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

陕西省志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第四十七卷

中国共产党志

(上)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

陕西省志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第四十七卷

中国共产党志

(上)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

陕西省志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第四十七卷

中国共产党志

(上)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 | | | |
|-------|-----|---------------------|
| 主 任 | 程安东 | 省长 |
| 副 主 任 | 贾治邦 | 常务副省长 |
| | 贾 湘 | 省政府副秘书长 |
| | 周伯光 | 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
| 委 员 | 董健桥 | 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
| | 张芳斌 | 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
| | 邓 理 | 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事厅厅长 |
| | 白智民 | 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
| | 宋海源 | 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
| | 姚 毅 | 省政协秘书长 |
| | 刘运通 | 省军区副参谋长 |
| | 丁全德 | 省财政厅厅长 |
| | 冀东山 | 省新闻出版局局长 |
| | 胡守贤 | 省统计局局长 |
| | 田晓光 | 省档案局局长 |
| | 武复兴 | 省图书馆名誉馆长 |
| | 霍松林 |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

《陕西省志·中国共产党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 袁纯清
副 主 任 吴崇信
委 员 王改民 赵毓明 刘文义 张志杰 李炳炯
兰友仁 王志明 王 新 甄生枝

《陕西省志·中国共产党志》编辑组

主 编 吴崇信 李鸿义
副 主 编 姚文琦
编 辑 宋新勇 康中兴 刘玉平
图片编排 刘玉平
责任校对 张春梅

审 定 单 位

一 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审稿委员会
二 审 《陕西省志·中国共产党志》编纂委员会
终 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工作领导小组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陕西省志·中国共产党志》撰稿人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习琳	王新	王小彦	王少民	王作权
王彦平	韦林珍	牛玉民	毛西康	田桦
付小青	刘玉平	孙亚政	杨文礼	杨发民
李承宗	李鸿义	李润乾	李瑞林	辛建民
宋新勇	张天成	张培林	陈华汉	邵持文
岳东峰	金沙曼	周磊	赵平	姜桦
段复汉	姚文萋	秦益珍	贾自新	高菁
高光厚	高建基	郭晓光	康中兴	韩锐民
蒲英	魏九林	魏华荣	魏晓鸿	魏照民

序

编修地方志,在陕西有悠久的历史。始自周秦,绵延历代,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史志文献资料。新中国成立以来,这项事业继续发展,成果丰硕,开创了盛世修志的新局面。

采取史志结合的方法,编修《陕西省志·中国共产党志》,是陕西地方志编修史上的第一次。它的编辑出版,是陕西中共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修工作相结合的一个新的重要成果。这部志书在陕西当代地方志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

本志书结稿之时,正值中国共产党的80年诞辰。这部志书的出版,对于了解党和人民的光辉历史特别是党在陕西的伟大实践,对于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鼓舞全省人民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与时俱进,再创辉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陕西省志·中国共产党志》,记述时限上迄1919年五四运动,下限截至1993年中共陕西省第七届委员会任期届满、中共陕西省第八届委员会成立并开始工作,共74年的历史。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党组织和陕西人民以其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中国革命的成功作出了独特的伟大贡献,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写下了永放光辉的重要篇章。

中国共产党陕西地方组织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初,是中国西北地区最早建立的中共地方组织之一。陕西党组织一成立,就以蓬勃的朝气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洪流,高举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旗帜,帮助当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三大政策的国民党恢复和发展了陕西地方组织,领导创办了被誉为“西北之黄埔”的中山军事学校,参与了反击北洋军阀刘镇华围困西安的斗争,支持国共合作的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很快把陕西的国民革命运动推向高潮,谱写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陕西篇。

中共陕西省委成立于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7月。在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中,省委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土地革命战争。先后发动了清涧、渭华、旬邑等多次武装起义,创建了渭北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红二十九军等陕西地方工农武装,开辟了渭北、陕甘边、陕北、鄂豫陕、川陕(陕南苏区)等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在陕北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是革命处于低潮时全国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八路军抗日斗争的出发点、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

一二·九运动后,中共陕西组织坚持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省委积极协助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工作,开展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后为三十八军)中的工作,创造了长期坚持地下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受到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赞扬。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里实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政策,代表了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被称为新中国的雏形。

解放战争时期,陕西党组织领导陕西人民和地方武装,支援和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胜利地转战陕北、保卫陕甘宁边区和解放陕西国民党统治区的伟大斗争,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进而解放了陕西全境。

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陕北和延安生活、战斗了13个春秋,史称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期。在

这一时期,陕北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延安成为举世闻名的革命圣地;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党领导革命从低潮走向高潮,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1948年3月,当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同志东渡黄河、离开陕北时,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胜利在望了。对这一历史时期,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10月26日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复电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陕西党组织领导全省人民,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发扬延安精神,艰苦奋斗,开拓前进,使古老的三秦大地焕发了青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解放前,陕西贫穷落后,百业凋敝,基本没有现代工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新中国建立后,陕西作为国家重点建设地区之一,经济快速发展,逐步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经济进入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轨道。到2000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660.9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长38倍。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对外开放取得重大进展,科教文卫等各项事业进一步发展。

改革开放使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2000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124元,实际比1978年增长2.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444元,实际比1978年增长1.6倍。农村扶贫目标基本实现,绝大部分农村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迈入小康生活。在物质文明建设大步跨越的同时,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丰硕的成果。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和在陕西的实践,生动而具体地

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的发展与未来。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全国和陕西在解放后、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大发展证明,无论是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或是搞改革开放,都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所以社会生产力能够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党在延安时期发展成熟的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延安精神,在陕甘宁边区实行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政策,延安时期开展的新文化、新文艺运动等等,是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集中代表。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始终高举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旗帜,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一切优秀文化和革命传统文化,分析和借鉴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断推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在中国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并且能够把中国人民带向光明、幸福、富裕的未来。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中流砥柱和革命、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

陕西党组织和陕西人民不仅具有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不怕困难的光荣传统,更具有实事求是、勇于探索、不断进取的开拓精神。光辉的延安精神永远是我们战胜困难、应对挑战、取得胜利的法宝。

历史不仅证明了过去,也预示着未来。

世界已进入 21 世纪。按照中共十五大制定的宏伟蓝图,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将在 2000 年基础上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再过十年,到建党 100 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 100 年时,将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民族将实现伟大的复兴。

迎着 21 世纪的曙光,随着国家建设战略重点的西移,中国西部大开发已迈开了坚实、有力的步伐,陕西又面临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陕西党组织和全省人民在新的世纪中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任重而道远。从 2001 年开始实施的陕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将使陕西经济和社会发展跃上新的台阶。我们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大力加强党的建设,进一步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奋发图强,团结奋斗,努力实现走在西部大开发的前列、早日建成西部经济强省的奋斗目标。

陕西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光荣的革命传统。古代的陕西,曾经以周秦汉唐之鼎盛著称于世;现代的陕西,曾经以西北的红星和延安精神光耀神州;进入新世纪的陕西,正在西部大开发的进军中迅速崛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个更加开放、文明、富裕的新陕西,将会展现于光辉的 21 世纪!

《陕西省志·中国共产党志》将继续记述中共陕西组织领导陕西人民,站在时代的前列所建立的新的辉煌业绩。

《陕西省志·中国共产党志》编纂委员会

2001 年 9 月 3 日

凡 例

一、《陕西省志·中国共产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历史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党领导陕西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

二、本志的时间上限起自 1919 年五四运动,下限截至 1993 年 5 月中共陕西省第七届委员会任期届满、第八届委员会产生。记述的主要内容为:中共陕西地方组织的创建、发展及其主要活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陕西和陕西边界地区建立的省级或相当省一级的中共组织,以及这些组织创建的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只记述了在今陕西辖区的情况;对中共中央及陕甘宁边区的重大活动作了摘要记述。

三、本志分为编、篇、章、节四个层次。考虑到中国共产党历史分期的特点和志书编纂体例的要求,我们采用史志结合的编纂方法,依时分期纪事,横排竖写。总体上仍是志书体例。

四、本志收录的中共陕西历史重要人物范围为:马列主义在陕西的早期传播者,中共陕西党、团组织的早期创建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省、地(特)委主要负责人,红军与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省级组织、政权组织、军事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书记处书记,不设书记处时期的书记、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长,省政协主席,省纪检委书记(1982 年 12 月后),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省军区司令员、政委。在外地工作,有较大影响的陕西籍中共党员;在中共陕西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人物。人物排列以姓氏笔画为序。

五、中共陕西地方组织领导的陕西省总工会、共青团陕西省委、陕西省妇

女联合会等群众组织的活动,因已各有专志出版,故在本志中未列专编,分别在有关篇章中概述。

六、本志所录中共组织名称,一律采用历史称谓,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用简称。

七、本志以文字记述为主,同时辅以图表、照片。

八、新中国成立、全国解放均指 1949 年 10 月 1 日。

目 录

序	(1)
凡 例	(1)
概 述	(3)
大事记	(51)

第一编 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中共陕西组织及活动 (1919.5—1949.10)

第一篇 中共组织的创立及在大革命时期的活动(1919.5—1927.7)	(247)
第一章 中共组织与进步团体	(249)
第一节 中共组织	(250)
第二节 青年团组织	(260)
第三节 进步团体	(265)
第四节 统一战线组织	(271)
第二章 中共组织在大革命时期的主要活动	(274)
第一节 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	(274)
第二节 陕西早期党、团组织的建立	(276)
第三节 驱刘、驱吴运动	(277)
第四节 陕西国民会议运动	(278)
第五节 非基督教运动	(279)
第六节 西安反围城斗争	(280)
第七节 中共组织在学校中的活动	(281)
第三章 重大事件及会议	(284)

第一节 重大事件	(284)
第二节 重要会议	(285)
第四章 报刊杂志	(289)
第二篇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组织及其活动(1927.7—1937.7)	
.....	(297)
第一章 中共组织	(299)
第一节 中共陕西省委及下属组织	(300)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在杨虎城部队中的组织	(316)
第三节 中共西北特别支部	(318)
第四节 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及下辖陕西地区组织	(318)
第五节 中共陕甘晋省委及下辖组织	(321)
第六节 中共陕北省委及下辖组织	(323)
第七节 中共陕甘省委及下辖陕西地区组织	(327)
第八节 中共陕甘宁省委及下辖陕西地区组织	(329)
第九节 中共川陕省委及下辖陕西地区组织	(331)
第十节 中共鄂豫陕省委及下辖陕西地区组织	(332)
第十一节 中共陕甘宁边(特)区委员会	(334)
第二章 共青团陕西地区组织及进步团体	(335)
第一节 共青团陕西省委员会	(335)
第二节 共青团陕西地区组织	(336)
第三节 进步团体	(339)
第三章 武装起义与“交农”围城	(342)
第四章 军事组织	(351)
第一节 早期军事组织	(351)
第二节 渭北根据地军事组织	(353)
第三节 陕甘边根据地军事组织	(354)
第四节 陕北根据地军事组织	(359)
第五节 川陕根据地陕南苏区军事组织	(364)
第六节 鄂豫陕根据地军事组织	(367)
第七节 西北根据地军事组织	(370)
第八节 其他军事组织	(375)

第五章 革命根据地	(377)
第一节 渭北革命根据地	(377)
第二节 照金革命根据地	(378)
第三节 陕南革命根据地	(379)
第四节 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	(380)
第五节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380)
第六节 陕北革命根据地	(382)
第七节 神府革命根据地	(382)
第八节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383)
第九节 西北革命根据地	(384)
第六章 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385)
第一节 陕甘边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386)
第二节 陕北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388)
第三节 西北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388)
第四节 神府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392)
第七章 红军会师在陕西	(397)
第一节 陕北游击支队与南梁游击队会师	(397)
第二节 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七军会师	(397)
第三节 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	(398)
第四节 红军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会师	(398)
第八章 重大事件及会议	(399)
第一节 重大事件	(399)
第二节 重要会议	(410)
第九章 战役 战斗	(425)
第十章 “左”倾冒险主义对陕西的影响	(432)
第一节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在陕西的影响	(432)
第二节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陕西的影响	(435)
第三节 罗章龙分裂主义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陕西的 影响	(437)
第十一章 中共组织举办的军政学校	(440)
第十二章 中共组织创办的报刊杂志	(442)

第三篇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组织及其活动(1937.7—1945.8)	(449)
第一章 中共组织与进步团体	(449)
第一节 中共组织	(449)
第二节 进步团体	(454)
第二章 抗日救亡工作	(465)
第一节 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465)
第二节 支援八路军出师抗日	(468)
第三节 与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合作抗日	(471)
第四节 团结国民党地方武装 合力保卫陕西	(475)
第五节 支持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开展抗日工作	(477)
第六节 反对国民党解散救亡团体	(479)
第七节 开展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	(481)
第八节 打退国民党顽固派三次反共高潮中对陕甘宁边区的 进攻	(484)
第三章 巩固、发展中共地方组织	(493)
第一节 执行荫蔽精干政策	(493)
第二节 国统区中共组织活动方式的改变与组织的巩固和 恢复	(496)
第三节 中共陕西省委和关中地委的干部整风	(499)
第四章 陕甘宁边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	(500)
第一节 党的建设	(500)
第二节 政权建设	(504)
第三节 经济建设	(510)
第四节 文化教育建设	(516)
第五章 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力量	(524)
第一节 八路军留守兵团(后方总留守处)	(525)
第二节 边区保安部队	(526)
第三节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526)
第四节 边区自卫军	(527)
第五节 其他军事组织	(528)
第六章 陕甘宁边区的重大运动	(531)

第一节	整风运动	(531)
第二节	“抢救失足者”运动	(534)
第三节	大生产运动	(536)
第四节	“双拥”运动	(541)
第七章	武装斗争	(543)
第一节	国统区抗日武装的发展	(543)
第二节	恒口起义	(549)
第三节	杨逢合起义	(549)
第四节	淳化起义	(549)
第五节	方里民意运动	(550)
第六节	爷台山反击战	(551)
第七节	支援敌后战场对日反攻	(552)
第八章	重大事件及会议	(553)
第一节	重大事件	(553)
第二节	重要会议	(562)
第九章	中共组织创办的学校与报刊	(568)
第一节	中共组织创办的学校	(568)
第二节	中共组织创办的报刊	(570)
第四篇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组织及活动(1945.8—1949.10)	(575)
第一章	中共组织与进步团体	(576)
第一节	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北解放区的中共组织	(578)
第二节	国统区的中共组织	(588)
第三节	陕南解放区的中共组织	(594)
第四节	进步团体	(599)
第二章	革命根据地	(609)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	(609)
第二节	豫鄂陕革命根据地	(610)
第三节	豫陕鄂革命根据地	(615)
第三章	军事组织	(618)
第一节	正规部队	(618)
第二节	地方武装	(631)

第四章 战役 战斗	(647)
第五章 重大事件与会议	(676)
第一节 重大事件	(676)
第二节 重要会议	(684)
第六章 起义 投诚	(689)
第七章 陕西全境解放	(699)
第一节 解放榆林国统区	(700)
第二节 解放延安国统区	(702)
第三节 解放铜川国统区	(703)
第四节 解放咸阳国统区	(704)
第五节 解放宝鸡	(706)
第六节 解放渭南	(707)
第七节 解放西安	(708)
第八节 解放商洛	(709)
第九节 解放安康	(710)
第十节 解放汉中	(712)

第二编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陕西组织及工作 (1949.10—1993.5)

第一篇 建国后的中共陕西地方组织(1949.10—1993.5)	(719)
第一章 中共陕西省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	(719)
第一节 中共陕西省委员会	(720)
第二节 中共陕西省委工作机构	(729)
第二章 陕西省人大、政协党组	(740)
第一节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党组	(741)
第二节 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党组	(742)
第三章 陕西省人民政府党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 军区党委	(744)
第一节 陕西省人民政府党组	(744)
第二节 陕西军区、陕西省军区党委	(748)

第四章 陕西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党组	(751)
第一节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	(751)
第二节 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党组	(752)
第五章 省级人民团体党组	(753)
第六章 地、市、县党的组织领导机构	(756)
第一节 建国初期的中共陕北区委员会和中共陕南区委员会 ..	(758)
第二节 建国初期的中共绥德、黄龙、彬县、三原、大荔地方 委员会	(759)
第三节 省委直辖的县(市、区)委员会	(761)
第四节 中共西安市委员会	(767)
第五节 中共宝鸡市(地方、地区)委员会	(770)
第六节 中共咸阳市(地方、地区)委员会	(773)
第七节 中共渭南地方(地区)委员会	(776)
第八节 中共铜川市委员会	(777)
第九节 中共榆林地方(地区)委员会	(779)
第十节 中共延安地方(地区)委员会	(780)
第十一节 中共汉中(南郑)地方(地区)委员会	(782)
第十二节 中共安康地方(地区)委员会	(784)
第十三节 中共商洛地方(地区)委员会	(786)
第二篇 恢复国民经济与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1949.10—1956.9)	(789)
第一章 城市接管与建立、巩固人民政权	(789)
第一节 城市接管与生产救灾	(789)
第二节 建立人民政权	(797)
第三节 城乡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造	(803)
第四节 剿灭土匪	(810)
第五节 抗美援朝运动	(817)
第六节 农村土地改革	(823)
第七节 镇压反革命运动	(830)
第八节 “三反”“五反”运动	(835)
第二章 经济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	(839)

第一节	统一财政、调整工商业、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839)
第二节	宣传过渡时期总路战,实行统购统销政策	(846)
第三节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849)
第四节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857)
第五节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862)
第六节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	(868)
第三篇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956.10—1966.4)	(877)
第一章	曲折前进中的经济建设	(877)
第一节	“大跃进”运动	(877)
第二节	人民公社化运动	(885)
第三节	全面调整国民经济	(889)
第四节	第二个五年计划和调整时期的经济建设	(899)
第二章	初步纠“左”与“左”倾错误再度膨胀	(905)
第一节	初步纠正“左”倾错误	(905)
第二节	“反右倾”斗争与平反甄别工作	(908)
第三节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民主革命补课	(913)
第四篇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923)
第一章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	(923)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923)
第二节	“造反派”夺权与武斗	(927)
第三节	“斗、批、改”和整党建党	(932)
第四节	贯彻《汇报会传达提纲》与1975年的全面整顿	(934)
第五节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	(937)
第六节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破坏	(939)
第二章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经济建设和“三线”建设	(942)
第一节	第三个五年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实施	(943)
第二节	“三线”建设	(944)
第五篇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76.10—1993.5)	(953)
第一章	拨乱反正与维护安定团结	(953)
第一节	开展批判“四人帮”的揭批查斗争	(953)
第二节	拨乱反正与平反冤假错案	(956)

第三节	改进干部作风与调整农村经济政策	(960)
第四节	调整国民经济与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实施	(963)
第五节	平息政治风波,维护安定团结	(967)
第二章	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	(973)
第一节	中共陕西省委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导和重大决策	(973)
第二节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980)
第三节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997)
第四节	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	(1018)
第五节	对外开放	(1025)
第六节	发展旅游业	(1033)
第七节	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	(1038)
第八节	老区建设和扶贫开发	(1044)
第九节	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与实施	(1056)
第三章	教育、科技、卫生、文艺、体育体制的改革	(1061)
第一节	教育体制改革	(1061)
第二节	科技体制改革	(1071)
第三节	卫生体制改革	(1079)
第四节	文化艺术体制改革	(1088)
第五节	体育体制改革	(1099)
第四章	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的改革	(1105)
第一节	领导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	(1105)
第二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1119)
第三节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1126)
第五章	党的建设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132)
第一节	加强党的建设	(1132)
第二节	中共陕西省委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与决策	(1142)
第三节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1147)
第四节	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弘扬延安精神	(1153)
第五节	群众性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1164)
第六节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	(1174)

第三编 建国后省委各党务部门(单位)的主要工作

第一篇 党的组织工作	(1181)
第一章 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1181)
第一节 基层组织的发展与分布状况	(1181)
第二节 对基层党组织的领导管理	(1187)
第三节 基层党组织的活动	(1187)
第二章 党员队伍	(1188)
第一节 党员队伍的发展	(1188)
第二节 党员队伍的分布	(1190)
第三节 党员队伍的结构	(1192)
第四节 党员队伍的教育管理	(1194)
第三章 党的干部工作	(1196)
第一节 干部提拔和使用	(1197)
第二节 干部管理权限	(1202)
第三节 后备干部队伍建设	(1205)
第四节 干部培训	(1208)
第五节 老干部工作	(1211)
第四章 整党整风	(1213)
第一节 1950年的整风学习	(1213)
第二节 1951年至1954年的整党建党	(1215)
第三节 1957年的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	(1219)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整党建党	(1229)
第五节 1983年至1987年的整党与1990年的党员重新 登记	(1231)
第二篇 党的宣传与思想工作	(1241)
第一章 宣传工作	(1241)
第一节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时期的宣传工作	(1241)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宣传工作	(1244)

第三节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宣传工作	(1246)
第二章 宣传机构与宣传队伍	(1249)
第一节 宣传机构	(1249)
第二节 宣传队伍	(1250)
第三章 理论宣传	(1254)
第一节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	(1254)
第二节 邓小平理论的宣传	(1256)
第四章 新闻宣传	(1260)
第一节 新闻媒体	(1260)
第二节 宣传内容	(1264)
第三节 新闻队伍建设	(1267)
第五章 文艺宣传	(1269)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的文艺宣传 ..	(1269)
第二节 新时期的文艺事业	(1271)
第六章 思想道德教育	(1274)
第一节 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	(1274)
第二节 延安精神教育	(1278)
第三节 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1280)
第三篇 统一战线工作	(1285)
第一章 建立与发展政治协商和多党合作	(1285)
第一节 人民政协组织及其工作	(1286)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	(1290)
第二章 海外统战工作	(1303)
第一节 对台工作	(1304)
第二节 海外联谊工作	(1306)
第三章 民族、宗教工作	(1309)
第一节 少数民族工作	(1309)
第二节 宗教工作	(1312)
第四章 统战教育工作	(1314)
第一节 陕西社会主义公学	(1314)
第二节 陕西社会主义学院	(1315)

第四篇 省委政策研究、党史研究和党校工作	(1317)
第一章 政策研究工作	(1317)
第一节 调查研究工作	(1317)
第二节 党的决策参谋与咨询工作	(1336)
第三节 综合资料与书刊编纂	(1339)
第二章 党史资料征集与研究	(1343)
第一节 机构与队伍建设	(1344)
第二节 资料征集与研究	(1346)
第三节 党史宣传教育	(1349)
第四节 党史书刊编纂	(1350)
第三章 党校教育	(1353)
第一节 党校组织机构	(1353)
第二节 教育方针及内容	(1358)
第三节 干部培训教育	(1362)

第四编 中共陕西省顾问委员会及其工作

第一章 中共陕西省顾问委员会	(1369)
第二章 省顾委的工作机构	(1372)
第三章 省顾委的工作	(1373)
第四章 省顾委全体委员会议	(1392)

第五编 中共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及其工作

第一章 组织机构	(1400)
第二章 纪检队伍	(1407)
第三章 党风廉政建设	(1412)
第四章 纪律处分	(1428)
第五章 案件复查	(1435)

第六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共陕西省委的重要会议

- 中共陕西省第一次代表会议(1950.7) (1441)
- 中共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1954.7) (1442)
- 中共陕西省一届一次全体委员会议(1954.8) (1442)
- 中共陕西省代表会议(1955.5) (1443)
- 中共陕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1956.6) (1443)
- 中共陕西省二届一次全体委员会议(1956.7) (1444)
- 中共陕西省二届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1956.10) (1444)
- 中共陕西省二届三次全体委员会议(1956.11) (1445)
- 中共陕西省二届四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1957.4) (1445)
- 中共陕西省二届五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1957.10) (1445)
- 中共陕西省二届六次全体委员会议(1957.11) (1445)
- 中共陕西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1957.11) (1446)
- 中共陕西省二届七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1958.2) (1446)
- 中共陕西省二届八次全体委员会议(1958.3) (1446)
- 中共陕西省二届九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1958.9) (1447)
- 中共陕西省二届十次全体委员会议(1958.12) (1447)
- 中共陕西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1959.1) (1447)
- 中共陕西省二届十一次全体委员会议(1959.4) (1448)
- 中共陕西省二届十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1959.8) (1448)
- 中共陕西省二届十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1960.2) (1448)
- 中共陕西省委五级干部会议(1960.3) (1449)
- 中共陕西省二届十四次全体委员会议(1960.10) (1449)
- 中共陕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1960.11) (1450)
- 中共陕西省三届一次全体委员会议(1960.11) (1451)
- 中共陕西省三届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1961.1) (1451)
- 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会议(1961.3) (1451)
- 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会议(1961.6) (1451)
- 中共陕西省三届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1961.10) (1452)

中共陕西省三届四次全体委员会议(1962.6)	(1452)
中共陕西省三届五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1962.10)	(1453)
中共陕西省三届六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1963.3)	(1453)
中共陕西省三届七次全体委员会议(1963.11)	(1453)
中共陕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1963.11)	(1453)
中共陕西省四届一次全体委员会议(1963.11)	(1454)
中共陕西省四届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1964.7)	(1455)
中共陕西省四届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1964.11)	(1455)
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会议(1965.1)	(1455)
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会议(1965.5)	(1456)
中共陕西省四届四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1966.3)	(1456)
中共陕西省四届五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1966.7)	(1456)
中共陕西省委三级干部会议(1966.11)	(1456)
中共陕西省第五次代表大会(1971.2)	(1457)
中共陕西省五届一次全体委员会议(1971.3)	(1457)
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会议(1971.7)	(1458)
中共陕西省五届二次全体委员会议(1972.8)	(1458)
中共陕西省五届三次全体委员会议(1973.6)	(1458)
中共陕西省五届四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1973.6)	(1459)
中共陕西省委地(市)、县委书记会议(1973.6)	(1459)
中共陕西省五届五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1973.9)	(1459)
中共陕西省五届六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1974.2)	(1460)
中共陕西省五届七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1974.10)	(1460)
中共陕西省五届八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1975.1)	(1461)
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会议(1975.7)	(1461)
中共陕西省五届九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1977.3)	(1461)
中共陕西省五届十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1977.6)	(1462)
中共陕西省五届十一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1977.7)	(1462)
陕西省三级干部会议(1977.9)	(1462)
陕西省地(市)、县委书记会议(1977.12)	(1463)
陕西省科学大会(1978.4)	(1463)

中共陕西省常委扩大会议(1978.8)	(1464)
中共陕西省常委扩大会议(1978.12)	(1464)
陕西省三级干部会议(1979.1)	(1465)
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会议(1979.5)	(1465)
中共陕西省五届十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1980.3)	(1466)
中共陕西省委三级干部会议(1981.1)	(1467)
中共陕西省五届十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1981.7)	(1468)
中共陕西省代表会议(1981.7)	(1468)
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会议(1982.1)	(1469)
中共陕西省委三级干部会议(1982.12)	(1470)
中共陕西省五届十四次全体委员会议(1983.4)	(1471)
中共陕西省第六次代表大会(1983.4)	(1471)
中共陕西省六届一次全体委员会议(1983.4)	(1472)
中共陕西省六届二次全体委员会议(1983.11)	(1473)
中共陕西省委三级干部会议(1983.11)	(1473)
中共陕西省委县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1984.8)	(1474)
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会议(1985.2)	(1474)
中共陕西省六届三次全体委员会议(1985.2)	(1475)
中共陕西省六届四次全体委员会议(1986.1)	(1475)
中共陕西省代表会议(1986.1)	(1476)
中共陕西省六届五次全体委员会议(1986.1)	(1476)
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会议(1986.1)	(1477)
中共陕西省六届六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1987.1)	(1477)
中共陕西省代表会议(1987.6)	(1478)
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会议(1987.12)	(1479)
中共陕西省六届七次全体委员会议(1987.12)	(1479)
中共陕西省六届八次全体委员会议(1988.4)	(1480)
中共陕西省第七次代表大会(1988.4)	(1480)
中共陕西省七届一次全体委员会议(1988.5)	(1481)
中共陕西省七届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1988.10)	(1482)
中共陕西省七届三次全体委员会议(1989.6)	(1483)

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会议(1989.11)	(1483)
中共陕西省七届四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1989.11)	(1484)
中共陕西省七届五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1990.3)	(1484)
中共陕西省七届六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1991.1)	(1485)
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会议(1991.10)	(1486)
中共陕西省七届七次全体委员会议(1991.12)	(1486)
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会议(1992.4)	(1487)
中共陕西省七届八次全体委员会议(1992.4)	(1488)
中共陕西省代表会议(1992.6)	(1488)
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会议(1992.11)	(1489)
中共陕西省七届九次全体委员会议(1992.11)	(1489)
中共陕西省七届十次全体委员会议(1993.4)	(1490)
中共陕西省第八次代表大会(1993.5)	(1490)
中共陕西省八届一次全体委员会议(1993.5)	(1491)
中共陕西省八届二次全体委员会议(1993.12)	(1492)

第七编 中共陕西历史人物

三画		王 瀛	(1499)
		王化民	(1499)
于明涛	(1495)	王文忠	(1499)
卫志毅	(1495)	王生玉	(1500)
习仲勋	(1496)	王兰江	(1500)
马云程	(1496)	王世泰	(1500)
马文瑞	(1497)	王任重	(1500)
马明方	(1497)	王观澜	(1501)
马佩勋	(1498)	王达成	(1502)
马锡五	(1498)	王兆相	(1502)
四画		王兆卿	(1502)
王 林	(1498)	王志成	(1503)
		王克明	(1503)

王希斌	(1503)
王辛德	(1503)
王芾南	(1504)
王尚德	(1504)
王柏栋	(1504)
王复生	(1505)
王炳南	(1505)
王泰吉	(1506)
王授金	(1506)
王德安	(1506)
王懋廷	(1507)
支益民	(1507)
牛书申	(1507)
文建武	(1507)
亢心裁	(1508)
方升普	(1508)
方仲如	(1509)
方鉴昭	(1509)
孔从洲	(1510)
孔昭文	(1510)

五画

艾楚南	(1510)
卢绍亭	(1511)
田伯英	(1511)
史可轩	(1511)
白文华	(1512)
白如冰	(1512)
白纪年	(1513)
白治民	(1513)
白明善	(1513)

白炳炘	(1513)
白清才	(1514)
白耀亭	(1514)
冯基平	(1514)
宁耀峰	(1515)

六画

吉国桢	(1515)
巩德芳	(1515)
吕佑乾	(1515)
吕剑人	(1516)
朱开铨	(1516)
朱理治	(1517)
乔国桢	(1517)
乔钟灵	(1517)
任 醴	(1518)
刘 庚	(1518)
刘天章	(1519)
刘甲三	(1519)
刘志丹	(1519)
刘坚予	(1520)
刘伯坚	(1520)
刘含初	(1521)
刘金轩	(1521)
刘荣惠	(1522)
刘映胜	(1522)
刘顺元	(1522)
刘继曾	(1523)
刘景范	(1523)
刘澜涛	(1524)
安子文	(1524)

- | | | | |
|-----|--------|-----|--------|
| 安存真 | (1525) | 李子洲 | (1535) |
| 安启元 | (1525) | 李子健 | (1535) |
| 许才升 | (1525) | 李世英 | (1536) |
| 许权中 | (1525) | 李生华 | (1536) |
| 毕维周 | (1526) | 李尔重 | (1536) |
| 牟玲生 | (1526) | 李合邦 | (1536) |
| 孙作宾 | (1526) | 李庆伟 | (1537) |
| 孙洪道 | (1527) | 李冲霄 | (1537) |
| 七画 | | | |
| 严克伦 | (1527) | 李志民 | (1537) |
| 苏士杰 | (1527) | 李启明 | (1538) |
| 杜衡 | (1528) | 李妙斋 | (1538) |
| 杜润滋 | (1528) | 李焕政 | (1538) |
| 杨江 | (1528) | 李茂堂 | (1539) |
| 杨珊 | (1529) | 李特生 | (1539) |
| 杨琪 | (1529) | 李隆贵 | (1540) |
| 杨森 | (1529) | 李维汉 | (1540) |
| 杨文谟 | (1530) | 李维俊 | (1541) |
| 杨佑章 | (1530) | 李景林 | (1541) |
| 杨伯伦 | (1530) | 李景膺 | (1541) |
| 杨国栋 | (1531) | 李富春 | (1542) |
| 杨明轩 | (1531) | 李象九 | (1542) |
| 杨和亭 | (1531) | 李瑞山 | (1543) |
| 杨拯民 | (1532) | 李溪溥 | (1543) |
| 杨重远 | (1532) | 李嘉谟 | (1543) |
| 杨得志 | (1532) | 吴化之 | (1544) |
| 杨嘉瑞 | (1533) | 吴岱峰 | (1544) |
| 李达 | (1533) | 吴桂贤 | (1544) |
| 李良 | (1534) | 吴浩然 | (1544) |
| 李一氓 | (1534) | 吴焕先 | (1545) |
| | | 时逸之 | (1545) |
| | | 何挺杰 | (1546) |

- | | | | |
|-----------|--------|-----------|--------|
| 何挺颖 | (1546) | 张德生 | (1559) |
| 何振亚 | (1546) | 陈 征 | (1559) |
| 余海丰 | (1547) | 陈元方 | (1559) |
| 邹 均 | (1547) | 陈文华 | (1560) |
| 汪 铭 | (1547) | 陈先瑞 | (1560) |
| 汪 锋 | (1548) | 陈浅伦 | (1561) |
| 宋兴国 | (1548) | | |
| 张 中 | (1548) | 八画 | |
| 张 策 | (1549) | 武止戈 | (1561) |
| 张友清 | (1549) | 林伯渠 | (1561) |
| 张方海 | (1550) | 拓克宽 | (1562) |
| 张汉民 | (1550) | 欧阳钦 | (1562) |
| 张汉武 | (1550) | 罗文治 | (1563) |
| 张汉俊 | (1551) | 罗梓铭 | (1563) |
| 张仲良 | (1551) | 金理科 | (1564) |
| 张仲实 | (1552) | 周冬至 | (1564) |
| 张邦英 | (1552) | 周芝轩 | (1564) |
| 张达志 | (1553) | 周彬如 | (1564) |
| 张秀山 | (1553) | 周雅光 | (1565) |
| 张含辉 | (1554) | 郑位三 | (1565) |
| 张国焘 | (1554) | 孟用潜 | (1565) |
| 张国藩 | (1555) | 孟芳洲 | (1565) |
| 张庚良 | (1556) | | |
| 张性初 | (1556) | 九画 | |
| 张宗逊 | (1557) | 赵连臣 | (1566) |
| 张勃兴 | (1557) | 赵守一 | (1566) |
| 张晨钟 | (1557) | 赵寿山 | (1566) |
| 张继华 | (1558) | 赵伯平 | (1567) |
| 张鸿博 | (1558) | 赵启民 | (1567) |
| 张慕陶 | (1558) | 赵焕职 | (1568) |
| 张蔚森 | (1558) | 赵葆华 | (1568) |

胡 炜 (1569)
胡达明 (1569)
胡炳云 (1570)
胡景铎 (1570)
胡耀邦 (1570)
秋步月 (1571)
姜 一 (1571)
宣侠父 (1571)
贺 龙 (1572)
贺晋年 (1573)

十画

秦武山 (1574)
秦善秀 (1574)
袁克服 (1574)
袁岳栋 (1575)
耿 觉 (1575)
耿炳光 (1575)
聂洪钧 (1575)
校明济 (1576)
贾拓夫 (1576)
侯宗宾 (1577)
徐九龄 (1577)
徐宝珊 (1577)
徐海东 (1578)
徐梦周 (1578)
高 岗 (1578)
高长久 (1579)
高自立 (1579)
高克林 (1580)
高朗亭 (1581)

高维嵩 (1581)
高维翰 (1581)
高锦纯 (1581)
郭子青 (1582)
郭述申 (1582)
郭洪涛 (1583)
唐 澍 (1583)
唐洪澄 (1584)

十一画

黄子文 (1584)
黄子祥 (1585)
黄平万 (1585)
黄罗斌 (1585)
黄经耀 (1586)
曹力如 (1586)
曹志麟 (1586)
萧 纯 (1587)
萧 潮 (1587)
章 泽 (1587)
常黎夫 (1588)
崔田夫 (1588)
崔田民 (1588)
崔孟博 (1589)
崔景岳 (1589)
阎红彦 (1589)
阎揆要 (1590)
梁益堂 (1590)

十二画

彭加伦 (1591)

彭德怀	(1591)	蒲克敏	(1599)
董继昌	(1592)	雷光显	(1599)
韩学亚	(1592)	雷晋笙	(1599)
惠子明	(1592)	慕生忠	(1599)
惠子俊	(1592)	蔡长元	(1600)
程子华	(1593)	蔡南轩	(1600)
程家盛	(1593)	廖乾五	(1600)
程德章	(1594)	颜金生	(1601)
焦维炽	(1594)	潘自力	(1601)
舒 同	(1594)	薛自爽	(1602)
曾慎达	(1595)	薛永寿	(1602)
鲁 贲	(1595)	冀月亭	(1602)
谢 华	(1595)	冀廷璧	(1603)
谢子长	(1596)	霍士廉	(1603)
谢怀德	(1597)	霍世杰	(1603)
谢觉哉	(1597)	霍维德	(1603)
谢唯俊	(1598)	戴季英	(1604)
		魏光波	(1604)
		魏野畴	(1605)
十三画以上			
蒲子华	(1598)		
后 记			(1607)

概 述

概 述

中共陕西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较早的一支战斗的队伍。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共陕西组织领导陕西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在长征后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作出了独特的、历史性的贡献。此后,从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陕北和延安成为全国革命的指挥中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这里战斗和工作了13个春秋,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共陕西省委作为中国执政党的地方组织,领导全省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实行土地改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为陕西的繁荣发展和人民的幸福,艰苦奋斗,开拓前进,使古老的陕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陕西省志·中国共产党志》全面、翔实地记述了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早期传播和中共陕西组织建立以来,截至1993年5月中共陕西第七届委员会任期届满、第八届委员会开始工作,共74年的历史进程。

中共陕西组织的建立和在大革命中的活动

1919年春,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5月4日,陕西在北京求学的刘天章、李子洲、杨明轩、刘含初、呼延震东、魏野畴、郝梦九(郝祖龄)、杨钟健、张耀东等积极参加了爱国示威游行和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等斗争。当天,陕籍学生杨明轩、郝梦九等九人被捕。6月3日,刘天章、刘含初也被捕入狱。5月14日,西安的《长安日报》首次对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作了报道。此

后,西安法政专科学校、省立一中、三中等校学生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6月初,正式组成了陕西学生联合会。6月28日,陕西成德中学学生屈武作为北京各界联合请愿团推举的十名代表之一,在与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的辩论中,言词激烈慷慨,以头触地,血溅总统府,一时传闻全国。与此同时,在陕北、渭北和陕南的一些地方,也先后发生了响应五四运动的学生运动。在上海和武汉求学的陕籍旅外学生雷晋笙、严信民、王尚德等,也在当地参加了响应五四运动的斗争。陕西知识青年在京、在陕和在上海、武汉等地的斗争,表现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爱国主义精神。参加五四运动的许多青年,包括李子洲、刘天章、王尚德等,后来都成为马克思主义在陕西最早的一批传播者。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陕西逐步地传播起来。早期在陕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是在外地求学回陕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在陕从事教育工作的进步人士。影响较大的有刘天章、李子洲、魏野畴、王复生、王尚德等陕籍人士在陕、在外地创办或主编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报刊。这些报刊对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陕西,起到了重要作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陕西中共组织和共青团组织的建立,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和干部的准备。

陕西从1922年起就有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活动。中共组织的建立过程是:先建立青年团组织,后建立共产党组织;先发展革命的知识分子,后发展工农劳动群众;先在城市建立组织,后在农村建立组织。

1922年8月,已在武汉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王尚德回到家乡陕西省渭南县的赤水镇,在赤水职业学校发展团员,于1924年6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支部干事会(又称“赤职支部”,后改为独立支部、特别支部),王尚德为书记。这是陕西地区建立最早的团组织。1924年夏,武止戈在西安进行建团活动,建立了西安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8月,在上海求学的陕籍学生、共产党员雷晋笙回到西安,参加并领导了西安团组织,并将其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西安第一支部。1924年秋,邹遵与魏野畴一起发展团员,建立了青年团西安第二支部。在此期间,在三原、华县等地也都建立了团的组织。1925年10月,成立了中共西安特别支部,共有党员五名。12月,成立了中共三原特支和赤水特支。1926年1月底,成立了中共西安地方执行委员会,统一领导陕西关中地区党的组织。

1924年夏,共产党员李子洲在任陕北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时,与

王懋廷、田伯英一起进行建团活动,于年底成立了陕西绥德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团。1925年2月成立了特别支部,这是陕北地区成立的第一个团组织。1925年冬,绥德团特支(即团陕北特支)改建为团地方执行委员会。

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的党组织,是陕北地区最早建立的共产党组织,归中共北方区委领导。1926年5月,中共北方区委派耿炳光为特派员到陕北考察和指导党团工作,对在此之前已经建立的陕北地区的中共组织进行整顿后,于6月上旬成立了中共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下辖三个支部、三个特支。

1926年12月,陕西党团组织统一的指导机关——陕西党团联席会议在西安成立,下属党的组织有西安、渭南地委和赤水、固市、临潼、三原、富平、泾阳、旬邑、兴平、岐山、乾县、延安等特支和近30个支部。加上当时隶属北方区委领导的绥德地委所属组织,共有党员388名。团的组织共有团员525名。

1927年1月,根据中央的决定,成立了中共陕甘区委。3月,陕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举行,选举耿炳光、魏野畴、李子洲、亢维恪(亢心裁)、陈家珍为区委委员,耿炳光为书记。1927年7月上旬,党、团陕西省委成立,党、团陕甘区委结束。

中共陕西组织一成立就投入到1924年至1927年席卷全国的反帝、反军阀的大革命运动之中,谱写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陕西篇。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政府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支持下,发起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国民会议运动。1924年12月底,团中央派李秉乾从上海回陕,北京党团组织派屈武、董汝诚以孙中山的代表名义回陕,开展国民会议运动。1925年2月由魏野畴主持成立了陕西省国民会议促成会。2月1日通过了致孙中山、段祺瑞及各省区的通电。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陕西各地团支部和党团员,组织领导青年、学生和国民会议促成会等组织进一步揭露了段祺瑞的“善后会议”阴谋,推动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1925年5月30日,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惨杀工人和学生的消息传到陕西后,陕西的党、团组织立即以各种形式开展声援上海工人、学生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在西安和陕西各地组织群众游行示威、罢工罢市,要求收回租界、惩办凶手、赔偿损失。各地还开展了支援上海人民反帝斗争的募捐活动和抵制日、英货的斗争。

1924年到1925年,早期的中共党员、团员先后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

党。为了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1925年下半年,一批有国民党党员身份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到全省各地帮助国民党筹建地方组织。1925年8月18日,成立了陕西省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在俱乐部第二次会议上,公推刘含初为主席,杨明轩、赵葆华为书记。1926年1月,魏野畴等作为国民党的陕西代表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刘、杨、赵、魏都是共产党员兼有国民党党员身份)。1927年1月,国民党陕西省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当选为省党部执委和候补执委的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省党部的组织、宣传、农民各部的部长均由共产党员担任。在帮助国民党建立地方组织的同时,中共陕西地方组织也有了很大发展,全省党员达到2000多名。

1926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对北方倾向国民革命的国民军发动进攻。4月,直系的陕甘军总司令刘镇华率部围困了西安。为了打破北洋军阀再度统治陕西的梦想,策应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在围城之前,中共西安地委即派魏野畴等协助国民军二军、三军召开会议,决定组成以李虎臣为总司令、杨虎城为副总司令的统一守城指挥部。在坚守西安的艰难日子里,中共西安和关中地区的党团组织广泛开展了反围城斗争。11月,冯玉祥率国民军联军入陕,与西安守军互相配合,打败了刘镇华部,使被围困八个月之久的西安解围。从此结束了北洋军阀在陕西的统治。12月,成立了国共合作的陕西临时军政府——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于右任任总司令,邓宝珊为副总司令,共产党人魏野畴、史可轩分别担任政治部副主任、政治保卫部部长。中共组织领导创办的中山军校,由史可轩任校长,邓希贤(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刘景桂(刘志丹)等任教官,被誉为“西北之黄埔”。中共组织和共青团组织在此期间也得到很大发展。截至1927年6月,中共地委由原来的二个增加到七个,特支由九个增加到41个,党员由388名增加到2177名,共青团员由525名增加到2400名。全省的工、农、青、妇组织也纷纷成立,其领导骨干大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

在席卷全国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中,中共陕西地方组织迅速发展壮大,以勃勃的生气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和斗争,成为这场大革命在陕西的中流砥柱。

燃起土地革命烈火,创建革命根据地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陕西的共产党、国民党、国民军联军

驻陕总部一致行动,组织讨蒋反蒋活动。同年6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在豫陕甘等省进行“清党”反共。7月18日,冯系陕西省政府成立,宣布解散一切革命组织,中共在陕西各地的组织均被取缔,在冯玉祥部和西安各革命组织中的共产党员被驱除。著名的共产党员史可轩、刘含初被害,刘天章被捕,白色恐怖笼罩陕西。到1927年秋,全省党员减少到1681人。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决定撤销陕甘区委。7月上旬,在西安成立了中共陕西省委。耿炳光任书记。

1927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制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加紧整顿和恢复各地的党组织,准备在农村举行武装暴动。从此,在陕西和陕西边界地区燃起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熊熊烈火。在长达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中,中共陕西省委坚持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清涧起义 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后,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第一枪在陕北的清涧县打响。1927年10月12日,共产党员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乐亭等组成陕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率领党在陕北军阀井岳秀部所掌握的一部分军队举行起义。起义部队从清涧一路南下,转战延川、延长、宜川、韩城、安定、安塞、保安,历时三个多月。1928年1月,起义部队在韩城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总指挥唐澍,副总指挥谢子长。月底,在北上突袭宜川的战斗中失利,撤出后遭敌追击,损失严重,最后在陕甘边界的洛河川一带分散隐蔽。

渭华起义 1928年3月,省委决定发动陕东暴动,以期引发全陕总暴动,建立全陕苏维埃政权。5月1日至4日,渭南、华县地区的农民在渭华原上举行群众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10日,由中共掌握的李虎臣部许权中旅开赴华县,在瓜坡镇宣布起义,抵达华县高塘后正式宣布工农革命军成立,唐澍任总司令,刘景桂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全军近千人与农民起义队伍会合,开辟了以华县、高塘、渭南塔山为中心,约200平方公里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但很快遭到优势力量之敌的围攻,起义军民进行了顽强斗争,终因敌强我弱,力量过于悬殊,于6月下旬败退入渭华南山,洛南县的两岔河和保安镇,蓝田县的许家庙等地。在保安镇的战斗中,唐澍牺牲。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起义地区的人民群众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为策应渭华起义,形成全陕总暴动的局面,在省委领导下,三原、泾阳、礼

泉、永寿等县开展了以交农具、围县城、抗粮抗税为主要形式的武装围城斗争；发动了麟游武装起义、旬邑农民起义、三原农民起义、淳化农民起义、澄城农民起义。其中，旬邑和淳化起义的农民曾攻进县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由于客观上敌强我弱，主观上缺乏斗争经验，以及受中央“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影响，陕西的这些起义都先后失败了。但是，在革命转入低潮，反动派向革命人民举起屠刀，斗争陷入严重困难的时期，敢于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表现了党和人民英勇无畏的革命气概，打击了敌人，锻炼了干部和群众，撒播下革命的火种，对于后来陕西革命运动的发展、工农红军的组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陕西地区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

以渭南起义为中心的陕西各地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党的组织迭遭破坏，中共陕西组织转入了地下斗争。

1928年11月27日长安县委被破坏，省委书记潘自力于28日被捕。1929年1月底，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后，团省委书记马云藩和省委委员大部被捕，党团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在这种形势下，省委委员张国藩（张质平）、王林（王芾南）、薛永寿等，于1929年3月1日在渭南的白家庄召开渭南、韩城、乾县、蒲城、富平等地党团负责人紧急联席会议，成立了临时省委，书记王林。1929年3月23日，临时省委会议决定杜衡任临时省委书记。4月16日、6月28日，中共中央两次给临时省委来信和作出《陕西问题决议案》，对陕西党在遭到大破坏之后，很快成立临时省委表示满意，并对陕西党的工作做了指示。1929年7月中旬，临时省委在渭南辛市召开全会，传达中央指示和决议，再次调整领导成员，书记杜衡，王林、张蔚森为常委。1930年7月1日至8日，临时省委在蓝田巩村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通过了政治形势、职运、农运、兵运、组织、宣传等决议案，改临时省委为正式省委，书记杜衡，常委王林、吉国桢（兼西安市委书记）。1930年10月10日，陕西党团组织再次遭到大破坏，党团省委负责人吉国桢、贾拓夫等30多人被捕，直到11月越狱，恢复了陕西党团省委和西安市委的工作。1933年7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省委委员兼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等人被捕后叛变，供出了他们知道的所有党的组织和党员。自29日起省委机关和关中、陕南各县党组织均先后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共产党员被捕遇害。省委遭到大破坏后，贾拓夫、刘宗沛（团省委书记）立即作出了应急布置。8月上旬，党团活动分子开会，决定成立省

委工作委员会。月底,由刘映胜、张新发、樊德音、雷振东、李冲霄等人组成临时省委,书记刘映胜。会后,派人去各地开展工作。不料,9月中旬临时省委开会时,被内奸出卖,临时省委成员全部被捕。10月,咎玉祥、孙作宾、余海丰、崔廷儒、胡振家等党员干部,再次成立临时省委,余海丰为书记。为了打击叛徒特务,保护党的组织,临时省委成立特工队锄奸反特。11月,余海丰被捕,临时省委又遭破坏。此后几年,孙作宾、魏光波、崔廷儒、高克林等先后几次成立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或其他领导机构继续顽强地坚持地下斗争。

西安事变后,为适应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新时期的需要,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1936年12月25日,陕西省委恢复,书记贾拓夫。省委恢复后,积极贯彻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和抗日救亡运动,同时,整顿与健全各地党的组织。到1937年3月,蓝田、渭南、华县、临潼、扶风、乾县、韩城等26县恢复了党的组织与活动。到5月底,除省委领导的关中特委和军队中的党员以外,仅在国民党统治区即有市委一个,县(工)委12个,党员896人。1937年5月22日在泾阳县云阳镇召开了中共陕西省代表会议,动员全省党的组织和党、团员把工作转移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为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而斗争。经历了土地革命的血雨腥风,在斗争——失败——再斗争的过程中,中共陕西组织在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更加坚强、更加成熟了。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组织领导了若干武装起义,并在这一过程中创建了陕西和陕西边界地区的地方工农武装。1928年清涧、渭华起义中建立了工农革命军。以后几年,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到30年代初又创建了渭北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红二十九军和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等几支工农武装。这些革命武装的建立和发展,是以革命的武装力量对抗反革命的武装力量,开展地方游击战争,开辟、扩大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保障。

中共陕西组织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在陕西和陕西边界地区开辟革命根据地,是从1932年前后开始的。在周围白色区域和白色恐怖的环境中,经过几年的浴血奋战,先后在陕西和边界地区建立了多块革命根据地。中共陕西组织领导革命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多次“围剿”,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勇于开拓的精神。这些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和巩固,为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础。这些革命根据地主要有:

渭北革命根据地 由中共陕西省委和三原、渭北的党组织创建和领导，主要武装力量是渭北游击队。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由中共陕西省委和陕甘边特委创建和领导，主要军事力量是红二十六军。

陕北革命根据地 由中共陕北特委创建和领导，主要军事力量是红二十七军。

神府革命根据地 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 由中共川陕省委和红四方面军创建，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由中共鄂豫陕省委创建和领导，主要军事力量是红二十五军及红七十四师。

西北革命根据地 是在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建立，实现了陕北、陕甘边两个苏区党组织和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两支红军的统一领导，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总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90万。在创造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刘志丹、谢子长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35年9月，中共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后，中共西北工委和中共鄂豫陕省委撤销，成立了中共陕甘晋省委，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下辖三个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中共中央设立中共西北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继续领导西北革命根据地。同时，撤销了中共陕甘晋省委和西北军委。西北革命根据地先后分设陕北、陕甘、陕甘宁省。1937年2月，西北革命根据地改称陕甘宁特区，后又改称陕甘宁边区。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在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之前，从1935年9月起，西北苏区在积极反击国民党军队“围剿”的同时，在根据地内部发生了错误“肃反”，刘志丹、高岗、杨森、张秀山、习仲勋、惠子俊、杨琪、刘景范、马文瑞、张仲良、黄罗斌、高锦纯、张策、郭保珊、任浪花、蔡子伟、张文舟、李启明、高朗亭、赵启民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捕，一批共产党员和干部被当做“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而错杀。它使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军心不稳，民心不安，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很快了解到这种情况，决定立即停止错误“肃反”。

11月到达瓦窑堡后,立即释放了被关押的刘志丹等100多名同志。接着,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协同作战,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1936年2月,红军渡河东征,刘志丹在战斗中牺牲。5月,又回师西征,解放了甘肃、宁夏的部分地区,形成了后来的陕甘宁边区的区域范围。

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实现了在抗日前提下的第二次合作。1937年7月7日后,中国进入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陕西地方组织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工作和斗争,是在两个不同的区域内进行的:一是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一是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在这一时期,中共陕西地方组织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坚持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陕甘宁边区创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国统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同时大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为抗战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独特的、巨大的贡献。

陕甘宁边区是在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在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扩大、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开始称陕甘宁苏区,后改为陕甘宁特区,再改为陕甘宁边区。边区辖延安市和38个县,人口150万,面积98600平方公里。

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上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从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的13年中,这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的所在地,是全国革命的指挥中心,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的总后方。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了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最后形成了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在这里,开展了伟大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在这里,培养了大批干部,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成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示范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新民主主义中国的雏形。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于11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1937年2月24日,西北办事处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实行共产党领导的新型的民主政治体制。边区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最高机关是各级参议会。各级参议会、政府的组成均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人士各占1/3。这种民主政治体制,是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和抗日战争环境中,最具独创性的人民民主体制,与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独裁政治形成鲜明的对照。

陕甘宁边区的经济体制是以农业为主体的私有经济(包括私营工商业)、公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并存、共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1940年至1942年,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实行经济、军事封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自力更生”的号召,边区的军队和机关、学校一律参加生产,发展自给经济,靠自己动手获得的收入占了经费支出的部分或大部分,有的还做到自给有余。1943年1月,在整风运动取得巨大成绩的基础上,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八路军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把荆棘丛生、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把生产与教育列为边区建设的两大任务。因地制宜采取措施,因陋就简创办中、小学校,大力开办社会教育,同时在延安和边区大办各级各类干部学校,如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民族学院、女子大学等,大大提高了干部的政治文化素质,为人民军队和根据地的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的骨干力量。为了发展新文艺、端正文艺工作的方向,繁荣文艺创作,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按照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创作了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诗歌、歌曲、小说等作品。《兄妹开荒》、《血泪仇》、《白毛女》、《黄河大合唱》等优秀作品,风靡全边区,并传播到各抗日根据地,有的还传播到全国各地。

中共中央初到陕北时,撤销了陕甘晋省委,成立了陕北省委和陕甘省委。1936年5月,中央又成立了陕甘宁省委。1937年2月又决定设立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统一领导边区各地的党组织。1940年9月,中央决定将边区党委改为边区中央局。1941年5月,将中共中央西北工委与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陕甘宁边区的党组织,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贯彻执行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加强党的建设,有力地推动了边区的各项工作。边区的党员人数1937年5月为32418名,到1939年底发展到46227名(不包

括军队中的党员)。

1942年4月,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全党开展了学习马克思主义,整顿党的作风的整风运动。边区系统12000多名干部参加了整风学习。通过整风,广大干部、党员整顿了思想,整顿了作风,清算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分清了党内的路线是非,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在整风过程中,中共西北中央局于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了边区的高级干部会议,党政军各方面的重要干部300多人与会。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会议集中讨论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抗战以来边区党组织在思想上、组织上及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边区的生产和教育。在讨论历史问题时,批判了“左”倾错误路线对西北革命造成的危害,对1935年9月至10月发生在陕北的错误“肃反”作了全面的结论,总结了教训,统一了认识,增强了团结。

陕甘宁边区在抗日战争期间,还卓有成效地进行了保卫黄河、剿匪除奸、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磨擦和武力进犯等斗争,保卫和巩固了边区,使陕甘宁边区在西北高原上岿然屹立。

从中共中央1935年10月到达陕北苏区,到1950年1月陕甘宁边区撤销,历时14年3个月。对于西北革命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毛泽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949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复电中指出: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组织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区域,主要在关中地区、陕南地区和甘肃东部临近陕西的地区。同时,在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中也建立了中共秘密组织,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中共中央即派贾拓夫、欧阳钦、张德生等一批干部来到西安,在中央代表的参与下,与在西安等地坚持地下斗争的负责人一起,于1936年12月25日恢复了中共陕西省委。省委恢复以后,很快派出巡视员到各地恢复与整顿党的组织。到1937年1月,在西安的报馆、学校、群众团体和国民党政府机关内恢复或建立一批党组织,发展了一批党员。到1937年5月,省委下辖的党组织发展到市委一个,县(工)委12个,支部66个,党员总数发展到896人。1937年4月,中共陕甘省委撤销,中共关中特委划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同年9月,关中特委又划归新成立的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

1938年8月,陕西国统区内有53个县建立了中共组织。随着东北军离陕,省委撤销了东北军工委,西北军工作委员会改为省委军事委员会。1939年,省委在国民党第四集团军第三十八军建立了工委,对部队党的秘密组织实行统一领导。至此,省委在陕西的党组织和活动全面恢复并迅速地得到发展。

1939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国民党当局在全国各地大肆破坏共产党组织,连续制造反共磨擦事件。陕西国统区的一些中共组织被破坏,一批党员被捕遇害。在此形势下,省委将工作机关迁至陕甘宁边区境内,1940年夏,迁到耀县的照金。根据中共中央提出中共组织在国统区的组织实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陕西省委决定,在紧缩组织、纯洁队伍的基础上一般停止发展党员,改变活动方式,使党组织及其活动处于更加秘密状态。同时坚决调动已暴露的干部和党员到安全的地方,或暂时中断与一些党员的联系。到1942年以后,陕西国统区县委以上的干部、党员基本都调进边区。由于措施及时得力,有效地保存了党的组织和骨干力量,保证了党在国统区各项工作和斗争的开展,为抗战后期陕西国统区中共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1941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关中分区划归陕西省委领导。同年5月,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陕西省委归西北局领导。1941年底,省委和关中分委机关先后迁到旬邑县的马栏镇。1942年底,中共西北中央局决定陕西省委与关中分委合并,成立关中地委,隶属西北局领导,张德生任书记。

1936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恢复以后,党组织领导的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国统区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由党组织建立和领导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东北民众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队部等群众救亡团体,深入到全省各地、各界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中共组织的宣传、组织和推动下,西安各行业的工人、城郊农民15万人,于1937年1月9日在西安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1月28日淞沪抗战五周年时,西安各界群众团体组织召开了有15万人参加的纪念大会,痛斥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错误国策,号召广大群众团结起来,保卫华北、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

全国抗战发动之后,在中共陕西省委的号召与领导下,陕西的抗日救亡运动逐步深入,从中心城市发展到广大农村。到1938年春,中共陕西组织建

立和领导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已有 15 个,人数近 4 万。

全面抗战开始后,为了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共陕西省委设立了统战部。首先以社会上层人士中的进步分子、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进步军官、省县级官员及社会名流为统战工作的对象。1938 年底,把工作对象扩大到国民党政权的公务人员、各地绅士和广大农村,使国统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扩大,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广泛地发展起来,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1938 年春,日寇逼近黄河东岸的潼关,陕西省委发出《为保卫陕西宣言》。国民党抗战救国纲领颁布后,中共陕西组织立即在群众中进行宣传解释,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是服从抗战利益与真诚拥护团结的党。同时,对国民党打击、限制抗日救亡运动的行为坚决进行抵制与斗争。最大限度地利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孤立、打击顽固分子,争取中间势力,团结开明进步人士。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入国民党要害部门,在国民党的行政、教育、军事、党务系统中取得职务,担任县长、县三青团干事长、校长、科长等重要职务。民主同盟的杜斌丞、韩兆鹗,国民党三十八军的陈雨皋,教育界的李瘦枝,东北籍的知名人士车向忱等民主人士,都同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为人民立下了历史功绩。

1937 年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随后在西安设立了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简称“八办”)。

“八办”的设立,对指导、支持和加强中共陕西省委的工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配合“八办”的工作,中共陕西省委的一些工作人员,经常以“八办”工作人员的身份对外联络办事,协助“八办”采购、运输延安和抗日前线所需物资,接送来去延安的各类人员,其中,转送去延安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有 2 万多人次。

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是著名抗日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创建的一支国民党地方部队。1936 年西安事变后,部队番号被蒋介石政府撤销,改编为第三十八军。中国共产党在十七路军(三十八军)中的活动和工作有着长期的历史。早在 1923 年,共产党人魏野畴就开始同杨虎城接触,向他宣传马列主义。中共在十七路军中建立地下组织始于 1927 年初。在十七路军的前身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政治处建立的中共支部,是中共在这支部队建立的第一个组织。西安事变前,中共在十七路军中建立的秘密组织有:师的军委三个,

团的军委三个,营的军委三个,特支二个,总支一个,支部 50 多个。西安事变后,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派张希文、吕剑人、张庚良、汪锋等一批干部为党的特派员或负责人到三十八军中开展工作,使党的组织有了更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共陕西省委在三十八军建立了党的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党在三十八军的工作。中共在十七路军(三十八军)中的工作和斗争,从 1923 年到 1946 年前后持续 23 年,不仅使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而且使这支国民党的旧军队得到改造,不仅有大批士兵、中下级军官成为共产党员,并且有一些高级军官(如张汉民、赵寿山)也入了党。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秘书宋绮云也都是共产党员。杨虎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孙蔚如、李兴中等三十八军主要将领,在全国解放后都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工作。由于中共组织的工作和中共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三十八军成为抗日战争中的一支劲旅。在抗日战场上,该军先后参加了保定战役、娘子关战役、忻口战役,粉碎了日军对晋东南的多路围攻,坚守中条山两年多,开展了豫北游击战。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丹心素裹,冲锋在前,英勇杀敌,血染沙场。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十分重视和关心中共在十七路军(三十八军)中的工作,多次听取汇报和作部队上层人士的工作。从 1942 年底到 1944 年初,中共中央与毛泽东通过中央掌握的渠道,实际上直接地领导了中共在十七路军(三十八军)中的秘密工作。毛泽东对党在十七路军(三十八军)中的工作曾给予这样的高度评价:抗日战争时期,三十八军是我们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模范。

保卫陕甘宁边区和解放陕西全境

抗日战争胜利后,陕西境内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政治区域: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西解放区,一个是中国国民党在陕西的统治区(简称国统区)。以自卫反击战争保卫解放区和以解放战争解放国统区,是这一时期党和人民在陕西的中心任务。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中共陕西组织和人民配合和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四年多的浴血奋战,胜利地完成了这两大任务,于 1950 年 1 月,解放了陕西全境。

1946 年 7 月,人民解放军中原部队的北路突围部队到达陕南,与陕南游击队会师后,创建了以商洛地区为中心的豫鄂陕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西北

局设立了中共陕西工作委员会。1947年3月,中共陕西省工委与关中地委合并,成立新的关中地委。在地委内设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委员会。到1947年10月,关中和陕南国统区的党员人数发展到3700多名,比一年前增加了近1倍。其中隐蔽在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部队中并与党组织有联系的党员干部达82名,掌握了大批敌方的人枪。在县级以上党组织领导的地方,普遍建立了人民武装组织,主要有:陕南游击队、西府游击支队、富同(富平、同官)游击队、西北民主联军第六总队、渭北游击总队、人民解放军西府总队等。这些地方人民武装在配合解放区的自卫战争和解放国统区的战争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共陕西地方组织大力开展对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成功地策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其中较大的有:旬邑起义、白水起义、朝邑起义等。这些起义,加快了地方解放的进程。组织人民支援前线是地方党组织的主要工作。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方针下,人民群众和地方武装担负了搜集敌人情报、担任向导通信、救护伤员、看押俘虏、运送粮草弹药等各种战勤工作,有力地保障了战争的胜利。

陕西解放区,包括陕甘宁边区的陕西部分和在陕西境内属晋绥边区的神府地区,共24个县(市、区),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人口110万。解放区的延安,是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其西北战区要夺取的最主要的目标。蒋介石用于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兵力有34个旅,主力是蒋介石的战略总预备队胡宗南集团的20个旅,共25万人。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解放军只有六个野战旅,共2.6万人,另有地方部队约1.6万人。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精良,弹药充足。人民解放军则基本是“小米加步枪”,处于绝对劣势。为了粉碎蒋介石的狂妄计划,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诱敌深入,利用有利地形,把胡宗南部拖在陕北,然后寻找战机,逐步消灭其主力,以保卫陕甘宁边区,鼓舞和支持全国其他地区的解放战争。1947年3月18日傍晚和19日晨,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从容撤离延安,踏上转战陕北的征途。在撤离延安的第7天,即3月25日,人民解放军即取得了青化砭伏击战的全胜。毙伤俘国民党军三一八旅旅长李纪云(俘)以下2900余人。接着,又于羊马河猛攻由瓦窑堡孤军南下之国民党军一三五旅,全歼国民党军4000余人。4月14日又取得了蟠龙大捷,毙伤俘国民党军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俘)以下6000余人。撤出延安仅40天,西北野战军三战三捷,歼灭国民党军2万多人。以后又经沙家店战役,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

三十六师。1948年2月至3月,取得了宜川、瓦子街战役大捷,毙伤俘国民党军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毙)、九十师师长严明(毙)、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俘)以下3万余人。接着解放了黄龙、宜川、黄陵、洛川、宜君等县。宜瓦战役改变了西北战场的敌我态势。1948年4月,侵入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全线败退,人民解放军于22日光复延安。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前方工委和后方工委的领导下,有力地开展了支援前线,保证战时后勤供应,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等各项工作。在边区保卫战的过程中,边区有10多万青壮年参军,数万人参加了民兵、游击队。边区人民抬担架、送军粮、做军鞋、传送情报、封锁消息,不惜一切,竭尽全力与野战军密切配合,使敌人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彭德怀说:“边区的劳动人民,是我看到的政治上最有觉悟、最有认识的人民。”

陕西境内除解放区以外的地区,是国民党统治区。其包括西安市和72个县,人口916万,面积15万平方公里。解放陕西国统区的战争,从1945年10月解放陕北的三边开始,到1950年1月解放陕南的镇坪县,前后共四年三个月。除少数地方是和平解放的以外,其余地方都是人民军队打下来的。敌我双方的斗争十分激烈,不少县城反复三四次才获得最后解放。

解放陕北国统区的战斗是从1945年冬开始的。当年10月,国民党新编第十一旅起义。1946年9月5日,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八十六师二五七团一营三连连长梅廷栋率部起义,解放了佳县。1946年10月12日驻守横山县的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胡景铎起义,16日解放了横山县城。1947年3月,胡宗南、马鸿逵、马步芳部分别从陕北的南部和西北部向陕甘宁边区发动全面进攻,已获得解放的定边、靖边、安边、横山等县重陷敌手。1948年1月和1949年6月,陕甘宁和晋绥人民解放军在地方武装力量的配合下,先后解放了府谷县和神木县的国统区。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代表团同驻守榆林的国民党第二十二军代表团经过多次谈判,于5月29日达成协议。二十二军在指定之地点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6月1日,榆林解放。随后,收复了横山、靖边、安边、定边。8月,榆林国统区全部解放。

1948年3月,西北野战军取得宜瓦战役胜利后继续南下,4月16日,发动西府战役。经过近一个月的连续作战,解放了旬邑、长武、彬县、永寿、麟游、扶风、岐山、凤翔、宝鸡、千阳等县城,毙伤俘国民党军第七十六师师长徐保以下官兵2.19万余名。1948年7月,西北野战军在陕西东府和渭北发动了澄

合、荔北等战役,到1949年5月解放了渭南、铜川、咸阳地区国统区之全部或一部。1949年7月,第一野战军第一、二、十八等三个兵团,发动扶眉战役,歼敌4.5万余名。最后解放了眉县、岐山、武功、扶风、宝鸡、千阳、陇县、凤县。至此,陕西关中东西部的国统区全部解放。

1949年初,胡宗南集团虽连连惨败,但并不甘心失败,妄图死守西安。为了解放和接收好这座西北最大的中心城市,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陕西和西安地方组织及人民解放军,作了充分的准备。3月1日成立了接收西安准备委员会。5月17日,第一野战军第一、二、四军截击南逃之敌,第六军于5月20日黎明强渡渭河,逼近西安。十七师四十九团快速进击至西安西郊,占领了飞机场,攻入西安城西门。十七师的另一部,由西郊三桥镇乘火车到达西安城北门和火车站附近。十六师四十六团则占领了西安城的南门、东门。至此,四面包围了西安城。在中共地方组织的帮助下,国民党西安团管区司令王子伟、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闵继騫分别率部起义。5月20日上午,解放军进城,至上午11时西安城及其郊区全部解放。西安的企业除西京电厂被敌人炸毁,大华纱厂部分被破坏以外,其他工厂、学校、文物古迹多数均得到妥善保护。5月25日解放了蓝田县,30日,和平解放了周至县。至此,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关中地区的国统区全部解放。

1948年1月,挺进豫鄂陕边的晋冀鲁豫解放军第四纵队第十二旅和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解放了陕南的山阳、镇安、商南及湖北的郧西等县。建立了陕南军区。4月,解放了白河、旬阳。1949年11月27日,解放安康。12月8日,该部与十八兵团会师于南郑(今汉中市),迫使胡宗南残部败退川北。1950年1月11日,陕南地方部队解放了镇坪县。至此,陕南国统区全部解放,陕西全境解放。保卫陕西解放区和解放陕西国统区的伟大斗争,历时四年多,赢得了完全的胜利。

恢复国民经济和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开始执政,担负起领导人民建设新生活的重任,中共陕西组织的工作也揭开了新的篇章。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中共陕西省委在中共中央和中央西北局的领导

下,带领全省人民,首先用三年的时间,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医治战争创伤,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在此基础上,按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逐步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从1953年起实施了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

在解放陕西国民党统治区的进程中,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相继成立,大中城市还设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农村建立了乡村人民政权。1950年1月,陕西省人民政府成立。省、市、县和西安市先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从1953年4月起,陕西实施基层普选工作。省、市、县相继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政府工作人员和人民法院院长。民主建政和普选制的实行,有力地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

中共陕西省委、省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军区(后改为陕西省军区),组织十九军等部队、公安部门和民兵,从1949年底到1953年底,分阶段实施了剿匪斗争。首先集中兵力,歼灭陕南、川北的土匪主力1.3万人,粉碎了胡宗南妄图在大巴山建立反共游击区的企图。随后重点清剿宁强西部、榆林北部沙漠区和太白山的股匪和特务。最后组织精干武工队,肃清残匪,瓦解反动的会道门。四年中,共毙、伤、俘虏、瓦解土匪3.16万人,破获匪特案件1502起,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1950年10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会议部署镇压反革命分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首先处理阴谋破坏活动和政治案件,各地运用罪证实物、现身说法、巡回展览等形式,教育和启发群众控诉反革命罪行,检举反革命分子,公开宣判、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罪犯。在国营、私营和公私合营企业的民主改革运动中,打击了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把头的嚣张气焰。在土改中,镇压了一批破坏土改的反革命分子,管制了一批不遵守政府法令的地主分子,收缴枪支13468枝。在镇反后期,开展了以清理内部为中心的肃反运动,关押、管制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罪犯,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环境。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陕西和全国一样,成立了各级抗美援朝委员会,开展了大规模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通过报告会、讨论会、示威游行、捐募慰劳品、写慰问信、举办图片展览、捐献飞机大炮、制订

落实爱国公约、开展拥军优属活动,提高了人民群众反帝斗志和必胜信心。爱国艺人常香玉带领西安香玉剧社,义演豫剧《花木兰》等剧目,捐款 15.2 亿元(旧币,下同),捐献飞机一架。1952 年,全省工人超额完成增产节约任务,西安市涌现出 1462 名劳动模范和一批先进工作小组。农村开展爱国丰产运动,涌现出一批模范互助组和丰产户。抗美援朝运动极大地鼓舞了全省人民的爱国精神和劳动热情,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推动了各项社会改革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

解放初期,根据省政府颁发的新区土地改革政策、减租布告等,在农村发动农民群众减租,镇压顽固不化的大地主、大恶霸,为建立农村政权和恢复农业生产,扫清了障碍。在城市,对国营企业、私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分别进行民主改革,清除了特务、恶霸、封建把头、帮派会道门头子等反动势力和反动封建迷信组织。积极推进基督教、天主教的革新运动,团结多数,打击少数帝国主义分子,使之成为独立自办、自选自治、自传自养的爱国组织。对旧社会的毒瘤——吸毒和卖淫进行彻底查禁。没收毒品,打击毒贩,查封妓院,改造妓女,扫除了社会丑恶现象。同时,认真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封建婚姻制度,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推动了妇女解放。

从 1950 年 10 月至 1951 年 5 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关中新区和榆林新区 700 万人口的农村,分两批进行了土改工作。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宣传土改政策,组织农民协会,划分阶级成分,开展说理斗争,分配胜利果实,引导发展生产。在土改中,贯彻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改路线。根据关中地区地主户数和所占土地比重都低于陕北陕南的特点,在政策上作了重大调整,对富农由征收多余的土地改为保存富农经济;提高小土地出租者保留其土地数量的标准;强调区别对待地主。从 1951 年 10 月到 1952 年 5 月,在陕南 500 万人口的地区进行了土改工作。经过土改,陕西 780 万农民分得土地 1080 万亩,粮食 1.1 亿斤。土改后,分期分批进行查田定产工作,处理土改遗留问题,丈量土地,评定土地等级,颁发土地证和房屋所有证。陕西的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业生产力,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陕西省和西安市从 1951 年 12 月上旬到 1952 年 5 月底,在县级以上机关、学校、团体、国营与公私合营厂矿内部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反

对浪费的“三反”运动。经过动员学习,打“老虎”(即大的贪污分子)、健全制度、定案处理,查出贪污款 720 万元(新币,下同),定案处理 2073 人,追回贪污款 270 万元。县级“三反”运动一般采用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办法进行。乡村“三反”不提“打虎”口号,以干部检讨会形式进行。从 1952 年 2 月到 8 月,在西安、宝鸡、南郑(今汉中)等主要城市开展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西安市查出完全违法户 46 户,占 0.25%。查出违法所得 1965 万元,实际补退罚款 352 万元,约占违法所得 18%。宝鸡、南郑两市查出完全违法户 20 户,违法金额 158 万元,补退罚款 65 万元,经营烟毒金银违法金额 136.3 万元。“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反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教育了干部,提高了抵御“糖衣炮弹”的能力,促进了党和国家机关建设,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建立了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参与管理的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

根据中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定》和《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1951 年至 1954 年,陕西省委对 4162 个党支部、97543 名党员进行整顿、审查。同时,积极慎重地开展建设党的组织,发展新党员工作。从 1952 年 6 月到 1954 年底,全省新建基层支部 3625 个,发展新党员 36833 名。全省 6424 个乡,有 5571 个乡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农村党员 84841 名,占农村人口的 0.86%。经过整党建党,提高了党员的觉悟,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密切了党群关系,同时发展了一批新党员,新建一批基层党组织,扩大了党的队伍。

在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的同时,中共陕西组织大力开展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为了击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平抑物价,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保障人民生活,党和政府从政治上、经济上、法律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运大批粮食、食油、棉花、布匹、煤炭等物资,投放市场,打击囤积商和投机商;宣布人民币为惟一合法货币,规定人民币与银元的比率,收兑银元;加强缉私,打击金融投机商,取缔金融黑市等。同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统一财政,紧缩编制”的决定,减少支出,加强税收,发行公债,保证地方财政收支平衡。1950 年 7 月,根据中央指示,开始调整工商业。贯彻“以销定产”方针,调整公私关系,扩大对私营企业加工定货,让出部分零售市场,增加贷款,减轻税收。调整劳资关系,建立“平等、互利、契约”的劳资关系。经过全省人

民的团结奋斗,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1952年全省社会总产值18.28亿元,比1949年的11.84亿元,增加54%。国民收入总额11.53亿元,比1949年的7.83亿元,增加47.3%。人均国民收入75元,比1949年增加16元。社会商品零售额6.34亿元,比1949年增长86%。1952年地方财政收入1.8亿元,支出1.11亿元,实现了财政根本好转。

1953年10月,党中央公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陕西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高级农业合作社三个步骤实现的。1950年底,全省互助组已达8.42万个;1951年互助组发展到15.08万个。1952年,互助组发展到33.75万个,创办农业合作社104个。1953年,在整顿、巩固、提高互助组、合作社的同时,又试办了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1954年2月,初级农业社发展到530个。是年,陕西先后召开第二次、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克服急躁冒进情绪,巩固新建和扩建的合作社,在山区试办单一的或农林牧相结合的农业合作社,并拟定了全省互助合作发展计划。1955年7月,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评了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陕西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入社农户占到总农户的60%。1956年,农业合作化继续高涨。到年底,入社农户占农村户数的95.76%,农业生产合作社达到38326个,其中高级社28477个。农业合作化运动把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土地私有制变为劳动农民集体所有的公有制,是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但由于指导方针上“左”的错误,后期工作过粗,要求过急,发展过快,遗留不少问题。

陕西原有的手工业绝大多数是手工业作坊和个体手工业。1952年底,手工业产值1.6亿元(新币),占工业总产值的36.5%,从业人数14万人。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和政府组织“生产自救活动”,扶助手工业发展。1954年春,召开了全省第一次手工业工作会议,确定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针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改造形式是生产合作小组、供销合作社、生产合作社;采取“说服教育、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办法,从供销入手,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逐步进行。到1954年底,全省已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92个、供销合作社67个。1955年3月召开了全省第二次手工业工作会议。会后,各地贯彻“巩固提高现有社组为主,适当发展并加强对个体手工业的领导”的

方针,进行整社试点工作,并发展新的社组。1955年下半年,在农业社会主义高潮的推动下,加速实现了手工业合作化。到1956年底,手工业合作社发展到3198个,从业人数80.4万人,占手工业人数70.9%,产值1.44亿元,占手工业总值的82.2%。在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后期,同样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发展过快的问题,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

解放前陕西经济十分落后,工商业十分不发达。从1953年起,全面展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和平改造的方针,通过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陕西总结了公私合营企业的经验,对公私合营企业进行了普遍调查和重点整顿。到1955年2月,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有74个,产值1759万元。1955年下半年,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步伐大大加快。1956年1月13日,西安市继北京、沈阳之后,在全国第三个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合作化。接着,渭南、宝鸡、咸阳、汉中、铜川等城市和近百个县城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合作化。到1956年,参加公私合营的私营工业有1375户,人数21819人,产值5000万元。公私合营商店1333个,合作商店2648个,合作小组4137个,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由于步子过急,工作不细,盲目撤点并店,不适当地将相当多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小业主纳入公私合营的范围,划为私方人员,后来又错误地强调割资本主义“尾巴”,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

土地改革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完成以后,从1953年起,陕西和全国一样,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对我国援建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中,安排在陕西的重点建设项目有24个,占全国的15.4%,居全国第二位,投资为18.25亿元,地方安排基本建设项目202个,投资3.47亿元。陕西人民像当年支援革命战争一样,全力以赴地支援工业基本建设,到1957年,胜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奠定了陕西新型工业基地雏形。建成了以西安和咸阳为中心的纺织工业基地和包括航空、兵器、电子工业在内的新兴机械工业基地框架。农田水利建设成绩显著,是陕西历史上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之一。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在探索和曲折中前进

党的八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探索中建设社会主义。由于“左”的指

导方针和“左”倾思想的影响,八大制定的路线和原则,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贯彻。相反,接连发生了反右派扩大化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的失误,遭到了严重的曲折。党在实践中对“左”的错误的不断认识和纠正,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仍然取得很大的成就。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全党进行一次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但整风开始后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根据中央部署,陕西省自6月8日起逐步转入反右派斗争。7月5日至12日,省、市民盟组织举行扩大会议,批判了本省几位知名人士的言论。以后,反右派斗争逐步扩大到基层。通过大鸣大放、反击右派、整改和思想总结,到1957年11月,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全省划定右派分子7578人。由于犯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严重的内伤,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的破坏。

1958年5月,党的八届二次全会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的愿望。但在实践中,急于求成,助长了浮夸不实之风,使“左”的思想进一步膨胀起来。报刊上不断宣传“高产卫星”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口号。浮夸风盛行,粮食丰产不丰收,水利建设投入多收益少。8月,全国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全省人民齐上阵,大搞“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铁、炼钢)、群(群众运动)”,耗费大量人力和资源,年底产钢1.8万吨(合格的仅占21%),产铁32万吨(合格的只有5%)。195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以后,使一度降温的“大跃进”又热了起来。经过三年“大跃进”,由于各项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各部门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积累率居高不下,农业减产,日用产品减少,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很大困难,给经济建设造成很大的损失。

195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陕西各地开展了并社工作。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省很快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只用了一个月,基本实现了全省人民公社化,参加农户占总农户的99.2%。后又将1673个小社,合并为696个大社,进而实行一县一社。全省101个县(市)合并为5个市、47个县,关中各县大部分变为公社。人民公社的

规模和经营管理范围都大大超过生产合作社。在人民公社内,不顾条件大办公共食堂,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甚至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全由公社包干。一度浮夸风、“共产风”盛行。为大炼钢铁,抽调 180 万农村劳力,砍了树木,误了农时,造成秋粮和棉花损失 10%。这些都严重挫伤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

从 1958 年冬到 1959 年 7 月,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错误,党中央多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并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从 1958 年底开始,陕西努力纠正“左”倾错误,重点是调整高指标和明确政策界限。1959 年春,省委决定退耕 640 万亩,粮食作物由 5260 万亩减少到 4750 万亩。2 月中旬,省委召开全省六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会议精神,制定了《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人民公社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宣布个人生活资料永远归个人所有,确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和分配单位。4 月,省委发出通知,将 1959 年粮食总产调为 300 亿斤(包括大豆),棉花总产 500 万担,油料总产 3.3 亿斤。这些生产指标仍然是很高的,实际没有达到。5 月,省委发出通知,分配私人自留地,作为集体经济的补充,以利发展多种经营。6 月,省委提出,发展农副产品、土特产品和山货,活跃初级市场。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根本改变,虽然纠“左”收到一定的成效,但这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仅不彻底,而且随着反右倾斗争的开展,纠“左”被迫中断。

1959 年 8 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在全党全国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当时,中共陕西省委举行全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错误地批判了刘国声、丛一平、岳邦响、陈元方、陈平、冯绍绪等同志,并把他们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 9 月中旬开始,在党内开展了“反右倾、鼓干劲”的整风运动。接着,向党外传达有关“反右倾”的文件,使“反右倾”斗争波及到党外群众。在农村整风整社中,重点批判了 7.6 万人,其中基层干部 1.4 万人,群众 6.2 万人,扩大了批判和处理范围,破坏了党内外民主生活,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使一度降温的“大跃进”又热起来,被削减的基本建设项目又上马,被压缩的经济指标又恢复。陕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加上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出现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使党开始认识工作指导中的失

误,并采取若干措施进行初步纠正。从1961年6月到1963年2月,陕西分两个阶段进行甄别工作,重点甄别1959年“反右倾”整风运动中戴了帽子、受了处分和重点批判的党员和干部。全省共甄别28.41万余人,占应甄别数的97.9%。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简称社教)。根据中央指示,中共陕西省委成立了农村、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委员会,并在临潼县行者公社进行社教运动试点。农村社教起初以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为主;城市原为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后来,城乡社教运动的内容都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和清组织,统称“四清”运动。1964年11月至1965年5月,省委又集中一批干部在长安县、延安县、西乡县开展第一期农村社教运动。1965年9月至1966年3月,从点到面,在全省开展第二期农村社教运动。1964年9月至1965年6月,以西安市阿房区为重点,在166个单位进行城市社教运动。由于康生等人错误地提出“陕西土改、镇反不彻底”的估计,社教中进行了“民主革命补课”。全省60个县和13个厅局被列为问题较多的单位。西北局直接指导的长安社教工作团,错误地宣布县委基本“烂掉”,公社领导班子多半“烂掉”,一半以上的干部有各类严重问题。甚至提出要“重新建党,重新建政”。结果全县95.8%的生产队以上基层干部被定为“四不清”干部,补定地主富农户数3271户,清除出党的党员152名,开除公职的干部493名。1964年11月16日,胡耀邦担任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根据在农村调查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于1964年12月由省委宣布面上社教工作中的“双开”(开除党籍,开除政籍)暂停,夺权暂停,捕人暂停。1965年2月4日,胡耀邦在安康急发《电话通讯》到地委、县委,提出了正确对待干部的四条意见。3月16日、20日,省委根据西北局指示,先口头宣布,后正式通知,停止执行《电话通讯》中对干部的处理意见。接着对胡耀邦、赵守一进行错误批判,直至省委被改组。城乡社教运动虽然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起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上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简单地看成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误伤了一大批基层干部和群众。1965年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提法后来发展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论点之一。

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下半年,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根据中共中央部署,陕西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调整。

1960年7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国民经济调整问题。会后中共陕西省委先后召开农业生产、钢铁生产等会议,深入地展开以粮、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紧急指示信》,强调三级(指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所有,队(即生产队)为基础;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中共陕西省第三届代表大会强调全党全民要一心一意大办农业,同时还检查了“共产风”,制定了坚决执行中央政策的十条措施。

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批准了调整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相继制定了关于农业、手工业、商业、工业、科学、高教、文艺等方针、政策。遵照中央部署,陕西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全面调整。全省人民公社由687个调整为2352个,52个县、市调整为96个县、市,并恢复了3个专区建制。把20万个厂矿压缩到1831个。到年底,全省减少吃商品粮人口40万人,减少城镇粮食供应量4000万斤,节约工资资金1700余万元,使农业战线净增22万个劳动力。大力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冻结有关单位的银行贷款,抓日用小百货、小五金和小农具生产,满足市场的需求。调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1961年钢产量为5万吨,生铁由12.5万吨调整为3.5万吨,粮食由107亿斤调整为85亿斤,棉花由200万担调整为160万担,煤炭由800万吨调整为520万吨。到年底,国民经济持续下降的趋势得到缓解。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号召全党做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陕西省委、地委、县(市)委分别召开干部大会,传达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联系实际,纠正“大跃进”错误。1962年又进行了全面调整,进一步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生产队基本核算单位由1960年的2.3万个调整为15.7万个;纠正了高征购错误;从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加强了对农业的支援;还大幅度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大力缩短基本建设战线,1962年基本建设项目由1960年的2704个减为859个,基建资金由1960年的12.09亿元缩减为1.82亿元。全省经济比例失调基本扭转。对工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精减职工,城乡比例关系基本上达到协调。从1961年到1962年,合计精减职工41.53

万,减少城镇人口 48.10 万人,减少吃商品粮人数 63.80 万人。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开始好转,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基本结束。

1963 年 9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确定再用三年时间,继续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为落实中央决定,省委成立了工业发展问题研究小组。在中共陕西省四届一次代表会会议上,确定了陕西继续调整的目标:使全省农业总产值和粮食总产量超过 1957 年的水平,棉花总产量力争接近 1957 年水平,工业总产值大幅度超过 1957 年水平。调整的重点是:把“解决吃穿用”问题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努力解决短线产品的生产供应,加强建筑、化工等薄弱环节;进一步改善和提高经营管理工作,使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和超过历史最好水平。到 1965 年,各项调整指标基本达到。市场货源充足,物价稳中有降,国民经济全面好转。

从 1956 年 6 月到 1966 年 4 月的十年探索中,虽然遭受了严重挫折,发生过严重的失误,但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然在曲折中继续前进,并取得了很大成就。在陕西,主要表现在:一是农业基础有所加强。全省用于农业和水利建设的投资 2.87 亿元,比 1957 年新增水库容量 6.3 亿立方米,新增有效灌溉面积 384 万亩,拖拉机增加 1443 台,农村用电增加 27.5 倍,化肥施用量增加 3.2 倍。植树造林成效明显,小麦、玉米良种和发展绿肥方面成效显著。二是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工业基建投资 29.5 亿元,建成 30 多个大中型项目。固定资产比 1957 年增长 3 倍。工业产品产量成倍增加。三是形成了以机械、纺织、煤炭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基地。建成了西安西郊“电工城”、以西安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西安东郊“纺织城”和渭北煤炭生产基地。沿陇海铁路线,西安、咸阳、宝鸡、铜川等各具特色的工业城市已基本形成。四是宝成铁路建成通车,公路建设发展较快,交通状况开始好转。五是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以西安为中心的科研、高等教育基地初步形成。这一时期建设起来的物质技术基础,积累起来的建设骨干力量和工作经验,为持续进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和“三线”建设

1966 年 5 月至 1976 年 10 月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在这场长达 10 年之久的内乱中,陕西省各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受到迫害,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但是,由于国家重点投资,开展三线建设,人民群众对“左”倾错误的反对和抵制,陕西的经济建设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陕西也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开展了对思想文化界的批判运动。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西安各大学出现批斗校领导的浪潮,校园贴满大字报,开始上街游行,掀起了大批判浪潮。6月6日,西安交通大学学生造反派在校内外张贴批评省委工作组的大字报。7月下旬,毛泽东指责派工作组并写信支持红卫兵的“造反精神”。8月初,西北局与陕西省委被迫撤销工作组(团),被迫宣布在西安交通大学发生的“六六事件”是革命行为。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彭康被撤销一切职务,交学生批判,工作组(团)被迫作检查。8月3日,西北局和陕西省委错误宣布原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是“陕西三反(当时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总头目,是黑线的总根子”。随后,省长李启明及丁济沧、李宗阳、王云等一批省、地、市、县及基层领导分别被点名批判和撤销职务。1966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随后,北京等省市红卫兵到陕西串联。红卫兵上街大破“四旧”(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斗争矛头指向各级党委。8月24日,西安14所大专院校部分学生召开大会,提出造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反。9月13日,他们组织召开“炮轰西北局,火烧陕西省委”大会。10月,中共中央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心内容的工作会议召开后,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和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多次遭到造反派组织的大会批判和斗争。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等各级党组织已经不能正常工作,生产、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陷于混乱。

1967年1月,上海发生了所谓“一月夺权风暴”,陕西也掀起夺权风暴。1月23日,西安地区大专院校造反派吸收“工联”、“农总会”等造反派组织,夺了西北局、省委、省人委、省公安厅和西安市委、市人委的权,并迅速蔓延到全省各地。各级党政大权相继被篡夺,党政机构瘫痪,各级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揪斗和打倒。

1967年3月3日,由省军区、兰空部队、陆军二十一军共同组成“西安地

区驻军支援左派统一指挥部”，随后，省军区对西安铁路局及新闻广播单位实行军事管制。二十一军派出干部和部队进驻省市机关，军队领导与初步“解放”出来的地方领导干部组成“陕西省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下设四个办公室，并组织部队在四所院校进行军训。陕西生产、工作和社会秩序有所好转。

由于极左思潮泛滥，特别是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后，1967年9月1日至3日，在西安发生大规模武斗。在宝鸡、咸阳、汉中、安康等地，也发生多起大规模武斗和一系列损害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事件。仅据1967年11月至1968年8月的不完全统计，全省银行被抢60余次，抢去现金734万元，国库粮食被抢44万多斤，不少地方连续发生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部队驻地，抢走武器，杀伤指战员等事件。1968年7月24日，针对陕西武斗严重事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颁发了“七二四布告”，严格要求收缴武器，制止武斗。全省人民积极贯彻中央七二四布告，协助革委会和解放军制止武斗。截至1968年9月17日，全省收缴武器7万余件、子弹400万发。到9月底，各地武斗陆续停止，局面得以控制。

1968年5月1日，经中央批准，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李瑞山任主任，胡炜、黄经耀、杨焕民、萧纯等任副主任。随后，各地市、县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

“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重点是清理阶级队伍，即所谓清理混进革命队伍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实际是打击各级干部和群众。全省先后被揪斗、审查、关“牛棚”者有40多万人，挨整干部6.2万人，被错误划为地富成份的有5万多户。造成“陕西民主革命不彻底”、“彭高习反党集团”、“陕西地下党严重不纯”等重大冤案，一批干部和群众含冤而死。

为了贯彻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10月决定省级机关1600多名机关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农场和生产队参加劳动。此后陆续下放干部2.6万人到各地、县，特别是在陕南、陕北落后地区进行所谓“重新学习”，使他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处于困难境地。从1968年至1978年，陕西省贯彻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先后组织46.4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落户，其中包括北京到延安插队的青年2.6万名，参加襄渝铁路建设的2.5万名。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虽然经受了锻炼，但失去接受正规教

育的机会,成为被耽误的一代,给国家的未来发展带来不利因素。“文化大革命”中,高等院校停止招生达六年之久。全省先后派出 800 多个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大、中、小学和文化、科研、卫生单位,领导“斗、批、改”,参加学校的“教育革命”。从 1972 年至 1976 年,全省共招收 3.5 万名工农兵学员。“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使教学质量下降,尤其是“停课闹革命”,贻误了一代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

从 1968 年 10 月到 1971 年上半年,陕西进行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整党建党工作。基本完成整建党支部和党委工作,纳新党员 32682 名,暂挂 25619 名,吐故 4124 名。这次整党建党是在全国大动乱背景下进行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虽然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恢复了党员组织生活,由于极左思潮的严重破坏,这次整党建党是不成功的。1971 年 2 月 28 日至 3 月 5 日在延安举行中共陕西省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采取“协商选举”的办法产生。由于执行的是“左”的指导思想,大会的工作报告严重歪曲陕西的党组织和历史,对建国后十七年党的工作全盘否定,提出了狠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搞好斗批改的任务。会后,各地、县(市)加快党组织的恢复工作,到 1972 年底,全省大多数基层单位的党组织相继恢复。这对维护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一定作用。但仍未摆脱“左”的影响,全省混乱局面仍未彻底改变。

1971 年 8 月 25 日至 9 月 5 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北京召见了中共陕西省委、省革委会和驻陕部队负责人。在周恩来主持下,制定了《陕西省委汇报会传达提纲》(以下简称《传达提纲》)。《传达提纲》指出,陕西在经济上的主要问题是,工农业生产发展速度比较缓慢,与兄弟省、市、区相比落后了。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派性、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作怪。为此,中共陕西省委号召全省人民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要求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迅速解放干部。对已经解放和结合的干部要大胆使用,支持他们做好工作;要团结、教育、改造工程技术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加快老区建设。从 1971 年 9 月到 1973 年,《传达提纲》一直作为陕西工作的重要指导文件来贯彻执行,对稳定当时的局势,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期间,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集团彻底毁灭,加快了陕西领导干部解放和政治经济形势向好的方向转变。但由于“左”的思想根深蒂固,在当时条件下,未能彻底解决陕西问题。1974 年 1 月,江青反革命集团竭力歪曲和利用毛泽东关于“批林批孔”的

指示,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老干部再次受到冲击,局势急剧恶化。混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不断发难,组织非法组织,煽动外出串联,建立“联络站”、“广播站”,攻击陕西贯彻《传达提纲》开展的“三批”活动(即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是“批了群众,批了文化大革命,批了反潮流的革命精神,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公开伸手要官要权。同时,全省还发生了“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等不正常情况,造成党组织和领导班子严重不纯,使刚刚抑制下去的资产阶级派性、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又重新泛滥起来,社会和生产秩序又严重混乱,许多企业陷于瘫痪状态,严重影响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成。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意见,接连召开交通、工业、农业、科技、军事等方面的会议,明确、坚定地提出要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省委、省革委会布置全面整顿工作。省委重点抓了73个单位的整顿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生产由停滞下降转为回升。1975年,全省国民生产总值由上年的62.03亿元增长到64.92亿元,增长5%。1975年11月,毛泽东听信“四人帮”的谗言,动摇对邓小平的信任,决定停止他的大部分工作。不久,又发动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江青反革命集团在陕西的党羽,立即点名批评各级领导干部,任意给他们戴上“走资派”、“翻案风”、“算账派”、“复辟派”、“投降派”等帽子,迫使大批领导干部无法工作,政治形势由相对稳定又走向混乱。1976年所谓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被撤掉党内外职务,江青一伙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陕西的“闹派”人物拟定了进省委和省级机关的名单方案,叫嚷“要掌握实权”,再次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煽动停工停产,使全省经济再次遭受严重挫折。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陕西各族人民无限悲痛,纷纷以不同形式悼念人民的好总理。“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性的悼念活动,激起了人民的愤怒。陕西人民继首都北京群众的悼念活动之后,也从3月底到4月初,在全省城乡自发地举行各种各样的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西安有数万人自发地到钟楼、新城广场等公共场所献花圈花篮,贴传单,作诗歌,怀念周总理,控诉“四人帮”。4月4日晚,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江青左右下,把天安门广场的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4月5日晚,民兵和警察奉命驱赶、殴打和逮捕留在广场的群众。4月7日,由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

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把北京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在陕西也发生了镇压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逮捕、处理了一批干部群众。

1976年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9月9日，毛泽东逝世，全省各地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于10月6日一举粉碎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反革命集团。10月7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消息传来，全省军民集会游行，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10月23日，中共陕西省委、西安市委联合召开了有60万干部群众参加的庆祝粉碎“四人帮”大会，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文件，通过了给党中央的致敬电。从此，陕西同全国一起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1966年到1970年陕西省实施了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三五”计划没有完成。但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国家在财力、人力和技术力量的投入比较集中，这一时期陕西的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

1971年到1975年，陕西省实施了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提出要把发展农业放在第一位，开展了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使陕西农业基础条件有了改善，生产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工业方面，建设了一批技术先进的大型工业企业，增强了陕西工业实力，能源、原材料工业有了较大发展，交通条件有所改善。

陕西是“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之一，从1965年开始，历时15年。在行业上重点发展钢铁工业、煤炭工业和国防、机械、化工、电子、仪器、仪表工业。同时，大力开发水利电力资源，相应地发展轻工业。1969年以打“歼灭战”的方式完成九个地方“小三线”建设项目。1970年，集中力量修建襄渝铁路和阳安铁路。70年代，投资161.39亿元，新建47个工矿区、镇，汉中、韩城、渭南成为初具规模的新兴工业城市。尽管“三线”建设遇到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但全省人民还是竭力排除干扰，克服各种困难，使“三线”建设各项工程得以实施。每年动员几十万人参加和支援“三线”建设，高峰期常年民工就有100多万。7年内，新建29个国防工业项目，“三线”建设使陕西成为我国内地的一个重要工业基地。

改革开放,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976年10月,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即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集团,以下简称“四人帮”),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内乱。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从此,开始了以实行改革开放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这一时期到中共陕西省第七届委员会任期届满的1993年,历时15个年头。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古老的三秦大地,焕发了生机,充满了活力,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粉碎“四人帮”后,摆在全省人民面前的迫切任务就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彻底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中共陕西省委于1976年11月25日至28日召开了常委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1976]16号文件,研究部署开展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开展了揭发批判“四人帮”,清查与他们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揭、批、查”斗争。但是,这一斗争在开始阶段就遇到了阻力。由于长期存在的“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清理,特别是省委、省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坚持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的“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使陕西的拨乱反正工作徘徊不前:“揭、批、查”斗争存在着“捂盖子”现象;落实干部政策进展迟缓,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老干部未能彻底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大批冤假错案未能清理纠正;在经济工作方面,“左”的一套仍在继续。国民经济刚刚恢复,又出现了急躁冒进、片面追求高速度的倾向。在农村急于把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过渡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取消集市贸易,压缩自留地,被群众称为“穷过渡”。对此,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极为不满,纷纷向省委提意见并向中央反映。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78年7月15日至8月9日,在北京召开了陕西工作汇报会议,总结了前一段揭批“四人帮”的经验教训,讨论了如何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尽快把陕西各项工作搞上去。8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对《陕西汇报会议纪要》的批示。中央批示指出:建国25年来,毛泽东主席的革命路线在陕西各条战线始终占主导地位,粉碎“四人帮”以后,陕西形势总的是好的。当前存在的主要

问题是,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认识不清,顾虑较多,领导不力,致使陕西形势的发展比较缓慢。中央决定,对省委、省革委会领导班子进行调整,任命王任重为陕西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8月20日至9月21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转发的《陕西汇报会议纪要》和重要批示,联系实际,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及其在陕西的代理人的罪行,讨论了尽快改变陕西面貌,把陕西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搞上去等重大问题。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对1976年清明节前后,因悼念周恩来总理和反对“四人帮”而遭受迫害的群众公开平反,恢复名誉。至此,基本上结束了两年徘徊的局面。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从基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8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王任重在总结报告中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把陕西的工作搞好。1978年10月19日,省委召开了省级各部门负责人和理论宣传干部共700人参加的座谈会,集中学习和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问题。省委书记李尔重在会上讲话,要求各级领导端正指导思想,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破“两个凡是”框框的束缚,解放思想,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科学观点。此后,省委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向全省。这次大讨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本清源,大大增强了各级领导、广大党员和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大胆思考、研究和解决新问题的自觉性,为打破多年来形成的“左”的禁锢,深入拨乱反正,奠定了思想基础。1979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理论务虚会和邓小平讲话的精神,作出了《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决议》,强调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决议的贯彻,使陕西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而坚定的正确方向。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决议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同时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中共陕西省委认真组织了对该决议的学习,纠正了当时存在的对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认识上的一些“左”的和右的错

误观点。从而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为落实政策等实际工作的拨乱反正扫除了思想障碍。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召开前,中央任命王任重为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不久,王任重调国务院工作,中央任命马文瑞任省委第一书记。1979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了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会议实事求是地澄清了陕西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重大问题,并做出了相应的结论或决定。主要是:胡耀邦主持陕西省委工作期间,反对“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简称“四清”)运动中“左”的路线是正确的,对因当时反对批胡而遭到打击的同志予以平反;对“文化大革命”中,原西北局、省委机关的一批人被打成“黑帮”、“反党分子”,遭到关押、打击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对在“四清”运动中进行的所谓“民主革命补课”而错划为地主、富农成分的,统统改正过来;解放前陕西地下党是好的,推倒对陕西地下党的一切诬蔑之辞,对因此而受到打击迫害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之后,全省开展了“揭、批、查”补课。基本查清了“文化大革命”中全省发生的6480多起重大事件,撤销了1000多名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的领导职务,复查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各种案件33.5万件,约占需复查案件总数的90%以上。平反纠正了18.8万件冤假错案,同时对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划为地主、富农成分的6万多户给予改正,并对11.3万多名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摘了帽子。对错划的8100多名“右派分子”全部进行了改正。与此同时,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民族、宗教政策,侨务政策和原国民党投诚起义人员的政策等各方面也都做了大量工作。经过拨乱反正,人们的思想获得了很大的解放。但是,在思想政治领域,在打破“左”的禁锢的过程中,右的错误思想倾向在一些方面萌发起来,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精神污染和党员、干部中的不正之风及腐败现象有所发展。针对这种情况,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的决定,自1983年12月到1987年6月,分期分批地在全省开展了整党。主要内容是:统一思想,纠正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整顿作风,纠正各种以权谋私的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加强纪律,反对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及涣散软弱现象;纯洁组织,关键是清理“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在整党的过程中,同时进行了抵制

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教育。这次整党历时三年半,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1989年的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很快就波及到陕西,特别是西安市。4月22日,在西安新城广场发生了冲击省政府大院和少数不法分子的打、砸、抢、烧行为,10辆汽车被烧毁,130多名值勤民警和公安人员被打伤。4月28日,省委召开省级机关党员干部大会,省委书记张勃兴在会上强调要立即行动起来,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5月23日和24日,省委、省政府连续发出关于稳定形势和维护社会秩序的通知,西安形势一度趋于平静。但6月4日又急剧恶化,西安新城广场上有4万多人聚集,一些人冲击省政府大楼,市内交通基本瘫痪。此后,由于北京地区的政治风波平息和省市党委、政府的积极工作,西安和省内其他地方的动乱也很快平息。6月28日至7月1日,省委召开七届三次全委会议,传达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讨论并安排了制止动乱,清查动乱中的犯罪分子,深入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及除“六害”^①,反对腐败,加强廉政建设等工作。1990年3月,省委又作出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八项决定。经过一系列的工作,较快地恢复了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再次出现了安定团结、经济发展的局面。

陕西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起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步是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1979年1月,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推行联产到组责任制。到1980年夏,全省实行“联产到组”的生产队已占到57.8%。这种责任制,使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但在作业组内仍存在平均分配。1980年夏收以后,进一步探索多种形式的责任制,由“联产到组”发展到“联产到劳”。当时,全省搞“联产到劳”的生产队达到20%。到1981年底,全省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双包”队,占总队数的50%。到1982年底,全省16.26万个基本农业生产核算单位中,实行“包干到户”的占94.8%,到1983年夏收后,达到了99%。1983年初,省委召开三组干部会议,传达贯彻胡耀邦来陕时提出的“思想更加解放一点,改革更加大胆一点”的指示精神,提出要开创我省农村改革和建设的新局面。到1984年,按照“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对耕地承包办法、地块作了适当调整,并明确规定从当年起15年内承包的土地不变。1992年9月,省人大常委会制定并公布了《陕西省农村集体承包合同管

^① “六害”即:卖淫嫖娼、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拐卖妇女儿童、私种吸食贩卖毒品、聚众赌博、利用迷信活动骗财害人。

理条例》，把家庭联产承包制纳入了法制轨道，更加稳定了农村政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1980年到1984年，全省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农村社会总产值年递增12.4%，其中农业产值年递增11.3%。1984年全省粮食生产首次突破100亿公斤大关，人均占有粮食340公斤，创历史最高纪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使人民公社体制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根据中央的指示，省委、省政府于1983年12月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若干问题的通知》，到1984年底，基本完成了撤销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权的工作。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和发展，要求打破农村旧的以供销社、信用社和国营商业为主体的垄断的流通体制，以便农村经济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为此，省委、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革了统购、派购政策，取消了对粮食、棉花的统购，改为合同订购，订购以外的粮棉可以上市自销。取消了生猪派购政策，实行市场自由买卖。调整和逐步放开农产品价格，合同收购的小麦、稻谷、玉米、谷子等四种粮食平均购价提高了35%，棉花收购价格经多次调整，比1978年提高了近四倍。改革供销社管理体制，使其恢复集体所有制合作商业的性质，恢复和发展集市贸易。到1985年已建成农村集贸市场1474个，全年成交额达15.1亿元，相当于全省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7%。90年代以后，农村乡镇商品市场更为繁荣，涌现出了一批规模大、档次高、功能全、辐射远的大型农村市场。

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带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1984年5月，省委在长安县召开会议，对加快乡镇企业作了部署，组织省级各部门和大型厂矿企业、科研单位进行对口支援，使乡镇企业出现了迅猛发展的良好势头。到1985年底，乡镇企业猛增到34万个，从业人员达到177万人，总收入49.66亿元，分别比1983年增长8.3倍、1.9倍和2.7倍，创造利润5.79亿元。从1984年到1988年5年中，乡镇企业总收入平均增长75%，上缴国家税金年均增长41.8%。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14.5亿元，相当于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7%。1989年至1992年在对乡镇企业进行了治理整顿，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和总收入的增幅下降，但年增长仍保持在15%左右。1992年增长48%。全省工业总产值的净增部分，有一半以上来自乡镇企业，已成为全省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

陕西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从1979年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开始启

动,到1983年以后改革的领域不断扩大,步伐加快。1984年10月以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各项改革逐步全面展开,配套进行,整体推进。到1993年,陕西的改革和开放事业围绕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改革前,企业管理和经营体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企不分,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对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统得过多,管理过死,企业的自主权很少,缺乏自主生产、自我发展的活力。针对这种情况,省委、省政府于1978年恢复了企业基金制度。1979年42个国营工业企业中实行利润留成试点,1980年扩大到123个工业企业。1984年4月又决定进一步放权,使企业在生产计划、产品销售、资金使用、资产处理、机构设置、工资奖金、劳动人事管理等10个方面,享有一定的自主权,使一部分企业的经营管理逐渐活了起来。1984年10月,省委组织了1000多人参加,历时100天左右,以进一步增强企业活力为主题的大调查(简称“千人百日调查”)。1985年2月调查结束,形成全省性改革方案(草案)19个。在此基础上,中共陕西省六届三次全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搞活国营工业企业的十五项政策规定》,于当年3月9日下发执行。这些政策性的规定,为搞活企业创造了较好的外部条件。

与此同时,在企业内部,推行了以改善生产经营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几项制度。主要是:(1)试行厂长制(经理)负责制。(2)改革企业分配体制,完善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3)改革企业干部制度和劳动管理制度。(4)调整所有制结构。到1991年底,在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值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87.9%下降到81.45%,集体所有制工业则从12.2%上升到16.78%,个体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从零上升到1.77%。城镇个体劳动者和城镇私人企业从业人数达到17.6万人,增长近156倍。全省注册的私人企业已达2097户,其中,注册资金在100万元以上的私营企业有六户。1983年,陕西批准建立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金花饭店,到1993年底,10年中全省共批准“三资”企业1440户,累计投资6.79亿美元,加上利用世界银行、亚洲银行及外国政府贷款,共达11.2亿美元。

改革前,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统得过死,管得过多过细,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针对这些问题,陕西对原有的计划体制进行了改革。1984年10月,经省委同意,省政府批转了省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几项规定》,明确了进行计划管理体制改革的方针、原则和12条具体规

定。此后,计划体制的改革在端正指导思想的基础上,迈开了新的步伐。主要是:(1)进一步缩小了指令计划,扩大了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2)改革国家资产管理体制,扩大地区(市)的管理权限。(3)在实施计划的调节手段方面,改变了过去单纯的指令方式,而更多地利用税收、价格、利率、工资、财政补贴等经济杠杆调节手段。各级计委更加重视长期计划和发展战略计划的制定,以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改革前,财税管理体制的主要弊端是统收统支,管得过多过死。针对这些问题,从1980年起,在上下级政府之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预算管理方法;接着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建立乡(镇)级财政的工作,实行各种形式的财政包干。这种体制有利于调动地方各级政府的积极性,改变了“鞭打快牛”、收支脱节的现象。到1991年全省先后有22个县(市)甩掉了吃补贴的“帽子”,有15个县(市、区)年度财政收入超亿元,多数县的财政实力有所增强。对企业财税管理,从1983年到1984年,分两步实行了利改税,全省企业税后留利大幅度增加。

从1991年起,陕西外贸体制进行了新的重大改革,取消了出口补贴,实行各类外贸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新体制,鼓励企业开展实业化、集团化和国际化经营,加强工贸结合,赋予有条件的大中型生产企业外贸自主权。1993年全省进出口总额14.96亿美元,其中出口9.93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83倍多。全省签订技术引进和出口合同55个,金额4800多万美元。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2500万美元。全年旅游收放外汇人民币5亿元。

省委、省政府经过调研明确提出“教育奠基、科技兴陕”的发展战略。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扩大科研院所的自主权,积极推行院、所长负责制和任期目标责任制;允许科技人员合理流动;改革科技拨款制度,把一部分有条件的科研单位推向市场,成为自主经营的实体;把竞争机制引入科研机构内部,实行优化组合,落实聘任制和责任制;鼓励科研单位面向市场,创办多种形式的科研生产联合体,发展新型科技产业;鼓励科技人员创办各种形式的民营科技机构;建立科技市场,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创建高新科技开发区;为推动农村科技进步,鼓励农业科研人员实行科技承包,创办各种形式的承包实体;经过这些改革,打破了旧的封闭的科技体制,逐步确立了开放的科技体制,使陕西科技优势得到发挥。

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下放管理权限,扩大各级各类学校的自主权,在学校内部实行校长负责制、教师聘任制和岗位责任制;调整中小学布局和中等教育结构,实行“三教统筹”和农科教结合,集资办学,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调整高校布局,大力发展成人教育和职工教育,形成新的办学格局。

在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全省 10 个地市都根据省政府制定的医疗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出台了当地公费医疗制度改革具体办法,并陆续付诸实施。企业和劳保医疗也采取不同形式,引入个人交费机制。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退休养老费用统筹迈出了新步伐。到 1993 年底全省收缴养老保险金 8.9 亿元,赡养退休职工 40 多万人。

从 1976 年到 1990 年,陕西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实施了第五、第六、第七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简称“五五”、“六五”、“七五”计划),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各项事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1976 年至 1980 年是陕西“五五”计划实施时期。由于粉碎了“四人帮”,特别是通过拨乱反正,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较快地恢复和发展了生产。国内生产总值由 1976 年的 62.94 亿元,增加到 1980 年的 94.91 亿元;工农业总产值由 105.31 亿元增加到 151.84 亿元。其他各项社会事业,在医治“文化大革命”的创伤后,渐渐恢复与发展。1981 年至 1985 年是陕西“六五”计划实施时期。在此期间,陕西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积极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均较好完成。国内生产总值由 1981 年的 102.09 亿元,增加到 1985 年的 180.87 亿元;工农业总产值由 155.11 亿元增加到 271.66 亿元。1986 年至 1990 年是“七五”计划实施时期。这五年中经济曾出现过比例失调、通货膨胀及 1989 年政治风波后的市场疲软、经济滑坡,给“七五”计划的完成带来一定困难。但是由于认真贯彻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从而保证了“七五”计划的圆满完成。1990 年同 1985 年相比,全省国民生产总值由 1985 年的 181 亿元增加到 1990 年的 404 亿元;工农业总产值由 271.66 亿元增加到 612.54 亿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陕西省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领导体制的改革,包括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也在积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和政治制度,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为目标,从最基本的政治制度建设入手,着重抓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始建于1954年,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破坏,被迫停止了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陕西省委及时组织领导了恢复、重建工作。1977年12月25日至29日,陕西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标志着中断了11年之久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陕西的恢复。接着,于1979年12月召开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时,选举产生了第五届人大常委会,撤销了“革命委员会”,恢复和重建了省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人大)作为地方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和正常的工作。随后,各市、县人大(在地区是建立省人大地区工作委员会)也很快恢复或建立起来。省五届人大及其六届、七届人大在各届省委的领导和支持下,依法行使了各项职权,发挥了地方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在地方立法和司法监督方面,从1977年到1993年各届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和批准地方性法规78件。其中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如《陕西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陕西省市场管理规定》等,这些法规的颁布施行,对于规范经济活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起了重要作用。为了保证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省人大和各级人大每年都有计划地进行司法检查,并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使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在依法审议和决定重大事项方面,省人大党组认真贯彻中共陕西省委的人事安排意见或建议,组织了各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并在任期内对其工作进行监督。定期审议和决定国民经济和财政计划,听取和评议政府组成人员和法院、检察院主要领导人员的述职报告。在依法组织人民代表的选举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的任免方面,自五届人大以来,实行了“差额选举”的办法。从六届人大以后,一年至少开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每两个月至少举行一次常委会,同时,对人民代表的视察活动、提案的办理等也都建立了相应制度,为人民代表履行职责,发挥作用,提供了制度上和工作上的保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体制。1989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据此,中共陕西省委作出了《关于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几个问题的决定》。主要内容有:扩大民主党派的知情范围和参与程度。凡涉及全省性的重大问题以及省级重要人事安排及关于地方大政方针和人民生活重大问题的决策和措施,在进行决策和作出决定前,一

般都要召开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的协商会议,听取意见和建议;主动接受各民主党派对中共党委、政府工作的监督。吸收他们参加对一些重大社会生活事项、经济案件和其他案件查办工作的检查监督;选配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人大、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并保证有职有权。省委批转了省委统战部制定的《选配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的三年规划》。按照这个规划,从六届人大以后,各民主党派人士分别出任了省人大副主任、省政府副省长和厅局领导职务。到1993年,有40人被选为省人大代表,有156人被选为省政协委员。

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也是实现多党合作的重要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成立于1955年2月,其前身是建国初期成立的陕西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文化大革命”中,人民政协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被迫停止活动。粉碎“四人帮”后,在省委的领导、支持下,省政协的组织和活动得到恢复。1977年12月,政协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此后,历经省政协五届、六届、七届委员会。各级政协组织不断完善,工作全面展开,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作用不断加强。在提出议案,参与决策,开展对港、澳、台的工作,协助党委、政府落实政策,开展民族、宗教工作及文史资料研究等方面都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按照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论述和党的十二大以来关于政治领导体制改革的部署,省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针对党政领导体制中存在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和机构重叠、效率不高等弊病,进行了积极的改革探索。党的十二大以后,在省委领导成员中不再设不在政府任职而又分管经济工作的专职书记。撤销了省委经济部等与政府部门对口设置的工作机构,随着政府监察部门的设立,党纪与政纪案件的查处也逐步分开。从1983年开始,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在宝鸡市进行了中等城市机构改革的试点。1991年,陕西被列为全国4个省级机关机构改革的试点省,经过调查研究和试点,于1993年实施了省级机关的机构改革,撤销了一些职能重叠、业务交叉的部门,适当裁减和压缩了分工过细的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充实和加强了经济调控部门、综合管理部门和经济监督部门。通过这次改革,省级副厅级以上党政机关的机构设置减少了30.12%,人员精简了31.54%。

1980年初,省委提出领导班子建设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四化”(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的要求放手提拔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1981年省委制

定了《关于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调整各级领导班子的规划》,到1982年的两年间,全省共选拔进县级以上领导班子的干部2837人,其中优秀中青年干部894人,占31.5%。1983年,在省级党政机关改革的过程中,按干部“四化”的要求,对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省级各部门新班子人数比机构改革前减少了50%,平均年龄下降了3.2岁,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提高到35.2%,有专业技术职称的占24.7%。1984年,省委下发了《关于改革干部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主要内容是:下放干部管理权限;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试行干部招聘、选举、选聘制度;实行干部任职易地交流制;在党政机关推行岗位责任制等。1985年上半年,进行了民主推荐省级部门负责人干部的工作,在民主推荐和民意测验的基础上,选拔了省级42个部门的领导班子,平均年龄49.2岁。1993年《国家公务员制度暂行条例》公布后,省委、省政府制定了实施方案。按照此方案,实行了注重思想革命化和工作实绩的干部考核、考试、录用方法;建立了民主推荐、组织人事部门考察、党委集体讨论决定或提名推荐、依法任免的一套工作程序;组织人事部门在职能上由过去的主要是具体的管人,逐步转到整体的干部“四化”建设和人才资源开发上来;干部人事的管理方式由过去的单纯组织、行政手段,逐步调整到法制化、市场化,建立起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使人才能脱颖而出的新机制。

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清正廉洁,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中共陕西省委把反腐倡廉,端正党风政纪作为严肃重大的问题和长期的任务,始终抓得很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陕西省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工作机构陆续恢复。十多年来,全面履行“保护、惩处、监督、教育”四项职能,大力开展反腐倡廉,严肃党风政纪,纠正不正之风,惩治腐财分子,保证了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1981年,省委、省纪委公开处理了若干起招工、转干、转户口中的违纪案件,引起了震动。在此基础上,省委于当年12月下旬发出了《关于检查纠正少数干部“三招三转”^①中违反政策规定的通知》和《关于坚决纠正少数干部违法盖房和多占住房的通知》。从此全面纠正“招、转、住”中的不正之风。到1983年底,全省共查出在这三方面有问题的干部12634人,分别作了处理。

1982年初,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中共

^① “三招三转一住”,是指招工、招干、招生;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农村青年转城市下乡知识青年,临时工和民办教师转为国家正式职工。

陕西省委、省纪委对此集中力量抓了五年。到1986年,全省共立案12880件,立案审查15775人。共惩处违纪人员9383人,其中开除党籍的789人,开除公职的886人,刑事处理的4602人。全省共追缴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3945.7万多元。1989年9月4日,省纪委召开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针对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再次部署了反腐败斗争。这次斗争的重点侧重于反对权钱交易和领导机关及领导干部。截至1992年,全省党委纪检机关共查处违法违纪案件84192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54128人,其中省级干部4人,地厅级干部150人,县处级干部1262人,移送司法机关受刑事处罚的2303人。1989年,根据省委的指示,省纪委和省监察厅合署办公,配合行动,重点抓了“两大院”(省委机关大院和省政府机关大院)、“八条线”(农业银行、税务、工商、电力、公安、粮食、水利、供销)和“十个片”(十个地市政府机关所在地),在这些部门和系统,开展廉政检查和制度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

按照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指示,中共陕西省委在领导全省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大力加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陕西省委于1978年10月召开了有省级各部门和宣传理论干部共70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就真理标准问题进行了讨论并统一了认识。会后,在全省展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确立了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观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从思想一拨乱反正,省委先后领导开展了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问题的讨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的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商品与市场问题的讨论。这一系列的学习和教育,使党内外思想空前活跃,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思想路线前进。但在冲破“左”的禁锢的过程中,社会上出现了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倾向。针对这种倾向,省委于1979年6月发出《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1983年冬和1987年春在全省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教育。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动乱平息之后,省委即召开了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及时总结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基本经验。强调在思想教育中要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使其成为全社会思想品德教育的主旋律。在全省建立了76个爱国主义示范基地。并把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渗透到各项社会活动中去。1990年8月到1993年6月,省委在全省农村开展了一次普遍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这次教育活动的指

导思想是“抓社教,打基础,促发展,奔小康”,恢复和新办乡镇企业 21500 多个,转移剩余劳力 25 万人,新增产值 15 亿元。查出违纪资金 3.34 亿元,其中包括干部贪污挪用的 2300 万元。这次农村社教,摒弃了 60 年代前期农村社教“左”的做法,提高了思想,解决了一批农民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明确了奔小康的路子,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陕西是延安精神的发祥地。1989 年 12 月,中共陕西省委作出了《关于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决定》,全省理论、教育、文化等各条战线,以各种形式坚持不懈地进行延安精神的宣传教育,大力表彰了邵小利、张华、罗健夫、李立科、陈素华等一大批发扬延安精神,艰苦创业,为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先进人物的事迹,有力地鼓舞了人民群众奋发图强,开拓进取,兴陕创业的信心和勇气。

省委把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使人民做到知法、守法,依法办事,依法维护合法权利,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 年省委在全省开展了对全国人大通过的七部基本法律的宣传教育。1985 年陕西省委批转了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党组《关于用五年时间在全省公民中普及法律常识的报告和规划》,并成立了“陕西省普及法律常识领导小组”。此后,开展了“一五”、“二五”、“三五”连续十余年的普法教育。同时在党委、政府各级机关中开展“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教育,使群众和干部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不断提高,为依法治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82 年,陕西在省、地(市)、县三级建立了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83 年 2 月,省委、省政府召开了全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双先”(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会议,表彰了先进,交流了经验。1987 年 1 月制定了《社会主义文明建设规划》,1989 年颁发了《社会主义文明单位建设管理办法》,1993 年又制定了《陕西省 1993—1997 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划》。到 1993 年全省已建成的县级文明单位 16372 个,市(地)级文明单位 1441 个,省级文明单位 350 个,文明小区 146 个。为了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全省从 1991 年起,在直接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系统中开展了“窗口”单位的“创佳评差”活动。1992 年参加这一活动的有省级 16 个厅局,1993 年又扩大到公安、工商、税务、交警、电力、卫生等 17 个厅局。为了鼓励创作更好的文化艺术精品,带动整个文化工作跨上新

的台阶,省委在1991年提出了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实施“五个一工程”(即省上每年出一本好书、一台好戏、一部优秀电影、一部优秀电视剧、一篇有创见、有说服力的好文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有话剧《毛泽东的故事》,歌剧《张骞》,电视剧《铁市长》、《半边楼》,电影《决战之后》和图书《邓小平文艺思想研究》等12项作品在全国“五个一工程”评比中获奖。《中共党史人物传》(1—50卷),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称誉。

1993年5月12日至16日,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第八届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张勃兴作了题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扩大开放,为提高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陕西省第八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张勃兴被选为省委书记。当年6月13日至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西安主持召开了西北五省(区)经济工作座谈会。江泽民为中共陕西省委题词:“勤政务实,发扬延安精神;励精图治,建设两个文明。”中共陕西省委决心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领导全省人民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事业,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为实现陕西经济和社会发展新的腾飞而努力奋斗。

大事记

大事记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19年

5月4日 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在京的陕籍学生大都参加了这次运动。北京大学学生会干事刘天章、李子洲和杨明轩、杨钟健、呼延震东、刘含初、郝梦九、张耀斗等参加了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和痛打章宗祥的斗争。

6月27日 北京各界代表数百人，在新华门前举行联合请愿。作为向总统府请愿的10名学生代表之一的陕西学联代表屈武，面见总统徐世昌时，言辞激烈，以头碰地，血流满面，表达学生坚决收回山东主权的决心。

10月 《西北日报》连续数十次刊登《马克思之价值说剩余价值说及其批判》、《理想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之一斑》等文章及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国内形势的消息报道。

1920年

1月20日 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出版《秦钟》月刊，陈顾远任编辑，发行人李子洲。该刊宗旨是：(1)唤起陕人自觉心；(2)介绍新知识于陕西；(3)宣传陕西现状于外界。该刊第一期发表了魏野畴《潼关外之新思潮》等文章。开辟了论坛、评林、调查、小说、丛录等栏目，发表宣传科学、民主内容的文章。刊物出至第六期，因内部意见分歧、经费不足及陕西军阀阻挠等原因，宣告停刊。

7月 《鼓昕日报》在西安创刊，连续刊登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和译文，如《布尔塞维克主义论》、《俄国联工会之实力》等，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俄国社会

主义运动的历史,还刊登了李大钊的一些文章。同时在陕西各地出版的《启明日报》、《捷音日报》、《正义日报》、《救国日报》等报刊,刊登了不少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政治倾向都比较进步。

10月 陕西旅沪学生会创办《秦铎》杂志,主办人雷晋笙。在此前后,陕西旅居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的学生还创办了《新时代》、《励进》、《竞进》、《进化》、《陕西旅鄂同乡学会月刊》等刊物,宣传民主政治。

1921年

7月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此后,陕西旅居北京、上海等地青年学生刘天章、雷晋笙等人陆续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

7月 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魏野畴回陕,在华县咸林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历史教员。他利用课外时间向学生宣传社会进化史、社会科学概论等,并向学生介绍《向导》、《新青年》等书刊。不久,他邀请在北京的朋友、共产党员王复生来咸林中学任教,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

10月10日 北京大学的陕籍学生刘天章、李子洲、杨钟健、杨晓初、赵国宾、刘含初、呼延震东等联合北京高等师范等学校的陕籍学生,改造出版《共进》杂志,该刊以“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为宗旨,开辟专栏,大量刊登揭露封建军阀对陕西进行黑暗统治的文章。翌年10月,建立共进社,成员最多时达600多人。

1922年

3月 在天津的陕籍学生武止戈、屈武、韩志颖等在天津南开学校创办《贡献》月刊。该刊连续登载《为什么讲社会主义》的文章,介绍社会主义发展史,论述社会主义学说的强大生命力。同时,陕北教育促进会天津分会创办了《促进》,汉中旅沪学生会创办了《汉钟》等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

7月 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王尚德从武昌中华大学毕业,受武汉地区中共组织和团组织派遣,回到渭南赤水镇,与张浩如等创办渭南赤水职业学校。通过教学活动向学生讲授革命理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并以学校为基地,创办平民夜校,进行革命活动。

1923 年

春 魏野畴应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邀请去该校任教,向学生讲授《共产党宣言》、《社会进化史》和《新青年》、《向导》、《共进》等刊物上的重要文章,启发青年学生的政治觉悟。在他的培养和影响下,刘景桂(刘志丹)、王子宜、曹力如、阎揆要等进步学生走上革命的道路。

暑期 在外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武止戈、邹遵等人,利用假期回家的机会,在西安等地开展革命活动。

8 月 共产党员李子洲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陕西,应三原渭北中学校校长郝梦九的邀请到该校任训育主任兼国文教员。他协助校长拟定了改革教学方案和扩建学校的计划,经常和进步青年谈心,向学生介绍《新青年》和社会主义学说、唯物史观等。

1924 年

3 月 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在最近时期由团中央设法在西安、三原、华县等地建立团组织。

5 月 30 日 上海大学学生共产党员武止戈被团中央派往苏联学习。他在赴苏前回陕探亲时,受团中央委托来赤水职业学校,向王尚德传达了团中央关于在赤水建立团组织的指示。

6 月 16 日 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支部干事会成立,张浩如为干事会会长,王尚德为书记。

6 月 共产党员武止戈到西安与魏野畴等取得联系,发展张性初、杨宏德、宋建旭为团员,在西安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杨宏德为负责人。小组直属团中央领导。

8 月 共产党员雷晋笙由上海回到西安,参与领导西安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工作,组织团员开会学习,发展、扩大团的组织,将其发展为社会主义青年团西安第一支部。并与崔物齐等人组建了西北青年社,出刊《西北青年》。1924 年底,第一支部发展团员 15 人。

夏 李子洲担任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他先后聘请了杨明轩、王

懋廷、田伯英、常汉三、李瑞阳、徐孟周、何寓础等进步人士到该校任教,改革旧的、陈腐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向学生讲授《共产主义 ABC》、《马克思主义浅说》、《社会主义浅说》等。

12月 团中央指派来西安的邹遵与魏野畴取得联系,发展团员 14 名,在西安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直属中央直接领导,支部干事有张性初、师守命、正谊、任致远、何挺杰。该支部后被称为团西安第二支部。

12月29日 绥德四师教员王懋廷给团中央组织部部长邓中夏写信,提到:“现在我与共进社的一个同志——田伯英,他是英文教员,但是还没有加入 SY(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这次请你介绍——在这儿组织 SY 地方团,因为起首宁可慎审些,先找得学生中较有希望较真实的 14 人——连我俩有 16 人——请你向中央部介绍并且支配应做的工作——名字就叫陕西绥德 SY 地方团”。

1925 年

1月7日 陕西渭南团支部书记王尚德向团中央汇报渭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工作情况。汇报信写到:“咸中励志团也是十人,青年文学社八人,三原的自进团七人。渭支部决定将以上三团暂作为三个支部,直接属中央,请中央直接管理,但渭支部仍不能放弃责任的。”并提到:“我们均愿加入 CP(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不知尚有其他手续否? 若需经同志介绍时,代英、育南可以介绍我们加入 CP 为荷!”

1月 王尚德在渭南赤水镇召集三原、临潼、渭南、华县等地区的学校代表和渭南地区各界人士代表会,决定成立陕东国民会议促成会。

2月1日 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举行代表大会,通过致孙中山、段祺瑞及各省区的三道通电,表示愿作国民会议之后盾。

同日 王尚德在赤水职业学校主持召开团赤水特支、团西安特支及渭南、西安、三原、华县等地进步教职员、学生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有关国共合作后在陕西地区加强团组织建设和开展国民会议促成会活动等问题,决定由李维屏等 14 人以青年励志社为基础吸收一部分团员,成立共青团华县支部;由姚志哲等 4 人以青年同志共进社为基础,吸收一部分团员,成立三原团支部;赤水团支部应以平民教育服务团为基础,积极培养和吸收

青年入团,扩大团的组织。

2月 华县团支部在咸林中学成立,李维屏任书记。暑期,李维屏等四人毕业离校,支部工作由岳炳光、张纶、张瀚等接替。

2月初 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总委员会委托该会委员杨明轩向关中各县人民团体介绍陕北革命运动情况。

2月17日 屈武、董汝诚联络渭北各人民团体成立渭北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在此之前的2月9日,30多个群众团体集会成立了三原国民会议促成会。

同日 张佩秋由北京回陕,主持召开陕西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大会,通过了《宣言》和《简章》,选举两名代表加入省国民会议促成会。

2月23日 共青团三原特别支部成立,支部书记姚志哲,机关驻地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直属团中央领导。

2月25日 共青团陕北特别支部书记王懋廷给团中央写信,提到:“我们接到来信,即召集会,按照来信,组织特别支部,定名CY陕北特别支部,因为年假后内部的范围扩充了,有榆林的,有佳县的,绥德两字不能包括所以改为今名,干事会分组织、书记、宣传三部,再分为绥德、榆林、汾阳三小组。”

2月 胡憨战争爆发。陕西团组织领导人民将统治陕西达七年之久的军阀刘镇华驱逐出陕西。

春 在澄城县立初级中学任教的共产党员张仲超,先后发展进步学生杨森定、李鼎新、雷逢泰等加入团组织,进而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澄城特别支部,书记张仲超。

春 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石谦团第三连连长李象九被共青团绥德特支吸收入团后,与共青团员史唯然受共青团绥德特支委派,在驻地安定县瓦窑堡镇组建了共青团瓦窑堡军队支部,属绥德特支领导,书记李象九。

3月12日 西安第一、第二两个团支部合并为共青团西安地方委员会,书记崔物齐(崔孟博)、组织李凤桥、宣传雷晋笙,在报请团中央审批期间,两个团支部又分开单独活动。

3月15日 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在绥德召集各分会代表会,反对段祺瑞在北京召开的“善后会议”,拥护孙中山主张召开的国民会议;主张在北京召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由代表大会召集国民会议。并推选代表四人,出席全国代表大会。

3月25日 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通函西安各大团体,发起组织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筹备会。

4月15日 西安市五六万人参加了孙中山先生追悼会。大会推王授金为主席,吕佑乾、雷晋笙为书记,魏野畴为司仪。大会宣传三民主义和国共两党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号召人民为实现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斗争。

4月 共青团绥德特支书记王懋廷在《陕北地方工作计划》中提到:“榆中同志中即由3人增至11人。”

5月 王懋廷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榆林支部已组织就绪。”“现时人数绥德23人,榆林9人,望瑶(瓦窑堡)4人,佳县3人。”

5月1日 陕西各地首次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活动。绥德团组织成立讲演团,上街演讲“五一的历史”和“中国劳工的状况”。榆林团组织以学生会的名义在榆林礼堂召集青年工人开会,由团员讲演“五一节史略”、“中国现在劳工者的情形”、“工人今后应有的觉悟和态度”。渭南赤水、三原等团支部也举行了纪念五一活动。

5月4日 西安一中学生在操场踢球时,将球踢出墙外,被驻扎在隔壁西仓的陕西军阀吴新田部的二十八团士兵拾去。学生索要时,遭到士兵毒打,接着官兵冲进学校,打伤学生40多名。事件发生后,西安一中学生全体罢课,发表宣言,向西安市和全陕西人民揭露吴新田的罪行。

5月5日 西安各校举行全市总罢课,声讨吴新田纵兵行凶打伤西安一中学生的罪行。西安团组织支持并领导这一斗争,鼓动各界人士支援学生。

5月 西安团组织和学生运动骨干转移到三原,与三原学联一起开展驱吴斗争。这一斗争,得到全省学生的纷纷支持,杨虎城部队和国民军二、三军也积极参加,经过两个月的斗争,吴新田被迫率部离开西安撤至陕南,国民军孙岳所部和二军李虎臣部进驻西安。

6月初 五卅惨案后,在西安的党团员雷晋笙、吕佑乾、崔孟博等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立即组织群众在西安地区发动反帝爱国运动、发表宣言,提出“收回租界”、“惩办凶手”、“赔偿损失”的要求。

6月7日 李子洲、王懋廷、田伯英等在绥德四师召开教职员和学生紧急会议,通过发表宣言、通电,发动绥德各界群众开展反帝斗争。

6月13日 三原和西安团组织负责人举行会议,决定由陕西总学联和渭

北学联分别通告各界,作五卅惨案声援大宣传。

6月 赤水团组织以赤水职业学校学生会名义成立陕东沪案后援会,组织讲演团下乡宣传。

6月20日至7月15日 陕西省学生联合会在三原渭北中学举办夏令讲学会,魏野畴主讲《帝国主义与中国》,李秉乾主讲《社会进化论》,王尚德主讲《革新教育》,耿炳光主讲《最近国际之时局》,赵葆华主讲《达尔文主义》。

7月7日至15日 陕西省学生联合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在三原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有西安、三原、赤水、华县等地学生会负责人,魏野畴列席会议。7月17日,陕西省学联从三原迁回西安。

7月19日至25日 共进社在三原渭北中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魏野畴、杨明轩、方仲如、郝梦九、赵葆华、刘志丹等参加会议。大会发表宣言,提出“武装民众”、“以民众的武力打倒一切统治阶级”等口号。

7月29日 高克林向团中央作《关于西安召开团员会议的报告》,指出7月26日召开团员会议,到会的有西安的魏野畴、高克林、张性初等,北京的耿炳光,天津的崔物齐,上海的武思茂、李秉乾,三原的王之鼎,陕北的杜嗣尧、刘志丹等人。决定成立共青团西安干事会,书记高克林,组织崔物齐,宣传张性初。

8月18日 魏野畴、李子洲、刘含初等在西安南四府街,帮助国民党首先成立了国民党俱乐部,并着手进行国民党的宣传和党员登记工作。刘含初被推为主席,杨明轩等为书记。

8月中旬 魏野畴等创办的《西安评论》创刊。《西安评论》根据党的理论和政策对当时陕西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具体问题发表主张和论述,对各方面的斗争发表专论。《西安评论》前后历时8个月,共出36期,1926年3月军阀刘镇华围攻西安的前夕,因环境恶化而停刊。

9月12日 西安召开全省国民党党员谈话会,魏野畴、刘含初、杨明轩等作重要讲话。会议通过了杨明轩、焦易堂为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筹备委员的议案。会后,在西安市东柳巷4号设立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筹备处,并派人去绥德、黄陵等地筹建临时县党部。

9月 西安原有的两个团支部因思想不统一,分别向团中央写信要求派人调查处理,团中央虽几次处理,但矛盾仍未解决。时值国民军三军由冀豫入陕,经党中央同意,由任国民三军军长孙岳秘书的共产党员安存真以中共

北京区委(10月改称中共北方区委)特派员的身份赴陕作兵运工作,同时负责整顿西安团组织,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安存真于9月到达西安后,与共产党员魏野畴、雷晋笙等取得联系,向西安第一、第二团支部传达了中央关于整顿团组织和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的指示,并采取各种形式,向党员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国共合作的重要意义。在其帮助下,不少对加入国民党组织有疑虑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组织。

9月26日 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在西安三中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推选杨明轩、刘含初、张性初、赵葆华、焦易堂等九人为执行委员。师守命、王圣域等五人为候补委员。在当选的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占绝大多数。同时,临时省党部派人去三原、延安、华县等地成立县党部。

9月27日 共青团中央派特派员吴化之来陕整顿团的组织。吴到渭南以后,整顿和健全了赤水团组织及工作秩序,帮助制订了行动大纲。

9月30日 共青团绥德支部宣传部就宣传情况向团中央报告,提到:“现在延安已经成立支部,有团员三人。”

10月4日 安存真、吴化之召集会议,对西安团组织进行整顿,解散了第一、第二团支部,对团员重新进行登记。成立了共青团西安特别支部,由吴化之、宋树藩、张性初组成干事会开展工作。特支归共青团豫陕区委领导,将团员28人分编为三中、二职、民校、俱乐部、梁府街等5个小组。

10月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共豫陕区委正式成立,王若飞为书记,领导河南与陕西党的工作。次年,“陕北为指导便利计,中央特许划归北方区管辖。”豫陕区委主要领导关中地区党的工作。

同月 中共西安特别支部建立,安存真、吴化之先后为书记,隶属中共豫陕区委领导。《西安评论》为其机关刊物。

11月2日 共青团豫陕区委决定成立共青团西安地委,指定吴化之为地委书记。11月13日,共青团西安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机关驻地西安市桃胡巷。团西安地委有团员40人,至1926年春,下辖的特支、支部十多个。

11月22日 共青团赤水特支派张宗适、雷光显等在渭南东张村乡建立农民协会。

12月初 根据共青团中央一二一号通告精神,中共西安特支书记、共青团西安地委书记吴化之到三原,在整顿三原团组织的基础上,把团员中年满

18周岁以上的优秀分子转为中共党员,并在第三职业学校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三原特别支部,特支书记张仲实。中共三原特支受中共豫陕区委直接领导,不久改属中共西安地委领导。

12月4日 根据党、团中央1925年10月20日发表的《对反奉战争宣言》和12月1日《为郭松龄倒戈告全国民众书》的精神,陕西党、团组织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反对奉系军阀运动。

12月13日 共青团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马瑞昌关于绥德团组织情况向团中央报告,提到:“自经中局允许之后,我们便成立地委,委员共有五人(书记一人,组织一人,宣传一人,教育一人,经济一人)。”当时,绥德的共青团员共有34人,分为6个小组。

同日 在共青团组织和省学联直接主持下,西安非基督教大同盟在西安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有陕西省学生联合会、西安市学生联合会、青年生活社、商农工会等十多个团体150多人。吴化之作《非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报告。12月24日圣诞节前夕,西安大街到处宣传演讲,揭露教会欺骗群众,暗中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本质。指出要使中国民族解放得到胜利,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教会势力。

同日 在三原团特支的组织下,国民党三原县党部成立。县党部设委员九人(其中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四人),候补委员四人(其中中共党员、共青团员三人)。共青团员贾怀庚任组织委员,共产党员庞诚斋任农运委员。

12月 吴化之到赤水职业学校,根据团中央一二一号通告的精神,将共青团赤水特支的王尚德、张浩如、张宗适等六七名团员转为党员,成立了中共赤水特别支部,书记王尚德,隶属中共豫陕区委领导,后改属中共西安地委领导。特支活动的范围在赤水、华县、高塘一带。

12月底 共产党员谢子长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回陕北,与绥德师范学校李子洲取得联系。之后,回到安定县担任民团团总。不久,又担任井岳秀部石谦团的连长,利用合法身份开展革命活动,秘密建立党组织。

1926年

年初 中共西安地方委员会成立,隶属中共豫陕区委领导,书记黄平万、组织吴化之、宣传黄平万兼,委员魏野畴、雷晋笙、张性初、吕佑乾等。时西安

城区有党员 20 多人。

1 月 共产党员魏野畴、王圣域、师守命三人代表中国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出席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中共广东区委委托魏野畴向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转达,要求推荐一批进步青年,到黄埔军校和第六届广州农讲所学习。会后,经中共北方区委批准,在北京、天津学习的陕籍学生乔国桢、李维屏、李秀实、鲁振之、李波涛、亢维恪(亢心裁)、冯文江、刘益、张超、杜松寿、苏士侗、郭忠仁、霍世杰、王树绩、马价人(马致远)、韩崇正 16 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1 月 14 日 共青团绥德地委书记冯景翼向团中央报告“组织 CP 一层,此处已决定成立;唯 CP 方面人材缺乏,作事的人不敷分配,望设法指导。再请将 CP 章程及刊物等寄来些”。

1 月 17 日 绥德团地委书记冯景翼向团中央报告:“此地 CP 已成立支部,有同志八人”,指定书记一人——田伯英。因田伯英赴西安出席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代表大会,书记由李子洲代理。

1 月 18 日 陕西省学生联合会临时代表大会在西安省立第一中学开幕。陕南、陕北、关中出席会议的学生代表 36 人;西安各机关、团体、党派、新闻界及工人、农民代表亦出席了会议。中共组织及全国学联派人指导并作了报告。

1 月 31 日 共青团西安地委在《西安地方报告》中提到,西安地委所属的支部有两个,特支 5 个,有共青团员 59 人,其中包括渭南特支 11 人、肤施(延安)特支 7 人、固市特支 5 人、蒲城特支 3 人、富平特支 3 人。

1 月 中共渭南城区支部成立,代号渭兰芝,书记宋蔚青,属中共西安地委领导。

2 月 26 日 王懋廷在上海与陕北党、团组织的同志研究陕北党、团的组织工作,并向团中央作了汇报。提出了整顿陕北党团组织的方法。

2 月下旬 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华县高塘民团成立,团长由共青团员史子衡担任,副团长由共产党员赵和民、进步人士王文风担任。

2 月 共青团西安地委在西安领导建立了陕西青年团体联合筹备会,联合全省各地青年社,筹备成立陕西青年社。

同月 共青团西安地委派刘廷献担任共青团渭南城区支部书记。在此前后,党、团组织在西安私立国立中学、省立单级师范、私立成德中学、省立第

一中学、省立第三中学、敬业中学、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及三原、绥德、榆林、延安、富平等地一些学校普遍建立起来。

3月20日 由杨虎城等发起在三原召开军事会议，各路陕军将领一起分析军事形势，研究抗击直系军阀刘镇华进攻的军事部署，决定分兵坚守西安、咸阳、三原等城，进行长期军事斗争。魏野畴从北京回陕后，亦前往三原参加了国民军三军杨虎城部召开的重要军事会议。

4月5日 共青团三原地委向团中央报告，三原原有团员30人，共分4个团小组。自团地委成立以后，团员人数增加到38人，编为4个团支部。4月28日，三原党、团组织成立党团，书记庞诚斋，负责领导三原农民运动。

春 魏野畴在渭阳中学建立中共组织。

4月7日 直系军阀刘镇华由潼关入陕。当刘镇华的部队抵西安城下时，中共组织支持杨虎城的国民三军三师除留下一部分人坚守三原外，主力部队于4月15日、16日进入西安。

4月17日 刘镇华的部队在占领陕东各县以后，西安党、团组织通过各种渠道揭露刘镇华的阴谋。陕西党、团组织以陕西学生联合会、国民党陕西临时党部的名义组织学生宣传队深入街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进行演讲，鼓动军民提高信心，团结对敌。在杨虎城部工作的党、团员还通过部队政治处创办的《青天白日报》进行宣传工作。在广大军民的支持下，杨虎城、李虎臣拒绝了“和谈”要求，坚定了守城信心。

5月 共青团三原地委在向团中央报告5月份的工作中提到，团三原地委已发展4个支部，有团员59人。

5月15日 刘镇华部围困西安，中共组织领导群众，克服动摇投降倾向，支援军队守城。

5月30日 西安党、团组织通过陕西省学生联合会、国民党陕西省临时省党部联络各界人士召开群众大会，纪念五卅运动一周年，提出帮助驻军、坚守西安、反对刘逆。

6月18日 耿炳光就陕北党、团组织情况向党、团北方区委报告。提到绥德师范学校设有党的地方委员会，由书记、组织、宣传三人组成，下辖三个支部和三个特支。团的地方委员会辖支部三个、特支五个。

同日 共青团三原地方委员会向团中央报告，此地团员转为党员者6人，在党和团的组织中工作的还有13人。

7月 在西安城被围困期间,西安市各学校大都无法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党、团西安地委通过市学生联合会举办暑期学校,把留在城内的学生组织起来,由党、团组织的负责人和教师中的党员、知名进步人士黄万平、吴化之、刘含初、王授金、雷晋笙等授课,用革命理论和科学知识武装青年学生,并在他们中发展了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同月 因刘镇华围城旷日持久,城内粮食缺乏,军民争食,治安难以维持。党、团组织便以学联、国民党临时省党部的名义联合各团体组成西安市民自救会,派代表向驻军交涉,要求出城作战和不准垄断粮食。

8月上旬 军阀刘镇华部三个混合旅包围三原城,并攻陷了泾阳、高陵两县城。三原党、团组织协助陕军组织各界人士全力投入守城斗争。

8月 中共西安地委派张含辉、曹碧轩到乾县,以筹建国民党乾县党部的名义,创建乾县中共党、团组织。不日,中共乾县特别支部和共青团乾县特别支部成立,特支书记张含辉,组织兼共青团乾县特支书记王炳南,宣传曹碧轩。

同月 魏野畴、侯德普等共产党员先后出西安,分别到三原、渭南、华县、蓝田等地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与刘镇华部作战,并向土豪劣绅进行斗争。

9月 中共渭阳中学特支成立,书记蒲克敏,组织常步杰,宣传徐振化。

同月 中共旬邑特别支部在宝塔高小成立,特支书记许才升,组织委员程永盛,宣传委员王子健。

10月初 冯玉祥接受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提出的“进军陕西,出师潼关,会师中原,策应北伐”的意见,制订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作战方针。将国民军联军分作两路:一路由孙良诚、吉鸿昌率领经宁夏银川、甘肃固原、平凉东进;一路由于右任、史可轩率领经榆林南下入关中配合陕军抗击刘镇华,以解西安之围。10月上旬,甘肃方面的国民军联军第三路抵达兴平,榆林方面的国民军联军所部已向三原挺进。在此形势下,刘镇华为了集中兵力进行顽抗,撤去了围攻三原的部队,三原之围遂解。

10月20日 于右任和共产党员史可轩、许权中等进入三原后,成立了国民军二、三军临时总司令部,积极筹划陕西的革命工作和善后计划。魏野畴、史可轩等均在总司令部担任重要职务。

10月 中共岐山特支成立,李琦任书记。

同月 中共富平特支成立,严木三任书记。在此前后,共产党员王勉之在渭南隆兴成立了一个独立支部,活动于渭南龙背村一带,打土豪,斗劣绅,帮助附近各村建立了12处农民协会,农协会员发展到1000多人,党员人数增加到20余人。

同月 由共产党员亢维恪任主任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驻陕办事处在广州成立。同时,在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乔国桢、霍世杰、杜松寿、冯文江、李波涛等13名(3名学员因病未回)陕籍学员陆续由广州回到陕西关中和陕北,在三原、蒲城、富平、渭南、华县、华阴等地开展农民运动,广泛传播毛泽东关于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自卫军等农民运动的经验。

11月中旬 国民军联军其他几路,分别由包头、宁夏经甘肃平凉先后入陕,与国民军联军第三路会师咸阳。27日复战西安。在国民军联军的强攻下,杨虎城、李虎臣积极出击,其他各地的陕军、民军、红枪会配合截击刘镇华部。28日刘镇华部溃逃,被围近八个月之久的西安城解围。

11月 中共泾阳特支在泾阳第一高小成立,特支书记耿觉、组织委员陈靖,宣传委员吴襄。

12月 西安解围以后,共产党的骨干力量云集西安。由于中共豫陕区委已于1926年8月撤销,西安党、团组织与上级组织未能取得联系,为集中力量,统一领导党、团组织开展工作,在中共西安地委书记黄平万、共青团西安地委书记吴化之主持下,组成临时性的陕西党、团最高指导机关——党团联席会议,下辖中共西安、渭南二个地委和10个特别支部,有党员388人(包括绥德地区的党员人数)。团的组织有西安、渭南、三原3个地委和14个特别支部,有团员525人。

同月 陕西党团联席会议派张性初、罗承运到渭南整顿党团组织,建立中共渭南地方委员会,书记雷光显。同时,共青团渭南地委成立,书记宋蔚青。

同月 中共兴平特支成立,特支书记曹碧轩,副书记杨景辉。

12月14日 三原武字区农民协会成立,主席乔国桢,副主席唐玉怀。武字区农协会下辖4个区农协会,38个村农协会,会员1万多人。

12月中旬 华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县城高级小学召开。大会通过了农民协会章程和举办华县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决议。

12月15日 中共北方区委发出《对于陕西问题的意见》,要求将陕北和

关中地区党的组织统一起来,决定耿炳光为党的工作临时特派员,领导全陕党的工作;成立陕西党的区委组织,由中央直接管理与指导。

12月21日 在中共西安地委的倡议和积极支持下,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创办了陕西《国民日报》,由共产党员雷晋笙任社长,孟园梧、吕凤岐等任编辑。该报主要介绍马列主义和国民革命的先进思想,报道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国际的活动经验。

12月22日 国民军联军在进军西安途中曾酝酿成立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中共西安地委派魏野畴、史可轩等人积极帮助于右任开展筹建工作。根据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的决议和冯玉祥之电嘱,12月22日于右任、邓宝珊分别就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总司令、副总司令。

12月 根据中共西安地委决定,魏野畴与李子洲等人在西安举办党员骨干训练班。训练班结束后又组织了一个政治队,召集党的基层干部和党、团员骨干学习马列主义常识和一般的军事技术。

1927年

1月1日至8日 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发布命令,废止陕西省督办、省长,由驻陕总部统管军政大权。不日,驻陕总部相继委任了各部、厅、局的领导,其中多数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苏共党员赛夫林担任驻陕总部顾问,魏野畴担任驻陕总部政治部副部长,史可轩任政治保卫部部长,杨明轩任教育厅厅长,杨晓初任财政委员会副主任,葛霁云任民政厅副厅长,王尚德任出版局局长。

1月2日 长安县召开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长安县农民协会筹备处。到2月15日,长安建立了150个村农协和3个区农协,同时组建农民自卫军参加肃清土匪和维护治安工作,开展清算豪绅账目的斗争。

1月10日 国民党西安市党部召开新老党员大会,共产党员师守命等被选为党部常务执行委员。

1月18日 陕西省妇女协进会在西安举行妇女解放大会,共产党员王观政主持大会,雷晋笙、刘含初等应邀在大会上讲话。

同日 三原党、团组织以国民党三原县党部的名义召开群众大会,纪念列宁、李卜克内西、卢森堡。

1月21日至26日 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多数为跨党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大会先后由于右任、史可轩、魏野畴、李子洲、刘含初、杨明轩、王授金任主席,共产党员赵葆华任大会秘书长。苏联顾问赛夫林、乌斯曼诺夫担任大会顾问。大会通过了宣言和决议案,选举刘含初、赵葆华、李子洲、魏野畴、张性初、张含辉、王授金等13人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正式执行委员,王尚德、呼延震东等3人为候补执行委员。

1月30日 冯玉祥在西安召开军事扩大会议,宣布国民军联军各路军的组成名单,各部队均成立政治工作机构。刘志丹、方仲如、宣侠父、蒋听松等近200名共产党员在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

2月4日 西安中山学院筹备委员会在西北大学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举办军事政治、组党和农民运动三个学员班,培养指导农民运动、党务及军队中政治工作人才。16日,中山学院再次召开筹备大会,学院领导人刘含初、李子洲在会上讲话,决定成立招生、事务、教育3个委员会,呼延震东、吴化之、张汉俊、杨怀英等共产党员担任各委员会委员。

2月上旬 绥德县党、团组织以国民党绥德县党部的名义举办农民补习学校,派党、团员轮流赴各乡村进行宣传,组织成立了40多处农民协会。

2月中旬 陕西省农民运动委员会成立,由共产党员黄平万、张含辉、李维屏、亢维恪、陈嘉惠五人组成,负责指导全陕农民运动。

3月5日 陕西党、团组织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和长安县农民协会筹备处的名义,在西安大莲花池召开反英大会和长安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

3月初 华县农民协会成立,委员长杜松寿,委员高克林、王述绩等。时华县有区农协8个,村农民协会324个,农协会会员5100人。

3月10日 西安中山学院正式开学,院长刘含初,副院长李子洲。学院其他领导和干部、教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学生中也有一部分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学院设有党、团组织。

3月13日 共青团陕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中山学院召开,到会代表10人,选举成立了共青团陕甘区委,书记曹趾仁(曹志麟),宣传张金印(张慕陶),组织吴化之,秘书长王鸿俊,王林负责省、市学联工作,王文彬负责陕西青年社工作。代表大会提出了团的组织群众化、工作青年化,以学生运动和青年社为中心的工作方针。

3月14日至18日 中共陕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中山学院举行,

出席会议代表 11 人,代表 9 处党组织。大会选举建立了中共陕甘区委,耿炳光(书记)、魏野畴(宣传)、李子洲(组织)、亢维恪(农委书记)、陈家珍(军委书记)为区委正式委员,候补委员二人暂缺。

3 月 中共绥德地委改组,书记蔡南轩,组织何寓础,宣传关中哲,青运赵通儒,农运李波涛。地委下辖党的特别支部和支部十多个,共有党员 196 人。

同月 中共渭南地委改组,书记何挺杰;组织王观德,宣传张翬,国民运动委员金子毅,农运李维屏,青运张宗适。地委下辖 1 个部委、10 个支部,党员 270 人。

3 月 22 日 中共三原地委成立,书记张性初,组织贾怀庚,宣传王之鼎,农运庞诚斋,妇委王爱玉。地委下辖富平、高陵、泾阳、云阳、蒲城 5 个特支和渭北中学、第三师范 2 个支部,有党员 47 人。5 月,三原地委所辖支部增加到 20 个,党员发展到 207 人。

3 月 27 日 陕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在西安成立,共产党员张含辉、亢维恪负责工作。

3 月 28 日 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肤施(今延安)县农民协会成立,委员长赵国玺、副委员长屈正江。

4 月 1 日 中共延安地委成立,书记田伯英,组织易厚庵,宣传陈瑜廷。地委下辖 3 个直属支部和安定、宜川、延川、延长等 7 个特支,党员人数 110 人。同时,共青团延安特支改为团地委,书记焦维炽。

4 月 2 日 三原县农民协会成立,主席庞诚斋。县农民协会下辖 6 个区农协,670 个村农协,会员 3 万余人。

4 月 12 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陕西人民开展反蒋活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省学联等团体发出通电,号召全陕人民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完成国民革命。

4 月 16 日 中共陕甘区委发动和领导的由农、工、青、妇各群众团体联合国民党省、市党部筹备的“拥护国民军肃清后方,会师中原”大会在莲花池广场召开。

同日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西安市党部、陕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陕西省总工会筹备处、陕西学生联合会、西安学生联合会、西安妇女协进会共同发出纪念《红色五月公告》。

4 月 27 日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西安市党部召开在西安的全体国民党

党员大会,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拥护国民党中央开除蒋介石党籍和解除其职务的决定。省党部常务委员赵葆华主持会议,于右任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

5月1日 中共陕甘区委的机关刊物《西北人民》旬刊出版发行。

同日 陕西党组织在西安东大街创办“廿八”书报社。该书报社除代销党、团机关刊物《向导》、《中国青年》和在上海出版的大量革命书刊外,还直接推销陕西地区党组织印刷、出版的书刊。

5月初 中共榆林地委成立,书记马云程,组织郭洪涛,宣传周家干。地委下辖中共榆林中学支部、横山特别支部等。

5月 中共陕甘区委决定,将中共泾阳特支改为中共泾阳地委,耿觉任地委书记兼组织,马步云任宣传。地委下辖7个支部,有党员61人。同时,共青团陕甘区委将共青团泾阳特支改为共青团泾阳地委,梁俊琪任团地委书记。

5月5日 冯玉祥按照中国共产党与武汉国民革命政府商定的军事计划,发布命令,率师东征。党组织领导陕西人民组织欢送,沿路供应开水、粮草,运输辎重及军需品,慰劳东征将士。

5月9日 中共陕甘区委代表黄平万出席在武昌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张金印参加了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

5月12日 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创办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校长史可轩、副校长李林、政治部主任邓希贤(邓小平)、总队长许权中。教员和干部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5月14日 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耿炳光任陕西省委书记。

5月20日 中共中央任命黄平万为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长,李子洲为组织部长。并决定李秉乾从苏联回国后参加中共陕西省委工作。

5月25日 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国民党特别党部成立,邓希贤等七人被选为执行委员。

同日 国民军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

6月1日至8日 陕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选举产生了王授金、张含辉、李维屏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组成的陕西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时全省50个县有农民协会组织,其中17个县成立了县农民协会,8个县成立了县农民协会筹备处,25个县成立了区、村农民协会。全省共有区农协179个,村农协3828个,会员41万人,农民自卫武装10万人。

6月中旬 中共陕甘区委增补刘天章(负责宣传)、杜振庭(负责组织及西安各支部的指导工作)为候补委员。

6月 冯玉祥先后参加了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等召开的郑州会议和蒋介石举行的徐州会议,参加并支持宁汉合作。

7月初 中共陕甘区委接到刘伯坚从郑州送来的紧急通知,要求陕西党组织做好冯玉祥叛变革命后的应急准备工作。耿炳光、李子洲和魏野畴商议后立即在中山学院召开中共陕甘区委紧急会议,决定立即通知各级党组织及党领导的群众团体,迅速由半公开活动转入秘密状态;身份已暴露的同志秘密离开西安,深入基层开展工作。

7月初 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黄平万回到西安。根据中央指示,由中央指定的省委领导人及原陕甘区委负责人魏野畴、共青团陕甘区委宣传委员张金印等在西安开会,正式成立陕西省委,撤销陕甘区委。省委由正式委员13人和候补委员5人组成,正式委员为耿炳光(常委、书记)、李子洲(常委、组织)、崔物齐(常委、宣传)、魏野畴(军事)、亢维恪(农运)、张金印、李秉乾、杜振庭(杜衡)、蒲克敏、何挺杰、张国藩、陈嘉惠、张秉仁。候补委员暂缺。省委下辖西安市委和长安、渭南、绥德、三原、五一、延安、华县等7个县委,岐山、乾县、泾阳三个区委和潼关、华阴、临潼、兰州、平凉、宁夏等20个直属支部。大革命失败后,党员人数由大革命高潮时的2177人减少到1618人,机关驻地西安红埠街9号。

7月 为了便于指导各地工作,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实行特派员制度,将全省分为六路,每路各设特派员一人,直接向省委负责。东路(省东)特派员何挺杰,后为潘自力;西路(省西)特派员耿炳光;北路(省北)特派员李子洲(一说李秉乾);南路(长安、蓝田、周至、户县)特派员陈嘉惠;东北路(五一、蒲城、澄城、合阳、朝邑)特派员蒲克敏;陕北路(陕北)特派员魏野畴。

7月6日 陕西《国民日报》社社长、共产党员刘天章和编辑、共产党员白超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押送河南。

同日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驻陕总部副总司令邓宝珊在宴请各机关代表的会上宣布:“冯玉祥来电,要求进行清党。”

7月7日 共青团陕西省委在西安成立。团省委由正式委员11人和候补委员5人组成,团中央指定张金印任书记。团省委成立不久,同中共陕西省委一样,将全省划分为7路,派特派员去各路指导工作。

同日 团西安市委成立,曹趾仁为书记。

7月8日 根据冯玉祥的指令,石敬亭令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进行“清党”。同时,冯玉祥电令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进行改组,强迫省农协停止活动,查封了陕西青年社。

7月11日 中共陕西省委就郑州会议后陕西形势的变化及省委采取的对策向中央作了书面报告。

7月13日 冯玉祥电令,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与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合并编为一个旅,由政治保卫部部长史可轩率领开赴河南。14日,史可轩按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带领政治保卫部与中山军事学校学生千余人离西安,过草滩,沿渭河开往临潼交口一带。

7月15日 西安警备司令部按照冯玉祥电令和国民党中央的训令,发出《严禁共产分子活动》的布告。

7月中旬 邓宝珊通过共产党员葛济云向省委表示不愿反共,并提出要史可轩部随他从南路出陕入豫,靠拢武汉的国民革命军。在无法与中央取得联系的情况下,省委派李子洲赴武汉向中央请示工作。不久,省委即接到武汉亦于7月中旬开始了“清党”反共的消息,遂决定史可轩部北上,向驻扎在陕北清涧、宜川一带受党影响较多的石谦旅靠拢。为此,派崔孟博去临潼交口镇向史可轩部党组织传达省委决定。同时,派魏野畴、唐澍、白乐亭去陕北清涧,向石谦部党组织传达省委决定,策应史可轩部北上。8月,魏野畴东渡黄河,经山西转赴河南归德(今商丘市)牧马集,到杨虎城的十军任军政治处处长,党内任军委书记。唐澍、白乐亭(白明善)留在清涧石谦旅李象九营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7月29日 史可轩率部到达富平县美原镇,为借道过境和筹借粮草,亲带十余人到美原镇,被军阀田生春扣押并杀害。后,部队在共产党员许权中的带领下,编为一个旅,辗转蓝田、洛南一带。1928年5月,这支部队参加了渭华起义。

8月4日 陕北军阀井岳秀派军队将中共组织在陕北的活动据点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延安省立第四中学查封。

8月8日至12日 中共中央先后两次在武汉听取了李子洲的汇报,并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对陕西工作的指示。要求在组织民众的基础上形成反冯玉祥力量,推翻其反动统治,在农运集中的几个县即可开始暴动。在

军事上可以利用原国民军二、三军合作反冯,但要形成自己的力量。

8月14日 中共中央致函中共陕西省委,要求依靠工农和一般劳苦民众,团结红枪会等力量,对冯玉祥实行进攻的政策。

8月19日 西安中山学院院长、共产党员刘含初被军阀井岳秀派人杀害于中部县(今黄陵)。

8月中旬旬 中共陕西省委农运负责人亢维恪、党员吕佑乾、王学习、曹瑄等在华阴组织农民抗粮时被捕。

9月26日 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省委委员、各路特派员及各县委、共青团代表15人出席。李子洲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并代表省委作党务工作报告。耿炳光作政治报告,检讨了省委对冯玉祥政策摇摆不定的错误。会议作出《接受中央八七会议决议案及其指示之决议案》、《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以及组织、军事、国民党问题等九个决议案。决议提出坚决反冯,发动群众破坏冯的军事设施,抢夺枪械;陕西的主要革命力量是农民,党到农村去,在土地革命政纲之下,加紧农村阶级斗争,准备总暴动,创造农协政权,推翻冯的统治;党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加紧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许权中旅北上与陕北李象九旅配合开展工作;恢复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活动方式由半公开转为秘密。会议改选了省委,常委耿炳光(书记)、李子洲(组织)、李秉乾(宣传)、委员亢维恪(农运)、张金印(共青团)、刘继曾(秘书长),候补委员张含辉、潘自力。此时,中共陕西省委辖县、市委八个,区委10个,特支32个,支部153个。

9月 中共陕西省委刊物《陕西省委通讯》创刊,出四期后停刊。

10月1日 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陕西省委划归长江局领导。11月初,长江局撤销,陕西省委仍直属中央领导。

同日 共青团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西安召开。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李子洲、刘继曾出席会议,传达了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精神。会议通过了接受中共陕西省委扩大会议报告、陕西共青团组织目前任务、组织问题等决议案。会议正式选举了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张金印。

10月12日 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共产党员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等率领为党掌握的原石谦旅在清涧起义。起义部队转战延川、延长,攻克宜川县城,在井岳秀部高双成师的围攻下,被迫转移韩城。11月,建立军委,唐澍、谢子长、白明善、阎揆要、史唯然为委员,并将

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总指挥唐澍,副总指挥谢子长,参谋长阎揆要。游击支队在攻占宜川受挫后,转战延安、延川、安塞、保安(今志丹)一带,途中屡遭国民党军队袭击,人员分散隐蔽。

10月13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岐山县委,书记耿菊人(耿觉)。下辖岐山、兴平、武功、凤翔党的组织。

10月1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第五号通告,指出党在陕西的任务不仅是做反冯玉祥的宣传鼓动,而且要积极地做倒冯的组织工作。要求各级党组织恢复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进行抗粮、抗款、抗税斗争,进而领导农民夺取政权,使一切权力归农协。

10月19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建立中共陕南特委,书记刘甲三。

10月23日 中共陕西省委、共青团陕西省委发出联字通告第二号,规定了党、团关系的原则:从省委到支部党、团互派代表出席会议,共同进行工作;团组织要经常向党组织报告工作,团代表在党的会议上有表决权;21岁以上的团员一律入党,18岁以上的团员可以兼党员;有党无团之地方,党应为团设法发展组织;团在国民党军队不设独立支部,团支分部受党军支指挥。

10月24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第七号通告(军事第一号),决定设立军事部管辖军支工作。要求各地调强壮、勇敢的同志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学习军事,充实力量,培训武装暴动的领导人才。

10月下旬 中共三原县委负责军事工作的张汉民在云阳镇成立了农民自卫团。

同月 中共乾县(工作)委员会建立,书记王玉裁。

同月 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后方三原留守部队补充团和炮兵营中共第四军支建立,书记张汉民。

秋 高岗、马明方、曹亚华等在横山旧城响水堡举办“农民运动通俗讲习所”,培养农协干部。

11月4日 中共陕西省委刊物《政治通讯》创刊。

11月6日 中共中央向中共陕西省委发出指示信,要求在抗捐、抗税、抗租、抗粮的口号下,引导农民暴动;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一切乡村政权归农民协会;立即改组各级党部,提拔贫农参加党和群众的领导工作。指出许权中旅的出路是在党的暴动政策之下,帮助农民发展土地革命,成为农民暴动的副力。

11月9日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指出全国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主张继续进攻，发动全国总暴动。

11月16日 根据陕西反冯玉祥斗争暂时失败的情况，中共陕西省委做出第二次《政治报告》，要求党员深入民众，继续努力反冯；到国民党军队中去，武装起来，准备总暴动。

11月17日 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就掌握的许权中旅、李象九旅及其它国民党军队中党组织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

11月26日 共青团陕西省委收到团中央来信，批评团省委根据党陕西省委7月11日报告所确定的工作方针。强调团与党目前的工作是与机会主义作斗争。

11月28日 共青团陕西省委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贯彻团中央《驻汉委员全体会议决议案》、《告全团同志书》、《复团陕西省委公函》及中共陕西省委准备提交全体会议审议的第二次《政治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表示完全接受团中央的批评，“努力与机会主义拼命。”会议对党省委《政治报告》中认为西北农民非常落后的观点及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前途问题的看法提出批评，认为中共陕西省委执行的是“机会主义”政治路线。指出今后陕西党和团的任务应该是：加紧动摇反动统治，建立农民武装和政权，立即组织暴动，向由民权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发展，并要求中共陕西省委采纳这些决议。

11月3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学习中央8月发出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会议认为决议案中对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及革命前途的分析是正确的。提出两个月来，省委和各级党组织对八七会议及省委九二六扩大会议精神没有完全了解和传达到党员群众，使决议未能完全实行。会议重申农民是陕西革命的主力军，党要积极恢复农协，发动农民抗捐、抗粮、抗税，作部分暴动，准备总暴动；坚持反冯玉祥斗争，打破冯玉祥在农村的封建基础，推翻其统治。会议增选刘继曾、张金印为省委常委。并建立组织、宣传、军事、农民运动委员会，分别由李子洲、李子健、苏士杰、潘自力负责。

同月 中共陕西省委派往上海向中共中央请示工作的刘志丹回陕，带来中央通过的号召全国普遍发动起义的文件。

同月 中共礼泉县委建立,书记秋步月。

12月4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张金印陈述了团中央对中共陕西省委7月11日的报告和团省委对省委11月16日《政治报告》的意见,认为党省委提出的西北农民非常落后和发动起义要经过一个准备过程的意见是右倾机会主义,要求党省委重新讨论。耿炳光与其进行了激烈争论。最后常委会表示接受团省委意见,修改《政治报告》和重新起草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并决定召开第二次全会解决这些问题。

12月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根据团陕西省委意见修改通过了《两月工作的回顾及政治问题决议案》和重新起草的《K·M·T问题决议案》(K·M·T国民党的英文缩写)。第一个决议案承认省委“在最近的政治报告上又表现出机会主义的犹豫与动摇”,将准备总暴动修改为组织农民在农协会旗帜之下,发动抗税、抗捐、抗粮的部分暴动,以至总暴动,推翻国民党在陕西的反动统治。

12月31日 中共中央发出第二十五号通令,命令共产党员一律退出国民党,退出国民党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绝对实行反国民党的工作。

12月 中共米脂(书记刘春园)、府谷(书记严念组)县委成立。

同月 中共三原县委书记张秉仁在云阳指挥农民自卫团收缴了国民党部队枪械30多支。

1928年

1月2日 中共中央向中共陕西省委发出第九号公函,对陕西工作提出几项重大原则:(1)绝对放弃利用军阀的心理,以工农暴动消灭军阀战争,造成一个割据的局面;(2)迅速改正创造革命的国民党的观念;(3)宣传苏维埃政权,改乡村政权归农民协会为归农民代表会议;(4)工农运动要变和平的请愿运动为激烈的直接行动——抗租、抗税,杀豪绅、地主,没收其土地、财物分给贫苦农民,以达到暴动的局面;(5)党领导的军队驻地,应是农运有基础的地方,应选择得力同志投入反动军队发展士兵支部;(6)彻底改造党组织,提拔勇敢的工农分子加入领导机关。

1月4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依据中央文件精神,认为省委仍然没有摆脱机会主义的指导,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决定撤销耿

炳光省委常委、书记职务。

1月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推选潘自力为代理书记,徐梦周(组织)、刘继曾(秘书长)、张金印(共青团)、王松年为常委,会后增加李子洲为常委。

1月12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第二十六号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工农武装暴动的新政策下,反对一切大小军阀,开展游击战争,由部分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的总暴动,履行彻底的土地革命。为了便于领导,将全省划分为关中、陕南、陕北三个区。关中划为省东、渭北、省西、中区、东府等五个重要区域,每区设一暴动委员会,指挥游击战争。2月2日,省委又发出通告,取消暴动委员会,由各级党部直接领导。

1月28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布第三十号通告,指出由于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需进一步加强,决定在渭南、华县、长安、三原四县设立军事部。

1月下旬 为加强党对许权中旅的领导,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派刘志丹、唐澍、谢子长、吴浩然、廉益民(卢少亭)、周益三等人到洛南许权中旅担负重要工作。

2月9日 三原武字区抗敌委员会成立,主任孙志刚。22日,抗敌委员会领导的游击队建立,总指挥黄子文,队长唐辉智。

2月12日 耿炳光致书中共陕西省委常委会,对省委第二十九号通告及党在陕西的机会主义错误,党、团关系和西北农民落后与否,特别是对发动农民暴动等问题申述了自己的观点。批评省委对暴动操之过急,认为暴动必须有相应的环境、时机和准备,现在应集中党的力量于农运中心,实现由部分暴动到总暴动。

2月13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传达1927年11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的文件和中央第九号公函精神,制订了《陕西C·P目前工作方针》。总方针是,发动群众开展从经济到政治的斗争,使工农群众自发的暴动尽快高涨,由局部暴动汇合成全省的总暴动,造成陕西割据局面,以至建立全省的苏维埃政权。会议同时讨论了耿炳光致省委常委的信,认为其意见大部分是对的。决定派耿炳光为中共陕南特委书记,耿认为难以完成年关组织暴动的任务而未就职,从此脱离党的关系。

2月18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决定在组织上自下而上地改造各级领导机关,吸收工农积极分子,洗刷腐化投机分子;在政策上,打

破不信任群众力量和侧重利用原国民军联军一、二军反冯的错误观念。补选张振海为常委,选举潘自力、张金印、王松年为陕西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2月29日 在中共渭南县委领导下,数百农民和学生将闯入渭南宣化小学的反动分子刘铭初、薛明璋打死。事发后,渭南许多学校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党、团员及群众遭逮捕。3月13日,省委发出三十九号通告,要求各级党部扩大宣化事件,发动新的群众斗争,开发农民游击战争,由陕东各县的部分暴动,汇合成陕东民众的大暴动,以至形成总暴动,建立全陕苏维埃政权。

2月下旬 潘自力、张金印、王松年前往上海出席党的六大会议。

同月 中共东府特委在澄城建立,书记张国藩。

3月16日 潘自力等在上海向中央作《陕西党、团组织情况的报告》。

3月18日 中共中央作出《陕西工作决议案》,指出陕西的反动统治已在崩溃之中,因此实行工农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是陕西革命发展的前途。后因中共六大会议延期,决议案由潘自力、王松年带回。

3月20日 中共中央致函许权中,指出许旅寄生在李虎臣下面不是出路,要随时准备脱离。目前主要工作是肃清内部,发展壮大组织,扩充军队;加紧党的训练,明确土地革命及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意义。

3月21日 中共陕西省委秘书处、交通处遭国民党当局破坏,方鉴昭、徐九龄、李嘉谟、任醴、校明济以及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工作的共产党员王德安等被捕。6月17日,方鉴昭等被国民党杀害。

3月22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划临潼、渭南、华县、华阴、固市为陕东暴动区。成立中共陕东特派委员会指导工作,准备暴动。4月1日,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在华县成立,书记刘继曾。

3月 中共蒲城(书记曹受祉)、榆林(书记李文芳)两县委建立。

同月 渭南、华县中共组织先后选调了28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到洛南三要司许权中旅学习军事。

同月 中共长安中心县委在咸阳召开咸(阳)、长(安)、户(县)三县党员会议,成立暴动委员会,总指挥李良。

同月 中共蓝田县委建立,书记赵伯平。

4月中旬 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会议在绥德苗家坪(今属子洲县)召开,成立中共陕北特委,书记杜衡。

4月中旬 李虎臣趁冯玉祥主力出陕参加军阀混战之际,在商县召开军事会议,联络原国民军二军各部发动反冯战争,并命令许权中旅开赴潼关,阻击冯部宋哲元入陕。

4月30日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对“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会后,中央发布第四十四号通告。年底,中共陕西省委收到通告,开始在陕西纠正“左”倾盲动主义。

4月下旬 王松年、薛自爽等一批渭华受训人员,在许权中旅营长李大德(共产党员)率领下,携带枪支弹药由商洛返回渭华地区。这支武装力量很快发展到100多人,被编为陕东赤卫队,李大德、薛自爽任正、副大队长。

4月下旬 中共陕西省委代理书记潘自力前往渭华地区指导起义工作。

4月 中共韩城临时县委(书记孙玉如)、富平(书记马文彦)、清涧(书记师应三)县委(工委)成立。

同月 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共产党员王泰吉率领国民党第十七军第三师甄守珊部教导团一营五六十人在麟游起义。起义部队离开麟游,经崔木到达礼泉南坊镇时,受到当地民团围攻而失败。

5月1日 在中共陕西省委和陕东特委领导下,渭华地区农民在渭华原上举行暴动,相继建立了区、村苏维埃政权。10日,许权中旅一部由潼关开赴华县,参加农民暴动。16日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唐澍,军委主席刘志丹,参谋长王泰吉,政治部主任廉益民,军党委书记吴浩然,总顾问许权中。起义军民杀豪绅,斗地主,很快形成以华县高塘、渭南塔山为中心,东至少华山,西到临潼,北接渭河,南连秦岭约200平方公里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苏维埃政权在渭南、华县、五一3个县的区、村相继建立。6月下旬至8月,在敌人的疯狂镇压下起义失败。

渭华起义前后,省委指示关中各地相继发动农民起义。中共三原县委在4月24日发动近万名群众手持权把、扫帚,高呼打倒贪官污吏、免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并焚烧农具进行示威,迫使国民党县政府答应免去全年粮款。5月3日,三原县委又发动农民武装围城,由于国民党当局防守严密,起义队伍内部叛乱,围城失败。4月26日,中共泾阳区委发动农民“交农”围城,要求豁免粮、款。5月1日,党、团礼泉县委动员3万多农民包围县城,高呼“免粮免款度春荒”、“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等口号,连续围城两天。

5月6日 旬邑县党组织领导起义农民以抗粮“交农”为口号,攻克县城。

12日,建立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主席许才升。31日,国民党军队围攻县城,内奸乘机叛乱,起义领导人吕佑乾、许才升、吕凤岐等人被杀害,起义失败。

5月9日 共产党员赵新三等领导淳化农民举行起义,攻克县城。6月19日,建立了淳化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赵新三。6月30日,在国民党军队包围下起义失败,赵新三、田望秀等领导人牺牲。

5月16日 李艮等人在咸阳马家寨举行暴动,杀死豪绅地主,烧毁契约、账簿。

5月18日 在党的武装暴动政策影响下,永寿农民自发地组织5000多人进行抗粮围城斗争。

5月26日 在中共东府特委领导下,发动了以澄城为主,并有大荔、朝邑、蒲城等县农民参加的驱逐韦庄军阀赵桂堂的斗争。经过持续月余的武装围攻,终将赵桂堂赶走。

6月13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通过《全陕总暴动决议案》,要求各地继续组织暴动。会议改组了省委,常委潘自力(书记)、李子洲(组织)、蒲克敏(宣传)、杜衡(职工委员会)、曹趾仁(共青团)。

6月 中共兴平(书记陈云樵)、户县(书记刘启宇)两县委成立。

同月 共青团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选举曹趾仁为团省委书记。

夏 中共吴堡县委建立,书记薛尚英。

8月 为适应渭华起义失败后的形势,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合并渭南、五一两县委为渭南县委,书记王芾南(王林)。

10月8日 中共中央向中共陕西省委发出指示信。指出“过去党的暴动政策,犯了极深的盲动倾向,必须严厉纠正”。

10月13日 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刊物《西北红旗》创刊。

11月28日 在长安县委开会的省委书记潘自力及县委负责人张新发(张鼎安)、李艮(愚痴)、杜松寿等被捕。潘自力被捕后,李子洲代理省委书记。

12月底 蒲克敏由中央返陕,带回中共中央六大会议文件。

12月 中共肤施(延安)县委建立,书记李馥华。

1929年

1月24日 中共陕西省委交通处遭国民党陕西当局破坏,10名工作人员被捕。

1月下旬 中共陕西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在富平美原小学召开。根据中共六大会议精神,总结了“左”倾盲动主义失败的教训,检查了省委领导工作的失误。改选了省委,书记曹趾仁。委员李子州(组织)、蒲克敏(宣传)、徐梦周(秘书长)、王芾南、张国藩、薛永寿、马云藩。会后,共青团陕西省委在蒲城荆姚小学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共青团全国五大和中共陕西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会议改选了团陕西省委,选举马云藩为书记。

2月2日至6日 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程士诚被捕叛变,使党、团省委负责人李子洲等被捕,机关遭破坏。这次大破坏后,关中地区党员锐减到200多人。

2月 中共陕北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绥德西川张家岔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共六大和中共陕西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要求党、团员到国民党军队中去,掌握武装。

3月1日 党、团陕西省委成员张国藩、王芾南、薛永寿以“现存之省委”名义在渭南固市召开蒲城、渭南、华县、富平、长安等地党、团负责人紧急联席会议,组成中共陕西临时省委,负责人王芾南,委员张国藩、薛永寿、张蔚森、徐振化、李凌云等。临时团省委书记薛永寿。

3月23日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渭南召开,重新调整省委成员,常委杜衡(书记)、徐振化、章子文,候补常委王芾南、张蔚森。并确定杜衡、王芾南、薛永寿三人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杜衡等离陕期间,由徐振化在西安组织临时省委机关,联系各地组织和散失的党团员。

4月初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派陈云樵(陈冠英)为西路巡视员,恢复整顿组织,开展灾民武装斗争。

4月16日 中共中央复函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对省委在遭破坏后,很快建立临时省委表示满意。指示临时省委加强反军阀斗争,恢复发展陕西工作。

5月4日 杜衡等三人在上海向中共中央做出书面报告。检讨陕西省委在二次扩大会议后犯了“左”倾盲动和军事冒险的错误,并就省委本身工作及各地情况作了详细报告。6月22日,根据杜衡等人的报告,中共中央做出《陕西问

题决议案》，指出陕西目前的总路线是：尽力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工作和对日常斗争的领导；建立城市工作的基础；从部分的领导工农群众的日常斗争，发展到农民游击战争，以至建立苏维埃政权；加强对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工作，以争取广大士兵，使之与工农斗争汇合起来。据此精神，陕西党组织先后派刘志丹、谢子长等一批共产党员打入陕西、甘肃的国民党军队，从事兵运工作。

6月18日 李子洲在狱中病逝。

6月 共产党员薛尚英、慕嘉绩、张毅忱等领导吴堡岔镇及周围数十个村庄四五百群众，同贪污受贿、私增地亩税的吴堡县财税局长薛有年进行斗争，取得胜利。

7月中旬 杜衡等由上海回陕西后，在渭南辛市召开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第三次全会。根据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会议决定今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组织，抓紧士兵和救济难民工作。会议调整了省委成员，常委杜衡（书记）、王芾南（组织）、张蔚森（宣传），候补常委徐振化、刘志丹。会后，临时省委派人分赴陕北、陕南、渭南等地整顿、恢复组织。

8月23日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召开第二次常委会议，调整省委成员，增加薛永寿为常委；吉国桢为正式委员，担任陕北特委书记；张蔚森改任候补常委，负责西安市工作；刘志丹去陕北开展兵运工作，不再任候补常委。

8月 中共周至县委成立，书记陈云樵。

夏初 中共陕北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在榆林红石峡召开。会议提出采取白色、灰色、红色三种方式进行武装斗争，推动灾民分粮。并决定撤销杨国栋代理书记职务，由刘志丹任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九十月间，特委改组，吉国桢任书记。

11月 在中共陕西临时省委西路巡视员陈云樵的指导下，武功县两支灾民武装袭击三官庙张荣禄民团和冯玉祥教导师某部及县警察局，缴枪数百枝。

是年 中共在杨虎城统帅的新编第十四师中先后建立了中共特别委员会、第三旅中共支部、南阳教导队中共军事委员会。

1930年

2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出七十号通告，指出党在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促进和准备武装暴动，首先争取一省或几省的胜利。

3月初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决定撤销渭南县委,建立四个特支,直属省委领导。

春 中共安定县委建立,书记冯文江。

4月初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机关由渭南迁到西安。

4月4日至15日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向西路、陕北、各军支等党组织传达中央七十号通告精神,要求各地按照通告精神部署工作。同时决定成立西路特支,指导各特支、军支工作。

5月25日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指示陕北特委,要求深入发动群众,坚持斗争,发展与巩固党的力量和群众基础。

5月下旬 根据中共中央七十号通告精神,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召开渭北工作讨论会,决定以三原北区为中心,恢复农民协会,组织灾民自救队,以广大农民、灾民为基础,开展游击战争。

6月1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6月上旬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西路巡视员陈云樵、三原特支书记黄子文等在三原、富平分别召开渭北地区党的负责人会议,决定联络地方武装在武字区成立灾民自救队。中旬,武字区灾民自救队成立,队长陈云樵,政委黄文。

6月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制定了《组织工作三个月计划》,强调吸收工农群众入党和进入党的领导机关,促进陕西革命运动的发展。

同月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候补常委张蔚森、秘书闵继騫被国民党陕西当局逮捕。张蔚森于7月6日被国民党杀害。

7月1日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在蓝田巩村小学召开,讨论通过了政治、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兵运、组织、宣传及共青团等七项决议。提出陕西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和发动群众斗争,准备武装暴动。会议决定改临时省委为正式省委,常委杜衡(书记)、王芾南、吉国桢。

7月9日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和布置各地工作,决定由吉国桢、张国藩组成西安市委;梁益堂为陕南特派员兼陕南特委书记,恢复陕南党组织;赵伯平为陕北特委书记。

7月中旬 共青团陕西临时省委在蓝田县草坪小学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贯彻中共中央第七十号通告和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精神。会议选举薛永寿为团省委书记。

7月2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第一号通告,指出陕西革命的客观条件更比全国成熟,党的任务是在全党政治路线和任务之下,努力地加强主观力量,准备总的革命斗争,争取全省总暴动的胜利,建立局部的以至全省的苏维埃政权。

7月 杨虎城任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师中共兵变前敌委员会在河南舞阳成立,书记孙永康。

8月1日 《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要胜利》等文件,由中央交通黄平带到陕西。黄平向陕西省委传达了中央关于“布置汉南、渭华工作,以配合武汉的取得”的口头指示。

8月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三次常委会议。根据中央决议精神,会议认为临时省委五次扩大会议对政治形势估量仍不足,犯有右倾错误,所形成的决议应予推翻,决定由杜衡另行起草新的决议;同时发一告同志书,指出五次扩大会议的严重错误。

8月23日 中共中央发出《九七^①纪念大示威通告》,要求各级组织以全力领导这一运动。

8月28日 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决定,中共蓝田特支发动蓝田南区农民和红枪会举行暴动,消灭了驻军刘汉三。

8月下旬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在秋收斗争路线之下,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混战,组织各地政治示威,直到组织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士兵暴动等。根据省委通告精神,西安市委组织了行动委员会,发动了西安监狱小职员索薪、广仁医院罢工等斗争。后因广仁医院罢工失败,九七政治示威未实现。

夏 乘陇东民团军总司令谭世麟扩充势力之机,刘志丹、谢子长等在谭部挂名建军,组织了一支部队。

9月14日 中共陕西省委通过杜衡起草的《陕西省委政治任务决议案》。决议认为“陕西新的革命高潮的客观条件是完全成熟了”,党的战略总方针是坚决组织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士兵暴动,创建与发展红军,汇合各种势力的暴动,推翻军阀统治,建立陕西苏维埃政权。

9月24日 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央政治局6月11日的

^① 1901年9月7日,俄、英、美、日、德、法、意、澳、西、比、荷等11个帝国主义国家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因而将9月7日定为国耻纪念日。

决议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

10月初 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召开扩大会议,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高维翰(李杰夫)传达6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会议决定合并党、团、工会、农会等组织,成立行动委员会,书记赵伯平,军委书记孔祥祯,行动委员会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

10月8日 共青团陕西省委在西安组织飞行集会和游行示威,遭到国民党当局镇压,团省委书记薛永寿在南院门被捕。10日、11日,党、团陕西省委主要领导人吉国桢、贾拓夫、王作宾(王曙)、马志敬等20余人被捕,西安和各地党、团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

10月17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来函通知,中共陕西省委归北方局领导。

10月18日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北方局通知中共陕北特委归其领导,特委与陕西省委发生横的关系。

10月29日 中共中央向中共陕西省委发出指示信,对9月14日《陕西省委政治任务决议(草案)》提出批评,要求根据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纠正“左”倾错误。指出陕西党目前主要的任务是领导城市和乡村中自发的群众斗争,鼓动与争取公开的群众运动。

10月下旬 中共宁强县委建立,书记王述绩。

11月19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第七号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利用工会、农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组织游行示威,扩大纪念广州暴动与反军阀运动周的宣传鼓动。

11月 杜衡、王芾南、杨珊前往天津,出席中共中央北方局扩大会议。

同月 中共汉中地区第一次代表会议在南郑县龙岗寺召开,重建陕南特委,书记梁益堂。

同月 蒋、冯、阎大战在10月结束后冯玉祥军队退出陕西,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率部入陕。先后被捕在狱的党、团陕西省委负责人潘自力、刘继曾、蒲克敏、徐梦周、吉国桢、贾拓夫等30余人在中共组织的帮助下,砸毁镣铐,冲出牢狱。

12月中旬 中共中央北方局扩大会议结束后,北方局派高维翰(李杰夫)同杜衡回陕西工作。高、杜到陕后立即召开省委第三次全会,传达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及北方局扩大会议精神。会议通过年关斗争计划,并调整了省委成员分工:常委杜衡(书记兼党报编辑)、高维翰(军委书记)、吉国桢(组织)。

12月21日 中共河北省委发出通知,宣布中共中央北方局改为中共河北省委,辖顺直晋、陕、甘及河南北部党的组织,陕西省委改为陕西特委。陕北特委划归河北省委及中央驻北方代表共同领导。

同月 中共北方局特派员王芾南到陕北,向陕北党组织传达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北方局指示,撤销了行动委员会,恢复中共陕北特委。

1931年

1月初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恢复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刘映胜。

1月7日 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支持下,王明在中央取得领导地位,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冒险主义还“左”的错误观点。

1月17日 罗章龙、徐锡根、余飞等召集会议,反对六届四中全会,要求撤换共产国际代表。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指出全总党团会议领导人罗章龙等企图改变国际路线,分裂中央、分裂党,号召全党坚决反对。31日,在罗章龙等操纵下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非常委员会及其所属的全总党团、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处等到处散发文件,四处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1月中旬 杨珊由天津回到陕西,带回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的《紧急通知》(即中央九十六号通告)、《反立三路线讨论大纲》、《告全体同志书》。

1月29日 中共陕西省委在渭南辛市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会前,“中央非常委员会”派人到陕西游说,省委常委接受了他们的观点。会议通过了接受共产国际来信、反对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决议案,陕西工作决议案等。选举高维翰为参加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的代表。与会人员在对陕西革命形势的认识上发生分歧,杜衡、高维翰认为陕西的革命形势是高涨的;张文华、李艮认为是低落的或者是活跃的,同时反对省委参加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处。因张文华坚持己见,被取消委员职务,由黄平递补。派吉国桢到中央汇报,调张国藩代理常委。

1月下旬 中共安定县委在任家砭成立,书记马文瑞。

1月 中共米佳镇中心县委建立,书记马明方。

年初 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卫士营干训队中共支部建立,书记汪锋。在此前后,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第十七师中共军委会,书记孙作宾。不

久,根据十七师分驻汉中与凤翔两地的情况,省委决定在汉中设立十七师前方中共军事委员会(书记李慕愚)和凤翔后方军事委员会(书记孙作宾)。

2月13日 中共陕西省委向中央报告省委四次全会情况,同时要求中央直接领导陕西工作。

2月15日 中共陕西省委在12日收到中央机关刊物《实话》五、六、七期后,始看到六届四中全会部分决议案。遂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六届四中全会决议,认为“在国际路线之下召开的四中全会及其产生的新中央政治局是正确的”,省委四次全会建议共产国际远东局(东方部)成立新中央的决议是错误的。决定做出补充决议,接受四中全会决议。常委会的补充决议尚未发出,罗章龙领导的“非常委员会”与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处又送来文件且派人游说。省委看到这些文件后,又决定反对四中全会,同意参加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处。

2月 中共河北省委派交通杨璞,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处派白明善先后来到陕北,向陕北特委宣传各自的观点。中共陕北特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向下传达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处的观点。

同月 中共陕北特委派阎红彦、白锡林等去山西吕梁地区,参加晋西游击队的创建工作。

3月6日 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在讨论陕西革命形势时,再次发生争论,赞成李艮意见的居多数,杜衡认为李艮的观点是右倾机会主义,必须给以打击。为解决省委在中央和罗章龙领导的“非常委员会”之间的依从问题,会议决定派代表同双方接触以后再作决定。

3月中旬 互济会代表刘公亭来陕,带来了六届四中全会全部文件。中共陕西省委遂又认为四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召开的,成立的中央是正确的,决定召开省委第六次全会。

3月25日 李艮、张国藩、刘映胜联名书写了《目前陕西工作决议案》,坚决反对继续立三路线的陕西省委四次全会产生的《陕西工作决议案》。

3月26日 中共陕西省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在渭南辛市召开,认为中央四中全会及产生的政治局领导是正确的。会议撤销了杜衡的书记和张国藩的代理常委职务。选举高维翰任书记兼党报委员会主席,杜衡任常委兼组织、职运、党报编辑,焦维炽任秘书长负责西安市委工作。

3月30日 共青团陕西省委作出接受团中央政治决议与中共陕西省委

第六次全会决议案的决议。

3月 王芾南、赵伯平、常应黎(常黎夫)组成中共陕北特委代表团,赴北平向河北省委汇报、请示工作。

春 中共城固县委成立,书记郑月波。

4月8日 中共陕西省常委会通过《关于红五月的工作决议案》,要求各级党组织转变狭隘的秘密工作方法,深入群众,争取群众,加强党对群众政治、经济斗争的组织和领导。

5月9日 中共河北省委报告中央,同意陕西省委归中央领导,陕北特委仍由河北省委领导。

5月 共青团中央指示团陕西省委改为团西安市委,以加强对中心城市青年运动的领导,并派陈浅伦回陕参加团的领导工作。5月30日,团省委改为团西安市委,书记刘映胜。6月下旬陈浅伦接任书记。

7月初 赵伯平等由河北省委返回榆林,决定将中共陕北特委机关迁往米脂,特委成员分散居住;各地组织转入农村,隐蔽活动。

同月 中共中央巡视员刘少文来陕,带来中央5月24日给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信。中央来信对省委在四中全会和罗章龙右派组织之间犹豫动摇进行了批评,否定了省委四次全会决议。并指出张国藩、李良的观点是“右倾机会主义”,同这种思想的斗争是陕西党目前的中心任务。党的工作重心不是空谈革命高涨的程度,而是发动和领导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建立党的基础。

8月7日 中共陕西省委与共青团西安市委联合发出《对目前时局宣言》,要求全省党、团组织打击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工农兵把开发游击战争与一切群众斗争汇合起来,战胜敌人。

8月上旬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会议,根据中央5月24日来信和刘少文的报告,作出《接受中央来信与陕西党目前中心政治任务与中心工作》决议案,指出陕西革命运动发展形势是高涨的,目前中心工作是,抓住日益严重的灾荒,迅速组织农民斗争,开发游击战争。并重申同李良等“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目前的中心任务。会议改组了省委,书记兼组织杜衡,常委、军委书记高维翰,常委兼巡视员刘万海。

8月 中共洋县县委建立,书记杨杏生。

夏 国民党陕西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中共委员会成立,李秉荣、李特生、习仲勋先后任书记。

9月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秋收斗争决议案》，要求渭北和西路灾荒严重区域的党组织，积极领导农民、灾民开展以减租、减息、抗债为主要内容的秋收斗争，并将斗争引向开发游击战争与扩大苏维埃运动方面来。

9月上旬 拓克宽、阎红彦、吴岱峰、杨重远等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来到陕北。

9月2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宣传大纲》。

9月27日 按照中共陕西省委20日决议精神，西安六七万人召开反日救国大会，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并举行了示威游行。

9月下旬 在中共三原地方党组织领导下，三原武字区农民反日救国会成立。

9月 刘志丹在子午岭将分散活动在合水、庆阳山区的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3支武装汇集起来，在合水太白附近进行整编，建立起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史称南梁游击队）。全队300多人，编为3个大队，总指挥刘志丹。

秋末 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贾拓夫到汉中检查工作。中共陕南特委召开会议，推选贾拓夫为书记。

10月1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为双十节告陕西民众书》，谴责国民党政府投降卖国，镇压工农群众。

10月上旬 晋西游击队在安定县应保商队杨琪、杨鼎等人之邀，就两支部队联合行动问题进行协商。在保商队同意接受游击队领导；不抢穷人东西；不强奸妇女的三个条件后，两支部队一起行动。不日，师储杰领导的商贩武装也愿意接受游击队的约法三章，联合行动。随即晋西游击队改编为陕北游击支队，阎红彦任大队长，杨重远任政委，吴岱峰任副大队长。

10月3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告陕西民众书》，再次号召人民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

10月 刘志丹率领南梁游击队到宜君店头、双龙、建庄（今属黄陵）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民协会。

同月 中共南（郑）、褒（城）、勉（县）边区委员会（后称南褒西南区）成立，书记偶彦民。不久，区委决定建立南（郑）褒（城）西南区游击大队，大队长杜捷如，政委蔡伦。1935年2月改编为南郑独立团，红四方面军北上抗日时，独

立团随军北上。

同月 阎红彦、杨重远率领陕北游击支队到达南梁和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会师。11月,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到南梁向游击队传达省委关于整顿部队建立工农红军的指示。并成立了由书记谢子长,委员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林组成的中共队委会。

11月20日 中共中央来函指示中共陕西省委,要求抓紧目前群众斗争高涨的情绪,把群众的经济斗争与反帝、反国民党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加紧农民运动,使之逐步发展到游击战争、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的轨道。因省委常委刘万海不能胜任工作,省委决定让其回富平,调李良任常委兼巡视员。

12月2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根据9月22日中央决议所拟定的省委工作决议案,认为三原、富平、蒲城、西路几个区域农民武装斗争和陕西士兵兵变的条件已经成熟,党要集中力量领导这些地区的农民斗争,积极准备开发游击战争。

12月7日 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目前陕西党的中心工作的决议》,提出目前中心工作是加紧扩大苏维埃运动,领导反帝尤其是反日运动;集中力量领导三原、富平、蒲城、西路等地的农民斗争,积极准备开发游击战争;派得力干部到陕甘边境游击队中去;游击队要向三水(今旬邑)、淳化发展,和渭北农民斗争汇合,使苏维埃运动迅速发展。

12月中旬 中共陕西省委派荣子卿到陕甘边境巡视游击队,传达省委关于整顿部队的指示,并批评部队的行动是“单纯军事投机”,“与其他土匪混合”,要求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

1932年

1月初 陕北游击支队和南梁游击队在甘肃正宁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参谋长杨重远。

1月20日 中共陕西省委向陕甘边境游击队发出指示信,要求部队坚决执行游击战争的任务,游击区域以三水、淳化、富平、三原、长武为主要方向,和这一带的农民斗争相结合;发动群众,扩大苏维埃影响;加强自身教育,健全党组织,改变游击队成分,树立铁的纪律。

1月 中共延川县委成立,书记曹必明。

2月12日 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政委高维翰,参谋长杨重远。下辖步兵大队两个,警卫队、骑兵队各1个,共400多人。同时建立了中共队委会,书记高维翰。

2月15日 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旬邑杨坡头设伏,击溃国民党驻张洪镇警卫团三营与旬邑县民团,缴枪150余枝。

2月中旬 中共陕西省委渭北巡视员焦维炽和从北平回陕的黄子文在三原武字区长坳堡举办党员训练班。

2月20日 谢子长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乘耀县照金街道办社火之际,将当地民团包围缴械。

2月28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为拥护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告工农及一切劳苦民众书》。

2月下旬 中共南(郑)城(固)褒(城)边区委员会成立,书记亢学诗。

2月 中共陕西省委任命陈浅伦为陕南特委书记。团西安市委书记由刘映胜接任。

3月初 中共陕西省委派高维翰去渭北巡视,由李艮接任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书记职务。李艮未到职,省委复派省委书记杜衡前往。根据杜衡的巡视报告,省委于6日、7日分别作出《陕西省委关于红军陕甘游击队决议》、《关于游击队新胜利与冲破敌人“围剿”的主要策略决议》,要求游击队加紧两条路线斗争,执行省委指示,向三原、富平、耀县以至西路游击,积极开发游击区域,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苏区。

3月8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布《陕西游击战争的行动纲领》,指出游击战争的任务是扩大红军和苏维埃影响,摧毁豪绅在乡村的一切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部分苏维埃政权。游击队要努力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加强政治教育,实行铁的纪律。

3月13日 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成立,队长刘善忠,政委高朗亭。4月18日,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

3月2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会议,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正式红军,并向中央申请番号。并指示游击队迅速向三原发展,以配合武装农民和城市的革命,夺取陕西渭北的政治、经济中心——三原,建立政权,然后进攻泾阳、咸阳,截断渭河交通。

同日 红军陕甘游击队开抵甘肃庆阳寺村原,将当地农民自发组织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下旬在寺村原建立革命委员会。4月中旬游击队撤走后,革命委员会随之解体。

3月 泾阳游击队建立,队长苗家祥。

4月2日 在中共陕西省委军委成员刘林圃领导下,习仲勋、吕剑人、李特生、许天杰等发动杨虎城部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三个连在甘肃两当起义。起义部队北上途中被国民党军队打散,吕剑人、许天杰到西安找省委联系时被捕。

4月18日 陕甘游击队在旬邑党组织的配合下,攻克了旬邑县城,迫使国民党旬邑县政府迁往张洪镇。

4月20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同意中共陕西省委创建红军的意见,规定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一师,由省委一名常委任军政委。要求各地在开展游击运动中,创立新的红军及陕甘边苏区。并指出夺取大城市,截断渭河交通还不是目前陕西红军与游击队所能胜任的,应将游击队活动的正宁、旬邑、耀县等地发展为根据地,然后再向泾、渭扩大。

4月中旬 杜衡及刘志丹、黄子文来到红军游击队驻地旬邑县马家堡。杜衡撤销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将部队改编为三、五两个支队,刘志丹、阎红彦分任队长。

4月21日 阎红彦率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到达三原武字区,配合农民攻打马额镇王茂臣民团。

同日 刘志丹率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一部攻打永寿县城监军镇,歼敌20余人。3日,三支队袭击永寿常宁镇,缴枪50余枝。

4月下旬 三原武字区游击大队成立,大队长孙铭章。

5月5日 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焦维炽到甘肃靖远策动国民党警备第三旅起义,因当局已有防备,起义联络失误而失败。月底,谢子长与该旅地下党负责人张东皎集合起义失散士兵200多人,在靖远水泉堡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一、二、三支队,总指挥谢子长,政委焦维炽。7月,游击队与“追剿”之敌多次激战,终因力量悬殊而分散隐蔽。

5月上旬 国民党派军队分东、西两路“围剿”陕甘游击队。10日红军三、五支队在旬邑清水原集结,为统一指挥,省委决定恢复陕甘游击队总指挥

部,总指挥刘志丹,政委高维翰。

5月20日 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司令员刘善忠被混进先锋队的内奸董风清枪杀。

5月底 陕甘游击队转战甘泉临真镇,由于高岗临阵退却,战斗失利,游击队遂转移到韩城一带。

5月 在共产党员李志安、任志豪等组织宣传下,白水县万名农民拥向县城,向国民党白水县政府“交农”。迫使县长石铭绩豁免1930年到1932年底的欠粮欠款。

同月 中共安康特委成立,书记李茂堂。翌年,中共陕西省委撤销安康特委,党组织归陕南特委领导。

6月1日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中共陕西省委做出《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工作的决议》,提出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红军和陕甘边根据地的三大任务。

6月10日 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六省会议,杜衡代表陕西出席。20日,会议作出《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提出北方党的基本任务是“创造巩固与发展陕甘新苏区”。

6月12日 陕甘游击队在韩城作战失利,退回陕甘边境一带。

6月18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党委会议,通过了省委工作检查与两条战线斗争决议草案。决议认为群众运动急剧高涨,省委领导跟不上形势,工作中存在右倾机会主义。提出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改造陕西全党,改造省委。并要求中央派人来领导工作。

6月底 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宁县梁掌堡召开会议,推选阎红彦为总指挥。会将原三、五支队改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

6月 在中共韩城县委和陕甘游击队的领导与帮助下,韩城赤卫队建立,队长徐岱云,政委高德辉。

上半年 国民党甘肃警备第三旅二团中共委员会建立,书记张东皎。

7月9日 共产党员杨林、高鹏飞等在甘肃西华池领导国民党甘肃警备第三旅特务营170多人举行起义。

7月23日 中共陕西省委派李艮为陕甘游击队政委。李艮不顾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和阎红彦等人的反对,限定部队在20天内完成在甘肃正宁五顷原等地建立政权和分配土地的任务。当游击队被迫转入反“围剿”时,李艮又

命令死守五顷原,导致三嘉原、王浪坡、五顷原三战皆败。李艮回西安汇报情况,受到省委严厉批评。但省委仍认为陕甘游击队是右倾机会主义领导,撤销了阎红彦总指挥职务。8月30日复派谢子长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

7月 中共三原县委重建,书记金理科。

同月 杨虎城部十七师五十旅补充二团一营官兵,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影响,在甘肃隴口起义。后被青海土匪背锅司令指挥的骑兵打散。

8月1日 中共中央向中共陕西省委发出指示信,要求开展两条战线斗争,特别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执行中央北方会议精神,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立即成立红军一个团,并派孟坚(曹长青、孟用潜)任省委书记,常委李艮、王松年;杜衡负责陕甘游击队,任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同时指示省委重视甘肃党的工作,负责建立甘肃省委;组织领导兵变,配合农民斗争,建立陕甘边苏区。

同日 渭北游击队在武字区成立,队长马志舟,政委金天华。

8月初 根据中共中央、团中央的指示,团西安市委改为团陕西省委,书记刘映胜。同时组建了新的团西安市委,书记李继善。

8月6日 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焦维炽(赵仪三)领导蒲城党、团组织在晋王、永丰两地区发动民团举行起义,因没有群众斗争配合而失败,焦维炽牺牲。

8月16日 中共陕西省委做出决议,批评高维翰在陕甘游击队犯有右倾机会主义和上山逃避主义错误,决定撤销其常委、军委书记职务,调往渭北工作。

8月25日 孟坚到陕后立即召开省委会议,传达北方会议精神和八一指示信。会议做出《陕西省委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决议要求开展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反对富农路线,特别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立即编成红军一个团。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边特委,并派干部去陕南开展工作,配合陕南农民斗争,建立川陕边苏区。

8月26日 中共陕西省委做出《关于九一八工作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抓住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并吞东三省的事实,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之际,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反日运动,扩大各界反日救国会,成立反帝大同盟。

8月 中共耀县县委建立,书记张仲良。

同月 武字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主席黄子祥。

9月5日 中共陕西省委刊物《斗争与学习》创刊。

9月8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九一八周年宣言》，提出以民族革命战争回击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侵略战争。

9月12日 红军陕甘游击队袭击耀县照金，击毙富平、同官（今铜川市印台区、王益区）、耀县3县民团总指挥党谢芳，毙、伤400余人。

9月18日 井岳秀部八十六师炮兵营工兵连中共地下党员张怀树、何格兰、杨德厚等六人准备举行暴动，因叛徒出卖，张怀树等三人被捕，被秘密杀害于榆林东山。

9月中旬 中共陕西省委向中央报告陕甘边反“围剿”计划。要求陕甘游击队和地方游击队密切配合，开展游击战争，集中力量击溃敌人一部，以粉碎“围剿”。

9月中旬 习仲勋将率领的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特务队在三原武字区改编为武字区游击队，队长程国玺，政治指导员习仲勋。

9月22日 渭北革命委员会（即原、富、耀革命委员会）在三原武字区成立，主席黄子文，党团书记李冲霄。革委会下设土地、军事、财政等部。革委会先后由中共陕西省委、渭北特委、三原中心县委领导。

秋 红军陕甘游击队派习仲勋、李妙斋等到耀县照金一带发动群众，开辟地方工作。

10月1日 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队长高朗亭，政委艾龙飞。翌年4月又改为第一支队，队长强世卿，政委李成荣。

10月4日 中共陕西省委向中共三原县委发出指示，批评三原县委存在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示改组县委；创建原、富、耀新苏区；武装农民，扩大游击运动。

10月6日 中共陕西省委做出《开展游击运动创建渭北新苏区的决议》，指出创建渭北新苏区是渭北党组织目前最中心、最迫切的战斗任务。决定建立中共渭北特委，书记高维翰。特委下辖三原、富平、蒲城、耀县、白水等地党组织。机关驻地三原县武字区。

10月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纪念活动的决议》，要求在陕甘边和原、富、耀游击区域动员群众举行纪念活动和示威游行。

同日 中共中央向中共陕西省委发出指示信，要求在十月革命节举行发展党员活动。

同日 中共陕南特委书记陈浅伦等到西乡私渡河筹划夺取国民党驻军武器,不慎被国民党驻军包围,刘传璧等人牺牲。

10月10日 中共渭北特委、渭北革委会决定在武字区南原分配土地。

10月25日 中共陕西省委做出《关于组织革命兵变开展甘肃陇东游击战争的决议》,要求把兵变与游击战争结合起来,武装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创建新苏区。为统一指挥陇东、陇南国民党部队内的党组织,决定成立陇东军特委,书记刘杰三。

10月26日 中共渭北特委和三原县委召开联席会议,要求各支部加强对土地分配工作的领导。

10月下旬 在中共陇东军特委领导下,西安绥靖公署甘肃行署干部补习队在接运蒋介石给邓宝珊的一批枪支时,在甘肃蒿店举行兵变,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队长李华锋,政委李良,后因计划不周遭民团袭击而失败。

10月 中共旬邑县委建立,书记焦思洲。

11月6日至8日 渭北革命委员会举行庆祝俄国十月革命节活动,2000余群众参加了游行。9日,国民党三原、泾阳、富平、淳化等六县民团和三原庄里等国民党驻军“围剿”武字区。国民党军进占武字区后,连续进行大搜捕,渭北特委和革委会领导被迫转移,游击队解体。

11月8日 红四方面军挺进陕西,27日,进占长安子午镇,直逼西安。

11月上旬 中共富平党组织为配合渭北根据地庆祝俄国十月革命节活动,发动农民包围县城,向政府“交农”罢耕,要求减免苛捐杂税。

11月2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欢迎红四方面军来陕宣言。

同日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在国民党军队“围剿”下,被迫退出湘鄂西根据地,在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红三军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带领下,由河南卢氏进入陕西丹凤蔡家店一带。

11月下旬 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贾拓夫到渭北巡视,撤销了渭北特委书记高维翰的职务,任命金理科为特委书记。12月中旬,省委取消渭北特委,成立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刘林生。中心县委下辖耀县、富平两个县委和三原、高陵、白水等6个区委。随即重新组建了渭北游击队。

11月 中共陕西省委派吴鸿宾、王建三到兰州,向孙作宾、常黎夫、马豫章、李慕愚等传达省委决定建立甘宁青特委的指示。12月初,中共甘宁青特

委成立,书记吴鸿宾。

同月 因中共陕西省常委王松年回家,省委常委调整为:孟坚(书记)、贾拓夫(宣传)、刘映胜(组织)。

12月1日 中共陕西省委向中央报告,在红四方面军的胜利进攻下,省委决定在西安组织总同盟罢工;在农村加强对抗捐、抗税的领导,开展游击运动;积极扩大红军,立即编成一个团,一月内扩大为一个师;派高维翰去东路巡视,开展潼关、华阴工作;孟芳洲为特派员(后任陕南特委书记)和杨珊去陕南,领导陕南党的工作。

12月2日 红三军进入旬阳县,处决了“罚款局”局长袁开洪。4日进抵安康县艾家河,镇压了催粮委员杨希元。12日,红三军进入湖北。

12月3日 红四方面军从周至辛口子入秦岭向汉中地区进发。9日到达城固小河镇,同中共城固县委取得联系。

12月10日 红四方面军到达城固升仙村、许家庙一带。徐向前听取了中共陕南特委和城固县委负责人的汇报,决定拨给地方长枪120枝,并派官兵10人帮助建立游击队。

12月11日 中共陕南特委在红四方面军的帮助下,于城固升仙村成立了陕南第一游击大队,大队长张仁俊,政委王燮。全队120人,活动于城固、留坝、南郑、洋县边境一带。

12月18日 中共陕西省委任命的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到达陕甘游击队驻地耀县衣食村。22日在宜君杨家店子(今属旬邑)召开党员会议,传达中共陕西省委改编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的决定。会上杜衡错误地指责刘志丹、谢子长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错误地对谢子长、阎红彦、刘志丹、杨重远四人执行党的纪律,开除出部队。给谢子长留党察看三个月,阎红彦严重警告处分,并到中央受训。后由于谢子长、王世泰等广大干部、战士的要求和考虑到军事技术问题才将刘志丹、杨重远留在部队。24日,在宜君转角镇(今属旬邑)举行授旗仪式,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组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军政委兼团政委杜衡,团长王世泰,参谋长郑毅,政治处长刘志丹,参谋处长杨重远,经理处长刘约三,管理处长杨琪,青年团书记史克寿。红二团辖骑兵连、步兵连和少年先锋队。

12月2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陕西省委关于红四方面军对陕西新进攻中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的紧急任务》决议案,提出拥护红军,反

对“围剿”，创造西北新苏区的紧急任务。

12月23日 中共陕南特委在红四方面军的帮助下，改编了几股民团和“神团”^①，在西乡宣布成立川陕边区游击队，任命神团头子张正万为司令，陈浅伦任政委。

12月 中共华阴临时县委建立，书记冯光波。

同月 红四方面军第十师开辟了镇巴苏区。1933年秋，先后建立了陕南县游击大队等19支游击队和18支赤卫队。

年底 杨虎城派武志平(中共党员，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少校参谋)与红四方面军联系谋和。翌年3月，上海中央政治保卫局指示武志平，要求设法建议杨虎城不要与红四方面军正面冲突，利用蒋、杨矛盾，争取杂牌部队保守中立。

1933年

1月3日 中共陕西省委向三原中心县委发出指示，要求健全革委会组织，实行土地革命，发展武装组织，肃清反动势力残余，扩大游击运动，为开创渭北新苏区而斗争。

1月4日 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杜衡扩大红军，建立支部，巩固红二十六军。

1月上旬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在耀县香山寺开仓分粮，救济饥民。不日，红二团向西发展，消灭了照金和旬邑民团一部。此时红二团组建了步兵二连，并组建了香山、芋园、旬邑、宜君五支游击队。

1月15日 杜衡向省委报告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进攻庙湾夏老么(夏玉山)民团受挫，骑兵连长曹世荣牺牲，指导员张秀山负伤的战况。战后杜衡撤掉郑毅参谋长职务，在广大指战员要求下，任命刘志丹为参谋长。

1月16日 中共陕南特委在汉中召开军事工作会议，做出《扩大西乡城固边新苏区创造红二十九军的决议》。

1月中旬 中共陕南特委将川陕边区游击队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游击大队。

1月中旬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决定，将泾阳游击队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苗家祥。21日渭北游击队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

^① 神团，为中国封建社会农村中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武装团体。

1月27日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骑兵连在宜君衣食村(今属耀县)遭夏玉山民团偷袭,马匹损失近半。

1月下旬 红四方面军总部任命陈浅伦为红二十九军军长。

1月 红二团成立随营学校,校长高维翰,政委汪锋。

年初 中共陕北特委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绥德中心区委,负责人崔田民。11月改为绥清县委,书记崔文运。

2月3日 中共陕西省委向红二十六军发出指示信,指出红二十六军目前还不能与敌人作对垒战,主要应采取游击战术。在保存红二十六军番号的情况下,不要强“撑架子”,将部队可以编成几个小游击队,开展游击运动,以巩固和扩大红二十六军。杜衡接到信后,立即召集红二十六军连以上干部会议,表示反对省委来信。认为这是取消红二十六军,违背北方会议路线。会后杜衡以部队代表身份回到省委,向省委提出反对意见,提议改组省委。3月,省委承认2月3日指示信犯了取消主义错误。将省委改组为书记袁岳栋,组织杜衡,宣传孟坚,由王烈(汪锋)代理红二十六军政委。

2月5日 中共陕西省委向陕南特委发出指示信,要求特委将党所有的力量用到发展红二十九军的工作上;红二十九军本身必须用最大的努力改造“神团”成分,克服农民的一切落后意识和群众中的封建迷信观念。

2月7日 中共川陕省委建立,书记袁克服。中旬召开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主席熊国炳。到1935年2月川陕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了近30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管辖区域东起川北城口,西抵嘉陵江畔,南起川北营山、渠县,北至陕南镇巴、西乡、南郑、宁强、勉县,总面积达42000多平方公里。

2月13日 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和红四方面军的指示,陈浅伦、李艮等在西乡私渡河召开军政会议,决定正式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军长陈浅伦,政委李艮。军部驻扎马儿岩,下设两个团,一个教导大队。

2月14日 中共旬邑县委召集5000余农民,在旬邑张洪镇举行“交农”围城斗争,迫使国民党县政府答应群众减免粮款、清查账目的要求。

2月中旬 耀县照金妇女游击队在北梁建立。

2月 中共澄城县委(书记张新发)、勉县县委(书记殷锐)建立。翌年5月,澄城县委改为中心县委,领导大荔、合阳、澄城三县党的工作。

同月 在中共淳化党组织的领导下,白庙村农民举行暴动,组建了游击队。

同月 李妙斋率游击队进驻耀县照金薛家寨,整修崖洞,据险筑堡。并在此设立了红军医院、修械所、被服厂、仓库等。

3月1日 中共陕西省委向陕南特委发出指示信,指出党只有在领导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开展游击运动,才能创建新苏区,同时撤销孟芳洲特委书记职务,由杨珊接任。

3月7日 中共陕西省委向红二十六军发出指示信,要求成立统一指挥部,领导边区和耀县、宜君一带的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并强调2月3日省委指示是正确的。中旬,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总指挥李妙斋(后由黄子文、吴岱峰接任),政治委员习仲勋(后由张秀山接任),参谋长史进财。

3月8日 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特委军事委员会在耀县照金土儿坪成立。特委书记金理科,军委书记习仲勋。特委下辖旬邑、耀县两个县委及一些地方党组织。6月,金理科调回省委,秦舞山接任书记。

3月上旬 红二十九军在西乡召开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决定纯洁内部,整顿组织;选拔优秀战士去川陕苏区受训;大力开展农运和兵运工作。3月中旬,红二十九军派刘瑞龙率50名红军战士去川陕苏区培训。

3月15日 中共陕西省委向红二十六军发出指示信,指出其中心任务是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扩大红军。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李平(后为黄子祥),政委金天华(后为张培述、刘映胜、张秀山),参谋长李天赦。

3月中旬 中共陕南特委决定正式建立西乡、城固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孟芳洲。同时建立了中共西乡城固边区委员会,书记王榜。在边区政府领导下,苏区人民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

3月26日 中共陕西省委向渭北游击队发出指示信,号召征调人员为红二十六军扩充一个师。

同月 上海中央局派孔原到天津主持北方地区工作,中共陕北特委归其领导。

同月 中共南郑县委建立,书记张书行。

4月1日 中共陕南特委和红二十九军领导干部40余人在西乡马儿岩开会,突遭率部叛变的原神团头子张正万包围,陈浅伦、李良、孟芳洲、程子文、杜润滋等人被残杀。

4月5日 陕甘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耀县照金土儿坪召开,宣布

成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主席周冬至,副主席习仲勋。至此,形成了以薛家寨为中心,横跨耀县、淳化、旬邑等县边界的陕甘边根据地,面积2000平方公里。先后建立了照金、金盆、韩家山、芋园、香山、七界石、老爷岭、桃渠河等区、乡、村革命委员会。

4月8日 红二十九军第二游击大队在城固建立,大队长杨维三,政委王燮。

4月上旬 红四方面军任命刘瑞龙为红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刘瑞龙带领在苏区培训的50名战士和40名红军指战员返回西乡,途中得知发生了马儿岩事变,立即赶往马儿岩,召集红二十九军失散人员200多名,在西乡等地转战月余后进入川陕苏区,编入红四方面军。

4月15日 中共陕西省委改组后,各地党组织对杜衡留省委有意见,同时孟坚一再要求离开陕西。因此,省委成员再次调整为:常委袁岳栋(书记)、李世英(军委书记)。杜衡回红二十六军工作。团省委书记由李盛弟、刘宗沛相继接任。

4月中旬 红二十六军二团袭击彬县龙高镇,全歼守城民团。

4月27日 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一大队配合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歼灭侯家堡国民党军队骑兵团一个排。

4月下旬 国民党陕西当局调集四个团的部队及旬邑、淳化等县民团进攻照金根据地。边区党、政、军召开联席会议,决定避实就虚,迂回敌后,粉碎“围剿”。

4月 中共陕南特委、军委在南郑中梁山召开紧急联席会议,总结马儿岩事变的教训,决定在城(固)南(郑)洋(县)褒(城)边区红二十九军第二游击大队的基础上组建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5月下旬,第三游击大队成立,大队长杨维三,政委张明远。

同月 中共旬邑县委将戚清振领导的灾民武装改编为红军游击队,队长戚清振,指导员吴润林。

同月 中共渭华县委建立,书记赵应魁(1934年被捕叛变)。

同月 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对所属游击队进行整顿,重新组建了一、三、五、七、九、十一支队和妇女游击队。

春 中共临潼县委建立,书记刘钧一。

5月初 中共安康军特支成立,书记梁步鲁。9月1日王辛德接任书记。

5月10日 强世卿、李成荣率陕北红一支队南下与红二十六军汇合,得到

刘志丹的支持和帮助,同时调李成荣去西安工作,派杨重远任红一支队政委。

5月13日 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派武志平为代表,持致红军绶书、地图等去川陕苏区,与红四方面军进行和谈。武志平向红四方面军领导汇报了上海中央政治保卫局的指示及杨虎城的情况。6月1日至24日,国民党三十八军与红四方面军双方分别在汉中康家花园和建设巷两地谈判五次。6月24日晚,孙蔚如代表三十八军,徐以新代表红四方面军进行会谈,双方达成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协议。7月1日,武志平护送徐以新及一批物资回川陕根据地。在谈判前后,汉中地下党与川陕苏区建立了秘密交通线。

5月29日 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在安定潭家峪遭国民党张建南部两个连包围,突围中杨重远中弹牺牲。

同月 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秘书程建文被捕叛变。不久省委交通处与妇委机关四人被捕,其中晓岚叛变。

6月中旬 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团党委在照金召开联席会议,杜衡否定了刘志丹等人以桥山山脉中段为依托,发展陕甘边根据地的正确意见,坚持红二团南下创建渭华蓝洛(即渭南、华县、蓝田、洛南)根据地。21日,红二团南下。陕西省委获悉后,立即派人到三原阻拦未及。29日,红二团渡过渭河,进入蓝田、商洛山区,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损失惨重。杜衡在南下途中借口向省委汇报回到西安,由汪锋代理政委。

6月22日 红二十九军第十大队在洋县建立,大队长何儒,政委朱曼青。

6月 中共洋县县委在铁冶河成立了城(固)、洋(县)、佛(坪)边区游击队,队长叶顺香,党代表席中瑶。

7月上旬 中共西路临时特委在千阳县城内建立,书记李特生。

7月中旬 党、团陕西省委决定7月为全省党、团冲锋月。

7月21日 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驻耀县杨虎城部骑兵团团长王泰吉率部起义,宣布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王泰吉,政治部主任刘映胜。

7月22日 在中共耀县县委书记张邦英及张仲良等领导下建立了耀县游击队,队长陈学鼎,副队长张仲良,党代表张邦英。

7月23日 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高起家鞏召开扩大会议,提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开辟安定、绥清(绥德、清涧)、神(木)府(谷)三块游击区;扩大和建立游击一、二、三支队,创建革命根据地;恢复县、区党、团组织;在条件成熟和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内建立工农民主政府。选举崔田夫为特委书记,鲁学曾为

团特委书记。

7月24日 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渭北游击第一大队在三原武字区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

7月28日 袁岳栋、贾拓夫、高岗、杜衡在西安东大街骡马市福盛楼饭馆开会,研究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行动计划时被国民党特务盯梢,贾拓夫、高岗脱险,杜衡、袁岳栋被捕后叛变。袁、杜两人带领特务到处捕人,关中、陕南、甘肃等地党组织多遭破坏。

同日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在三原心字区辘轳把与杨虎城部孙友仁特务团遭遇,战斗失利。在红四团接应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撤到照金根据地。

7月30日 红二十六军四团在三原、富平交界全歼张德润民团,生俘张德润。

同日 因叛徒告密,共产党员毕维周、王兆卿、崔明道、高庆恩、王守义等六人在榆林镇川堡被国民党逮捕。8月3日,在米脂十里铺无定河畔遇害。

8月5日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在清涧王家山成立,队长罗永宽,政委高朗亭。

8月9日 强世卿率陕北红一支队3个分队70余人再次南下陕甘边苏区。

8月上旬 贾拓夫在西安召集党、团活动分子会议,要求做好应付国民党特务破坏的准备。并决定贾拓夫、刘宗沛到上海向上海中央局汇报;高岗到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红二十六军工作;三原等县工作由刘映胜代表省委就近领导;并由张新发、省委组织部干事和西安市委负责人三人组成省委工作委员会,处理一些重大问题。15日,贾拓夫、刘宗沛去上海中央局汇报工作。

8月14日 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把红四团、耀县游击队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组成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王泰吉,政委高岗。中共陕西省委遭破坏后,陕甘边特委独立担负领导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的工作。1934年春,陕甘边特委由中央驻北方代表直接领导。

8月下旬 刘映胜回到西安,与张新发、樊德音、李冲霄等成立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书记刘映胜,组织李冲霄,宣传张新发,青年团雷振东,秘书樊德音。由杨文谟组织建立西安市委。

8月底 共青团陕西临时省委成立,书记雷振东。9月中旬,团临时省委和各地组织相继遭到国民党破坏。1934年3月,在孙作宾主持下召开党、团

活动分子会议,决定不再恢复建立团的组织,由中共西安中心市委组织委员严克伦兼管青年工作。

同月 在中共陕北特委委员张达志领导下,贺生荣、尤良、刘聋子等人指挥清涧数千名农民扛着农具包围县城,迫使县政府答应围城群众提出的条件,斗争取得胜利。

同月 国民党调集六个团以上的兵力对渭北根据地的中心武字区、心字区进行“围剿”,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干部和群众四五百人被捕。中共三原县委遭破坏,书记赵伯平被叛徒出卖入狱。红四团撤离武字区北上照金,渭北根据地被国民党军队强占。

同月 中共陕西省委派黄子文到渭华一带寻找红二团失散人员,在渭华党组织的帮助下,将刘志丹、王世泰等人隐蔽在华县箭峪口,渭南桥南、赤水、龙背、辛市等地。一月后帮助其返回照金。

9月上旬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派汪锋到陕南任陕南特委书记,高维翰、王筠、陈子敬分别到陕东、韩城、蒲城工作。

9月中旬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在西安开会时,被内奸王治国夫妇出卖,刘映胜、李冲霄、樊德音、雷振东等被捕(张新发在此之前已被捕)。下旬,原省委交通陈子敬和干部咎玉祥、党员胡明伦等酝酿成立党、团机关,活动约半个月,被叛徒出卖,胡明伦等三人被捕。陈子敬和中央交通李自靖去上海向中央局汇报工作。

9月下旬 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调一个步兵团及一个炮兵营,并纠集耀县、淳化、宜君、旬邑、同官县民团,乘红军主力外线作战之机,对照金根据地发动进攻。21日,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在保卫薛家寨战斗中牺牲。

9月底 参与原陕西省委军委工作的孙作宾联络原省委发行部长余海丰和从红二十六军回西安的崔廷儒(崔景岳)及在杨虎城部从事兵运工作的胡振家等建立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书记余海丰,组织孙作宾,宣传咎玉祥,军事胡振家,秘书长崔廷儒。为了保护党的组织,打击叛徒特务,临时省委组建了由赵成璧、李鼎九、杨嘉瑞等负责的特工队,活动于西安、临潼、周至、兴平等地区。

9月底 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率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三支队及强世卿领导的陕北游击队一支队,智取旬邑县城张洪镇,镇压了县民团团总。10月,又攻克甘肃合水县城,歼国民党军队及地方民团200多人。

9月 红军陕甘边游击队临时总指挥部第二十支队在淳化中嘴成立,队长吴春荣,指导员梁德全。

同月 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民运科派干部在镇巴县平乐坝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成立陕南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康洪礼。下辖17个乡苏维埃政府。

秋 中共上海中央局派谢华到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开展兵运工作,不久建立了中共宪兵营委员会,书记谢华,隶属上海中央局。

10月初 中华苏维埃南(郑)城(固)褒(城)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主席张书行。并改编第三游击大队为红二十九军独立第三团,团长杨维三,政委陈文华。

10月18日 神府特务队在神木南乡尚家孤正式成立。队长李成兰,政委王兆相。11月7日,特务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队长王兆相,政委马万里。

10月中旬 杨虎城十七路军孙友仁部,持续几天向陕甘边根据地薛家寨发动进攻,边区军民奋勇抗击,据险固守。后由于叛徒陈克敏带路偷袭,薛家寨失守。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率部队分路突围,辗转北上,到南梁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10月下旬 共青团中央派韩学亚到陕西。韩到陕西后与魏光波、高维翰、王好勤、秦舞山、刘庚等接上关系,进行组织活动。

10月 中共大(荔)、朝(邑)、澄(城)三县工作委员会建立,樊振恒负责。翌年2月,国民党当局在东府进行大搜捕,樊振恒转移陕北,工委停止活动。

11月上旬 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包家寨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撤销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先建立四十二师;开辟以庆阳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三个游击区,成立一、二、三路游击指挥部。7日,红四十二师在葫芦河地区的莲花寺成立,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四十二师下辖红三团(由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三支队、少年先锋队合编而成),团长王世泰;红四团改编为骑兵团,团长黄子祥。不久成立了中共红四十二师党委,书记张秀山。

包家寨会后,陕甘边特委书记秦舞山赴西安寻找省委关系,特委其他成员分散在部队,特委工作实际上由红四十二师党委代行。

11月18日 韩学亚、魏光波、秦舞山等在渭南三张背坡村开会,建立陕

西党、团恢复工作委员会，书记韩学亚、组织魏光波、武装秦舞山。会议决定各县工作仍由原县委负责，并派魏光波去上海同上海中央局联系。在此期间，临时省委与党、团恢复工作委员会并存。

11月下旬 保安(今志丹)游击队建立，队长刘约三，指导员王英。

11月 中共赤安县委在保安成立，书记任秀明。

12月11日 中央驻北方代表派李华生在北平召开陕北问题座谈会，要求陕北特委发动群众，进行抗粮、抗税斗争；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并错误地批评陕北特委犯有富农路线的错误。决定派谢子长、郭洪涛、李铁轮到陕北特委工作。之前，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政治特派员杨璞已到陕北。

12月25日 中共陕南特委在勉县黄沙建立了红二十九军第四游击大队，大队长王卓玉，政委金大康。

12月30日 中共陕北特委派郭洪涛、马佩勋在吴堡樊家圪坨组建了抗日义勇队，队长薛俊山、政委马佩勋。翌年2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四支队。

12月 中共上海中央局派特派员刘顺元来陕西工作。因省委遭到破坏，刘顺元到汉中与汪锋、张德生取得联系，建立中共陕西特委(亦称陕南特委)，直属上海中央局领导。刘顺元任特委书记，汪锋负责军事工作。

1934年

1月5日 韩学亚、孙作宾、高维翰等在西安开会，商量建立陕西党的统一组织。25日，韩学亚得悉特务追捕，即离开陕西前往上海，统一组织工作未果。

1月初 王泰吉经红四十二师党委同意，去豫陕边开展兵运工作，行至淳化县通润镇时被国民党逮捕，后在西安遇害。刘志丹继任红四十二师师长。

1月22日 谢子长到安定(今子长县)西区，着手恢复红一支队。3月8日一支队恢复，队长李胜堂，政委刘子清。

1月下旬 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合水县连家砭召开会议，撤销高岗师政委职务，由杨森接任。

1月底 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南翠村召开联席会议，传达北方代表对陕北特委的错误批评。会议决定按照高起家翠会议精神，加强一支队，发展二、三支队，新建四、五支队，开辟新的根据地。

1月 中共陕南特委将红二十九军独立第三团和第四游击大队整编为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一说仍称三、四两个大队),大队长杨维三,政委金大康。

同月 中共川陕省委派干部到镇巴县苏区召开党代会,建立了中共陕南县委,书记马金芳。1935年2月,马金芳将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游击队100余人组成陕南县工作队,随红军主力长征。

同月 第二路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南梁成立,总指挥杨琪,政委高岗。

同月 中共佳县县委成立,书记高钧耀。

同月 中共绥清县委建立,书记崔文运。

2月初 中共陕南特委指示红二十九军第三、四游击大队向川陕苏区转移,靠拢红四方面军。2月6日,三大队在勉县元墩子与民团遭遇,激战一天,除少数战士在政委杨国光率领下突围外,30多人被俘。后,驻勉县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警卫团团长张汉民(共产党员)得知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受挫后,命共产党员史唯然率一个加强排,以民团隐匿士兵为口实,击毙了民团团长张化志,解救了被俘的游击队战士。

2月14日 红二十九军第七游击大队在洋县南区建立,大队长翟日融,政委张景仁。

2月16日 韩学亚到上海后,同魏光波向上海中央局写了陕西党组织情况的报告。不久,中央又派韩学亚来陕,着其与孙作宾、刘顺元等联系。韩回陕后,慑于白色恐怖,没有开展工作。党、团工作恢复委员会停止活动。

2月22日 在中共安康特支领导下,安康区绥靖军士兵60多人举行起义,成立红三十军第一纵队,纵队长袁作舟,政委王辛德,游击指挥王泰诚。不久,起义部队遭国民党军队堵截而失败,王泰诚、王辛德等牺牲。

2月25日 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小河沟召开群众大会,宣布重新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

2月 国民党陕甘军阀调集八个团的兵力向陕甘边区根据地发动“围剿”,红四十二师转入外线作战,相继取得姚曲、石板、五里镇、店头战斗的胜利。接着挥师北上,攻打吴起(今吴旗)蔺家砭、崖窑,消灭张廷芝部一个连;在庆阳元城活捉国民党第四自治区区长高明山;在赵梁子消灭谭世麟部一个骑兵连。5月24日,红四十二师抓住有利时机,在合水西华池消灭国民党杨子恒部王子义团两个营及一个机枪连600余人,取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同月 第三路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总指挥张明吾,政委黄子文。

同月 中共赤淳工委建立,书记金理科。

3月16日 中共神木县委在神木南乡成立,书记贾怀光。

3月21日 陕北游击队第二、四支队夜袭清涧店则沟李成善民团获胜。

4月上旬 魏光波由上海回到陕西,与孙作宾取得了联系,决定成立中共西安中心市委,代行省委职权,书记魏光波,组织严克伦,军事崔廷儒,成员有孙作宾、苗建平等人。

4月上旬 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南区神堂沟召开会议。会议决定继续发展游击战争,在陕北创建一师红军;武装开辟根据地,使红区连成一片;发动群众,实行土地分配,建立苏维埃政权。

4月17日 中共西安中心市委发出《关于红五月工作决定》,号召全省党员抓紧有利形势进行斗争。

4月中旬 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在淳化甘嘴村与国民党何高候部两个连遭遇,在三路游击队的配合下全歼何高候两个连。

4月中旬 红二十六军第三团、骑兵团从耀县稠桑出发,分兵三路,攻打同官(今铜川城区)梁家原和黄堡镇,击毙国民党守军营长范子畴,活捉区长梁子峰。

4月下旬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五支队在绥德王家沟成立,队长崔正冉,政委马万里。

4月 富西革命委员会建立,主席韩明奎。9月,富甘革命委员会建立,主席张尚达。

同月 中共西安中心市委负责人孙作宾由西安来到汉中,在国民党第三十八军从事兵运工作。孙在和高维翰、张德生取得联系后,参与陕南特委领导工作。10月,汪锋去上海后,军委工作由孙作宾负责。

春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六支队(安定十六支队)在安定建立,队长王生贵,指导员刘明全。

5月28日 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决定健全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张秀山。同时成立了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并决定杨森任红四十二师师长,高岗任政委。

5月 井岳秀调集八十六师和各县民团15000余人,对陕北根据地发动

第一次“围剿”。

同月 佳县特务队成立,队长郭玉人,政委樊文德。后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六支队(佳县六支队)。

同月 中共横山县委建立,书记白如冰,后由吴志祥接任。

同月 中共吴堡县委建立,书记丁茂义。

同月 靖边县赤卫军中队成立,队长江德玉。

同月 中共陕北特委派王达成以特派员身份去神府指导工作。

上半年 国民党陕西省政府警卫团中共团委会(6月改称士兵委员会,负责人崔廷儒)、西安绥靖公署教导营中共委员会(书记杨正人)先后建立。隶属中共西安中心市委。

7月8日 中共陕北特委在安定杨道崋将一、二、五支队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谢子长,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

7月15日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安定临时第八支队(横山八支队)成立,队长栾新春,政委刘明山。25日,临时八支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八支队。同时又新建了第八支队。

7月16日 谢子长率一、二、五支队及薛兰斌领导的赤卫队,经过一夜激战,于17日攻克安定县城。

7月下旬 谢子长、郭洪涛率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到南梁,与红二十六军会师。2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与中共陕北特委、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阎家洼子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红四十二师三团北上陕北,配合陕北红军游击队作战,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撤销高岗红四十二师政委职务,由谢子长兼任。会后,陕甘边特委调拨步枪100枝,银元数百枚支援陕北游击队。

7月下旬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二支队(安塞十二支队)在安塞团庄河成立,队长李治国。

7月 中共南(郑)褒(城)西南区委改为中共南郑县委,书记白耀卿。

同月 中共陕甘边特委做出《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提出了陕甘边根据地以华池为中心,向四周发展,创造中心苏区;恢复照金苏区,打通陕北苏区;创造条件,转变临时政权为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和扩建红军的任务。

8月17日 谢子长率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和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在

安定县景武家塔全歼国民党军八十六师姜梅生部一个连。22日,又在绥德张家圪台歼八十六师两个排。

8月25日 安定县革命委员会在李家岔成立,主席白占玉。后安定县改为赤源县。

8月26日 谢子长率部奔袭清涧河口镇,经过激战,击溃国民党守军八十六师一个连和一部分民团,谢子长胸部负伤,遂撤出战斗。河口守军亦于次日逃回清涧县城。

8月28日 中共陕北特委在清涧寺塬里召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开展土地分配;扩大红军,将一、二、三支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一、二、三团;重建九支队(队长高朗亭,政委王文良)。

8月下旬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三支队(靖边十三支队)在靖边青阳岔成立,队长王锦秀。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四支队在绥德东区建立(绥德十四支队),队长吴创业,政委刘九宫。翌年夏,该支队叛逃。

8月 中共上海中央局通知中共陕南特委派人到上海汇报工作,特委先后派刘季平、吴鸿宾、张德生、刘顺元、汪锋等去汇报。

同月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十二支队成立,队长吴亚雄,政委曹动之。

9月上旬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七支队在府谷木瓜村成立(府谷七支队),队长兼政委韩峰。

9月12日 清涧县革命委员会建立,主席白世杰。

9月18日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一团在安定崖窑沟成立(由红一支队、红八支队合编而成),团长贺晋年,政委马佩勋。同时新建了红一支队(队长姬占庭,政委刘明山)、红八支队(队长高光明,政委李盛堂)。

9月中旬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在神木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三团,团长王兆相,政委杨文谟。同时组建了新的三支队。10月18日,神木县革委会成立。11月7日,神木县革委会改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呼子威。

9月下旬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一支队(神木十一支队)成立,队长刘德,政委贾如胜。

9月 佳县临时革命委员会在马连塌村成立,主席王好明。10月,苏维

埃政府建立,主席高长直。

同月 中共陕甘边南区委员会和南区革命委员会在中部(今黄陵)小石崖成立,书记张邦英,革委会主席黄子文。南区党委下辖耀县县委、赤淳工委。革委会下辖富西、富甘县革命委员会和甘肃宁县办事处。

秋 红二十六军和游击队返回照金,恢复了照金苏区。

秋 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在各县开始分配土地,试点工作在清涧袁家沟进行。

秋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二支队建立(绥德十二支队),队长梁凤鸣,政委马龙飞。翌年1月,该支队叛逃。

9月至11月 国民党调集两个团又两营兵力,对神府根据地发动“围剿”,红三团避敌主力,北上府谷,在七支队配合下,攻进府谷哈拉寨,歼灭守寨民团。

10月初 陕甘边红军干部学校在荔园堡成立,校长刘志丹。

10月10日 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以第二路游击区的保安、庆阳、安塞游击队为基础,在阎家洼子组建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团长刘景范,政委胡彦英。

10月中旬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支队于安定成立,队长高步仁,政委拓嘉祯。

10月15日 谢子长带伤指挥部队再次攻打安定县城,在城内共产党员刘光汉、白应奎等接应下,攻入城内,击毙民团团总李培成。

10月 中共米东县委成立,书记郭文华。

同月 魏光波、严克伦先后被捕,中共西安中心市委遭到破坏。

11月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七支队成立(延川十七支队),队长杨兴元,政委高志安。

11月3日 吴堡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主席李庆玉。1935年1月改为苏维埃政府,主席丁茂义。

11月4日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在清涧马家山改编为红军陕北第二团,团长郭玉人,政委马万里。红二支队改编后,又成立了新二支队。

11月4日至6日 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同时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部,军委主席刘志丹,赤卫军总指挥朱自清。会议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等议案。

11月8日 中共陕南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机关驻地青鹤观被镇巴县民团包围,县委书记潘天成率机关干部和游击队同民团激战竟日,终因力量悬殊,青鹤观失守。

11月中旬 在陕甘边区党组织和红四十二师的帮助与影响下,活动于陕西黄龙山的地方武装郭宝珊率部120余人在庆阳新堡宣布起义。起义后部队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令员郭宝珊,政委任浪华。

11月 中共陕北特委在安塞完坪村举办土地分配学习班。随即在寺湾、张梁等村庄进行分配土地试点。

中共陕南特委书记白耀卿被国民党逮捕,经营救脱险后离开汉中。特委工作交孙作宾负责。

12月6日 延水县工作委员会在白家畔成立,主任任长明。12日,建立了延水县总务部,主席刘青云。

12月8日 中共鄂豫皖省委率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于豫陕交界处铁锁关(洛南县境箭杆峪)进入陕西。

12月10日 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街(丹凤县境内)召开常委会议,提出立即建立中共鄂豫陕省委,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决定改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省委领导成员仍由原鄂豫皖省委成员担任,书记徐宝珊。

同日 红二十五军在庾家河与国民党第六十师激战一日,将其击退,毙伤其300余人。

12月29日 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洛南县景村建立中共商洛特委,书记宋光国。1935年2月,特委遭国民党军队袭击,损失严重。4月特委撤销。

同日 红二十五军宣布成立陕南抗捐第一军,司令刘实通(红枪会首领),政委宋光国。

12月下旬 中共赤源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书记魏怀礼,主席薛兰斌。

12月底 安塞县苏维埃政府在洛河川刘家老庄成立,主席王聚德。

冬 甘洛游击队第八支队在甘泉成立,队长冯长斗。

冬 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正宁县湫头以第三路游击队的特务队、四支队为基础,组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一团,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

冬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西北报》出刊,负责人蔡子伟。

1935年

1月8日 红二十五军攻克镇安县城。

1月16日 鄂陕第九路游击师在山阳九甲湾成立,师长阮开科(红枪会首领),政委李洪章。

1月19日 陕北红军第一团配合延川九支队,在延川王家圪坨、官庄歼灭延川民团200余人,活捉民团总指挥高善亭。

1月中旬 鄂陕第五路游击师在镇安县白塔杨家岭成立,师长毛仪彬(红枪会首领),政委白明俊。下辖一、三、五团,共100余人。

1月22日 鄂陕第六路游击师成立,师长叶忠让。

1月23日 在中共吴堡县委领导下,县保安团举行兵变。兵变后,县委将其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五支队(吴堡十五支队),队长薛英桂,政委慕生忠。

1月25日 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白庙岔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陕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副主席崔田民、霍维德。会议通过了《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法令。同时成立了陕北总工会。随着形势的发展,根据地内县级苏维埃政权(革命委员会)纷纷建立。

1月30日 在中共陕北特委和中共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在赤源县白庙岔成立,师长杨琪,政委张达志,参谋长朱子休。下辖三个团,其中红三团活动于神府苏区。

1月 赤光县革委会在延川成立,主席曹增荣。

同月 中共陕甘边特委派刘志丹、惠子俊等率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二团北上,到达陕北赤源县水晶沟。刘志丹去灯盏湾探望正在养伤的谢子长,两人就建立西北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机构,以及组织第二次反“围剿”作战方针等问题进行研究,取得一致意见。

同月 中共陕甘边特委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生活》创刊,负责人龚逢春。

2月1日 红二十五军主力在柞水蔡玉窑击溃尾追之陕军一二六旅二五二团,歼其一个营后攻占蓝田葛牌镇。

同日 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在安定南沟岔消灭高桂滋部一个连,缴枪百

余枝。

2月4日 红四方面军攻克宁强县城,俘国民党军团长以下官兵600多人。同时,中共川陕省委在此建立中共宁强县委,书记冯凯。5日,宁强游击大队成立。10日,宁强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刘炳成(因贪污被镇压),后由沈连章接任。

同日 红四方面军解放阳平镇,建立中共阳平县委。9日,阳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王延寿。同时建立县游击大队。

2月5日 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安定西区)周家岭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同时撤销陕北特委,陕甘边特委继续存在。西北工委属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领导。工委下辖陕甘边特委、神府特委和神木、佳县、米东、米西、吴堡、绥德、清涧、子长、赤源、秀延、延川、延水、延长、延安等县委。在此期间西北苏区没有建立统一的政权组织,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陕西省苏维埃政府继续领导着两个地区的行政工作。西北工委书记惠子俊(崔田夫代理),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一说谢子长)。7日,刘志丹主持在赤源县冯家梢塬召开军事会议,宣布正式成立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两支红军。

2月6日 中共秀延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在柳树沟成立,书记李子厚,主席薛兰斌。

2月9日 红四方面军解放勉县,建立苏维埃政府,主席杨芝林。

2月上旬 中共鄂陕特委、鄂陕游击总司令部在郧西县二天门成立,书记郭述申,司令陈先瑞,政委郭述申兼任。

2月14日 中共镇安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在水河洞河垣成立,书记白明俊,主席李明德。

2月15日 佳县、吴堡两县在佳县张家峪召开县委书记和六、十五支队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六、十五支队合编为红二十七军第五团,团长王士杰,政委慕生忠。3月,五团改为第三团,原第三团改为神府独立团。

同日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六支队在安定田家坵成立,队长常在贵,指导员刘明金。

2月18日 鄂陕第四路游击师在山阳袁家沟口成立,师长阮英臣。

2月中旬 鄂陕第七路游击师在镇安县成立,师长阮士春,政委张祖祥。

2月21日 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谢子长因伤势恶化,在灯盏湾逝世。

2月28日 国民党陕西省彬县保安团驻永乐镇分团50多人在王富贵、李振海、张占云等率领下起义,加入红军。

同月 中共延安县委成立,书记李向海。5月,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阎登高。

同月 蒋介石调集陕甘宁晋4省国民党部队约4万兵力向西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28日,刘志丹发布反“围剿”动员令,决定红四十二师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与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组成西北红军主力,以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同月 中共延水县委、县革委会成立,书记白玉华,主席惠志明。

同月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七支队(延川十七支队)成立,队长杨兴元,政委高子安。

同月 陕甘边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建立,总指挥陈国栋,政委张邦英。下辖中宜、富县、淳耀、赤水及甘肃新正、正宁等地方游击队或独立营。

同月 孙作宾离开汉中,特委工作交杨永昶负责,军委工作交成之慎负责。

2月至6月 国民党调集5000余兵力,对神府苏区发动“围剿”。

3月初 西北军委任命刘景范为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3月10日 红二十五军在石塔河设伏,将国民党军张飞生部500余人毙、伤。不日,在华阳镇七个乡建立了苏维埃政府。

3月中旬 中共陕甘边特委派马文瑞到甘泉、宜川等县开辟工作,建立了红泉县委(书记苏保全)。马文瑞以陕甘边区特委驻东地区特派员的身份直接领导红泉县委和宜川县党支部的工作。不久建立了陕甘边东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马文瑞。下辖红泉革命委员会和赤川革命委员会。

3月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一、十支队合编为陕北游击队第一纵队,纵队长高步仁,政委刘明山。

同月 陕北游击队第四、五、六、十四、十五支队合编为二五纵队,纵队长郭玉人,政委马万里。

同月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五支队(米脂十五支队)在吴堡成立,队长高尚乐。

同月 中共重远县委和县革命委员会在安塞成立,书记乔奋山,主席刘汉鼎。4月底,重远县划归安塞县管辖。

4月9日 红二十五军在柞水县九间房设伏,误将中国共产党掌握的陕军警备第三旅大部歼灭,共产党员、旅长张汉民等30余名党员被错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追认张汉民等为革命烈士。

4月上旬 红二十六军三团、骑兵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在庆阳六村原与国民党军三十五师作战,三团团团长王世泰、骑兵团团长赵国卿负伤。

4月上旬 中共五星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在柞水红岩寺成立,书记李志英,主席田银斗。

4月上旬 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山阳袁家沟口成立,主席程家盛。下辖镇安、五星两县苏维埃政府及山阳县苏维埃筹备处。

4月14日 国民党马鸿宾三十五师占领南梁荔园堡,陕甘边苏维埃政府转移至保安县石崩湾,后又迁至甘泉县。

4月18日 红二十五军攻克洛南县城。

4月中旬 中共鄂豫陕省委在蓝田县葛牌镇召开扩大会议,改选了省委,书记徐宝珊,副书记吴焕先。会议提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围剿”和加紧建设根据地的任务。5月9日徐宝珊在龙驹寨病逝,吴焕先代理省委书记。

4月下旬 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建立中共豫陕特委和豫陕游击师,加强洛南、商县、商南、卢氏四县边的工作。5月,中共豫陕特委和豫陕游击师正式成立,书记郑位三,师长方升普,政委曾焜。

4月 赤川县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主席黑志德。

同月 中共安塞县工委在砖窑湾成立,书记郭东升。5月改为县委。

同月 陕甘边区直属赤卫军总指挥在甘泉建立,总指挥刘金声,副总指挥王继之,参谋长陈德福。下设三个大队,约七八百人。

春 陕西省特务队在安定黄家峁子村成立,队长牛岗,政委刘振华。8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十三支队。

5月1日 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义勇军在白庙岔与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主力会师。刘志丹号召两支红军互相学习,加强团结,用枪杆子打出根据地的新局面。

5月4日 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在安定玉家湾成立,总指挥刘志丹,政委高岗。

5月初 中共神木县委在呼家庄召开扩大会议,宣布成立中共神府工委,书记王达成。工委下辖由神木县委改成的东、西、北三个县委和府谷县委。

5月9日 西北红军主力在马家坪将国民党八十四师五零零团第三营全歼,迫使安定守军退往瓦窑堡。安定县城遂告解放。

5月10日 中共西北工委在玉家湾举行会议,决定主力向南出击,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打通陕甘边、陕北两根据地的联系,把整个根据地联成一片。

5月上旬 国民党调集部队向鄂豫陕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

5月28日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九支队在延长成立,8月改为宜川独立营。

5月30日 刘志丹率主力红军攻克延长县城,活捉县长董公绶,击毙民团总指挥李鸣吾,缴获枪械400余枝。

5月下旬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十支队在任家砭成立,队长宜立功,指导员陈克功。

5月 陕甘边南区党委新正办事处建立。

同月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十一支队在郑家砭成立,队长王志杰,政委许培仁。

同月 陕北游击队第八、十三支队合编为第三纵队,纵队长陈世思,政委惠艾琛。

同月 孙作宾、崔廷儒、高克林等在西安重建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书记高克林,组织孙作宾,秘书长崔廷儒。

同月 中共渭北工作委员会在高陵县岳华村复兴小学建立,书记周芝轩。工委先后领导三原、蒲城、临潼、富平等县的四个支部和一个特支。

同月 中共神府工委将投诚的史文华部正式改编为抗日义勇军陕甘骑兵第一师,师长史文华,政委王兆相兼。同年6月,史文华率旧部投奔国民党高桂滋部。

6月2日 在西北红军的强大攻势下,延川县长和驻军弃城逃往清涧。当日,延水县委和县政府进驻县城。

6月5日 中共豫陕特委书记郑位三率地方武装在商南县清油河击溃商南县县长带领的“围剿队”500余人。

6月11日 红二十六军三团与红二十七军一团包围安塞县政府所在地兴隆寨。14日,国民党驻军宵遁,红军顺利进城,活捉安塞县长。

6月20日 中共延长县委和革命委员会建立,书记白如冰,主席谭生彬。9月,县革委会改为县苏维埃政府。

6月21日 中共神府工委在神木何家沟召开军政干部联席会议,决定将红军主力和地方干部编成九个小分队,分散活动。会后工委书记王达成离开神府。

6月22日 刘志丹率红二十六、二十七军攻克安塞最后一个反动堡垒——李家塌寨子,使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

6月28日 西北红军主力攻克靖边县城,歼灭守军500余人。

6月30日 保安县城国民党守军在红军围困下弃城逃跑,保安解放。

6月 中共上海中央局决定恢复中共中央北方局,西北工委改由北方局领导。在此期间,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朱理治为驻西北代表到达西北苏区组建代表团。8月,上海临时中央局派聂洪钧参加代表团。代表团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错误地开展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受到西北工委刘志丹等同志的抵制。

同月 高岗在宜川阁楼寺宣布解散抗款军,将宜川十支队、一支队和宜川赤卫队合编为新编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令员黑志德,政委赵正化。

同月 肤甘县革命委员会在柳林龙儿寺成立,主席刘秉温。9月肤甘县撤销,辖区归肤施县(今延安市宝塔区)。

同月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延长十八支队在延长甘谷驿成立,队长李万胜,指导员贺挺智。

7月2日 中共鄂豫陕省委集中红二十五军主力及四路、三路游击师等地方部队,与尾追之陕军警备第一旅在山阳袁家沟口展开激战。午后,警备第一旅被全歼,俘旅长以下1400余人。

7月3日 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陕西省政府机关迁驻延川永坪镇。不久建立西北红军干部学校,校长吴岱峰,政委张秀山。

7月5日 中共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来到永坪。15日,朱理治主持召开西北工委扩大会议,传达1934年7月至1935年5月25日北方代表、河北省委的五封指示信,要求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开展所谓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7月15日 中共鄂豫陕省委得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向北行动的消息后,立即在长安洋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

到西北苏区会合西北红军。

7月17日 国民党当局以20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实施“清剿”。

同日 西北红军主力挥师东进,在绥德老君殿歼国民党八十四师一个营,打伤团长艾捷三。

7月25日 中共鄂豫陕省委指示豫陕、鄂陕两特委,告知省委机关与红二十五军北上西北苏区,要求两特委合并为中共鄂豫陕特委,统一党的领导与组织工作,将游击总部健全成为边区军事和游击战的领导机关。任命李隆贵为书记兼政委,陈先瑞为总司令。

7月 红泉县革命委员会在临真镇建立,主席刘大才。

同月 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骑兵团在宜川将宜川第十、十一、十三支队、延长十八支队、延安四支队、甘泉六支队合编为红军第二路游击师,共600余人。司令员邵风林,政委杨凤岐。10月,游击师改编为红宜独立营。

8月9日 刘志丹率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主力千余人,采用围堡打援战术,攻击吴堡慕家原守军据点取胜,全歼守军四个连。

8月21日 刘志丹率西北红军和陕北游击队五、十四等支队,在绥德定仙呈一带,全歼国民党阎锡山部一个团。

同日 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在甘肃泾川战斗中牺牲。省委书记由程子华代理。

8月 中共淳耀县委在淳化桃渠原成立,书记张有信。

同月 中共新正县委在旬邑湫头成立,书记卢永才。

同月 正旬彬(正宁、旬邑、彬县)革委会成立,主席郭廷藩。

9月初 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及骑兵团在黄陵隆坊镇歼灭东北军一个营,俘敌300余人。

9月9日 中共鄂陕、豫陕两特委于商南县梁家坟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两特委合并,建立中共鄂豫陕特委(即陕南特委),书记郑位三;合编鄂陕游击总司令部和豫陕游击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政委李隆贵。

9月12日 中共神府工委恢复,书记张晨钟。同时恢复红三团,团长王兆相,政委杨文谟。

9月15日 徐海东、程子华率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西北苏区延川县永坪

镇。不日根据中央北方局指示,朱理治、聂洪钧和程子华三人组成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

9月16日 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和红二十五军在永坪镇会师。

9月17日 中共靖边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在店家城成立,书记李子厚,主席王治邦。

同日 在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的主持下,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和军队主要领导干部在延川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兼任书记;改组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改编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军团下辖七十五(师长张绍东,政委赵凌波)、七十八(师长杨森,政委张明先)、八十一(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3个师,7000余人。陕甘晋省委隶属中央北方局。中共陕甘晋省委下辖陕甘边特委、神府工委、陕北第一分区区委,并直接领导着赤源、秀延、子长、瓦窑堡、靖边、米西、延川、延长、延安等九个市、县委。

9月 中共肤施县委和革委会在龙儿寺建立,书记马承德,主席刘秉温。11月改为县苏维埃政府。

同月 中共陕甘晋省委决定建立陕北第一分区区委,书记白炳炘。区委下辖佳县、吴堡、绥德、清涧、延水等五个县委。同时建立了陕北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白炳炘。

10月1日 红十五军团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以少量部队包围甘泉,主力则在甘泉以北劳山设伏,歼灭国民党东北军一一零师3700余人,击毙师长何立中。

10月5日 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中共陕甘晋省委、西北军委、陕西省政府机关迁驻瓦窑堡。不日,瓦窑堡市委、市政府成立,书记兼市政府主席崔田夫。

10月6日 原中共鄂陕、豫陕两特委领导的游击师在商南县梁家坟碾子坪会合,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十四师。

10月初 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影响下,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在西北苏区开展错误肃反,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关押,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和陕甘边区县以上干部几乎全部被捕,200多人被错杀。

10月16日 中共永红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在正宁南坡头成立,书记赵宏钧,主席梁文汉。

10月19日 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

同日 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先后听取了当地游击队负责人张明科和龚逢春的汇报,了解到西北苏区错误肃反的严重形势,立即派王首道等先赴瓦窑堡,向陕甘晋省委传达中央关于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的指示。并决定派人接管西北保卫局。

10月21日 毛泽东等指挥中央红军在吴起消灭尾追之马鸿逵部及国民党东北军一个骑兵团,击溃三个团。

10月22日 中共中央在吴旗召开政治局会议,认为红军到达西北苏区后的任务是保卫与扩大苏区,在西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同时提出要将保卫苏区的斗争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斗争,因此要求加强白区、白军的工作。并决定派贾拓夫、李维汉等寻找西北红军主力及其负责人。

10月24日 中共中央到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驻地甘泉县下寺湾,并在此召开干部会议,决定纠正西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

10月25日 红十五军团发动榆林桥战役,在富县榆林桥同东北军六十七军六一九团展开激战,全歼守敌四个营,团长高福源被俘。

同月 中共富县工委(书记李继德)、韩城县委(书记姚权)建立,隶属陕甘晋省委。

同月 西北军委决定将陕北游击队第一纵队、第三纵队和陕北游击队第二十三支队合编为米西游击师,共500余人,师长柴福俊,政委魏国亮。

11月1日 国民党政府在西安建立“西北剿匪总部”,蒋介石兼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

11月3日 中共中央在下寺湾召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了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西北苏区、西北红军、“肃反”及劳山、榆林桥战役情况的汇报。经研究决定:中央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党务委员会,审查西北错误肃反事件。同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秦邦宪);建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并决定中央领导人分两部分行动,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同红

十五军团会合,张闻天、洛甫、王稼祥、刘少奇等率领中央机关北上瓦窑堡。

11月5日 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撤销中共陕甘晋省委,建立陕甘、陕北两个省委和关中、神府、三边三个特区。中共陕甘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李富春,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王生玉,机关驻地寺湾;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郭洪涛,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机关驻地瓦窑堡;中共关中特委书记贾拓夫,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中共神府特委书记杨和亭,苏维埃政府主席乔钟灵;中共三边特委书记谢维俊。两个省和三个特区统归中共西北中央局和西北办事处领导。

11月7日 中共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受到当地机关干部、部队和群众的欢迎。下午,中央党务委员会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等在西北错误肃反中被关押的100多人。月底,中央组织部召开平反大会,公布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宣布刘志丹等无罪。

11月8日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建立后方办事处,主任周恩来,副主任刘志丹。

11月9日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派谈国帆赴陕北向中央汇报工作。

11月21日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指挥下,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发动直罗镇战役,歼灭进犯苏区的国民党东北军一〇九师一个师及一〇六师一个团,毙俘师长牛元峰以下官兵5300人。至此,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11月30日 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会上作《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

11月底 中共米西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在石窑沟成立,书记杨彩霞,主席王文随。

同月 陕甘边南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湫头原召开,选举产生了南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副主席张邦英。政府下辖淳耀、永红、赤淳、正旬彬等县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委员会及宁县办事处,宁县荏掌办事处。

同月 为适应中央关于西北苏区党组织和行政区划变化的需要,共青团陕北特委改建为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慕纯农。

同月 中共赤水县、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书记周志宏,主席王银喜。

同月 中共佳芦县委建立,书记刘长亮。

同月 西靖边县苏维埃政府警卫一连连长宗文耀等人发动反革命武装

叛乱,杀害了谢维俊等 10 余名领导干部和游击队骨干,使建立不久的中共三边特委遭到破坏。

12 月 5 日 毛泽东分别致书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并派汪锋持书前往西安与杨、杜会晤。毛泽东建议建立西北大联合,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以逐步实现全民族抗战。汪锋在西安一个多月,与杨虎城会谈多次,初步商定了合作抗日,互相帮助的方案。

12 月 7 日至 11 日 杨虎城部警二旅四团四连、九连在进步青年何振亚、王武林等领导下,先后在柞水县营盘和长安引驾回举行起义,不久宣布成立陕南游击纵队,指挥何振亚。1936 年 3 月下旬,部队被安康专署收编。8 月 13 日,按照中共西北特支指示,部队在镇安紫荆乡(今属安康)再次起义,建立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军长何振亚。1937 年 3 月,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编为红十五军团警卫团。

12 月 8 日 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联名发表《告陕甘苏区劳苦群众书》,号召苏区工农劳苦群众用一切力量来保卫苏维埃的土地和自由,保卫苏维埃政权。

12 月 17 日 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下河滩田家院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和《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12 月中旬 中共鄂豫陕特委率红七十四师进驻宁陕县四亩地。特委在此召开会议决定建立中共宁佛工作委员会和宁佛游击大队,书记罗明义,大队长张绍安。

12 月下旬 中共中央陆续将原西北苏区的地方革命武装整编组建为三个军和两个独立师。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红二十九军,军长萧劲光,政委甘渭汉;红三十军,军长阎红彦,政委蔡树藩;神府独立师,师长王兆相,政委张秀山;关中独立师,师长白志文。

12 月 杨虎城派杜斌丞寻找中共陕西组织负责人,经过与孙作宾商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决定派崔廷儒赴陕北,向中央汇报杨虎城愿与红军互不侵犯、联合抗日及要求同党中央联系的意向。途中中央代表团鲁贲、贾拓夫、张德生听取报告后让崔廷儒返回西安。

年底 中共中央北方局派王世英来西安,同杨虎城进行商谈。王世英向中央汇报后,又到韩城同杨虎城进行谈判,双方达成建立秘密交通线的协议。春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王炳南回国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在中共的

帮助下,杨虎城联共反蒋抗日的思想日益坚决。

1936年

1月初 红七十四师采用游击战术,先后在陕南荆紫关、西坪、官坡、兰草、三要司、庾家河等地歼灭当地民团 500 余人。

1月7日 谈国帆回到西安,给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带来中央瓦窑堡会议的有关文件。

1月10日 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红军渡过黄河,东征山西,打通抗日道路。

1月 中共中央派贾拓夫等到达关中,在原中共陕甘边南区党委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关中特委,书记贾拓夫。机关驻地新正县南邑村。下辖淳耀、赤水、永红和甘肃之新正、新宁等五个县委。同时关中特区司令部建立,司令员江华,政委贾拓夫。

2月17日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东征宣言》。20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从延水至河口一线渡过黄河,进行东征。

同日 中共韩城县委组织 30 多名游击队员,在高家坡村发动武装暴动,收缴了国民党保甲的枪支。21日,宣布建立中国工农红军陕西东府游击队第二支队。队长严文炳,政委薛和昉。

2月21日 中共中央派李克农、钱之光、戴镜元等到洛川,与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就红军和六十七军合作抗日问题达成口头协议。

2月 神府东北办事处成立,主席杨孝先(后为乔钟灵)。

同月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撤销赤源县,恢复安定县,县委书记李合邦,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崔田夫。

同月 中共神府特委正式成立,书记杨和亭。

同月 清涧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李占江。

同月 在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和渭北工委的安排下,中央派赴华北工作的刘少奇由陕北安全抵达临潼,乘火车赴华北。

同月 为配合主力红军东征,中共陕甘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陕东特委,书记郭子青。同时组建了陕东抗日游击队,司令员曾政,政委郭子青。

3月10日 陕西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瓦窑堡召开,选举马明方、艾楚南、霍维德等49人为省苏维埃执行委员。16日举行第一次执委会,选举马明方为主席,霍维德为副主席。

3月 佳芦县革命委员会在佳北建立,主席梁士堂。1937年7月,改为佳芦县苏维埃政府。

4月5日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负责学运工作的姚权被捕叛变,临时省委负责人有暴露的危险。高克林、孙作宾即将工作交崔廷儒负责,准备去陕北向中央汇报。临行前,孙蔚如通过杜斌丞找到孙作宾,表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愿同红军互相合作,共同抗日。孙作宾到陕北后,即向中央作了汇报。后中央决定高克林留陕北工作,孙作宾担任中央交通。

4月9日 周恩来、李克农受中共中央委托与张学良、王以哲在延安举行谈判,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以及帮助东北军部队进行抗日教育等条款。

4月上旬 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成立,书记周恩来。

4月14日 红二十八军军长兼北路军总指挥刘志丹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同年,中共中央决定将保安县更名为志丹县。

4月15日 神府特区在杨家沟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神府特区抗日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乔钟灵。

4月中旬 神府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总指挥郭宝珊,政委毛凤翔。

5月1日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从铁罗关开始撤回黄河西岸。

5月5日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5月17日 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撤销陕甘省委,建立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锡五;成立中共陕豫鄂省委(又称陕南省委),书记贾拓夫。陕甘省委撤销后,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在甘泉一带设立陕甘工委,书记欧阳钦。夏,陕甘工委在洛河川一带建立了陕甘南路军指挥部,总指挥曹力如,政委欧阳钦。下辖3个独立营和10余支游击队。

5月18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太相寺发布《西征战役计划》,决定组织西方野战军活动于陕甘宁广大区域。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

夏 在杨虎城部宪兵营从事兵运工作的谢华、徐彬如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建立了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简称西北特支),书记谢华,归中央直接领导。

西北特支成立后,除继续作兵运工作外,还在学生中发展党员,领导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兼管鲁南、苏北地下党组织。

6月1日 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在西安成立,主要领导人谢华、徐彬如、李木庵。九十月间,杨明轩到西安,担任西救负责人。

同月 中共绥清中心县委成立,书记刘玉春。

同月 中共关中临时特委建立,书记汪锋。9月关中特委正式建立,书记习仲勋。下辖赤水、淳耀、永红和甘肃之新正、新宁等四个县委。

7月14日 中共红宜县委员会在宜君石堡村成立,书记王清廉。1937年改为宜君县工委。

7月27日 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央西北局,书记张国焘,副书记任弼时。

8月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成员崔廷儒先后派吕剑人、刘庚、张涛、李特生、谈国帆等到乾县地方民团中开展工作,准备建立武装。

9月3日 毛泽东写信给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要求与红军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

9月6日 张文彬持毛泽东致杨虎城、杜斌丞的信函,同杨虎城进行会谈,双方达成联合抗日协定,主要内容为:(1)互不侵犯,取消敌对行动;(2)互相通商,取消经济封锁;(3)建立通信联络,及时交换情报。

9月22日 中共定边工作委员会组成,书记李维汉。因情况变化,不久撤销。

9月 延安县人民政府成立,县长刘秉温。

同月 西安绥靖公署特务二团中共工作委员会成立,书记王建基(一说张一平)。

同月 中共米西县工作委员会(书记蔡淑德)、吴堡县工作委员会(书记李向良)相继成立。

9月至11月 国民党调集一万兵力对神府根据地发动“围剿”。10月1日,中共神府特委在阎家山召开会议,制定了“向南作战,先打晋军”的作战方针。

10月1日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临时队部成立,队长胡景和,后刘金声、樊一鸣、李连璧、于志远、朱怀琳(朱平)接任队长。

10月4日 东北民众救亡会(简称东救)在西安成立,主要负责人是东北流亡陕西人士刘澜波、高崇民、车向忱、宋黎等。

10月7日 张庚良、刘庚等在乾县发动铁佛寺保安中队起义。起义部队攻进永寿县城,打开监狱,释放政治犯。8日,部队转战麟游山区,成立了陕甘边抗日联军,总指挥张庚良,政委兼参谋长刘庚。

10月19日 红军独立第一师在神府先后取得了泥河沟、苏泥家村伏击战的胜利。月底,又消灭了乔家岔滩民团和高家堡援军,粉碎了“围剿”。

10月 中共鄂豫陕特委在宁陕东江口以宋登贤的“大刀会”为基础,建立了抗日抗捐军,后改编为红七十四师补充团,团长宋登贤。

同月 中共中央和中共陕甘宁省委决定重建三边特委,书记张德生。辖靖边、安边、定边、盐池四个县委。

11月7日 西安广大学生冲破国民党军警阻拦,在革命公园举行悼念鲁迅大会。

11月15日 西安师范、二中、西安高中、西安女师、西安女子中学等14个学校救国会代表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正式成立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中共党团书记刘南生。

11月下旬 中共西安师范临时支部成立,书记董学源。

11月 中国工农红军永乐独立营在渭北底庙牛家坡成立,营长关国玺。

12月4日 蒋介石飞抵西安,部署兵力,准备“围剿”红军。

12月9日 在中共西北特支领导下,西安各界青年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示威活动,当游行队伍向蒋介石住地临潼进发请愿时,为避免流血事件,张学良赶到十里铺向游行学生声言“关于抗日问题,一星期以内用事实答复”。游行队伍遂返回西安。

12月12日 张学良、杨虎城举行兵谏,在临潼扣留了蒋介石。并提出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宗旨的八项救国主张。

12月15日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将领发出《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通电》,支持张、杨的救国主张。

同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救、东救、西安学联发起组织西安18个救亡团体,联合发表通电,支持张、杨两将军兵谏,拥护抗日主张。

12月17日 应张、杨两将军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从延安飞抵西安,协同解决西安事变。

12月18日 赵伯平等20多名共产党员在西安获释出狱,不久同党组织接上关系。

12月19日 周恩来在西安接见东救、西救等救亡团体负责人,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12月中旬 中共中央决定再次成立陕甘省,省委书记李维汉,政府主席刘景范。省委驻甘泉县高家哨。

12月23日 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同蒋方代表宋子文谈判。周恩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条件。

12月24日 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蒋表示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六项条件。

12月25日 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同日 秦邦宪在西安二府街谢华家中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关于解决西安事变通电的内容和白区工作指示,同时宣布撤销西北特支,恢复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

12月27日 延安抗日救国会成立,主任曹华山。

12月3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致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一封信》,号召西北各党派一致联合,停止内战,结成全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寇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

12月底 应杨虎城电请,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政委任弼时率部抵达泾阳县云阳镇。

1937年

1月9日 西救、市学联等抗日救亡团体在革命公园举行全市农、工、商、兵示威游行,反对南京政府扣押张学良,反对内战,要求抗日。

1月10日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保安县城迁驻延安。1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进驻延安。

1月上旬 中共陕西省委刊物《统一战线》创刊。

1月11日 陕西省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总务李连璧。

1月18日 回民救国会在西安化觉巷清真寺成立。

1月22日 红七十四师奉命回撤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于商州。

1月26日 国民党中央军第十师二十八旅五十七团一营二连在陕西举行兵变,参加抗日联军。

1月下旬 中共陕西省委机关迁往泾阳县云阳镇,在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掩护下,领导陕西国统区党的工作。省委机关一部分仍留在西安坚持工作。

1月下旬 中共西安市委成立,书记惠子俊。3月25日,陕西省委对领导的区域重新作了划分,将西安市委改为市工委。

1月至4月 国民党调集近2万兵力,对神府根据地发动“围剿”。

2月5日 根据中央指示,红十五军团由商洛开赴三原进行整训。

2月6日 贺龙、关向应率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由富平移驻同官陈炉镇。

2月中旬 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在西安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等会谈,决定在西安七贤庄一号建立红军联络处。

2月2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林伯渠主持西北办事处的工作,筹建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准备更名改制工作。

2月 中共延安市委成立,书记白耀明。3月,肤施、延安两县合并为延安县,县委书记贺炳章,县长刘秉温。

同月 中共陕西省委划甘肃平凉为平泾区。3月,省委派赵伯平为平泾区特派员,接收东北军地下党组织在平凉发展的党员。

同月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郭洪涛为书记。

3月8日 中共陕西省委确定各县委中心工作是:在大力整顿党组织的基础上,发展壮大党的力量。

3月上旬 中共耀县工委建立,书记郝成斋。

3月25日 中共陕西省委给渭南、华县两县党组织发出指示,号召扩大统一战线,建立各种救国会组织,并要求建立渭华工委。同月中共渭华工委建立,书记刘玉堂。

同日 中共陕西省委将所辖区域划分为西安、渭南、蒲白、韩合、三原、北路、关中、平泾、乾县、扶风等11个区。

3月31日 贾拓夫向秦邦宪汇报:中共陕西省委已建立和发展了蓝田、渭南、扶风、岐山、乾县、永寿、麟游、礼泉、韩城、富平等县地方党组织。有党工作的县达26个,党员人数达600人以上。

同日 中共陕西省委向韩城县委发出指示,要求将过去偏重于“开发游击”、“创造苏区”的主导思想转变到广泛开展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上来,广泛开展救亡运动,采取公开、合法的方式组织抗日救国组织。

3月下旬 国民党政府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并令中央军进驻西安。

3月 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正式宣布改苏维埃制度为民主共和制度,改陕甘宁苏区为陕甘宁特区(不久改为边区),特区政府为国民政府统辖下的地方政府。

同月 中共蒲城工委成立,书记窦正芳。

同月 中共渭北工委撤销,恢复中共三原县委。4月,三原中心县委成立,书记周芝轩。

4月2日 中共陕西省委制定学生运动提纲,规定学生运动的方针是实行青年的民主的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运用各种公开合法的形式开展工作,团结、争取中间和后进青年,建立健全各种青年团体中党的组织。

4月4日 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陕甘省委,将陕甘省委所辖洛川以南非苏区和关中特委划归陕西省委领导。

4月12日 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选举冯文彬为西北青救会主任。

4月 中共鄂豫陕特委奉命率领抗日联军从镇安、柞水移驻长安县大峪口进行整训。8月5日部队奉命前往三原接受整编。整编后部队改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同时撤销中共鄂豫陕特委。

同月 新华通讯社在延安成立,社长向仲华。

同月 中共同官县临时工委成立(隶属红二方面军),书记张如洲。6月,赵伯平代表中共陕西省委到陈炉接收关系,并改临时工委为正式工委。

同月 中共宜君县工委成立,书记杨建舟。

同月 为了贯彻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精神,中共神府特委先后多次派干部和国民党驻军谈判,达成停战协议。

5月2日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亦称苏区党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大会确定,陕甘宁边区党的总方针是把边区建设成为抗日的及民主政治的模范区域,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政治与军事的模范区域,实现民主共和国的模范区域。

5月15日 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郭洪涛。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成立后,中共陕北、陕甘宁省委逐步撤销。

5月17日 白区党代表会议在延安举行。刘少奇做《关于白区的党和群

众工作》的报告。

5月22日至27日 中共陕西省委在泾阳县云阳镇召开陕西党代表会议,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杨尚昆等出席大会并作讲话。贾拓夫作《目前陕西党的任务与工作》的报告,提出陕西党在新时期的任务是动员和领导千百万群众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为和平民主和抗战而斗争。

6月20日 陕甘宁边区党委公布民主政府施政纲领十六条。

6月 陕西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员已达900人以上,加上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党员共有1350人。

7月1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事件告西北各界同胞书》,号召西北各界同胞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7月12日 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日本进攻平津与党的任务及工作指示》,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加紧进行抗战的宣传鼓动工作和抗日人民的组织工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发动全民族的抗战而奋斗。

7月14日 中共陕西省委就开赴抗日前线部队中党的工作发出指示,要求国民党三十八军中的中共党员坚决拥护与服从开赴抗日前线抗敌救国,以身作则,奋勇杀敌,用模范作用影响带动周围的人。

7月19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为援助华北抗战致中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赞成省党部14日发起成立陕西各界抗敌后援会的倡议。

7月23日 朱德总司令从延安到达泾阳云阳镇,主持红军的改编工作。

7月下旬 中共西路工作委员会建立,张庚良任书记。西路工委领导乾县、永寿、礼泉、武功、彬县、长武、兴平、咸阳、扶风、麟游等县党的工作。

夏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建立受省委领导、由中共西安市工委管理的中共西安教职工特别支部。

8月16日 由共产党员韩钟秀、曹冠群等人主持组建的中国妇女慰劳抗战将士会陕西分会(简称“妇慰会”)在西安成立,会长李定荫,中共党团书记曹冠群。

8月19日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向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救亡运动与党的组织工作报告》,提到全省党员人数已由年初的600多人增至1700多人,大多分布在关中,陕南组织尚未恢复起来。

8月24日 国民党西北行营和陕西省党部发出通告,以统一为名,下令解散学联和西救组织。中共西安组织领导西安各抗日救国群众团体与之进

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8月25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关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及留陕北各部驻防地的决定。

8月下旬 八路军出师抗日前后,中共中央决定,在西安原红军联络处的基础上建立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林伯渠为中共中央驻陕代表,宣侠父为办事处高级参议,伍云甫为办事处处长,以便加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八路军出师抗日后,中共陕西省委在云阳一一五师留守处掩护下工作。

8月2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征兵、壮丁训练及民团保甲等问题的通告》。通告要求各地方党组织和党员,对国民党这些工作不要采取反对或观望态度;要积极赞助和参加这些实际工作,争取领导权,从中开展党的工作,建立支部;采取各种方式积极宣传抗日及党的纲领,以提高壮丁、民团保甲抗战的热情和信心。

8月底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再次提出解散西救,以其委员参加省抗敌后援会内的设计委员会。29日,中共陕西省委就国民党解散西救问题向西安党组织发出指示信,指出应该认识到抗日救国团体遭到当局的压迫,是目前实行抗战新阶段中我们与国民党斗争的一个内容。对国民党要求西救解散的命令应坚决反对,但在斗争策略上要采取一些合法的、和平的斗争方式与方法,以求达到我们的目的。并指出目前最紧要的问题是统一救国会广大群众的意见,团结并依靠这个力量。

8月 中共陕西省委在泾阳县云阳镇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赵伯平任班主任。到1941年训练班共举办10期。

9月1日 中共陕西省委就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解散西救、学联事,向国民党省党部、西救、学联等发出快邮代电,提出为调解省党部与各救亡团体之间的磨擦,双方应停止争论。依据国民政府扶植民众运动的原则,省党部应允许西救、学联各团体全体加入抗敌后援会,以求集中抗敌力量,统一救亡运动。同时建议改组省党部包办的抗敌后援会,吸收各界爱国人士及民众领袖参加,共商救国大计。

9月6日 根据国共谈判口头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简称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张国焘(副主席)、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高岗为边区政府主席团委员。边区政府首府延安,下辖陕西、宁夏、甘肃的23个县

(市),面积 13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150 万。

9 月初 八路军一二〇师将在富平、耀县等地建立的党组织关系移交中共陕西省委。

9 月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延安成立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和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参谋长曹里怀,政治部主任莫文骅。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高岗,副司令周兴,参谋长谭希林。12 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改称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后方留守处的名义对外仍保留)。下辖 1 个旅部、11 个团和由地方武装改编的保安部队。

同月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建立中共汉中工作委员会,书记杨永昶。

同月 中共关中特委由中共陕西省委划归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领导。

同月 中共中央青年部部长冯文彬到泾阳县云阳镇,同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商定举办战时青年训练班。10 月 11 日,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在泾阳县斗口镇开学,主任冯文彬。11 月,训练班迁往云阳镇,1938 年 1 月又迁往安吴堡(简称“安吴青训班”),到 1940 年 5 月青训班迁回延安时,共举办 14 期,培训学员 1.2 万名。

秋 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驻合阳国民革命军一七七师中共组织负责人吕剑人派管建勋到澄城恢复党组织。

10 月 10 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表为开放民众救亡运动致信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揭露顽固派压制民众运动,呼吁给民众以抗战救国的自由。

10 月 12 日 共产党员李敷仁发起创办并主编的《老百姓》报在西安创刊发行。

10 月下旬 中共西安学委以西安学生分会、民先队西安队部为主,联合其他救亡团体,先后四次组织 65 个农村工作团,深入关中、陕南各县,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抗战形势以及救护、防空知识,号召人民参加抗战。

同月 中共关中特委书记习仲勋主持召开中共关中地区代表大会,将关中特区改称关中分区,关中特区苏维埃更名为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霍维德,下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四县。并选举成立了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书记习仲勋。隶属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领导,下辖分区四个县的县委及旬邑、淳化两个八路军办事处。关中特区司令部改为关中分区保安司

令部,属中共关中分委和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领导,司令员张仲良,政委习仲勋兼。

同月 中共三边特委成立,书记白如冰。11月改为三边分委。

11月初 在中共陕西省委和西安八办的支持下,西安广仁医院、同仁医院、培华中学的14名青年医生、护士和学生,在同仁医院院长罗锦文的带领下,组成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奔赴山西抗日前线,进行战地救护。

11月2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为全陕紧急动员保卫陕西通电》。

11月 中共陕西省委派地方科科长王柏栋从云阳镇返故里商县,组建中共商洛地区工作委员会,工委书记王柏栋。

12月7日 中共陕西省委就西安学生运动及抗敌后援会工作问题向西安党组织发出指示信,指出目前学生运动在反对分化破坏的斗争中,应加强团结。目前工作的中心是发动组织学生到工厂、农村去,开展民众运动,将救亡运动从单纯的学生运动转到工农民众中去。

12月13日 中共中央决定由林伯渠(主席)、张国焘(副主席)、习仲勋、徐特立、刘景范、马明方、高岗组成陕甘宁边区政府新的主席团。

12月17日 周恩来邀请中共陕西省委、西北青年救国会、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负责人及西安各青年团体代表在西安召开座谈会。周恩来发表关于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任务的讲演,号召各界统一意志,免除磨擦,集中力量,担负抗战救国的重任。

12月22日 中共陕西省委在云阳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贾拓夫作《关于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指出今后的工作方针是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民众救亡运动的领导,广泛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使其成为补充前方和开展游击战争的基础。此时全省党组织已发展到30个县,党员人数达1300多名。

1938年

1月5日 为加强国统区沿黄河西岸各县党组织的领导,中共陕西省委派吕剑人为巡视员,前往合阳、韩城等县,恢复和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月12日 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渭北工委在渭北各县加强城市工作,利用各种方法领导救亡团体。

1月21日 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刊物《西北》在西安公开出版发行,毛泽东题写刊名。主编李初梨。《西北》先为周刊,后不定期。从创刊到1940年4月停刊,共发行50期。

1月 西安学生分会及民先队部根据中共陕西省委、西安工委指示,组织70多个学生寒假农村工作团和流动宣传队,奔赴陕南、关中、沿黄河农村以至河南、山西战区进行救亡宣传,发展民先组织。

2月22日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下令解散西北青年救国会、民先队西安队部等13个救亡团体。23日,贾拓夫发表《关于解散西安十三个救亡团体》一文,驳斥国民党陕西当局的错误做法。

2月 中共陕西省委派军委干部王力随国民党陕西警备第一旅第三团(团长刘威诚,中共党员)到安康,领导该旅中共工作,并以发行报刊为掩护,在安康各学校开展建党活动。到10月,安康及各县有党支部六个,党员约110多名。

同月 中共陕西省委为加强陕南工作,决定改中共汉中工委为汉中特委,余洪远任书记。下辖勉县、洋县、城固、宁强等县委和南郑市委、西乡工委及西北联大支部。

同月 中共蒲城中心县委成立,书记刘拓。管辖蒲城、白水、大荔中共组织。

3月初 日军进逼潼关,占领风陵渡,炮击陕西河防阵地。8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布《保卫陕西宣言》,要求加强各抗日力量之间的团结,摒弃一切党派成见,在保卫陕西的神圣战斗中,真正团结起来,共赴国难。

3月初 民先全国总队部从临汾迁至西安。队部设在西安师范学校。

3月1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4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就发展组织问题向各级党委发出指示信,指出大量地发展党员在陕西十分迫切。要求在沿黄河、沿铁路各县大量吸收新党员,扩大党的组织。其它地方也应有计划地发展党的组织,在没有党组织的县或联保村镇、工厂、学校迅速建立组织。6月2日,贾拓夫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全陕西党员已发展到4000人。6月13日,中共陕西省委在四、五两月发展党员总结中称:两月发展党员2053名,在14个县新建了党的组织。

3月25日 西北青救会、西安学生分会、民先西安队部、西北青年文协联合在西安出版《青年战线》杂志,宣传青年统一战线、青年战时教育、国际青运经验,介绍陕西和各地青运动态和经验。

3月 中共陕西省委、西安学委以省妇女慰劳会名义发起组织西北青救会、平津同学会、西安抗协总会、东北救亡会等20余个救亡团体，先后赴沿黄河各县宣传抗日，动员民众保卫陕西、保卫西北。

同月 中共沿河特委(夏改为地委)在合阳成立，书记王俊。下辖韩城、澄城、合阳等县委。

4月4日至7日 民先全国总队部在西安师范召开陕西各地和甘肃天水等地民先代表参加的民先西北代表大会。民先全国总队部总队长李昌和丁浩川在会上作了关于形势与任务和民先斗争史的报告。为促进西北民先组织的发展壮大，成立了民先西北地方队部，队长李连璧。民先西北地方队部成立后，立即组建了中共民先西北地方队部党团，书记李连璧。

4月13日 由西安学生分会、民先西安队部牵头，西安六个救亡团体一起组织的前线慰劳队携带宣传品、慰劳品前往潼关、平民、合阳、朝邑、韩城、沿河一带慰问抗日部队。

4月中旬 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决定，中共西路工委改为中共西路特委，书记崔廷儒。下辖礼泉、乾县、永寿、麟游、扶风、武功、彬县、长武、咸阳、兴平等县党的组织。

4月 中共中央决定高岗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张邦英负责组织工作，王若飞负责宣传、统战工作。

同月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改为中共三原县委，书记周芝轩。直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

同月 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沈志民到渭南传达省委指示，决定撤销渭南工委，分别成立渭南、华县县委。渭南县委书记王杰(因王在边区学习暂由沈志民代理)，华县县委书记刘玉堂。

春 张德生回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中共西安市工委书记由惠子俊接替。

5月4日 民先全国总队部、民先西北队部、民先西安队部组织西安学生游行集会，纪念五四运动19周年。

5月17日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再次明令限期解散13个救亡团体。西青救、民先队等团体据理驳斥，要求省党部收回成命。26日，西北青年救国会负责人冯文彬就此事发表谈话，强烈反对国民党当局对进步的抗日救亡团体所采取的压制、打击、取缔的政策。下旬，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先后查抄民先全国总队部和西北民先队部办公室，又于5月31日和7月14日、22日先后逮捕

了于志远、蔺克义、何志诚、李连璧、陈宇等五名青年救亡团体负责人。中共西安组织动员各校学生向国民党省党部纷纷抗议,与当局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通过各种渠道,积极进行营救工作。6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欧阳钦发表《我们的意见》,指出省党部这种做法是破坏抗日团结,分裂抗战力量的行为,必须立即停止;释放被捕青年,给救亡团体以合法地位。11日,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等七家青年、文化团体联合发表《为陕西省党部重令解散十三民众团体拘押爱国青年快邮代电》,强烈谴责国民党当局破坏民主团结与抗日救亡的行径,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爱国青年,收回取缔13救亡团体的成命,积极领导民众运动,为争取中原抗占胜利而奋斗。

5月 中共洛川工委更名为洛川特委。宜君工委归属洛川特委领导。1939年秋,洛川特委由洛川迁驻宜君县店头,书记高克林。

6月初 中共陕西省委全体委员会议在云阳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党的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

6月 中共陕东南工作委员会在安康成立,书记王力。

7月中旬 由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共产党员周宝航与安吴青训班毕业的杜景返回商洛。9月初到商县武关(今属丹凤县)做民团团团长田兆丰的工作,后将民团改名社训队,由周宝航领导,共产党员负责军事训练。

7月25日 受国民党陕西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温良儒指示,商县地方武装买通匪首曹建勋,将中共商洛工委书记王柏栋枪杀于家中。

7月30日 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共产党宣侠父被国民党特务在西安绑架、杀害。

8月7日 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抗议国民党暂编五十五师一部袭击陕西淳化八路军保安队,侵占爷台山野猪嘴八路军防地。

8月12日 中共陕西省委在云阳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县级以上干部30多人参加,贾拓夫作《关于巩固团结、保卫陕西当前的迫切任务与工作的报告》。

8月下旬 中共西安职工委作出决定:新党员入党三个月内都要上党课,进行党内保守秘密、纪律及气节教育。

8月下旬 中共陕西省委派在省委党训班学习结束的彭一民回商洛,任中共商洛工委书记。

8月底 周恩来由武汉返延安途经西安,给西北行营主任程潜打电话,要

求立即释放爱国五青年。经过西安党组织发动群众营救和周恩来、林伯渠出面交涉,国民党陕西当局终于在9月4日释放了于志远、蔺克义、李连璧、陈宇、何志诚五人。

同月 中共汉中特委为加强对城固、汉中边区的领导,决定恢复组建中共南(郑)城(固)褒(城)边区区委,李文芳任书记,下辖九个支部。

同月 陕西国统区已有53个县建立了中共组织,许多大专院校、中小学校和工厂、铁路、邮电部门建立了支部或小组,全省有党员8000多人。

9月 中共西府地委在凤翔成立,书记吕剑人,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辖兴平、武功、扶风、眉县、岐山、凤翔、宝鸡、陇县、千阳、凤县,以及西北农学院、凤翔师范、东北竞存中学、西北工合宝鸡办事处及所属厂、站,眉县难童教养院、商业职业学校,马营一六一后方医院和虢镇吕正操办事处等单位、团体内的党组织或零散党员。

秋 由于国民党对抗日统一战线的破坏,西安形势开始逆转。中共陕西省委决定,省委及主要领导人回云阳省委机关办公(1938年上半年,省委全体成员在西安),欧阳钦、李初梨、惠子俊等省委委员留西安,由欧阳钦负责管理西安的各项工作。10月,中共西安工委根据省委指示,为保存革命力量,防止国民党当局的破坏,决定西安民先队、西安学生分会的活动与工作逐步转向半秘密状态。

秋 中共汉中特委在汉中市建立中共汉中学生工作委员会,徐士杰为书记。11月,中共汉中特委派董学源去西乡建立了中共西乡工作委员会,孙生贤为书记。

10月22日 在中共西安组织和共产党员的推动下,为支援前线抗日战士,西安各界展开募捐棉衣运动。

11月22日至12月21日 中共陕西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在云阳召开。贾拓夫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检查总结陕西党两年来的工作。会议补选阎揆要、李铁轮为省委委员。

11月 西安政治形势更趋恶化,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欧阳钦在西安八办召集惠子俊、张林、高贤开会,代表省委宣布撤销中共西安市工作委员会,重建中共西安市委委员会,市委书记惠子俊,组织部长兼西安职工委书记张林,宣传部长高贤。不久增加朱平负责青年工作。

同月 民先西北队部从西安迁往泾阳县安吴堡。西安民先队工作由朱

平负责。

12月初 陕西青年救国联合会成立,主任黄爱民。

12月初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建立中共安康地委,书记刘文彬。

12月27日 中共陕西省委青年工作委员会在云阳召开扩大会议,指出陕西青年的任务是组织广大无组织青年,争取三青团青年及动员全陕青年为保卫陕西、保卫西北而奋斗。会议根据中央《关于组织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决定》,将省委学生工作委员会改为省委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赵伯平(1939年2月由董学源接任),副书记陈煦。

12月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改组中共汉中特委为中共汉中地委,调余洪远回省委工作,省委委员李铁轮接任书记。

1939年

年初 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书记张闻天(兼),秘书长李维汉,受中央委托负责西北地区党的地下工作及少数民族工作。

1月17日至2月4日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是在延安举行,选举高岗为参议会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

同月 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青年委员会的决定,在泾阳县安吴堡成立陕西青年团体联合会办事处,主任宋继唐(夏,李连璧任主任),支部书记李连璧。

同月 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甘肃陇南临时工委建立,辖甘谷县委及部分学校党组织,书记董振国。

同月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发展组织的补充通知》,进一步提出在发展中巩固提高党的组织。

2月2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大会发动生产运动。

2月7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改为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机关报。

2月20日 贾拓夫向张闻天报告中共陕西省委统战工作情况,指出在国共关系未恶化前,共产党员可以秘密加入国民党,以取得掩护。

2月 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国民党第三十八军中共工作委员会在山

西平陆建立,书记蒙定军(后由范明接任)。

同月 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建立马列主义研究社。下分甲、乙、丙三组,甲组学习联共(布)党史,乙组学习党的建设,丙组学习文化课及《论共产党》。每组设有特派员,由省委常委辅导学习。

3月 中共陕西省委妇女工作委员会在云阳召开会议,决定进一步唤起妇女参加抗日工作。

4月3日 中共陕西省委在云阳召开组织部长联席会议。针对国民党“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政策,张德生作《陕西党组织工作当前的紧急任务》报告和《加倍努力为巩固扩大我党而斗争》的总结。

4月1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建立发行部及改进发行工作的通知》。

5月5日 中共陕西省委在云阳召开会体委员会会议,提出党组织“以巩固为主,但并不放弃发展”的方针。

5月14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加强宣传工作的通知,要求从地委到支部建立宣传部门。

5月下旬 贾拓夫调往陕甘宁边区党委工作,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由欧阳钦接任。

6月 中共陇海铁路管理局委员会(简称中共西安铁路委)建立,书记朱子彤。

夏 中共陕西省委改青年委员会为青年部,部长董学源。

夏 中共陕西省委军事部派李骥生到商洛,以鄂豫陕抗日联军名义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

7月7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克服国民党的投降反共逆流,争取时局好转而斗争。24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拥护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的决定》。

7月10日 抗大由延安迁往晋冀豫边区。抗大在陕北三年多,共培养学员15621名。

8月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9月,中共陕西省委接到文件后,立即在省委干部研究班传达。西安市党组织根据这一决定精

神,将工作重点开始逐步转入整顿、巩固党的组织,在巩固中发展党的组织。

同月 中共陕西省委在云阳召开扩大会议,选举贾拓夫、欧阳钦、赵伯平、吕剑人、董学源、胡达明等为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上报中央待批。

9月 中共陕西省委为了进一步巩固党的组织,防止破坏,决定缩小目标,减少领导层次,撤销西路、沿河、西府地(特)委,实行特派员负责制,崔廷儒、严克伦为西路正、副特派员;吕剑人为西府特派员;并决定将岐山县委改为岐山中心县委,书记王宏谟。10月下旬,省委撤销中共西安市委员会,改为中共西安市工作委员会,书记王俊。

同月 中共礼泉中心县委建立,书记张思明。三原县委改为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周芝轩。

同月 中共陕西省委派联络员杨信向中共和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工委传达省委指示:党的组织形式除教导队学生支部外,一律由支部和小组改为单线联系,进入秘密状态。一些高级干部党员分别由中央和省委直接领导。

10月31日 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开展党内教育运动的决定》。要求对党员进行党的性质、任务及国内形势的教育。

10月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在中共洋县县委的基础上建立中共洋县中心县委,由汉中工委书记江硇兼任书记。

11月13日至12月17日 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安塞举行。选举产生了新的边区党委,书记高岗,副书记王观澜。

11月 中共陕西省委在云阳召开全体委员及省委机关干部、特派员、县委负责人会议,学习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讨论当前形势与陕西党的任务。

12月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磨擦,陕西国统区形势进一步恶化,中央指示陕西省委机关从云阳迁往边区淳耀县安社镇。

冬 董必武在西安八办代表中共中央建立西安情报处(简称西情处),由王超北负责,归八办处长伍云甫直接领导。

1939年 中共陕西省委建立警卫连,连长李荣之。

同年 天水、甘谷、秦安等地中共组织停止活动后,中共陕西省委派刘玉堂前往天水等地开展工作,恢复组织。

1940年

1月2日 中共陕西省委在安社镇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加强党内教育,继续审查党员干部,开展反奸细斗争;健全秘密工作制度,改变党的领导方式。会后省委派干部到各地传达会议精神。

年初 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在耀县柳林镇设立“柳林民主客栈”,由关中保安处领导。1942年更名为“柳林联合客栈”,经理张仲平,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客栈对外以经商和招徕住客为名,其实质是接送南下北上的过往同志,搜集传递各种情报和做国统区的统战工作。

2月 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南、西、北三面部署军队,封锁边区。

3月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规定在政权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分子和中间派应各占1/3,实行“三三制”。

3月2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目前陕西青年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国民党顽固派打击摧残青运、欺骗青年的形势下,把争取青年、加强青年文化教育、坚持青年民主团结统一、巩固青年组织,在党的主张下抵抗顽固派的进攻,作为目前青运的中心任务。

同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保卫党的组织问题的紧急通知》。

3月25日 大众读物社主办的《边区群众报》在延安创刊。

3月 根据中共陕西省委通知,撤销中共商洛工委,建立中共商县县委,书记王连成。

4月 国民党预备第三师进攻陕甘宁边区,侵占了湫坡头、底庙两个区和武家堡、马家堡。

春 西安局势更加险恶,国民党特务到处搜捕共产党员,破坏中共组织。为了保存党的干部,中共陕西省委调一批地、县领导干部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5月13日 紫阳县县长带领保安队袭击芭蕉口小学,安康地委机关遭到破坏。

5月2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通知,将国统区已经暴露的党员、干部调回边区。

6月29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国民党区内学生工作的通告》,指出

青年学生运动的基本方针是“长期潜伏的发展,积蓄力量,争取人心”。并“积极谨慎隐密的设法在重要的大中学及地方教育界有地位的学校中建立短小精干的党支部”。

6月 中共宜君县工委书记王润民被捕自首,使党组织遭到破坏。

7月 根据中央指示,中共陕西省委机关迁驻耀县照金镇。

8月18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指出陕西党三年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在大量发展党组织工作中存在着不足。因此,要求陕西党必须严格执行荫蔽精干政策,加强与社会的广泛联系,以达到长期埋伏与积蓄力量的目的。

9月2日 中共陕西省委在照金镇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对陕西工作的决定。欧阳钦作《讨论中央对陕西工作决定的结论》报告。

9月 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以下简称:边区中央局)按照中央政治局9月11日会议决定,由边区党委改组成立。高岗为书记,谢觉哉为副书记,林伯渠、萧劲光、高自立、张邦英、王世泰、刘景范为常委。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社会部、边区党校、《大众读物》社。

10月25日 中共驻陕代表林伯渠奉命返回延安,董必武到西安接任此职。

11月19日 国民政府宣布停发八路军军饷(10月份实际也只发给一部分)。

11月 中共陕西省委下辖县委以上机关53个,区委80个,支部462个,党员5593人。

12月18日 中共陕西省委制定了《关于保卫党的组织条规》23条,将荫蔽精干政策进一步具体化。

12月30日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建成并首次播音。

1941年

1月9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组织根据具体情况,迅速将已暴露的党员、干部介绍到省委。至11月全省共调动170多人。到1942年以后,县级以上干部几乎全部调回边区。

1月上旬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陕西当局对中共陕西地下组织进行大搜捕、大破坏。中共西安职工委迅速采取措施,把一部分工人党员转移到外地

工作或让其回故里隐蔽。要求所有党员尽可能做到“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以利开展斗争。

1月 胡宗南等调集40万军队，从四面包围陕甘宁边区。

2月1日 中共陕西省委在照金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中央对陕西的指示。欧阳钦作《目前时局下的陕西工作》报告，提出党的组织必须从单一形式改变为复杂的多样的形式。党员必须做到社会化、职业化，广交朋友，必要时可参加国民党各级小组织。

2月18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防止国民党破坏组织的指示。强调坚决撤退暴露的党员、干部，立即销毁党内文件。并指出目前一切工作应以巩固党的组织为中心。

2月20日 中共陕西省委致电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阐述对保卫关中的意见，建议中央向关中分区增加一个团兵力，以防国民党军队进攻边区。

3月29日 中共陕西省委就国民党中央对国民党军赵寿山部限期调30余名干部到劳动营受训事致电毛泽东、张闻天并转中央书记处。4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中共陕西省委，让欧阳钦、张西鼎立即到延安面商国民党第三十八军问题。5月9日，再电陕西省委，指出三十八军仍应忍耐敷衍，避免决裂，“你们仍可与他通电”。

3月 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吴柏畅、王俊到西安、宝鸡等地，联系与管理部分单位的党组织，要求认真贯彻荫蔽精干的方针，利用一切机会打入国民党军、政内部，以保存党的力量。

4月16日 中央政治局决定将领导陕甘宁地下党（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之西北工作委员会与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

4月22日 中共中央决定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所辖之关中分委由陕西省委领导。7月10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决定将关中分委领导的边区以外党组织交陕西省委直接领导。

4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指示》。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由边区中央局颁布。

5月1日 中共陕西省委将调回边区的党员、干部50余人集中起来，建立干部训练队（简称干训队），主要学习政治、军事。

5月6日 中共中央决定中共陕西省委由常委欧阳钦（书记）、张德生（组织部长）、赵伯平（宣传部长）、汪锋（统战部长）、习仲勋（关中分委书记）及委

员文年生(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张中(秘书长)七人组成。

5月11日 中共陕西省委在照金召开委员会会议,欧阳钦作《新形势下陕西党的任务的结论》报告,指出日军集结兵力准备进攻陕西,国民党顽固派封锁陕甘宁边区,陕西形势非常严峻。因此,省委必须密切注视时局发展,团结陕西人民,为保卫西北而斗争。

5月12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目前支部工作的指示》。指出支部工作的方针是荫蔽精干,多交朋友,长期埋伏,以待时机;支部组织形式力求短小精干、形式多样;支部生活要灵活机动以保存力量,必要时可停止一切活动,埋伏待机;支部对党员实行异地领导,插花领导,领导关系减少到最低的程度。

5月13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成立西北中央局的通知》,任命高岗为西北局书记。西北局统一领导西北地区党的工作。先后下辖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地(分)委、三边地(分)委、神府分委、绥德地(分)委、延属地委、洛川工委、陇东分委,以及西北国统区的陕西省委、甘宁工委、绥宁工委、伊盟工委。1943年5月,晋绥分局也划归西北中央局领导。机关驻延安市。

5月 中共蒲城中心县委、白水县工委、渭南赤水农校党组织遭国民党当局破坏。

6月13日 中共陕西省委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陕西党的工作重心在国民党区域,鉴于“目前环境与工作日益复杂和严重,迫切需要人收集整个大后方的工作经验以加强对我们的领导;高岗对国统区工作缺乏经验,希望中央加强西北局领导”。并建议将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同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合并,以适应反磨擦斗争的需要。

6月 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召集欧阳钦、张德生、贾拓夫等人讨论陕西党的工作。陈云听取汇报后指出,在国民党反共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地下党只有坚持荫蔽精干的方针,方能生存和发展。

夏 欧阳钦调西北局工作。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由张德生接任。此时全省有党员4874名。

8月27日 关中分区警备司令部与政治部成立,文年生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

8月28日 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公、女大、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校长吴玉章。9月22日,延安大学举行开学典礼。

9月17日 国民党第四集团军少将高参、原《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兼总编、共产党员宋绮云在长安县蒲阳村被国民党军统特务秘密逮捕,1949年9月6日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遭杀害。

同月 中共陕西省委交通科在同官县冯家桥建立地下交通联络点。之后,中共关中地委交通员孙光明先后十多次经该点与陈炉、黄堡、同官等地党组织接头,建立起柳林—涝池—王堵村—冯家桥交通线。

11月6日至21日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举行。会议根据“三三制”原则,选举高岗为参议会会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

11月 中共陕西省委机关由照金迁往边区新正县马栏镇(后划归旬邑县)。

12月20日 西北局作出《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肯定两年来陕西党在执行中央新的策略、调查研究、精干荫蔽、巩固组织、审查党员等工作中做出了相当成绩,虽然党组织受到一些破坏,但保留了党的基础。要求陕西省委必须随机应变,在整顿和发展组织中以精干、短小、分散、多样、自然为原则;党员可以利用一切机会加入国民党、三青团及其小组织;有中上层社会职业的党员,一般不编入支部,单线联系;停止印发秘密文件,改用口头传达;继续审查党员,清洗不坚定分子。

12月 中共中央社会部西安情报处先后建立了西安、华阴、大荔、朝邑、澄城、延安交通线、站,负责传递情报。

1941年 中共陕西省委建立研究室,研究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情况,并承担与各地组织的联络任务。1942年1月,省委在西安设立调查站,吴柏畅任站长,专搞情报工作,并分管西安一部分地下党员。

1942年

1月15日 中共陕西省委在马栏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传达和讨论西北局《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会议认为执行中央荫蔽精干政策以来,陕西党组织不仅“保存了量”,而且“提高了质”。决定进一步贯彻荫蔽精干方针,彻底改变党的组织形式与领导方法。一般不发展党员,达到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目的。

2月1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报告。

12日,西北局宣传部发出指示,要求根据中央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有关决定、报告精神,在陕甘宁边区、中共陕西省委开始整风。

4月21日 西北局和边区总学委举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5月30日,西北局发出指示,对分区以下的各级学习计划、组织、方法等作了规定,要求各级党委把学习文件作为下半年最中心的任务。中共陕西省委将在国统区工作的有关人员集中在马栏进行整风学习。

4月7日 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常委及各部、站、室职能暂行条例。

5月1日 经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

5月13日 中共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决定》。任命贺龙为司令员,关向应为政委(高岗代理)。司令部设在延安。同时中央任命王世泰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员,吕振球为政委。

8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陕甘宁边区工作方针的决定》。

8月15日 西北局向陕甘宁边区各级党委发出《关于贯彻精兵简政的决定》。

10月2日 中共商县县委书记王连成和县委委员巩德胜在洛南县蔡川(今属丹凤县)被捕,翌年6月26日,在商县城外就义。

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 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地方县以上、部队团以上的党内负责干部300多人出席,中央高级学习组和中央党校的大部分领导干部到会旁听。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讲了话。会议解决了三个重大问题:(1)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2)检讨了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主要偏向;(3)明确了发展生产、教育是边区党今后的基本任务,而又以生产为第一。

10月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副书记肖江洪和中共西阳区委书记周新轩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12月12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对1935年九十月间所进行的错误肃反,作了全面的复查和平反。

12月 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先后开始了审查干部工作。

同月 毛泽东在延安听取国民党第三十八军中共工作委员会负责人郝克勇(范明)汇报后,对三十八军工作作了全面指示,指出三十八军党的统战

工作是地下党的典范,并决定工委由中央直接领导。

同月 根据中央精兵简政的精神,西北局决定中共陕西省委与中共关中分委合并,建立中共关中地委,张德生任书记。关中地委统一领导关中分区和陕西国统区党的工作。1943年1月地委正式成立,机关驻地马栏。

1943年

3月 国民党彬洛区民众组训指挥部指挥官梁干桥坐阵耀县,四处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雷醒民、杨增贤等共产党员先后被捕。中共关中地委指示耀县县委暂时停止活动。

4月3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

5月7日 西北局发出关于整风学习问题的指示。

6月 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到处宣传“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18日,胡宗南调动驻守河防的一部分军队和原封锁边区的十多个师进驻洛川、宜君、耀县、三原、旬邑、淳化、彬县、平凉、固原等地,企图进攻边区。7月5日,中共关中地委作出《关于反对顽固分子进攻边区的紧急决定》,号召关中党政军民立即行动起来,打败顽固分子的进攻,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

同月 国民党西安警备司令部派出百余名军警突然包围西安八办,强行没收电台。

7月15日 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造成许多冤假错案。30日毛泽东指示停止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

7月23日 中共关中地委发出《关于战时宣传鼓动工作的指示》。提出宣传工作的总方针是在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内战的原则下,揭穿反共顽固分子制造内战的阴谋。

10月10日 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及路线。

10月 中共麟游县委负责人王乐天被捕,县委遭破坏。

12月7日 西北局决定关中地区成立友军工作核心领导小组,由张德生、汪锋、文年生3人组成。

12月8日至9日 礼泉县中共党员23人和群众25人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12月25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命令,将原绥西办事处自1944年1月1日起改为子洲县。

12月 国民党第四集团军高级参议、共产党员许权中在眉县横渠镇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是年 中共关中地委建立调查站,站长由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吕剑人兼任。

是年 驻守旬邑的国民党陕西保安第六团第三大队队长董策成不满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与中共关中地委建立统战关系,第三大队的防线成为向边区运送物资、接送干部和青年学生的一条地下交通线。

1944年

1月24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春,中共关中地委按照中央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给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蒙冤者甄别平反。秋,地委陆续派干部到各地恢复和地下党的联系,逐步建立党的组织机构。

1月 中共关中地委将商洛和临潼地下党在边区的人员组织起来,成立干部训练队,队长谈国帆,副队长巩德芳,支部书记王杰。

同月 为适应整风需要,中共中央将西北党校一、三区改为中央党校五部,二区改为中央党校六部。

3月24日 西北局通过《关于1943年工作基本总结及1944年工作基本方针的决定》,具体规定了1944年边区工作的六项基本方针。

5月21日 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举行。

6月18日 中共关中地委开始派干部到国统区恢复各县被破坏或中断联系的党组织。至8月10日,共派干部13人,到韩城、澄城、临潼、渭南、华县、华阴、三原、富平、麟游等地,与县委、区委和党员27人取得联系。

8月10日 中共关中地委在《关于陕西地下党被破坏与现存组织统计表》中提到:自1939年以来,全省被国民党当局破坏的县委机关13个,区委机关11个,被捕党员105名,现有县委机关7个。

8月 中共关中地委统战部成立调查研究室,主任王俊。研究室编印《陕情汇报》,向中央及地委提供国统区的有关情况。

9月30日 中共关中地委统战部召开各县统战部长联席会议。要求各地做好国统区的工作,积蓄力量,应付日寇的进攻。

12月4日至19日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在延安举行。

12月 中共关中地委指示在陕甘宁边区学习的共产党员李世华等返回

商县,建立麻街地下交通站。

下半年 根据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指示,由梁布鲁负责,建立了一条由西安经同官通往边区的地下交通线:西安—富平曹村—同官—边区交界处,并在三原坡子堡建立了据点。

1945年

1月5日至9日 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检查领导作风。

1月26日 西北局指示各地委,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仍然是荫蔽精干,以待时机。在没有组织的地方,应慎重地发展党员,已有组织的地方停止发展。

2月 中共关中地委先后派联络员王军、韩夏存到西安与王维祺建立组织联系。

3月 国民党驻淳化第五分区指挥部指挥官梁干桥趁驻守淳化蒙家村一带的关中警一旅三团大部外出开荒之机,以四个中队的兵力向十里原、蒙家村一带进犯。留守人员英勇抗击,击溃了梁部。

4月21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预备会议。23日,七大正式开幕。

4月 中共关中地委领导的进步组织西北民主青年社在西安成立。1948年由于国民党的镇压破坏,民青社被迫停止活动。民青社五人领导小组为李敷仁、武伯纶、王维祺、张光远、郑竹逸。

5月10日 国民党陕西省社会服务处强行霸占西安八办领导的秘密联络站“百乐饭店”。

5月 国民党第三十八军部分中共党员和赵伯经率领的宝鸡地区一些党员进入马栏,中共关中地委将其与干训队合编在一起,组成关中地委教导团,团长赵伯经,副团长谈国帆,政治委员秋宏。

6月23日 西北局发出《关于学习七大文件的指示》。

6月26日 西北局在延安举行高级干部历史座谈会。

7月21日 国民党军队突然分兵三路向陕甘宁边区大举进犯。22日炮轰爷台山,驻地八路军和地方武装扼守爷台山主峰阵地,展开保卫战。

8月15日 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以及日本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

9月26日 西北局办公厅发出通知,指出,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高岗、林伯渠、贺龙、谭政、马文瑞、贾拓夫、王世泰七人为西北局常委。

9月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关中地委随即派地委调查研究科副科长唐磊(韩夏存)为中共关中地委联络员,秘密到西安了解和联络长期隐蔽埋伏、分散在西安各系统的中共组织和党员,唤醒处在“睡眠状态”的中共地下党员,开展党的工作。

10月10日 国共双方代表在重庆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次日毛泽东等乘飞机回到延安。

10月25日 国民党军十一旅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中共三边地委帮助下举行起义,解放了安边城,并成立了安边县人民政府。

10月 中共关中地委根据时局发展的需要,派关中分区教导团区队长巩德芳率刘兆英等由马栏返回商洛,建立和发展武装,创建“隐蔽根据地”。

同月 中共关中地委派刘邦显、王平凡、张万照等到华阴县,恢复和发展中共组织。

同月 西北局统战部从西北党校学员中选调原三十八军中共地下党员伍力、高秦生等人奔赴汉中,负责领导三十八军系统在汉中的中共组织。11月,决定建立中共汉中工委,书记伍力,副书记高秦生。工委隶属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领导,机关设在洋县江坝啣唔峰小学。

同月 在中共中宜工委基础上组建了中共雁门工委,薛志仁任书记。

11月6日至9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延安及陕甘宁边区面临的严峻形势,通过了保卫延安的决定。

11月11日 中共中央召开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干部动员大会。

11月17日 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边区。

12月下旬 为了进一步加强保卫延安工作,西北局决定由杨尚昆、李克农、马文瑞、阎揆要等组成延安卫戍委员会,阎揆要任司令员。主要任务是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机关的安全。

1946年

1月20日 西北局发出《关于加强各县通讯工作的通知》。

1月 为了进一步恢复和加强陕西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做好统一战

线工作,西北局决定成立中共陕西省工作委员会,工委机关驻地旬邑县马栏镇,汪锋任书记。

同月 在韩夏存、张光庭的领导和组织下,中共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支部委员会成立。

2月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介绍并肯定了政治协商会议及重大成果。同日,延安市各界两万群众集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闭幕,朱德总司令在讲话中指出:“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使我们的国家从此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

2月 中共蒲澄工委在澄城县赵庄镇成立,隶属中共陕西省工作委员会领导,张军任书记。中共蒲澄工委领导蒲城、澄城两县党组织和游击队,发展党员100余名。

3月20日 国民党特务逮捕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杜斌丞。

4月19日 西安印刷业工人因物价暴涨,要求追加工资宣布罢工。

5月1日 《老百姓报》、《农村周刊》和《民众导报》的创办人,民盟西北总支部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共党员李敷仁,在西安街头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拉至咸阳塬上枪杀,幸未致死,被群众秘密救出。同年7月中旬,李敷仁安全到达延安。

同日 西安《秦风·工商联合版》报馆被国民党特务捣毁(5月3日报纸被迫停刊)。

5月13日 经中共陕西省工委批准,中共商洛工委在商县两岔口成立,书记王力。

5月28日 中共陕西省工委派韩斌、刘彭勃、王仁平等去商洛,向王力、巩德芳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准备接应中原解放军突围部队,在商洛建立根据地的指示。

5月上旬 陕南游击队指挥部在商县留仙坪镇(今属丹凤县)成立,巩德芳任指挥,王力任政委,薛兴军任副指挥。

6月 西北局发出《关于紧急动员,准备战争,保卫边区的指示》。并将中共洛川工委改为中共黄龙特委,归西北局领导。

同月 中共关中地委发出《关于加强民兵工作的决定》。指出国民党反动派正在积极准备大规模的内战,关中地区随时有被敌人进攻的可能。因此,巩固、发展与提高民兵的组织和战斗力则成为我们当前的迫切任务。《决

定》要求在分区司令部设武装科,专管民兵工作。各县设立民兵大队部,各区设自卫营,乡设自卫连,平时搞好生产建设,战时消灭国民党清乡队,抓捕特务、暗探,清除内奸,努力成为保卫关中,坚持武装斗争的生力军。

7月中旬 西北局和中共陕西省工委遵照中央指示,陆续派出刘庚、秋宏、陈效真等近300名干部,先后进入商洛地区,准备接应中原人民解放军北路突围部队。

7月15日 李先念等率领的中原北路突围部队,连续冲破国民党军队四道封锁线后,全部渡过丹江,进至浙川以西的梅家铺。中共中央军委就陕南敌情和陕南游击队情况向郑位三、李先念、王震发出通报。

7月23日 中共中央中原局在商南县白鲁础召开会议,决定创建豫鄂陕根据地。

7月29日 李先念在龙驹寨西南油房村(今属丹凤县)会见了中共商洛工委书记兼陕南游击队政委王力,“商讨此地工作及行动问题”。

7月 根据西北局决定,将洛川工委改为中共黄龙山区工作委员会,书记杨西林。

同月 为迎接中原突围部队入陕,建立秦岭山区根据地,中共陕西省工作委员会根据中央指示,组建了中共长柞工委,尤超任书记,李浩为副书记。

同月 中共陕西省工委统战部部长吕剑人到赤水县(今淳化),组织建立了中共礼泉县工委和礼泉游击队,张思明任书记兼游击队政委。

8月2日 李先念率中原突围部队在留仙坪镇(今属丹凤县)与陕南游击队会师。决定将部队合编,创建豫鄂陕根据地。

8月3日 中共豫鄂陕边区三地委(山郧地委)在山阳县中村成立,方正平、王力先后任书记。

8月4日 中共豫鄂陕边区二地委(商洛地委)在今丹凤县留仙坪成立,书记刘庚。

8月6日 中共中央电复中原局,表示同意成立豫鄂陕军区,王震为司令员兼政委及区委书记,汪锋为副书记兼副政委,任质斌为第二副书记兼副政委,周志坚为副司令员。

8月8日 中共豫鄂陕边区一地委(镇柞地委)在镇安县七里峡街建立,张树才、萧元礼先后任书记。

8月15日 国民党陕西省保安六团三大队在大队长董策成率领下于旬

邑起义,投奔陕甘宁边区。

8月17日 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汪锋奉中共中央指示,由旬邑县马栏镇前往豫鄂陕根据地。赵伯平接任省工委书记。

8月28日 中央同意李先念关于豫鄂陕边区领导干部配备问题的提议,批示:汪锋为书记兼政委,文建武为司令员,调陈先瑞为副司令员,方正平为副政委,张树才为主任,魏国运为参谋长。

8月30日 中共商山蓝镇柞中心县委在商县杨家斜小学成立,书记曾焜,副书记徐达三。

同日 中共镇柞工委在镇安县大坪成立,书记黄德钦。中共郧商县委、县政府在商南县赵川马家坪成立,县委书记兼县长陆诚。

8月31日 国民党一战区司令部发出限期撤销西安八办的命令。朱德总司令电令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撤回延安。9月11日晚,军调小组成员、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处长周子健率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20多人离开西安七贤庄,返回延安。

8月 中共陕西省工委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中共西府工委和西府游击支队,赵伯经任书记及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严克伦任副书记,刘懋功任副司令员。

同月 中共三原县工委成立,书记陈元方。

9月13日 西北局发出《关于改选各级党委的决定》。

9月22日 豫鄂陕军区成立,司令员文建武,政委汪锋。

9月24日 豫鄂陕边区党委成立,书记汪锋。

9月 中共平朝工委在朝邑县下鲁坡村成立,书记韩增友。

9月下旬 中共豫鄂陕边区五地委(柞宁地委)在柞水县营盘成立,书记汤成功。同时,豫鄂陕军区决定,以宁陕县东江口为中心建立豫鄂陕军区第五分区,司令员王海山,政委汤成功。

9月 中共泾(阳)(三)原工委在耀县寺坡村成立,书记张中涛。

同月 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党校五部改为西北党校,隶属西北局领导。

同月 中共咸阳工委成立,书记陈吾愚。

同月 中共陕西省工委派干部建立了富同游击队一、二支队,惠璋杰、许天洁分别任队长。

同月 中共长柞工委发动寨沟起义,建立长柞游击队,队长李志中。

10月1日 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三个月总结》中,对中原突围后创建的豫鄂陕根据地给予高度评价。

10月2日 中共陕西省工委将关中国统区划分为周户眉、大华潼、朝邑、三原、合阳、蒲城、澄县等七个战略区。

10月 中共陕西省工委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建党工作要以发展为主,恢复为辅,应放手而审慎地进行发展工作”。

同月 中共陕西省工委决定将中共蒲澄工委改为中共蒲白工委,书记张军。

同月 中共蒲白工委将两支与国民党政府相对抗的地方武装改编为西北民主联军第六总队,司令员王振邦,政委张军。

同月 中共富(平)同(官)工委成立,书记雷振东。

同月 根据中共陕西省工委决定,中共东府工委成立,书记苏史青。

10月13日 胡景铎等率横山驻军二十二军八十六师新编十一旅部分部队及榆林保安指挥部保安九团 5000 多人起义,通电反对蒋介石。

10月31日 根据西北局决定,中共榆横特别委员会在米脂成立,书记刘文蔚。

11月15日 中共豫鄂陕边区党委、豫鄂陕军区向各地委、军分区发出关于保卫陕甘宁边区、加速豫鄂陕边区根据地建设的指示。

12月6日 中共关中地委发出《关于战时群众工作指示》。

12月12日 中共豫鄂陕边区党委作出《关于游击队的发展与整理的决定》。

12月 中共关中地委发出《关于战时拥军劳军工作指示》。

同月 中共渭北工委和渭北游击总队在耀县寺坡村成立,工委书记谈国帆兼游击总队司令员及政委。

1947年

1月1日 中共中央与中原局发出关于坚持豫鄂陕游击战争的指示。

1月2日 国民党胡宗南部开始对同官、富平、蒲城、白水、澄城、宜君等县游击队展开“清剿”。

同日 西北局发出《关于积极备战,抗击蒋胡军进犯延安的指示》。

2月4日 中共豫鄂陕区党委在鲁山县瓦屋街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

陕南工委及指挥部,工委书记兼指挥部政委刘庚,司令员巩德芳。

2月7日 西北局电致各地委,要求分区、县级机关派出大批干部下乡领导土改运动。

2月13日 中共华(阴)潼(关)工作委员会成立,书记刘邦显(刘零)。

2月18日 国民党部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

2月28日 蒋介石借其空军副司令王叔铭飞抵西安,召集胡宗南等部署进攻延安。中共中央决定总部紧急疏散。

2月 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建立,司令员张宗逊,政委习仲勋。

同月 蒙定军选派国民党三十八军地下党员杨荫东打入国民党军西北联勤总部第七补给区司令部。在解放战争中杨荫东将胡宗南部的战役部署及时传递给陕西地下党领导机关和西北野战军。

3月7日 为了统一领导关中地区军事力量,以适应关中游击战争和国统区党的工作的开展,西北局决定将中共陕西省工委与中共关中地委合并成立新的关中地委,地委书记高锦纯(兼),第一副书记赵伯平。省工委所辖党组织及游击队均由关中地委领导。关中地委内设国统区工作委员会,书记赵伯平。

3月8日 延安各界万人举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

3月上旬 关中地委决定将蒲白工委与富同工委合并,组成中共路东工作委员会,书记张凤岐。

3月13日 国民党军胡宗南部、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部、榆林二十二军由南、西、北三面向延安进攻。

3月16日 中央军委决定,将所有陕甘宁边区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组成西北野战兵团,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番号。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副政委习仲勋,参谋长张文舟。

同日 中共关中地委发出《为准备反“清剿”给各县的紧急指示》。

3月18日 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主力主动撤离延安。19日,胡宗南部占领延安。

3月25日 西北野战兵团于延安东北青化砭地区设伏,全歼胡宗南部整编二十七师之三十一旅旅部和一个团,俘旅长李纪云,取得撤离延安后的第一个胜利。

3月26日 中共中央在清涧县枣林沟举行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前敌委员会,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同时,组成以刘少奇

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3月 中共陕西(陕鄂)边界工委成立,隶属中共关中地委领导,书记黄正甫。

4月初 中共豫陕工委(亦称商山工委)在卢氏县五里川成立,书记罗孟刚。

4月3日 关中分区警一旅三团在小塬子村全歼国民党整编第十师二四八团第三营。

4月14日 西北野战兵团于瓦窑堡西南羊马河,全歼国民党军整编十五师之一三五旅,生俘一三五旅代旅长麦宗禹。

5月2日至4日 西北野战兵团攻克蟠龙补给兵站,全歼守备之国民党整编第一师一六七旅旅部及一个团。旅长李昆岗、副旅长徐建、参谋长柳届春被俘。

5月3日 中共关中地委作出《关于扩兵决定》。

5月7日 西北局发出《关于敌占区(包括游击区)农村干部和党员的工作任务及活动方式的指示》。

5月19日 西北局发出《对目前敌占区工作和敌军工作的指示》,强调敌占区党的工作任务是宣传教育群众,分化、瓦解和打击敌人,摧毁敌伪保甲制度,配合解放区军民开展斗争。

5月22日 共产党员、国民党旬邑县自卫大队大队长马志超率守城武装起义,配合关中警一旅解放了旬邑县城。

6月1日 国民党陕西当局在西安各大专院校进行大搜捕,全市约200余名学生运动骨干和中共党员被捕。

6月17日 西北局发出《关于发展党员的决定》。

同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府总队成立,司令员赵伯经,政治委员吕剑人,副司令员张占云、董策丞。

6月21日 西北局发出《目前肃反斗争方针指示》。

6月23日 中共关中地委组织部发出《关于审查与培养干部问题的指示》。

6月下旬 中共关中地委决定中共路东工委与中共渭北工委合并,成立新的渭北工委,张凤岐任书记兼渭北总队政委。

6月 为了适应战争要求,边区后方各党政机关(中央机关、边区政府及延安各机关)进行精简整编。中共关中地委改组西府工委,组成新的西府工委,书记吕剑人。

7月6日 西北局发出《关于蒋管区我工作的指示(初稿)》。要求在国统区的边沿山区放手开展游击战争;在国统区之内地,应视条件成熟程度举行起义、部分起义或发展隐蔽武装。

7月10日 中共关中地委国统区工委向关中地委报告,关中国统区有党员 1821 人。

7月中旬 黄南游击总指挥部成立,苏史清任总指挥,王俊任政委。总指挥部统一领导东府地区游击战争。

7月21日至28日 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研究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阶段全国各解放区配合作战问题和解放区土改等问题。

7月31日 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简称西北野战军)。

8月6日 西北局决定成立榆林地委,书记张德生,副书记刘文蔚。同时建立了榆林军分区,司令员张达志。11月中旬,西北野战军停止攻打榆林,榆林地委、军分区自行撤销。1949年2月,榆林地委再次成立,书记刘长亮。

同日 蒋介石飞抵延安,召集胡宗南、裴昌会商议,部署救援榆林。

同日 西北野战军发起第一次进攻榆林战役,12日撤出战斗。此役毙俘敌 3600 人。

8月11日 西北局发出《关于整顿后方的决定》。决定后方各机关、部队迅即开展精简工作。后方医院、工厂、学校等及野战军家属暂移黄河以东,各分区来后方人员应陆续转回原地工作。

8月20日 西北野战军于米脂沙家店歼灭了胡宗南部整编三十六师之一二三旅全部及一六五旅大部,计 6000 余人。

9月1日 中共关中地委发出《目前关中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指出目前的任务是:进行反攻,恢复巩固老区,扩大东、西府新区,展开东、西府游击战争。

同日 前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将军,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内战政策,由上海辗转抵达陕甘宁边区,受到边区主席林伯渠的欢迎。

9月5日 中共关中地委发出《关于恢复山区建设坚持斗争的紧急指示》。

9月9日 中共关中地委发出《关于巩固与发展党的组织决定》。

9月16日 西北民主联军三十八军根据陈、谢兵团前委决定,抽调干部

组成中共陕南工委,书记刘庚。11月15日,陕南工委正式组建为豫陕鄂第二地委,书记王力。1948年6月,中共陕南区委成立后,改为陕南区二地委。

9月24日 西北野战军四纵包围白水县城,中共白水县工委负责人杨培才、田焕贵等遵照中共关中地委指示,率白水县保警队和预备队240余官兵起义,配合四纵占领了白水县城。

10月3日 西北野战军前委决定,建立黄龙行动委员会,王震任书记,王世泰任副书记,统一指挥二、四两个纵队的作战行动。

10月7日 中国民主同盟常委杜斌丞和11位共产党员在西安被国民党枪杀。

10月11日 西北野战军二纵队在韩城、韩宜、合阳游击队配合下攻克韩城县城。

同日 西北野战军一、三、六纵队攻占清涧县城,消灭国民党军整编七十六师师部及二十四旅,俘中将师长廖昂以下4300余人。12日,绥德国民党守军弃城而逃,西北野战军收复绥德。

10月21日 西北野战军二、四纵队攻占宜川。

10月25日 中共关中地委作出《关于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的决定》。

10月27日 中共关中地委成立奖惩委员会,杨伯伦为主任。

同日 西北野战军发起第二次进攻榆林战役。

11月26日 中共关中地委发出《关于分区县、区、乡各级党政机构精简整编意见》。

12月19日 中共关中地委发出《关于争取今冬明春全部完成老区半老区土改整党工作的指示》。

1948年

1月1日 中共豫陕鄂边区第四地委、第四专员公署、第四军分区在湖北郧西土门建立。地委书记李耀,公署专员张明,司令员刘金轩。

1月2日 西北局在绥德召开分区党政军和土改工作团党员干部会,传达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1月10日 西北局机关报《边区群众报》改名为《群众日报》。

1月13日 中共关中地委召开城市工作问题会议。

1月中旬 西北野战军第一次前委扩大会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毛泽东、周恩来等出席并做了重要讲话。任弼时在会上作了题为《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贺龙作了《关于后方动员与供应问题》的讲话。彭德怀作了《关于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的报告。

2月23日 西北野战军发起宜川战役，歼国民党军整编二十四旅。

2月25日 黄龙地委、专员公署、军分区成立。地委书记强自修，专员黑志德，司令员牛书申。

2月 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改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习仲勋(兼)。下辖晋绥军区及直属关中军分区(警备第一旅兼)、绥德军分区、延属军分区、三边军分区(新编第一旅兼)、陇东军分区、警备第三旅和骑兵第六师。

3月17日 中共关中地委发出《关于目前分区形势与任务的决定》及《关于地下支援工作给各工委的指示》。

3月23日 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从吴堡川口东渡黄河，进入山西。

4月1日 西北局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决定的指示》。

4月17日 西北野战军发动西府战役。

4月22日 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中共延属地委、延属专员公署、中共延安市委和延安市民主政府一起迁回延安。

4月23日 西北局指示，以原西府工委为基础，成立中共西府地方委员会，书记李景膺。同年6月，西府地委在马栏镇正式成立。

同日 西府各地相继解放，西府分区专员公署成立，专员杨伯伦。

4月26日 西北野战军攻克宝鸡，歼国民党军整编七十六师(第二次被歼)等部3000余人，俘师长徐保(因重伤翌日毙命)，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4月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决定在西府游击总队(1947年6月17日建立)的基础上，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府军分区，司令员赵伯经。

5月26日至6月1日 西北野战军前委在中部(今黄陵)以东的土基镇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春季攻势，特别是西府陇东战役的主要经验和教训。

6月7日 中原局决定，将豫鄂陕边区党委划分为豫西和陕南两个区党

委,同属中原局领导。汪锋任陕南区党委书记。

同日 陕南区行政主任公署成立,隶属中原人民政府领导,行署主任汪锋(兼)。

6月 中共西府地委书记李景膺在淳化枣林村召开西府战役总结会,宣布撤销中共乾永工委,分别成立中共乾县县委和中共永寿县县委。

夏 西北野战军继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方式整顿后,又于是年夏开展了以三评(评斗志、评智慧、评政策)为主的新式整军工作。

7月1日 西北局发出《关于在职干部学习的指示》。

7月5日 西北局决定重新成立中共东府工作委员会。9月初,东府工委在韩城中学成立,书记刘文蔚。1949年2月,改为东府地委。3月,更名为大荔地委。

7月10日 中共陕南区委书记汪锋在召开的党员干部会上作《关于陕南工作方针》报告时指出,目前陕南根据地有三类:(1)正规根据地;(2)游击根据地;(3)游击区。

7月19日至8月4日 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地委书记联席会议,全面总结边区半年多来的各项工作,并制定了《中共西北中央局执行中央1948年土改整党指示初步意见》。

8月8日 西北野战军发动澄合战役,歼灭国民党军整编三十六师(第二次被歼),收复合阳县城。8月10日,收复澄城县城。

8月 西北局决定恢复陕甘宁边区总工会。

9月12日 关中地委召开扩大会议,书记赵伯平作了《关于新区工作,整党领导等问题的总结报告》。

9月15日 西北局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

10月6日 在西北野战军前总与东府工委领导下,由共产党员刘仲锴、杨海潮、王彦亭率领的国民党朝邑县常备队及保警队等武装1000余人起义,朝邑县城解放。

10月12日 西北野战军发动荔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24600余人。

10月21日 西北局召开第三次学习汇报会。

10月 中共关中地委在马栏镇成立东路工作委员会,书记刘邦显。

11月10日 西北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发出《关于陕甘宁军区民兵工作的指示》。

11月15日 西北局发出《敌区工作会议通知》。

11月28日 西北野战军在蒲城永丰全歼国民党七十六军。

12月下旬 中共西安市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安工委)正式成立,书记韩夏存。

12月 中共关中地委决定撤销中共渭北工委。

同月 中原局电示,决定张邦英任陕南区党委第一书记、陕南军区第一政委,汪锋任第二书记、陕南军区第二政委;时逸之任陕南区行政主任公署主任。

1949年

1月5日 中共陕南区委根据中原局通知,将陕南区中共第二地委改为商洛地委。分区行政、军事机构也随之改名。

1月11日至23日 中共西北野战军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澄城武庄召开。彭德怀作《关于1948年的几个基本工作的总结和1949年的任务》的报告,习仲勋作《关于城市政策与工作》的报告,张德生作《关于地方工作》的报告。党代会通过了《总决议》。总决议要求全军指战员牢牢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为彻底消灭胡、马军队、解放大西北而奋勇前进。

1月18日 关中地委作出《关于青年工作的指示》。

1月26日 陕甘宁边区妇女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2月1日 西北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决定,自即日起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阎揆要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刘景范任后勤部司令员。

2月8日至17日 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常驻议员、边区政府委员和晋绥行署代表联席会议在延安举行。习仲勋被推举为代理参议会议长(原任议长高岗调赴东北解放区工作)。

2月26日 西北局常委会决定,成立接收西安准备委员会(简称西准会),着手研究接收西安的准备工作,主任贾拓夫。

2月 中央军委决定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改称西北军区,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

同月 根据中共中央规定,中共西北中央局改称为中共中央西北局。

3月9日 中共陕南区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建立中共安康地方委员会,安康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安康军分区。唐方雷为地委书记,王廷佐为专

员,谭友夫为军分区司令员。5月,安康地区党政军机构在郧县相继建立。

3月10日 中共关中地委发出《关于目前关中形势给各县的指示信》。要求各县党组织加强在接近敌区的地方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或歼灭小股敌匪,捕捉敌人散兵、侦探及奸细分子;宣传群众,做好坚壁清野工作,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同时,要求各地做好春耕、整党等各项工作。

3月11日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大会通过了《关于当前青年运动的基本任务和继续推进建团工作的决议》,选举成立了青年团陕北区委,书记王治周。

3月 西北局决定组建中共渭华地委,5月8日,任命白清江为书记。同时决定成立渭华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谢怀德。5月20日,西北局决定将渭华分区改称渭南分区,渭华地委、专署遂改称为渭南地委、渭南专署。

4月1日 商洛军分区所属部队发起高桥战斗。

4月4日 关中地委改为中共三原地方委员会,书记白治民。

4月16日 中共西安市工作委员会发布《关于接收西安的几点意见》。

4月19日 第一野战军前委在澄城以北的平城召开扩大会议,要求全军指战员积极练兵,准备解放全西北。

5月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命令,以陕南军区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九军(兼陕南军区),刘金轩军长兼司令员,张邦英任第一政委。

5月2日 陇海铁路局组成护路团,配合西安解放。

5月3日 第一野战军发起陕中战役。18日,解放咸阳。

5月5日 中共陕北区委员会在延安成立,书记李合邦,副书记李景膺。同时陕北区行政主任公署、陕北军区在延安王家坪成立,主任曹力如,代主任崔田夫,司令员先后为张达志(未到职)、吴岱峰。

5月8日 根据西北局决定,中共宝鸡地委和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书记吕剑人,行署专员张育民。

5月12日 中共陕南区委员会召开常委会议,研究部署解放全陕南的工作。

同日 西北局决定成立咸长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及中共咸长地委、咸长军分区。5月20日,改咸长分区为咸阳分区,咸长地委、咸长军分区也相应改为咸阳地委、咸阳军分区。地委书记张中,副书记张凤岐,专员吴志渊,分区司令员王宝珊。

5月18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组成,贺龙任主任,贾拓夫、赵寿山、甘泗淇任副主任。

同日 中共彬县地委、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军分区成立。地委书记杨伯伦,专员赵伯经,司令员赵伯经兼。

同日 胡宗南集团逃往汉中。

同日 咸阳解放。

5月20日 西安解放。

5月23日 国民党渭潼警备司令部司令武纬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于渭南起义。

5月25日 西安市人民政府成立,市长贾拓夫,第一副市长方仲如,党组书记贾拓夫,副书记方仲如。同时,西安警备司令部正式成立,司令员张经武,副司令员罗元发(后刘威诚),政委徐立清(后赵伯平)。次日,中共西安市委成立,书记贾拓夫,副书记赵伯平,隶属西北局领导。

5月29日 榆林国民党军二十二军代表与解放军代表达成榆林守军和平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协议。

6月1日 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率部起义,人民解放军进驻榆林城,榆林和平解放。

6月6日 中共陕南区委发出《关于新区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

6月8日 中共中央任命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20人为西北局委员,彭德怀为第一书记,贺龙为第二书记,习仲勋为第三书记。

6月14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迁入西安新城办公。

6月21日 中共西安市职工工作委员会在群众堂召开西安职工代表会议,讨论并成立了西安职工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主任朱子彤。7月,西北局任命赵伯平兼主任,朱子彤改任副主任。

6月24日 中共中央电令:原属中原局领导的陕南区党委改由西北局领导。

6月26日 西安市各界妇女代表76人集会,成立了西安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曹冠群,副主任胡景儒、李润琛。

6月 中共西安市委、中共中央西北局青委决定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安市工作委员会,任命韩夏存为负责人。机关驻西安青年路。

7月10日 第一野战军发动扶眉战役,全歼胡宗南集团主力一个兵团部四个军九个师共4.3万多人,收复武功到宝鸡间的八座县城与西府广大地区。

7月12日 解放军占领商县县城。

7月14日 宝鸡解放。7月16日,宝鸡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市长萧蓼(萧江洪)。

7月28日 西安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在西安市群众堂(今人民大厦地址)召开西安市各界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制定了西安市各界代表会组织章程,选举赵伯平为西安市各界代表会主席,马德涵、杨子廉、朱子彤、王竞秋为副主席。

7月下旬 中共陕北区委员会第一次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决定陕北行政区的两大任务是:(1)确定黄龙与榆林的土改方针,以及老区结束土改、整党、评定产量、颁发土地证、确定地权等工作的步骤与方法;(2)规划陕北区1950年经济文化建设方案。

7月 中共汉中地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建立,书记白成铭,专员毛凤翔。

8月4日 中共安康地委、安康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及安康军分区机关,进驻白河县裴家河。

9月4日 青年团中央决定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北区工作委员会,书记罗毅,副书记陈煦。

9月18日至20日 西安市各界代表第二次会议召开,主要议题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军管会文教委员会主任张稼夫、副市长方仲如等讲了话。会议还通过了中苏友协西安分会筹备委员会名单。

9月21日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在西安举行开学典礼。

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1949年

10月2日 西安市各界群众20万人举行盛大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习仲勋、刘景范、贾拓夫等党政领导在庆祝集会上讲话。

11月8日 中共西安市第一次代表会议在西安召开。

11月27日 安康解放。

11月3日 中央军委电令,第十九兵团兼陕西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第一

政委马明方,政委李志民。

12月2日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马明方为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

12月6日 汉中解放。17日汉中地区解放。

1950年

1月6日 中共中央批准中共陕西省委由马明方等17名委员组成。马明方任书记,张邦英任第一副书记,李合邦任第二副书记。马明方、张邦英、李合邦、杨得志、李志民、白治民为常委。2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宣布成立。省委机关驻西安市五岳庙街公字2号(现五岳庙门125号)。省委下辖陕北区党委、陕南区党委和大荔、渭南、三原、咸阳、彬县、宝鸡六个地委。

1月10日 陕西省人民政府成立,主席马明方,副主席张邦英、张凤翔、韩兆鹗。省政府下辖陕北、陕南两个行政公署及榆林、绥德、黄龙、汉中、安康、商洛、咸阳、彬县、三原、宝鸡、渭南、大荔等12个分区,3个县级市、96个县。

1月1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国民党在陕西的最后一个据点——镇坪县。至此陕西全境解放。

1月19日 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彭德怀任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任副主席。同时撤销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西安市军管会。

2月22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当前中心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贯彻下列工作任务和方针:除陕南巴山地区仍以剿匪为中心外,其他各地应把中心转到生产自救上来,以生产救灾为中心搞好各项工作。

2月23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报经中央同意重新调整中共陕西省省委委员。马明方任书记,张邦英、李合邦任副书记,马明方、张邦英、李合邦、杨得志、李志民、白治民、崔田夫、吴岱峰、杨伯伦、刘文蔚、时逸之、甘一飞、白清江、吕剑人、刘金轩、陈先瑞、李耀、李景膺为省委委员。

3月12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为动员春耕给全体党团员的指示信》。省委号召全省农村党团员“成为生产中的模范”,保证1950年农业生产计划顺利完成。

3月1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通报,转发《咸阳县春节开明绅士座谈会总结》。通报指出,咸阳县委利用春节,邀请开明绅士20多人座谈,宣传政策,征求意见,各地可采用此种方法。

3月1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纠正党政不分现象的通知》。

4月23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铲除各地烟苗(罌粟苗)的指示》。要求向人民群众宣传禁烟政策,说服群众,坚决铲除烟苗,改种禾苗。

4月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陕西省工作委员会成立。8月王治周任书记。

5月19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加强指导各级妇委工作,以迎接全省妇女代表大会召开。

5月22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陕中各县下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指示》。规定凡确已具备条件,而又有时间将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好的县市,均可于下届人民代表会议中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依照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原则,行使检查政府工作,选举县长、副县长、县政府委员等项职权。

5月28日 中共陕西省委致电陕南区党委,同意对安康商人“关门风波(商人因嫌税重,关门不营业)”的处理意见。指出:在商户复业时,要一面做好思想工作,一面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对幕后操纵的敌特分子,要严加惩处。

6月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贯彻西北局整顿干部作风的指示》,要求把对整顿干部作风的重点放在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方面。

6月26日至7月4日 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精神,讨论了整党、建党工作并制订了陕西省整党建党计划。决定从1951年下半年起,在三年时间内,对全省4162个党支部进行一次整顿,同时对97543名党员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

7月9日至1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对宣传工作的认识、党的思想工作、组织宣传队伍、宣传工作的经常化及健全宣传机构等问题。会议确定通过轮训和在职学习等办法,对全体党员进行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基本知识教育。

7月20日至30日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讨论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任务。省委书记马明方在会上作《关于陕西省土地改革和目前一般工作任务的报告》。

8月1日至7日 陕西省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选举李合邦任省农协主席,王振喜任副主席。

8月13日至23日 陕西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西安举行。会议

审议了马明方新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了陕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条例及协商委员会组织规程。会议选举马明方为省主席,张邦英、张凤翔、韩兆鹗为副主席。

8月25日 陕西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一届一次会议在西安举行,决定成立协商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及办事机构。马明方当选为主席。

9月6日至14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联席会议。会议确定今冬明春的中心工作任务是:除发展生产外,陕南以土地改革为主;关中以解决遗留问题与查田定产、颁发土地证为主,结合进行整党准备工作;陕北以整党和训练干部为主,结合进行生产救灾工作。马明方作《关中地区土地改革的总结和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工作任务》的报告。

9月1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剿匪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在九十两个月内必须抓紧时间,集中力量进行剿匪。强调发动群众,结合军事清剿,进行政治瓦解,以足够的兵力坚决消灭股匪,搜捕散匪的剿匪方针。

10月5日至11日 陕西省首届妇女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选举成立了陕西省民主妇联领导机构,曹冠群为主任。

10月1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加强合作事业的通知》。

11月4日 陕西省土地改革委员会成立,主任马明方。

11月13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贯彻清仓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组织力量,清查敌伪遗留或为我党政军缴获和寄存城市、农村的一切尚未得到清理之财产、物资。

12月5日 西北局和陕西省级机关抽调143名干部下乡参加土改工作。

12月2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结合土改整顿农村党组织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订出结合土改整顿农村党组织的方针、步骤、计划与办法;确定结合土改整顿农村党组织的具体内容;在土改完成后,可适当地发展党员。

1951年

1月29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指示,号召所有在职干部于本年二三月份内学习下列文件:《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论联合政府》、《组织起来》、《文化统一战线方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习仲勋在1951年元

且团拜会上的讲话,马明方《论土改中群众工作的两种立场和两套方法》等。

4月4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对太白山区剿匪的指示》。决定4月20日进剿,6月底完成任务。

4月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迎接“五一”大示威、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指示》,要求“五一”要组织800万群众参加城乡爱国大示威,深入进行抗美援朝宣传教育,以推动土改、镇反和抗美援朝等各项中心工作的开展。

5月1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建立与健全各级人民检察署的指示》。指示规定必须在1951年普遍成立各级人民检察署。

7月1日 西安5万人集会,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

8月10日 西安各界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在西安召开,确定抗美援朝的中心工作是:大力推行爱国公约,继续增产捐献,做好优抚工作,建立各级抗美援朝机构。

8月22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土改后继续培养乡村积极分子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要把培养积极分子的工作,列为经常的中心任务之一。

9月3日 中共中央来电,同意省委《关于整理党的基层组织和发展新党员的计划》。

9月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李连璧接任团省工委书记。

10月14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在公私合营厂矿中发动群众开展民主改革运动的指示》。

10月16日 中共陕西省委给西北局、中央财委呈报《关于申四、福五、宏文、建成、新渝等五厂愿与政府公私合营问题的报告》。10月31日,中央财委复电陕西省委,同意与申四等五厂公私合营。

10月25日 西安各界纪念志愿军出国作战一周年,提前完成捐献飞机10架的计划,捐款总额达170多亿元。

12月2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省级各机关党员干部整风动员大会,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三反”斗争的指示》,省委组织部长作了《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整风运动》的报告。会后,省级机关即开始“三反”整风运动。

12月31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成立陕西省转业建设委员会,马明方任主任。

1952年

2月1日至4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关中地委书记、专员及长安县委书记会议,总结第一期查田定产工作;检查“三反”斗争;确定上半年关中地区几项重要工作。

2月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加强党对工商业联合会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正式成立工商联并健全组织,加强对工商界的领导。

2月20日至23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陕南地委书记联席会议,检查了陕南地区的土改工作和“三反”工作。

3月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完成1952年农业生产任务的决定》。提出1952年生产粮食82亿斤,皮棉229万担。

3月26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开展爱国丰产竞赛运动的宣传工作指示》。

4月1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加强保密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认真检查一次“三反”和“五反”运动中的保密工作。

6月2日至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会议总结了陕南土改及布置查田定产、“三反”、“五反”等工作。会议决定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通过了《老根据地十年建设方案》。

7月8日 “三反”、“五反”运动在陕西全省范围内宣告结束。

7月1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要求在1953年三四月间全部完成整党工作。

8月1日 中央军委命令,陕西军区改称为陕西省军区。司令员杨嘉瑞,第一政委马明方兼。

8月7日 据统计,陕西为抗美援朝捐献人民币322.2亿元,折合战斗机21架;西安市捐献人民币302.7亿元,折战斗机20架。

8月9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禁毒行动的指示》。决定于8月10日晚在宝鸡、南郑、渭南、潼关等地重点城市统一行动,将大毒品犯全部逮捕。

8月13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推行速成识字法的指示》。

8月25日至29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宣传员代表大会。省委书记马明方和省委宣传部长甘一飞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交流了经验,明确了

宣传任务,评选出 35 名模范宣传员和 3 个模范单位。

8月3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普遍深入地开展宗教改革工作的指示》。

9月13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抓紧开展秋季生产运动的指示》。

9月19日 中共陕西省委转发西北贸易部《关于进一步活跃市场与扩大物资交流的意见》。要求各地认真贯彻执行。

10月6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进一步改进报纸工作的指示》。要求进一步加强报纸的政治性、思想性、群众性和通俗性,正确地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对党委对报纸工作的领导。

10月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为保证完成典型县社会人口调查及试行普通民兵制,建立民兵基干团与基干民兵冬训工作的指导》。

10月16日 中共陕西省委批转宝鸡地委《关于加强物资交流与市场管理指示》。要求各地委切实注意改变以往城市经济工作中所存在的被动现象与初级市场的盲目混乱状态。

同日 潘自力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马明方调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任副主席。

11月5日至14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全省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白治民作了《陕西省互助合作运动的基本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

11月24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 12 月下旬在长安县进行宣传贯彻婚姻法试点。

12月20日至29日 中共陕西省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听取了潘自力《关于整党和建党和干部工作》的报告。

1953 年

1月5日至1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 1952 年 11 月西北局第二次互助合作会议精神。省委书记潘自力在总结报告中指出,1953 年的基本任务是: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大力领导工业农业,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开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1月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通知,决定成立省委农村工作部、陕西建筑工程公司;并抽调县委书记、县长 38 名,县以上干部 215 名到省上分配工作。

2月14日 陕西省人民广播电台建立,开始播音。

2月23日 中共陕西省委向西北局呈报《关于灾情的报告》。1952年陕西相继发生旱、虫、风、雪、霜、冻及雨、水等灾害,多数作物减产,全年平均收成可达七成。省委要求各地组织生产自救,稳渡春荒。

2月2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学习民族政策的指示》。要求各地干部认真落实民族政策,巩固民族团结。

3月5日 西北局报请中央同意,免去已调离陕西的马明方、张邦英、杨得志、李志民、白治民等13名省委委员,同时任命13名委员及常委。潘自力任省委书记,李合邦任副书记。潘自力、李合邦、赵寿山、杨嘉瑞、刘庚、时逸之、甘一飞任省委常委。

3月1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认真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斗争的指示》,同时成立办公室,具体指导和处理“三反”斗争中的问题。12日,省委书记潘自力在省级机关干部会议上,对具体实施省委指示作了重要讲话。

3月11日 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主任潘自力兼,副主任杨嘉瑞。

3月至5月 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派出工作组,分赴各地进行工商业调查。

4月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加强妇女工作领导的指示》。指出1953年妇女工作的任务与要求是:继续发动妇女积极参加爱国增产节约活动;大力宣传婚姻法;开展妇婴卫生、儿童保健工作;动员妇女参加各级人代会的选举工作,选拔培养妇女干部;健全各级妇联组织。

4月26日 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1953年—1954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精神,制定出中、高级干部学习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理论教育计划。计划对省级学习高级组进行整顿。整顿后的省级理论学习高级组有八个,以省委小组为核心组,潘自力担任核心小组组长。

4月2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陕西省党校开设文化班的计划》。提出一般干部由各地速成班和业余学校逐步提高文化外,200多名县委书记、县长以上干部分批送西北党校学习文化,800名区、县级干部在省党校开设的文化班进行学习。

4月28日 陕西省选举委员会成立,潘自力任主席。

5月4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陕西省第一届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选举张德立为团省委书记。

5月14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通知,白锋悟任省妇联主任,李晋昭任副主任。

5月16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加强检察工作的指示》,指出加强检察工作的首要问题是适当调配干部,健全检察机关。提出当前检察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党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

6月3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军区联合发出《关于建立各级人民武装委员会的几点指示》。要求地、县、区、乡建立人武会。

6月12日 西北局批转陕西省委《关于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存在问题的处理意见》。

6月18日 中共陕西省委向西北局上报《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报告》。

6月30日 陕西省第一次普查人口日。普查结果为:全省人口15881204人,其中城镇占11.4%,乡村占88.6%。

7月2日至4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三次宣传工作会议。会议确定贯彻宣传教育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要求加强党的领导,抓好学校、干部和支部教育工作。

7月4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张毅忱兼任省委职工委员会书记,吴沙浪任副书记。

7月28日至8月4日 中共陕西省委农村工作部召开试办农业合作社经验座谈会,讨论山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结合林业、牧业共同发展等问题,提出农业合作社的试办必须贯彻“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方针。

9月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整顿中、小学校,提高教学质量的指示》。

9月21日 陕西省级机关派大批干部深入基层,帮助各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9月2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目前集中全力做好财政经济工作的指示》。指示提出,增产节约、秋收秋种、粮食收购和供应工作是我省当前的中心任务。

10月28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会议,检查全省增产节约进展情况。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加强领导,重点督促检查,解决关键问题,推动运动深入开展。

11月1日至1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地委书记、县委书记联席会议,重点宣讲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党对解决粮食问题的方针政

策,结合陕西情况提出执行统购统销意见。

12月10日 中共陕西省委印发《农村整党工作总结》。从1951年冬至1953年9月,全省有农村支部3196个、党员76312人参加整党工作。这次整党对党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共产主义教育,纠正了部分党员的单干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审查了党员的政治历史情况,加强了支部工作与党在农村中的领导作用。

12月12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加强党委对军事工作领导的通知》。

1954年

1月9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目前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要求纠正强迫命令,做好统购入仓工作。

2月12日至24日 中共陕西省委第三次组织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潘自力作《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与总任务》的报告。

2月19日至3月3日 陕西省第二次纪律检查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指出当前纪检工作的任务是:加强检查财经部门和工矿企业部门及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中党员干部因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所发生的一切违犯党纪的行为。

3月15日至2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二次农业生产互助合作会议,研究当年推动整个互助合作运动的具体安排。

4月10日至22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和讨论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及西北局扩大会议精神以及高岗、饶漱石的问题。潘自力在会上作了《坚决贯彻党的四中全会决议,为增强党的团结而奋斗》的报告。

5月2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加强贫瘠山区工作的指示》,要求加强对山区工作的指导,逐步改变山区的落后面貌。

6月17日至27日 中共陕西省委农村工作部在西安召开手工业工作座谈会。

6月19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夏季粮食统购工作的指示》。提出1954年全省粮食统购指标为11亿斤。

同日 西安市改为省辖市,8月20日,正式并入陕西建制。

7月21日至31日 中共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大会选举

出中共陕西省第一届委员会,潘自力代表省委作工作报告。

8月2日 中共陕西省第一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潘自力为省委书记,李合邦为副书记,赵寿山、赵伯平、方仲如、时逸之、杨嘉瑞、刘庚、严克伦为常委。

8月5日至12日 陕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西安群众堂召开,会议审查并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和1953年度财政决算。会议选出马明方、潘自力、赵寿山等19人为陕西省出席全国人代会代表。

10月16日 中共陕西省委机关报《陕西日报》发刊。原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陕西省委机关报《群众日报》从即日起改为中共陕西省委机关报,并更名为《陕西日报》。

10月 经中共中央批准,张德生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赵伯平任第二书记,白治民任副书记,增补赵守一为常委。

11月22日 中共陕西省委第二次统战会议结束,研究了公私合营企业的整顿、提高问题。

11月15日至12月4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二次农业生产互助合作会议。会议指出,党必须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通过互助合作变小生产为大生产,变个体农民私有制为集体农民所有制,在集体化基础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会议确定新办2.1万个农业社。

12月26日 陕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西安群众堂召开。会议根据国家宪法规定,将省人民政府改称为陕西省人民委员会。会议选举赵寿山为省长,赵伯平、张凤翔等为副省长。

1955年

1月 经中共中央批准,方仲如、唐洪澄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魏怀礼、刘文蔚任常委。

2月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当前发展与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

2月25日至3月2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第一届委员会在西安召开,选举张德生为省政协主席,孙蔚如等七人为副主席。

3月9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部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

传达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会议研究了贯彻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具体措施。

3月10日至19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工矿党委书记会议。会议交流了工矿企业党的工作经验,研究了企业党组织的基本任务。

3月24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迅速全力转入领导春耕生产和做好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

5月20日至6月10日 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建国路省委机关俱乐部召开了中国共产党陕西省代表会议。省委书记张德生代表省委作了题为《九个月来的基本情况和当前的几项重要工作》的报告。中共中央副秘书长马明方、省委第二书记赵伯平就高岗反党罪行和当前工作问题作了讲话。会议选举了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监察委员会。

6月28日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成立。第一书记张德生,第二书记赵伯平,书记处书记李合邦、方仲如、唐洪澄、白治民。

8月15日至23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会议。会议认为健全和加强支部的领导核心是做好支部工作的中心环节,而支部书记在支部工作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8月下旬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地委书记和直属县委书记会议,确定今后四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发展的计划。

9月16日至22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全省第一次区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检查总结全省农业合作化工作。讨论通过了全省合作化运动发展规划,研究了实施规划的方法、步骤。

10月20日 陕西省召开直属县(市)支部书记会议,传达中央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10月23日 陕西省第三次妇女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选举白锋悟为妇联主任。

10月24日 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抽调专、县、区级2万多名干部下乡协助建社工作。

12月1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成立省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领导小组,省委秘书长严克伦任组长。

12月12日至24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和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

化和农业生产的 17 条指示。

1956 年

1 月 24 日至 2 月 2 日 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陕西省工业会议。传达中央召开的省、市工业部长座谈会议精神,讨论部署了加快工业生产步伐问题。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作《坚决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充分发动职工群众,为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的讲话。

1 月 25 日 中共陕西省委资改领导小组发出《合营合作与生产经营两不误的指示》。

1 月 31 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电话会议,检查私营工商业改造工作。

2 月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地委书记和直属县委书记会议。根据中央提出的 1956 年至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制定了陕西省贯彻执行的具体方案。

3 月 26 日至 4 月 5 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四次组织工作会议。会议认为不仅要注意吸收工人和农业社社员中最先进最积极者入党,特别要注意接收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中最先进最积极者入党,并且应该注意在妇女中发展党员。

4 月 17 日 中共陕西省委农村工作部提出《关于在农业社推行包工包产包投资的意见》,提出这是提高农业生产劳动效率,贯彻生产责任制的好办法。

4 月 21 日至 30 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财政贸易工作会议。确定从 1956 年至 1957 年对全省财贸系统 80% 未受过专业训练的干部,分期分批,轮训一遍;进一步加紧党对财贸工作的领导;加强财贸部门党的政治工作和干部教育工作。

4 月 27 日至 5 月 6 日 中共陕西省委农村工作部召开专区、县(市)生产合作部长会议。张德生在会上讲话强调:“要搞好生产,必须抓紧整社”,“这次整社,可以集中力量解决包工包产问题”。

5 月 4 日至 13 日 陕西省第四次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提出今后统战工作任务是:普遍深入地对资产阶级分子、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加强统战工作,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5 月 5 日 张德生在西安作报告,传达毛泽东关于重工业和轻工业、农

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等十大关系的论述。

6月27日至7月5日 中共陕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陕西省第二届委员会；省委书记张德生代表省委作了题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提前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的工作报告。

7月7日 中共陕西省第二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本届常委、第一书记和书记处书记。张德生为第一书记，赵伯平、李合邦、方仲如、唐洪澄、白治民为书记处书记。

8月9日至16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农村宣传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力克服农村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作风。

8月2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全面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指示》。

9月13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全面检查提拔使用干部工作的通知》。

10月11日至13日 中共陕西省召开二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八大”会议精神和决议；讨论了农村工作问题。

10月16日至2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陕西省第二次区委书记会议。会议检查和批评了领导农村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确定年底以前全省基本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同时进行整社工作。

10月19日至3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全省工业、交通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在企业中加强党的领导、贯彻执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城市规划等问题。

11月3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陕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选举白纪年为团省委第一书记。

11月22日至23日 中共陕西省召开二届三次全体会议，传达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精神；研究了增产节约问题。

12月30日 中共陕西省委批转张德生《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一些问题向省委的报告》。指出，在扩社、并社、升级工作中，不少干部有急躁情绪，有的提出消灭空白村，不留单干户等等。省委要求各地对这些问题认真研究解决。

1957年

1月16日至23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基本建设工作会议,讨论部署1957年基本建设任务,研究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

1月27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对机关工作人员实行精简。省委机关精简人员占原编制的28.2%。

2月18日至26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五次宣传工作会议,讨论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的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

4月8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在西安视察。

4月16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省暨西安市机关干部大会,动员开展整风。后又多次召开座谈会,征求党外各界人士的意见。

4月22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在全省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4月29日至5月8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二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学习讨论了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制订了陕西省开展整风运动的计划和各级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暂行办法。

4月30日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贯彻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省委常委会议确定了在全省各级党的组织开展整风运动的初步方案。会议决定成立以第一书记张德生为首的省委整风运动领导小组。

5月16日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向省级机关和西安市4000名党员干部作整风动员报告。至此省市机关党组织正式开始整风运动。

5月17日 中共陕西省委邀请陕西省和西安市各民主党派组织负责人进行座谈,请他们帮助党开展整风运动。

5月18日 中共陕西省委邀请西安部分高校的教授和负责人进行座谈,动员他们帮助党开展整风运动。

5月2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地(市)县委组织部长会议。会议确定基本停止接收新党员,普遍开展整党,加强对预备党员的考察教育。

5月22日 中共陕西省委邀请西安文学艺术界党外人士郑伯奇、赵望

云、谢迈千、傅庚生进行座谈,征求他们对党在文学艺术工作方面的意见。

5月30日 中共陕西省委整风运动领导小组举行扩大会议,决定从6月1日起,在省、市机关和大专院校中,暂停整风文件的学习,集中开展批评运动。

6月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6月10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来陕西视察工作,并向省级机关负责同志做了国内形势问题的报告。

同日 中共陕西省委邀请剧作家和戏剧工作者进行座谈,征求他们对党在戏剧工作方面的意见。

6月17日 《陕西日报》发表题为《反动言论必须驳斥》的社论,号召反击右派分子对党的进攻。至此,陕西整风运动转入反右派斗争。

8月8日 中共陕西省委整风运动领导小组转发赵守一在地、县委书记和农村工作部长会上作的《关于在专区和县级单位开展整风运动的报告提纲》。

8月28日 中共陕西省委整风运动领导小组发出《关于中等学校、业余文化学校和小学进行整风的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所有中等学校、业余文化学校和小学的教员都必须参加整党。其步骤分为大鸣大放、反击右派、整改、思想总结等。

10月16日至23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二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讨论了整风运动和工农业建设问题,及召开第三次省党代表大会的问题。会议决定,动员5万干部深入农村,开展整风运动,兴修水利,并在省、地、县级机关下放6万名干部到基层和山区,加强农业第一线的领导力量。

11月15日至28日 中共陕西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西安举行。会议讨论了全民整风和农业生产问题,要求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和全民整风进行到底。省委书记赵伯平作了《为争取整风运动的全胜而奋斗》的报告。

1958年

1月3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原则通过了《陕西省1956

年到1967年农业建设规划(修正草案)》。

1月12日至2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了工矿企业党委书记会议,讨论了工业生产和工业建设面临的新问题,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会议要求争取厂矿企业整风的全面胜利,掀起大办地方工业运动,促进全省工业生产的大跃进。

1月18日 中共陕西省委整风运动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检查省级机关整改工作的进展情况。会议确定:在整改阶段,要把反浪费作为整改的一项重要内容。

1月25日 中共陕西省委对陕西省1958年的肃反工作作出规划并上报中央。文件指出,我省必须在今年内将肃反单位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坚决地、彻底地全部清理出来,搞深搞透。

2月3日至16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二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制定了六年达到纲要指标,三年改变全省面貌的规划。

2月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集省级各口和省级机关党委负责人会议,决定省、市机关集中力量,发动群众,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反浪费运动。

2月24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召开全省农业大跃进誓师广播大会。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赵伯平在大会上作了题为《胜利完成春季生产任务,给今年大丰收打好基础》的报告。大会号召鼓足干劲,向自然进军,实现农业生产大跃进。

2月27日 中共陕西省委就地方工业总产值五年内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制定出规划要点(草案),要求五年内地方工业总产值提高五倍;二五期间,新建和扩建中小企业8000多个,平均每天建4.5个厂矿。

3月1日 中共陕西省委整风运动领导小组举行会议,检查省、市机关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进展情况。会议要求各单位要放手发动群众,打掉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彻底改变机关面貌。

3月7日 中共陕西省委整风运动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要求迅速把省级机关和西安市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推向各行各业。

3月28日至4月1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二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地方工业和农村工作问题。会议要求广泛开展比指标、比措施、比干劲的运动。

4月10日 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干部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的决定。

4月11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建立中国科学院陕西省分院,院长:赵守一。

同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全委会议,选举赵守一、严克伦为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

4月12日 中共陕西省委全体会议通过《陕西省1958年至1962年发展地方工业规划要点》。要求大力发展地方工业,在5年内把地方工业总产值提高到45亿元以上,到1962年生铁产量达到50万吨,钢达到30万吨,钢材达到20万吨。

4月14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开展农具改革运动的指示》。

4月16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认真贯彻1958年水利和水土保持4项布局的通知。4项重点布局为100条中、小河流域治理;1000个蓄水2万方以上的中、小型水库;2500个水土保持重点社;3万条支毛沟的集中治理。

同日 省委发出关于追加1958年水利任务的通知,要求全省人均新增一亩水地。

4月中旬 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加强理论工作的指示》。指出:要在五年之内培养2000人的理论队伍,以充实各高等学校、各级党校、省市级主要理论刊物编辑部干部队伍。

4月 省委召开二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成都会议精神,并作出了《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

5月7日 中共陕西省委五人小组作出《关于甄别定案小组工作的若干问题的规定》。

5月12日至22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批判教育工作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和“教条主义”。

5月29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学习和宣传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示》。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一次群众性的宣传八届二中全会精神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运动。

6月14日 省委发出关于第二次追加1958年度水利任务的通知,要求本年扩灌面积达到2200万亩。

6月25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成立陕西省社会主义公学。

7月1日 中共陕西省委主办的理论刊物《思想战线》创刊。赵守一任主编。

7月23日 中共陕西省委批转省委组织部《关于1958年至1960年组织工作跃进规划》。指出,对那些领导生产不力,完不成大跃进指标的主要干

部,应当立即调整,对在大跃进中表现出色的优秀干部,应当适当提拔。

7月28日 王林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7月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地、县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央郑州会议精神。会议要求“必须反对新的保守思想”。

8月14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召开有500多万人参加的广播大会,副省长李启明在会上作了题为《全省人民立即行动起来,把我省文化革命推向新高潮》的报告。号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大闹技术革命。同时发布了《文教工作十二条奋斗目标》。

8月1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合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草案)》。指示提出:全省现有3.2万多个合作社,大体可并成1万个,每社平均600户;陕北、陕南并为7000多个社,每社200户上下。

8月2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地委、县委书记电话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迅速行动起来,苦战四个月,超额完成今年的钢铁生产任务。并要求在9月底建成4000座土炉、50座转炉和电炉。《陕西日报》为此发表了《有干劲就有钢铁》的社论。

同日 白治民在全省电话会议上部署创办人民公社意见,要求秋收前各县都要试办。

9月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指示,要求全省农村党、团员播种小麦“卫星田”,争取平均亩产5000斤以上,其中10万亩要达到万斤以上。

9月8日至1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二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会议要求全省干部和群众千方百计保证钢铁和粮棉双丰收,在九十两月内建炼铁炉2万个,发射钢铁生产“卫星”。

9月25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成立省委经济小组,协助省委处理工业、农业、财贸等方面的问题。方仲如任组长。1963年4月26日,经济小组撤销。

9月29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成立省原子能工作委员会,王林任主任。

9月30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委员会联合发出完成今年钢铁生产和冬季生产任务的通知。提出创造日产百吨社、县;大干一冬春,实现水利化。

10月3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全省钢铁生产和深翻土地问题。

10月5日 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在全省广播大会上作了《立即

掀起一个更大规模的钢铁生产的群众运动》的讲话。

11月1日 中共陕西省委批转省委组织部《关于结合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进行整党工作的安排意见》。

11月3日至9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全省财贸工作会议,讨论农副产品的收购、调运,公社化后改进农村财贸管理体制;加强党的领导,贯彻群众路线,开展红旗竞赛等问题。

11月12日 《陕西日报》报道,在全省741个公社已实行的“吃饭不要钱”为主的半供给制半工资制,其中68个公社实行包吃、包穿、包上学、包婚丧、养老、看病、看戏等基本生活需求的供给制。

11月22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大力开展小麦大面积“卫星田”运动的指示。指示提出,1958年下种的2300万亩麦田中,以20%即460万亩作为“卫星田”,其中:亩产1万斤以上的一级“卫星田”92万亩;亩产5000斤以上的二级“卫星田”380万亩,力争“卫星田”产量最少达到276亿斤。

同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立即开展今冬水利建设运动的通知。

11月24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召开全省农村积极分子广播大会。赵伯平在会上作了《掀起冬季农业生产高潮,全力争取明年更大丰收》的讲话。

11月27日 中共陕西省委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在全省开展整顿人民公社的意见安排。要求各地在12月至明年初,以四个月时间,对本地区所有人民公社生产建设、生产规划、分配状况、生活福利、经营管理进行一次全面的、深刻的检查和整顿。

12月8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召开祝捷大会,庆祝全省产钢1.8万吨,产铁32万吨。

12月13日 经国务院批准,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将全省101个市、县合并为52个县、市,以适应大跃进的形势。

12月19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从12月20日起,以四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以学习和宣传《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决议》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运动。

12月25日至29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二届十次全体会议。会议传达了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讨论了省委向省第二届党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工作报告。

12月30日 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在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向全省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作了《大力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广播讲话。

12月3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切实办好公社生活福利事业的具体规定。要求安排好社员的劳动和休息;办好公共食堂,办好托儿所、幼儿园和敬老院;逐步改善居住条件。

1959年

1月8日至3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部署1959年大跃进的任务。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作了《做思想战线的勇士》的报告;通过了《中共陕西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议》。会议强调继续反对保守,大力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1月13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发给职工1958年跃进奖金的通知》。奖金总额为1958年12月份(或11月份)一个月实支工资总额的1/2。

2月13日 中共陕西省委推广西安市灞桥区神鹿坊小学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经验。

3月9日 中共中央批准黄静波、杨拯民、彭康为中共陕西省委委员。

3月10日至2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全省六级干部会议,检查“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问题,制定了《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

3月25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委员会联合召开造林广播动员大会。会议要求在清明以前,突击完成春季造林900万亩,四旁植树2亿株,育苗50万亩的任务。

4月1日 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人民公社伙食供给制的补充规定(草案)》。

4月8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调整粮、棉、油计划指标的通知》。决定1959年全省粮食总产300亿斤,棉花500万担,油料总产3.3亿斤。

4月9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1959年至1960年度粮食征购任务的通知》,指出此年度的粮食征购任务仍定为28亿斤。

4月13日至1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二届十一次全体会议。省委第一

书记张德生传达了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精神并作了总结发言。

4月 中共中央第二中级党校与省委党校合并,改为中共陕西省委党校。

5月4日至20日 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陕西省机械工业六级干部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机械工业贯彻“全国一盘棋”的方针,确保完成国家六大设备的生产问题。

5月1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规定》。

6月21日至7月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市场问题会议,讨论了恢复发展日用工业品和城市副食品生产问题。

7月2日 省委批转赵守一给省委的报告。指出农村食堂要坚持自愿原则,不要勉强。

7月13日 政协陕西省二届一次会议在西安举行,选举张德生为省政协主席。

7月14日 陕西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在西安召开,选举赵伯平为省长。

7月2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工业、交通干部会议,研究解决全面加强企业管理工作问题。

8月2日 中共陕西省委主办的为期一个月的工农兵理论讲习会在省委党校开学。讲习会主要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

8月5日 中共陕西省委批转省委五人小组《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的总结》。指出,各级党委必须在肃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继续保持革命的警惕性,严密防止和及时打击反革命的破坏活动。

8月22日至9月1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二届第十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会议通过了《关于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决定》,号召反右倾,鼓干劲,大搞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

9月10日至2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县、社工业会议。要求继续贯彻执行“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服务、为支援大工业服务、为出口服务”的方针。

10月29日 陕西召开公共食堂工作会议,要求大办公共食堂,促进生产继续跃进。

11月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开展以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

育为纲的整社运动的指示》。要求对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势力”进行批判。

11月27日至12月8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多种经营问题会议,讨论并制定了1960年发展多种经营规划。

11月28日 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整顿人民公社中对处理若干经济问题的规定》。

11月28日至12月9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全省工业、计划会议。总结1959年以来大跃进的主要经验教训,安排了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

12月10日至2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全省农业书记会议。研究讨论了整社运动,及如何改变全省农业面貌等问题。省委书记处书记谢怀德在会上作了《树立雄心壮志,迅速改变全省农业面貌》的报告。

1960年

2月5日至22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二届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会议根据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精神,确定了《陕西1960年国民经济建设计划(草案)》的建议;制订了培养科学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的初步规划;通过了《关于开展十万红旗单位,百万名红旗手运动的决定》。

3月11日至16日 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现场会。

3月25日至4月3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全省五级干部会议。会议讨论了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人民公社,提前三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等问题。

3月26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执行〈陕西省一九六〇年奋斗目标二十五条〉的通知》。

4月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办好公共食堂的十项规定》,要加强领导,使食堂普遍化。

下旬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陕西视察。

5月25日至6月6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全省工业书记会议,传达中央工业书记会议精神,讨论如何进一步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等问题。

7月2日 中共陕西省委“三反”领导小组发出《必须把“三反”运动搞深搞透的通知》。规定了农村“三反”的验收标准。

7月25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当前粮食

工作方面几个问题的紧急通知》。

8月1日至31日 中共陕西省委在省委党校举办了“工农兵理论讲师讲习会”。

8月10日至14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钢铁生产工作会议。会议号召全省人民鼓足干劲,把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确保今年钢铁任务的超额完成。

8月21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召开农业生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大抓粮食生产。

9月2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在省级机关实行“三三制”领导方法的决定》。要求省级机关、西安市委和各地委机关,从4月份起,一律实行“三三制”领导方法。即:以1/3的干部下放到基层蹲点(其中一部分人进行劳动锻炼,一部分参加基层工作);以1/3的干部经常到基层检查工作;以1/3的干部留在机关办理日常业务。并规定一年轮换一次。至11月中旬,省级机关已有1389名干部深入基层进行劳动锻炼,加强基层工作。

10月4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撤销工业部、财贸部。

10月8日 中共陕西省委举行报告会。省委候补书记赵守一在会上作了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报告。

10月14日至22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了农村工作部长会议,检查了共产风,并决定进行整社试点。

10月29日至3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二届十四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了省委向第三届党代表大会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及有关会议的组织工作。

11月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安排群众生活的指示》。提出口粮坚决实行低标准,狠抓瓜菜代食品,进一步办好公共食堂。

同日 中共中央决定建立西北局,刘澜涛任第一书记。

11月8日至14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三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张德生代表上届省委在大会上作了题为《以农业为基础,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跃进》的工作报告。会议强调大办农业,同时检查了共产风。张德生当选为第一书记,严克伦、方仲如、张策、赵守一、赵伯平、李启明、谢怀德、杨拯民为书记处书记。大会选举出中共陕西省第三届委员会。

12月3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恢复农村集市贸易的指示,要求采取各种措施,活跃农村集市贸易。

1961年

1月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当前工作。认为陕西形势是好的,存在问题一是天灾,二是五风不正,三是反革命分子的复辟活动。要进行整风整社,把民主革命补课进行到底。

1月16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全省镇反、肃反会议总结,要求全省工作重点放在“民主革命不彻底”、当前问题较多的地区。

1月28日至2月6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三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张德生在会上作了《坚决贯彻九中全会精神,全力争取农业丰收》的报告。会议还讨论了整风、整社、农业生产等问题。

3月12日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会研究讨论了抢救和发展牲畜问题及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措施。提出大牲畜实行公养私养并举;自留地可增加到10%;开垦的荒地,暂不收归集体。

3月28日至4月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制定了《关于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件(草案)〉的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草稿)》和《农村人民公社调整方案》。

4月1日 中共陕西省委通知有关单位,西安市3月至6月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各机关学校单位均应准备在粮食一旦脱销时,把机关、学校搬出去办公、上课。

5月4日 中共陕西省委任命杨拯民为中共陕西省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

5月1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通知,章泽任省委书记处书记。

5月16日至2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工业政治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工业企业的整风问题和落实全年的生产计划,缩短生产战线等问题。

6月6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会议讨论分析了面临的粮食紧张和市场紧张等问题。张德生在会上作了报告。赵守一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存在的错误原因:一是没有按客观规律办事;二是缺乏调查研究,滋长了主观、片面、想当然作风;三是党内外民主生活不正常。

6月20日至7月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调查研究、群众路线和压缩城镇人口等问题。

7月22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坚决纠正无偿平调农民财物的错误。对

无偿平调农民的财物要彻底退赔。

7月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了精减职工和减少城市人口问题。计划两年减少城镇人口50万。

8月23日 中共陕西省委成立甄别领导小组,开始对1958年至1961年上半年开展的几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处理。

8月30日 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学习和讨论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精神。常委会指出,在基本建设方面必须刹车,缩短战线,退足退够。

同日 国务院批准,设立太白县,恢复武功等43个县的建制。

9月7日至18日 中共陕西省委案件甄别和党的监察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甄别工作;农村整风整社组织处理和复查工作;加强调查研究和反映情况工作;处理控诉、申诉工作;检查总结近几年来监察工作的经验教训。

9月26日至30日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粮食问题、《六十条》贯彻执行情况和三年奋斗目标等问题。

10月4日至14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三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讨论了粮食和市场问题。

10月5日 中共陕西省委批转省委十人小组《关于内部肃反工作的今后意见》。

10月6日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陪同尼泊尔国王和王后来西安参观访问。

同日 陕西省、西安市和民主党派给一批有悔改表现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

10月23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西安市区的自由市场问题。提出大中城市的市区不开放自由市场。

10月25日至3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计划会议,编制陕西省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11月29日 中共陕西省委批转关于试办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情况报告。

12月8日至11日 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召开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会议。会议强调对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必须认真对待,一件一件都要处理好。

12月25日至3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工业书记会议,对如何全面贯彻

执行工业《七十条》提出了初步规划。

12月28日 中共陕西省委在延安召开农业增产经验座谈会,总结推广全省一些地方连年增产的经验。

12月 根据中央指示,中共陕西省委布置了关于开展反对商品“走后门”的运动。

1962年

3月2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渡过春荒克服当前粮食困难的紧急指示》,要求各地大力开展生产自救,做好灾区粮食供应工作。

4月2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精简问题。省委指出:五年之内,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搞调整,着重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安排好市场。并决定中专、技校一律放长假,以渡饥荒。

4月11日 中共陕西省委检查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情况。

4月28日 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精简、压缩问题。

5月7日 省政协召开二届三次扩大会议,选举方仲如为省政协主席。

5月2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甄别工作范围和加速基层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对从1958年至1961年,凡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党员,都应列入甄别范围。

6月9日 中共陕西省委从省级机关抽调110名领导骨干,下放到专区、县和公社工作。

6月25日至7月19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三届四次全体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当前形势和国民经济调整及精简工作,及巩固农村集体经济等问题。会议决定,全省最少减少商品粮人口65万人,力争超过。

7月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在省、地、县以至公社党委取消分管书记的名义,改变党委分兵把口的做法,把应该由政府各部门办的业务交由政府部门办理。

8月2日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会讨论了清涧县单干倾向问题。提出要纠正个别地方已露头的单干现象。

8月6日至2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宣传工作座谈会,讨论农村宣传工作问题,并安排部署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宣传文化部门的精简问题。

8月20日 省委召开会议,讨论农村宣传工作及单干问题,指出单干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要积极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

9月15日 省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等精神。

10月25日至11月1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三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阶级矛盾、政治形势和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等问题。同时讨论了所谓“彭德怀、习仲勋等反党集团问题”。

11月11日 中共陕西省委向中央作出《关于纠正单干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情况的报告》。指出,全省80%以上的生产队是巩固和基本巩固的。但也有10%办得不好,其中极少数(约2%左右)已经瓦解,实行了“分田到户、包产到户”。

11月23日 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今冬明春整顿人民公社的安排》,提出必须在今冬明春,集中进行一次以社会主义教育为中心的整顿,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办好生产队,纠正单干风,争取明年农业生产的丰收。

1963年

1月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通知:舒同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1月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讨论全省计划会议总结。会议指出,减少城镇人口的计划,要保证完成。应抓紧精减生产人员,逐步精减机关农副业生产人员,中专、技校和大专院校在1962年实行放长假的学生,要如期复学。同时认为1962年减得过头的作法是错误的。

2月2日至3月9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党的建设工作会议,要求加强对党的建设工作的领导。

2月7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恢复《陕西农民报》。

2月2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整顿城市集市贸易问题。会议认为,资本主义势力曾几度泛滥,现已基本扭转。在目前情况下,对城市集市贸易采取“加强管理、缩小范围、逐步代替、区别对待、因地制宜”的方针是正确的。

3月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研究精简工作问题。会议认为1963年全省精减职工3.87万人的安排是正确的、可行的。

3月11日至22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三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讨论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粮食工作、精简工作等问题。

3月16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当前农村整风整社几个问题的通知》。

3月18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向党内外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教育。

3月26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成立省级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领导小组,组长章泽。

同日 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指示,西北地区很多地方民主革命不彻底,必须认真补上这一课。

3月2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的部署计划,决定在全省县级以上机关、企事业单位,分三批开展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

4月9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增产节约和“五反”动员大会。

4月24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向西北国棉一厂女工赵梦桃和赵梦桃小组学习的决定。

5月1日 中共陕西省委创办的农村通俗政治刊物——《工作与学习》出版。

6月8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指示,要求各地认真贯彻执行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决定。

6月25日 中共陕西省委就1963年春季社教运动情况向中央西北局报告,陕西农村阶级斗争复杂、尖锐,1/3的四类分子有破坏活动;解放较晚的关中、陕南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陕北老区社会主义革命谁战胜谁的问题没有基本解决。

7月7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成立省委加强思想战线对敌斗争领导小组,刘端棻任组长。

7月20日 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县级机关开展“五反”运动的规定。

10月5日至9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张德生传达了九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会议着重讨论安排农业生产、农副产品收购、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五反”等工作。会议强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争取在1965年内完成,“五反”运动争取在1964年底全部结束。这次会议起草的文件认为陕西绝大部分地区民主革命是比较彻底的。

10月21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成立省委工业发展问题研究小组,组长

杨拯民。

10月30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成立省委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领导小组，赵守一任组长。

11月9日至17日 中共陕西省第四届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张德生代表省委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为迎接国民经济的新高潮而奋斗》的工作报告。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17日，召开四届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张德生为省委第一书记，严克伦、章泽、舒同、谢怀德、李启明为书记处书记。

12月16日 政协陕西省三届一次会议在西安召开，选举赵守一为省政协主席。

12月17日 陕西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西安人民大厦礼堂举行。会议选举李启明为省长。

1964年

1月4日 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在工人中开展“两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斗争的规定。

1月18日至2月2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委员会联合召开全省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研究制定了全省农业科学技术工作的长远规划，提出了关中粮棉高产、陕北水土保持等十项综合性研究任务。

2月11日 中共陕西省委在转发“五反”办公室主任会议纪要中指出：对贪污分子该斗的一定要斗，不该斗的或者可斗可不斗的不斗。斗争的对象：一是问题性质确定了的；二是不老实交待和不退赃的；三是要经过批准手续。同时还强调，凡给开除公职以上的处分，须经地委批准。

2月22日至3月3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学习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的指示，讨论了陕西农村形势和当前工作。会议还讨论了进一步肃清高岗反党集团在陕西的残余影响等问题。

3月3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成立省委内部理论刊物编辑小组，舒同任组长。

4月21日 刘澜涛发表《关于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八个问

题》的讲话。6月2日,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组织学习。

4月24日 中共陕西省委对人民警察是否参加“五反”运动作出规定:交警、消防警、经济警察不参加“五反”运动,户籍警、刑警、法警一般均参加。

4月25日 陕西省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选举海涛为省妇联主任。

7月3日至8月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四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讨论和部署陕西地区进一步把城乡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以及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问题。

7月20日 中央西北局向中央报送《关于陕西关中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的情况报告》,指出西北地区有相当一部分地方民主革命很不彻底,严重影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

7月22日 中共陕西中省委举行全体(扩大)会议,着重研究陕西地区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及其表现,部署进一步肃清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的影响问题。

8月15日 中共陕西省委宣布成立农村、城市、思想战线社会主义教育(简称社教)运动三个指挥部。

9月9日 第一期“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运动在长安、延安、西乡和阿房区四点上开展。不日,社教工作队进驻。

9月2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重新部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紧急通知》。

10月26日 中共陕西省委批转关于横山县“单干风”的情况报告,要求在全省彻底批判“单干风”。

11月16日 由于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患病,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代理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11月24日 中共陕西省委同意《关于整顿中共长安县委领导班子问题的报告》。该报告说,中共长安县委领导班子是“挂的共产党的招牌,干的反社会主义的勾当”。

11月24日至28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四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会议错误地批判了省委常委、西安市市长刘庚。

1965年

1月18日至28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工作会议。胡耀邦传达了中央一月工作会议精神,集中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亦称《二十三条》),并总结了前一段社教活动。

1月28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从长安、延安、西乡等几个社教点上抽调5400名脱产干部,加强面上工作。

2月14日 胡耀邦在安康向各地、县委急发《电话通讯》,提出四条干部政策:(1)凡属从社教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2)凡属停职和撤销工作但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再作结论;(3)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待过的在职干部(包括脱产和不脱产的干部),不再在这次会议上“洗手洗澡”,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将功补过,就一律不咎既往;(4)凡属这次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人,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3月16日,中共陕西省委口头宣布停止执行上述四条意见。

2月16日 刘澜涛在长安社教工作团干部大会上作题为《坚决贯彻执行〈二十三条〉,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报告。

2月27日 赵守一向省委书记处写信,支持胡耀邦《电话通讯》意见,并对贯彻《二十三条》和搞好生产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3月3日 省委发出《关于执行胡耀邦同志2月14日〈电话通讯〉第二个问题的前两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和通知》。3月16日,按照西北局的指示,省委口头宣布停止执行《电话通讯》中的四条干部政策。

3月20日 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发出《关于撤销几个“暂停”的通知》。即:1964年12月,社教工作中的“双开”(开除党籍、开除政籍)暂停、夺权暂停、捕人暂停。

3月31日 刘澜涛在西北局书记处会议上对胡耀邦的“四条干部政策”提出了批评。

5月8日 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5月30日至6月18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二十三条》和西北局书记处会议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省委一

月工作会议以后四个月来的工作。与会多数同志认为四个月来工作成绩是主流,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局部的;少数人认为这一段错误是严重的,其性质是“思想上右倾”,“政治上摇摆”。

6月29日 省委转发长安社教工作《关于长安地区民主革命补课情况的报告》。报告指示,补定地主、富农 3271 户,加上土改原订的共 5992 户,占土改时总户数的 5.97%;清除党员中地、富、反坏分子 152 人,各级干部 493 人;补戴“地、富、反、坏分子”帽子 2306 人。

7月10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决定成立农业建设师。采取军垦形式,开荒生产。后经中央、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农业建设第十四师。负责建设三门峡库区农场、大荔农场和南泥湾农场。

8月22日至9月9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检查是年一月以来省委的领导工作,批评了省委第一书记胡耀邦和第二书记赵守一在社教工作中的所谓错误。这次会议是在西北局的领导下召开的。

8月27日至9月1日 中共陕西省委农村社教指挥部办公室召开各地区社教工作团办公室主任会议,检查社教运动的准备情况,讨论了社教中存在的问题。

9月10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成立省委社教委员会,李启明任主任。

9月25日至29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基本建设工作会议。

10月29日 中共中央决定:免去胡耀邦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任命霍士廉为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11月2日至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农村 13 个社教点座谈会,交流社教工作的经验,研究“四清”阶段需解决的若干问题。刘澜涛在会上说,所谓民主革命不彻底,一个是土改不彻底,一个是镇反不彻底,不管哪个地区、哪个单位都要完成这件事,不要漏掉。

11月15日 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省开展宣传和学习王杰同志活动的通知》。

1966 年

1月26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发出《坚决同铺张浪费的不良现象作斗争》的通知。

同日 中共陕西省委通报纠正少数社、队出现的“平调风”，指出：“一平二调三收款”过去有过深刻的教训，现在又出现这种现象，应引起各级党委重视。

2月1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向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学习的通知》。

3月2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四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近几年工作总结和今后主要任务的意见》及《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几个问题的决议》。

3月28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从省、地、县三级抽调8000名干部到农村长期蹲点，培养500多个样板公社，以点带面，使全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要求。

5月9日至1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座谈会”，批判邓拓、吴晗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揭发陕西文化战线上的所谓严重问题。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在会上讲了话，论述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性质、政策和大搞群众运动的必要性。

5月19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西安地区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机关负责人会议，讨论研究“文化大革命”问题。

5月2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通知》。

5月2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听取西安市委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决定派省委书记处书记萧纯去西安市委工作。并决定改组西安晚报社。

6月3日 严克伦带领省委工作组进驻西安交通大学。上午，省委召开西安地区各大专院校党委负责人会议，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要求各院校党委要站在运动的最前线。

6月4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

6月5日 西安交通大学校园内贴出反对省委工作组、省委和西北局的大字报。西安交通大学学生李世英贴出大字报，提出深挖省委、西北局黑线的口号。7日，刘澜涛明确提出西北局、省委、工作组是革命的。

6月9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西安交通大学工作组改名工作团，严克伦任团长。

6月13日至9月18日 中共陕西省委举办陕西省文教单位文化大革命座谈会(后改为“干训班”)。座谈会中心内容是在陕西抓所谓胡耀邦、赵守一、李启明“三家村”反党集团，批判在他们周围工作过的同志。

6月1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城市社教工作团、队和社教单位负责人会议。研究社教单位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6月17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撤销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彭康等人的一切职务,并对党委进行改组。改组期间,省委工作团代行校党委的职权。18日,新华社刊发了此新闻,西北局要求西北各省转载。同日,西安交通大学举行批判彭康大会,这是西安地区错误揪斗领导干部的开始。

7月8日 中共陕西省委对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作出具体部署,并对陕西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分析。指出,从最初揭露大量事实看,陕西的阶级斗争是严重的、复杂的、尖锐的;陕西地区由于民主革命不彻底,党内干部队伍严重不纯;在文化战线上,绝大多数领导机关一直被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所统治。要求将斗争矛头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共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权威”,也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7月15日至8月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继续错误地揭发批判了胡耀邦、赵守一、李启明的所谓反党罪行。

7月1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文件,要求各级党组织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揭发批判赵守一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切反革命罪行”。

8月3日 西北局和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北体育场召开“西安市大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上宣布撤销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同时认为西安交通大学工作组犯了方向性错误,严克伦应向师生检查。并宣布赵守一是陕西三反分子总头目。4日,赵守一被“造反派”揪斗。

8月9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通知:宣布省委已撤销各校工作团、队、组,停止其一切活动。但有些团、队、组仍有活动,这是完全错误的。

同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和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通知》。

同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公安干部会议。会议强调公安干部一律不得干预大专院校、中等学院的“文化大革命”。

8月10日 中共陕西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组长肖纯。

同日 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政法学院联合召开“向西北局、陕西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霍士廉到会检讨。

8月12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撤销陕西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郭琦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8月15日 中共中央决定李瑞山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

8月16日 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冶金建筑学院、西北工业大学一些人组织两万学生在省委机关门前静坐,至18日刘澜涛、霍士廉出面接见,静坐结束。

8月19日 中共陕西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规定:大字报不上街;不在街上进行辩论;广播车不上街;不打人。23日,省委又发出通知,宣布撤销前三条。

8月20日 中央西北局、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举行集会,庆祝中共八届十一次全委会议闭幕。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在会上讲话,号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有50万人参加了集会。

8月2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西安地区各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霍士廉对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进行了检讨。

8月25日 在西安的14所大专院校的部分学生在西安市体育场召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誓师大会”,公开提出了造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反,造中共陕西省委的反的口号。

8月30日 西北局、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市体育场召开“西安市红卫兵成立大会”。

同日 西安工学院等24所大中学校部分师生联合成立“西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联络站”。

9月6日 外地来西安的数百名学生和交大等院校近万人以要省委交出赵守一为名,在省委门前绝食静坐,直至9日收场。期间西安学校造反派成立了“西安地区大中院校联合指挥部”。

9月17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市体育场召开“西安各界人民炮打司令部进军大会”。刘澜涛、霍士廉在会上作了检讨。

10月13日 根据中央和国务院精神,中共陕西省委、省人委决定组织陕西省大中学校师生代表赴京参观北京的“文化大革命”。

10月18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改组宝鸡市委,地委书记张方海兼任市委书记。

同日 中共陕西省委机关的造反派组织“革命烈火战斗团”成立。

10月27日 中共中央决定胡炳云(省军区司令员)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

处书记,萧潮(省军区副政委)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

11月3日至12月3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揭发批判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议决定由西北局、陕西省委、西安市委联合成立“中共西安地区平反委员会”,刘澜涛任主任,下设办公室。

12月21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对12月20日24时以前到达延安串连的师生实行免费乘车,使他们尽快回到原单位。

1967年

1月1日 中共陕西省委在“造反派”组织的冲击下,正常工作被迫中止,陷于瘫痪状态。同日,《陕西日报》被西安地区造反派查封。1968年3月1日复刊。

1月15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省级机关单位应按照各自的工作范围,负责承担本系统“文化大革命”的工作。同日,省委又发出通知,要求蹲点的省级机关干部,回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

1月16日 造反派夺取了省委办公厅的领导权。

1月17日 造反派夺取了省委宣传部的领导权。

1月18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参加农村社教的干部,一般不再回农村做检查。个别干部错误严重,而贫、下中农要求调回检讨的,可以调回。

1月19日 造反派夺取了省委组织部的领导权。

1月20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撤销省委农村社教办公室,农村四清工作纳入农村“文化大革命”。同时决定撤销城市四清工作团、队,停止城市社教办的工作,从此,全省社教运动结束。

1月25日 省委机关“革命烈火战斗团”等西安造反派组织组成的“夺权小组”夺取了省委书记处的领导权。1月26日,“省委夺权小组”正式对外办公。

1月 中共陕西省委在建国路73号建立“监护管理所”(亦称73号)。“监管所”从1969年3月至1975年4月先后“监护”省级、厅级领导干部55人,其中副省级以上28人,副厅级以上24人。

3月3日 由省军区、兰空、二十一军共同组成的“西安地区驻军支援左派统一指挥部”(简称支左指挥部)成立,胡炜、黄经耀、杨焕民任指挥。此后

陕西驻军陆续对陕西公、检、法等机关实行军事管制。

3月7日 中共陕西省委机关的又一造反派组织“红色造反总部”成立。

4月12日 支左指挥部派军队干部进驻省委、省政府有关单位。

5月23日 支左指挥部决定,成立“陕西省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

8月5日 西安交通大学“文革总会”以对军队支左不满为由,组织群众在建国路静坐,历时42天。

8月28日 陇县发生造反派组织武斗,死伤300多人。30日西安发生武斗,死伤11人。

9月2日 “西派”(以西北工业大学、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为首)与“东派”(以西安交通大学为首)发生武斗,死亡56人。

12月4日 陕西第一个县级革命委员会——临潼县革委会成立。

12月19日至1968年3月5日 省支左委员会举办省、市领导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有232人参加了学习班,占领导干部总数的46%。其中有省委第二书记李瑞山,书记萧纯、严克伦等领导干部。

1968年

年初 省委办公厅出现一起“给毛主席整理黑材料”的假案。全案牵连20余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此案进行了平反。

1月8日 泾阳三〇四库武器被造反派抢劫。

4月4日至6月5日 安康地区连续发生武斗,死亡734人。

4月23日 《陕西日报》发表《彻底砸烂反动的公检法》的社论。

4月30日 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了《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5月1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成立,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副主任黄经耀、胡炜、杨焕民、萧纯、张培信、马希圣、单英杰、王凤琴(女)、李世英、孙福林、杨梦云(女)。委员会由149名委员组成,常委35名。

5月7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常委会议。确定革委会设办事组、政工组、政法组、生产组,《陕西日报》为省革委会机关报。

5月9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作出《关于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决定》、《关于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加强

革命委员会革命化建设的决定》。

5月13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公布省革命委员会各组负责人的通知》。通知宣布：办事组组长袁立荣；政工组组长周茂芹；政法组组长黄传龙；生产组组长苏锦章。

5月28日至6月8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生产组召开全省工交系统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号召全省职工主动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

6月4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生产组发出《关于改进几种商品供应办法的通知》。对煤油、火柴、卷烟、肥皂等实行限量、凭票供应的办法。

6月5日至9月10日 佳县发生武斗，持续98天。

6月8日 三原发生武斗，损失1000万元。

6月20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在市体育场召开“学习、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主动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誓师大会”。5000余人参加了大会。

6月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专案办公室成立，组长赵明。1979年1月23日，中共陕西省委撤销此办公室。

7月4日至12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召开地(市)、县革委会负责人“学习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主动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大会”。

8月3日 陕西省革委会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结束。李瑞山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七三”、“七二四”布告的报告》。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落实这两个布告是陕西当前一切工作的中心。

8月28日 陕西省革委会作出《关于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认真搞好斗、批、改的决定》。

9月5日 省级机关斗批改领导小组成立。组长先后由顾苏荣、刘同芳担任。

9月18日至24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举行第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李瑞山在会上作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全省范围内迅速掀起一个伟大的斗、批、改新高潮》的讲话。

10月5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通知》。毛主席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在职干部都应该分批下放劳动。”10月29日，省革委会召开万人大会，欢送原省级机关1600多名干部，下放南泥湾“五七”干校等地参加劳动。此后，全省先后下放干部2.6万

余人,接受“再教育”和“改造”。

10月16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精兵简政、干部下放劳动领导小组”。肖纯任组长。

10月30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在陕棉十一厂召开“清理阶级队伍”现场会。

12月5日 陕西省革委成立基本建设指挥部。

12月12日至15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召开“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掀起农村斗批改新高潮潼关现场会议”。

12月22日 陕西省革委会发出《关于广泛宣传、深入学习、坚决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通知》。要求各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

1969年

1月2日至8月15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在长安县汤峪举办“西安地区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月13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召开第二次整党建党试点工作座谈会,会议强调要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搞好整党建党工作。

1月25日至30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举办“西安地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落实毛泽东最新指示学习班”。会上,西安四所大学的“工宣队”介绍了他们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经验”。李瑞山在学习班上作了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统帅下,抓紧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夺取对敌斗争的更大胜利》的讲话。

1月31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在新城黄楼召开农村“清理阶级队伍”有关政策问题座谈会。

3月28日至4月5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召开农村落实政策座谈会。

4月5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将原“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毕业生工作领导小组及其下设办公室”和“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干部下放劳动办公室”合并,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干部下放劳动和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简称“下放、分配领导小组”),组长萧纯。

4月29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下发《1969年基本建设计划》。计划总投资2.96亿元。

5月8日至23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召开传达贯彻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干部大会。会议提出要理解毛泽东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真搞好“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5月26日 为加速陕西省宝鸡峡引渭工程的建设,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决定成立陕西省宝鸡峡工程指挥部领导小组,组长吕祖光。

7月8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党委决定: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陕西省军区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组长苏锦章。

7月14日至20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在陕西宾馆召开第四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李瑞山代表省革委会作了题为《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为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而奋斗》的报告。会议指出,根据陕西斗、批、改的进展情况,当前,多数单位应适时转入整党建党阶段,以整党建党为焦点,完成其他各项斗、批、改任务。

9月15日至29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召开“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10月11日至18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召开全省农业会议。会议强调要尽快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会议讨论并制订了1970年至1975年的农业发展规划。

11月18日至25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召开第三次整党建党座谈会。

12月8日至15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召开第五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讨论研究战备问题。

12月22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各级组织贯彻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自此,全省每年有十几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70年

1月22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召开省级领导干部大会,传达兰州军区战备会议精神,布置战备和其它各项工作。

2月5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三、五、六”(指中发[1970]3号、5号、6号文件)领导小组成立,组长李瑞山。

2月26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决定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交通运输指挥部”。熊光焰为指挥部领导小组组长。

3月28日 中共中央批准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核心小组由李瑞山等八人组成。同年8月12日,增补颜金生4人为核心小组成员。组长李瑞山。

4月1日 陕西第一座最大的抽水灌溉工程——东方红电力抽水灌溉工程建成,可灌面积118万亩。

4月5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认真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复电,大力发扬延安精神,在短期内迅速改变延安地区和全省面貌的决定》。

4月16日至19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召开第六次全体会议。会议提出了1970年工农业生产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的设想,通过了李瑞山等82人为我省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5月17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决定成立:省革委会计划委员会、物资局、科技局、农林局、水电局、基建局、重工业局、煤炭工业局、机械工业局、轻纺工业局、交通局、商业局、粮食局、财政局、卫生局、民政局、教育局、文化局、档案局、行政管理局、劳改局。各局(委)均成立领导小组。

6月23日至25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召开“增产节约运动誓师大会”。

9月3日至18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召开农业会议。会议要求掀起一个学大寨的热潮。李瑞山在会上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的讲话。

10月21日至11月4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召开“第二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10月23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召开会议,传达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和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

11月26日至30日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召开陕南地区三线建设问题座谈会。要求各部大力支援陕南三线建设,以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

1971年

2月28日 中共中央通知:增补方升普、李建平为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副

主任;增补吴桂贤(女)、孙长兴、兰大民、霍士廉、刘桂荣(女)为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2月28日至3月6日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大会选举出中共陕西省第五届委员会。6日,召开五届一次全委会议,选举李瑞山为省委第一书记,胡炜、黄经耀为省委书记,吴桂贤为副书记。

3月10日至2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开展“批陈(陈伯达)整风”。

4月10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成立国防工业领导小组,胡炜任组长。

5月13日至16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工作会议,部署批陈整风。会议要求,以批陈整风为动力,推动我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5月22日 中共陕西省委成立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黄经耀任组长。

7月13日 宝鸡峡引渭灌溉工程竣工。

8月25日至9月5日 中共陕西省委、驻陕部队负责人赴北京向中央汇报工作,形成了《陕西省委汇报会传达提纲》。要求排除派性干扰,落实各项政策,掀起工农业生产新高潮。

9月11日至22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李瑞山传达了《省委向中央的汇报提纲》。会议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了思想。

9月27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省委办公厅和省革委会办事组为一套机构,负责承办省委、省革委会日常工作;为了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确定在生产组下,设置计委(包括工交)、建委、农村办公室、财贸办公室。各局、委按业务性质分别划归各办领导;将省委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改为省“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组长黄传龙。

10月2日至6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发[1971]57号文件(《关于林彪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通知》)。

12月15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向广大干部群众传达中发[1971]77号文件(《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

12月15日至2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加强延安和陕北工作的决定》。会议还制订了我省农业生产的发展规划。

1972年

1月20日至2月1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干部工作会议,批判所谓的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研究解放干部的安置、下放干部的使用管理等问题。

1月25日至2月1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1972]4号文件,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炮制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此后,全省各级党组织普遍开展了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揭发批判。会议还讨论了1972年国民经济计划。

4月26日至28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研究整顿农村基层组织,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和粮食征购工作问题。

5月17日至18日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会决定:撤销省革命委员会生产组核心小组,成立生产组领导小组,组长萧纯;成立省纪委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傅子和。

7月11日至8月8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学习毛泽东、党中央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批示、指示和文件,深入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8月9日至1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五届二次全委会议。会议汇报了省委批林整风的情况,总结了第一次全会以来的工作。会议强调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狠抓经济领域里两条路线的斗争。

9月12日至3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会议分析了工业生产情况,研究了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

9月21日至10月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传达北方6省市生产救灾座谈会和北方14省抗旱会议精神。会上还讨论了批林整风、整顿农村基层组织和落实政策等问题。

11月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研究了批林整风、路线教育问题。

12月11日至18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联系陕西实际揭发批判与林彪反党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

1973年

1月3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新年献词〉的通知》。

3月2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批林批孔”学习辅导团动员大会。

3月21日至5月4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召开的兰州军区、陕、甘、宁、青四省(区)赴京负责人汇报会议精神;进一步学习毛泽东、党中央关于“十次路线斗争”的重要指示,揭发批判林彪一伙在陕西的反革命活动,清查与之有牵连的人和事。

4月4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转发〈关于撤出部分三支两军人员的讲话提纲〉的通知》。决定在今年上半年撤出一部分“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干部。

4月28日 共青团陕西省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选举韩志刚为团省委书记。

5月13日 中共陕西省委审干领导小组成立,萧纯任组长。

5月14日 中共中央批准,霍士廉为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萧纯、吴桂贤为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谷凤鸣为省革委会副主任;章泽为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李琦涛为省革委会常委。

6月8日至1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陪同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范文同先后在西安和延安进行了参观访问。期间,周总理对陕西、延安工作作了重要指示。指出:“陕北无论如何要在三五年内搞上去。”

6月13日至1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五届三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陕西省出席党的十大代表候选人。

6月21日至29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五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五月工作会议精神,制定贯彻会议精神的措施。选举产生了陕西出席十大代表。

6月30日至7月4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地(市)、县委书记会议,讨论落实周恩来对陕西工作的指示;研究如何尽快把全省农业搞上去的问题。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在会上讲了话。

7月17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撤销省革委会政法组,分别设立省革委会公安局、政法办公室,恢复省高级人民法院。

8月1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会议,研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会议决定成立陕西省知识青年工作领导小组,霍士廉任组长。

8月16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通知,决定撤销陕西省支左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

8月20日 陕西省第五次妇女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选举白锋悟为省妇联主任。

9月7日至1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五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党的十大精神。

11月7日至1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组织工作会议。总结“整党建党经验”,根据中共十大精神提出今后任务。

11月10日至2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工业工作会议,贯彻中共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加快发展。会议强调,要加快发展速度,力争三年内有20%左右的企业成为大庆式企业。

12月5日至13日 陕西省贫下中农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陕西省贫下中农协会第二届委员会,李瑞山当选为主任。

1974年

1月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及省革委会各大组负责人会议。黄经耀传达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等指示。会议强调当前路线斗争中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1月21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撤销省委办公室、省革委会办事组、政工组,成立省委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和省革委会办公厅、外事办、文教办,省委办公厅和省革委会办公厅为一套机构、两个牌子。同时任命了上述机构的负责人。新的工作机构,自2月1日起开始办公。

2月3日至16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五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讨论研究在陕西广泛深入地开展批林批孔问题,安排部署陕西1974年的工作。

2月9日 中共陕西省委暨中共西安市委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吴桂贤传达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指示。

4月18日 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市小寨俱乐部等地召开省级机关批林批孔大会。

6月1日 中共陕西省委批转省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关于选调干部带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7月12日至19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批林批孔汇报会,讨论如何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和增产节约的措施。

8月25日 中共陕西省委暨西安市委召开批林批孔报告会。

9月9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批林批孔大会,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10月18日至23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五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毛泽东主席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强调要继续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12月1日至1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议。

1975年

1月1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批林批孔大会。会议要求,在新的一年里,要继续抓好批林批孔,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

1月28日至2月3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五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传达党的十届二中全会精神和第四届全国人代会精神。

2月2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和各大系统负责人会议,学习江青寄来的七份材料,传达江青在《国内动态》上的批文和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给省委的电话精神。

2月2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省级机关和省军区机关干部大会,进一步动员机关干部深入农村蹲点劳动。

3月6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通知》。

3月15日 中共陕西省委暨西安市委召开“抓理论学习,促工业生产”动员大会。号召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大力促进安定团结,把经济工作搞上去。

4月16日至5月16日 中共陕西省委举办地、市、县委书记学习班,学习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7月20日至28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如何把学习“理论问题”引向深入;如何大干快上,加快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

7月28日 石泉水电站建成投产。

10月6日至9日 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整顿“老大难”和重点单位蹲点工作会议。交流整顿领导班子,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加强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经验。

11月3日 中共陕西省委、省革委会召开干部大会,传达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

11月22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加强县委领导班子整顿和建设的指示》。

11月26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在全省农村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指示》,提出要在全省农村进行整党整风,整顿社队领导班子。

12月16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和省级部门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和《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

1976年

1月2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两首词和元旦社论》的电话通知(两首词为《重上井冈山》、《鸟儿问答》)。

2月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意见》。要求抓好县委领导班子思想和作风的革命化建设;切实搞好农村社、队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工作;认真做好16个学大寨先进县的巩固提高工作。对第一批重点抓的延安、户县、汉中、蒲城、安康、武功等六个县,要加快建成速度。

2月10日至1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省委、省革委常委、地市委和各部门、办、厅、局主席负责人会议。学习中共中央《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和《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以及毛泽东主席的两首词。

3月6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中共中央[1976]4、5、6号文

件的通知》。要求县团以上干部认真学习毛泽东的重要指示,批判邓小平的所谓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回击“右倾翻案风”。

3月10日至2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各地(市)委书记和省级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共中央[1976]5号文件,部署反击“右倾翻案风”。

4月1日至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23个县的县委书记座谈会,研究“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问题。

4月6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组织干部群众学习《人民日报》4月6日发表的《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社论。

5月6日 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公安部的紧急电话通知,要求各地追查“总理遗言”的起草者。

6月2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通知》。

6月5日至12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和省直各系统负责会议,汇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及“抓革命、促生产”情况。会议错误提出要围绕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这个重点,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始终把矛头对准邓小平”。

7月19日至8月6日 中共陕西省委、省革委会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如何联系实际,批判邓小平的所谓问题。

8月2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会议错误地提出要联系实际,集中火力,深入批判“三株大毒草”(即《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学技术工作的几个问题》、《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掀起批邓新高潮”。

10月2日 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继承毛主席遗志,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新高潮的决定》,要求在全省迅速掀起一个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新高潮。

10月2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组织群众游行,祝贺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庆祝粉碎“四人帮”(即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23日,中共陕西省委、西安市委联合举行庆祝大会,并给中央发了致敬电。

10月25日至28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1976]16号文件,研究部署开展揭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罪行。

11月26日至12月3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充分发动群众,在全省掀起大揭发、大批判“四人帮”的高潮。会议作出《关于

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罪行的安排意见》，部署了在全省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

12月2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省直机关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行大会，11000多名干部、职工参加。会议揭发批判了“四人帮”把黑手伸向陕西、破坏陕西省革命和建设的种种罪行。

1977年

1月7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革委会组织2000多名机关干部和职工群众举行集会，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李瑞山在大会上讲话，深切缅怀周恩来总理的光辉革命实践和对陕西省革命建设事业的关怀。

1月10日至2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全省工业学大庆会议。会议传达了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制定全省普及大庆式企业的规划；选举出席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代表。李瑞山在会上作了《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把工业学大庆的革命运动推向新阶段》的讲话。

3月16日 全省5万多名干部组成工作队，分赴803个公社、生产大队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3月25日 向毛主席纪念堂敬献延安青松起运仪式在咸阳举行。

4月15日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西安发行。17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决定，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通知》。

4月28日至5月2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联系实际，深入批判“四人帮”，并对省革委会几个常委追随“四人帮”的错误进行了揭发批判。

6月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350万群众收听有线广播大会。传达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

6月23日 中共陕西省委举行科技工作报告会。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在会上讲话，要求各部门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今后3年、8年、23年科技工作规划设想。把陕西省科技工作搞上去。

6月23日至3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基本路线教育蹲点汇报会，交流半年来开展基本路线教育的经验。会议强调在基本路线教育中要抓好整党整风，还要注意解决经营管理。

9月8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革委会举行大会,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

9月2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百万人广播大会,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会议提出迅速把全省科学技术工作搞上去的具体措施。

9月29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大、中、小学教师代表座谈会,揭发批判“四人帮”在教育战线的罪行。

10月5日至10日 中共陕西省委在渭南召开全省科技工作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研究了贯彻通知的意见。

10月25日 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恢复和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

10月31日至11月12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全省文艺创作会议,讨论如何发展和繁荣文艺创作等问题。

12月2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干部大会,传达党中央关于在全省点名批判原省常委会某些人追随“四人帮”,结帮组派的严重错误。李瑞山在大会上讲话。

同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地、县委书记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召开的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精神,着重讨论了高质量学大寨,高速度发展农业的问题。修订了陕西省1978年建设大寨县和发展农业的规划。

12月24日 政协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西安召开,选举李瑞山为政协陕西省主席,常黎夫等15人为副主席。

12月25日 陕西省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在西安召开,大会选举李瑞山为省革委会主任,于明涛等12人为副主任。

1978年

1月15日至27日 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会议传达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如何贯彻《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案)》,讨论整顿企业问题。

1月16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普及大寨县,高速度发展农业的决定》。该决定制定了三年奋斗目标:到1980年,把1/3的县建成大寨县;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粮食产量平均每年递增10~13%,总产量达到1225亿斤,

棉花产量平均每年递增 15% 以上,总产量达到 320 万担以上。

1 月 27 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成立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委员会党校的通知》,李瑞山兼任党委书记、校长。

2 月 16 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全省人民认真学习全国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旬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地(市)、县委工业书记会议。会议要求工交战线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狠抓企业整顿,建立厂长制和工人代表大会制,以质量为中心深入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4 月 23 日至 30 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全省科学大会。会议落实了全国科学大会的精神,制定了 1978 年到 1985 年全省发展科学技术的规划。

5 月 20 日 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

5 月 24 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革委会决定命名西北第四棉纺织厂等 106 个单位为大庆式企业。

6 月 24 日 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交通大学召开大会,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原校党委书记、校长彭康公开平反。

7 月 6 日至 15 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高校党委书记会议。会议传达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重点讨论了怎样深入揭批“四人帮”,整顿高等学校、提高教育质量、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问题。

7 月 11 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学习中共中央转发的《湘乡县委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经验》。

7 月 12 日至 20 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工业学大庆会议,讨论了加快普及大庆式企业和整顿企业等问题。会议强调要整顿和改进干部作风。

8 月上旬 中共中央决定,王任重任陕西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

8 月 20 日至 9 月 21 日 中共陕西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学习、讨论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批示。会议认为,批示对陕西的工作做了正确的分析和评价,指出了抓纲治陕的方向。会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批评了省委工作中的错误,分清了是非,团结了同志。省委第二书记王任重在会议期间作了题为《抓纲治陕,大干快上》的重要讲话。

9月16日 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国营红安公司“特务集团”假案平反的决定》。

10月16日 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省理论研究室召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

10月19日 中共陕西省委举行由省级各部、委、局负责人和宣传理论干部700多人参加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座谈会。省委书记李尔重在会上讲了话。

11月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善始善终搞好农村第三期基本路线教育的通知》。

11月6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成立“陕西省陕北革命建设委员会”，王任重任主任。

11月12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陕西省委纪律检查临时委员会。严克伦任第一书记，杨文海任第二书记，董学源、张汉武、罗文治、白耀明为副书记。

11月1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认真解决当前农村经济政策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指示》。为减轻农民负担和改进干部作风，该指示提出了10项政策规定。

12月1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设立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12月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通知，宣布在1976年清明节前后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的行动是革命行动，并决定对因此而受迫害的同志平反，恢复名誉。

12月10日 中央决定，免去李瑞山中共陕西省委、省革委会、省政协担任的职务，任命王任重为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

12月15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为丛一平、吴钢、丁济沧、胡采等同志平反。

12月19日 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召开大会，宣读《中共陕西省委关于所谓恶毒攻击毛主席的严重反革命事件的平反决定》。

12月22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为陕棉十一厂的所谓“现行反革命集团”平反。

12月23日至3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动员全省人民，解放思想，大干快上，全面深刻领会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意义。

12月25日 中共中央决定免去王任重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职务,任命马文瑞为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常委、第一书记。

1979年

1月8日至2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进一步传达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部署1979年的工作;重点抓好农业生产。会议澄清了陕西历史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省委决定:胡耀邦主持陕西省委工作期间,反对“四清”运动中形左实右的路线,以及对陕西工作的指导思想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是正确的。因反对批判胡耀邦而遭受打击的赵守一、李启明、陈元方等一批同志应予以平反;将原省委、西北局机关一批同志打成“黑帮”是错误的,予以平反;陕西民主革命是彻底的,“四清”中提出的“陕西土改不彻底”、“镇反不彻底”的口号和做法是错误的;陕西地下党是好的,对其诬蔑不实之辞应推倒。由此受到迫害的党员、干部、群众应予以平反、昭雪。

1月15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为优秀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及作者杜鹏程平反,恢复名誉。《保卫延安》在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被错误批判,“文化大革命”中作者因此受到迫害。

1月16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通知,要求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把社教以来错定的地主、富农成分纠正过来。

3月7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成立复查纠正“三案”(即冤、假、错案)领导小组。省委书记严克伦任组长。其任务是: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复查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的冤、假、错案,协助省委处理“三案”和信访等问题。

3月21日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会通过1979年工作安排。1979年的中心工作是: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重点抓好农业,全面完成国民经济计划。

4月5日至2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地市委工业书记会议,落实调整了1979年生产计划,研究部署了开展增产节约等问题。

5月11日至24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讨论我省国民经济调整问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问题和揭批查运动补课问题。

6月3日 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

7月22日至8月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全省工交系统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会议交流了在新形势下搞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研究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后工交系统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问题和任务。

8月31日至9月13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农业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全国农田基建会议精神,讨论了陕西农业方面的几个重大问题。马文瑞在会上作了《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向农业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讲话。

9月22日 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加强陕南山区建设的若干问题的决定》。

同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积极地大踏步地发展社队企业的指示》。要求各行各业都要积极扶持社队企业,到1981年全省社队企业总收入达到12.5亿元。

9月23日 中共陕西省委提出《关于落实三年农业调整任务的意见》。指出,要合理调整工农业之间和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加快农业发展。

10月20日 陕西省妇女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选举李晋昭为省妇联主席。

11月13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全省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

11月19日至12月2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座谈会。会议着重研究了全省经济工作。马文瑞在讲话中指出,经济工作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搞好调整是当前经济工作的关键。

12月6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对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2月22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安召开,选举吕剑人为省政协主席。

12月23日 陕西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西安召开,马文瑞当选为省人大主任,常黎夫等10人为副主任,于明涛当选为省长,姜一等9人为副省长。

1980年

1月1日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陕西省委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彻底平反。

1月8日至16日 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召开地(市)县委宣传部长会议。会议提出了1980年全省宣传工作的主要任务,讨论了“怎样把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做到基层,切实加强农村宣传工作”等问题。

1月8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开展全省经济大调查。这次调查以工业、财贸为主,由省委负责人挂帅。通过调查,摸清省情,总结经验,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1月12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成立省人民政府党组。于明涛任党组书记,姜一、惠世恭任副书记。

1月21日 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发出《关于组织学习陕西日报三篇文章:“反对个人主义”、“坚持党性、根绝派性”、“共产党人必须诚实”的通知》。三篇文章分析全省党员、干部思想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纠正措施。

1月27日至2月4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统战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加强政协和民主党派工作,搞好党与非党人士合作共事、发展海外统战工作以及落实政策等问题。

3月15日 中共陕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安排部署了1980年纪检工作的中心任务;研究讨论了健全纪检机构和信访工作等问题。

3月21日至2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五届十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在党员中进行政治教育的决议》、《关于召开陕西省第六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在11月召开第六次党代表大会。

4月7日 中共陕西省委印发《关于目前农村工作的若干问题》的文件,提出推行生产责任制,稳定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

5月3日至12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地(市)委工业书记会议,落实企业增产节约、增收节支任务和措施。

5月15日 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加强科学技术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

5月16日 中共陕西省委纪律检查(临时)委员会发出《关于不准干扰高

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5月19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命名西北印染厂等174个单位为大庆式企业。

5月29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地市委文教书记会议,研究讨论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和城乡教育事业的发展问题。

6月22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研究加快陕北建设问题。

8月11日至19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召开全省农业生产会议。省委、省政府决定调整农作物布局,建设关中和汉中盆地粮棉油基地。

9月7日 中共陕西省委从机关抽调54名干部,组成9个工作组,协助地、市县委开好党代会。

9月13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政府转发全省劳动就业会议纪要。纪要指出,今后城镇知识青年不再上山下乡。为解决城镇知识青年就业,要求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办好劳动服务公司。

9月28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要求全省党的支部都要组织学习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响应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搞好陕西的计划生育工作。

10月6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省地(市)负责同志座谈会,传达党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精神,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议认为当前必须明确以下几点:(1)农业集体化的方向必须坚持;(2)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巩固集体经济的中心环节;(3)对包产到户应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方针。(4)今冬明春,各地市要把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当做一项重要任务认真安排部署。

10月21日 中共陕西省委纪律检查(临时)委员会严肃处理了韩城县招工走后门的问题。

12月10日 共青团陕西省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选举赵含磷为团委书记。

1981年

1月15日 中共陕西省委纪律检查(临时)委员会向各级纪检部门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1月21日至3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讨论如何做好经济调整工作等问题。马文瑞在会上讲了话。

2月1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加强和改善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指示》。分析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势,要求把中央[1981]1、2号文件作为进一步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强大武器,并提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八个方面的任务。

3月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通知》,要求掀起学习、宣传“五讲”、“四美”^①为内容的文明礼貌活动热潮。

3月20日 中共陕西省委机关举行报告会。马文瑞作了学习中央工作会议文件辅导报告。主要讲了三个问题:(1)关于形势问题;(2)关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3)关于经济调整问题。

3月21日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正式成立。常黎夫任主任委员。

3月26日至4月4日 中共陕西省委纪律检查(临时)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中纪委第三次全会精神;讨论通过了《关于1980年工作基本情况和1981年工作安排的意见》;确定了纪律检查工作当前面临的主要任务。

4月24日 中共陕西省委批示同意陕西省农委党组《关于把集体代耕的自留地交给社员自己经营的请示报告》。

5月4日至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农业方面的重要指示;讨论了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发展农村多种经营、适当扩大自留地三个问题;作出了《关于适当扩大自留地的通知》、《关于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指示精神,大力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通知》和《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的座谈纪要》。

5月18日 中共陕西省委外事领导小组成立,吕剑人任组长,李连璧任副组长。

5月18日至2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加强少年儿童教育座谈会,号召全党全社会都要关心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

6月4日 中共陕西省委批准撤销各级贫协办事机构。

6月9日至1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工作座谈会。

7月16日至23日 中共陕西省代表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学习和讨论

^① 五讲: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为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

了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选举 32 人为陕西省出席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8 月 16 日至 18 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全省高校教学工作座谈会。会议要求改变目前高校工作存在的领导软弱无力的涣散状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大力提高教学质量。

8 月 27 日至 9 月 2 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企业民主管理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企业主管领导部门尽快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企业民主管理。

9 月 8 日至 13 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马文瑞在会上讲话指出，必须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

9 月 13 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抗洪排涝、生产救灾的紧急指示》。

9 月 28 日至 30 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召开全省生产救灾工作会议，总结前一阶段生产自救工作，并对进一步开展生产自救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10 月 2 日至 16 日 杨静仁副总理率中央慰问团来陕，慰问灾区群众。

10 月 15 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组成生产救灾委员会，马文瑞任主任，于明涛任第一副主任。

同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发展工业消费品生产的决定》。

11 月 15 日 中共陕西省委纪律检查(临时)委员会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干扰大学生毕业分配工作的通知》。

12 月 15 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纠正“三招三转一住”问题工作会议，要求检查纠正少数干部在“三招三转一住”中的不正之风，并制定了纠正此种不正之风的規定和具体措施。

1982 年

1 月 10 日至 16 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当前农村工作的几个问题，着重讨论了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马文

瑞在会上作了《加强农村工作,千方百计争取农业的全面发展》的讲话。

2月5日 中共陕西省委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分赴各地检查纠正“三招三转一住”中的不正之风和经济领域的违法违纪行为。

2月23日 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开展全省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的安排。

3月8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成立老干部工作委员会,张方海任主任。

3月20日至2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统战工作会议,传达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讨论新形势下统战工作的任务。

4月10日至21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召开全省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端正了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讨论落实了1982年工交生产任务。马文瑞作了《提高经济效益与开创工业新局面的几个问题》的讲话。

4月12日至1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会议。

4月2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工作指示〉的通知》。要求认真贯彻综合治理的方针,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5月24日至29日 陕西省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就党史资料征集研究的任务、方针和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落实了有关征集任务。马文瑞出席会议并讲了话。

7月1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二次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工作会议。

7月21日至3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全省组织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离休制度的规定》;讨论了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继续落实干部政策,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即“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分子),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等工作。

7月27日 共青团陕西省委召开六届三次委员扩大会议,补选黄莺(女)为团省委书记。

9月2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中共十二大文件,强调在会后五年内实现陕西财政经济状况、社会风气和党风的根本好转。

9月3日至8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全省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会议检查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省知识分子工作的成绩和经验,研究并提出了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十项措施。

10月6日至1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提出了全省和各地市经济翻番的规划、目标和措施。

10月19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省级党政机关机构改革工作动员大会。省委决定:省委机构由现在的14个单位减为10个,工作人员精减20%;省政府机构拟将62个单位合并、精简为40个。

12月28日至1983年1月12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讨论如何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同时安排1983年农业生产的主要任务。

1983年

1月3日 中共中央决定,李庆伟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

1月13日至15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召开陕南山区建设会议。会议要求陕南一定要在搞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大力发展多种经营。

2月20日至22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胡耀邦的《四化建设与改革问题》的重要讲话。会议就全省改革工作的任务、方针和步骤进行了讨论。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作了题为《坚决而有秩序地搞好我省的各项改革工作》的讲话。

3月4日 陕西省整党试点工作开始。

3月4日至1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农村教育工作会议。会议就改革农村中等教育结构、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普及初等教育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认为,今后农村教育的基本任务是,为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民劳动致富服务,为农业现代化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

3月31日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来陕西视察工作。赵紫阳在陕期间,就搞好农业、发展经济建设,推进改革及转变干部作风等问题作了指示。

4月10日至17日 中共陕西省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陕西省第六届委员会、中共陕西省顾问委员会和中共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马文瑞代表五届省委作了题为《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局面而奋斗》的报告。

4月18日 中共陕西省第六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马文瑞为省委第一书记,李庆伟、李溪溥、曾慎达、周雅光、董继昌为书记。

同日 中共陕西省顾问委员会和中共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分别举行会议。章泽当选为省顾委主任,陈元方、张方海、白文华当选为副主任;罗文治当选为省纪委书记,唐逸民、杨鸿章当选为副书记。

4月26日 政协陕西省五届一次会议在西安召开,选举吕剑人为省政协主席,刘钢民等13人为副主席。

4月27日 陕西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在西安召开,选举严克伦为省人大主任,李庆伟为省长,白纪年等六人为副省长。

6月3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以退居二、三线的原厅局级干部为骨干,抽调一批干部组成10个工作组分赴10个地、市,帮助搞好地改市和地区的机构改革工作;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调整配备好地、市领导班子、选好主要领导干部。

7月9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中纪委〈关于坚决制止乱涨生产资料价格和向建设单位乱摊派费用的紧急通知〉的通知》。

7月23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从现在开始到年底,有计划地组织党员干部学习《邓小平文选》。

7月25日 陕西省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选举薛昭釜(女)为省工会主席。

7月26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全省党校工作会议,讨论、研究全省各级党校如何实现教育正规化问题。

8月3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生产救灾工作的紧急指示。7月下旬陕南地区连降大雨、暴雨,安康县城遭受百年不遇的洪水袭击,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十分严重。省委要求安置好受灾群众生活;尽快恢复工农业生产和商品供应;加强治安保卫工作;加强领导,对重大问题要果断决策,不能延误时机。

8月4日至6日 马文瑞陪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延安。胡耀邦在延安领导干部会议上作了《我对改变中国干旱地区面貌的意见》的讲话。

8月9日 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李鹏到达安康,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受灾群众和救灾的干部群众、人民解放军表示慰问。

9月7日 中共陕西省委、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开展大规模种草种树、彻底改变我省干旱地区农业落后面貌的决定》。

9月9日 中共陕西省委、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纠正乱摊派、减轻农民负担的规定》。

10月1日 中共陕西省顾问委员会办公室成立并正式对外办公。

10月22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决定从今年冬季开始,用三年时间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

11月12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会议,马文瑞在讲话中提出:“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一是全面整党;二是在思想战线上清除精神污染;三是扭亏增盈。”

11月14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听取党外人士对整党工作设想的意见。

11月16日至24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就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县级机构改革与政社分开、经济工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了相应的安排。

11月25日 中共陕西省委举行六届二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陕西省委关于整党的实施方案》。

11月28日至12月4日 中共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会议认为,全面整党开始后,纪律检查工作应围绕整党工作,保证整党顺利进行。

12月9日 陕西省级机关党群系统召开整党动员大会。全省整党工作全面展开。

12月15日 中共陕西省常委会决定从即日起,省委常委和省顾委常委、省政府正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正副主任、省纪检委常委、省政协正副主席集中三周时间集体学习整党文件。

12月29日 中共陕西省委整党办公室召开第一次联络员会议。会议指出,省委派往各行业和各单位联络员同时受省委和各行业整党指导小组的领导。联络员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所联系单位的整党情况,掌握动向,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及时反映情况,提出建议。

1984年

1月16日至23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学习中央[1984]1号文件。会议提出,继续解放思想,消除“左”的影响,进一步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生产,使全省农业更快地从自给和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商品经济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马文瑞在会上讲了话。

2月11日至18日 陕西省召开宣传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1983年宣传工作,研究制定了1984年开创思想战线新局面的任务和措施,安排部署即将到来的文明礼貌月活动。马文瑞作了《切实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的讲话。

2月15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广泛深入开展建设文明村(镇)活动的决定》。

3月9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宣布放宽林业政策的六条规定:在划自留山上,面积不应当限制;自留山以外的荒山、荒地、荒滩群众愿包的,承包面积不限,包期要长,待遇优厚;可以跨乡承包,种草种树等。

3月9日至12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召开首次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

3月13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联合组织的10个“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检查组,深入各地市进行检查。

3月29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省直机关党员领导干部大会,马文瑞作整党对照检查阶段动员报告。

4月2日至10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召开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会议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这个中心,通过了给企业放权的10条意见。

4月13日 中共陕西省常委会发出《关于大力促进商品生产发展的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就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的目标和方针;发展乡镇企业和开展多种经营;支持专业户、专业村、专业队、专业市场的发展;改革商品流通体制;开发农村智力;进一步放宽山区经济政策等问题确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4月26日 中共陕西省委结合整党,建立健全了省级党组织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民主协商制度。

5月16日 中共陕西省委整党办和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办公室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把解决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作为边整边改内容。

5月17日 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代表省委常委会作的整党中的对照检查在《陕西日报》上刊登。

5月23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省级机关整党对照检查阶段经验交流会。李溪溥在会上强调,坚决肃清“左”的影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6月24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作出决定,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检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尽快妥善处理“文化大革命”中查抄财物的遗留问题。

7月23日至3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集中研究部署了整党中的整改和经济改革问题。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主持会议并讲话。李溪溥就整党工作,李庆伟就全省经济改革问题,白纪年就努力实现经济翻番问题,分别在大会上发言。会议讨论修改了《关于改革干部制度的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外引进和经济协作工作的指示》、《关于依靠科学技术振兴陕西经济的决定》等文件。

8月6日至1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县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民主推荐省委主要负责人。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派员指导。根据民主推选意见,8月30日中共中央决定,白纪年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马文瑞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免去其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职务。

8月27日 中共陕西省委拟定陕北经济建设方针:(1)农业生产建设方针,实行农林牧并举,林草先行,综合治理,在做到粮食自给有余的同时,逐步建立以林业为主的商品生产基地;(2)工业生产建设方针,实行大中小并举,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积极开发煤炭、石油资源,逐步发展轻工业和能源工业。

8月28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保护农村专业户合法权益的若干规定》,对专业户的财产、生产经营、政治生活等方面的合法权益规定了17条具体的保护政策。

9月7日至1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来陕视察。

10月31日至11月4日 中共陕西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省、地、县主要负责同志在认真学习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的同时,组成1000多人的调查组,深入实际,进行100天左右的调查(简称为“千人百日”调查活动),为研究制定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最佳方案和措施提供依据。会后,由省、地组成

的10个调查组,开展了700多个专题调查研究,形成调查报告830多份。

11月2日至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宋任穷在省委书记周雅光陪同下视察榆林。

11月26日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庆祝建校50周年。

12月6日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陕西省委不再设第一书记。省委书记白纪年,省委副书记李庆伟、李溪溥、曾慎达、周雅光、董继昌、牟玲生。

12月24日至29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宣传部长会议。会议确定1985年宣传工作的重点是:抓好经济宣传,做好改革中的思想工作;搞好干部正规化理论学习;以倡导新的生活方式和振奋精神状态为主要内容,把“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1985年

1月10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的通知》,要求各级党政机关都要认真组织学习中央的决定,并对本地、本部门进行一次检查,凡以前所办企业,尽快与之脱钩,拒不执行中央决定的,要严肃处理。

1月1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党的城市基层组织工作会议,提出基层组织要发挥对企业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工作的保证监督作用。

1月18日至24日 中共陕西省委举行全省中青年干部“立志改革、振兴陕西”经验交流会。

2月1日至1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进一步搞好全省经济改革问题。提出今后工作重点是:(1)政放权、搞活大中型企业;(2)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步伐;(3)疏通商品流通渠道;(4)发展旅游产业;(5)开拓技术市场。

2月12日 中共陕西省六届三次全体委员会会议召开。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搞活国营工业企业的15项政策规定》等几个决定。

2月28日 中共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省级厅局党组、纪检组负责人会议,传达中纪委关于“令必行,禁必止”的紧急通知。

3月12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大力发展旅游点的决定》,指出,把发展旅游业作为发展第三产业,振兴陕西经济的突破口,大

胆起用和培养旅游专业人才,放宽政策,努力开创陕西旅游工作新局面。

3月18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会议,要求继续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3月22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省级机关和省属西安地区二期整党单位党员领导干部大会,强调要把纠正新的不正之风作为二期整党的重要内容。

4月7日 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进一步改革干部制度的规定》。

4月8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进一步加强贫困山区工作的紧急通知》,提出了加强贫困山区工作的四点要求和措施:(1)各级领导干部要在大好形势下警惕头脑发热,扎扎实实地工作,既要帮富,更要扶贫。(2)切实加强贫困山区的调查研究工作,通过调查,提出和制定扶贫、治穷、致富的意见和措施。(3)坚决纠正一些干部强迫命令的坏作风。(4)省委决定派出强有力的工作组到安康地区,就发展山区建设问题进行专题调查研究。

4月17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批转省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意见》。这次清理整顿的公司,主要对象是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营的公司,名不符实的“四无”公司,行政性公司和政企不分的公司。

4月22日 政协陕西五届三次会议在西安举行,会议选举谈维煦为省政协主席,增选吴庆云等五人为副主席。

6月5日至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地县整党经验交流会。

6月15日至19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我省府谷、神木、宜川、黄龙、白水、蒲城、澄城、合阳、韩城等县(市)视察工作,并对陕西经济的发展方向,治穷致富的路子,发表了许多意见。

6月21日至27日 4月下旬以来,新华社记者著文披露陕南山区的贫困、三门峡库区移民到西安游行、商县破获龙治民特大杀人案等问题,在省内外引起震动。为此,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白纪年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代表省委检查、寻找出工作中的六个薄弱环节,制定了一系列改进的措施。会议还推选了出席全国党代表会议的代表。

7月10日 省第七次妇女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选举张秀绒为妇联主任。

7月3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会,研究抗旱工作。

9月6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抽调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加强基层工作的决定》和《关于加强农村基层干部培训工作的

决定》。省委提出,要在近期内从省、地(市)、县级机关中抽调 5000 名干部深入农村,为进一步推动农村各项改革,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并决定,从现在起,用半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农村基层干部进行一次短期培训,此后,每年轮训一次,形成制度。

9月10日 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人民大厦举行第一届教师节庆祝大会。大会宣布了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 29 名优秀教师为省劳模称号的决定。

10月20日至2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十二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着重研究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问题。

10月22日至23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商洛地区和潼关县视察。

11月12日至13日 国务院副总理李鹏视察了神府煤田,并就发展陕北经济提出意见。

11月21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发出通知,要求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迅速改变全省教育事业同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不相适应的问题。

12月17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当前机关作风中几个严重问题的通知〉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切实解决好争相购买更换进口小轿车问题,彻底清理 1984 年以来购车、换车和配车的情况;从严掌握干部出国,坚决刹住请客送礼、公费旅游、经商牟利、中饱私囊等不正之风。

12月23日至28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整党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中指委领导的指示,研究了善始善终地搞好地、县级整党的措施,部署了全省县以下的整党工作。

1986 年

1月15日至16日 中共陕西省六届四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陕西省代表会议议题,决定将“七五”计划纲要(草案),省委、省顾委、省纪委调整方案等问题,提请省党代会审议。

1月17日至21日 中共陕西省代表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通过了《陕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和《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调整了省委、省顾委、省纪委委员。省委书记白纪

年,副书记李庆伟、周雅光、董继昌、牟玲生;省顾委主任章泽;省纪检委书记周雅光。

1月22日 中共陕西省顾问委员会举行第五次全会,增选了五位常委和一位副主任。

1月25日至29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1985年的工作,安排了1986年的工作。白纪年在会上作了报告。

2月7日 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

同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活动的通知》。

2月26日 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进一步加强工会工作,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支持工会参与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等重大决策性的活动。

3月6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布《关于农村整党工作的安排意见》,对农村整党工作提出了五项要求,指出,这次农村整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要围绕实现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总目标,把整党同农村第二步改革和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紧密结合,统筹安排,全面完成,通过整党解决好农村基层党组织不适应新形势的问题。在方法上要坚持“先乡后村”,分期分批地进行,全省到1987年春完成。

3月10日 中共陕西省委批准省顾委办公室改为省顾委办公厅。

3月26日 共青团陕西省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选举蒲长城为团省委书记。

4月12日 中共陕西省委在汉中召开农村整党工作会议。

4月16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严格按照党的原则选拔任用干部。强调选拔干部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办事,坚决纠正随意增设机构、提高机构规格和增加领导干部职数的不良倾向。

5月3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加强青少年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把加强青少年教育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

5月23日至24日 国务院副总理赵紫阳视察陕北神府煤田。

6月30日至7月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会议。会议交流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经验,表彰了近年来全省农村先进党支部和优秀党员。

8月5日至1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省委副书记周雅光传达了党中央的有关精神,省委宣传部长毛生铎作了《深入开展改革和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教育,促进农村两个文明建设更加迅速地向前发展》和报告。省委决定,授予30个单位为“全省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8月13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提倡科学、制止封建迷信活动的通知》。

8月15日至2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学习胡耀邦《关于党风和党内矛盾问题》的讲话和邓小平的有关指示,集中讨论了端正党风和农业及粮食生产问题,布置了今后四个月的工作。

8月22日至28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召开全省农村科技进步大会。会议的中心任务是:加速科技由城市向农村转移,研究用科学技术改造农业,武装乡镇企业,发展农村生产力问题。会议还讨论修改了陕西省农村科技进步“七五”规划和有关政策;表彰了87个先进集体和81名先进个人;宣布了关于向李振声课题组学习的决定。

10月27日 中共陕西省委举行纪念长征胜利50周年大会。

12月30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陕西省委财经工作领导小组,以加强省委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组长张勃兴(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副组长牟玲生、张斌。

1987年

1月12日至1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六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陕西省1987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划》和《关于召开陕西省党代表会议的决议》。省委书记白纪年在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争取两个文明建设的更大成绩》的讲话。

1月17日 中共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周雅光在会上作了《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支持保护促进改革,为实现我省党风的根本好转而奋斗》的讲话。会议强调纪检部门一定要站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前列。

1月27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认真做好清理非常设机构工作的通知》。

2月20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召开双增、双节动员大会。会议提出“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突出重点,讲求实效”。省委、省政府作出《关于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的决定》。

3月10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给创建文明城市取得优异成绩的五个城市予以表彰的决定》。受表彰的五个城市是:西安市、宝鸡市、咸阳市、铜川市、榆林县。

3月10日至17日 陕西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西安举行,选举张勃兴为陕西省省长。

3月25日至31日 陕西省纪检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白纪年在会上讲话,要求各级党委进一步加强对端正党风工作的领导,大力支持纪检工作,排除干扰,继续纠正不正之风。

4月3日至6日 陕西省宣传部长会议在西安召开。白纪年在会上作了《坚决、健康、持久地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的讲话。会议部署了加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整顿新闻舆论阵地等问题。

4月7日至11日 中共陕西省委在临潼召开整党工作座谈会。陕西省整党从1983年12月开始,历时3年6个月,参加整党的各级组织96780个,145万党员。省委整党工作指导小组组长李溪溥就整党后的工作作了部署。省委书记白纪年在会上总结了全省整党的收获,提出要做好工作,巩固整党成就,抓紧纠正不正之风,继续加强党的建设的要求。

5月16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决定成立陕西省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区领导小组。组长白纪年,副组长牟玲生、徐山林。同时,决定撤销陕西省秦巴山区工作领导小组。

5月25日 中共陕西省委批转省委组织部《关于加强城乡基层干部系统培训工作的意见》。

6月16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通知,批转省委宣传部《关于在全省各条战线广泛开展领导同群众对话活动的意见》。

6月22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加强卫生工作的决定》。决定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切实抓好此项工作,加快卫生事业的发展,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战略目标。

6月29日至7月3日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代表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

总结了全省整党工作,讨论了加强党的建设问题。白纪年在会上作了《在整党的基础上把我省党的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的报告。会议还选举产生了陕西省出席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37名代表。

8月21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召开的全省控制编制、调整干部结构工作会议结束。会议研究了如何采取措施,尽快刹住机构、编制和干部队伍膨胀的势头,并计划从全省党政群和事业单位选调3000多名干部充实政法和经济监督调节部门,以适应改革的需要。

8月26日 中共中央决定:张勃兴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免去白纪年的省委书记、常委职务。

9月29日 省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定,接受张勃兴辞去陕西省省长的请求,任命陕西省副省长侯宗宾为代理省长。

10月5日至8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陕西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会议要求高校要端正办学思想,克服只重视智育而轻视体育,只重视传授理论知识而轻视实践的偏向。

11月2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加强中小学师资队伍建设的指示》。要求:广开渠道,挖掘潜力,大力培养新师资;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培训提高在职教师素质;进一步理顺师范教育管理体制,保证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协调发展;加强师资培训基地建设;加强中小学教师的思想建设和组织管理。

11月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广泛宣传党的十三大文件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广泛宣传,全面、准确领会文件实质,结合实际工作贯彻落实。

11月21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干部工作的通知》,要求充分认识老干部工作的意义,检查老干部政策落实情况,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

12月16日至2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大精神,讨论部署全省1988年的工作。

12月26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六届七次全委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1988年4月召开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定》。

1988 年

1月10日 为加强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决定设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省长专线电话,方便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对话。

1月26日 陕西省六届人大第六次会议在西安召开,选举侯宗宾为陕西省省长。

2月1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省级机关党员领导干部大会。张勃兴就全省党风状况及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风建设问题作了重要讲话。

4月24日至26日 中共陕西省六届八次全体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和审议召开中共陕西省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有关事宜。

4月29日至5月4日 中共陕西省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张勃兴代表六届省委作了报告;通过了省委、省顾委、省纪委报告的决议;选举了中共陕西省第七届委员会。5日,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第七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张勃兴当选为省委书记,侯宗宾、董继昌、牟玲生当选为省委副书记。张勃兴、侯宗宾、董继昌、牟玲生、梁琦(女)、王希斌、支益民、安启元为常委。

同日 陕西省顾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章泽为省顾委主任,张方海、白文华为副主任。

同日 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李焕政为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杨鸿章、刘陶生、张旭为副书记。

5月18日至6月3日 陕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西安召开,李溪溥当选为人大主任,孙克华等10人为副主任;侯宗宾当选为省长,徐山林等三人为副省长。

6月17日至21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陕西考察。赵紫阳先后视察了榆林风沙区和西安、咸阳一些大中型企业,并同10个大中型企业负责人就加快大中型企业内部机制改革进行了座谈。

7月27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印发《陕西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纲要》,确定了1988年—2000年陕西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指导思想、战略目标和步骤。

8月4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研究讨论如何把全省正在开展的生产力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引向深化,推动全省改革和建设的发展;

如何加强党的纪检工作,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8月9日 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省委常委保持清正廉洁的决定》。

8月15日至20日 陕西省组织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传达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董继昌作了《从严治党,深化改革、开创我省组织工作新局面》的报告。

8月20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撤销省政府11个工作部门党组。

9月4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撤销中共陕西省委科教工作部,成立中共陕西省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

10月1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七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张勃兴作了题为《坚决贯彻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夺取我省改革和建设的新胜利》的报告。

10月20日 中共陕西省委举行党外人士座谈会,听取党外人士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及省委工作的意见。

10月22日 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在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中党组织和党员必须遵守的六条规定》。

11月18日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会举行会议,传达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研究了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业发展等问题。

12月30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加速农村发展,夺取1989年农业丰收的决定》。

1989年

1月16日至19日 中共陕西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联合召开信访工作会议。省委副书记牟玲生就信访工作的形势任务以及加强信访工作的领导问题作了报告。会议表彰奖励了65个先进集体和83名先进个人。

1月25日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会举行会议,学习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的关于反对腐败,保持廉洁的指示精神;制定了落实中央指示精神的具体措施和办法。

1月26日至28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召开全省高等院校党委书记、校长会议,研究加强高等院校思想政治工作,整顿秩序,从严治校,

优化育人环境等问题。

2月6日至8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习仲勋来陕视察。

3月3日至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在陕西视察。

3月18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对农村改革试验区扩大权限的若干规定》，确定礼泉县、大荔县、宝鸡县、汉中市分别被列为全国和陕西省的农村改革试验区。

4月13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表彰改革先进单位和优秀改革者的决定，表彰了15个改革先进单位和30名优秀改革者。

4月15日 陕西省召开党员教育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建立民主评议党员制度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在改革开放中进一步加强全省党员教育工作的安排意见》。

4月16日 中共陕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并胡耀邦家属发出唁电，对胡耀邦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4月26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认真学习人民日报〈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重要社论的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大专院校立即行动起来，同制造动乱的不法分子作坚决的斗争，要把反对动乱、维护安定团结的教育作为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

4月28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省级机关党员干部大会，省委书记张勃兴对制止当前发生的动乱提出了四项措施和要求：(1)学习《人民日报》4月26日的重要社论，提高认识，统一思想；(2)要积极主动地做好学生的的工作；(3)要采取措施，尽快恢复和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4)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要站在反对动乱斗争的第一线。

5月15日 张勃兴、侯宗宾等与西安部分高校学生干部座谈对话。

5月19日 张勃兴、侯宗宾在新城黄楼会见学生代表，接受了他们递交的请愿书，并同学生代表交换了意见。

5月2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紧急常委扩大会议。传达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精神。下午，省委、省政府又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了省委、省政府关于制止动乱的决定。同日，省委、省政府致电党中央、国务院，拥护在北京地区实行戒严、制止动乱的决策。

6月7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陕西省军区致电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平息反革命暴乱表示拥护。

6月12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省级机关干部大会。侯宗宾传达了邓小平6月9日接见北京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重要讲话。张勃兴通报了一个多月来全省特别是西安地区反对动乱斗争的情况。指出,要把反对动乱斗争作为各项工作的首要任务,认真抓好,夺取反对动乱斗争的全面胜利。

6月17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查处案件,惩治腐败的决定》。

6月19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西安“四二二”事件真相的通报》,以澄清事实,促进稳定。

6月26日 中共陕西省常委会举行会议,传达、讨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会议分析了发生这场动乱的原因,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今后要切实抓好的四项工作是:(1)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经常地、持久地、深入地进行下去;(2)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对党进行整顿,解决党组织和干部队伍不纯的问题;(3)必须大力惩治腐败,尽快取得效果;(4)坚定不移抓紧抓好经济工作。

同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公报的通知》。

6月28日至7月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七届三次全委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讨论研究制止动乱和做好当前工作等问题。省委书记张勃兴在会上作了题为《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夺取制止动乱斗争的彻底胜利》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第七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议》。

7月10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召开省级机关干部大会,部署清查反革命暴乱、动乱分子和惩治腐败工作。

7月17日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指示精神,为清查制造动乱的犯罪分子,彻底清理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队伍中的不纯分子,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决定成立清查、清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董继昌。

8月3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廉政建设的决定,并作出《关于近期内做好群众关心的六件事的决定》。这六件事是:(1)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2)坚决制止领导干部子女经商;(3)严格执行有关领导干部待遇问题的规定;(4)严禁请客送礼;(5)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6)抓紧查处大案、要案。

8月4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召开清理整顿公司动员大会。

8月10日至13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精神,讨论了中共陕西省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的意见》,部署了全省的宣传、思想工作。张勃兴作了《必须高度重视和大力加强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的讲话。

9月9日至13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延安和西安的纺织城、电子城、飞机城视察,听取了省委的汇报,并作了重要讲话。

9月11日至14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全省组织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组织部长会议精神。

10月1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省级机关领导干部大会,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通告》和监察部《通告》精神,敦促贪污、受贿、诈骗等犯罪分子坦白、自首。

10月18日 中共陕西省委转发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关于稳定农村政策,深化农村改革的意见》。

11月21日至2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修改省委《关于贯彻十三届五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搞好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意见》(讨论稿)和省委常委会向中共陕西省七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草稿)。

11月27日至12月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七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省委书记张勃兴在会上作了题为《认真学习十三届五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为实现我省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而奋斗》的报告。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省委《关于贯彻十三届五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搞好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实施方案》、《关于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决定》及其工作报告。

12月3日至5日 中共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中纪委第五次全会和省委七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李焕政作了《贯彻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精神,加强党风、党纪建设,保证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任务的完成》的工作报告。

1990年

1月4日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会和省政府常务会共同召开会议,听取清

理整顿公司工作情况的汇报。

1月19日 中共陕西省常委会举行会议,讨论干部下基层工作问题。会议发出《关于组织党政机关干部下基层的通知》。要求省级各部门、各地(市)、县,都要抽调相当数量的机关干部,于2月15日前下到基层。省级党政机关干部下基层调查研究,每年三批,每批不少于一个月。

2月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省级机关领导干部大会。张勃兴在会上就党政干部下基层作了《深入基层,转变作风,为稳定大局推进工作,全面落实党的五中全会确定的各项任务而努力》的动员报告。

2月1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基层党委书记,省工、青、妇组织负责人会议,学习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工会、青年团、妇联工作领导的通知》。

3月8日 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省军区联合发出《关于向雷锋式好战士李润虎学习的决定》。

3月14日 陕西省七届人大第十三次常委会议在西安召开,接受了侯宗宾辞去省长职务的请求,选举白清才为陕西省副省长,代理省长。

3月21日至26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七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学习和讨论了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精神,审议并通过了张勃兴代表省委作的工作报告和省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的实施意见》。

4月6日 中共中央决定,安启元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

4月12日至21日 省委书记张勃兴陪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李瑞环在陕西视察工作。

5月9日 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召开清理党政干部违法、违纪、违章建私房电话会议。

5月3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电话会议,进一步动员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

6月26日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与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在西安签署了陕西省与山东省建立长期稳定经济文化合作关系协议。

7月4日至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全省调查研究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经验,表彰了先进,明确了新形势下调查研究工作的地位和任务。

7月30日至8月3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全省统战工作会议。会议传

达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精神,研究了进一步加强全省统战工作的任务和措施,讨论了省委提出的《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通知〉的意见》。张勃兴在会上作了题为《必须高度重视和大力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讲话。

8月13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成立陕西省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专业职务评定领导小组。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巨才任组长。

9月4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并经中央同意,程安东任中共西安市委常委、书记。免去安启元中共西安市委常委、书记职务。

10月5日至9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会议研究在治理整顿期间农村改革的重点和如何深化问题;研究“八五”期间到本世纪末全省粮食上台阶问题;安排部署今冬明春的农村工作。

10月27日 陕西省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选举张秀绒为省妇联主任。

11月16日至21日 国务院总理李鹏来陕西考察。

11月28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省级各民主党派、有关人民团体负责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协商会议,听取党外人士对陕西制定“八五”计划的意见。

12月1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开展向李立科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

12月1日至3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召开学习沿海经验座谈会。会上省委、省政府代表团分别介绍了赴天津、山东、上海、福建学习考察的情况,认真寻找差距,研究制定了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陕西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

12月20日至23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会议。省委决定,用三四年时间,集中力量,分期分批地在全省农村中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1991年1月3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了《关于在全省农村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决定》。

1991年

1月16日至21日 中共陕西省七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讨论了制定陕西省“八五”计划的思路,

安排部署了1991年的工作。

2月7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制定了《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选拔管理暂行办法》。

4月1日 江苏省来陕交流的73名干部抵达西安。6日来陕交流干部赴汉中、安康、商洛、宝鸡四个地市挂职工作。

5月2日 陕西省73名赴江苏挂职干部起程赴江苏。

5月14日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同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沈达人在南京签订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两省间的交流与合作的协商纪要。

7月4日至8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讨论研究发展乡镇企业,搞活流通及搞好大中型企业等问题。

7月11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陕西省军区在延安召开双拥模范城(地区)建设现场经验交流暨命名大会。会议授予延安、渭南双拥模范城、地区称号。

9月6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企业法〉,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的决定》。

10月12日至16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研究进一步搞活大中型企业和流通问题。

11月2日至4日 国家主席杨尚昆来陕西视察。

11月24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水利建设的决定》。

12月10日至14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七届七次全体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省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召开陕西省党代表会议的决议》。省委书记张勃兴在会上作了题为《振奋精神,励精图治,把农村改革与发展推向新阶段》的报告。

1992年

2月27日 中共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宣布,为了进一步实施和推广行之有效的党风和廉政建设制度,拟在全省普遍推行四项制度。即:领导干部个人及其家庭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各级党委、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事项的公布制度;组织各界代表评议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制

度;实行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党风廉政领导责任制。

3月5日 中共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陕西省监察厅作出《关于支持保护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规定》。

3月21日 山东赴陕挂职工作的54名干部抵达西安。25日,54名干部分赴延安、榆林工作。

4月16日至18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学习贯彻邓小平南巡谈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着重研究加快全省改革开放和加速经济发展的问题。

4月19日 中共陕西省召开七届八次全体会议,讨论陕西省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事项。

6月12日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同新闻界进行座谈,就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加快改革开放,促进全省经济上新台阶等问题发表意见。

6月28日至7月2日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代表会议在西安举行。会议讨论研究了陕西省经济工作在90年代跃上新台阶的问题;选举了陕西省出席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张勃兴代表省常委会作了题为《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突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使陕西在90年代上一个新台阶而努力奋斗》的讲话。

7月3日至5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在西安召开全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研究制定了全省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战略目标、工作重点。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增强总体开放意识,带领全省人民走出一条具有内陆省份特色的对外开放的路子。

7月20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意见》。

7月23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促进国民经济跃上新台阶的实施方案》,调整了重要经济发展指标,确定了20项兴陕工程。

8月10日至13日 陕西省召开统战工作会议,讨论统战工作如何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

8月24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研究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真抓实干,把省党代会提出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8月28日 中共中央决定,刘荣惠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9月10日至12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召开县级综合改革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进一步搞好县级综合改革,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扩大县级综合改革重点县县级经济管理权限的若干规定》。会议决定,“八五”期间全省普遍推行此项改革。

10月7日 共青团陕西省第八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选举蒲长城为团省委书记。

11月23日至27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工作会议。研究部署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全省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思路和措施。

11月27日 中共陕西省召开七届九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中共陕西省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93年4月在西安召开。

12月4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意见》。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充分认识加强党建的重大意义,认真贯彻落实十四大提出的要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牢固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

1993年

1月5日至8日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召开陕西普通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贯彻全国高教会议和省委工作会议精神,研究解决全省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

4月10日 政协陕西省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西安举行,周雅光当选为省政协主席,董继昌等八人当选为副主席。

4月12日 陕西省八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在西安召开,张勃兴当选为省人大主任,牟玲生等六人当选为副主任;白清才当选陕西省省长,徐山林等六人当选为副省长。

5月12日至16日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共陕西省第七届委员会、顾问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选举了中共陕西省第八届委员会、中共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张勃兴代表七届省委向大会作了题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扩大开放,为提前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的报告。鉴于党的十四大决定不再设立顾问委

员会,大会批准不再设立省顾问委员会。16日,中共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李焕政为省纪委书记,石学友、孙安华、刘国元为副书记。17日,中共陕西省召开八届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张勃兴为省委书记,白清才、刘荣惠、支益民为省委副书记,程安东、李焕政、徐山林、郑斯林、王志成、刘揆楚、贾治邦、艾丕善为常委。

第一编

新民主主义时期的
中共陕西组织及活动

(1919.5—1949.10)

第一篇 中共组织的创立及在大革命时期的活动

(1919.5—1927.7)

陕西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后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建立较早的省份之一。辛亥革命前陕西的知识分子已接触马克思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逐步在陕西传播起来。1922年陕西地区就有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活动。党团组织的建立是先有团组织,后有党组织。陕西早期党、团组织的建立有两种情况,一是在京、津、沪、汉等地加入组织的党、团员,根据当地党组织的指示回陕西发展党、团员,建立组织,受有关地方党、团组织的领导;二是党、团中央派人到陕西建立组织,受党、团中央直接领导。1922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王尚德受武汉地区党团组织的委派,回陕发展组织。1924年6月,王尚德等人在渭南赤水建立了陕西第一个团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支部干事会,不久改为独立支部、特支。此后陆续成立了青年团西安第一支部、西安第二支部、西安特支、绥德特支、三原特支、澄城特支。1925年11月,共青团西安地委成立,统一了关中地区团组织的领导。此后,团绥德地委、三原地委建立。

1925年秋,中共北京区委派共产党员安存真来陕西进行整团建党工作,中共豫陕区委也委托由上海赴陕整团的团中央特派员吴化之在西安建党。1925年10月,组建了中共西安特别支部,直属中共豫陕区委。1926年初,建立了中共西安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关中地区党组织。年底,建立了赤水特支、三原特支。1926年5月,中共北方区委特派员耿炳光到陕北,对在此之前建立的陕北地区的党组织进行整顿,于6月建立了中共绥德地委。1926年11月西安解除军阀刘镇华部包围后,建立了陕西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陕西省党、团联席会议。1927年1月,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决定建立党、团陕

甘区委。3月,中共陕甘区委在西安建立,辖6个地委和41个特支。同时共青团陕甘区委亦建立起来,辖六个地委37个特支。1927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陕甘区委,建立中共陕西省委。

在此期间,陕西地区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国共合作的路线和政策,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积极开创陕西革命的新局面。1925年初,共产党员在西安主持建立了陕西省国民会议促成会,旗帜鲜明地支持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反对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五卅惨案发生后,陕西地区的共产党员和团组织,立即组织广大群众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并开展罢工、罢市、罢课斗争,配合国民军驱逐了北洋军阀在陕西的军务督办吴新田。大革命时期,根据党、团中央的指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帮助国民党在陕西建立组织。当选的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的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其组织、宣传、农民各部的部长均由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后,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员和县级党部都有较大的发展。1926年春,中共西安地委和共青团西安地委支持和配合国民军开展反直系军阀刘镇华围攻西安的斗争。西安解围后,建立了由共产党、国民党、国民军联军三位一体的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形式的陕西省军政府——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陕西党、团组织派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参加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的工作。一些要害部门的领导为共产党员担任,国共合作呈现高潮。截至1927年6月,陕西中共地委一级组织由陕甘区委成立时的3个增加到7个,特支由9个增加到41个,党员亦由388名增加到2177名。团地委一级组织由3个增加到6个,特支由16个增加到37个,团员由525名增加到2400名。在中共组织帮助下,国民党党员发展更快,由原来的500名发展到2.3万名。新委派的60多名县长,多数依靠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主持的国民党组织推行行政事务。群众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迅速开展,到1927年春夏,全省50个县建立有农协组织,会员37万。6月,建立了全部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组成的陕西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一些地方出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政治局面。在此期间,省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不断深入,推动了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出师北伐,陕西大革命运动出现高潮。1927年4月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陕西党、团组织领导群众开展了反蒋讨蒋活动。1927年6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汪精卫公开反共,在陕西实行“清党反共”,各地党、团组织遭到不同

程度的破坏,党员人数降为 1681 人,党组织亦由半公开活动转入秘密状态。1927 年 5 月,中共中央常委决定,耿炳光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7 月,中央决定撤销中共陕甘区委,建立中共陕西省委,由中央指定的省委领导及党团陕甘区委负责人于 7 月初在西安开会,正式成立中共陕西省委。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土地革命新的历史时期。经过大革命运动锻炼的陕西党组织和广大党、团员,团结广大工农群众,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方针,为建立红军和根据地展开了新的斗争。

第一章 中共组织与进步团体

中共陕西地区早期组织创建于大革命时期,先建立团组织,后建立党组织;先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团员,后在工农群众中发展党、团员;先在城镇建立组织,后在农村建立组织。

1924 年 6 月,陕西地区最早的团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支部干事会(又称赤水支部)建立。接着先后在西安、绥德、三原、华县、榆林、延安等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或特支。1925 年 11 月,成立了共青团西安地方委员会,统一领导关中各地及延安团的组织,隶属共青团豫陕区委;12 月,共青团绥德地区执行委员会成立,统一领导绥德、榆林等陕北地区的团组织,先隶属团中央,后划归团北方区委。

1925 年 10 月下旬,中共西安特别支部建立。同年底,在三原、渭南赤水先后建立了党的支部或特支。陕北最早建立的党组织是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党支部。1926 年初,中共西安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隶属中共豫陕区委,辖三原、渭南赤水等特支。6 月,中共绥德地方委员会成立,领导陕北地区党的组织。此后,陕西地区先后建立了陕西党团联席会议、中共陕甘区委、中共陕西省委等领导机关。1927 年 5 月,陕西大革命形成高潮时,中共陕甘区委在陕西下辖有陕西省的西安、渭南、绥德、三原、泾阳、榆林、延安等 7 个地(市)委及 41 个特支,有党员 2177 名。同时,共青团陕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辖有陕西省的西安、渭南、三原、泾阳、绥德、延安等 6 个地委及 37 个特支、两个支

部,团员 2400 人。

1927 年 4 月蒋介石叛变革命,但陕西地区革命形势仍在发展。同年 5 月,中共中央决定取消陕甘区委,成立陕西省委。1927 年 7 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正式成立。7 月 7 日,共青团陕西省委在西安建立。此时冯玉祥追随蒋介石、汪精卫在陕西进行“清党”反共,陕西各级党团组织遭受破坏,党团员人数锐减。

第一节 中共组织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当时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求学的一些陕西籍青年先后加入中共组织。他们受党、团中央或地方组织派遣,回到陕西开展革命工作,发展党团员,组建党团组织。1925 年 10 月后陆续在西安、三原、渭南、绥德、榆林、宜川、延安等地建立起中共组织。1926 年 2 月,中共中央将绥德、榆林、宜川党组织划归中共北方区委管辖,关中地区和延安党组织划归中共豫陕区委管辖。到 1927 年 7 月大革命失败,陕西先后建立了党团联席会议、中共陕甘区委等组织,统一领导陕西的党组织。截至 1927 年 6 月,中共陕甘区委共辖 7 个地委,4 个部委和直属的 17 个特别支部、4 个支部 2177 名党员。这一时期党的基层组织的分布:陕北集中于绥德,渐及榆林、延安;关中主要集中在东至潼关,西至长武的渭河流域,渐及陕南。1927 年 7 月,中共陕西省委成立时,全省 153 个支部,分布在关中、陕北 25 个县。其中西安 10 个、长安 33 个、渭南 20 个、三原 6 个、五台县(今渭南市临渭区固市一带)9 个、绥德 17 个、延安 10 个、华县 5 个、泾阳 3 个、乾县 3 个、岐山 3 个,高陵、旬邑、淳化、礼泉、武功、兴平、蓝田、临潼、蒲城、富平、华阴、雨金(临潼)、关山、平凉各 1 个。合阳、朝邑(今属大荔)、韩城、白水、周至、扶风、永寿、凤翔、澄城、咸阳、户县以及陕南等地有分散的党员,全省共有党员 1681 人。

1. 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

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是大革命时期北方成立最早的中共区委。其前身是中共北京区委。1924 年底,中共中央决定改北京区委为北方区委,书记赵世炎。1925 年 1 月中共四大后,李大钊为书记。1926 年 2 月后,北方区委管辖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包括河北、山西、陕西、甘肃、绥远、察哈尔、热河以及

东北三省的党团组织。1927年4月,北方区委组织遭受破坏,李大钊等大批党员遭到杀害。5月19日,成立顺直省委,实际取代了北方区委的部分地位和工作任务。

2. 中共豫陕区执行委员会

1924年10月冯玉祥北京政变后,河南、陕西的部分地区成为冯玉祥国民军的势力范围。在国民军占领的地区里,革命运动有了新的发展。为了适应北方出现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区委派王若飞、萧楚女、李求实、刘天章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到河南,开展工人、农民和学生运动,并筹建党团豫陕区委。1925年7月8日,共青团开封地委建立,代行团豫陕区委职权(不久团区委正式成立),马文彦、李求实先后任书记。1925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共豫陕区委在开封成立,书记王若飞,委员有黄平万(王用时)、李求实等。管辖河南和陕西的党组织,还领导徐州、宿县等地的工作。豫陕区委成立后,中共中央又于1925年底派黄平万到西安发展党的组织,并于1926年初在中共西安特支的基础上成立了西安地委,归豫陕区委领导。1926年2月,中共中央把绥德、榆林、宜川的党、团组织划归党、团北方区委领导,关中地区及延安地区的党、团组织仍归豫陕区委管辖。4月,直系军阀刘镇华部队围困西安,关中地区党、团组织与上级组织联系中断。同年8月,中共豫陕区委改为豫区委,同陕西中共组织无隶属关系。

3. 中共西安特别支部

1925年9月,中共北方区委派安存真(安体诚)来西安做军事工作,同时发展党的组织。稍后,共青团中央特派员吴化之也受中共豫陕区委的委托,来西安开展建党工作。他们与西安的共产党员雷晋笙等建立了联系,于1925年10月建立了中共西安特别支部,书记安存真,隶属中共豫陕区委领导。同年12月,安存真离开西安,吴化之接任书记。1926年1月,黄平万、吴化之等人在中共西安特支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共西安地委。

4. 中共赤水特别支部

1925年12月,中共西安特支书记、共青团西安地委书记吴化之去渭南,按照团中央1925年121号通告精神,将共青团赤水特支中的王尚德(王璋峰)、张浩如等六七名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并组建了中共赤水特别支部,书记王尚德。机关驻赤水职业学校,隶属中共豫陕区委,后改属中共西安地委领导。特支活动范围主要在渭南赤水地区和华县高塘一带。

5. 中共三原特别支部

1925年2月,共青团员李秉乾受团中央派遣由上海回到三原,建立了共青团三原特别支部。同年12月,中共西安特支书记吴化之到达三原,先后将各校年满18岁的部分优秀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并在省立三原第三职业学校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共三原特别支部,书记先后为张仲实、贾子明,隶属中共豫陕区委领导。1926年初中共西安地委成立后,改由西安地委领导。1927年3月22日,三原特支改为中共三原地委。

6. 中共绥德特别支部

中共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简称绥师)党组织是陕北地区最早建立的共产党组织。该组织建立的时间和领导人,说法不一。田伯英回忆说,王懋廷和他于1924年10月以后在绥师建立了中共小组,田伯英为组长。1925年先后建立了支部、特支。耿炳光回忆说,他于1925年去绥师,建立了陕北第一个党支部,书记李子洲。有些老同志填写的个人档案中说自己是1925年在绥师入党的,还有个别人说是1924年入党的。也有的回忆材料说,绥师党组织建立于1926年1月或1926年初。根据目前征集到的历史文献看,王懋廷于1924年12月29日给邓中夏写信,提出要邓介绍他和田伯英及14名学生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批准在绥师建立地方团,并安排应做的工作。共青团绥德地委书记冯景翼1926年1月14日写给团中央的报告中说:“组织CP^①一层,此处已决定成立。”接着,在同月17日写的报告中说:“此地CP已成立支部,有同志八人,旧CP一人,由CY^②提出七人,……指定书记一人——田伯英。”因田伯英在西安开会,由李子洲代理书记。团北方区委文件记载,陕北党、团组织于1926年2月划归北方区委管辖,4月接上关系,1926年5月1日派耿炳光赴陕北整顿党、团组织。中共陕西省委和共青团陕西省委于1927年10月联合发出的《关于党团关系的通告》中曾说,陕西1925年10月以前还没有党的组织。1926年6月,在中共绥德特支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

7. 中共西安地方执行委员会

1925年11月,中共豫陕区委派黄平万来陕筹建中共西安地委。黄到西安后,参与了中共西安特支的领导工作。同年底,黄平万、吴化之把西安团组

① CP为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

② CY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

织中年龄较大的团员转为党员。1926年初,经中共豫陕区委批准,在中共西安特支基础上建立了中共西安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黄平万。机关先后设在西安桃胡巷、太阳庙门慈善巷,隶属中共豫陕区委领导。1926年4月,西安被军阀刘镇华围困后与上级领导机关失去联系。此时地委下辖私立民立中学支部、省立单级师范学校支部、私立敬业中学支部、私立成德中学支部、省立一中支部、省立三中支部、东九府街支部、西九府街支部、暑期学校支部、赤水特支、三原特支、肤施特支、渭南特支、固市特支、岐山特支、乾县特支、旬邑特支、泾阳特支、富平特支、隆兴独立支部等。

西安解围后,地委先后派党员到西安附近各县开展农民运动,建立党组织,至1927年2月,在西安城区及关中各县及延安共建立支部和特别支部19个。此时,地委归陕西党团联席会议领导,机关驻地太阳庙门慈善巷。地委下辖私立民立中学支部、私立敬业中学支部、私立成德中学支部、省立一中支部、东九府街支部、西九府街支部、中共政治队支部^①、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支部、省财委、民政厅支部、长安支部、长安五楼支部、长安三桥东张支部、长安茧子村支部、长安鱼化寨支部、肤施特别支部、旬邑特别支部、岐山特别支部、乾县特别支部、富平特别支部、泾阳特别支部、兴平特别支部、三原特别支部、临潼特别支部等。1927年2月,中共陕甘区委成立后,西安地委工作由中共陕甘区委兼理。

8. 中共渭南特别支部

1926年1月,中共西安地委派宋蔚青到渭南发展组织,召集城区周围的党员在西关南塘巷开会,建立了中共渭南特支,代号“渭兰芝”,书记先后为宋蔚青、贞德暹。特支隶属西安地委领导。1926年11月,陕西党团联席会议派张秉仁(张性初)、罗承运去渭南,12月在特支基础上成立了中共渭南地委。

9. 中共延安特别支部

1926年春(一说夏),根据共青团中央121号通告要求,共产党员呼延震东等人在延安四中原共青团肤施特支的基础上,分设并组建了中共延安特别支部,书记呼延震东。特支先后辖安定、湫峪沟、蟠龙、延川、延长、宜川、甘泉等七个支部。特支先后属中共豫陕区委、陕西党团联席会议和陕甘区委领导。1927年4月,根据中共陕甘区委决定,撤销延安特支,设立中共延安地方

^① 政治队是以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名义开办的。

执行委员会,原特支所辖组织改由地委领导。

10. 中共宜川(军队)第一特别支部

1926年春,根据共青团中央121号通告精神,共产党员李象九等人在陕北军阀井岳秀部队驻地宜川集义镇组建了中共宜川(军队)第一特支,书记李象九(一说李政煦),属中共绥德党组织领导,并受中共北方区委的指导。1927年春,特支随部队转移驻清涧县城,称清涧(军队)特支,归中共陕甘区委直接领导。

11. 中共宜川(军队)第二特别支部

1926年春,根据共青团中央121号通告精神,谢子长等人在陕北军阀井岳秀部队驻地宜川县城组建了中共宜川(军队)第二特别支部,书记谢子长(一说杜振庭),属中共绥德地委领导,并受中共北方区委的指导。1927年春,特支随部队移驻安定瓦窑堡,称安定(军队)特支,归中共陕甘区委直接领导。

12. 中共榆林特别支部

1926年上半年(一说1925年12月)中共榆林特别支部在榆林成立,书记刘景象。特支先后隶属中共绥德特支和绥德地委领导,下辖榆林中学、榆林单级师范、女子师范和榆林高级小学四个支部。机关驻榆林中学附设之平民学校。1926年9月,郭洪涛接任特支书记,特支改由中共北方区委领导。1927年5月,榆林特支改为中共榆林地方执行委员会。

13. 中共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

1926年5月,共青团北方区委派耿炳光为陕北特派员,对陕北地区党、团组织进行整顿。6月,在中共绥德特支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田伯英。1927年1月,田伯英调延安工作,蔡南轩任书记。地委机关驻地绥德四师高家祠堂,隶属中共北方区委领导。先后下辖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第一支部、第二支部、第三支部、榆林特别支部(该特支下辖榆林中学支部、榆林女子师范学校支部、榆林单级师范学校支部、榆林高级小学支部)、定边特支、绥德苗家坪高级小学支部、宜川(军队)第一特别支部、宜川(军队)第二特别支部、绥德义合特别支部、绥德米家沟特别支部。1927年2月,中共陕甘区委成立后,地委划归中共陕甘区委领导。同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成立,中共绥德地委改为中共绥德县委。

14. 中共乾县特别支部

1926年8月,中共西安地委派张含辉、曹碧轩到乾县发展党的组织。他

们以国民党乾县县党部筹备处名义进行革命活动,发展中共党员,并建立了中共乾县特支,书记先后为张含辉、王炳南、王玉栽。特支先后隶属中共西安地委、陕西党团联席会议、陕甘区委领导。1927年7月,中共乾县特支改为中共乾县区委。

15. 中共富平特别支部

1926年10月,共产党员严木三等按照中共西安地委指示,在富平董家庄成立了中共富平特别支部,书记先后为严木三、张卓亭、张超。特支隶属西安地委领导,1927年3月,中共三原地委成立后改属三原地委领导。1928年3月,中共富平区委成立,特支结束。

16. 中共泾阳特别支部

1925年11月,耿觉、陈靖等共产党员回到泾阳,积极筹备建立中共党团组织。1926年5月建立了共青团泾阳特支。11月,中共西安地委派蒲克敏到泾阳从事建党工作,经与耿觉等人商议,先后接收了一批党员,在县城第一高小成立了中共泾阳特支,书记耿觉。特支先后隶属西安地委、三原地委领导。1927年5月,中共陕甘区委决定,将泾阳特支改为中共泾阳地委。

17. 中共兴平特别支部

1926年11月,中共西安地委派曹碧轩等以国民党兴平县党部筹备委员身份回兴平发展中共组织。12月,曹碧轩在兴平县城北寺召开党员大会,成立了中共兴平特支,书记曹碧轩,副书记杨景辉。特支先后隶属中共西安地委、陕甘区委领导。1927年4月,兴平特支改为中共兴平支部,由李仁轩、雷士宏负责。7月,李仁轩、雷士宏奉命离开兴平,支部遂停止活动。

18. 陕西党团联席会议

1926年11月底,国民军联军击溃军阀刘镇华部,使被困八个月之久的西安解围。西安解围后,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云集西安,为加强党的领导,中共西安地委在未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的情况下,于1926年12月成立了党团联席会议,作为临时性的党团最高指导机关,黄平万、吴化之分别担任正、副书记。下辖中共西安地委、渭南地委及10个特别支部和共青团西安、渭南、三原地委及14个共青团特别支部。党团联席会议成立后,派魏野畴、李子洲、史可轩、杨明轩、杨晓初等共产党人到国民军联军各部队作政治工作,并到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工作。同时,陕西党团联席会议还调派大批党、团员,分赴农村、工厂、学校,开展农民、工人、学生和妇女运

动,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团组织,为中共陕甘区委的成立,从思想上、组织上、干部上作了准备。1927年2月,中共陕甘区委成立,陕西党团联席会议结束。

19. 中共渭南地方执行委员会

1926年11月,陕西党团联席会议派张性初到渭南整顿党的组织,12月建立了中共渭南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雷光显,后为何挺杰、吕佑乾。地委机关驻渭南东关小学,隶属陕西党团联席会议领导。此时地委下辖赤水特别支部、固市特别支部、谷堆小学支部、大王支部、郑村支部、包氏庙支部、咸林中学支部、杨尧村支部、贺家村支部、窟圪村支部、王埝村支部、渭南县立高小支部、渭南单级师范学校支部、渭南教育局支部、隆兴特别支部。1927年2月,中共陕甘区委成立后,地委归属中共陕甘区委领导。陕甘区委领导期间,中共渭南地委下辖赤水特别支部(该特支下辖姚李村支部、田家村支部、华县三张支部)、固市特别支部(该特支下辖大寨子支部、新民学校支部、阎家村支部、赵家崖支部、韩家集支部、下吉支部、安刘村支部、隆兴支部、蒲城荆姚支部、大荔芟家庄支部、固市小学支部)、高塘特别支部(该特支下辖算王支部、高塘小学支部、谷堆小学支部、大王支部、高塘民团支部)、华县特别支部(该特支下辖郑村支部、包氏庙支部、咸林中学支部、瓜坡支部、郭村支部、七里寺支部、杜家堡支部、华县教育局支部)、杨尧村支部、贺家村支部、窟圪村支部、王埝村支部、渭南县立高小支部、渭南单级师范学校支部、渭南教育局支部、三张镇支部、长稔小学支部、宋村支部、渭南第二部委员会。同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当时形势和中共“五大”精神,撤销中共渭南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中共渭南县委。

20. 中共陕甘区执行委员会

中共陕甘区执行委员会是大革命时期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陕西、甘肃地区的地方组织。1926年11月底,国民军联军击败北洋军阀刘镇华部,解了西安之围后,西北出现了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在此前后,中共中央及北方区委、豫陕区委相继派人到陕西,建立党团组织,领导工农革命运动。当时已在陕西地区工作的党员有200多人,加上在国民军联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200多人,陕西党员已达到400多人,并已先后建立了中共西安地委、绥德地委、渭南地委、三原特别支部、赤水特支、甘肃特支等地方组织。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北方区委向中共中央建议,派耿炳光为党的临时工作特派员,统一指挥陕西全省党的工作,并于最短时期内成立区委,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中

共中央也认为陕西形势发展很快,于1927年1月28日决定成立中共陕甘区执行委员会,任命耿炳光为书记,负责领导陕西、甘肃两省党的工作。耿炳光到西安后,与黄平万、吴化之、李子洲等取得联系,于1927年2月25日在西安桃胡巷召开中共陕甘区委第一次会议,耿炳光、曹趾仁、黄平万、吴化之、李子洲、赵葆华等参加。会议决定召开中共陕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区委。3月14日至18日,中共陕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中山学院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11人,代表九处党组织,耿炳光、曹趾仁主持会议。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由正式委员五名,候补委员两名(暂缺)组成的中共陕甘区执行委员会,耿炳光为书记,魏野畴负责宣传,李子洲负责组织,亢维恪为农委书记,陈家珍为军委书记。

这次代表会议决定改组中共西安、渭南、绥德三个地委,组建中共三原、延安、榆林三个地委,临潼、咸阳、兴平、岐山、乾县、旬邑六个特别支部归区委直辖。1927年五六月间,又决定成立中共五一(1927年1月1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决定将渭南固市一带划为“五一县”,设立县治)、泾阳两个地委和一些特别支部、支部(后五一地委未能建立)。到1927年6月底,陕甘区委共辖西安、渭南、三原、泾阳、绥德、榆林、延安7个地委、4个部委和直属的临潼、咸阳、兴平、岐山、乾县、旬邑、潼关、礼泉、临潼雨金(军队)、户县、商县、龙驹寨、同官(今铜川市印台区、王益区)、华阴、蓝田特别支部及合阳学生回乡工作队、武功等17个特别支部和支部。

1927年6月,为健全区委组织,中共陕甘区委决定增补刘天章、杜衡为候补委员,刘天章负责宣传,杜衡分管组织,并负责西安各支部的指导工作;军委书记陈家珍因工作消极,区委决定停止其工作,由魏野畴负责军事工作。

中共陕甘区委根据陕西党组织成立仅一年多时间,力量比较薄弱,基本群众是农民的实际情况,确定其工作原则为:工作集中,人才集中,到农民中去,工作重点应当首先致力于农民运动。在地域上,首先集中于陕西,渐及甘肃。在陕西则集中在东到潼关,西到长武的渭河流域,渐及陕北、陕南。陕北集中于绥德,渐及榆林、延安。为了集中人力,区委决定西安地委的工作由区委兼理。到1927年6月,陕西党员人数达2177人。

中共陕甘区委建立后,领导陕西地区党组织及共青团组织、陕西省总工会、陕西省农民协会和陕西省学生联合会、陕西青年社等群众组织,积极开展农运、工运、青运和妇女运动,把陕西地区大革命运动推向了高潮。刘伯坚、

史可轩、刘含初、李林、邓希贤(邓小平)等著名共产党人参与领导的西安中山学院和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为陕西、甘肃等地培养了一批军事、政治、农运、妇运干部。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陕甘区委领导广大群众继续坚持斗争,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和屠杀革命人民的罪行。1927年7月,冯玉祥在陕西“清党”反共后,陕西革命形势逆转,中共陕甘区委在西安中山学院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决定各级党组织尽快由半公开活动转入秘密状态,重要干部秘密离开西安,各地请示工作由耿炳光、杜衡两人负责接待。

1927年7月初,黄平万参加中共五大后返回西安,带来中共中央撤销中共陕甘区委,成立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7月上旬,由中央任命的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人与前陕甘区委负责人在西安秘密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共陕西省委,陕甘区委完成了使命。

中共陕甘区委隶属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先后驻西安桃胡巷、北大街故衣店、红埠街九号。

21. 中共岐山特别支部干事会

1926年下半年,在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上学的岐山籍学生、共产党员李琦、曹永丰等回到岐山。他们在县职业学校开展活动,建立了党团小组,李琦为组长。1927年2月,李琦、曹永丰、雷星阶等根据中共陕甘区委的指示,在岐山县教育局开会,决定将岐山党、团组织分设,成立了中共岐山特别支部干事会,书记李琦。7月,经中共陕西省委批准,中共岐山特支改为中共岐山区委。

22. 中共咸阳特别支部

1927年1月,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执行委员、共产党员赵葆华派张怀义、李特生为省党部特派员,到咸阳以指导县党部工作的名义,发展中共党、团组织和开展农民运动。3月,成立了中共咸阳特别支部,书记张怀义。特支隶属中共陕甘区委领导。6月,咸阳特支改为中共咸阳支部,书记徐德林。

23. 中共三原地方执行委员会

1927年3月22日,中共三原地委在中共三原特别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书记张性初,隶属中共陕甘区委领导。地委下辖中共泾阳特别支部(该特支下辖泾阳第一高小支部、第二高小支部、女子高小支部、单级师范学校支部)、云阳特别支部、高陵特别支部、富平特别支部(该特支下辖富平第一高小支部)、

蒲城特别支部、渭北中学支部、第三师范学校支部、大寨支部、合字区支部、西王支部、蒙家支部、鲍氏庙支部、三原女子中学支部、三原地委机关支部。地委机关设在三原县渭北中学。同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有关规定,取消了地委一级建制,中共三原地委改为中共三原县委。

24. 中共陕甘区执行委员会兼理的西安地方执行委员会

1927年3月,中共陕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由陕甘区委兼理西安地委工作。西安地委所辖范围为西安城区和长安县。由于西安当时党员人数比较多,按照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的规定,按地区先后成立了三个部委员会,分片管理所属的基层党的组织。到1927年5月,第一部委领导的农村党支部有13个,党员159人。第二、三部委领导的城区党支部29个,党员622人。在第二、三部委成立之前的3至4月,城区党的支部直属中共陕甘区委兼理的西安地委领导。7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汪精卫在陕西“清党”反共,形势逆转后,城乡党支部按照中共陕甘区委的通知,大部分停止活动;身份已公开的党员撤离西安;留在西安城区的党员和保留下来的支部,全部转入秘密活动。同时,根据中共五大关于改变区委建制,设立省委的指示和斗争形势的需要,撤销陕甘区委,成立中共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结束了中共陕甘区委兼理西安地委的领导体制。

中共陕甘区委兼理的西安地委下辖组织有:私立民立中学支部、私立敬业中学支部、私立成德中学支部、省立一中支部、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支部、省财委、民政厅支部、中山学院支部、省农民协会筹备处支部、西安第一部委员会(该部委下辖长安县的五楼支部、车张村支部、茧子新村支部、鱼化寨支部、黄良支部、缪家寨支部、北窑头支部、姜仁村支部、郭杜支部、甘河支部、西大村支部、北强村支部、杜曲支部、漳浒寨支部、袁家村支部、庆镇支部、南窑头村支部、引驾回支部)、西安地委第二部委员会(该部委下辖私立敬业中学支部、私立成德中学支部、省立第一中学支部、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支部、省财委、民政厅支部、省农民协会支部、中共中山军事学校组织)、西安地委第三部委员会(该部委下辖中山学院支部、私立民立中学支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支部)。

25. 中共延安地方执行委员会

1927年3月,中共陕甘区委派田伯英负责组建中共延安地方执行委员会。4月1日,中共延安地委在陕西省立第四中学正式成立,书记田伯英。地

委先后下辖安定特别支部、宜川特别支部、延川特别支部、延长特别支部、湫峪沟特别支部、蟠龙特别支部、甘泉特别支部等7个特支和3个直属支部,110名党员。隶属中共陕甘区委领导。7月,中共延安地委改为中共肤施县委。

26. 中共榆林地方执行委员会

1927年3月,中共陕甘区委决定组建中共榆林地委。5月初,地委正式成立^①,书记马云程,组织郭洪涛,宣传周家干。地委隶属中共陕甘区委,机关驻榆林中学平民学校。同年6月,陕北军阀井岳秀在榆林“清党”反共,通缉榆林共产党和共青团负责人,马云程等党、团组织的负责人被迫离开学校,组织停止了活动。中共榆林地委下辖榆林中学支部、榆林单级师范学校支部、榆林女子师范学校支部、榆林高级小学支部及神木、横山、府谷三个特支。

27. 中共泾阳地方执行委员会

1927年上半年,中共泾阳特别支部按照中共陕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精神,积极发展党组织,组织农民协会。在中共泾阳特支领导下,泾阳农民运动发展很快,先后发展农协会会员达4万多人,并建立了农民自卫团,全县党员也发展到60余人。为了加强领导,1927年5月,中共陕甘区委决定将中共泾阳特别支部改为中共泾阳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耿觉,隶属中共陕甘区委领导。同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又将其改为中共泾阳区委。机关设在泾阳县城第一高小。地委下辖泾阳第一高小支部、林桂巷女子小学支部、泾阳第二高小支部、泾阳教师训练班支部、云阳支部、泾阳县城机关支部、大湾村支部。

28. 中共礼泉特别支部

1927年初,经陕西党团联席会议同意,共产党员秋步月以筹建国民党礼泉县党部的名义回到礼泉发展中共组织。6月,中共陕甘区委西路特派员到礼泉协助秋步月建立了中共礼泉特别支部,书记秋步月。特支隶属中共陕甘区委。大革命失败后,特支改为中共礼泉支部,隶属中共陕西省委。

第二节 青年团组织

1922年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陕西的渭南赤水和西安等地开始了建团活动。从1924年6月

^① 一说建立于1926年12月。

建立陕西第一个团组织到大革命失败,先后建立了共青团西安地委、绥德地委、陕甘区执行委员会及下辖的6个地委、37个特支、两个支部,有团员2400人。1927年7月7日,共青团陕西省委成立,统一领导陕西地区的青年运动。

1. 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特别支部

中共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特别支部是陕西地区最早建立的团组织。1922年8月,王尚德受武汉地区党团组织的委派,回到陕西渭南赤水镇,创办赤水农业职业学校,积极在师生中发展团员,进行建立组织的活动。1924年5月,武止戈受团中央委托,来赤水向王尚德传达了团中央关于在赤水建立组织的指示。6月,王尚德、张浩如、刘建侯等正式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支部,成立了支部干事会,会长张浩如,书记王尚德,有团员五人。不久,该支部改为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独立支部(后改为特支),直属团中央领导,机关驻赤水农业职业学校。活动范围除渭南外,还有华县、西安、三原等地。同年8月到1925年,还先后发展建立了青年团渭北分县支部和华县支部。1925年初,团员发展到18人。9月,在团中央特派员吴化之参与下,对赤水特支进行了整顿,进一步健全了组织和工作秩序。同年11月,共青团西安地委成立后,特支改由共青团西安地委领导。

2. 社会主义青年团西安第一支部

1924年6月,共产党员武止戈受团中央委派到西安,与魏野畴(魏凤林)取得联系,发展了张性初、杨宏德、宋建旭等三名团员,经团中央批准,成立了团小组,杨宏德为负责人,直属团中央领导。8月,共产党员雷晋笙从上海回到西安,参加并领导了该组织的活动,将其发展为团西安支部,亦称第一支部,张性初任支部书记。到1924年底,团员发展到15人。1925年3月,武思茂、崔孟博将团西安第一、第二两个支部合并,成立团西安地委,书记崔孟博。由于两个支部领导人意见不一,不日又取消地委。1925年10月,团中央特派员吴化之与中共北方区委派来的安存真一起,对西安团组织进行整顿,将第一支部和1924年12月建立的团西安第二支部解散,对团员重新登记,成立了共青团西安特别支部。

3. 社会主义青年团西安第二支部

1924年秋,共产党员邹遵受团中央指派由上海回到西安,同在西安任教的共产党员魏野畴取得联系,发展团员14人,并于年底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西安支部,选举产生了干事会,张性初、师守命、正谊、任致远、何挺杰

等任干事,直属团中央领导。后该支部被称为团西安第二支部。1925年3月,武思茂、崔孟博将团西安第一、第二两个支部合并,成立团西安地委,书记崔孟博。由于两个支部领导人意见不一,不日又取消地委。1925年10月,团中央特派员吴化之与中共北方区委安存真来西安整顿发展党、团组织,将第二支部与团西安第一支部解散,成立共青团西安特别支部。

4. 共青团西安临时支部

1925年7月26日,参加在三原召开的陕西省学生代表会后来西安的共青团员(包括北京、天津、陕北、三原、西安等地来的团员)举行会议,决定并成立了共青团西安临时支部干事会,书记高克林。不久,外地团员离开,该支部消失。

5. 共青团西安特别支部

共青团西安第一、第二支部由于相互间有矛盾,妨碍工作开展,团中央便先后派武思茂、李秉乾(李子健)、崔孟博(崔物齐)等人来西安进行整顿。武思茂、崔孟博于1925年3月12日,将两个支部合并,成立了共青团西安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崔孟博。但由于两个团支部领导人意见仍不一致,又取消了团地委。1925年10月,团中央特派员吴化之与中共北方区委派来的安存真一起,对西安团组织再次进行整顿。解散了第一、二两个支部,对团员重新登记,成立了共青团西安特别支部,书记吴化之,隶属共青团豫陕区委领导。并将团员28人按西安省立三中、二职、民校俱乐部、39号、梁府街等单位或地区分为5个小组。

6. 共青团绥德特别支部

1924年12月29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教员王懋廷给团中央组织部部长邓中夏写信,汇报陕北地区青年学生的活动,要求邓向团中央介绍,批准其和田伯英等14名进步学生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批准成立“陕西省绥德CY地方团”及其干事会。1925年2月,王懋廷根据团中央批示,召开团员大会,正式成立了“CY陕北特别支部”,后又称CY绥德特别支部。书记先后为王懋廷、张礼庭、马瑞昌、杨应举。特支隶属团中央直接领导,下辖团榆林支部、瓦窑堡(军队)支部、肤施(今延安)支部、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支部、佳县支部。1925年10月,共青团豫陕区委成立后,特支改由团豫陕区委领导,但仍同团中央保持联系。同年底,绥德团特支改为团绥德地委。

7. 共青团三原特别支部

1924年3月,团中央决定在三原建立团的组织。1925年初,共青团赤水支部负责人王尚德指示在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上学的共青团员姚志哲等人在三原开展建团活动。与此同时,团中央派李子健回到三原,协助开展建团工作。2月1日,在共青团赤水及西安组织主要负责人主持下,西安、赤水、三原、华县的进步青年团体负责人在赤水职业学校举行会议,讨论在三原、华县正式建团问题,决定由姚志哲等四人成立三原团支部。2月23日,在李子健指导下,三原团员开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原特别支部,姚志哲、赵宗润、亢心裁先后任特支书记,隶属团中央领导。机关设在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5年11月,特支划归共青团西安地委领导。

8. 共青团澄城特别支部

1924年底,北京大学学生、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张仲超休学期间在澄城中学任教,发展了一些团员。1925年春,他与上海大学学生、共青团员王超北一起,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澄城特别支部,书记张仲超(后杨森定)。同时,创建了澄城青年社,作为特支的外围组织。

9. 共青团西安地方执行委员会

1925年3月,武思茂、崔孟博受共青团中央委派,将原社会主义青年团西安第一、第二两个支部合并,成立了共青团西安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崔孟博。由于两个团支部负责人意见不一致,又取消了团地委。同年10月,团中央特派员吴化之与中共北方区委派来的安存真一起,重新整顿了西安团组织,解散了第一、第二两个支部,成立了共青团西安特别支部,书记吴化之,隶属共青团豫陕区委领导。11月13日,经报共青团豫陕区委批准,吴化之在西安特支的基础上建立了共青团西安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吴化之。1926年8月,共青团豫陕区委撤销,加之西安被直系军阀刘镇华围困,因而一段时间无直接上级领导。12月,陕西党团联席会议成立,归陕西党团联席会议领导。地委下辖西安私立敬业中学支部、私立成德中学支部、省立一中支部、省立三中支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支部、渭南特别支部、赤水特别支部(该特支下辖华县支部、谷堆小学支部)、固市特别支部(该特支下辖蒲城荆姚支部)、肤施特别支部、富平特别支部、乾县特别支部、旬邑支部、澄城特别支部。1927年2月,共青团陕甘区委成立后由于干部缺少,决定不建立团西安地委,由团陕甘区委兼理团西安地委工作。这一阶段团组织有重大发展,至1927年5月,在西安城区建立支部20多个,在长安县也建立了不少团支部。1927年7月,团

省委成立后,正式建立了团西安市委员会。

10. 共青团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

1925年12月间,经共青团中央批准,在共青团绥德特别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共青团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马瑞昌(后为冯景翼、李明轩、杨应举、赵通儒、刘述蔚)。团地委机关设在省立第四师学校(简称省立四师),直属团中央领导,一度接受团豫陕区委领导;1926年2月至1927年2月归团北方区委领导;1927年2月后划归团陕甘区委领导。团地委先后下辖省立四师学校支部、省立四师学校第一支部、省立四师学校第二支部、省立四师学校第三支部、宜川(军队)特别支部、绥德苗家坪高级小学支部、清涧第二高级小学特别支部、榆林特别支部(该特支下辖榆林中学支部、榆林女子师范学校支部、神木第一高级小学支部)、佳县特别支部、定边特别支部等。

11. 共青团三原地方执行委员会

1926年3月,共青团三原特支已有团员40名。1926年3月底,共青团中央特派员吴化之(时任团西安地委书记)去三原,于3月30日召开团员大会,选举成立了共青团三原地委,书记赵宗润(后王鸿俊、孟芳洲担任书记)。机关设在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三原地委隶属共青团豫陕区委领导,1926年12月改由陕西党、团联席会议领导,1927年2月由团陕甘区委领导。1927年7月,共青团三原地委改为共青团三原县委。团地委先后下辖渭北中学支部、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支部、省立第三职业学校支部、富平庄里支部、三原女子中学支部、三原中学支部、民治中学支部、泾阳特别支部(该特支下辖泾阳第一高小支部、泾阳教师讲习班支部、泾阳女子高小支部)、高陵特别支部。

12. 共青团渭南地方执行委员会

1926年12月,陕西党团联席会议派罗承运到渭南整顿团组织,建立了共青团渭南地方委员会,书记宋蔚青(后罗承运),机关驻渭南县立高级小学。地委隶属陕西党团联席会议领导,先后下辖赤水、固市、高塘、华县四个特支和乐育小学、长埭小学、渭南县立高小、渭南单级师范学校四个支部。1927年3月,共青团陕甘区委成立后,隶属共青团陕甘区委。同年7月,共青团渭南地委改为共青团渭南县委。

13. 共青团陕甘区执行委员会

1927年1月下旬,根据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共陕甘区委,与此同时,团中央也相应作出建立共青团陕甘区执行委员

会的决定,并委派团沪区闸北(上海)部委书记曹趾仁回陕负责组建。2月26日,共青团陕甘区委在西安桃胡巷成立,书记曹趾仁。隶属共青团中央和中共陕甘区委领导,由于干部缺少,团陕甘区委兼理团西安地委的工作。区委下辖6个地委,直辖37个特支,两个支部,团员2400人。办有机关刊物《CY陕甘区委通讯》。外围组织有陕西青年社、陕西全省学生联合会。机关驻地先后在西安桃胡巷、庙后街西仓门小学、土车巷。6月,中共陕甘区委改组了团陕甘区委,由潘自力任书记。7月,冯玉祥在陕西实行“清党”反共,各级团组织被迫转入秘密活动,并根据团中央指示精神,撤销共青团陕甘区委,建立共青团陕西省委。

14. 共青团泾阳地方执行委员会

1927年5月,共青团陕甘区委决定将共青团泾阳特别支部改组为共青团泾阳地方执行委员会,并派梁俊琪担任书记。机关设在泾阳县城林桂巷女子小学,隶属共青团陕甘区委和中共泾阳地委领导。由于绝大多数团员参加各区农民运动,未及建立基层组织,大多数团员受地委直接领导,团地委仅辖泾阳第二高小一个团支部。同年7月,共青团泾阳地委改为共青团泾阳区委。

15. 共青团延安地方执行委员会

1927年4月,根据共青团陕甘区委指示,共青团延安特别支部改组为共青团延安地委,书记焦维炽。隶属共青团陕甘区委领导。地委先后下辖省立四中及安定、延川、延长、湫峪沟、盘龙、甘泉等地团组织。机关设在延安省立第四中学。同年7月,共青团延安地委改为共青团肤施县委。

第三节 进步团体

在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在外地求学加入中共党、团组织的青年学生陆续回陕,以关中和陕北一些中小学校为阵地,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青年进步团体,进而发展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在陕西建立中共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1. 陕西省学生联合会

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后,西安法政专科学校、陕西省立一中、三中、第一师范、成德中学等学校学生代表在省立一中召开西安学生代表联席会议,决定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实行全体总罢课,并组织讲演团,宣传抵

制日货。6月初,以西安学生代表联席会议为基础,正式组成了陕西省学生联合会,并编辑出版《白话报》。学联建立后,派代表赴京、沪声援学生运动。8月底,经各校学生代表酝酿讨论,决定重新组织全陕学生联合会。9月9日,选举屈武为陕西省学生联合会会长,刘道洁为副会长,并发表了宣言。学生会成立后,开展了请愿、索薪斗争和驱逐军阀陈树藩等活动。1925年7月,陕西省学生联合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在三原召开,出席会议的有西安、三原、赤水、华县等地学生会负责人,共产党员魏野畴列席会议。会议通过了谋求学生永久利益等13项重要决议,选举产生了陕西省学生联合会的执行机关。会后,学联组织了宣传队到各地进行宣传活。1927年5月12日,陕西省学生联合会第二届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出席代表60余人。会议讨论通过了十余项决议案,选出了王芾南(王林)、郭俊、胡景儒等五名常务委员和13名候补执行委员,共产党员李子洲、杨明轩、雷晋笙等为顾问团。同年7月,冯玉祥“清党”反共以后,省学联被迫停止活动。

2. 共进社

1922年10月建立于北京的共进社,是五四运动后旅京陕西学生的进步社团。五四运动前,一部分旅京陕籍人士,发起组织了三秦公民救陕会,继而又组织了陕西学生团。五四运动爆发后,学生团更名为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1922年10月,正式成立共进社,主要领导人李子洲、刘天章、魏野畴、杨钟健、杨晓初、赵国宾、刘含初、呼延震东等。共进社成员最多时达600余人,其中不少人成为陕西早期中共党团组织骨干。1926年10月1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以“赤化”的罪名,封闭了共进社总部,几十名共进社社员相继被捕,组织在反动势力的镇压下解体。共进社创办有《共进》杂志。共进社与《共进》杂志是大革命时期国内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社团和刊物之一。

3. 青年励志社

1923年春,由华县咸林中学教员、中共早期党员王复生领导创立的青年励志社,为陕籍旅京学生组织的共进社华县分社。潘自力、吉国桢、李维屏、杨慰祖先后任干事。励志社隶属北京共进社领导,下辖七个进步学生团体,驻地咸林中学。1926年10月,共进社在北京被查封,励志社亦停止活动。

4. 青年文学社

1924年7月,在张秉仁等领导于西安创办的进步社团。文学社宗旨是“揭露西安文化教育的腐败现象,团结教育广大青年,提高新文化思想水平,

积极参加政治斗争”。同年10月,社员发展到30余人,且分布各个学校,成为西安青年学生向往的中心。该社出版有《青年文学》旬刊。不久,青年文学社改为青年生活社。

5. 青年生活社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1925年1月前为社会主义青年团)西安组织领导的进步青年团体。1924年10月,共产党员魏野畴在西安将青年文学社改为青年生活社,并出有《青年生活》旬刊。青年生活社在西安各中学建立有支部。该社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开展青年学生运动,参加了驱逐军阀吴新田等斗争。

6. 西北晨钟社

大革命时期西安的进步青年团体,前身为西北青年社,1924年12月由共产党员吕佑乾等创办于西安。该社办有《西北晨钟》旬刊,宣传改造风俗,推翻腐败政治,打倒封建军阀,建立民主的思想。主要领导成员多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

7. 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

1925年1月21日,共产党员魏野畴、王授金等在西安召集律师公会、报界工会、实业会等17个团体代表会议,决定发起建立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支持孙中山北上的政治行动,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会议发布启事,号召各团体加入。2月1日,筹备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到会36个团体,48名代表。与会代表一致通过,将此次筹备会改为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大会,推举俞嗣如为临时主席,魏野畴为临时书记。接着在陕西各地陆续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1926年1月8日,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举行代表会议,决定改名为西安国民会议促成会,反对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主张,把国民会议运动与反对奉系军阀,拥护国民军、拥护广东革命政府统一起来。

8. 渭北青年社

1925年2月,共产党员李秉乾在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青年同志共进社”的基础上建立了渭北青年社,书记先后为赵宗润、王鸿俊。渭北青年社成立后,联系进步青年,发展社员,发动和领导学生开展革命活动,在渭北一带有相当的影响。到6月,社员发展到70人,在县立中学、渭北中学、省立第三师范等校普遍建立了支部和小组,并出版有《渭北青年》。

9. 西安总工会

1925年8月,共产党员魏野畴在《西安评论》上发表“敬告西安工友”,号召西安工人联合起来组成西安总工会,并提出了建立工会的方法、步骤。1925年9月10日,300余名鞋业、皮革业、印刷业工人在西安南院门图书馆集会,宣告成立西安总工会,通过了宣言、章程,选举了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总工会书记张性初,干事宋树藩。在西安总工会的领导下,皮革业、鞋业、印刷业等行业工会相继成立。

10. 渭南东张村农民协会

1925年11月22日,在共青团赤水特别支部的领导下,渭南县(今渭南市临渭区)东张村农民协会召开成立大会。大会由共产党员雷光显主持,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渭北青年社”、“渭南青年社”、“关中农工兵学联合会”、“赤水职业学校”等组织的代表身份出席会议,表示支持和祝贺。大会通过了《东张村乡农民协会成立宣言》和“清算斗争恶绅”、“清理值年账目”等决议案。会议选举雷光显等五人为委员。

11. 西安非基督教大同盟

1925年12月13日,在陕西中共党、团组织和陕西省学联的主持下,陕西省学联、西安市学联、青年生活社、商农工会等10多个团体150多人在西安第三中学召开会议,成立了西安非基督教大同盟,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对中国进行文化、经济侵略。大会选举周伯勋等五人为执行委员。非基督教大同盟成立后,组织非基督教讲演团,散发传单,揭露教会进行文化侵略的罪恶阴谋,组织学生到教会和传教士展开辩论,团结和争取了广大的教会学生,使他们加入革命阵线,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12. 西安妇女协进会

大革命时期,以女学生为骨干的西安妇女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为统一领导,从1925年2月起,先后成立有妇女国民会议促进会、女子外交后援会、家庭妇女救国会等进步团体。1926年2月8日,在西安九府街12号召开大会,建立了西安妇女协进会,总务委员刘文德。

13. 西安工人俱乐部

1927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西安工人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2月中旬,工人代表在西安东大街军用电话局开会,成立了西安工人俱乐部,负责指导西安工人运动。7月,国民党在西安开始“清党”反共,西安警备司令部勒令

解散革命团体,工人俱乐部转入秘密活动。

14. 陕西青年社

大革命时期,陕西在团组织建立前和建团过程中,渭南赤水、西安、绥德、南郑、三原等地都建立了青年组织,多数称为青年社。1925年驱逐陕西军阀吴新田运动,促进了陕西青年学生革命情绪的高涨,全省各地建立的青年社达20余处,有社员千余人。1925年11月2日,共青团豫陕区委指示西安团组织切实推进陕西青年总联合的工作,使青年社成为共青团指导下训练、吸收革命分子,从事国民革命运动和学生运动的先进组织。在共青团西安地委的支持下,1926年2月在西安成立了陕西青年团体联合筹备会,决定同年6月正式成立陕西青年社。由于军阀刘镇华围困西安近八个月,使成立工作无法进行。1927年2月,中共陕甘区委、共青团陕甘区委成立后,陕西青年团体联合筹备会留西安的工作人员即于3月20日在西安召开会议,决定恢复陕西青年团体联合筹备会,加强对陕西各青年团体的指导。1927年5月18日至21日,陕西青年社第一届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大会通过了《宣言》、《陕西青年社章程》,选举产生了领导机构。7月中旬,冯玉祥在陕西“清党”反共后,共青团陕西省委决定取消陕西青年社,青年运动转入秘密状态。

15. 陕西省总工会

1926年11月西安解围后,陕西各地工人运动蓬勃发展。1927年2月上旬,西安工人俱乐部成立,负责指导各行业工会的工作,从此各业工会迅速恢复、建立起来,仅2月份就建立了陕西邮务总工会、印刷局工会、制造局工会、电话工会、电报工会等。各界工会为切身利益和本阶级利益进行斗争,为省总工会的建立作了准备。3月29日,陕西省总工会筹备处成立。5月1日,陕西省总工会成立大会在西安东大街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召开,30多个团体千余人参加了大会。会议通过了宣言、章程,选举产生了陕西省总工会执行委员会。5月7日,执委会议公推张含辉、严振五、李子静三人为常委,周志学为总干事。省总工会建立后,在中共陕甘区委的直接领导下,工人运动与农民、妇女、青年学生运动互相配合,促进了全省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7月,冯玉祥在陕西地区“清党”反共,陕西省总工会被解散。

16. 陕西省农民协会

在中共党、团组织的帮助下,1927年3月27日,陕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成立。6月1日至8日,陕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正式选举产

生了由 13 名执行委员和 4 名候补执行委员组成的陕西省农民协会,王授金、陈嘉惠、张含辉、亢维恪、马价人为常委,王授金为主席。常委会下设秘书处(秘书长杜松寿)、组织部(部长马价人)、宣传部(部长亢维恪)、军事部(部长张含辉)、教育合作部(部长陈嘉惠)。当时,全省有农协组织的县 60 余个,农协会员 37 万人,农民自卫武装 10 万人以上。其中以长安、周至、户县、渭南、华县、三原、绥德等县的农民运动发展最快。陕西农民运动是大革命时期全国农民运动最活跃的省份之一。同年 7 月,冯玉祥在陕西“清党”反共,陕西省农民协会被解散。

17. 廿八书报社

为适应广大读者购买革命书刊的需要,1927 年 5 月 1 日,由中共西安组织负责开办了廿八书报社,地址在西安东大街。廿八书报社除销售党、团中央机关的刊物《向导》、《中国青年》及中共组织领导的上海书店出版的大量革命书刊外,还直接推销陕西地方党组织印刷、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概论》、《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浅说》、《中山画报》、《新国民军》等革命书刊,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7 月,冯玉祥“清党”反共后,廿八书报社停止营业。

18. 其他进步团体

这一时期陕西成立的进步团体还有:澄城青年社(1925 年春—1926 年 12 月),社长李鼎新。渭南青年社(1925 年夏—1927 年 3 月),负责人杨培琦、李振东。渭北分县青年社(1926 年春—1927 年 3 月),社长先后为罗承运、高步诱。澄城青年社(1925 年末—1926 年秋),负责人万志宁。泾阳青年奋斗社(1925 年 12 月—1926 年 11 月),主任耿觉。青年生活社(1924 年夏—1927 年春),负责人魏野畴、何挺杰、张性初。西北青年互助社(1924 年 8 月—?)负责人雷晋笙。三原妇女协进会(1926 年 2 月—1927 年 2 月),负责人王爱玉。富平青年社,负责人不详。陕北青年社(1925 年 11 月—1927 年 2 月),负责人马瑞生。渭南革新社(1925 年 7 月—1927 年 3 月),负责人金子毅。西安学生联合会(1925 年 5 月—1927 年 3 月),执行委员王芾南。渭南县学生联合会(1925 年 7 月—1927 年 3 月),负责人雷光显、宋蔚青。渭北分县学生联合会(1926 年春—1927 年 3 月),负责人常步杰。渭北学生联合会(1925 年 3 月—1926 年 6 月,1925 年 9 月改为三原学生联合会),主席张仲实。旬邑县学生联合会(1927 年 3 月),主席许才升。陕北学生联合会(1925 年 5 月—1927 年 2 月),负责人不详。兴平青年社、乾县青年社、咸阳青年改进社、华县青年互助

团、南郑学生青年会、同官(今铜川市印台区、王益区)青年社。

第四节 统一战线组织

在中共组织的创建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中共陕西组织按照中共中央制定的统一战线方针,积极发展、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组织,开展统战工作,帮助国民党筹建了国民党陕西省统一的领导机构——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和地方各级组织;积极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参加了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和一些学校的领导工作,推动了陕西地区的大革命运动。

一、帮助国民党建立各级地方组织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到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根据党团中央的指示,陕西早期的中共党员和团员先后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并帮助国民党积极发展组织。1925年5月5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地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用“切实方法,扩大国民党左派的宣传和组织”,“劝人加入国民党”,“至迟亦必在7月1号以前成立”国民党的省党部。根据这一精神,8月18日,中共党员魏野畴、刘含初等在西安南四府街帮助国民党成立了国民党陕西党员俱乐部,以联络国民党员,宣传三民主义为宗旨。并着手进行国民党党员的登记和宣传工作。这时,国民党在陕西只有一些零散党员,个别地区有基层组织。9月5日,国民党陕西党员俱乐部召开第二次会议,推选刘含初为主席,杨明轩、赵葆华为书记。决定划西安为六个宣传区,设置干事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国民党陕西党员俱乐部成立后,使陕西地区的国民党组织很快发展起来。

1925年9月初,受于右任、刘允臣和国民党中央委托回陕组织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焦易堂到达西安。9月12日,焦易堂与魏野畴、刘含初等在西安召开全省国民党党员大会,通过了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筹备委员会的议案。会后在西安东柳巷四号设立了筹备处。9月26日,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成立,推选杨明轩、刘含初、张秉仁、赵葆华、张含辉、王授金、宋树藩、焦易堂、刘允臣为执行委员,师守命等五人为候补执行委员。在当选的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占绝大多数。

1927年1月20日至25日,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举行,会议决定将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改为正式省党部,选举邓宝珊、甄寿珊、史可轩、黄平万、张性初、张含辉、刘含初、李子洲、吴碧云、魏野畴、杨明轩、王授金、赵葆华为正式执行委员,徐九龄、王尚德、呼延震东、陈俞廷等九人为候补执行委员;赵葆华、刘含初、杨明轩为常委。选举冯玉祥、于右任、杨虎城、雷晋笙、惠有光、薛笃弼、刘天章为正式监察委员;井岳秀等五人为候补监察委员。省党部下设宣传部(部长先后为黄平万、魏野畴)、组织部(部长先后为张性初、熊文涛)、农民部(部长先后为张含辉、王尚德)、工商部(部长王授金)、妇女部(部长吴碧云)、青年部(部长李子洲)。省党部隶属国民党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领导。省党部下辖67个国民党县党部以及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特别党部和西安市党部。省党部办有机关报《陕西国民日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及其下属各级党部,其核心和骨干多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1927年7月,冯玉祥在陕西“清党”反共,国民党陕西组织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纷纷退出。此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为反革命的领导机关。

二、在国民军联军中的统战组织

1. 国民军联军国民党最高特别党部

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宣布国民军联军全体官兵集体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9月27日,冯玉祥、刘伯坚、于右任等主持召开国民党国民军联军全军代表大会,成立国民军联军国民党最高特别党部。会上,刘伯坚报告国民党的主张与这次大会的意义;冯玉祥报告国民军联军情况及国际国内形势。大会选举方振武、刘伯坚、任右民、赵守钰、王一飞、张绍丰、续范亭、张允荣、武勉之、弓富魁、石敬亭等11人为执行委员;冯玉祥、徐谦、于右任、刘骥、史宗法(史可轩)等五人为监察委员。国民军联军国民党最高特别党部是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刘伯坚、王一飞、卢绍亭、史可轩等为中共党员。1927年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后,冯玉祥将刘伯坚、王一飞、邓希贤(邓小平)、宣侠父、刘景桂(刘志丹)等中共党员全部“礼送”出境,国民军联军中国共两党的合作局面破裂。

2. 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

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是国民军联军的最高政治工作领导机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军联军中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阵地。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的

主要负责人是中共早期著名政治活动家刘伯坚。1926年8月,刘伯坚受党的派遣随冯玉祥离开莫斯科回国。9月17日,帮助冯玉祥举行五原誓师,国民军正式改称国民军联军,冯玉祥任总司令。五原誓师后,冯玉祥即着手组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下设两部(参谋部、政治部)八处,鹿钟麟任参谋长,石敬亭任政治部长,刘伯坚任副部长,实际主持工作。五原誓师后,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在全军各部队建立了政治工作机关,军和独立师以上部队设立政治部,师以下部队设政治指导员。各级政治工作的领导骨干,大多由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刘伯坚,总政治部组织科科长贾大容,宣传科科长曾晓渊,第四路军政治部主任刘景桂(刘志丹),杨虎城部政治部主任魏野畴,刘郁芬部政治部主任贾从周,孙良诚部政治部主任宣侠父,韩复榘部政治部主任李世乐,方振武部政治部主任卢绍亭,中山军事学校政治部主任邓希贤(邓小平)等均为中共党员。1926年10月,刘伯坚主持制定的《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大纲》,明确规定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的任务和目的是:“使每个士兵都能彻底了解政治的意义、战争的目的”,“成为有觉悟的为中国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战士”。1927年4月,国民军联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由冯玉祥任总司令,刘伯坚任总政治部主任。6月,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清党”反共,刘伯坚、宣侠父、邓希贤、刘景桂等200多名共产党人先后被“礼送出境”,共产党人在国民军联军中的政治工作宣告结束。

3. 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

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是大革命时期,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建立的陕西省军事民政最高机关,临时性地方军事政府,是共产党、国民党、国民军联军三位一体的合作领导体制。1926年10月,冯玉祥率国民军联军分兵七路从五原进军陕西,配合北伐战争。11月27日,解西安之围,进入西安。1927年1月,在西安成立了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于右任任总司令,邓宝珊任副总司令。根据《国民军管辖区域军政时期临时行政大纲》的规定:国民军各省驻军总司令及省政府,承联军总司令之命令,分管一切军事民政事宜;各省驻军总司令,得指挥民政事宜。因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便成为陕西省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革命政权组织。1927年1月1日,驻陕总部发布命令,宣布废止陕西督办、省长制,取消陕西省议会,由驻陕总部统管陕西军政大权。总司令部下设参谋部、政治部、政治保卫部、总部办公室、民政厅、教育厅、司法厅、建设

厅及财政委员会等机构。1927年1月3日至8日,驻陕总部先后任命了各部、厅的负责人。许多共产党员在总部担任领导职务,如魏野畴任驻陕总部政治部副部长,史可轩任政治保卫部部长兼政治保卫总队总队长,杨明轩任教育厅厅长,还有100多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各部厅局担负各类工作,从而保证了共产党在这个政权中能发挥重要作用。1927年4月,国民军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也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驻陕总部。6月6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成立陕西省政府,以于右任为主席。此后,驻陕总部不再是政权机关。此时的陕西省政府仍是国共合作的政权,共产党员仍在其中担负领导工作。同年7月,冯玉祥下令在陕西“清党”反共,共产党员被排挤出陕西省政府,国民党完全控制陕西省政权。

4. 国民党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

1927年2月18日,国民党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在西安成立,冯玉祥为常委、主席,于右任为常委、副主席,刘伯坚为常委、秘书,薛笃弼、郭春涛、杨明轩为常委。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后改名为西安政治分会,是国民党在西北的最高领导机关,管理国民军联军辖区内的党务、军务、政务工作。7月17日,根据冯玉祥的训令,西安政治分会撤销。

第二章 中共组织在大革命时期的主要活动

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在陕西广泛传播,中共党、团组织和进步团体应运而生。中共党团组织建立后,团结带领陕西青年学生积极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斗争,推动了陕西地区的国共合作和大革命运动。

第一节 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

1. 五四运动在陕西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掀起了震惊全国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5月14日,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陕西,西安法政专科学校、省立一中、省立三中、第一师范学校、成德中学等校学生代表,在省立一中召开了西安学生代表

联席会议,决定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实行总罢课,并组织讲演团,宣传抵制日货。会后,各校同学积极行动,编印宣传材料,准备示威游行。5月下旬,西安学生冲破陕西当局的禁令,陆续走上街头集会、讲演,由于陕西当局的阻挠,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未能举行。5月22日,陕西省教育会、总商会联合致电北洋政府,要求拒绝和约。30日,陕西学界通电全国,表示“宁可蹈东海而亡,誓不弃地以资敌”。6月初,以原西安学生代表会议为基础,正式组成了陕西学生联合会,屈武任会长,并出版了《白话报》,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及时报道全国和陕西学生运动的状况。从此,全省的学生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陕西学生救国讲演会、陕西公民救陕会、基督教救国会等各界救国团体纷纷成立。学生们为了表示拒用日货的决心,率先将自己和家中使用的各种日货带到学校,一齐烧毁。西安商界也与学联联合通电,表示与全国一致坚决抵制日货,誓为青岛问题抗争。一些商人自动销毁了部分日货,少数继续贩卖日货的商店,多被学生捣毁。为了支持北京和全国的学生运动,陕西学生联合会推选屈武和李伍亭等为代表,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地进行活动。6月27日,屈武在北京与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辩论时,为抗议北洋政府卖国行径,以头撞地,血溅总统府,一时传闻全国。在北京的陕西籍学生刘天章、李子洲、杨明轩、杨钟健、刘含初、魏野畴、郝梦九等,也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对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 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早期传播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陕西逐步传播。在此之前,陕西的知识分子已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08年井勿幕留学日本时,在《夏声》杂志上发表《二十世纪之新思潮》一文,提到马克思主义并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流行欧洲的各派社会主义学说。五四运动后,刘天章、李子洲等旅京学生首先参加了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主要有三个途径:(1)在省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回到陕西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中,多数是陕西旅外求学的学生,也有外籍来陕从事教育工作的青年。1921年后,魏野畴先后在咸林中学和榆林中学,王复生(云南籍)在咸林中学,王尚德在赤水农业职业学校,李子洲在渭北中学和榆林中学、绥德省立四师通过教学,向学生宣传民主、科学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魏野畴还到驻榆林的杨虎城部队宣传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2)旅外进步学生创办的刊物向陕西传播马克思主义。其

中有刘天章、李子洲、魏野畴等在北京主办的《共进》，武止戈、屈武等在天津创办的《贡献》，陕北教育促进会天津分会主办的《促进》和《改进》，雷晋笙、严信民等在上海创办的《汉钟》、《南针》，都不同程度地刊登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3)陕西具有民主倾向的报纸，不顾陕西当局的禁令，刊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有靖国军辖区的《启明日报》、《捷音日报》、《正义日报》，西安的《西北日报》(由原《长安日报》改版)、《鼓昕日报》。通过以上途径，进步知识分子向陕西人民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说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宣传中共中央的路线、纲领等，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和陕西的现状。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广泛传播为陕西党、团组织的建立，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第二节 陕西早期党、团组织的建立

五四运动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陕西地区的建立和发展。陕西早期的党、团组织建立一是在京、津、沪、汉等地加入组织的党、团员，根据当地党、团组织的指示回陕西建立的，受各有关地方党、团组织的领导；二是党、团中央派人到陕西建立的，受党、团中央直接领导。其组织建立的特点是先建立团组织，后建立党组织；先发展革命的知识分子，再发展工农群众；先在城市建立组织，后在农村发展。1922年8月，已在武汉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王尚德，受武汉地区党团组织的委派回陕发展组织。他在家乡渭南赤水镇创办了赤水农业职业学校，以此为阵地，在进步师生中发展团员，进行建团活动。1924年5月底，武止戈受团中央委托，向王尚德传达了团中央关于在赤水建立团组织的指示。王尚德等于是年6月正式建立了陕西第一个团支部——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团支部，成立了支部干事会。1924年6月至1925年10月间，陕西各地相继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西安第一支部、第二支部，共青团绥德特别支部、三原特别支部、澄城特别支部、西安临时支部、西安特别支部等。1925年11月13日，经共青团豫陕区委批准，吴化之在团西安特支的基础上建立了共青团西安地方执行委员会，下辖关中地区团组织。1925年底到1926年春，共青团绥德地委和三原地委先后建立。各地团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党组织的建立准备了条件。1925年10月，中共中央组建了中共豫陕区委，领导河南、

陕西地区党的工作。同年秋,为贯彻中共中央四届二次扩大会议精神,中共北方区委派共产党员安存真来陕西做军事工作,并指示其在西安进行整团和建党工作。同时,中共豫陕区委也委托由上海赴陕西负责整团的共青团中央特派员吴化之在西安建立党的组织。安存真和吴化之在西安首先整顿了团组织,并于10月组建了中共西安特别支部,安存真任书记,直属中共豫陕区委领导。11月中共豫陕区委派黄平万来西安发展党的组织,筹建中共西安地方执行委员会。黄平万到陕后,参与中共西安特支的领导工作。1926年初,中共西安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黄平万任书记,归中共豫陕区委领导,下辖关中地区党组织。在此之前,根据团中央121号文件精神,吴化之于1925年底去渭南、三原,把部分团员转为党员,并在渭南赤水、三原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

陕北地区最早建立的中共组织是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党的支部。中共绥德支部(后改为特支)建立后,先后派人在榆林、宜川等地建立组织。1926年5月,党团北方区委派耿炳光到陕北地区巡视工作,于6月间在中共绥德特支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共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田伯英。1927年1月,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决定成立党团陕甘区委,领导陕西、甘肃等地的党团组织。3月,中共陕甘区委在西安成立,耿炳光为书记。区委下辖西安、绥德、榆林、延安、三原、渭南、泾阳等地委和41个特支,西安地委由陕甘区委兼理。全省党员达2000余人。同时共青团陕甘区委也宣告建立,曹趾仁为书记。团陕甘区委下辖西安、泾阳、渭南、绥德、延安、三原等地委和37个特支。期间在杨虎城等部队亦发展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1927年7月上旬,中共陕甘区委和共青团陕甘区委分别改为中共陕西省委和共青团陕西省委。

第三节 驱刘、驱吴运动

1. 驱除军阀刘镇华运动

刘镇华原是河南镇嵩军的统领,1922年6月被北洋政府任命为陕西督军兼省长。刘镇华到陕后纵兵殃民,迫民种罌粟,摧残教育,滥发纸币,危害人民,引起陕西人民的愤慨。陕西各界团体与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多次联名通电,一致要求罢免刘镇华,将镇嵩军驱逐出陕西。1922年11月,关中各县反对刘镇华包办省议会选举,发起驱刘运动。1923年11月,渭南县农民为反抗刘镇华的苛捐杂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交农”运动。陕西旅京学生创办的

《共进》杂志,也发表了许多驱刘的文章。1924年11月,在国共合作新形势的推动下,陕西人民驱刘出现了新的高潮,活动于西安、三原、渭南等地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散发传单,组织各种形式的驱刘斗争。与此同时,隶属国民军系统的一些陕军和陕北井岳秀等部,出于不同的目的,也纷纷加入了驱刘斗争。其中原陕军胡景翼部曾在华县、华阴一带试图发动武装驱刘,但由于没有得到其他陕军的配合而失败。1925年3月,胡憨战争结束^①,刘镇华兵败逃往山西,但段祺瑞政府企图再命刘镇华为陕西的督军和省长,陕西各界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坚决抵制刘镇华归陕。关中的陕军也积极参加了抵制刘镇华归陕的斗争,在韩城、合阳、朝邑、潼关一线的黄河渡口,堵死了刘镇华的归路。3月21日,刘镇华表示愿意下台,陕西人民的驱刘斗争取得胜利。

2. 驱吴运动

吴新田原为北洋陆军第七师师长,1921年率部入陕,任陕南边防军总司令,盘踞安康、汉中等地。吴在陕南横征暴敛,纵兵为匪,鱼肉百姓,为陕南人民所痛恨。1925年4月,北洋政府任命其为陕西军务督办,遭到陕西人民的反对。5月4日,西安一中学生踢球时误将足球踢入吴新田部二十八团军营,学生寻找足球时,双方发生争执,士兵冲进校园殴打学生,制造了西安五四惨案。事发后共青团西安组织及时提出驱逐吴新田,打倒军阀制度的口号,得到西安各界人民的响应。这一运动迅速扩大到全省,并得到国民军和陕军的支持。7月,在国民军孙岳部、李文龙部和陕军杨虎城、甄寿珊部的夹击下,驱吴运动获得胜利。

第四节 陕西国民会议运动

国民会议运动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共同组织和领导的一次反帝反军阀运动。1924年11月在全国发展起来的国民会议运动,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陕西国民会议运动主要是由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区委派回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以中国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利用各种群众团体宣传和组织起来的。1925年1月21日,陕西国民会议筹备会成立,17个群众团体参加。23日,陕西国民会议

^① 胡憨战争即胡景翼、憨玉昆之间的战争。

第二次筹备会议召开,出席代表63名,代表36个团体。会议将筹备会改为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大会,宣告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总务股主任魏野畴,副主任俞嗣如;交际股主任李凤桥,副主任何挺杰;会计股主任王授金,副主任胥元勋;文书股主任吕佑乾,副主任邹均;庶务股主任羿文龙,副主任刘述吾;宣传股主任康少韩,副主任魏纯如。并决定由总务股主任魏野畴主持执行委员会,商决一切事务。3月22日,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推举王授金为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主席。在此前后,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三原国民会议促成会、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等相继成立。陕西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后,首先反对段祺瑞于1925年2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善后会议”;其次通过悼念孙中山等活动,推动国民会议运动深入开展。1926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根据反帝反封建的需要,发出73号通告,再次强调开展国民会议运动,恢复或重新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根据通告精神,陕西人民再次掀起促成国民会议运动,1925年12月下旬,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和反奉运动协进会共同联合省内各团体,发起成立了新的陕西国民会议促成筹备会。1926年1月8日,成立了“西安国民会议促成会”,选举何受孙、王授金为总务委员,刘含初、李应良为文书委员,俞德暹、何挺杰为组织委员。这一时期的国民会议运动,大多由其他社会团体出面,而陕西的国民党组织则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进行反奉倒段,促成国民会议。随着南方广东革命政权的巩固和北伐战争临近,以及奉、直联合迫退国民军,国民会议运动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国共两党虽然未放弃“国民会议”的口号,但是通过和平手段召集国民会议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通过运动教育人民的目的已经达到,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它在1926年3月结束。

第五节 非基督教运动

1922年至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和推动下,以学生为主体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斗争。1925年12月13日,西安非基督教大同盟成立,周伯勋等五人为执行委员。同时各学校、各团体都成立了非基督教同盟,组织讲演团。在此前后,三原、延安、绥德等地也成立了非基督教大同盟,反对教会进行文化、经济侵略。12月25日圣诞节,许多地方举行了反基督教游行示威,要求

收回教育权。三原非基督教同盟组织数千名群众游行示威,迫使县知事签字答应收回教育权。在非基督教运动中,中共党、团组织始终正确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严格区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文化、政治侵略的罪恶阴谋与教会的正常宗教活动,争取和团结广大的教会学生,使他们加入革命阵线。

第六节 西安反围城斗争

1926年4月,直系军阀刘镇华奉吴佩孚之命,率镇嵩军10万之众自豫西犯陕,相继攻陷潼关、华阴、华县、渭南、临潼。陕军兵单援绝,致使西安被围。在刘镇华攻占陕东时,陕西军务督办李虎臣奉岳维峻电令,率全部精锐驰援,后因部将麻振武叛变,与刘镇华合流,潼关失守,被迫撤退。3月27日,李虎臣返回西安。29日,李虎臣、杨虎城、邓宝珊、卫定一、田玉洁、朱子敏等陕军将领在三原召开军事会议,公推陕西军务帮办兼陕北镇守使井岳秀维持全省治安,并守中立,实行保境安民策略。在并未到职前,委杨虎城代行帮办职务。共产党员魏野畴赴三原协助国民军召开会议,支持国民军坚守西安。4月14日晚,刘镇华命万选才部向西安附近移动,企图在李虎臣离开西安时,跟踪追歼。此时,杨虎城先遣姬汇伯旅于15日入西安,16日,杨部冯钦哉旅入驻西安北门。18日,镇嵩军占领东郭门外桑园、城南大雁塔、城北咸阳店(午门坊),开始围城。同日,杨虎城进入西安。当时,西安守军有杨虎城部(国民军三军第三师)、李虎臣部(国民军二军第十师)、卫定一部(陕西陆军第四师),分属三个不同系统。为统一指挥,加强团结,共同对敌,5月19日,各方将领召开联席会议,杨虎城提议取消国民军二、三军名称,一律改称陕军,公推李虎臣为陕军总司令兼第一师师长,杨虎城为副司令兼第三师师长,田玉洁为第二师师长,卫定一为第四师师长。围城期间,西安中共党、团组织以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和青年社、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开展工作。刘含初、赵葆华、张含辉等共产党人以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负责人的名义,对守城官兵进行宣传鼓动,对上层人士进行统战工作,组织群众慰问守城部队;举办暑期学校,进行革命理论学习,培训骨干,参加社会救济;组织市民自救运动,并派代表出城请援。还出版刊物,进行宣传工作。1926年夏,共产党员魏野畴、张含辉等先后冒险化装出城,分别到渭南、华县、蓝田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与刘军作战。守城军民与刘镇华部发生激烈战斗,先后

有东关防御战、东北城角之战、小雁塔争夺战、大白杨突围战等。一直坚持了八个月艰苦卓绝的反围城战斗。9月17日,冯玉祥在五原举行就职誓师典礼,宣布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并采用李大钊“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计划,任命孙良诚为援陕军总指挥兼第三路司令,方振武为援陕军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弓富魁、马鸿逵、石友三、韩复榘为二、四、五、六路司令。11月28日,援军与城内守军内外夹击,终使镇嵩军全军溃退,被围困近八个月的西安古城得以解围。

第七节 中共组织在学校中的活动

1. 榆林中学

全称为“榆林陕北联合县立中学”。1914年由杨翀宣创办,1932年改称陕西省第六中学,1938年改称陕西省榆林中学。1917年杜斌丞出任榆林中学校长后,聘请了思想进步的魏野畴、李鼎铭等十多人来校任教,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1923年刘志丹任第一届学生会主席,组织社会科学、青年文学、话剧等研究会,并创办了进步刊物。从1924年起,学校三年掀起三次学潮。1928年春为驱逐反动校长,联合职中、女师学生举行罢课。1929年中共陕北特委迁驻榆林,并派刘澜涛以教员身份来校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初榆林中学成立了和平促进分会,为和平解放榆林出谋划策。解放前,榆林中学培养了一批革命家、外交家和科学家,如著名的革命家刘志丹、谢子长、曹力如、王子宜、李力果等都是榆林中学毕业的学生。

2. 咸林中学

1918年春,杨松轩、刘德轩、薛辑五等十余人在华县教育会高等小学的基础上创办了咸林中学。同年4月8日正式成立,杨松轩任董正,薛辑五任校长。学校初创,广捐学资,延揽人才,建立组织,立新教育。经杨钟健介绍,1921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魏野畴来校任历史教员、教务主任。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王复生来校任国文教员。此后,杨松轩邀请了常汉三、严少儒、王德崇等德高博学者来校任教。学校不仅开设国文、英语、数学等十余门文化课,还开设了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等课程,并在学生中建立了演讲会、青年会、新剧团等学生自治组织和革命青年组织励志社,在陕西独树一帜,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

要阵地。1928年杨松轩病逝后,学校几经变化,先后由关秀卿、王德崇等人主持校务,学校曾易名咸林学校,私立咸林中学等。1949年秋由人民政府接办,由私立改为公办。

3. 绥德师范学校

全称“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该校创办于1923年5月,高竹轩任校长。1924年夏,陕西早期中共组织创始人李子洲接任校长后,聘请共产党员王懋廷及杨明轩(教务主任)、常汉三(训育主任)、田伯英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来校任教,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增设社会科学课程,并把马克思主义列为教学的重要内容。校内设立图书杂志辅导委员会,向学生辅导《向导》、《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共进》、《独秀文存》等进步书刊。学生中建立有读书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共进社绥德分社等组织,在此基础上,王懋廷等物色、培养、发展党、团员,开展建党建团活动。同年12月,学校开设平民夜校,先后进校学习者达680人之多。大革命时期,绥德县是党在陕北的活动中心。而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则是党在陕北革命活动的领导中心。这里的党组织是陕北地区建立最早的组织。中共绥德地委、共青团绥德地委以及陕北学生联合会、陕北青年社等进步组织均设在绥德第四师范学校。1926年12月,李子洲调往西安工作后,常汉三接任绥德第四师范学校校长,继续坚持李子洲开创的办学方针。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军阀井岳秀于8月4日派人查封了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并软禁了校长常汉三。蔡南轩、关中哲(均为中共绥德县委负责人)等教师被迫离校。

4. 渭南赤水农业职业学校

全名为“私立渭南赤水初级农业职业学校”,校址在渭南赤水镇,1923年由王尚德等筹办。王尚德任校长兼语文教员,赵葆华任教导主任。他们以教师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和建团工作,创建了陕西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支部。学校除开设文化课外,还设有园艺、农作物等课程,实行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开辟数十亩土地作各种农林科技试验。抗日战争时期,学校效法延安抗大的办学方针,对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针进行改革。学校设立党支部和抗敌后援会、工作团等抗日团体,并派出部分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准备开赴延安,参加革命工作。在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对学校进行监视和破坏的形势下,师生在王尚德领导下坚持办学。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学校建立了面粉厂、砖瓦厂,又设立了高中班。1946年8月,王尚德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后,学

校仍坚持开办。

5. 耀县三民军官学校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创办陆军军官学校,杨虎城先后派人前往学习,准备在陕西创办军校。1924年冬,杨虎城南下关中驻防耀县,在中共党员魏野畴的建议下,于1925年7月在耀县文庙内正式开办三民军官学校。学校由黄埔军校毕业生唐嗣桐任校务长,刘子潜任总队长,魏野畴任政治部主任,中共党员刘含初、赵葆华、吕佑乾、宋树藩等任政治教官。学校开设的政治课程有三民主义、总理遗教、帝国主义侵华史、不平等条约、社会进化简史等。一部分学生由杨部官兵中选送,一部分由各地党团组织动员报考。总队直辖四个队,每队130人。这些学生先后参加了西安守城、北伐战争、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一批学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6. 国民军军官学校

1926年9月,冯玉祥根据苏联军队建设的经验,在绥远包头开始筹建国民军军官学校。学校在筹建过程中先后迁徙宁夏银川和甘肃平凉。1926年12月27日,冯玉祥宣布国民军军官学校在平凉成立。1927年1月该校随冯玉祥迁入西安,校址在东厅门的一所军械库内。该校“以培养国民革命实际斗争的军队初级干部人才,实现三民主义达到世界革命为宗旨”。该校曾一度改名为“国民军联军第二军官学校”,1927年4月又改名为“国民军联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续范亭,副校长王文彬,政治部主任唐澍(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刘伯坚、邓希贤、刘继曾、汪泽阶等担任教官或作兼职教官,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等担任学校顾问。在校学生1000多人,分编为步兵队和骑炮队、机关枪队、迫击炮队等。

7. 西安中山学院

1927年3月,西安中山学院由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创办于西安,共产党员刘含初任院长。学院设有农民运动班、军事政治班、组党班、妇女运动班,还办有地方行政人员训练班和夜校。课程有:社会科学概论、世界政治经济状况、国民党史、孙文主义、帝国主义侵华史、军队政治工作、土地问题及农民运动、农民问题、农协和农民自卫军之组织与训练、军事常识等。1927年6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清党”反共后,学校改组,性质发生了变化。

8. 西安中山军事学校

1927年3月创立于西安,由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管辖,共产党人担任领

导。主要领导人有史可轩(校长)、李林(副校长)、邓希贤(政治部主任)、许权中(总队长)等。课程设置有军事术、军事理论、野外作业、中国革命史、形势任务教育、政治经济学等。学校先后招收学员 700 多名。1927 年 6 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清党”反共后,军校于 7 月中旬奉命与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合编为一个旅。在中共组织的领导下,该旅拒绝了冯玉祥让其开赴河南的命令,在临潼、商洛一带活动,暂编入陕军冯子明部。1928 年 5 月,这支部队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参加了渭华起义。

第三章 重大事件及会议

第一节 重大事件

1. 户县惨案

1927 年春荒,户县农民断粮,而驻防户县的反动军官何经纬却勾结豪绅摊派苛捐杂税,私囤粮食,哄抬市价。4 月底,中共户县组织发动群众查出何经纬私囤粮食 750 多石。何恼羞成怒,以武力包围农民协会。5 月 11 日,何又以 4 个营兵力包围东索村农民协会,屠杀会员 11 人,伤 40 余人。当晚,何经纬又派士兵窜入各村,捣毁农协,杀害无辜。惨案发生后,在中共组织的领导下,陕西省农民协会筹备会和户县农民协会接连发表宣言、通电,揭露何经纬的滔天罪行。15 日,西安各团体在东大街中山俱乐部召开追悼死难农友大会,进行示威游行,向陕西省政府提出惩办凶手等十条要求。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冯玉祥被迫给何经纬以“革职留任”的处分,令其出兵潼关,“将功折罪”。

2. 冯玉祥出师东征

1927 年 5 月,冯玉祥在整肃西北后方后,按照中国共产党和武汉国民政府商定的军事计划,发布命令,率部东征。5 月 1 日,国民军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在西安宣誓就任总司令。5 月 6 日,冯玉祥移驻潼关,挥师东进河南,配合武汉国民政府北伐。8 日占领陕州,15 日攻克洛阳。5 月 26 日,冯玉祥派孙良诚、方振武率部沿陇海路继续东进,逼近郑州。奉军

在正面被北伐军击溃,侧面受到冯玉祥部的攻击,加上阎锡山态度改变,威胁后方,使其被迫放弃郑州、开封,向山东、直隶(今河北、北京一带)退却。5月30日,冯玉祥部占领郑州。6月1日,北伐军第三十六军也到达郑州,与冯玉祥部会师。贺龙率领的独立第十五师在参加临颍决战后,由周家口北进,追击奉军残部,经朱仙镇,直逼开封。6月2日,独立第十五师率先进入开封,北伐军第四军、第十一军同日到达,与冯玉祥部在开封地区会师。

3. 冯玉祥“清党”反共

1927年6月,冯玉祥与汪精卫、蒋介石分别在郑州、徐州举行会议后,决定在豫、陕、甘等省进行“清党”反共,将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礼送出境”。7月18日,冯系陕西省政府成立,冯部参谋长兼留守司令石敬亭代于右任为主席,宣布解散一切革命组织;共产党员不准跨党加入国民党,加入国民党的一律解除职务开除党籍;在国民革命时期不准以共产党名义活动,亦不准假国民党名义做共产党工作,违者按反革命条例治罪。并先后逮捕了共产党员刘天章、白超然,杀害了著名共产党员史可轩、刘含初。改组了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停止了农协活动,使陕西大革命运动归于失败。

4. 美原事件

1927年6月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后,冯玉祥公开背叛革命,在其所辖地区“清党”反共。7月13日,冯玉祥电令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与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合编,由政治保卫部部长、中山军事学校校长、共产党员史可轩率领开赴河南“整训”,伺机加以消灭。在此情况下,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抗拒冯玉祥的命令,不赴河南,由史可轩率部北上陕北,向与受党影响较深并由党组织部分掌握的石谦旅靠拢。14日,史可轩率部离开西安,沿渭河开往临潼交口一带,随即向渭北山区进发。为借道过境和筹措粮草,史可轩带十余人来到美原镇,与地方军阀、原国民二军的田生春交涉,却被田生春扣押杀害,部队遂交共产党员许权中指挥。

第二节 重要会议

1. 陕西省学生联合会第一届代表大会

1925年7月7日至15日,陕西省学生联合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在三原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有西安、三原、赤水、华县等地学生会负责人,共产党员魏

野畴列席会议。会议通过了谋求学生永久利益等 13 项重要决议,其主要内容为:保证学生本身利益,改良课程,革除腐败教员;购买新的书报杂志,添加设备;减免学费、体育费和住宿费;改革教育,促进教育经费独立;破除宗法社会思想,废止专制教育制度;注重社会运动,对于种种爱国运动、民众运动、各种纪念节,学生应参加并向群众宣传,学校和政府当局不得干涉等。会议还选举产生了陕西省学生联合会的执行机关。会后,学联组织了五个宣传队分赴各地进行宣传活动。

2. 国民党陕西党员俱乐部第二次会议

1925 年 8 月 18 日,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国民党陕西党员俱乐部成立。9 月 5 日,国民党陕西党员俱乐部在西安召开第二次会议,到会党员 64 人(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会议推举刘含初(共产党员)为主席,杨明轩、赵葆华(两人均为共产党员)为书记。根据杨明轩的提议,会议决定将西安划分为东、南、西、北及东关、西关六个区,每区设干事两人,负责宣传工作,并推举宋树藩为俱乐部宣传计划干事。会后,向与会者分发了孙中山遗像、《中山遗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中国国民党党章》等文件及有关书籍。

3. 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成立大会

1925 年 9 月 26 日,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成立大会在西安陕西省立第三中学大礼堂举行。会议通过了临时省党部组织大纲,推选杨明轩、刘含初、张性初、赵葆华、焦易堂等九人为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师守命、王圣域等五人为候补委员。在当选的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多数。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成立后,分别向于右任、冯玉祥等军事将领发电报告情况,并派人去三原、延安、华县等地成立县党部,使陕西各地国民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

4. 三原军事会议

1926 年 3 月,国民二军在豫西作战失利,河南境内的国民二军几乎悉数被歼,直系军阀刘镇华率 10 万镇嵩军进逼陕西。3 月 29 日,国民二军、三军在陕将领李虎臣、杨虎城、朱子敏、田玉洁、卫定一、邓宝珊、冯子明、甄寿珊等在三原举行军事会议,中共党员魏野畴出席。会议决定李虎臣辞去陕西军务督办职务,通电下野;推举陕西军务帮办兼陕北镇守使井岳秀“维持全省治安”、“并守中立”。并由杨虎城率领陕军三个师从三原进驻西安,和李虎臣等

共同组成陕军,保卫西安。

5. 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7年1月21日至26日,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70余人,其中多数为跨党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大会先后由于右任和共产党员史可轩、魏野畴、李子洲、刘含初、杨明轩、王授金任主席,共产党员赵葆华任大会秘书长。苏联顾问赛夫林、乌斯曼诺夫任大会顾问。共产党员刘伯坚以国民军联军特别党部主席的身份出席大会,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大会通过了宣言和有关问题决议案,选举刘含初、赵葆华、李子洲、魏野畴、张性初、张含辉、王授金等13人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王尚德、呼延震东等3人为候补执行委员。

6. 共青团陕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7年3月13日,共青团陕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中山学院召开,曹趾仁、吴化之等十人出席会议。大会提出了“工作青年化,组织群众化”的行动口号;以大力发展组织,全面开展青年运动,加强农村青年工作做为活跃陕甘共青团工作的目标。会议选举产生了共青团陕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曹趾仁,组织委员吴化之,宣传委员张慕陶(张金印),青年委员王文彬,学运委员王芾南(王林);选举张慕陶为出席共青团全国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7. 中共陕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7年3月14日至18日,中共陕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中山学院举行。出席会议代表11人,代表9处党组织。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目前工作计划》,制定了“工作集中”、“人才集中”的工作原则,提出“党到农民中去”的口号,强调要健全党的组织,严格党的纪律。会议决定改组西安、渭南、绥德三个地委,组建三原、延安、榆林3个地委,正式成立中共陕甘区委。大会选举耿炳光(书记)、魏野畴(宣传)、李子洲(组织)、亢维恪(农委书记)、陈家珍(军委书记)为正式委员,候补委员两人暂缺(同年6月,增加刘天章、杜衡为候补委员,分别做宣传和组织工作)。

8. 陕西省学生联合会第二届代表大会

1927年5月12日至18日,陕西省学生联合会第二届代表大会在西安举行,关中、陕南、陕北各地学生代表60余人出席会议。大会总结了第一届代表大会以来全省学生运动的经验,通过了参加政治运动、拥护国民革命军、帮助工农运动、妇女运动、平民教育运动、反对基督教运动、文化运动、维护学生利

益、组织问题等 13 个决议案和《陕西省学生联合会章程》，发表了《宣言》、《告国民革命军肃敌诸将士书》。大会选举产生了由 13 名执行委员和 5 名候补执行委员组成的陕西省学生联合会。5 月 22 日，执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选王芾南、郭峻、胡景儒（女）、秦镇西、曹耀宗为常务委员，王芾南为总务部主任。

9. 陕西青年社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7 年 5 月 18 日至 21 日，陕西青年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到会代表 45 人，代表 21 个青年团体。邓希贤向大会介绍苏联近况，杨明轩、雷晋笙等作讲演。会议通过了反基督教运动、青年参加政治运动、维护青年本身利益、组织问题、文化运动等决议案，通过了《陕西青年社章程》和《陕西青年社总社成立宣言》，发表了《本社成立通电》、《拥护国民革命军肃清奉系军阀通电》、《哀悼京津死难烈士李大钊通电》等。会议决定将 5 月 18 日定为陕西青年社成立纪念日，各分社每年都要在这一天举行纪念大会，开展纪念活动。大会选举王文彬、黎光显，王若渊、刘鼎锡、任淑英（女）等九人为陕西青年社执行委员，白钟雄等五人为候补委员。王文彬为总务部主任。

10. 陕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

1927 年 6 月 1 日至 8 日陕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出席会议代表 84 人（其中 54 人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代表 32 个县农协组织。会议总结了陕西农民运动的基本经验，检阅了陕西农民的革命力量，通过了《陕西省农民协会成立宣言》和《政治报告决议案》、《会务总报告决议案》、《组织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决议案》、《惩治贪官污吏及土豪劣绅决议案》、《改良雇农及佃农生活决议案》等 26 个决议案。选举产生了由 13 名执行委员和四名候补执行委员组成的陕西省农民协会，推选王授金、陈嘉惠、张含辉、亢维恪、马价人（均为中共党员）为常委，王授金为主席。

11. 中共陕甘区委紧急会议

1927 年 7 月初，中共陕甘区委接到共产党员刘伯坚从郑州送来的紧急通知，要求陕西党组织做好冯玉祥叛变革命后的应急准备工作。中共陕甘区委接到通知后，立即在西安中山学院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议决定：立即通知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的群众团体，迅速由半公开活动转入秘密状态；重要干部和身份已经暴露的党员秘密离开西安，深入基层开展革命工作；各地请示工作由区委书记耿炳光和负责组织工作的区委候补执行委员杜衡负责接待。

第四章 报刊杂志

1.《白话报》

由陕西学生联合会创办于1919年6月。编辑刘道洁、邹遵、韩志颖。《白话报》主要刊登全国各地及陕西五四运动的发展情况、往来电讯和对时局的言论。

2.《励进》月刊

由汉中旅京学生励进会于1919年夏创办。该刊以团结救国,反帝反封建,促进新文化,改进汉中地方弊政为宗旨。主办人傅鹤峰。1920年后,因汉中旅京学生相继毕业离京而停刊。

3.《启明日报》

由陕西靖国军于1919年10月创办于三原,为总部机关报。主办人蔡江臣,撰稿人汶洁夫、王平正、胡伯一、周伯敏等。其主要内容为传播革命思想,记载国内外大事。《启明日报》主要发行于渭北地区。1921年9月停刊。

4.《正义日报》

《正义日报》1919年创办于三原,主办人李椿堂。该报“阐发革命理论,介绍中外学说,对社会主义介绍尤多。”后因主办人李椿堂被害,报纸停办。

5.《秦钟》

由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创办的月刊。1920年1月在北京出版,同年6月停刊,共出6期。宗旨为:(1)唤起陕人自觉心;(2)介绍新知识于陕西;(3)宣传陕西现状于外界。主要内容为传播新文化,反对陕西地方军阀黑暗统治。主办人陈顾远、李子洲。

6.《鼓昕日报》

1920年7月15日《鼓昕日报》在西安创办。创办人田芝芳,主笔张仞鸣。该报为最早介绍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陕西报纸之一,先后刊登了《列宁的演说》、《布尔塞维克主义论》、《俄国工联合会之实力》、《民主主义论》等译文及李大钊《各国妇女参政运动》讲演词等,在社会影响较大。1921年4月停刊。

7.《秦铎》

由陕西旅沪学生会主办的刊物,1920年10月创刊于上海。主办人雷晋笙、严信民。刊登的主要内容为反对旧的政治、教育、婚姻等制度,宣传反帝、爱国、民主思想。该刊每期印刷两三千份,主要在陕西地区发行。后因刊物撰稿人员复杂,刊物质量下降而停办。

8.《共进》

1921年10月,由陕西旅京学生李子洲、刘天章、杨钟健、刘含初等创办于北京。1922年10月,陕西旅京学生组织的共进社成立后,《共进》半月刊成为该社的机关刊物。《共进》以“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为宗旨,刊登了大量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文章,其中有《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俄罗斯革命第六周年纪念》、《列宁周年纪念感言》、《列宁之死与中国青年》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马列主义在陕西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1926年10月,《共进》被奉系军阀以“赤化”罪名封闭,共出刊105期。

9.《贡献》

1922年3月1日由天津南开中学的陕西籍学生屈武、武止戈、崔孟博等人在天津创办。《贡献》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教育革命,刊登有《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五一运动史略》等文章。同年6月停刊,共出刊4期。

10.《促进》

1922年6月由陕北旅津进步学生在天津创刊,主办人白超然。该刊以陕北教育促进会(后改为陕北改进社)天津分会等组织的名义创办,以宣传进步思想,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社会革命为宗旨,号召人民群众同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陕北教育促进会改为陕北改进社后,《促进》也更名为《改进》,1924年11月终刊。

11.《新时代》

1922年由雷晋笙、严信民等在上海创办,旬刊。该刊主要评论陕西时政,介绍民主思潮,宣传马克思主义。《新时代》先后出版10期,主要发往陕西地区,后因经费困难而停办。

12.《汉钟》

1923年10月由汉中旅沪学生会创办。《汉钟》“以提倡新文化,介绍适用知识,共谋改进汉中为宗旨”,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色彩,主办人刘秉钧、钟进泉、廖作民等。主要发行对象为汉中的学校、团体、机关及知识分子和汉中

旅外学生。

13.《青年文学》

1924年7月由魏野畴领导的“青年文学社”在西安创办,主编张秉仁。该刊宗旨是团结教育广大青年群众,提高新文化思想水平,积极参加政治斗争。同年10月,青年文学社改为青年生活社,《青年文学》亦随之改为《青年生活》。

14.《西北晨钟》

1924年12月10日在西安创刊,主办人武止戈、魏野畴、雷晋笙、崔孟博、康少韩等。该刊为综合性旬刊,内容有文艺、政治、哲学、时事、论文等。1925年停刊。

15.《陕西青年》

1924年在西安创刊,主办人张秉仁、张秉辉、张金印、陈嘉惠等。该刊以提倡新文化,讨论青年问题为中心内容。

16.《青年生活》

1924年10月由魏野畴等创办于西安,前身是《青年文学》,主编张秉仁。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鼓动学生运动,引导青年从事社会改革。1926年3月12日停刊。

17.《渭北青年》

1925年8月4日由渭北青年社创办于三原,主编先后为蒲子正(蒲克敏)、张安人(张仲实)、亢维恪(亢心栽)、李秉乾(李子健)等。该刊主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号召人民反帝反封建。

18.《西安评论》

1925年8月12日由魏野畴等创办于西安。西安评论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唤起民众,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为宗旨,主要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文章。1926年3月12日停刊,共出36期。

19.《新群》

1925年12月26日由上海大学陕西同乡会的吉国桢、杨明轩、曹趾仁、关中哲、邹遵、李秉乾、许尚志等创办,为半月刊。主编曹趾仁。该刊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反封建为宗旨,刊有《国民党左右派的分化——远因与近因》、《唯物史观论者眼中的中国乱源》等文章。

20.《青天白日报》

1925年出版的国民军三军第三师机关报。由杨虎城倡办,宋树藩、赵葆

华等为编辑。内容以传播革命思想,报道军政消息为主,1926年停刊。

21.《陕西国民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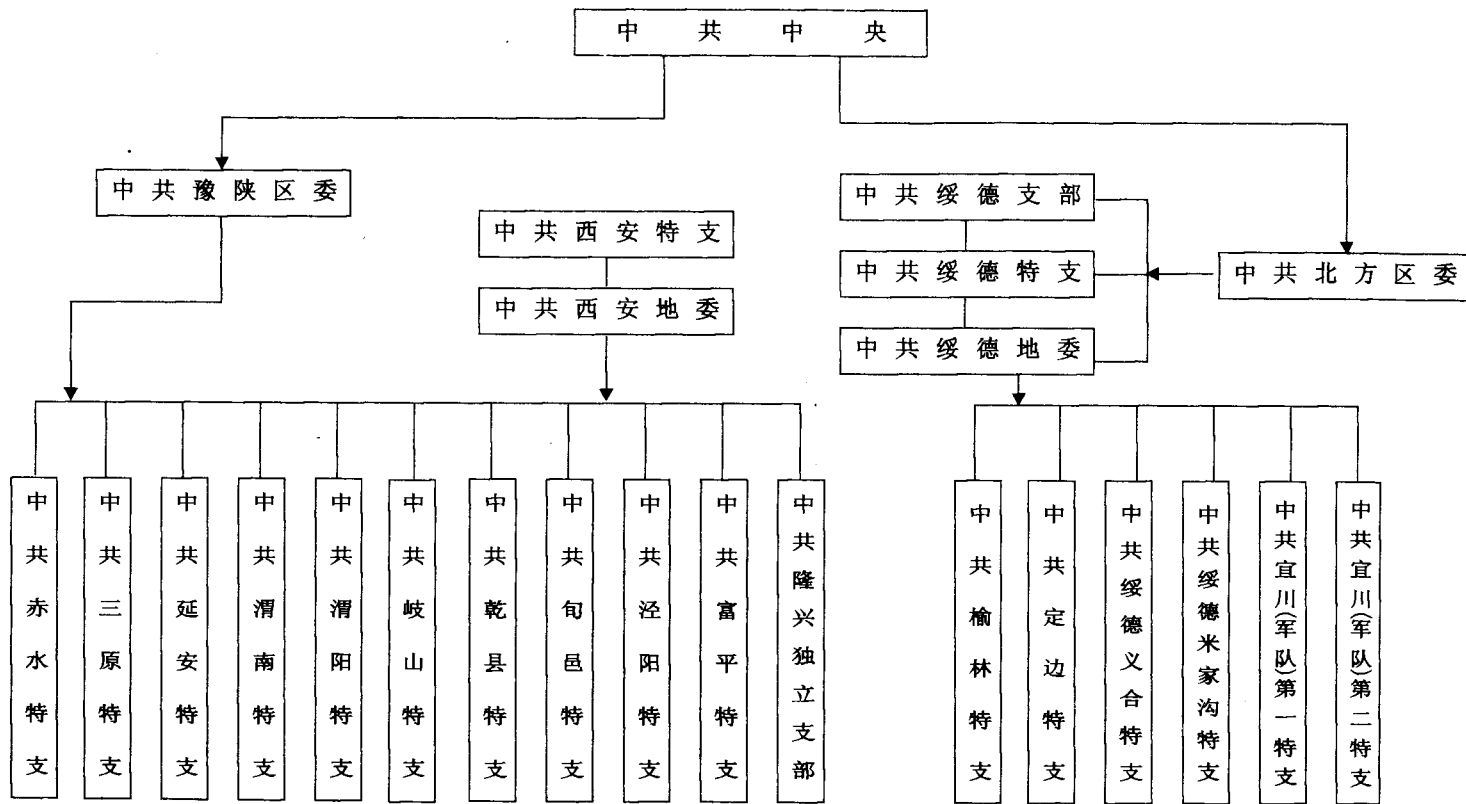
1927年1月国民军联军进驻西安后,中共组织即派雷晋笙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名义创办了《陕西国民日报》,雷晋笙、刘天章先后任社长,孟园梧、杨慰祖先后任总编辑,白超然为编辑。该报名义上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创办,实际上由中共党员主持,为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促进国共两党在西北的合作及推动国民革命在西北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1927年7月,冯玉祥“清党”反共后,刘天章、白超然被捕,报纸停办。

22.《西北人民》

1927年5月1日由中共陕甘区委创办,为区委机关刊物,旬刊。每期发行2000份。该刊除转载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的文章外,还公开以中共陕甘区委的名义发表对于西北政治形势的看法和意见。曾登载有《介绍同志须知》、《工农入党须知》、《入党须知》、《支部须知》、《党的组织讨论提纲》等文章。大革命失败后停刊。

中共陕西地区早期组织序列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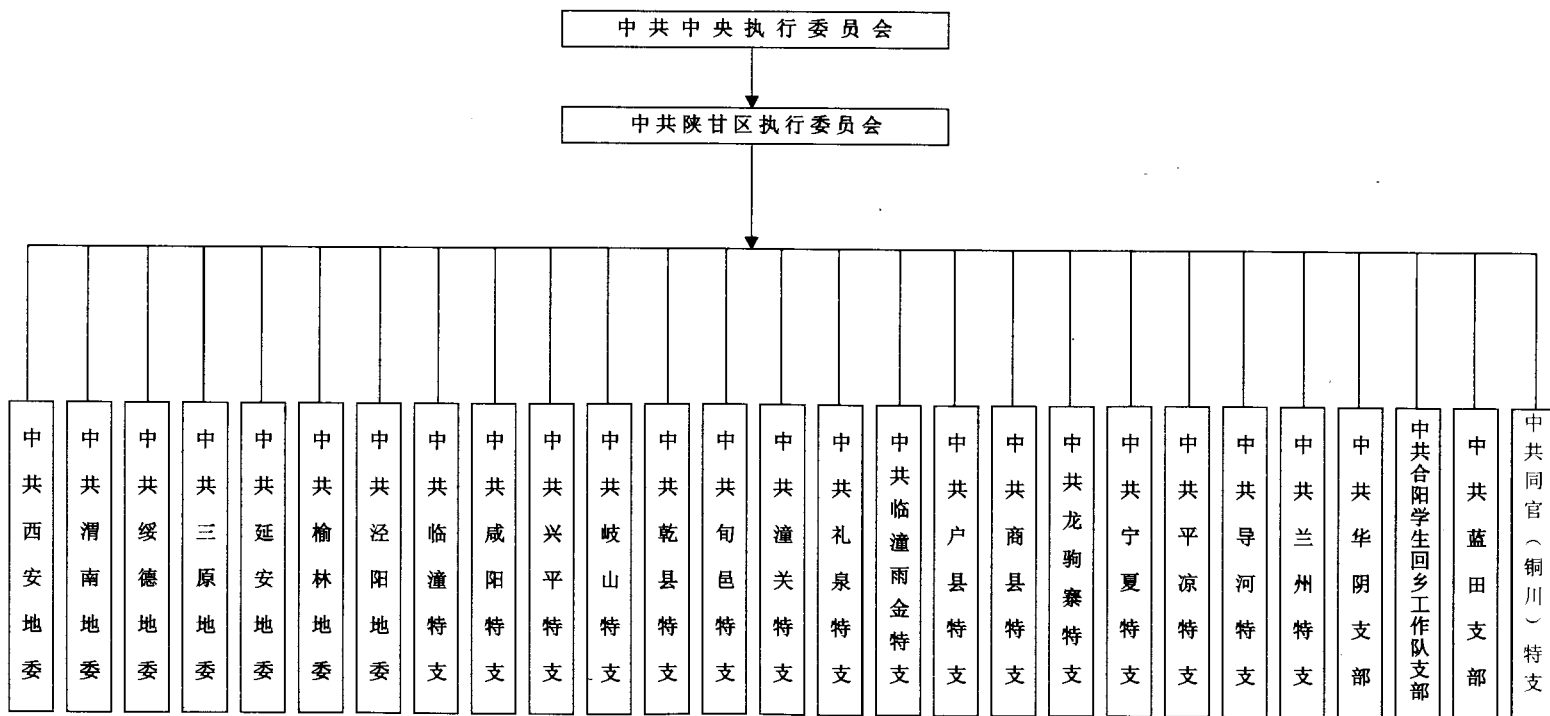
(1925.10~1926.11)



中共赤水 三原特支在1926年初未成立中共西安地委前 直接归中共豫陕区委领导 各地委直属的支部未收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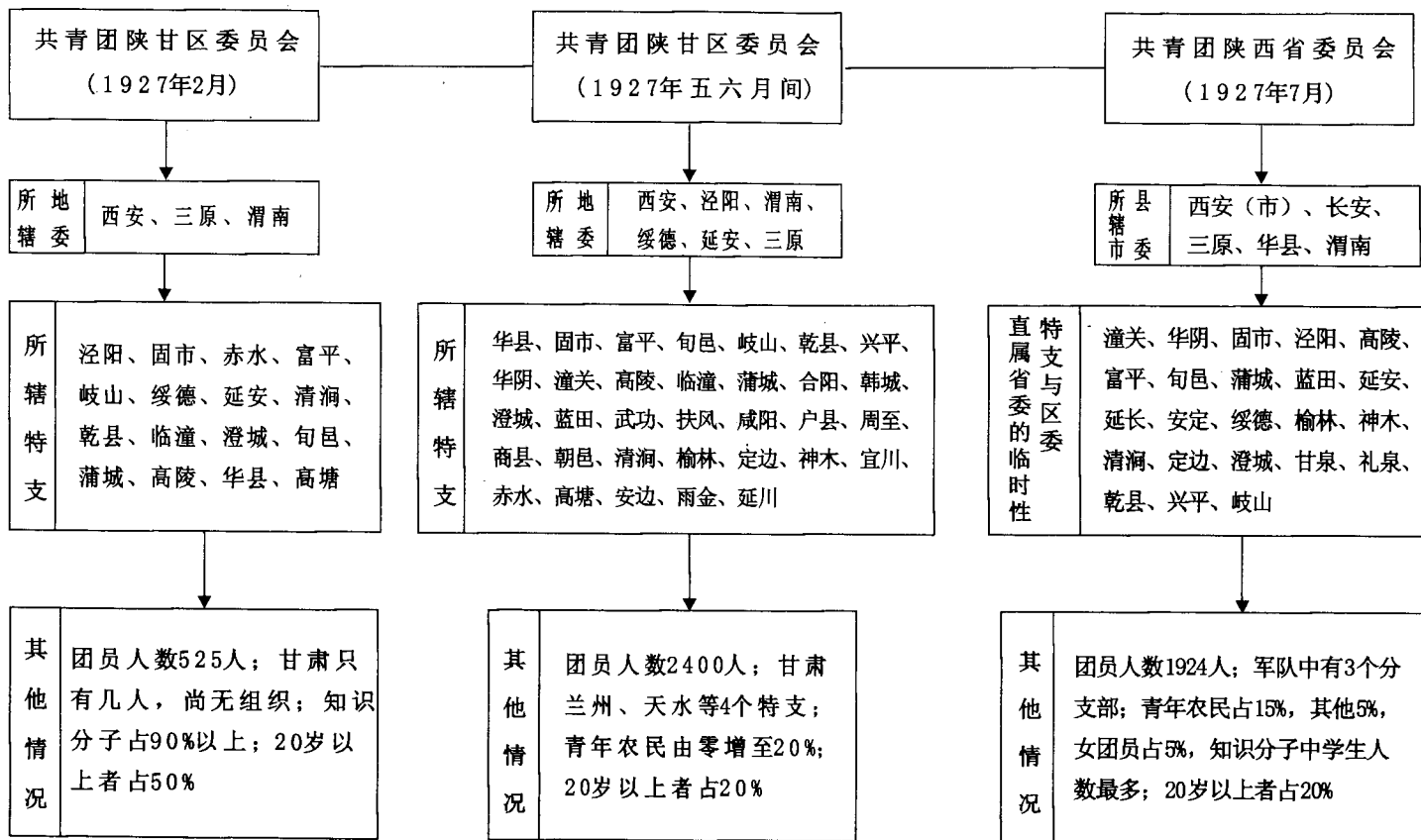
中共陕甘区执行委员会组织序列表

(1927.2~1927.7)



共青团陕甘区委成立到团陕西省委成立期间陕西地区团组织状况序列表

(1927. 2~1927. 7)



此表根据1927年10月团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 团务报告 编制

第二篇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 中共组织及其活动

(1927.7—1937.7)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西地区中共组织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27.8—1933.7),中共陕西省委基本上是陕西地区共产党组织的统一领导机关,其活动方式以秘密斗争为主,并开始了武装革命,创建苏维埃区域的斗争。第二阶段(1933.7—1935.10),这一阶段,陕西地区共产党省级或相当省级的组织建立较多。中共陕西省委在这阶段屡遭破坏,一直坚持工作,但机构不够健全。渭北、陕甘边、陕北、陕南地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武装斗争不断发展,苏区不断壮大。第三阶段(1935.10—1937.7),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西国统区和西北苏区的党组织都有较大发展,并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开始实行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的转变。

1927年7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委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成立,活动范围包括陕西全部和宁夏、甘肃部分。十年中陕西省委先后遭到国民党陕西当局8次大的破坏和4次小的破坏,重建和改组17次,更迭过14任省委书记。其间耿炳光、潘自力、曹趾仁、杜衡、高维翰、孟坚(孟用潜)、袁岳栋先后为书记,李子洲在潘自力被捕后代理省委书记(杜衡、高维翰、袁岳栋被捕后叛变,曹趾仁自首)。在1933年8月至1936年12月期间,许多党员干部为恢复陕西省委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刘映胜(被捕后自首)、余海丰(被捕后自首)先后任陕西临时省委书记,韩学亚任陕西党团恢复工作委员会书记,魏光波任西安中心市委书记(代行省委职能),高克林任陕西临时省委书记。1936年12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正式恢复建立,贾拓夫任书记。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西省委先后组建和领导了1个市委、13个特委、3个中心县委,40多个直属县(工)委。西安事变前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几个师、旅和不少团、营建立了中共党的组织。

尽管斗争异常艰苦复杂,但党的活动一直没有中断。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爆发前,陕西地区已有党员 35394 人。其中,陕甘宁特区 34498 名(不含中央、省级机关和军队中的党员),国统区 896 名。1937 年 6 月,陕甘宁特区党委下辖支部 677 个,其中关中区 19 个,陕北分区 576 个,陕甘分区 18 个,神府分区 64 个。国统区陕西省委活动范围建有支部 43 个(1937 年 3 月数字),主要分布在 12 个县,其中耀县 7 个,富平 3 个,三原 12 个,泾阳 3 个,渭华 3 个,礼泉 2 个,扶风 7 个,乾县 2 个,高陵、临潼、蓝田、商县(今商州市)各 1 个。岐山、平凉、宜君、韩城、合阳、蒲城、麟游、西安、武功、礼泉、永寿等地有分散的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面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路线,于 1927 年冬至 1928 年春夏,在陕北、陕东、渭北等地组织领导了多次武装反抗国民党的起义。1931 年 1 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陕西省委投入较大力量在国民党的地方部队中组织了甘肃南部、东部,陕西渭北、陕南等数十次兵变。

上述起义和兵变虽然大多失败,但为发展红军、创建根据地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从 30 年代初开始,中共陕西组织先后建立了渭北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红二十九军和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等正规红军和一些红军游击队,创建了渭北、陕甘边、陕北、陕南、西北几块革命根据地和十多个县级以上苏维埃政权。最后形成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及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陕西边界地区还建立了数个省级或相当省级的组织。(1)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委在陕南苏区设有道委、县委、区委。1935 年 3 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陕南后,陕南苏区的中共组织停止活动。(2)中共鄂豫陕省委。1934 年 12 月,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鄂豫陕边,在洛南县庾家河改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省委书记徐宝珊病逝后,吴焕先、程子华先后代理书记。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到西北根据地后,活动在商洛地区的党组织于 1935 年 9 月 9 日在商县梁家坟建立了中共鄂豫陕特委(亦称陕南特委),执行鄂豫陕省委的工作任务,书记郑位三。1937 年 8 月撤销。鄂豫陕省委领导红二十五军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3)中共西北工委。1935 年 2 月 5 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安定县(今子长县)周家塬召开联席会议,建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工委书记惠子俊

(崔田夫代理)、军委主席刘志丹(一说谢子长),统一领导由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组成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群工作。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领导西北苏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当局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使陕甘边、陕北两个苏区连成一片。(4)中共陕甘晋省委。1935年9月,中共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到达西北苏区延川县永坪镇,与中共西北工委召开联席会议,撤销了鄂豫陕省委和西北工委,建立了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郭洪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与红二十五军组成红十五军团,组织了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取得了劳山战役的胜利。在此期间,西北苏区发生了错误的肃反,刘志丹、习仲勋等被捕,200多红军干部和地方领导干部被错杀。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陕北后,11月撤销了中共陕甘晋省委,相继设立了中共陕西省委、中共陕甘省委、中共陕甘宁省委。1935年11月,中共陕西省委在安定瓦窑堡成立,郭洪涛、马明方先后任书记。1937年7月陕西省委撤销。同期,中共陕甘省委在甘泉下寺湾成立,朱理治任书记。1936年5月陕甘省委撤销,1936年12月再次建立,李维汉任书记,1937年4月撤销。1936年5月中共陕甘宁省委成立,李富春、刘景范先后任书记,1937年9月撤销。

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联合作战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当局对西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随后又组织了东征、西征战役,巩固和扩大了西北苏区,迎来了一、二、四方面军的大会师。

中共西北特支是1936年5月在西安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部宪兵营中共支部基础上组建的,隶属上海中央局,谢华任书记。西北特支负责西安地区学生运动和徐州、山东枣庄等地有关组织活动。

这一时期各级党组织的机构比较健全,大都设有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统战部、白区工作部、妇女部等。

第一章 中共组织

十年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和陕西边界地区的组织有较大的发展,其中党的省级或相当省级的组织有:中共陕西省委、中共川陕省委、中

共鄂豫陕省委、中共西北工委、中共陕甘晋省委、中共陕北省委、中共陕甘省委、中共陕甘宁省委、中共西北特支。

第一节 中共陕西省委及下属组织

一、中共陕西省委

中共陕西省委于1927年7月上旬在西安正式成立。时值冯玉祥在陕西“清党”反共,无法召开党代表大会进行选举,由中共中央任命的省委主要领导和原中共陕甘区委领导成员共同研究,决定由耿炳光(常委、书记)、李子洲(常委、组织)、崔孟博(常委、宣传)、亢维恪(农运)、魏野畴(军事)、张慕陶、张国藩(张质平)、蒲克敏(蒲子政)、陈嘉惠、张性初、李子健、杜衡(杜振庭)、何挺杰(何清楷)等13名委员组成中共陕西省委员会。同时,成立西安市委,将渭南、绥德等地委改为县委。省委成立后,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辖西安市委和绥德、肤施(延安)、长安、渭南、三原、五一、华县7个县委,泾阳、岐山、乾县3个区委,以及兰州、宁夏、平凉、潼关等20个直属特支和支部,共有党员1681名。机关设在西安红埠街九号。随着政治形势日益恶化,中共陕西省委派李子洲前往武汉向中央请示工作。此时,党的八七会议刚刚结束,中央指示陕西省委“要在组织民众的基础上形成反冯势力”。李子洲回陕以后,于9月26日夜在西安红埠街九号向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共陕西省委,由耿炳光(常委、书记)、李子洲(常委、组织部长兼军事)、李子健(常委、宣传部长)、刘继曾(常委)、张慕陶(常委)、亢维恪(农民部长)六名正式委员和张含辉、潘自力(同年11月接任农民部长)、苏士杰(同年11月任军事部长)三名候补委员组成。省委设有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农民部、职工委、妇女部等机构。10月,中央决定成立长江局,中共陕西省委划归其领导。12月,长江局撤销,中共陕西省委又归中央直接领导。

在八七会议精神指导下,中共陕西省委于1927年10月组织和领导了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与此同时,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陕南特委,翌年1月又决定建立中共陕北特委,以加强两地区党的领导。由于各级党组织的积极工作,全省党组织和党员人数有了较大的回

升。到1928年初,建有党组织的县达44个,县委增加到10个,党员总数由1681人发展到1820人。

1928年1月初,陕西省委连续接到中央指示,要求发动农民暴动,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政权;“立即改组各级党部,对于工作不积极,观点不正确的人,要坚决地取消其领导地位,甚至清洗出党”。中共陕西省委立即于是月四、五两日召开第三、第四次全体委员会会议,学习中央指示,检查陕西工作。会议认为,省委书记耿炳光“没有脱离右倾机会主义的指导”,“对组织农民暴动持消极态度”,因而决定撤消耿炳光省委书记职务,由潘自力代理省委书记,委员调整为:李子洲(常委、军事)、徐梦周(常委、组织)、刘继曾(常委、秘书长)、张慕陶(常委)、王松年(常委)、张振海(常委)、李子健(宣传)、亢维恪(农民)、胡宪之(职工委员会)、苏士杰。候补委员张振海、郭世英、李茂森。交通科主任景云。会议还根据中央关于“提拔勇敢的工农同志加入党的指导机关”的指示,增加工农出身的党员王松年、胡宪之、张振海、郭世英等为委员和候补委员。

1928年春,中共陕西省委为了组织武装暴动,决定将陕东、东府地区划为两个暴动区,并先后成立了中共东府特委和陕东特委。这时陕西地区党组织和党员人数得到恢复和发展。陕北特委于1928年4月新建了榆林、清涧两个县委。关中地区新建了韩城、蒲城、富平、兴平、户县等县委。全省党员总数发展到近3000名,共青团员也从1927年7月的1924名猛增到3678名。1928年5月间,中共陕西省委分别组织和领导了渭华起义、旬邑起义和三原、礼泉、泾阳、澄城、淳化、永寿等地的农民“交农”围城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陕西的统治。但由于受中央“左”倾盲动主义影响,起义条件不成熟,在国民党军队的残酷镇压下,除澄城起义取得暂时胜利外,其他起义均告失败,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失。

1928年6月13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全陕总暴动计划决议案》,并改造了省委领导机构。委员为:潘自力(常委、书记,是年11月潘自力被捕,李子洲代理书记)、蒲克敏(常委、宣传)、杜衡(常委、职工委员会书记)、曹趾仁(常委)、张振海、王松年、张性初、刘继曾、徐梦周、萧明。交通科主任陈云樵(陈冠英)。

1928年6月到7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张慕陶出席了会议。党中央在10月8日写给陕西省委的指示中指出:“过

去党的暴动政策犯了极深的盲动倾向,必须严厉纠正。……六次大会决议案是目前党的一切工作的准绳”。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陕西省委于1929年1月底在富平县美原小学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总结工作,并改选了省委,曹趾仁任书记。委员为:李子洲(组织)、蒲克敏(宣传)、徐梦周(秘书长)、马云藩、张国藩、薛永寿、王芾南。会后,团省委书记马云藩等被捕叛变,供出了党、团省委机关。2月6日,党、团省委遭到严重破坏,省委委员大部被捕。截至1929年春,陕西省委下辖的党组织,除陕北特委及所属的六个县委外,关中地区只剩下渭南、韩城、乾县、蒲城、富平等县委。全省党员从近3000名锐减到1300多名,关中地区有组织的党员只剩下200多名,陕西地区的革命形势转入低潮。

党、团省委被破坏后,幸未被捕的省委委员张国藩、薛永寿、王芾南在渭南一起商讨对策。他们以省委三委员的名义,于1929年3月1日在渭南固市陈家滩召集渭南、蒲城、华县、富平、长安等县的党、团负责人召开党团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和临时团省委。会议选举王芾南(书记)、张国藩、薛永寿、张蔚森(组织兼军事)、徐振化(宣传)、李凌云(秘书)、王勉之七人为临时省委委员,后又增补杜衡和章子文(章一悟)两人为委员。3月23日,临时省委在陈家滩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派杜衡、王芾南、薛永寿三人组成代表团去上海向中央汇报、请示工作。6月22日中央作出《关于陕西问题决议案》,对陕西省委被破坏后,立即成立临时省委表示满意,指示陕西临时省委“缩小机关,常委会只需三人,省委兼市委”。7月,代表团回到渭南,立即在渭南辛市召开临时省委全会,对临时省委又作了调整。会议选举委员为:杜衡(常委、书记)、王芾南(常委)、张蔚森(常委)、薛永寿(常委)、刘志丹(候补常委)、徐振化(候补常委)、张国藩、章子文、李凌云、吉国桢、闵继騫(宣传)、梁益堂(秘书长)。候补委员刘树模、张养诚。

1930年2月26日,中央发出第70号通告,提出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和扩大红军等“中心策略”。为贯彻70号通告精神,临时省委于7月在蓝田县巩村小学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并决定将临时省委改为正式省委,委员为:杜衡(常委、书记)、吉国桢(常委、组织)、王芾南(常委、宣传)、高维翰(常委、军委书记)、焦维炽、陈征、张文华、陈云樵。候补委员赵伯平、黄子文。同年10月,中共陕西省委划归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12月,北方局撤销,陕西省委划归中共河北省委领导。

1931年3月29日至31日,中共陕西省委在渭南田家村召开第六次全体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会议围绕拥护与反对四中全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决议,拥护党中央关于开除罗章龙党籍的决定,反对罗章龙领导的“非常委员会”和“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处”分裂党的活动。会议还批评了杜衡在立三路线时期所犯的错误,决定改组省委,委员为:高维翰(常委、书记兼管宣传)、杜衡(常委、组织)、黄平、焦维炽。5月9日,河北省委应陕西省委的请求,报经中央批准,同意陕西省委由中央直接领导,陕北特委仍由河北省委领导。

1930年8月,省委收到中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主义决议案,在全省普遍发动暴动,以配合武汉的取得和全国革命的胜利。结果省、市委领导的西安广仁医院罢工、西安市“九七”示威、蓝田南区驻军暴动、神木、榆林一些部队的起义无一成功。1930年10月,党团省委再次遭到大破坏,吉国桢、贾拓夫等30多人被捕。11月,杨虎城入陕,党团省委被捕的同志趁机越狱,恢复了党、团省委。1931年7月,中央巡视员刘少文(又名刘国璋)来陕,批评陕西省委从省委第四次全会以后犯了“政治动摇”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于8月初召开省委全会,改组了陕西省委。刘少文认为杜衡“在政治上比较坚定,并有督率一切工作的能力”,决定由杜衡担任省委书记兼组织。其他委员为:高维翰(常委、军委书记)、刘万海(巡视员)、李艮(宣传)、刘映胜,同年10月雷某(名字不详)接任宣传。

1932年6月,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作出《关于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会议将创建陕甘边苏区和建立红二十六军作为北方党组织的“第一项基本任务”,决定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派孟坚接任省委书记职务。孟于8月到西安后,立即召开会议,改组了省委。委员为:孟坚(常委、书记)、李艮(常委、组织)、王松年(常委)、贾拓夫(宣传)、刘映胜、汪锋(军委书记)、杜衡、杨珊(杨荫川,秘书长)。接着,陕西省委便有计划地派出大批干部赴陕南、渭北、陕甘边以及甘肃兰州等地,发展党的组织,建立革命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九十月,中共陕西省委派高维翰、汪锋等到三原县,先后建立了渭北革命委员会和中共渭北特委,组建了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第二大队,掀起了抗粮、抗捐、抗税、抗丁等斗争。

1932年12月,省委委员又作了较大调整。委员为:孟坚(常委、书记)、贾拓

夫(常委、宣传)、刘映胜(常委、组织)、杨佑章(职工运动)、李茂堂(李自靖)、金理科(李奎)、杜润芝(军委书记)、杜衡、袁岳栋。秘书樊德音(樊少已)。

是月,省委委员、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杜衡到达宜君转角镇,在刘志丹、谢子长等创建的陕甘边游击队的基础上,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正式成立。1933年三四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在此之前,1932年秋,省委派刘杰三、樊世荣到甘肃平凉,在国民党军队中建立了中共陇东军特委。12月,省委又派吴鸿宾、孙作宾、常黎夫、李慕愚、马豫章等,在兰州建立了中共甘宁青特委,统一领导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党的工作。翌年3月,中共甘宁青特委组建了一支约400人的西北抗日义勇军。

与此同时,中共陕南特委在红四方面军的帮助下,建立了陕南第一游击大队、川陕边区游击队和红二十九军。

1932年到1933年上半年,关中各县的党组织也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到1933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所辖的党组织有:西安市委、陕甘边区特委、陕南特委、甘宁青特委、西路临时特委和三原、韩城、澄城3个中心县委,以及蒲城、渭南、华阴、临潼、户县等直属县委,共有党员1300多名。

1933年1月,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在杜衡的错误指挥下,在陕甘边区攻打与游击队有统战关系的夏老么民团,使红二团损失很大。省委得悉后,写信指示将剩余人员缩编为若干小分队,开展游击活动,逐步恢复红二团。对省委的指示,杜衡表示坚决反对,认为这是“取消红二十六军”,“违反中央北方会议精神”。他立即返回西安,提出改组省委。3月23日,在省委会议上,经过激烈争辩,接受了杜衡改组省委的意见,决定由袁岳栋、杜衡(组织)、孟坚(宣传)组成常委会,袁岳栋任书记。这次改组后,不少同志反映杜衡害怕艰苦,借故离开陕甘边区和红二十六军,反对其在省委工作。另外,省委常委孟坚一再要求离开陕西,省委乃于4月9日召开全会。会议同意孟坚离陕的请求,并决定免去杜衡常委职务,令其回红二十六军工作。调整后省委委员为:袁岳栋(常委、书记)、李世英(常委、军委书记)、贾拓夫(宣传)、刘宗沛、刘映胜、金理科、李茂堂。程建文接替杜衡组织工作(6月被捕叛变)。

同年7月28日,省委书记袁岳栋、省委委员杜衡、贾拓夫和高岗在西安福盛楼饭馆开会,研究王泰吉骑兵团起义后的有关问题,被国民党特务发觉,袁、杜两人当场被捕,贾、高两人乘机逃脱。袁、杜被捕后叛变,供出他们知道的所有组织和党、团员,使省委机关和各地党、团组织遭到空前的破坏。在渭

北地区,就有 500 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或被杀,关中幸存的党组织,只剩下韩城、临潼两个县委。陕西地区的革命形势,又一次转入低潮。

1933 年 8 月,省委委员、原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刘映胜按照贾拓夫的安排,从陕甘边区返回西安,联系同志,召开会议,于 8 月底组建了党和团的临时省委。委员为:刘映胜(书记)、李冲霄(李鼎新,组织)、张鼎安(张新法,宣传)、雷振东(雷致远,青年)、樊德音(秘书)。9 月 19 日,临时省委在西安大差市开会时,又遭国民党破坏,全体委员被捕。

9 月,从外地回到西安的共产党员孙作宾、崔廷儒、史唯然、陈子敬等,与前省委发行部长余海丰取得了联系,经过筹备,于 10 月初,再次组建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委员为:余海丰(书记)、孙作宾(组织)、咎玉祥(宣传)、崔廷儒(秘书长)、胡振家(军事)。秘书刘惠芳。工作刚刚开展,余海丰又在 11 月间被捕,临时省委由孙作宾负责,继续坚持斗争。

11 月,共青团中央派韩学亚了解陕西党、团组织被破坏的情况,并授命“如有可能,就把各地组织尽快恢复起来”。韩回陕后,通过其同学、共青团三原县委书记魏光波与关中各县党、团负责人取得联系,于 11 月 18 日至 19 日在渭南三张背坡村召开党、团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西党、团共同恢复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委员为:韩学亚(书记)、高维翰、王好勤、赵应魁、刘庚、魏光波(组织)、樊德音(宣传)、秦武山(军事)。此间,临时省委与党、团共同恢复工作委员会同时存在。工委成立后,即派魏光波去上海中央局汇报情况,因故未能接上关系。翌年 1 月,工委委员秦武山、赵应魁等被捕,韩学亚于 2 月 10 日赴沪向上海中央局汇报请示工作。上海中央局于 2 月 28 日对韩、魏作了具体指示,命韩先回陕西工作。韩回陕后,慑于白色恐怖,不敢出面活动,工委遂停止活动。

1934 年 3 月,魏光波从沪回陕,与临时省委孙作宾接上关系。接着,由孙作宾主持,在西安盐店街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决定将临时省委改为中共西安中心市委,代行省委职权,委员为:魏光波(书记)、严克伦(组织兼青年)、崔廷儒(军事)、孙作宾(分管陕南工作)、苗建平(分管西安工作)。秘书刘秀珍。并决定不再恢复团市委,由组织委员严克伦兼管团的工作。同年 10 月,魏光波、严克伦先后被捕,其他委员分别转移、隐蔽,中心市委遂停止活动。

1935 年夏,从外地回到西安的共产党员高克林与在西安的孙作宾、崔廷儒接上关系,三人决定重建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委员为:高克林(书记分管西

安和东路工作)、崔廷儒(分管西路工作)、孙作宾(分管杨虎城部队中的中共工作)。秘书萧佩芳。同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临时省委先后派谈国帆、崔廷儒、孙作宾等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从此临时省委与中共中央取得直接联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中共中央及时派出贾拓夫、欧阳钦、张德生等一批领导干部来到西安。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代表(解决西安事变问题)秦邦宪(博古)、罗瑞卿的参加下,于西安二府街召开会议,由秦邦宪传达中央关于恢复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委员为:贾拓夫(常委、书记)、欧阳钦(常委、西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张德生(常委、组织部长)、朱理治(常委、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李一氓(常委、宣传部长)、彭加伦(常委、秘书长,1937年春崔廷儒接替秘书长职务)、惠子俊(惠荣生、薛斯)、李初梨、崔廷儒、危拱之(女,妇女部长)、谢华、王俊(霍建德)。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赵伯平。省委机关先设在二府街,后迁到纸坊巷。省委恢复后,立即派出各路巡视员,分赴各县及杨虎城部队中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恢复与发展党的组织。1937年1月,蒋介石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率军入陕,张学良、杨虎城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被调离陕西。在此情况下,中共陕西省委机关迁到泾阳县云阳镇,在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掩护下,领导关中、陕南国统区党的工作。到5月,已有26个县恢复了党的组织,党员人数已逾千名。

1937年5月2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从政治上、组织上为抗日战争作了准备。为贯彻这次会议精神,进一步部署陕西党的工作,陕西省委于当月22日至27日在泾阳县云阳镇召开了中共陕西省代表会议。会议分析了西北的形势,总结了西安事变后党的工作,提出党面临的新任务是“动员和领导千百万的群众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为和平民主和抗战而斗争!”从此,陕西国统区的党组织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二、中共陕西省委下属组织

1. 中共西安市(工作)委员会

1927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成立中共西安市委,但未配备专人负责,直到9月26日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后,才正式组成西安市委,书记先后由潘自力、蒲克敏、卫志毅担任。1929年4月至1930年6月,西安白色恐怖严重,

党的工作一直由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兼管。临时省委先后指定省委委员徐振化、张蔚森、闵继騫专管西安党的工作。1930年7月,陕西省委决定重建西安市委,吉国桢、张国藩先后任书记。1931年3月26日,省委撤销张国藩市委书记职务,指定省委秘书长焦维炽兼管市委工作。8月,省委重新组建西安市委,由雷某(名字不详)任书记,9月雷某调省委宣传部工作,李良接任市委书记。同月,因西安印刷工人罢工失败,李良调离,省委决定撤销西安市委,西安市党的工作仍由省委负责宣传的雷某兼管。1932年初,省委又指定王松年任市委书记,1933年4月又派宁耀峰(宁慎言)为书记。7月底袁岳栋、杜衡被捕叛变,省委、市委均遭国民党破坏。8月,临时省委指定卢志远为中共西安市委负责人。9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决定,由张鸿博、黄士贞、丁志明、胡明伦重建中共西安市委,张鸿博任书记。数日后,市委遭破坏,临时省委又指定杨文谟为书记,重新组建西安市委。9月下旬,杨文谟、胡明伦先后被捕。10月,临时省委又派王好勤负责市委工作,不到一月,又被迫停止活动。在此期间,市委领导机构一直不健全,在多次更迭中,往往只有书记或负责人,未配备委员。1934年3月,中共西安中心市委成立,代行省委职权,书记魏光波。10月,中心市委遭破坏。此后,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前的两年间,西安市委未能恢复起来。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后,中共陕西省委正式恢复。翌年1月,省委决定重建西安市委,惠子俊任书记。机关驻桃胡巷、纸坊巷等处。同年3月25日,省委又决定将西安市委改称西安市工委,张德生任书记。

2. 中共陕南特别委员会^①

1927年10月19日,中共陕西省委制定《陕南工作大纲》,拟建立陕南特委,以正式委员3至5人、候补委员2人组成。随后,派刘甲三为特委书记,前往汉中。刘到汉中后,先后建立了城固、南郑、宁羌(今宁强县)等支部。1928年春,国民党汉中当局大肆搜捕共产党员,陕南特委委员一人被捕,刘甲三在汉中无法立足,避往四川,特委活动中断。1930年2月,中共陕西省委任命梁益堂为陕南特委书记,重建陕南特委。梁在相继建立城固、洋县县委和宁羌、褒城、西乡、沔县(今勉县)等地党的基层组织后,于同年11月在南郑西南龙岗寺召开中共陕南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建立特委机关,书记梁益堂。此后,周

^① 陕南特委亦称汉南特委、汉中特委,刘顺元主持工作期间又称陕西特委。

彬如(代理)、张继华、贾拓夫、陈文华(代理)、陈浅伦、孟芳洲、杨珊、杨佑章(代理)、汪锋、刘顺元、王克明、白耀卿等相继担任特委书记。

1934年11月,白耀卿被捕,特委工作由中共西安中心市委(代行省委职能)分管陕南工作的委员孙作宾负责。1935年2月,汉中白色恐怖严重,孙作宾被迫离开汉中,特委工作交杨永昶负责。1936年2月,特委停止活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南特委先后下辖宁羌、城固、洋县、勉县、南郑五个县委、三个区委,并领导红二十九军和16支游击队(赤卫队)以及三个边区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同时领导着中共陕南特别委员会军委(前身为国民党第三十八军中共前方军委)。1933年,党员人数达430人,特委机关先后设在南郑(今汉中市)城内及勉县武侯镇、褒城县杜家湾(今属南郑县)、洋县许家庙等地。

中共陕南特别委员会下辖组织

中共宁强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王述绩、张德章、周奋扬(负责人)。

中共城固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郑月波、赵寿阶、王红济、苏文震、李瑞英、刘善长。

中共洋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杨杏生、胡居仁、祝天耀、赵定泰、席中瑶、刘钟秀、王克明、杨永昶(兼)。

中共勉县委员会,书记殷锐。

中共南郑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张书行、胡居仁(兼)、白耀卿(兼)。

中共陕南特别委员会军委,书记先后为李慕愚、张继华(负责人)、杨维三、张明远、汪锋,负责人孙作宾、戚之慎。

3. 中共东府特别委员会

1928年2月,中共陕西省委为组织武装暴动,决定在澄城设立东府暴动区,建立中共东府特委,书记张国藩。5月26日,为了策应渭华起义,东府特委在澄城发动农民起义,将驻韦庄军阀赵桂堂部包围40余天。7月5日,赵桂堂率残部逃走,农民起义取得胜利,东府特委也随之撤销。

4. 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

1928年3月22日,中共陕西省常委会决定,将临潼、渭南、华县、华阴、固市等县划为陕东暴动区,成立中共陕东特委,领导陕东各县的农民起义。4月1日,陕东特委在华县江村药王洞正式成立,书记刘继曾,机关先后设在华县堡子底村的三教堂和渭南塔山等地。5月,特委领导发动了渭华起义。6月下旬,渭华起义失败后,陕东特委自行解体。

5. 中共陕北特别委员会

1928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苗家坪南丰寨(今属子洲县)成立,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特委辖绥德、米脂、清涧、神木四个县委和延安、榆林、延长、横山四个区委。此间,杜衡、杨国栋、刘志丹(临时主持工作)、吉国桢、赵伯平先后任书记。1930年10月,陕北特委划归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北方局指示将陕北党、团特委合并,成立陕北行动委员会,赵伯平任书记,孔祥祯任特委军委书记,谢子长、刘志丹分别任陕北暴动总指挥和副总指挥。12月,陕北特委恢复后,赵伯平、马明方(代理)、崔田夫先后任书记。此时特委划归中共河北省委领导。1931年春,由于党的组织暴露,特委主要领导人被迫离开。五六月间,赵伯平等人秘密返回陕北组建了陕北临时特委。到1932年春,各地党组织初步恢复,特委领导的党员有700多人。1933年3月,特委划归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领导。7月,新的陕北特委成立。12月,中央驻北方代表派谢子长、郭洪涛回陕北工作,谢子长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在陕北特委的领导下,陕北地区的武装斗争全面开展,游击队、正规红军相继成立,并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军事“围剿”,形成了纵横几百里的陕北苏区。至1934年底,陕北特委先后下辖府谷、神木、佳县、横山、米东、吴堡、绥德、绥清、清涧、安定、赤源、延川等12个县委。1935年2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塬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撤销中共陕北特委,成立中共西北工委。陕北特委所辖组织由西北工委直接领导。

中共陕北特别委员会下辖组织

中共绥德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赵通儒、白明善、周发源、马瑞生、霍维德、张肇繁、崔文运、王林武、李东升、李德山、李景林。

中共吴堡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薛尚英、王国昌(负责人)、丁茂义、樊士乐、慕生桂。

中共肤施(延安)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李馥华、武善养。

中共米脂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景仰山、吴伯樵、窦增荣、白明善、常立德、高仰云(代理)、毕维舟。

中共府谷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严念祖、景仰山、鲁学曾、赵希贤。

中共榆林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李文芳、胡颖民、石作琦。

中共清涧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师应三、赵通儒、李卓然、杜绍林、刘耀

三、刘玉春、高长直。

中共安定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冯文江、马文瑞、李子厚、刘光显。

中共神木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贾怀光、张晨钟。

中共佳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高钧耀、高长久、任子恩。

中共横山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白如冰、吴志祥。

中共米东县委员会,书记郭文华。

中共米佳镇中心县委员会,书记马明方。

中共绥清县委员会,书记崔文运。

中共赤源县委员会,书记魏怀礼。

中共延川县委员会,书记曹必明。

6. 中共安康特别委员会

1932年5月初,李茂堂(李自靖)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在安康县城内建立了中共安康特别委员会,李茂堂任书记,陈子敬(陈靖波)任组织委员,共有党员12名,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12月,李茂堂被捕,经营救出狱后,被国民党当局“驱逐”出安康。翌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撤销安康特委,安康党的组织归中共陕南特委领导。

7. 中共渭北特别委员会

1932年10月中共渭北特别委员会成立,机关设在三原武字区,辖三原、蒲城、耀县3个县委和富平刘家卓区委,共有党员150名。在渭北特委领导下,创建了红军游击队和渭北根据地。同年11月,特委领导举行庆祝俄国十月革命节大游行,遭国民党军警镇压,特委被冲散。12月,特委进行两次改组后,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撤销中共渭北特委,成立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高维翰(李杰夫,后叛变)、李冲霄(王孝先)、金理科(李逵)先后担任特委书记。

中共渭北特别委员会下辖组织

中共三原县委员会,书记金理科。

中共蒲城县委员会,书记李冲霄。

中共耀县委员会,书记张仲良。

8. 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

1931年至1932年,刘志丹、谢子长等经过艰苦奋斗,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进行游击战争,开辟了陕甘边根据地。1932年12月,在陕甘游击队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翌年3月8日在耀县照金

兔儿梁成立了中共陕甘边特别委员会,书记金理科(后秦武山),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机关驻耀县照金薛家寨,下辖旬邑、耀县两个县委。7月,杜衡叛变,省委遭到破坏,特委与上级领导机关失去了联系,处于独立活动状态。10月,国民党对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发动“围剿”,薛家寨失守,陕甘边特委转移至甘肃华池南梁堡一带。1933年11月初,陕甘边特委与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建立一、二、三路游击指挥部,开辟安定、南梁、照金三个游击区,重建陕甘边苏区。会后,特委书记秦武山赴西安寻找省委关系,其他委员分散在党、政、军组织中活动,红四十二师党委代行陕甘边特委职权。1934年春,陕甘边特委由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直接领导,下辖陕甘边南区区委、耀县县委、赤淳工委等组织。5月,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重新健全了陕甘边特委,书记张秀山(后惠子俊、李生华、李景林)。同时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后刘景范)。在陕甘边特委领导下,陕甘边地区武装斗争蓬勃发展,游击队、正规红军、革命政权相继扩大,先后形成以照金和南梁为中心纵横三四百里的陕甘边苏区。1935年2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塬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陕甘边特委归其领导。4月,国民党军队向南梁地区大举进犯,陕甘边特委转移至陕西安塞桥府峪、王家湾、甘泉下寺湾等地。此间,特委辖陕甘边南区委员会、东区特派员和肤甘、安塞、韩城等县委。9月,西北工委撤销,成立陕甘晋省委,陕甘边特委归其领导。特委下辖南区区委、东区特派员和安塞、肤施、赤安、富县、韩城等县(工)委以及甘肃的华池战区区委。在陕北错误肃反中,陕甘边区特委大批干部被捕,有的被杀害。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省委、中共陕北省委(以甘泉下寺湾为界,以北为陕北省委,以南为陕甘省委),并设立神府、关中、三边三个特委,陕甘边特委随之撤销。

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 1934年5月,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健全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同时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刘景范先后任军委主席。1935年11月,中共中央重新调整了西北苏区的行政区划和党的组织机构,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撤销。

中共陕甘边特别委员会下辖组织

中共旬邑县委员会,书记焦思洲。

中共耀县委员会,1934年8月前为特委直辖,9月改为南区区委领导。书

记张邦英,负责人张仲良、宋子岐。

中共赤淳工作委员会,书记先后为金理科、郭洪超。

中共陕甘边南区委员会,1934年春,陕甘边区第三路游击指挥部在陕西的富县、中部(今黄陵)、宜君、耀县、旬邑、淳化和甘肃正宁、宁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区。为加强党对该地区工作的领导,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于1934年9月在中部小石崖成立了中共陕甘边区南区委员会,书记先后为张邦英、唐洪澄、鲁学曾。下辖中共耀县县委(书记宋子岐)、淳耀县委(书记郭存信、郭廷藩)、永红县委(书记赵宏钧)、赤水县委(书记周志宏)和甘肃的新正县委及富县、中部等县的党组织。同时,南区区委机关由中部县高窑子迁往甘肃正宁三嘉原的南邑村一带。1935年冬,南区区委撤销,在原区委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关中特委。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驻东地区特派员,1935年春,陕甘边区特委派马文瑞去甘泉、宜川等县开辟工作,建立了红泉县委(书记苏保全)、宜川县委(书记薛正常)。马文瑞以陕甘边区特委驻东地区特派员的身份直接领导红泉县委和宜川县委。10月,在陕北错误肃反中马文瑞被捕,两县委工作由陕甘边区特委直接领导。

中共肤甘县委员会,书记任文明。

中共安塞县工作委员会,书记郭东升。

中共韩城县委员会,书记姚权。

中共肤施县委员会,书记马承德。

中共赤安县委员会,书记任秀民。

中共富县工作委员会,书记李继德。

9. 中共西路临时特别委员会

1933年7月上旬,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在千阳城内建立了中共西路临时特别委员会,书记李特生。特委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辖咸阳、兴平、武功、扶风、礼泉、岐山、凤翔、宝鸡、千阳、陇县等县的党组织。8月,由于叛徒出卖,李特生等人被迫离开千阳,特委随之停止活动。

10. 中共大(荔)朝(邑)澄(城)三县工作委员会

1933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遭破坏后,省委机关干部樊振恒被派到东府地区开展工作。当时,澄城、大荔、朝邑三县党员迫切要求改变无上级领导的状态,成立一个统一组织,领导三县革命斗争。同年10月,樊振恒主持在澄城

醜醜镇召开三县党的骨干分子会议,决定成立大、朝、澄三县工作委员会,负责大荔、朝邑、澄城三县党的工作,总负责人为樊振恒。1934年2月,国民党当局在东府进行大搜捕,樊振恒被迫转移陕北,工委停止活动。

11. 中共渭北工作委员会

1935年初,在高陵县岳华村复兴小学建立了中共渭北工作委员会,书记周芝轩。工委起初无上级领导,与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取得联系后与中共关中特区委员会接上关系,隶属关中特委。1936年12月,渭北工委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先后下辖三原、蒲城、临潼、富平等县的四个支部和一个特支。1937年3月,陕西省委决定撤销渭北工委,恢复渭北各县县委。

12. 中共关中特区委员会

中共中央长征到达西北苏区后,于1935年11月,决定设立关中特区,成立中共关中特区委员会。1936年1月,贾拓夫等人到达关中,在原中共陕甘边南区区委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共关中特委,贾拓夫任书记,隶属中共陕甘省委领导。特委机关驻新正县(今甘肃正宁县)三嘉原南邑村,下辖淳耀、赤水(今旬邑)、永红和甘肃的新正、新宁等五个县委。同年春,国民党东北军大举进犯关中特区,贾拓夫、江华(黄春圃)等党政军领导干部率大部分武装转移到瓦窑堡,关中特委撤销。汪锋、习仲勋、张凤岐等人留在关中坚持游击战争。不久,习仲勋调环县工作,汪锋和张凤岐等人在旬邑花家洞建立了中共关中临时特委,书记汪锋,领导当地武装斗争。1936年5月,中共陕甘省委撤销,关中临时特委划归中共陕北省委领导。9月,中共中央派习仲勋、郭炳坤、张策等人回关中工作,逐步恢复苏区,正式成立了中共关中特区委员会,习仲勋任书记。同年12月,关中特委划归新建立的中共陕甘省委领导,特委机关迁驻淳耀县桃渠河。1937年4月,中共陕甘省委再次撤销,关中特委划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9月划归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1937年10月,中共关中特委主持召开党代表大会,决定将关中特委改为关中分委,并选举成立了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

中共关中特区委员会先后下辖陕西地区组织

中共淳耀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郭廷藩、郭进亭、李月清、张策、张凤岐。

中共赤水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郭存信、周志宏、牛汉山、陈学鼎。

中共永红县委员会,书记赵宏钧。

淳化县红军募补处,主任先后为薛和昉、田润芝。

旬邑县红军募补处,主任薛和昉。

13.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

1927年7月,中共三原县委成立,书记先后为张性初、金理科。1932年12月,省委决定撤销渭北特委,将三原县委改为中心县委,辖耀县、富平两个县委和三原、高陵、白水等六个区委。刘林生、刘映胜、赵伯平先后任书记,汪锋、赵伯平先后任副书记。1933年8月,中心县委遭到破坏。1937年3月,陕西省委重建了三原县委。4月,三原县委改为中心县委,机关设在武字区。周芝轩、黄子祥为正副书记,下辖高陵、临潼、交口、富平及三原武字、西阳区委。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员会下辖组织

中共富平县委员会,书记郑柱。

中共耀县委员会,书记张邦英。

14. 中共韩城中心县委员会

1928年4月韩城县委成立,书记先后为孙玉如、薛子芳(代理)、樊德音、薛和昉(代理)、薛亚杰(代理)、孙昶。1932年10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将韩城县委改为中心县委,机关设在韩城清水村小学。中心县委下辖澄城、合阳、韩城等县的两个区委、46个支部、230多名党员。1933年初,由于形势恶化,中心县委主要领导成员相继离韩,县委处于涣散状态。4月,中心县委奉命撤销,恢复中共韩城县委。书记先后为薛和昉、薛亚杰(代理)。

15. 中共澄城中心县委员会

1933年2月,中共澄城县委成立,书记张鼎安。1933年5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将澄城县委改为中心县委,书记张鼎安,机关设在王庄镇。中心县委领导大荔、合阳、澄城三县党的工作,辖两个区委、16个支部,有党、团员97人。同年9月,县委负责人张鼎安及常委雷振东被捕,中心县委停止活动。

16. 中共陇东军特别委员会

1932年10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做出《关于组织革命兵变开展甘肃陇东游击战争的决议》,要求把兵变与游击战争结合起来,武装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创建新苏区。为统一指挥陇东陇南国民党部队内的党组织,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建立中共陇东军特委,书记刘杰三。

17. 中共甘(肃)宁(夏)青(海)特别委员会

1932年11月,中共陕西省委派吴鸿宾、王建三到兰州,向孙作宾、常黎夫、马豫章、李慕愚等传达陕西省委决定建立甘(肃)宁(夏)青(海)特委的指

示。12月初,甘宁青特委在青海成立,书记吴鸿宾,军委书记孙作宾,秘书长常黎夫,组织部长马豫章,宣传部长李慕愚,张德生,梁干丞后来也参加特委领导工作。特委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领导武装斗争。特委先后领导了西北抗日义勇军和兰州水北门士兵暴动。1933年8月,甘宁青特委负责人梁干丞被捕,张德生、常黎夫等转移,特委解体。

18. 中共陕西省委直辖组织

中共绥德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冯文江、张肇勤。

中共佳县委员会,书记高光祖。

中共肤施(延安)县委员会,书记田伯荫。

中共米脂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刘春园、景仰山。

中共府谷县委员会,书记严念祖。

中共榆林县委员会,书记李文芳。

中共长安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陈嘉惠、张国藩、张鼎安。

中共渭南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萧明、王芾南、张蔚生、王积忠、李良。

中共三原县委员会^①,书记先后为张性初、金理科。

中共韩城县委员会^②,书记先后为孙玉如、薛子芳、樊德音、薛和昉(代理)、薛亚杰(代理)、孙昶。

中共澄城县委员会,书记张鼎安。

中共华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马文宪、王芾南、王松年。

中共蓝田县委员会,书记赵伯平。

中共五台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蒲克敏、王勉之、徐振化、苏士杰。

中共乾县(工作)委员会^③,书记先后为王玉栽、王敬之、张庚良。

中共岐山县(工作)委员会^④,书记先后为耿菊人、杨念一、周肇岐、李秉枢。

中共礼泉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秋步月、吴焕然。

① 1928年9月至1932年6月县委活动中断,1932年12月至1933年8月改为三原中心县委,1933年8月至1937年3月再次中断,1937年4月至7月又改为中心县委。

② 1928年4月至1930年7月为中共韩城临时县委,1930年7月至1932年1月活动中断,1932年10月至1933年3月改为中心县委,1935年8月至1937年4月,先后由陕甘边特委、陕甘省委、陕北省委、陕甘省委领导。

③ 1928年10月至1929年5月,1930年夏至1937年2月两度活动中断。

④ 1928年8月至1937年2月活动中断。

中共蒲城县(工作)委员会^①,书记先后为曹受祉、许尚志、李维屏、王勉之、许尚志(负责)、樊德音、李冲霄、曹春生、窦正芳。

中共富平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马文彦、冯异生、张祝山(负责人)。

中共兴平县委员会,书记陈云樵。

中共户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刘问津、刘安仁(负责人)、杨伸、杨森(负责人)、苏鸿儒(负责人)、宋裕光。

中共周至县委员会,书记陈云樵。

中共华阴县(临时)委员会,书记先后为冯光波、丁炳谋(负责人)。

中共旬邑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焦思洲、许国钧。

中共临潼县(工作)委员会^②,书记先后为刘均一、刘庚。

中共渭华县(工作)委员会^③,书记先后为赵应魁、刘玉堂。

中共耀县工作委员会,书记郗成斋。

中共宜君县工作委员会,书记杨建舟。

中共同官(今铜川城、郊区)县委员会,书记先后张如洲、贾武祥(负责人)。

中共洋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朱曼青、刘中甫。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在杨虎城部队中的组织

1. 国民革命军第十军中共特别委员会

1927年11月,第十军中共特委在皖北建立,书记先后为南汉宸、魏野畴、宋树勋。特委隶属河南省委,下辖十军军政干部学校的中共总支委员会(书记先后为南汉宸、王汉秋、吴岱峰)、十军第一师中共总支委员会(书记胡英初)、十军直属机关中共支部(书记陈云樵)。1928年4月,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在中共特委领导下举行阜阳暴动。暴动失败后,中共组织遭到破坏,党员人数由200多人减少到二三十人。

2.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四师中共军事委员会

1929年秋,第十四师中共军委在河南建立,书记杜理程,隶属中共中央。

① 1929年8月至1931年2月,1933年11月至1937年2月两度活动中断。

② 1935年8月至1937年3月中断活动。

③ 1934年2月至1937年2月中断活动。

军委下辖十四师南阳教导队中共军事委员会(书记赵华仁)、中共第一中队支部委员会(书记曾楚川)、中共第二中队支部委员会(书记孙永康)、第十七师中共兵变前敌委员会(书记孙永康)。

3.1931年后建立的中共组织

1931年中共在杨虎城部队建立的组织有:陕西省政府卫士营干训队中共支部(书记汪锋)、十七路军总部宪兵营中共营委员会(书记魏志坚),第十七师中共军事委员会(书记孙作宾)、第十七师随营军官训练班中共支部(书记吕剑人),陕西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中共营委员会(书记先后为李秉荣、李特生、习仲勋)、陕西警备师中共支部(书记阎维良)。上述组织隶属中共陕西省委或陕西省委军事委员会。

1932年建立的组织有:甘肃省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中的中共校官支部(书记李罕言)、中共士兵支部(书记石子健)、教导队中共支部(书记张东皎),警三旅二团中共团委员会(书记张东皎),十七师五十旅补充二团中共支部(书记贺修之)。

1933年建立的组织有:中共安康军事特别支部(书记梁布鲁、王辛德),陕西省政府警卫团中共军支部(书记雷展如)、士兵支部(负责人马学文),十七路军总部宪兵营中共支部(书记谢华),第十七师补充团中共支部(书记胡振家)。

1934年成立的组织有:陕西省政府警卫团中共士兵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崔廷儒),第三十八军军部中共支部(书记崔尽善),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第四期骑兵团中共支部(书记王志仁)、步兵训练班学生队中共支部(负责人李启明),第三十八军教导大队中共支部(书记李锐)。

1935年成立的组织有:十七路军总部宪兵营第三连中共支部(书记王力)。

1936年成立的组织有:十七路军总部宪兵营新兵训练排中共支部(书记刘子义),西安绥靖公署教导营中共营委员会(书记杨正人),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书记谢华),西安绥靖公署特务二团中共团委员会(书记王建基),十七路军总部特务营中共总支委员会(书记王力、韩学礼)。

此外还有一些担任重要职务的党员如张汉民(警三旅旅长)、许权中(独立旅长)、武勉之(四十二师旅长)、唐哲民(十七路军总部军械处处长)、阎揆要(特务二团团团长)、刘威诚(警一旅团长)、王泰吉(骑兵团团长)、宋文梅(特务营营

长)等,没有编入中共基层组织,由中共中央或中共陕西省委直接领导。

第三节 中共西北特别支部

1932年秋,中共上海中央局派谢华到西安,在杨虎城部宪兵营从事兵运工作。1933年秋,中共宪兵营支部建立,书记谢华(后金闽生负责)。1936年春,经中共中央批准,在中共宪兵营支部基础上,成立了中共西北特支,书记谢华,委员徐彬如、李木庵。在此期间,特支与陕西党组织不发生关系。西北特支以“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名义作掩护,建立并领导了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队部、西安妇女救国会、西安学生抗日救国会,以及西安近郊和长安的农民抗日救国会等进步团体。与此同时,中共西北特支还领导着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和机关设在徐州的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西安事变前夕,西北特支动员和组织群众,举行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大会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爱国请愿大游行。

1936年12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正式恢复,西北特支奉命撤销。

第四节 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及下辖陕西地区组织

一、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创建陕甘边、陕北苏区的过程中,互相联系,互相配合,互相支援。1934年秋,陕甘边、陕北两个苏区在各自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后,红色区域不断扩大。陕甘边苏区向东发展,陕北苏区向南推进,两块苏区仅百里之隔,且日趋靠近。此时国民党政府纠集陕甘宁晋四省军阀部队约五六万人,向陕甘边和陕北苏区发动第二次军事“围剿”。严峻的形势,迫切要求两个特委实现统一领导两支红军共同作战。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经过商议,并征得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往西北巡视工作的黄翰同意,拟建立统一的党组织。

1935年1月,陕甘边区特委派刘志丹、惠子俊等率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北上,到达陕北苏区的赤源县水晶沟。刘志丹专程去灯盏湾探望正在养伤的谢子长,两人就成立西北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机构,以及第二次反“围

剿”作战方针等问题进行磋商,达成共识。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塬(今子长县)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会议决定撤销陕北特委,原陕北特委领导的党组织直接隶属西北工委;保留陕甘边特委,在西北工委领导下管辖陕甘边区的党政军民组织。从此,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分别领导的两个苏区统一为由中共西北工委领导的西北革命根据地。西北工委由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领导。工委委员为惠子俊(书记,1935年2月至5月崔田夫代理书记)、崔田夫(后接任组织部长)、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马明方、郭洪涛(秘书长,组织部长)、张秀山(后任宣传部长)、高岗(宣传部长)。妇女部长白茜。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一说谢子长)。在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领导下,西北苏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六座县城,使陕甘边、陕北两个苏区连成一片。工委机关驻赤源县周家塬,后移驻柳渠、秀延东区七家里、延川县永坪镇。工委下辖陕甘边区特委、神府工委和府谷、神木、佳县、米东、米西、吴堡、绥德、清涧、赤源、秀延、子长^①、延川、延水、延长、延安等县委。1935年5月,孔原调离河北前,建立了中共中央北方局,西北工委由其领导。在此期间,原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驻西北代表朱理治、聂洪钧陆续到达西北苏区。他们的工作中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错误地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受到西北工委和刘志丹等多数同志的抵制。同年9月中旬,中共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西北苏区,朱理治、郭洪涛、程子华等三人组成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在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主持下,召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主要领导干部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改组西北军委,同时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

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塬(今属子长县)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刘志丹(一说谢子长)任西北军委主席,高岗任副主席,白坚任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朱子休任参谋长。同年9月,中共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

^① 为纪念西北红军创始人谢子长的历史功绩,1935年5月,中共西北工委决定将安定南部和安塞东部命名为子长县。

五军长征到达西北苏区,在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主持下,召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主要领导干部会议,决定改组西北军委,聂洪钧任主席。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1月3日中共中央在甘泉下寺湾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西北办事处,建立以毛泽东为主席,以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原西北军委自行解体。

三、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下辖陕西地区组织

1. 中共陕甘边特别委员会

书记先后为李生华、李景林。

2. 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席刘景范。

中共陕甘边特委下辖组织

中共陕甘边区南区委员会,书记先后为张邦英、唐洪澄。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驻东地区特派员,特派员马文瑞。东地区特派员下辖中共红泉县委员会,书记苏保全。

中共肤甘县委员会,书记任文明。

中共安塞县工作委员会,书记郭东升。

中共韩城县委员会,书记姚权。

3. 中共神(木)府(谷)工作委员会

神(木)府(谷)地区党组织从1933年开始进行武装斗争,创建了神府苏区。1935年5月,原陕北特委特派员(此时为西北工委特派员)王达成主持召开会议,决定改变特派员包揽一切的办法,在神木县委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神府工委,书记王达成。工委领导成员随红三团活动,机关驻地不定。工委下辖神木东、神木西、神木北和府谷四个县委。同年6月,陕北红三团在瓦窑渠战斗中失利,各县委相继解体。此时,工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暂时取消工委,主要领导人编入红军分散活动。8月,神府地区党政军领导在神木郑家塬召开会议,决定恢复神府工委,书记张晨钟。11月,中共中央派杨和亭任工委书记。下辖佳芦县委。1936年初,工委撤销,成立中共神府特区委员会。

中共神府工作委员会下辖组织

中共神木东县委员会,书记王恩惠。

中共神木西县委员会,书记乔钟灵。

中共神木北县委员会,书记刘北垣。

中共府谷县委员会,书记呼子文。

4. 中共西北工委直辖县委员会

中共府谷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赵希贤、呼子文。

中共神木县委员会,书记张晨钟。

中共佳县委员会,书记任子恩。

中共米东县委员会,书记郭文华。

中共米西县委员会,书记杨彩霖。

中共吴堡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慕生桂、刘玉春。

中共绥德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贺治国、鱼生池、耿如香、王学善。

中共清涧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高长直、高峰。

中共赤源县委员会,书记魏怀礼。

中共秀延县委员会,书记李子厚。

中共子长县委员会,书记朱怀旺。

中共延川县委员会,书记贺旭东。

中共延水县委员会,书记白玉华。

中共延长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白如冰、高朗亭。

中共延安县委员会,书记李向海。

第五节 中共陕甘晋省委及下辖组织

一、中共陕甘晋省委

1935年9月15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长征抵达延川县永坪镇。为了加强对西北苏区革命斗争的统一领导,根据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示,朱理治、聂洪钧和程子华组成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9月17日,西北代表团在永坪镇主持召开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委员为:朱理治(书记)、郭洪涛(副书记)、马明方、王达成(组织部长)、白茜(妇女部长)、刘志丹、高长久、聂洪钧、徐海东、郭述申(宣

传部长)、程子华、慕生忠(白区工作部长)、慕纯农、戴季英(1935年10月接任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秘书长李景波,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崔田民。同时撤销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改组西北军委,聂洪钧任主席;三支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陕甘晋省委隶属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驻延川县永坪镇,10月上旬迁驻瓦窑堡。省委下辖陕甘边区特委、神府工委、陕北一分区委,并直接领导赤源、秀延、子长、靖边、米西、延川、延长、延安等县委和瓦窑堡市委。在神府地区黄河东岸山西省兴县境内还领导着三个区委。这一时期,红十五军团组织了反国民党军队对西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取得了崂山、榆林桥战役的重大胜利。此间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主要负责人继续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错误地开展所谓反“右倾”的斗争,直到进行错误肃反,逮捕了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等一大批各级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错杀党政军干部200多人,使西北苏区陷入政治、军事危机。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制止了错误肃反。11月,中共中央调整了西北苏区的行政区划和党的组织机构,决定撤销中共陕甘晋省委,分别成立了中共陕北省委、陕甘省委、神府特委、三边特委和关中特委。

二、中共陕甘晋省委员会下辖组织

1. 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

在陕甘晋省委领导期间,陕甘边区特委机关驻甘泉下寺湾,下辖中共陕甘边区南区区委、东地区特派员和安塞、肤施、赤安、富县、韩城等县(工)委以及甘肃境内的华池战区党委。在陕北错误肃反中,陕甘边区特委首当其冲,大批干部被捕,有的被杀害,使党组织蒙受巨大损失。在此期间,陕甘边特委领导为书记李景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特委下辖中共陕甘边区南区委员会(书记鲁学曾,特委下辖淳耀县委,书记先后为郭存信、郭廷藩;永红县委,书记赵宏钧;赤水县委,书记周志宏)、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驻东地区特派员(特派员马文瑞,下辖红泉县委,书记苏保全;宜川县委,书记薛正常)及特委直辖的安塞(书记郭东升)、肤施(书记马承德)、赤安(书记任秀民)、富县(书记李继德)、韩城(书记姚权)等县委。

2. 中共神府工作委员会

1935年8月,神府地区党政军领导干部在神木县郑家砭召开会议,决定

恢复中共神府工委(书记张晨钟),红三团集中活动,恢复和发展神府苏区。工委随红三团活动,机关无固定驻地。特委下辖佳芦县委(书记王恩惠)。

3. 中共陕北第一分区委员会

1935年9月,陕甘晋省委在清涧县榆树腰设立陕北第一分区委员会(亦称中共绥清延分区委员会),书记白炳炘,机关驻清涧县榆树腰、店子沟等地。区委下辖佳县、吴堡、绥德、清涧、延水等五个县委。同年10月,中共中央到陕北后决定撤销陕甘晋省委,将西北苏区划分为陕甘、陕北两个省委,并设立神府、关中、三边三个特区。按照新的区划,区委撤销,所辖五个县委按其地域划归新的机构领导。

中共陕北第一分区委员会下辖组织

中共佳县委员会,书记任子恩。

中共吴堡县委员会,书记刘玉春。

中共绥德县委员会,书记王学善。

中共清涧县委员会,书记高峰。

中共延水县委员会,书记白玉华。

4. 中共陕甘晋省委直辖县委员会

中共赤源县委员会,书记魏怀礼。

中共秀延县委员会,书记李子厚(子长人)。

中共子长县委员会,书记朱怀旺。

中共瓦窑堡市委,书记崔田夫。

中共靖边县委员会,书记李子厚(靖边人)。

中共米西县委员会,书记杨彩霏。

中共延川县委员会,书记常德义。

中共共延长县委员会,书记高朗亭。

中共延安县委员会,书记李向海。

第六节 中共陕北省委及下辖组织

一、中共陕北省委员会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西北苏区。11月3日,中共

中央在甘泉下寺湾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撤销中共陕甘晋省委,将西北苏区划分为陕北、陕甘两个省(以下寺湾为界,以北为陕西省,以南为陕甘省),并设立神府、关中和三边特区。11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委在瓦窑堡市(今子长县)正式成立,常委为:郭洪涛(书记)、马明方(1936年冬接任书记)、李合邦、吴溉之、王涛、刘子义、马佩勋、周建屏。执委为李子厚、崔田夫、白向银、白凌云、惠子明、曹力如、王月明、张家修、慕生忠、薛兰斌、白炳炘。秘书长马文瑞,后为崔曙光。组织部长王达成,后为李合邦。宣传部长贾拓夫,后为郭滴人、李铁轮、吴溉之接任。白区工作部部长李铁轮,后为李景林、王达成、王涛接任。白军工作部部长马文瑞。军事部部长钟亦兵,后为周建屏。妇女部长白茜,后为史秀云。省委隶属中共西北中央局领导。1936年6月,红军主力进行西征,瓦窑堡受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陕西省委机关转移到安塞谭家营,翌年春迁至延安蟠龙镇。1936年5月,陕甘省大部分区域被国民党东北军侵占,中央决定撤销陕甘省委,将其所辖的关中特委和肤施、甘洛、红泉、宜川、富县、韩城、澄城等县委划归陕西省委管辖。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决定再次成立中共陕甘省委,上述组织除澄城县委外,复归陕甘省委管辖。1937年4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中央决定再次撤销陕甘省委,将其所辖的甘洛、富县和宜川县委划归陕西省委管辖。陕西省委先后下辖三边特委、神府特委、东地区特委、关中特委和延安市委,以及佳县、吴堡、米西、绥德、清涧、靖边、新城、瓦窑堡、赤源、横山、安定、秀延、子长、延川、延水、延长、安塞、赤安(志丹)、延安、甘洛、肤施、宜川(红宜)、富县、韩城、澄城等县(中心县)委。1937年5月,中共陕甘宁特区委员会成立,陕西省委归其领导。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陕甘宁特区委员会于1937年7月报请中央批准,撤销陕西省委,将陕西省划分为东分区和西分区,分别设立中共东分区委员会和西分区委员会。

二、中共陕西省委员会下辖组织

1. 中共三边特区委员会^①

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共三边特委,任命谢唯俊为书记兼三边剿匪总指挥。同时,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派刘景范、慕生桂、崔宗山、李玉英、杨琪等人前往三边开辟工作。不料,西靖边县苏维埃政府警卫连连长宗

^① 三边指陕西的定边、安边、靖边三地区。

文耀等人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将谢唯俊等十余名领导干部和游击队骨干杀害,使刚建立的三边特委遭到破坏。

2. 中共神府特区委员会

1935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检查讨论了神府工作之后,西北中央局写信给神府工委,决定派杨和亭任工委书记。1936年初,杨和亭、张汉武、张江全等人到达神府,在罗家湾召开神府工委扩大会议,宣布成立中共神府特委,书记先后为杨和亭、张秀山、唐洪澄,归中共西北中央局直接领导。特委先后下辖神木、府谷、佳芦县委和神城、赤绥、佳北、榆林工委等。3月,中央又派张秀山、刘明山、邓万祥等到神府,并通知特委划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1936年春,刘志丹率红二十八军东征路经神府地区,在红二十八军帮助下,神府苏区得到恢复和发展。1936年冬,国民党军队对神府苏区进行“围剿”,侵占了部分区域,所辖佳北工委和榆林工委先后撤销。1937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撤销后,神府特委改归陕甘宁特区党委领导。

中共神府特区委员会下辖组织

中共神木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贺子贵、刘海珠、刘长亮、王俊卿。

中共府谷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刘志清、杨孝先、李旺淮。

中共佳芦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王恩惠、刘长亮、刘济民、李旺昭、李子川。

中共神城工作委员会,书记先后为王道三、高步功。

中共赤绥工作委员会,书记黄忠。

中共佳北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成功。

中共榆林工作委员会,书记先后为张晨钟、刘子林、苏佐山。

3. 中共东地区特别委员会

1936年6月,红军主力西征时,国民党军队乘机侵占了陕西省东部和南部的清涧、绥德、延川等县部分地区。为抵御国民党政府军队的进攻,保卫陕西省中心区域的安全,配合西征部队开展游击战争,陕西省委决定成立中共东地区特委,书记先后为戴季英、白炳翠。特委先后下辖绥清中心县委、吴堡中心县委和佳县、吴堡、绥德、延川、延长、宜川、红泉等县委。1937年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国民党军队陆续从陕西省东部地区撤离,苏区全部恢复,东地区特委撤销,所辖各县委由陕西省委直辖。

中共东地区特别委员会下辖组织

中共绥德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李万春、李向海。

中共绥清中心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刘玉春、刘英勇、李万春、黄光声、张家修。

中共佳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任子恩、郭文华。

中共吴堡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李向良、马树春。

中共吴堡中心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慕生忠、罗文、李向良。

中共延川县委员会,书记常德义。

中共延长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任自新、薛占才。

中共宜川县委员会,书记赵建基。

中共红泉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黄光声、白玉清。

4. 中共关中特区委员会

1936年5月,中央决定撤销中共陕甘省委,将其所辖的关中临时特委(书记汪锋)划归中共陕北省委领导。1936年12月,关中特委划归新成立的陕甘省委领导。

中共关中特区委员会下辖组织

中共淳耀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郭进亭、李清月。

中共赤水县委员会,书记郭存信。

中共永红县委员会,书记赵宏钧。

5. 中共陕西省委员会直辖组织

中共佳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任子恩、张鹏图。

中共吴堡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刘玉春、郭文华、慕生忠、李向良、郭文华。

中共米西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杨彩耀、惠子俊、白文生、蔡淑德。

中共绥德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王学善、李万春、黄志诚。

中共清涧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高峰、白凤章、张家修、王月明。

中共靖边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白耀明、郭步世、马成德、陈致中。

中共新城县委员会,书记白凤章。

中共瓦窑堡市委员会,书记崔田夫。

中共赤源县委员会,书记魏怀礼。

中共横山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高腾霞、魏怀礼、高述贤。

中共安定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李合邦、杨成森。

中共秀延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李子厚(子长人)、杨成森、康润民。

中共子长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贺秉章、曹九德。

中共延川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常德义、郝玉堂。

中共延长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高朗亭、任自新、薛占才、王春华。

中共延水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白玉华、白清江。

中共安塞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徐锡麟、李子厚(子长人)、林昆山。

中共赤安(志丹)^①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任秀民、龚逢春、苏耀亮、高峰、曹力如。

中共延安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李向海、崔曙光、贺秉章。

中共延安市委员会,书记先后为白耀明、王德明、高述先。

中共甘洛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王生海、惠中权。

中共肤施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李向海、王金璋。

中共宜川(红宜)县委员会,书记赵建基。

中共富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韩明奎、霍士廉。

中共韩城县委员会,书记王筠,苏史青(负责人)。

中共澄城县委员会,书记张鼎安。

第七节 中共陕甘省委及下辖陕西地区组织

一、中共陕甘省委员会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11月,中共中央对西北根据地的行政区划和党的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撤销了中共陕甘晋省委,将西北根据地分设为陕西省、陕甘省和神府特区、三边特区、关中特区。11月上旬,中共陕甘省委在甘泉县下寺湾成立,书记朱理治,副书记李富春,秘书长曹力如,组织部部长先后为李富春、欧阳钦,宣传部部长先后为李景林、李一氓,白区工作部部长张策,军事部部长萧劲光,省委妇女部部长蔡畅。省委隶属中共西北中央局。先后下辖关中特委、陕东特委,并直辖甘洛、肤施、红泉、宜川、韩城、澄城、富县、中宜、华池等县(工)委。1935年底,机关由下寺湾迁到富县套洞镇(今道德村)。1936年春,国民党东北军乘红军主力东征之机,进攻西北苏区,占领了关中特区和中宜、富县、甘泉的大部分

^① 1936年5月,为纪念刘志丹的功绩,中共陕北省委决定将赤安县改名为志丹县。

地区,陕甘省委转移到靖边县吴旗镇刘家渠村。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36年5月撤销了陕甘省委,将其所辖组织除华池县委划归陕甘宁省委管辖外,其余划归陕北省委领导。

陕甘省委撤销后,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在甘泉、富县、中宜一带设立中共陕甘工委(也称洛河川工委),欧阳钦任书记,军事部部长曹力如,财政部部长高秀山,粮食部部长郭子青,教育部部长李子钦,保卫局局长金道松。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不详。1936年冬,陕甘工委撤销。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为了配合东北军、西北军抵御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军事进攻,中共中央决定红军主力南下渭北一带集结待命。同时决定再次成立中共陕甘省委,书记李维汉,秘书长申力生,组织部部长张邦英,宣传部部长李华生,统战部部长杨一木,军事部部长刘景范,妇女部部长先后为刘锦如、白国英。省委隶属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先后驻甘泉县高家哨、中部县(今黄陵)店头镇。陕甘省委成立后,中央决定把前陕甘省撤销时划归陕北省委领导的关中特委和甘洛、肤施、红泉、宜川、富县、韩城等县委,以及陕甘工委领导的红宜(宜君)县委划归陕甘省委领导。193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陕甘省委,其所辖党组织分别划归中共陕西省委和陕北省委领导。

二、中共陕甘省委员会下辖陕西地区组织

1. 中共关中特区委员会

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关中特区,成立中共关中特委。1936年1月,在陕甘边南区区委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共关中特委,书记贾拓夫。隶属陕甘省委领导。特委驻地新正县(今正宁县)三嘉原南邑村。特委下辖淳耀、赤水、永红和甘肃境内的新正、新宁等五个县委。

1936年春,国民党东北军大举进犯,根据中央指示,贾拓夫、江华等率大部分红军转移到瓦窑堡,关中特委撤销。汪锋、习仲勋、张凤岐等人留在关中坚持游击战争。不久汪锋、张凤岐等人在旬邑花家洞建立了关中临时特委,领导当地武装斗争和恢复党组织工作。1936年5月,临时特委划归陕北省委领导,12月复归陕甘省委管辖。特委书记习仲勋,机关驻淳耀县桃渠河,先后下辖淳耀、赤水、永红和甘肃之新正、新宁五个县委。1937年4月,陕甘省委撤销,特委划归陕西省委领导。

中共关中特委下辖组织

中共淳耀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郭廷藩、郭进亭。

中共赤水县委员会,书记周志宏。

中共永红县委员会,书记赵宏钧。

2. 中共陕东特别委员会^①

1936年2月,为牵制西北苏区南线之国民党军队,配合红军主力东征,中共陕甘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陕东特委,书记先后为郭子青、李景林。陕东特委率领陕东抗日游击支队在黄龙山一带活动,无固定机关。1936年5月,陕东特委奉命撤销。

3. 中共陕甘省委直辖县委员会

中共甘洛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王生海、惠中权。

中共肤施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马承德、李向海、刘秉温。

中共红泉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苏保全、白玉清。

中共宜川(红宜)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薛正常、赵建基。

中共韩城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姚权、王筠(代理)、苏史青。

中共澄城县委员会,书记张鼎安。

中共富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郭子青、韩明奎。

中共中宜县委员会,书记刘恩善。

中共红宜(宜君)县委员会,书记王清廉。

第八节 中共陕甘宁省委及下辖陕西地区组织

一、中共陕甘宁省委员会

1936年5月,中共中央为配合红军西征,巩固和发展西北苏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决定成立中共陕甘宁省委,李富春、刘景范先后任书记。其他常委为:罗梓铭(组织部长)、萧劲光(军事部长)、李一氓(宣传部长)、蔡畅(白区工作部长,1936.12—1937.3任组织部长)、朱开铨、郑自兴、李景膺(1937.4—1937.9任组织部长)、李华生(1937.4—1937.9任宣传部长)、王世泰(1937.6—1937.9任军事部长)、李握如、马锡五、雷德茂。执委为李光业、旷坚、黎林、秦力生(统战部长)、张明科、李国斌、惠庆祺、朱协辉、刘昌汉、任质斌、白国英

^① 一说为中共韩澄特委。

(1937.4—1937.9任妇女部长)。秘书长先后为左觉民、赵一民。1937年3月—1937年4月陈时夫接任组织部长,1937年6月—1937年2月赖传珠接任军事部长,1936年5月—1937年3月李光蓉接任妇女部长。西征部队于5月下旬至6月上旬相继出发,至7月底攻占甘肃东部的曲子镇、环县、镇原洪德城和陕西西北部直到宁夏的盐池、豫旺、豫海、固原、灵武、金积、同心城等地,开辟了纵横400余里的新苏区。中共陕甘宁省委派出大批干部进入新区,发动组织群众支援红军,建立健全党组织和革命政权,使新区得到巩固。陕甘宁省委隶属中共西北中央局。先后下辖中共三边特委和陕西境内的定边、安边、赤安,甘肃境内的华池、赤庆、环县、曲子、合水、庆阳、定环、镇原、驿马关,宁夏境内的盐池、豫旺、豫海、固北、固原等县(工)委。1937年5月,陕甘宁省委改属中共陕甘宁特区委员会领导。9月,陕甘宁省委撤销,成立了中共庆环分区委员会。

二、中共陕甘宁省委员会下辖陕西地区组织

1. 中共三边特区委员会

1936年6月,红军主力在西征中相继解放了定边、盐池等重要城镇后,中共中央和陕甘宁省委派毛泽民、贾拓夫、王齐华、邓振晌、揭俊勋、秦力生、白茜、张玉英、曹建勋、张德生等人组成中央巡视团,到三边一带建党建政,开展群众工作和经济工作。同年9月,红军准备攻打银川,中央决定建立中共定边工作委员会,李维汉任书记。后因军事计划改变,定边工委撤销。1936年10月,中央和陕甘宁省委决定再次建立中共三边特委,张德生、贾拓夫、李维汉(代理)、罗梓铭先后任书记。特委机关先后驻宁夏盐池县城和陕西定边县城。特委下辖安边、定边、盐池县委和绥远省的鄂托克工委。1937年5月,陕甘宁省委决定撤销三边特委,成立定边中心县委。

中共三边特委下辖陕西地区组织

中共定边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刘悠安、王聚德。

中共安边县委员会,书记朱协辉。

2. 中共定边中心县委员会

1937年5月,中共陕甘宁省委决定撤销三边特委,成立中共定边中心县委,下辖安边县委、定边县各区委和宁夏境内的盐池县委、绥远境内的鄂托克工委。同年10月,定边中心县委撤销,建立了中共三边分委。

3. 中共陕甘宁省委直辖县委员会

中共定边县委员会,书记刘悠安。

中共安边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慕纯农、朱协辉。

中共赤安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朱协辉、高伯祥、贺恩宽、刘景瑞。

第九节 中共川陕省委及下辖陕西地区组织

一、中共川陕省委员会

1932年1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总部率两万余人,转战到陕南城固县境内。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中共陕南特委立即派人前往接应。红四方面军在取得升仙村、许家庙战斗胜利后,在西乡县钟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制定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方针。不久,红四方面军分兵两路入川。1933年2月7日,中共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四川通江县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由37名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的川陕省委员会,书记先后为袁克服、周光坦,组织部长先后为余洪远、谢富治,宣传部长刘瑞龙,妇女部长先后为姚明善、张琴秋,秘书长吴永康。省委机关先后驻通江、巴中县城。1933年五六月间,红四方面军一部进入镇巴、西乡、南郑开辟苏区,建立了基层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1934年初成立了中共陕南县委。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发起陕南战役,攻克了宁强、勉县两座县城以及宁强、南郑的一些重要村镇,相继成立了中共宁强、阳平两个县委和宁强、阳平、南郑、勉县四个县苏维埃政府。从1933年到1935年春,川陕根据地陕南苏区先后建立过六支县级游击队和六个县级群众团体。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进行长征,省委机关消失。陕南苏区各级党、政组织和游击队奉命组成工作队或编成独立团随军入川,参加了长征。留下少量党、团员、干部和游击队在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和中共陕南特委的领导下,由公开斗争转入秘密斗争,坚持在大巴山区与国民党继续进行斗争。省委下辖中共巴中特别市委、巴中道委、绥定道委及四川、陕西境内的20多个县委。

二、中共川陕省委员会下辖的中共陕南地区组织

中共陕南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马金芳、潘天成。

中共宁强县委员会,书记先后为冯凯、袁鸿化。

中共阳平县委员会,书记冯凯。

第十节 中共鄂豫陕省委及下辖陕西地区组织

一、中共鄂豫陕省委员会

1934年12月8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进入陕南。12月10日,鄂豫皖省委在今丹凤县庾家河召开第十八次全委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决定改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会议期间,由于国民党军队尾追而至,与会人员均投入战斗,鄂豫陕省委领导成员未能选定,由原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常委吴焕先代行职权。1935年4月中旬,中共鄂豫陕省委在蓝田县葛牌镇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总结创建鄂豫陕苏区四个月来的工作,选举产生了省委领导成员,书记徐宝珊,副书记吴焕先。委员为李隆贵(常委)、赵凌波(常委)、张明先(常委)、田宋尧(常委)、戴季英、陈先瑞、张希才、郑位三(增补)、郭述申(增补)。5月9日徐宝珊病逝后,吴焕先代理省委书记。8月21日,吴焕先在甘肃泾川战斗中牺牲,省委决定由程子华代理书记。鄂豫皖省委原属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领导。1932年10月,鄂豫皖分局机关率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鄂豫皖省委与上级联系中断。中共鄂豫陕省委建立后,独立领导该地区的武装斗争和苏区建设。省委成员随部队指挥作战,机关无固定地点。同年7月中旬,省委接到上海中央局文件,证实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北会师,并准备北上的消息后,即于7月15日在长安沔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迅速西进,配合中央红军创建西北新苏区。月底,省委随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陕根据地,向西北苏区进发。鄂豫陕省委先后下辖中共商洛特委、鄂陕特委、豫陕特委等。1935年9月15日,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到达西北苏区延川县永坪镇,与中共西北工委及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17日,在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主持下,召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主要领导干部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同时撤销鄂豫陕省委和西北工委。

二、中共鄂豫陕省委员会下辖陕西地区组织

1. 中共商洛特别委员会

1934年12月,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派手枪团政委宋兴国等人,在洛南县东原村成立了中共商洛特委,书记宋兴国。中共商洛特委主要活动

区域在今洛南、丹凤两县的边界地区,机关无固定驻地。1935年2月,商洛特委遭国民党军队突然袭击,损失严重,同年4月奉命撤销。

2. 中共鄂陕特别委员会

1935年2月,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湖北郧西县二天门建立了中共鄂陕特别委员会,书记先后为郭述申、戴季英、郑位三。先后下辖镇安县委和五星县委。主要活动在镇安、山阳、柞水、旬阳、宁陕和湖北郧西等县边界地区。特委机关先后驻湖北郧西二天门和陕西镇安县店垭子。1935年9月,鄂陕特委与豫陕特委合并,组成中共鄂豫陕特委。

中共鄂陕特委下辖陕西地区组织

中共五星县委,书记李志英。

中共镇安县委,书记白明峻。

3. 中共豫陕特别委员会

1935年5月,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洛南县庾家河(今属丹凤县)成立了中共豫陕特委,书记先后为郑位三、李隆贵。特委主要活动在今陕西洛南、商南、丹凤、商县以及河南的卢氏等县边界地区,机关无固定地点。特委下辖刘家花屋等支部。1935年9月,豫陕特委与鄂陕特委合并,成立了中共鄂豫陕特委。

三、中共鄂豫陕特别委员会

1935年7月,中共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北上陕北后,鄂豫陕苏区形势异常险恶。鄂豫陕省委离开时,省委书记吴焕先曾指示鄂陕、豫陕两特委合并建立一个新特委,继续坚持战斗。但信件落入敌手,致使省委与两特委及两特委之间联系中断。8月,鄂陕、豫陕两特委分别从报纸上得悉省委与红二十五军已到陇东,为了防止被国民党军队各个击破,两特委便互相寻找,向一块靠拢。1935年9月9日,鄂陕、豫陕两特委在商南县梁家坟会合,并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合并两特委,成立中共鄂豫陕特委(亦称陕南特委),书记郑位三,委员为陈先瑞(常委)、李隆贵(常委)、方升普(常委)、曾焜、李书全、袁崇安、张培真、郑连顺、李学先;合并鄂陕游击总部与豫陕游击师,组成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鄂豫陕特委建立后独立领导鄂豫陕苏区的武装斗争。1936年3月,特委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12月20日,中共中央派李涛等从陕北到陕南,成立了陕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李涛,副主席郑位三,统一指挥陕南武装斗争。特委下辖宁佛工委。1937年8月,鄂豫陕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

示,率红七十四师开赴三原,编入八路军一一五师序列,特委随之撤销。

四、中共鄂豫陕特别委员会下辖组织

中共宁佛工作委员会

1935年12月中旬,中共鄂豫陕特委率红七十四师经湖北郧西二天门一带进驻陕西南陕、佛坪两县交界的四亩地。在此鄂豫陕特委指示罗明义等带一个连开展地方工作,旋即组建了中共宁佛工作委员会,书记先后为罗明义、刘鉴挺、曾焜。宁佛工委成立后,在宁陕、佛坪两县边界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因红七十四师调防,工委奉命撤销。

第十一节 中共陕甘宁边(特)区委员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政府于1937年2月9日设立了西安行营,并下令停止对陕甘宁苏区的军事行动,使国内和平初步得以实现。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其中一条保证是把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导。国民党三中全会接受了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共中央即着手把苏区变为特区。1937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陕甘宁特区党委,郭洪涛任书记。同年5月15日,中共陕甘宁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城内召开。会上,毛泽东对边区党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要求转变与创立特区为抗日民主政治的模范区域,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政治与军事的模范区域,实现民主共和制的模范区域。大会选举产生了高岗、林伯渠、吴亮平、马明方、李富春、周兴、李坚真、郭洪涛、王达成、习仲勋、白治民、刘长胜、崔田民、张秀山、刘景范、崔田夫、李维汉等17名执委和罗梓铭、蔡畅、马锡五、王世泰、张邦英、马佩勋等六名候补执委组成的中共陕甘宁特区第一届委员会,5月17日,在第一次全体执委会上,推选了特区党委主要领导人,郭洪涛任书记,随后,边(特)区党委设立了工作机构,秘书长高克林,组织部部长王达成,宣传部部长吴亮平,统战部部长王涛。机关驻延安市衙门西坡。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合作协议,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中共陕甘宁特区委员会也随之改称为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边(特)区党委先后下辖陕北东分区委、陕北西分区委、关中分(特)委、三边分(特)委、

绥德特委、洛川特(工)委和直属的十个县(市)委,以及甘肃境内的庆环分委、陇东分委等组织。

第二章 共青团陕西地区组织及进步团体

土地革命初期,陕西共青团组织有较大的发展。1933年后由于国民党统治区陕西党团组织连续遭到破坏,1934年3月,西安中心市委(代行省委职权)决定不再单独恢复和建立团组织,青年学生工作直接由中心市委领导。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青年学生的团结、教育工作由新建立的西安学生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负责。西北苏区青年团组织1935年11月改为少共组织,在少共中央局指导下开展工作。1936年11月,中共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改造共青团及其组织形式,吸收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救国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共青团中央即建立了西北青年救国会筹备会。与此同时,西北苏区团组织也自下而上进行团员转党,建立青救会的工作。到1937年初,苏区各县少共组织改造结束。

第一节 共青团陕西省委员会

1927年7月7日,共青团陕西省委员会在原共青团陕甘区委的基础上正式成立,由张慕陶等11名正式委员和五名候补委员组成,书记张慕陶。此时,团省委所辖的团组织有西安市委(省委兼)和五一、长安、三原、华县、渭南、肤施等县委,以及其他21个县的区委与特支,共有团员1924名(不含甘肃)。1927年10月初,团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将团的工作转向农村,并正式选举产生了共青团陕西省委员会,由张慕陶等七名正式委员和罗承运等四名候补委员组成,张慕陶仍为书记。同年11月,团省委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根据团中央指示,增补了四名委员,下设组织、宣传、军事、学生、农工、秘书六个部,作为工作机构。1928年4月,全省团员发展到3678名。1929年1月,团省委在蒲城荆尧小学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选举马云藩为书记。会议结束后,马云藩等被捕叛变,陕西党、团省委大部分委员被捕。3月1日,幸未

被捕的党、团省委委员在渭南陈家滩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团的临时省委,薛永寿任书记。1930年7月,团省委在蓝田草坪小学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决定恢复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仍为薛永寿。同年10月,薛永寿被捕,团省委再次遭到破坏。此后几个月,团的工作由中共陕西省委代管。1931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重建团省委,由刘映胜任书记。同年5月,根据团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团省委改为西安市委,书记陈浅伦(后刘映胜接任)。8月,团西安市委改为团省委。年底,团中央派袁岳栋担任团省委书记。1933年3月后,由李盛弟、刘宗沛先后任书记。1933年7月,袁岳栋、杜衡被捕叛变,党、团省委及各级组织遭到严重破坏。8月,在成立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的同时,成立了共青团陕西临时省委,雷振东任书记。9月19日,党、团临时省委又一次遭到破坏,团省委三名委员全部被捕。10月,团中央派韩学亚来陕西恢复组织,于11月19日在渭南背坡村成立了陕西党、团共同恢复工作委员会,韩学亚任书记。翌年2月,工委停止活动。1934年3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改为中共西安中心市委。中心市委决定不再单独恢复和建立团组织,由党直接领导青年学生运动。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西安学生救国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进步青年团体相继建立,团结教育青年的任务,便由这些进步青年团体担负起来。团省委先后下辖团西安市委、陕北特委(团陕北特委下辖团绥德、米脂、府谷、榆林、清涧、定边、安定、延安县委)、渭北特委、陕南特委(团陕南特委下辖团城固、洋县、南郑县委)、红二十六军团委、陕甘边特委、三原中心县委、长安、渭南、肤施、五一、华县、礼泉、岐山、户县、乾县、蒲城、韩城等团县委员会。

第二节 共青团陕西地区组织

1. 共青团西安市委委员会

1927年7月,中共西安市委建立。1929年2月,团市委遭到破坏后,由临时团省委兼管西安团的工作。1930年8月,团市委重新组建,10月,团市委书记贾拓夫被捕,团市委工作停顿。1931年5月,团省委改组为团西安市委。1932年8月,团省委正式恢复后,重新组建了团西安市委。1933年9月下旬,团市委遭国民党当局破坏。10月,团市委重建。11月,又遭破坏。此后,团市委再未恢复起来。书记先后为曹趾仁(兼)、马云藩、贾拓夫、陈浅伦、刘映

胜、李云波、朱循(负责人)、胡明伦、郑福平等。

2. 共青团陕北特别委员会

1927年11月28日,共青团陕北特委在榆林成立,书记焦维炽(后贾拓夫、张文华、常黎夫先后接任或代理书记)。团特委隶属共青团陕西省委领导。1930年10月,陕北党、团组织划归中央北方局领导。在李立三“左”倾路线指导下,陕北党、团特委合并为陕北行动委员会,团特委被取消。同年12月,团特委恢复,划归共青团河北省委领导。1933年3月,共青团陕北特委改由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直接领导。4月,改为团陕北工作委员会,常黎夫、鲁学曾、马文瑞、明日、李铁轮先后任书记。团特委先后下辖绥德、米脂、府谷、榆林、安定、清涧、神木、吴堡、米东、赤源、安定、佳县等团县委和区委。1935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撤销后,共青团陕北工委在中共西北工委直接领导下,负责指导西北苏区青年的工作。团工委下辖团陕甘边区特委、团神府特派员和佳县、吴堡、米东、绥德、清涧、赤源、秀延、子长、延川、延水、延长、延安等12个团县委。1935年9月到11月,团陕北工委归中共陕甘晋省委领导。1935年11月,为适应西北苏区党组织和行政区划变化的需要,共青团陕北工委改为少共陕西省委,书记慕纯农(后由陈时夫、高朗山接任),在中共陕西省委的直接领导和少共中央局指导下工作。1936年11月,中共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变换团的组织形式,使团组织成为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年组织形式,共青团中央即建立了西北青年救国会筹备会。与此同时,少共陕西省委和各少共县委自下而上地进行团员转党,建立青年救国会的工作,成立了省、县青救会筹备委员会。1937年初,陕北县以下少共组织改造结束。1937年4月,陕西省青年救国会代表大会在延安蟠龙镇召开,宣布成立陕西省青年救国联合会,高朗山任青救会主任兼党团书记。少共陕西省委和陕西省青年救国会先后下辖神府特区、陕北东地区、关中特区、三边特区及佳县、米西、绥德、清涧、靖边、新城、横山、瓦窑堡、赤源、安定、秀延、子长、延川、延长、安塞、赤安、延安、甘洛、宜川(红宜)、肤施、富县等县少共(青救会)组织。7月,陕西省青救会撤销,分别建立陕北东地区和西地区青救会。

3. 共青团渭北特别委员会

1932年10月,共青团渭北特别委员会成立,书记程建文(后叛变)。1932年12月,团特委改为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先后为程建文、李盛弟、习仲勋、李云波、魏光波。

4. 共青团陕南特别委员会

1932年5月共青团陕南特委建立,书记陈文华。同年12月,中共陕南特委对团陕南特委领导进行了调整,李泽生、刘明达先后任书记,机关驻南郑县西大街。1933年7月,团陕西省委派李楷到汉中,对团特委进行改组,书记李楷。8月,李楷被捕牺牲,特委瘫痪。1934年9月,中共陕南特委书记王克明兼管团的工作。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离开陕南,陕南白色恐怖严重,团特委被迫停止活动。特委先后下辖共青团城固、洋县、南郑等县委。

5. 少共神府特区委员会(青救会)

1936年1月,少共神府特委建立,隶属少共陕西省委领导,下辖少共佳芦县委,书记(主任)张汉武。1937年5月,少共神府特委改称神府特区青年救国会,同年7月撤销。

6. 少共关中特区委员会

1936年1月,少共关中特区委员会成立,隶属少共陕甘省委。1936年5月,少共陕甘省委撤销时,划归少共陕西省委领导,下辖淳耀、永红、赤水和甘肃省境内的新正、新宁等县少共组织。1936年12月,少共关中特委划归新成立的少共陕甘省委领导。1937年3月,少共关中特委改为关中特区青年救国会。书记先后为惠碧海、贺建山。

7. 少共东地区特别委员会

1936年6月,少共东地区特别委员会成立,机关无固定驻地,隶属少共陕西省委领导。特委下辖少共吴堡、绥德、绥清、延川、延长、宜川、红泉等县委。1937年3月,少共东地区特委撤销。书记先后为盛占英、白志明。

8. 少共陕甘省委员会

1935年11月,共青团陕甘边区特委改为少共陕甘省委,归中共陕甘省委和少共中央局领导,机关随中共陕甘省委活动。省委下辖少共关中特委和甘洛、肤施、红泉、宜川、富县和甘肃境内的华池等少共县委。书记先后为白治民、揭俊勋、李光业。1936年5月少共陕甘省委撤销,所辖组织划归少共陕西省委领导。1937年1月,少共陕甘省委再次成立,白向银任书记。省委下辖少共关中特委和少共甘洛、肤施、红泉、宜川(红宜)、富县等县委,隶属中共陕甘省委和少共中央局领导。1937年4月,少共陕甘省委再次撤销。

9. 共青团红二十六军委员会

1932年初,共青团西安市派张我功去陕甘边游击队任团代表。同年12

月,陕甘边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团陕西省委派史克寿任红二十六军团委书记。1933年6月,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团委亦消失。

10. 共青团神府特派员

1935年2月,共青团陕北特委任命贾怀琪为神府地区特派员,领导神府地区团的工作。特派员下辖共青团神木县委和神木东、神木西、府谷等县团组织。同年六七月贾怀琪叛变,神府地区共青团组织停止活动。

11. 共青团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

1933年3月,共青团陕甘边区特委在耀县照金建立,书记习仲勋。7月,共青团陕西省委被破坏,团陕甘边区特委与团省委失去联系,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领导下工作。同年10月,照金苏区失守,团陕甘边区特委停止活动。1935年夏,共青团陕北特委派白光、惠碧海去陕甘边区恢复团的组织,重建了团陕甘边区特委,书记惠碧海。特委先后下辖共青团陕甘边区南区区委和肤施、红泉、安塞、赤安、宜川等团县委及甘肃的华池战区团组织。1935年11月,共青团陕甘边区特委改为少共陕甘省委,归中共陕甘省委和少共中央局领导,书记自治民(后为揭俊勋、李光业)。团特委下辖少共关中特委和甘洛、肤施、红泉、宜川、富县及甘肃的华池等少共县委。1936年5月,少共陕甘省委撤销,所辖组织划归少共陕西省委领导。

12. 少共陕甘宁省委员会

1936年5月,中共中央在组建中共陕甘宁省委的同时,成立了少共陕甘宁省委,书记自治民。省委先后下辖少共三边特委、少共定边中心县委以及少共定边、安边、赤安,甘肃的华池、赤庆、环县、曲子,宁夏的盐池、豫旺、固北等少共县委。1936年11月,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决定改变共青团组织形式,在各地建立青年救国会。少共陕甘宁省委于1937年初改为陕甘宁省青年救国会筹备委员会。同年4月,陕甘宁省召开青年救国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陕甘宁省青年救国会,主任李光业。9月,陕甘宁省撤销,陕甘宁省青救会改为陕甘宁边区庆环分区青年救国会。

第三节 进步团体

1. 陕西省工会筹备委员会

1935年7月,中共西北工委决定成立陕西省工会筹备委员会,主任高长

久,开始组建西北苏区各级工会组织。筹委会下设组织部、福利部、青工部、女工部、文教部等机构。到1935年9月,延水、延川、清涧、延安、红泉、安塞、瓦窑堡市等县都建立了工会。1935年11月,中共陕北省委成立后,陕北工会筹备会正式改称陕西省总工会,主席高长久,委员长李子厚(子长人)。

2. 西北苏区各县妇女组织

1935年,在各级中共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西北苏区的广大妇女积极参加革命运动。为了使妇女运动有领导有组织的进行,绥德、清涧、赤源、秀延、子长、延安、红泉、延川、肤施、延长、瓦窑堡市、佳芦、榆林、延水、安定、志丹、宜川和甘肃省境内的华池战区都先后建立了妇女会或妇女救国会组织。

3. 陕甘省各县工会妇女组织

1935年11月陕甘省成立后,宜川、富县、肤施和甘肃境内的华池等县都建立了工会、妇女会等组织。

4. 陕甘宁省工会

1936年5月,陕甘宁省工人联合会成立,管瑞才任主席(后旷坚任委员长)。工会下辖三边特区工会和定边、赤安,甘肃境内的华池、赤庆、环县、曲子、定环,宁夏省境内的盐池、固北等县工会。1937年9月,陕甘宁省撤销,陕甘宁省工会改为陕甘宁边区庆环分区工会。

5. 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至抗日战争爆发前,由中共地下组织领导建立的抗日群众团体,简称西救会。1936年6月,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在西安成立,主要领导人为谢华、徐彬如、李木庵。西救会隶属中共西北特支领导。九十月间,杨明轩到西安,担任西救负责人。西安事变后,中共西北特支撤销,西救会改由中共陕西省委领导。西救会内部设有党团,书记谢华。1937年9月被国民党陕西当局下令解散。

6.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队部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是一二·九运动中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青年抗日救国组织。1936年2月在北平(今北京)成立,不久扩展到全国和海外一些地区。1936年10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临时队部在西安成立,队长胡景和(后为樊创基),党团书记先后为蔺克义、李连璧。西安民先隶属民先总队部和中共西北特支领导。12月,西安临时队部改为民先西安

队部,队员发展到150多人,由中共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共同领导。1938年,西安地区的民先队员发展到2000人左右。1938年4月初,民先西安队部改为民先西北队部。队长先后为刘金声、樊一鸣、李连璧、于志远、朱平。

7. 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

1936年11月,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在西安建立,负责人先后为李连璧、苏一平、刘日修。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隶属中共西北特支领导。西安事变后,西安学联在中共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共同领导下,深入各县农村,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抗战开始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企图以抗敌后援会取代学联,西安学联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在坚持学运领导地位不变的原则下,将学联改为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西安学生分会,取得了合法地位。学联和学生分会实行以校为单位的常委制,由七个常委单位各派三名常委组成。学联设有党团,书记先后为刘南生、陈煦、杨克。1938年11月,日本飞机轰炸西安,学校纷纷外迁,学生分会停止活动。

8. 陕西省学生救国联合会

西安事变后,陕西国统区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迅速高涨,各县陆续建立了学生救国会。在中共陕西省委青年部指导下,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于1937年1月初发起筹备成立陕西省学生救国联合会,以统一领导陕西国统区的学生运动。1月11日,陕西省学生救国联合会在西安高级中学正式成立,李连璧任主席。省学联下辖西安学联和长安、蒲城、武功、临潼、岐山、乾县、同官、商县、城固等近30个县学联。1937年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西安采用以抗敌后援会取代学联的办法,限制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并于同年8月下令解散省学联、西安学联等救亡团体。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通过斗争和必要的让步,在国民党陕西省抗敌后援会进行改组的条件下,省学联于9月停止了活动,西安学联和各县学联改为抗敌后援会学生分会,继续坚持抗日救亡活动。

9. 陕甘省总工会

1937年1月,在成立中共陕甘省委的同时,成立了陕甘省总工会,主任高长久。1937年4月,陕甘省总工会撤销。

10. 鄂豫陕苏区群众团体

1937年1月,为阻止国民党亲日派入陕,中共鄂豫陕特委奉命率红七十四师集结商县。在此期间,红七十四师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商县抗日救国农民协会、工

会、学生联合会等各种救亡团体纷纷建立。1937年2月,红七十四师移防镇安、柞水、宁陕,在柞水县建

11. 川陕苏区陕南群众团体

1934年1月后,川陕苏区陕南各县普遍建立了少共、妇女、贫农团、雇农工会等组织。

第三章 武装起义与“交农”围城^①

大革命失败后,陕西地区中共组织按照中共中央实行土地革命战争,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相继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和交农围城斗争,为创建红军和根据地积累了经验,锻炼了干部。

1. 清涧起义

1927年10月12日,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和中共陕西省委九二六扩大会议精神,共产党员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等率领陕西党组织掌握的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石谦旅部分官兵在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当日下午,起义部队在李象九、谢子长带领下,转战延川、延长。15日,攻占宜川县城,将部队改编为旅,旅长李象九,下辖三个营近千人。不日,部队遭到井岳秀部高双成师的进攻,被迫转移韩城,暂归杨虎城留陕部队王保民部。11月,唐澍、阎揆要来到韩城,与谢子长、白明善、史唯然组成军委,并决定将部队开往清涧、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经过短期准备,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总指挥唐澍,副总指挥谢子长,参谋长阎揆要。部队随即在韩城举行二次起义,北上途中进攻宜川受挫,继续北撤到延安、延川、安定、安塞、保安一带,途中屡遭国民党军队袭击,损失惨重。唐澍、谢子长、阎揆要等先后回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情况,其他人员分散隐蔽。

2. 麟游起义

1928年4月,驻防麟游县城的原国民二军教导团一营营长、共产党员王泰吉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发动教导团一营一中队五六十人举行起义。起

^① 农民采用上交农具、不种庄稼的方式,要求国民党政府减免粮款的一种斗争方式。

义部队由王泰吉率领离开麟游县城,经崔木到达礼泉县南坊镇时,受到当地民团李世龙部围攻,人员有的失散,有的被迫缴械,起义失败。

3. 三原“交农”和武装围城

1928年4月,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中共三原县委决定发动农民举行“交农”斗争。4月24日,武字区农民手持农具高呼“天不下雨,天逼民反;苛捐杂税,官逼民反;百姓不反,离死不远”的口号,与心字区、军字区、力字区等地“交农”大军汇合,奔向三原县城。中午,两三万“交农”群众包围县城,不断高呼“打倒贪官污吏”、“免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并焚烧农具示威,迫使县长马润昌答应免除当年粮款。5月1日,为配合渭华起义,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中共三原县委决定武装围城,并成立了以黄子文为总指挥的围城指挥部。3日,武装围城斗争爆发,由于三原驻军宋哲元部有了防备,第一次攻城未克。二次攻城时,参与武装围城的地方武装马仙舟叛变,缴了武字区农民武装的枪支,扣押了黄子文等,武装围城遂告失败。

4. 泾阳“交农”与围城斗争

1928年4月,中共泾阳区委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决定以“交农”形式发动农民举行起义。各乡农民万余人在起义总指挥张焕文、副总指挥雷志学等领导下,于26日手持大刀、长矛、农具,由崇文、永乐、鲁桥、口镇等地向泾阳县城进发。傍晚,起义农民包围了县城,由于国民党县政府军警巡守严密,攻城未克。27日黎明,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命令三原驻军马鸿宾部骑兵连前来镇压,起义农民撤退,围城结束。

5. 礼泉起义

1928年5月1日,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部署下,中共礼泉县委和共青团礼泉县委发动农民举行“交农”围城斗争,直接参加围城的1.8万多农民手持农具,高呼“免粮免款度饥荒”、“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等口号,分南、北、东和东北四路拥向县城。起义农民由于准备不周,攻城未克。2日下午,起义领导人秋步月等率群众再度攻城时,县长朱家骥下令开枪,起义领导人和骨干群众多人牺牲。起义群众被迫撤退,围城结束。

6. 渭华起义

1928年5月初,在中共陕西省委和中共陕东特委的领导下,渭(南)华(县)地区农民在渭华原上举行起义,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和陕东赤卫队。5月10日,由中共陕西省委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八路新编第三旅

(即许权中旅)在唐澍、刘景桂等人率领下,由潼关开往渭华地区。部队到达华县瓜坡镇后宣布起义,参加渭华农民起义。16日,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唐澍,军委主席刘景桂,参谋长王泰吉,军党委书记吴浩然,总顾问许权中,政治部主任廉益民。起义军民在渭华原上,杀豪绅,斗地主,并没收其财物分给贫苦农民。起义中心区域的国民党地方基层政权被摧垮,形成了以华县高塘、渭南塔山为中心,东至少华山,西到临潼,北接渭河,南连秦岭约200平方公里的红色割据区域,苏维埃政权在渭南、华县、五一3个县的48个区、村建立。6月,冯玉祥调集3个师及渭华一带的民团对起义中心区域实行“围剿”,经过数次激战,工农革命军、陕东赤卫队终因寡不敌众,退入秦岭山区。廉益民、吴浩然及陕东赤卫队副大队长薛自爽在战斗中牺牲。7月,工农革命军在洛南保安镇又遭李虎臣部进攻,唐澍、李大德等牺牲。在此,中共陕东特委决定取消工农革命军番号,部队由许权中率领暂归刘文伯师。8月,许权中旅在进入河南邓县后被打散,起义失败。

7. 旬邑起义

1928年5月6日,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中共旬邑党组织以抗粮“交农”为口号,发动旬邑清水原农民举行起义。起义农民在吕佑乾、吕凤岐、许才升等领导下,手持农具、梭镖和大刀,连夜向县城进发,沿途群众纷纷响应,队伍不断扩大。5月7日拂晓,起义农民攻入县政府,处决了反动县长李克宣及恶差数人。5月12日,起义农民在旬邑县城召开大会,宣布成立旬邑临时苏维埃政府,主席许才升,军事总指挥程永盛,下设军事、土地、经济、交通、宣传、外交等委员会。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县城周围村庄打土豪,分粮食,土豪劣绅闻风逃窜,起义烈火燃遍旬邑,涉及彬县、淳化、永寿以至甘肃宁县、灵台等地。5月30日,被国民党地方当局收买的内奸在县城发动叛乱,先后逮捕了吕佑乾、吕凤岐、许才升等起义领导人,并将其杀害,起义遭到镇压。

8. 淳化起义

1928年5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中共淳化区委以“交农”的方式,领导全县农民举行起义。9日清晨,在总指挥、共产党员赵新三等领导下,淳化东北乡、西北乡、北乡及县城周围一带万余群众肩扛农具,手持大刀、长矛,从四面八方拥向县城,包围城北门、南门和东门。围城群众不断呼喊“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等口号,并提出开仓放粮,县长段桂田和保安队离开淳化等条件。群众的要求遭到拒绝后,11日中午,围城指挥部组

织进攻,段桂田等仓皇逃窜。6月19日,起义农民代表五六百人汇集淳化通润镇,由田望秀主持成立了淳化县苏维埃政权,主席赵新三。30日,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派正规部队和保安团队六七百人包围了县城,起义军民在田望秀、赵新三的指挥下,英勇抗击,终因力量悬殊,退出县城。田望秀在突围中牺牲,赵新三等被捕遇害。

9. 咸长起义

1928年5月上旬,中共长安县委在咸阳东张村三关庙学校召开会议,决定发动咸长起义,打击横行乡里,反对革命的咸阳县马家寨大恶霸白辛太及其侄儿白云祥。会议制定了起义计划,并成立了起义委员会,李良任起义总指挥。会后,中共咸阳区委分头向党、团员和农民协会骨干传达了县委会议精神。5月16日,百余起义群众手持马刀、梭镖等,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东张村,李良宣布了行动计划,起义群众随即冲进马家寨,因白辛太外出,白云祥逃跑,群众便将白辛太的3个侄儿当场处决,并焚烧了契约、账簿等。

10. 永寿“交农”围城斗争

1928年5月18日,在礼泉、旬邑等县农民起义的影响下,永寿农民窦玉明、张策合、张文正等以“交农”方式,组织5000多农民参加围城斗争。19日,“交农”群众包围县城,高呼“粮、款太重,我们不种庄稼,向县长交农”等口号,迫使县政府在21日口头答应3年不征不派,但对交出恶绅李风清等条件未作答复。午后,群众拥向城门,准备攻城时,遭到县政府保安队的武装镇压,张文正等壮烈牺牲,数人受伤,围城失败。

11. 澄城农民起义

1928年5月,中共东府特委决定驱逐韦庄军阀赵桂堂。在此前后,特委先后派王育真、吴卜亭、雷振东等打入各地红枪会组织,建立了澄城县西南区农民问政总团。在农民问政总团的指挥下,武装农民占领了酥酪、原畔、临皋、东白、西白等地,控制了交通,对韦庄形成了包围。6月22日,起义农民兵临韦庄城下,县城周围及大荔、朝邑、蒲城等县数千农民赶来参战。由于赵桂堂防守严密,攻城接连失利,问政总团便采取“引蛇出洞”的战术,终将赵桂堂主力消灭。7月5日晚,赵桂堂利用出城求和之机,率残部逃窜,围城宣告结束。

12. 周户灾民起义

1929年11月,周至、户县一带灾民因不满国民党当局的反动统治,在农民周七的统领下,揭竿而起,攻克周至县城,接着围攻户县县城。中共陕西临

时省委闻讯,急派西路巡视员陈云樵及李特生前往领导。陈、李奔赴途中,灾民起义已被镇压。陈、李又联络周至、户县、兴平等地农民约 2000 余人持 200 多枝枪,再次攻打周至县城,未克。起义农民在转移眉县途中遭敌追剿而失败。

13. 乾县起义

1930 年初,中共陕西临时省委要求各地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将乾县划为发动武装斗争的中心区域。根据省委指示精神,中共乾县县委书记王敬之联络了吴好善、许庚辰等组建了一支武装。为了扩大武装,王敬之接受了驻乾县、永寿、礼泉等县的西北民军第十七师师长张西昆的收编,被任命为第十团一营营长,先后在乾县县城和麟游崔木等地驻防。3 月间,中共周至县委书记陈云樵向王敬之传达了省委关于发展组织,开展兵运、农运和武装斗争的指示。同年夏,王敬之随部队驻防乾县城内,秘密与上官克勤联络,发展力量,准备发动起义。不料事泄,王敬之即带领上官克勤、许桂林、吴好善、吴宗汉、许庚辰等隐藏于陆陌村油坊,遭到张西昆部丁万林团包围。王敬之、上官克勤奋力冲出包围,其他人有的在战斗中牺牲,有的遭敌杀害,起义失败。

14. 蓝桥起义

1930 年 8 月 30 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决定,中共蓝田特支发动蓝田南区农民和红枪会举行起义。红枪会首领曾老三担任起义总指挥。起义队伍分兵三路向蓝桥驻军刘汉三部发起进攻,除刘汉三逃脱外,其余 100 多人均被消灭,起义胜利。

15. 赵伯经起义

1931 年 12 月上旬,共产党员赵伯经、王乐天等率领杨虎城部第三营官兵以出操比赛为名,在麟游举行起义。1932 年 1 月,起义部队与民团遭遇,损失很大,王乐天为保存力量,将人员疏散。

16. 两当起义

1932 年 4 月 2 日,在中共陕西省委军委成员刘林圃的领导下,打入国民党第十七路军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的共产党员习仲勋、吕剑人、李特生、许天洁等利用部队换防之机,率领全营 200 多人举行起义。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计划北上旬邑与刘志丹领导的革命武装会合。当部队行至陕西永寿岳御寺时遭国民党军队围攻而溃散。

17. 凤翔路口起义

1932 年 4 月 13 日,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国民党十七路军潼关行营附

设教导队,于甘肃东北泾川县凤翔路口举行起义。该教导队共300余人,经中共地下组织及其负责人陆子江、曹定侯等人积极活动,全队近半数人倾向进步。同年4月,教导队学员毕业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决定将教导队划归甘肃行署主任邓宝珊部,并由教导队队长杨干丞带领前往兰州。4月12日,当教导队行至长武县时,中共地下组织秘密召开会议,决定次日在长武与甘肃泾川交界的凤翔路口举行起义。13日,起义按预订计划顺利进行,由曹定侯、张汉儒率领,渡泾河至甘肃宁县太昌宿营。在此起义部队遭国民党军杨子恒部骑兵团包围,虽经激战突围,但损失严重,领导人曹定侯、张汉儒在突围中下落不明。部队遂由罗子英、陈斌如、张铁汝指挥,继续向陕北行进。起义部队行至灵台县上良镇时,再次被杨子恒部骑兵团包围。起义部队经过英勇奋战,再次突出重围,罗子英、陈斌如、张铁汝在突围中下落不明,余部由允希贤率领,转移到固关峡山区坚持活动,后终因孤立无援,弹尽粮绝而分散隐蔽。

18. 靖远起义

1932年4月,中共党员谢子长、焦维炽等在甘肃靖远筹划甘肃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起义。由于事泄,旅长王子元突然扣押了副旅长张东皎和二团一营营长王儒林(均为中共党员)。一团一营营长吕振华(共产党员)率领该营和教导队一部于5月5日傍晚率先在靖远起义,宣布成立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第四支队,吕振华代理总指挥。不久,起义部队受国民党军队追击而失败。5月30日,谢子长、杜润滋及脱离险境的张东皎、王儒林在筹到一批武器后,再次组织王子元部起义,在靖远水泉堡打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旗号。游击队很快发展到200多人,整编为一、二、三支队,总指挥谢子长,政委焦维炽,参谋长杜润滋,李鸿范、张东皎、王儒林分别任三个支队司令。6月,部队合编为第三支队,司令王儒林,政委杜润滋,在靖远、海原、会宁、榆中、景泰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不久,孙作宾到部队参加领导工作。由于部队发展很快,又扩编了第四支队,孙作宾任司令兼政委。7月,游击队遭驻防靖远的国民党军王云山部偷袭,激战后游击队趁雨夜突围,旋又受到国民党军冶成章旅追袭,失利后分散隐蔽。

19. 西华池起义

1932年7月9日,驻军甘肃西华池的国民党陆军第十一旅特务营一、二连,在中共党员高鹏飞(任一连连长)等率领下举行起义。10日,起义部队170

余人在甘肃宁县盘克原与红军陕甘游击队会合,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高鹏飞任大队长。

20. 岷口起义

1932年7月,中共组织领导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第十九师第五十旅补充第二团第一营在甘肃定西县岷口举行起义。当晚,起义部队离开岷口,准备与靖远起义部队会合。第二天,部队到达会宁县城南后,暂编为一个团,马济人任团长,卢纪民任团附,下设四个营。整编后,部队离开会宁,到达陕西、甘肃边界的旬邑,与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会合,部队改为人民革命军,马济人任司令,卢纪民任副司令,下辖两个支队。后革命军经静宁向东行军途中,数次遭到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的围追堵截。9月初,革命军在清水县关山遭到国民党军千余骑兵包围,尽管几经冲杀,但始终未能冲出重围,革命军战士大部壮烈牺牲,余部分散活动。

21. 晋王、永丰起义

1932年8月初,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焦维炽(化名赵仪三)在蒲城晋王、永丰分别召开党员会议,决定利用党、团员在晋王、永丰民团供职的有利条件,于8月6日两地同时举行武装起义。晋王起义由李冲霄、曹木海负责,永丰起义由焦维炽负责。8月6日,永丰民团首先起义,巧取了民团团长沙振南的短枪,但在袭击赵振南及民团第十团团长沙跃林时没有成功,致使其派人到孙镇民团总团处求援。起义部队因联络失误,焦维炽遭围攻被俘,其他起义人员在收缴了刘家沟民团武装后,与增援之敌激战于陈古原,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此时,晋王起义尚未发动,正在等待永丰起义消息的曹木海等也因遭到民团包围而失败。这次起义有30多名党、团员参加,其中焦维炽、曹木海等11人牺牲。

22. 蒿店起义

1932年10月下旬,在中共陇东军特委领导下(陇东军特委隶属陕西省委领导),西安绥靖公署甘肃行署干部补习队在接运蒋介石给邓宝珊的一批枪支时,于甘肃蒿店举行起义,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队长李华锋,政委李良。不日,起义部队遭到民团袭击而失败。

23. 耀县起义

1933年7月21日,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国民党第十七路军骑兵团团长王泰吉(共产党员)在耀县率部起义,宣布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

总指挥王泰吉,政治部主任杨声(刘映胜),参谋长谈国帆。义勇军下辖6个大队,1200余人。7月30日,义勇军与前来进攻的特务团在三原轳辘把村相遇,损失惨重。8月上旬,王泰吉率余部退往照金革命根据地。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陈家坡主持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王泰吉,政委高岗,统一领导红二十六军第四团、耀县游击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

24. 木头峪起义

1933年12月,中共陕北特委派马佩勋到佳县木头峪,与在当地民团任教练的共产党员刘子义联系,准备发动武装起义。随后,陕北特委又派马佩勋到吴堡,领导成立了抗日义勇队,队长薛俊山,政委马佩勋。1934年1月中旬,已任中共佳县县委组织委员的刘子义和县委书记高长久,得知国民党佳县当局将于2月初在木头峪召开全县各区绅士代表会议,研究催收年终捐款及捕杀共产党人的计划时,决定举行武装起义。中共陕北特委派人到吴堡与马佩勋联系,将隐蔽在宋家川的抗日义勇队迅速派往木头峪集结待命。2月6日晚,当各区绅士代表会议举行时,义勇队在木头峪党员的引领下,首先奔向民团队长杜庆甫的住处缴了杜的枪械,然后到民团和代表开会处收缴了民团的枪支,将团丁和大部分绅士扣押,并处死了民团团总张东蛟等人,烧毁了所有账簿。次日拂晓,义勇队撤出木头峪,向吴堡方向开进。2月15日,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的决定,义勇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四支队,薛俊山任队长,马佩勋任政委。

25. 安康起义

1934年2月22日,国民党安康区绥靖司令部所属的特务三连、手枪连和迫击炮营部分官兵,在中共安康军特支的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第一纵队,袁作舟任队长,王辛德任政委,王泰诚为纵队游击指挥。起义后,部队撤出安康县城,开往川陕革命根据地。同年3月中旬在紫阳县毛坝营盘大梁遭到国民党地方民团的截击,王泰诚在战斗中阵亡,王辛德等起义领导人被捕牺牲,其他人员分散隐蔽。

26. 郭宝珊起义

1934年10月20日,在陕甘边区中共组织的帮助和红二十六军的影响下,活动于陕西黄龙山区的民间武装郭宝珊率部下120余人在甘肃庆阳新堡宣布起义,进入陕甘边苏区。11月,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令郭

宝珊,政委任浪花,参谋长于振学。隶属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下设三个大队,段荣启、王东来、杨茂堂分任队长。在中共组织的领导下,这支部队屡建战功,成为红二十六军的主力团队之一。

27. 彬县起义

1935年2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及陕甘边红军的影响下,彬县永乐镇民团50多人在班长王富贵、张占云率领下举行起义。起义后,部队进入陕甘边苏区,编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王富责任连长,张占云任排长。

28. 引驾回起义

1935年12月7日至11日,国民党陕西警备第二旅四团四连、九连在进步青年张子新、王展(王武林)、何继周(何振亚)等人领导下,先后在柞水县营盘和长安县引驾回举行起义。不久,在红七十四师的建议下,起义部队宣布成立陕南游击纵队,指挥何振亚。陕南游击纵队成立后,先后转战于陕南的镇安、柞水、宁陕、石泉、汉阴、安康等地,以红军为榜样,开展游击战争,部队很快发展到500余人。但随着国民党军队对鄂豫陕根据地大规模“围剿”,陕南游击纵队的处境愈来愈困难,在此情况下,为保存实力,陕南游击纵队先后在镇安和安康,有条件地接受了国民党地方政府的两次改编。1936年8月,在中共西北特支的领导下,陕南游击纵队在镇安县紫荆乡(今属安康)再次起义,宣布成立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军长何振亚,军委主席兼宣传科长沈敏,组织科长杨江,参谋长杜瑜华,政治部主任徐海山,供给处长傅东山。下辖四个支队,一个特务队,一个侦察队,一个少年先锋队。成立大会上散发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宣言》和《告民众书》。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成立后,在镇安、宁陕、石泉及安康等地交界地区与国民党军队周旋,部队迅速扩大到八九百人。西安事变后,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划归红十五军团序列。

29. 铁佛寺起义

1936年8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负责人崔廷儒先后派吕剑人、刘庚、张涛、李特生、谈国帆等到乾县地方民团中开展工作。10月7日,张庚良、刘庚等在乾县发动铁佛寺保安中队起义,攻进永寿县城,打开监狱,释放政治犯。8日,起义部队转往麟游山区,成立陕甘边抗日联军,总指挥张庚良,政委兼参谋长刘庚。部队后在与强敌战斗中不支,分散隐蔽。

第四章 军事组织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中共陕西省委设有军事部或军委,领导全省军事工作,通过组织工农武装起义,在国民党军队中组织士兵起义,收编民团、红枪会等办法,组建了多支规模不等的军事武装组织。

在陕北地区,1927年10月举行清涧起义,建立了陕西第一支人民武装力量——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1933年3月,又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以后又陆续创建了几十支游击队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在关中地区,经过1928年5月渭华起义、渭北起义等起义后,先后建立了工农革命军、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红军陕甘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等十多支革命武装;在陕南地区,建立了红二十九军、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等十多支武装组织。并发展壮大从鄂豫皖苏区转移到商洛的红二十五军。这些武装组织有的建立时间不长,即被国民党军队镇压而失败;有的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一部分。党领导这些武装,经过英勇奋战相继创建了渭北、陕甘边、陕北、鄂豫陕等苏区,最终发展成为西北苏区。它是土地革命时期全国惟一保存下来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第一节 早期军事组织

1. 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

1927年10月,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等人在清涧发动陕北军阀井岳秀部十一旅(石谦旅)部分官兵起义。同年12月,起义部队在韩城宣布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总指挥唐澍,副总指挥谢子长,参谋长阎揆要。部队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1928年1月起义部队在二次攻打宜川时失败。

2. 陕东赤卫队

1928年4月,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为加强渭华地区的农民武装力量,分别从渭南、华县抽调了40余名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到驻洛南的许权中旅学

习军事。4月下旬,许权中旅中共组织派共产党员李大德率领在许旅学习军事的渭华地区人员返回,以“踏团”的名义在渭华地区进行武装活动。不久,陕东特委正式将其命名为陕东赤卫队,李大德任大队长,薛自爽任副大队长,冯养浩任党支部书记。赤卫队下辖三个分队和一个大刀队,共100余人,隶属中共陕东特委领导。陕东赤卫队成立不久,移驻渭南塔山一带,在打击渭华地区的反动势力,配合工农革命军进行反“围剿”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渭华起义失败后,陕东赤卫队随工农革命军一道撤往洛南山区,在洛南保安战斗中被打散,队伍解体,主要领导人薛自爽、李大德等在战斗中牺牲。

3. 工农革命军

1928年4月,陕西地方军阀趁冯玉祥在河南与奉军及河南地方军阀交战,冯玉祥在陕军事力量空虚之机发动了反冯战争。5月,由中共组织控制的许权中旅被李虎臣调往潼关参加反冯战斗。5月10日,李虎臣部在潼关北山被冯玉祥部击败。当晚,唐澍、刘志丹等人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率许旅一部撤出战斗,向渭华地区进发。部队到达华县瓜坡镇后宣布起义,成立工农革命军,唐澍任总司令,刘志丹任军委主席,廉益民任政治部主任,王泰吉任参谋长,吴浩然任军党委书记,许权中任总顾问,杨晓初任财政经济委员。工农革命军下辖四个大队,一个骑兵分队,一个赤卫队。赵雅生、武丕谟、谢浩如、雷天祥分任大队长,张汉泉任赤卫队队长,许权中兼骑兵分队队长,全军近千人。工农革命军成立后,开往华县高塘,与渭华地区的农民起义相结合,很快形成了以华县高塘、渭南塔山为中心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同年6月,冯玉祥在取得潼关战役胜利后,调集3个师的兵力及地方武装,对渭华起义的中心区域进行军事“围剿”。工农革命军虽经英勇作战,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离渭华地区,转往洛南山区。主要领导人唐澍、吴浩然等牺牲。同年8月,部队由许权中率领进入河南邓县后,被当地红枪会打散。

4. 澄城县西南区农民问政总团

1928年5月,中共东府特委为配合渭华起义,领导发动了澄城及邻近地区农民起义。期间,以当地红枪会组织为基础,成立了澄城县西南区农民问政总团,马坤斋、马师古为常委,王育真为秘书。同年7月,起义农民将韦庄驻军赵桂堂部驱逐出境,斗争取得胜利,农民问政总团自行解散。

5. 旬邑游击队

1928年5月,中共旬邑区委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领导发动了旬邑起义,

建立了 400 余人的农民武装。同年底,由于国民党军队的镇压,起义失败,保留下来的部队由共产党员程百印、程双印、吕振邦等领导,成立了旬邑游击队,在旬邑山区进行武装斗争。游击队隶属中共旬邑区委领导。总指挥程永盛,队长吕振邦,副队长程双印。1932 年初,旬邑游击队编入陕甘边游击队。

第二节 渭北根据地军事组织

1. 礼泉游击队

1930 年 1 月,礼泉游击队在南乡史德镇宣布成立,队长秋步月。游击队隶属中共礼泉县委,主要活动于礼泉、兴平、乾县、武功交界地区。5 月 9 日,秋步月被害,游击队停止活动。

2. 渭北灾民自救队

1930 年 5 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派陈云樵、黄子文到渭北地区,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争。6 月 16 日,陈、黄二人领导成立了渭北灾民自救队,队长陈云樵,政委黄子文。自救队隶属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领导,下辖 4 个大队,200 余人。7 月 13 日,一大队张成义叛变,自救队解散。

3. 泾阳游击队

1932 年 3 月,在中共泾阳特支策划下,国民党军杨虎城部警卫团副官苗家祥同王福茂、侯振西两人回到泾阳,组建了泾阳游击队,队长苗家祥(因此也称苗家祥游击队)。游击队人数最多时发展到七八十人。1933 年 1 月中旬,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将泾阳游击队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

4. 渭北游击队

1931 年 5 月,中共三原武字区委在全区挑选了 30 多名党、团员和农民积极分子,建立了武字区赤卫队。1932 年 4 月下旬,在此基础上,正式组建了武字区游击大队,大队长孙铭章。大队下设三个分队,由邓万祥、康尚武、王化海分任队长,队员 40 余名,长枪 30 余枝。游击队主要活动在西至三原心字区,东至富平石川河,北至耀县西原,南至三原心、武两区的原畔一带。8 月 1 日,武字区游击队改编为渭北游击队,马志舟任队长,金天华任政委。全队 60 人,30 枝枪。同年 11 月,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围剿”武字区,游击队被冲散。12 月,黄子文等人领导恢复了渭北游击队,黄子文任游击队指挥,金天华任政委,下辖两个中队,四五十人。游击队隶属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领导。

1933年1月,渭北游击队改为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

5. 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

1933年1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将渭北游击队在三原武字区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马志舟任大队长,金天华任政委。大队下辖两个中队,40余人,隶属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领导。同年7月,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与其他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

6. 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

1933年1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将泾阳游击队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苗家祥,副大队长姚德顺。大队下辖3个中队,50余人。隶属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领导。同年3月,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二大队改由总指挥部领导。

7. 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

1933年3月,渭北游击武装发展到四支游击队,300余人。据此,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成立了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李平、黄子祥先后任总指挥,金天华、张培述、刘映胜、张秀山先后任政委,李天保任参谋长。总指挥部隶属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领导。7月,总指挥部与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

第三节 陕甘边根据地军事组织

1. 南梁游击队

南梁游击队亦称陕甘边境游击队。1931年9月,刘志丹偕马锡五等先后到陕甘边界的南梁地区,将分散活动在合水、庆阳山区的赵连璧、杨培胜、贾生财3支武装集合起来,在合水县倒水湾进行整编,建立了南梁游击队。全队300余人,分为三个大队,刘志丹任总指挥。10月,阎红彦、杨重远等领导的陕北游击支队及师储杰等领导的保商武装来到南梁,与南梁游击队会合。1932年1月,两支部队整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

2. 西北反帝同盟军

1932年1月,由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和阎红彦、杨重远等领导的陕北游击支队及师储杰等领导的保商武装在甘肃正宁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谢子长,政委高维翰,副总指挥刘志丹,参谋长杨重远。西北反帝同盟

军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同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3.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1932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先后任总指挥,高维翰、李艮先后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游击队下辖三个步兵大队和一个警卫队。4月,杜衡来游击队视察,撤销了总指挥部,将游击队改编为三、五两个支队,刘志丹、阎红彦分任队长。5月10日,省委决定恢复游击队总指挥部。游击队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同年12月,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

4.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

1929年,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派李秉荣、李特生、习仲勋、吕剑人、刘书林、陈云樵和刘林圃等,到驻陕西凤县国民党第十七路军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开展兵运活动。1930年4月,该营建立了党委,李秉荣、李特生、习仲勋先后任书记,下设三个支部。1932年4月2日,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部队调防途经甘肃两当县城时,刘林圃、习仲勋等组织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支队长许天杰,政委习仲勋。同年4月下旬,第五支队在北上与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会合途中,被土匪王结子部打散。

5.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四支队

1929年,中共陕西省委和中共陕北特委派共产党员张东皎等打入国民党地方武装苏雨生部王子元团开展兵运工作,在该部建立中共组织。1930年后,王子元部先后移防宁夏平罗和甘肃靖远。1931年冬,王子元部改编为甘肃警备第三旅。在该旅的中共组织以党员比较集中的二团为主组建团党委,张东皎任书记,下辖校官、教导队、士兵等三个支部,党员近百人。1932年4月,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焦维炽到靖远策划甘肃警备第三旅举行武装起义。他们到靖远后,焦维炽以省委特派员的名义改组了团党委,焦维炽任书记。同年5月5日,团党委领导甘肃警备第三旅部分官兵于靖远起义,部队改编为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第四支队,总指挥谢子长(未到职,后由吕振华代理),政委焦维炽(未到职)。下辖两个大队,曹炳奎、张秀山分任大队长。起义后,部队向海原方向进发,途中被王子元部周维邦、王治邦的两个骑兵营打散。

6.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

1932年5月初,靖远起义失败后,谢子长等人在甘肃兰州聚集力量。5月

下旬,谢子长、杜润滋、张东皎、王儒林在靖远水泉堡打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红旗,总指挥谢子长,政委焦维炽(未到职),全队 200 多人,下辖 3 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杜鸿范,第二支队司令张东皎,第三支队司令王儒林。6 月,部队合编为一个支队,称第三支队,支队司令王儒林,政委杜润滋。游击队活动于靖远、海原、会宁、榆中、景泰等县边界地区。7 月,队员由 200 余人发展到 400 余人,又在水泉堡扩编了第四支队,支队司令兼政委孙作宾。三、四支队各辖三个大队。7 月,部队在集中训练时先后遭国民党军王云山部偷袭,冒雨突围时又受到驻宁夏的第三十五师一〇五旅(旅长冶成章)的“围剿”,部队被打散。

7.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

1932 年 9 月,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兼陕甘游击队政委李艮到甘肃平凉开展兵运工作。10 月,李艮与共产党员周志学发动来平凉接枪的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甘肃行署干部补习队军士队队长、共产党员李华锋在返回蒿店时发动起义,宣布成立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队长李华锋,政委李艮。随后,第七支队遭当地民团袭击而解散。

8.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省委和陕甘边特委领导创建的革命武装。1932 年 3 月,中共陕西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情况,申请陕西组建正式红军的番号。4 月,中央批准陕西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一师。12 月,陕西省委派杜衡前往陕甘边,在宜君县转角镇(今属旬邑县)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红二十六军政委先后为杜衡、汪锋(代理)。红二团团王世泰,政委杜衡(兼),参谋长郑毅,政治处长刘志丹。红二团下辖步兵连、骑兵连和少年先锋队,全团共 200 余人。1933 年 6 月,杜衡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强令部队南下渭华一带创建新苏区,使部队遭受损失。7 月下旬,根据省委指示,渭北游击第一大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在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带领下进入照金根据地。同时,杨虎城部王泰吉率骑兵团在耀县起义,宣布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亦到达照金。8 月 14 日,陕甘边特委在耀县陈家坡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把红四团、耀县游击队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组成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王泰吉,政委高岗。10 月初,红二团主要领导王世泰、刘志丹等人从秦岭山中脱险回到照金,刘志丹到后任总指挥部参谋长。10

月,国民党陕西当局纠集四个团和邻近几县民团的兵力向照金根据地“围剿”。由于红军主力北上陇东,10月15日陕甘边苏区机关所在地照金薛家寨陷落。11月3日,陕甘边特委在甘肃合水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甘肃合水县莲花寺正式恢复红二十六军,首先成立红四十二师,先后下辖五个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师长先后为王泰吉、刘志丹、杨森,政委先后为高岗、杨森、张秀山、高岗、谢子长。师党委书记先后为杨森、张秀山。1935年9月,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和从陕南到陕北的红二十五军合编成红十五军团,红二十六军编为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红二十六军从建立到编入红十五军团,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当局对陕甘根据地的多次“围剿”,并同陕北红军一起粉碎了国民党当局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1935年2月后,在刘志丹领导下,红二十六、二十七军联合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当局对西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先后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六座县城,巩固和扩大了西北苏区,迎来了先期长征到达西北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

9. 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

1933年3月,中共陕甘边特委以照金和旬邑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李妙斋、黄子文、吴岱峰先后任总指挥,习仲勋、张秀山先后任政委,史进才任参谋长。指挥部先后下辖一、三、五、七、九、十一支队和妇女游击队,隶属中共陕甘边特委领导。1933年10月,照金革命根据地失守后,游击队总指挥部撤销。

10.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

1933年7月,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国民党第十七路军骑兵团团长王泰吉在耀县率部起义,所部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总指挥,刘映胜任政治部主任。义勇军下辖5个大队,1000余人。先后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领导。同年8月,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进入照金苏区。11月编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

11. 耀县游击队

1933年7月,中共耀县县委为配合王泰吉骑兵团起义,在耀县阿姑社村组建了一支100多人的游击队,陈学鼎任队长,张仲良任副队长,张邦英任党代表。游击队隶属中共耀县县委领导。8月,耀县游击队进入照金根据地,隶属于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

12. 红二十六军第四团

1933年7月24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渭北游击队一大队在三原武字区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红四团下辖两个连和一个少年先锋队。11月8日,红四十二师建立,红四团改编为四十二师骑兵团,团长黄子祥,政委先后为杨森、张秀山。

13. 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

1933年8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在耀县陈家坡主持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耀县游击队。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同年11月,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成立,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撤销。

14. 保安游击队

1933年11月下旬保安游击队建立,队长刘约三(后刘景范),政委王英。队员最多时达百余人。1934年1月,保安游击队隶属第二路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1934年11月,保安游击队编入红四十二师第二团。

15. 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

1933年11月8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成立。四十二师建立后,立即将王泰吉率领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三支队(耀县游击队)和原红四团少年先锋队改编成红三团,全团200余人。团长王世泰,政委李映南(后黄罗斌)。

16. 第二路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

1933年11月初,中共陕甘边特委与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包家寨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建立三个游击区,成立第一、二、三路游击总指挥部。1934年1月,根据包家寨会议精神,第二路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庆阳南梁成立,总指挥杨琪,政委先后为高岗、惠子俊。下辖庆阳、合水、保安、赤安、安塞四支队、陕甘游击队五支队、六支队、七支队、八支队、庆北、定边、华池、环县、庆华、柔远等县游击队和保卫队。同年10月,指挥部所辖游击队大部编入红四十二师第二团,指挥部撤销。

17. 第三路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

1934年1月,按照包家寨会议决定,第三路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总指挥先后为张明吾、王安民、陈国栋,政委先后为黄子文、张仲良、张邦英。下辖中宜、富县、富西、淳耀六支队、淳耀七支队、赤水十一支队、赤

水十二支队等游击队。1934年11月,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改称为陕甘边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

18. 陕甘边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

1934年11月,第三路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改称为陕甘边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陈国栋,政委张邦英。总指挥部下辖中宜游击队、中宜独立营、淳耀第六支队、赤水第十二支队以及甘肃境内的正宁回民支队、正宁五支队、八支队、新正特务队、宁县一支队、三支队、新正独立二营等游击队,主要活动在陕西的淳化、旬邑、中部(今黄陵)、宜君、耀县和甘肃的正宁、宁县等县交界地区。1935年冬,陕甘边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奉命撤销。

19. 西北抗日义勇军

1934年11月中旬,在陕甘边区党组织和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的帮助和影响下,活动于陕西黄龙山区的地方武装郭宝珊部120余人在甘肃庆阳新堡宣布起义。起义后,部队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令员郭宝珊,政委任浪花。义勇军隶属红四十二师领导。

20. 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一团

1934年冬,中共陕甘边特委以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所属的正宁四支队、直属特务队为基础,抽调宁县三支队、正宁五支队部分人员,组成红四十二师第一团,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全团200余人。

21. 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

1934年11月,中共陕甘边特委以第二路游击总指挥部所属的庆阳、保安、安塞游击队为基础,在南梁阎家洼子组成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团长刘景范,政委胡彦英。全团180多人。

第四节 陕北根据地军事组织

1. 晋西游击队

1931年春,中共山西省委在山西孝义县楼底村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大队长拓克宽,副大队长阎红彦,政委黄子文。游击队骨干是驻防山西的国民党军高桂滋部和太原兵工厂中的中共地下党员。游击队主要活动于吕梁山南段区域。1931年9月,由于国民党军队大肆“围剿”,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进入陕北,改编为陕北游击支队。

2. 陕北游击支队

1931年9月,由山西进入陕北的晋西游击队在收编、改造了杨琪、师储杰等领导的商贩武装,队伍发展到300余人。游击队随即改编为陕北游击支队,阎红彦任大队长,吴岱峰任副大队长,杨重远任政委。隶属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同年10月,陕北游击支队进入陕甘边界的南梁地区,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1932年1月,两支部队整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

3.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

1932年3月,刘善忠、高朗亭等人在清涧淮宁湾收缴了国民党地方民团的枪支,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延川县游击队”,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1932年10月1日,中共陕北特委决定把“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20日,九支队在延川县高家圪塔正式成立,支队长高朗亭,政委先后为艾龙飞、马万里,副支队长强世清,党委书记马万里。全队20余人,主要活动在延川、安定、清涧、绥德、延安、延长一带。1933年4月,九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

4.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

1933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支队长先后为强世清、白得胜(代理),政委先后为杨重远、李成荣、魏武,副支队长马佩勋。隶属中共陕北特委。全队30余人,主要活动在延川、清涧、安定、绥德、延长、横山等县边界地区。11月,一支队在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下分散隐蔽。1934年3月8日,红一支队在安定刘家圪塔重新恢复,支队长李盛堂,副支队长谢绍安,政委先后为刘克清、贺晋年。全队50余人。同年9月18日,红一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一团。同时,陕北特委新建了红一支队。

5.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八支队

1933年7月25日,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八支队在安定李家川正式成立,支队长栾新春,政委刘明山,副队长贺吉祥。隶属中共陕北特委,主要活动于安定、横山、米脂西区及清涧北区一带。1934年9月,八支队编入陕北红一团。同时,陕北特委在梨树台成立了新八支队,支队长先后为高志明、王正川、陈世海(代理),政委先后为李盛堂、惠艾申、贺树槐,有队员50多人,枪20多枝,主要活动于横山石湾、靖边及安定北区一带。1935年3月新八支队编入陕北游击队第三纵队。

6.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

1933年8月5日,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在清涧王家山成立,隶属中共陕北特委。支队长先后为罗永宽、王聚德、白雪山,政委先后为高朗亭、崔正冉、王浩、张毅忱、马万里。1934年11月4日,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将二支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二团。同时,又在清涧小马家山组建了新二支队。

7.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

1933年9月,中共神木南区区委在神木尚家坬村组建了神府特务队,队长李成兰,政委王兆相,隶属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同年11月,神府特务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王兆相、高朗亭先后任支队长,马万里、张毅忱、贾怀光、杨文谟先后任政委。全队20余人。1934年9月,三支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三团。但三支队番号未取消,又组建了新的三支队。

8.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三支队

1933年9月下旬,中共陕北特委将靖边县赤卫军主力在靖边青阳岔龙窑镇改编为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三支队。支队长先后为王锦秀、王震川,政委贺树槐。全队30余人。1935年3月,十三支队编入陕北游击队第三纵队。

9.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四支队

1933年12月,中共陕北特委派张达志、马佩勋等人在吴堡县樊家圪坨成立抗日义勇军,队长薛俊山,政委马佩勋。1934年2月,抗日义勇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四支队,薛俊山、郭玉人、宋平生先后任队长,马佩勋、高长久、王国昌、崔世俊、慕生忠先后任政委。支队下设两个分队,60余人。1935年3月,四支队与陕北红五团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第三团(原三团改为神府独立三团)。

10.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五支队

1934年3月,中共绥德县委报请中共陕北特委批准,以南区王家沟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五支队。支队长先后为崔正冉、蔚国占、张家修,政委先后为马万里、张毅忱、崔世俊、崔正冉。主要活动在绥德县境内。五支队人数最多时发展到七八十人,编为三个中队。1935年3月,五支队主力编入陕北游击队第二五纵队,留30余名队员继续以五支队名义开展斗争。

11.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六支队

1934年5月,根据中共陕北特委指示,佳县县委组织了特务队,队长郭玉

人,政委樊文德。6月,佳县特务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六支队,全队近20人。支队长先后为郭玉人、王士杰,政委樊文德,副队长王士文。隶属中共陕北特委。六支队主要活动在佳县南部和吴堡、米脂边界地区。1935年2月,六支队与十五支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五团。后陕北特委重新组建了六支队。

12.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

1934年7月8日,为加强对陕北游击队的统一领导,中共陕北特委在安定县杨道岭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隶属中共陕北特委。总指挥先后为谢子长、贺晋年,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下辖陕北游击队第一、二、五等支队,共600余人。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率各游击支队,在红二十六军第三团的配合下,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同年9月,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撤销,将所属的红一、红二、红三支队分别改编为红军陕北第一、二、三团。

13.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二支队

1934年8月,中共陕北特委将绥德梁家甲村赤卫队改编为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二支队。支队长先后为霍维德、梁凤鸣,政委马龙飞,副队长马景林。主要活动在绥德梁家甲、深沟、前后坪、孙家翠、郭家坪一带。1935年1月1日晚,梁凤鸣等叛变,游击队解散。

14.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十二支队

1934年8月,中共陕北特委在横山县清河沟将曹动之领导的骑兵赤卫队改编为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十二支队。隶属中共陕北特委。支队长吴亚雄,政委曹动之。主要活动于横山、靖边、安定、定边、鄂旗城川和乌审旗一带。1935年12月,二十二支队改编为蒙汉骑兵游击队。

15.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一团

1934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在安定县(今子长县)崖窑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一团,团长贺晋年,政委马佩勋。全团下辖三个连,200余人。1935年1月,红一团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

16.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三团

1934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在神木县王家庄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三团,团长王兆相,政委杨文谟,参谋长刘鸿飞。全团下辖三个连,200余人。1935年1月,红三团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

四师。

17.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一支队

1934年9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一支队(神木十一支队)建立,支队长刘德,政委先后为贾如胜、张德超、武开章,隶属中共陕北特委。1935年11月刘德等叛变,支队番号撤销。

18.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支队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支队在安定县(今子长县)成立,队长高步仁,政委拓嘉祯。1935年3月,十支队编入陕北游击队第一纵队。

19.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七支队

1934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七支队(延川十七支队)成立,队长杨兴元,政委高志安。支队隶属中共陕北特委领导。

20.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二团

1934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在清涧东区小马家山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二团,团长郭玉人,政委马万里,参谋长马三。二团下辖四个连,300余人。1935年1月,红二团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

21.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

1934年7月,中共陕北特委在陕北十多支游击队的基础上,成立了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9月,总指挥部撤销,组建陕北红军第一、二、三团。1935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的指示,中共陕北特委将红一、二、三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朱子休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团及陕甘宁晋军政干部学校。1935年9月,红二十七军、二十六军和从陕南到陕北的红二十五军合编成红十五军团,红二十七军编为十五军团八十一师。红二十七军从建立到编入红十五军团,巩固和发展了陕北根据地,同二十六军一起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当局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1935年2月后,在刘志丹领导下,红二十七军、二十六军联合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当局对西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先后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六座县城,巩固和扩大了西北苏区,迎来了先期长征到达的红二十五军。

22. 中国工农红军神府独立三团

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成立后,其第三团在神

(木)府(谷)一带活动。由于神府苏区距陕北苏区中心区域较远,部队不便统一指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将其改称神府独立三团。团长先后为温治恭(王进修)、王兆相、贺伟、刘明山,政委先后为杨文谟、张汉武、毛凤翔、陈景堂。全团下辖三个连。1936年7月,神府独立三团编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独立第一师。

23.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五团

1935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六、第十五支队在佳县张家山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五团,团长王士杰,副团长李启贤,政委慕生忠,参谋长樊文德,全团下辖三个连,100余人。不久,红五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三团(原三团改称神府独立三团)。

24.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六支队

1935年2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六支队在安定田家翠宣布成立。支队长先后为王生贵、常在贵,指导员刘明金。下辖两个班,十三四人,主要活动在安定与安塞交界地带。同年底,十六支队编入红二十八军第四团。

第五节 川陕根据地陕南苏区军事组织

1. 川陕边区游击队

1932年12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抵达城固县小河口镇。在红四方面军帮助下,将程子文领导的川陕边交通游击队与刘典章领导的游击队合并,组成川陕边区游击队。伍述甫、刘绪金担任领导,全队六七十人。1933年2月13日,游击队编入红二十九军。

2. 红四方面军陕南第一游击大队

1932年12月11日,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帮助下,中共陕南特委在城固升仙村何家祠堂成立了红四方面军陕南第一游击大队,大队长张仁俊,副大队长胡哲,政委王燮,全队120余人。游击大队主要活动于城固、留坝、南郑、洋县边界一带。1933年1月下旬,第一游击大队在国民党城固县民团重创下失败。

3.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精神,中共陕南特委从1932年春即

开始红军游击队的组建工作。同年12月,红四方面军进军川陕边界,在其帮助下,陕南特委收编了西乡县的几股民团和“神团”,于西乡城固边境地区组建了川陕边区游击队,张正万任司令,陈浅伦任政委,程子文任政治部主任。全队共1000余人。1933年1月6日,中共陕南特委作出关于《扩大西乡城固边新苏区创建红二十九军的决议》。1月中旬,川陕边区游击队更名为红二十九军游击支队。2月13日,陈浅伦、李艮在西乡县私渡河主持召开军政大会,宣布红二十九军游击支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陈浅伦任军长,李艮任政委,程子文任政治部主任。全军下辖两个团及一个教导大队,共2000余人。第一团团团长刘绪金,政委杜润芝,第二团团团长储茂章,政委陈忠山,教导大队大队长黄朝海。军部驻西乡、城固交界处的马儿岩祖师庙。隶属中共陕南特委领导。红二十九军成立后,经过大小20余次战斗,创建了西乡、城固边游击根据地。4月1日,张正万与国民党军队相勾结,发动叛乱,致使在马儿岩开会的红二十九军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陈浅伦、李艮、孟芳洲、杜润芝、程子文等牺牲,制造了震惊陕南的马儿岩事变。事变后,被红四方面军派往红二十九军任军政治部主任的刘瑞龙收集失散人员200余名,进入川陕省赤北县楼房坪区(今西乡境内),随后改编为隶属于红四方面军的陕南游击队。

4. 红二十九军第二游击大队

1933年3月中旬,红二十九军第二游击大队在城固县斗山唐仙观成立,大队长杨维三,政委王燮。大队下辖3个中队和1个政治宣传队,60余人,长短枪40余枝。同年4月马儿岩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汉中绥靖司令部派出大批军队“围剿”第二游击大队。第二游击大队为了保存实力,决定由杨维三、王燮、胡哲各带领一部分力量,分别转移到南褒西南区、洋县谢村、马畅和城固县文川、原公等地分散隐蔽。

5. 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

1933年4月红二十九军遭受马儿岩事变后,中共陕南特委于5月28日在洋县谢村镇成立了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大队长杨维三,政委张明远。下辖三个中队及侦察队、通讯队,大队有近百人,枪五六十枝。同年9月,陕南特委将第三游击大队改编为红二十九军独立第三团。1934年1月8日,独立第三团与活动于勉县的红二十九军第四游击大队合并,重新编为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大队长杨维三,政委傅剑寒。不久,第三游击大队在勉县元墩子遭当地民团伏击而失败。

6. 红二十九军第十游击大队

1933年6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第十游击大队在洋县西区良马寺成立,大队长何儒,政委朱曼青,队员70多人。隶属中共陕南特委领导。后第十游击大队在与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会合途中,在城固水础河受到国民党城固县民团的阻击,撤回洋县隐蔽。

7. 陕南县游击大队

1933年9月,中共陕南县委、陕南县军区指挥部在陕南县赤化区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了陕南县游击大队,大队长康洪由,政治指导员刘定发。游击大队下设3个班,队员最多时达130多人。1934年11月,游击大队在青鹤观与当地民团作战中失利,队伍被冲散,部分队员坚持活动到1935年2月,编入陕南年工作大队,随红三十三军参加长征离开镇巴。

8. 红二十九军独立第三团

1933年9月,中共陕南特委将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改编为红二十九军独立第三团,团长杨维三,政委陈文华。全团300多人,枪百余枝。隶属中共陕南特委领导。11月20日,独立第三团遭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及地方民团重兵“围剿”,受到重大损失。1934年1月8日,独立第三团余部在勉县南区脚草沟与红二十九军第四游击大队会合,重新编为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

9. 红二十九军第四游击大队

1933年12月25日,红二十九军第四游击大队在勉县黄沙玉皇庙成立。大队长王卓玉,政委傅剑寒,副大队长卢黄轸。队员60多人,隶属中共陕南特委领导。1934年1月8日第四游击大队在南区脚草沟接应红二十九军独立第三团后,与之合编为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

10. 红二十九军第七游击大队

1934年2月1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第七游击大队在洋县南区黄安乡成立。大队长翟日融,政委张景仁,队员60余人。隶属中共陕南特委领导。七大队成立后,因除掉恶霸王维钧,遭国民党军队四处围追。为防止发生意外,大队长翟日融离开洋县,一部分队员转移到南(郑)褒(城)西南区与赵华轩、陈小平领导的游击队合并,仍称红二十九军第七游击大队,赵华轩任队长。1934年10月18日,赵华轩、陈小平被国民党陕南地方当局逮捕杀害,七大队停止活动。

第六节 鄂豫陕根据地军事组织

1.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属红四方面军建制,1931年10月,以红四军第十二师和部分地方红军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邝继勋任军长,王平章任政委。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西移,红二十五军一部和红二十七军一部在11月重建红二十五军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34年12月红二十五军主力3000余人进入陕西商洛地区,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此更名为鄂豫陕省委,领导红二十五军,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省委兼有红二十五军党委的职能,其主要领导成员除徐宝珊外,均在军内兼职,随军实施领导。1934年12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在洛南县蔡川进行整编,将原辖的4个团缩编为二二三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全军约2000人,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徐海东任副军长,戴季英任参谋长,郑位三任政治部主任。在鄂豫陕省委领导下,红二十五军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7月,中共鄂豫陕省委得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向北行动的消息后,决定红二十五军到西北苏区会合西北红军,配合红军主力行动。8月下旬,吴焕先在战斗中牺牲,省委决定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政委。9月16日,红二十五军和西北苏区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在延川县永坪镇会师。17日,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红二十五军改编为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师长张绍东,政委赵凌波。

2. 抗捐第一军

1934年12月下旬,中共鄂豫陕省委派手枪团政委宋兴国等人到洛南、商县、丹凤三县边界地区开展地方工作,在成立中共商洛特委的同时,成立了抗捐第一军,司令刘实通,副司令岳新明,政委宋兴国。第一军下辖四个大队,300余人,隶属中共商洛特委领导。第一军主要活动于景村、洛源、古城一带。1935年1月,抗捐第一军因遭国民党军队袭击而失败。

3. 鄂陕第五路游击师

1935年1月中旬,鄂陕第五路游击师在镇安县白塔杨家岭成立,毛仪彬(红枪会首领)任师长(后孙光),白明俊任政委。下辖一、三、五团,共100余人,主要活动于镇安县的店埡子、米粮川、两河一带。2月,鄂陕游击总司令部

成立,五路游击师归其领导。

4. 鄂陕第九路游击师

1935年1月16日,鄂陕第九路游击师在山阳县九甲湾成立,师长阮开科(红枪会首领),政委李洪章。主要活动于山阳唐家河、白马塘一带。2月,鄂陕游击总司令部成立,九路游击师归其领导。

5. 鄂陕第六路游击师

1935年1月22日,鄂陕第六路游击师在湖北郧西县二天门地区成立,叶忠让(红二十五军干部)任师长。该师200余人,主要活动于郧西县一、二、三天门和山阳县南宽坪一带。2月,鄂陕游击总司令部成立,第六路游击师归其领导。

6. 鄂陕第三路游击师

1935年2月上旬,红二十五军军部以蔡玉窑、文公岭战斗中缴获的武器装备陕西蓝田、柞水边的抗捐军,组成鄂陕第三路游击师,由红军干部汪世才任师长,李志英任政委,隶属鄂陕边游击总司令部。初有200余人,下设四个连,后发展到500余人。主要活动于商县、柞水、镇安、蓝田等县边界。1935年10月6日在陕西商南碾子坪编入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

7. 鄂陕第四路游击师

1935年2月18日,鄂陕第四路游击师在山阳县袁家沟口成立,农民首领阮英臣任师长,中共山阳西区区委书记夏云廷任政治部主任。隶属鄂陕游击总司令部领导,下设四个中队,共400余人。主要活动于山阳袁家沟口、牛耳川等地。

8. 鄂陕第七路游击师

1935年2月中旬,鄂陕第七路游击师在镇安县西沟河由抗捐军改编而成,阮仕春(后余德心)任师长,张祖祥任政委。隶属鄂陕游击总司令部领导。全师200余人,活动于镇安、山阳、郧西边等地。

9. 鄂陕游击司令部

1935年初,红二十五军在鄂陕交界一带对一些农民“打富济贫、除暴安良”的自发组织进行收编改造,于2月间在湖北省郧西县二天门成立了鄂陕游击司令部,司令陈先瑞,政委先后由郭述申、戴季英、郑位三担任。鄂陕游击司令部隶属中共鄂陕特委领导,下辖三路、四路、五路、六路、七路、九路等六个游击师和蔡玉窑游击队、茅坪游击队,主要活动在山阳、镇安、柞水、旬阳和

湖北郧西等十余县的边界地区。同年10月,鄂陕游击司令部和豫陕游击师合并,组成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

10. 华阳游击队

1935年3月,华阳游击队在洋县华阳街成立,队长张进朗,副队长魏文建,指导员洪颜科。下辖三个排,七八十人。隶属中共鄂豫陕省委领导。游击队主要活动于洋县北部。同年7月,华阳游击队随红二十五军主力长征。

11. 茅坪游击队

1935年3月,茅坪游击队在洋县茅坪成立,队长李炳银。隶属中共鄂豫陕省委领导。部队最多时曾发展到300余人。同年5月,茅坪游击队受挫后,余部编入红二十五军。

12. 豫陕游击师

1935年5月,豫陕游击师在洛南县庾家河(今属丹凤县)成立,师长方升普,政委曾焜。下辖一、二、三、四等四个大队,主要活动在洛南、商南、丹凤及河南的卢氏、西峡等县的边界地区,隶属中共豫陕特委领导。同年10月,豫陕游击师与鄂陕游击司令部合并,组成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

13.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七十四师

1935年8月,中共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向西北根据地进发,留在鄂豫陕根据地的中共鄂陕特委、豫陕特委同鄂豫陕省委中断联系,(省委于7月25日、30日给鄂陕、豫陕特委的两封指示信,落入国民党手中未能收到),同时两个特委之间也失去联系。8月底9月初,鄂陕、豫陕两特委都从国民党报刊上得悉省委已率领红二十五军到达陇东。为保存力量,避免被敌各个击破,两特委便向一起靠拢,于9月9日会合于商南县梁家坟。两特委在此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在宁陕、佛坪边开辟新根据地;将鄂陕、豫陕两特委合并,成立中共鄂豫陕特别委员会(亦称陕南特委),统一领导鄂豫陕边的革命斗争,书记郑位三;合编各自领导的游击武装,组成红七十四师。梁家坟会议后,中共鄂豫陕特委主要领导成员分头在鄂陕、豫陕边收拢武装力量和伤病员。10月16日,在商南县碾子坪正式成立了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政委李隆贵,副师长兼参谋长方升普。师下辖一营、二营、手枪团,全师约700人。

红七十四师建立后,在鄂豫陕苏区的广大区域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巩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6年5月,特委对七十四师进行整编。整编后七

十四师下辖第四、五、六团、补充团,达1300余人。西安事变发生后,红七十四师奉命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商州,抵御亲日派进攻西安。1937年2月,中央军委命令中共鄂豫陕特委率红七十四师从商县移至镇安、柞水、宁陕三县驻防,开展抗日救亡活动。8月,红七十四师奉命开赴三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

14. 宁佛游击大队

1935年12月,宁佛游击大队在宁陕县四亩地成立。张绍安、汪世才、方升普先后任大队长,罗明义,刘鉴挺、曾焜先后任政委。宁佛游击大队隶属于中共宁佛工委领导,主要活动于宁陕、佛坪、周至三县交界地区。部队最多时曾发展到800多人。1936年12月编入红七十四师。

15. 宋登贤抗款抗捐军团

1936年4月,红七十四师在宁陕县东江口瓦子沟将宋登贤领导的农民武装改编为抗款抗捐军团,团长宋登贤。抗捐军团三四百人,主要活动于柞水、长安、宁陕边界地区。同年12月,抗款抗捐军团编为红七十四师补充团。

第七节 西北根据地军事组织

1. 西北军委与前敌总指挥部

1935年2月7日,刘志丹主持在赤源县冯梢塆村召开军事会议,宣布正式成立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一说谢子长),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5月1日,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在赤源县白庙岔会师,总兵力达3000多人。同时,西北军委决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白坚任政治部主任。在前敌总指挥部指挥下,两军紧密配合,艰苦转战,歼灭大批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相继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边六座县城,取得了西北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这一时期,西北根据地有大小不等的40多支游击队,共3000余人,各县还普遍成立了农民自卫军。这些地方武装积极配合主力红军作战,支援前线,镇压反动势力,为保卫苏区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为配合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西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西北军委决定把陕北地区的十余支游击队进行整编,分别称为陕北游击队第一、二、三、四、五、六纵队,统一指挥,协同作战。1935年9月,陕甘晋省委建立后,改组了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1935年

11月,中央下寺湾会议决定建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原西北军委自行解体。

2.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五支队

1935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五支队(米脂十五支队)在吴堡成立,队长高尚乐。隶属中共西北特委领导。同年5月,十五支队编入陕北游击队第二五纵队。

3.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纵队

1935年3月,为配合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西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把陕北游击队第一、十支队合编为陕北游击队第一纵队,纵队长高步仁,政委刘明山。一纵队主要活动在米脂、横山等县,策应神府独立三团的斗争。同年10月,第一纵队编入米西游击师。

4.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纵队

1935年3月,西北军委将陕北游击队第八、十三支队合编为陕北游击队第三纵队,纵队长先后为陈世恩、牛刚、王子长,政委先后为惠艾深、黄振邦、魏国良。第三纵队主要活动在靖边、横山等县,并向长城以外发展。同年10月,第三纵队编入米西游击师。

5.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五纵队

1935年3月,西北军委将陕北游击队第四、五、六、十四等支队合编为陕北游击队第二五纵队,纵队长郭玉人(兼)、政委先后为马万里(兼)、王再兴。主要活动在佳县、吴堡、绥德等县,配合红二十七军活动。同年8月,第二五纵队扩编为战斗团。

6. 陕甘边区直辖区赤卫军总指挥部

1935年4月,陕甘边区直辖区赤卫军总指挥部在甘泉县柳河渠湾村成立,总指挥刘金声,副总指挥王继之,参谋长陈德福。下设三个赤卫军大队,七八百人。同年10月,指挥部撤销。

7.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十支队

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十支队在陕北任家砭成立,队长宜立功,指导员陈克功。

8.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十一支队

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十一支队在陕北郑家砭成立,队长先后为王志杰、贾兰枝,政委许培仁。

9. 抗日义勇军陕甘骑兵第一师

1935年5月,中共神府工委决定将投诚的史文华部正式改编为抗日义勇军陕甘骑兵第一师,并派王兆相等十余名干部加强该师的政治工作。史文华任师长,王兆相任政委。同年6月,史文华率旧部投靠了国民党高桂滋部。

10. 新编西北抗日义勇军

1935年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帮助宜川县建立了宜川赤卫队、宜川第十支队、宜川第一支队。同年6月,中共西北工委派高岗到宜川,将以上三支游击队合编为新编西北抗日义勇军,黑志德任司令员,赵正化任政委,杨开德任副司令员。7月,西北抗日义勇军改称宜川十支队。

11. 陕甘边红军第二路游击师

1935年7月,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骑兵团在宜川太留村附近将宜川第十、十一、十三支队,延长十八支队、延安四支队、甘泉六支队合编为陕甘红军第二路游击师(后改称第四路游击师),司令员邵凤林,政委杨凤岐。下设一、二、三、六、十、十八、十九支队,共600余人。同年10月下旬,红军第二路游击师改编为红宜独立营。

12.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

1935年9月16日,程子华、徐海东率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9月17日,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在延川永坪镇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十五军团下辖七十五师(由红二十五军改编而成,师长张绍东,政委赵凌波,参谋长毕士悌。辖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七十八师(由红二十六军改编而成,师长杨森,后田守尧,政委张明先,后张达志。辖二三二团、二三四团、骑兵团)和八十一师(由红二十七军改编而成,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后崔田民,参谋长任浪华。辖二四一团、二四三团)三个师,共六七千人。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西北苏区后,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

13. 陕北第一军分区

1935年9月,中共陕甘晋省委决定设立中共陕北第一分区委员会,同时成立了陕北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白炳炘(马义),参谋长乔红(白宏德),政治部主任惠庆祺(一说杨和亭)。军分区下辖绥德、米脂、佳县、吴堡、延水、清涧等县的军事组织。同年11月,陕北第一军分区撤销。

14. 米西游击师

1935年10月,西北军委决定将陕北游击队第一纵队、第三纵队和陕北游击队第二十三支队合编为米西游击师,师长柴福俊,政委魏国亮。师下辖四个连,500余人。

15. 三边剿匪总指挥部

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三边(定边、安边、靖边)成立剿匪总指挥部,任命谢唯俊为三边特委书记兼三边剿匪总指挥。当月,西靖边苏维埃政府警卫连连长宗文耀等人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杀害了谢唯俊等十余名领导干部和游击队骨干,三边剿匪总指挥部遭到破坏。

16.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①

1935年冬,中央军委西北办事处决定将陕甘省的一部分地方武装统一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军长萧劲光,政委朱理治,归陕甘省委和中央军委西北办事处指挥。该军下辖二五五团、二五六团、二五七团,共900余人。军长萧劲光兼任陕甘省委军事部长,率该军活动在陕甘边界一带。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二十九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直属炮兵营。

17.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

1935年12月,中共西北军委为进行东征,以陕北地方红军1200余人组成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二十八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

18. 关中特区司令部

根据中央决定,1936年1月关中特区司令部成立,司令员江华,政委贾拓夫,属中共陕甘省委领导。下辖淳耀第六支队、第九支队和第八支队,赤水独立三营、赤水第十二支队、第十三支队,永红保卫队和甘肃境内的新正武工队、新正独立二营,宁县一支队,新宁十八支队、十九支队、二十支队、二十一支队、新宁独立一营等游击队。3月,由于东北军进犯,司令部主要领导成员撤回陕北,留汪锋等人原地坚持斗争,又恢复了关中司令部。5月,中共陕甘省委撤销后,关中司令部划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司令员汪锋,政委习仲勋。1936年12月,司令部又划归新成立的中共陕甘省委领导,司令员张仲良,政委习仲勋。1937年4月,司令部划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辖淳耀、赤水两

^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西境内建立有两个红二十九军,一在陕南,二在陕北。

县的保安大队和新正、新宁县的游击队。10月,关中特区司令部改为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

19. 陕东抗日游击支队

1936年2月,为配合主力红军东征,巩固和扩大西北苏区,中共陕甘省委在成立陕东特委时,将富县独立营、宜川独立营和东府游击支队第二支队合编,成立了陕东抗日游击支队,郭子青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支队政委,曾征任支队长。隶属中共陕甘省委领导。主要活动地区为黄龙、韩城、澄城、合阳等县的交界地区。同年4月,游击支队一部编入红二十九军,其余在当地开展游击活动。

20. 神府独立四团

1934年9月,原神府三支队改编为红三团后,又建立了新三支队。1936年4月,新三支队随红二十八军渡河东征,迅速发展至100余人,装备也有较大改善。中共神府特委当即决定将红三支队改编为神府独立四团,团长王兆相,政委贺伟。下辖两个连,一百六七十人。同年7月,神府独立四团编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独立第一师。

21.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①

1936年春,中共西北工委将陕北地方红军一部编为红三十军,军长阎红彦。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三十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直属工兵营。

22. 神府红军临时总指挥部

1936年4月,为统一指挥神府地区的武装力量,中共神府特委决定成立神府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郭宝珊任总指挥,刘明山任副总指挥,毛凤翔任政委。同年6月,郭宝珊率部离开神府后,临时总指挥部进行调整,王兆相任总指挥,张秀山任政委。神府红军总指挥部先后下辖郭宝珊团、红三团、红四团及吴堡、米西两个独立营。同年8月,红三团与红四团合编为中国抗日人民红军独立第一师,神府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撤销。

23.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陕甘独立师

1936年4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陕甘独立师在甘肃环县曲子镇成立,师长姚喆,政委先后为李志民、黎林,参谋长尹国赤。隶属中央军委西北办事处和中共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领导,下辖一、二、三、四团。1937年8月,陕甘独立

^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西境内建有两个红三十军,一是陕南红三十军第一纵队,一是陕北红三十军。

师番号取消,所属部队编入八路军三五九旅。

24. 关中红军司令部

1936年5月,由于东北军进犯关中地区,中共关中特委和关中特区司令部撤离时,成立了关中红军司令部,司令江华,政委贾拓夫。下辖第一团、第二团(由赤水、新宁、新正等三个独立营改编而成)。同年6月,红一团和红二团编入红军陕甘独立师。

25. 陕甘南路军指挥部

1936年夏,陕甘南路军指挥部在洛河川成立,曹力如任总指挥,欧阳钦任政委,隶属中共陕甘工委领导(陕甘工委归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领导)。指挥部下辖三个独立营和十余支游击队,主要活动于甘泉、中宜、富县、甘洛等县的边界地区。同年冬,指挥部与陕甘工委同时撤销。

26. 东地区游击司令部

1936年6月,红军主力西征后,国民党军趁机侵占了陕西省东部和南部的清涧、绥德、延川等县的部分地区。在此情况下,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成立陕北东地区游击司令部,领导陕北东地区的游击战争,保卫陕西省中心区域的安全。游击司令部先后由黄罗斌、慕生忠、赵启民任司令员,下辖吴堡、绥德、清涧、延川、延长、宜川、红泉等县的军事组织。1937年春,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国民党军队陆续撤离陕西省东部地区,东地区游击司令部随即撤销。

27. 中国抗日人民红军独立第一师

1936年7月,中共神府特委以神府独立三团、四团为基础,组建了中国抗日人民红军独立第一师,王兆相任师长,张秀山、王宝珊先后任政委。独立师先后下辖3个步兵团和1个骑兵团,共1000余人。抗日战争爆发后,独立第一师编入八路军一二〇师,开赴晋西北抗日前线。

第八节 其他军事组织

1. 韩城赤卫队

1932年5月初,中共韩城县委在上官庄召开扩大会议,宣布成立韩城赤卫队,大队长徐岱云,政委高德辉。下辖3个中队,100余名队员,配合红军陕甘游击队在韩城一带活动。11月,政委高德辉被国民党当局杀害,队长徐岱

云离韩,赤卫队停止活动。

2.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第一纵队

1934年2月22日,国民党安康绥靖军中的中共特支领导该部60余名官兵举行起义,在安康西药王殿山下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第一纵队,袁作舟任纵队长,王辛德任政委,王泰诚任纵队指挥。2月28日,第一纵队在紫阳县境内被国民党军队包围,战斗失利后分散隐蔽。

3. 陕甘边抗日联军

1936年10月,在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领导下,张庚良、刘庚等在乾县铁佛寺发动保安中队起义,成立了陕甘边抗日联军,司令员张庚良,政委兼参谋长刘庚。抗日联军下辖3个大队及1个特务队,共300余人,主要活动在麟游山区和西兰公路附近。同年12月,抗日联军遭国民党军队“围剿”,分散隐蔽。

4. 澄城县抗日救国牺牲团

1936年12月,中共澄城县委宣布成立抗日救国牺牲团,团长杨兆春,副团长张坤生,共200余人。牺牲团宗旨是拥护张学良、杨虎城抗日救国八项主张,武装民众,团结抗战。12月21日,该团30多人参加了澄城县保安大队起义,武装声援西安事变。30日,起义部队失败,抗日救国牺牲团被迫解散。

5. 蓝田人民抗日义勇军

1936年12月25日,蓝田抗日义勇军在蓝田县孟村成立,大队长屈光,副队长赵子侃,政治指导员胡达明。义勇军有队员30余人。不久,赵伯平代表中共陕西省委将游击队改编为蓝田抗日救国自卫军,旋又更名为蓝田抗日义勇队,大队长陈志正,副大队长赵子侃,政治指导员屈光。1937年2月,抗日义勇军随红十五军团北上淳化整训。4月,省委宣布撤销其建制。

6. 临潼抗日义勇军支队

1936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派刘庚到临潼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1月,刘庚在领导成立临潼各界抗日救国会的同时,在新丰镇组织成立了临潼抗日义勇军支队,支队长刘庚,队员百余人。不久,抗日义勇军支队在与地方恶霸杨秀之武装作战之后,开赴泾阳县云阳镇,加入红军。

7. 陕南游击纵队

1935年12月,国民党陕西警备第二旅四团九连在长安引驾回起义,进入秦岭山区后,改编为陕南游击纵队,何振亚任纵队指挥,苗鸿鑫任大队长,李伯亭、徐海山先后任副大队长。1936年8月,陕南游击纵队改编为陕南人民

抗日第一军。

8.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

1936年8月,陕南游击纵队在镇安改编为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何振亚任军长,杨江任政委,沈敏任军委主席,杜瑜华、沈启贤先后任参谋长,徐海山任政治部主任。部队下辖四个支队及特务队、侦察队、少年先锋队,共1000余人,隶属中共西北特支领导。1937年2月,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编入红十五军团。

第五章 革命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和陕西边界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经过几年浴血奋战,先后建立了渭北根据地、陕甘边根据地、陕北根据地、川陕根据地、陕南苏区、鄂豫陕根据地及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联在一起形成的西北根据地。西北根据地是十年土地革命时期,全国惟一仅存的一块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第一节 渭北革命根据地

渭北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由中共渭北地区党组织领导创建的根据地。它以三原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包括富平、耀县、泾阳、淳化、高陵、蒲城、白水等县的部分地区,总面积750平方公里,人口4万多。1928年5月,三原、泾阳、淳化等地农民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相继举行“交农”与武装围城斗争。1930年夏,中共陕西省委渭北巡视员黄子文与省委西路巡视员陈云樵在三原武字区组织渭北灾民自救队,杀恶差,分财物,开展游击战争。1932年3月,武字区游击队建立,4月改为游击大队,大队长孙铭章,有队员40余人。8月1日,渭北游击队在武字区成立。同月,武字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主席黄子祥,副主席唐玉怀。9月,渭北革命委员会(即原富耀革委会)在武字区成立,下设土地、军事、财政、肃反、教育等部。10月初,中共渭北特委建立。特委及渭北革命委员会领导群众建立农会,并在武

字区南原分配土地。11月9日,三原、富平、泾阳、高陵、耀县、淳化等县民团和三原、庄里、小丘的国民党驻军对武字区发动“围剿”,党、团员及干部五六十人被枪杀。12月,中共陕西省委派贾拓夫在富平恢复了中共渭北特委,不久,特委取消,成立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刘林生、刘映胜、赵伯平先后任书记。与此同时,各级党组织及渭北游击队先后恢复。1933年3月,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总指挥李平,政委金天华。7月,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团,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红四团为策应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北上,在三原、富平交界处设伏,全歼张德润民团。此时,武字区、富平等地的镇反、分粮斗争基本恢复。1933年8月,国民党渭北“剿匪”司令刘文伯调集六个团以上兵力,对渭北根据地进行“围剿”,大肆捕杀干部和群众,红四团被迫于8月上旬撤离心字、武字两区,转移至耀县照金,渭北根据地被国民党军队占领。

第二节 照金革命根据地

照金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由陕甘边党组织及陕甘边红军、游击队直接创建的根据地。1932年春,刘志丹、谢子长率领陕甘红军游击队到耀县照金地区活动。9月17日,中共陕西省委明确提出创建包括照金在内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计划。11月,陕甘红军游击队在照金发动群众,着手创建根据地的斗争,组织了芋园游击队。年底,成立分粮委员会。12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在宜君转角镇(今属旬邑)成立。在照金游击队的配合下,红二团将打击重点指向照金及其周围的国民党地方民团,战焦坪,克香山,出击旬邑、淳化、三原连获胜利。遂形成了以照金薛家寨为中心,横跨耀县、淳化、旬邑三县边界的照金革命根据地。1933年3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成立,书记金理科(后为秦武山)。与此同时,边区游击队发展到18支,900余人。为了统一指挥,3月中旬成立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李妙斋(后由黄子文、吴岱峰接任),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兼政委(后由张秀山接任)。4月5日,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兔儿梁召开,选举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副主席习仲勋,下设土地、粮食、肃反、经济、文教等委员。在红二十六军的配合下,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委会及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

领导群众没收地主、富农和祠堂、寺庙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摧毁国民党保甲政权，建立了照金、香山、芋园、桃曲源、马栏川、七界石、老爷岭等区、乡、村革命委员会。1933年8月，红二团南下失败后，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陈家坡主持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王泰吉（后由刘志丹接任），下辖红四团、耀县游击队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1933年9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刘文伯部乘主力红军西征旬邑之机，纠集耀县、旬邑、同官（今铜川城郊区）等县民团向根据地发动进攻。根据地党、政、军领导率部突围，到甘肃与主力红军会合，照金根据地被国民党军队占领。1934年，照金苏区逐步恢复。

第三节 陕南革命根据地

陕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随着川陕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而由中共陕南特委领导创建的根据地。1932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的指示，中共陕南特委扩大会议决定加强农村工作，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陕南新苏区。同年8月，中共陕西省委派陈浅伦回汉中，改组陕南特委，陈浅伦任书记。陈回汉中后，与堂兄陈明伦等一起在西乡廷水、贺家山、私渡河一带，以办“神团”为名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斗争。同年12月，红四方面军进驻西乡。12月17日，陈浅伦在西乡钟家沟同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红四方面军派刘绪金等人同陈浅伦赴骆家坝组建了川陕边区游击队，任命“神团”头子张正万为司令，陈浅伦为政委，程子文为政治部主任。1933年1月，中共陕南特委作出关于《扩大西乡城固边新苏区，创造红二十九军的决议》。同时，陕西省委派李良、杜润芝、孟芳洲等领导骨干相继抵达西乡城固边区，开展创建红军和根据地工作。1933年2月13日，陕南特委根据陕西省委和红四方面军的指示，将川陕边区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九军，军长陈浅伦，政委李良。红二十九军创建了西乡城固边区革命委员会（后改为苏维埃政府，孟芳洲任主席）和南城褒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张书行），面积550平方公里。在根据地内没收了地主土地、财物分配给贫苦农民。4月1日，由于张正万与国民党军队勾结，发动反革命叛乱，致使正在马儿岩开会的党、政、军领导人陈浅伦、李良、杜润芝、孟芳洲、刘绪金等60余人牺牲，红二十九军遭到失败。此后，中共陕南特委又先后组建了红二十九军第二、第三、第四、第七、第十等游击大队，继续坚持武

装斗争。

第四节 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

川陕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和川陕边人民群众共同创建的根据地。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60余万军队,对包括鄂豫皖在内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10月,红四方面军冲破“围剿”,撤离鄂豫皖根据地。11月5日,先头部队从商南赵川入陕,在白鲁础建立了区苏维埃政府。1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入川,连克通江、南江、巴中等县城。12月29日,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在通江成立,主席邝继勋。1933年2月7日,中共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共川陕省委,书记袁克服。2月中旬,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成立,主席熊国炳。经过红四方面军的浴血奋战,到1935年2月,川陕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了2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管辖区域东起川北城口县,西抵嘉陵江畔,南起川北营山、渠县,北至陕南镇巴、西乡、南郑、宁强、勉县,总面积42000多平方公里。川陕根据地各级苏维埃政府普遍建立了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物,分给贫苦农民。川陕根据地陕南苏区的县一级党组织和政权主要有,中共陕南县委和陕南县苏维埃政府、中共宁强县委和宁强县苏维埃政府、中共阳平县委和阳平苏维埃政府、勉县苏维埃政府、南郑县苏维埃政府。陕南苏区共辖有22个区、镇,320个村庄。陕南苏区的县及区党组织机构比较健全,设有书记、秘书和组织、宣传、妇女等部,并设有少共县委、妇女委员会、贫农团、儿童团等群众组织。1935年2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向川陕苏区发动进攻,红四方面军撤出陕南向川康边界转移。川陕根据地陕南苏区人民在红军撤离后仍坚持斗争,直到解放。

第五节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省委、陕甘边特委领导创建的革命根据地。1931年9月,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进入陕北。不日,改为陕北游击支队。11月初,陕北游击支队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汇合。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派荣子卿、谢子长等人到部队加强领导。1932年1

月,中共陕西省委将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12日,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下辖3个大队,400多人。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红二十六军成立后,按照中共中央创造与发展陕甘新苏区的指示精神,以耀县照金为中心创建陕甘边根据地。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成立,同时成立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4月,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成立,主席周冬至,副主席习仲勋。在特委和革委会领导下,根据地军民进行了土地改革。同年6月,国民党军队围攻照金根据地,杜衡违背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决定红二团南下,创建渭(南)华(县)蓝(田)洛(南)根据地,结果部队被打散。7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将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陈家坡主持召开陕甘边区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领导红四团、耀县游击队及王泰吉率领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10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及地方民团乘红军主力西征转入外线作战之际,对照金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照金失守。11月3日,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决定撤销临时总指挥部,成立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11月7日,红四十二师成立,下辖红三团、红四团及后来建立的红一团、二团、西北抗日义勇军。1934年2月25日,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南梁重建,主席习仲勋。革委会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军事、文化等委员会。5月,中共陕甘边特委恢复。11月,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会议宣布成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在此前后,陕甘边根据地先后建立了华池、庆北、合水、新正、永红、新宁、酃西、酃甘、正旬邠、安塞、赤安、中宜、定边、肤甘、红泉、赤川、靖边、淳耀、赤水等县苏维埃政府(革委会)。1935年2月,中共陕甘边特委、陕北特委在安定(今子长县)周家塬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和武装力量。谢子长牺牲后,西北红军在刘志丹的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数万军队的“围剿”,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使陕甘、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后来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第六节 陕北革命根据地

陕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省委和陕北特委领导创建的革命根据地。1927年10月12日,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等共产党员发动了清涧起义,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1928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成立。1931年9月,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来到陕北。不日,将晋西游击队改为陕北游击支队。11月上旬,陕北游击支队在甘肃南梁与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汇合。1932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成立。翌年改编为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到1934年7月,陕北特委先后建立了八支游击队,红色区域迅速扩大,并出现了大片的巩固区。1934年7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成立,下辖一、二、五支队。到1934年冬,陕北红军游击队已发展到26个支队,为建设一支正规红军打下了坚实基础。1935年1月,中共陕北特委将陕北红军各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至此,中共陕北党组织领导的武装力量有主力红军一个师,先后下辖五个团和几十支游击支队。随着武装力量的不断扩大,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也迅速发展起来。1935年1月下旬,陕北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安定召开,宣布成立陕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副主席崔田民、霍维德。下设土地、粮食、劳动、财经、文教等部及保卫、贸易两局。根据地内各县苏维埃政权也纷纷建立,先后建立的有赤源、秀延、仲远、延安、横山、清涧、吴堡、绥德、佳芦、延川、延水、靖边、米东、米西、神木、府谷等县苏维埃政府(革委会)。在根据地内进行了土地分配。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以后,统一领导陕北、陕甘两块根据地和武装力量,并粉碎了国民党数万军队的“围剿”,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使陕北、陕甘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后来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第七节 神府革命根据地

神府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神府根据地以神木为中心,包括府谷、佳县、榆林部分地区,总面积40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14万。在中共陕

北特委领导下,1933年神木就建立了20多个党支部,党、团员发展到200多人;府谷党员约有140多人。1933年10月中旬,神木南区特务队成立。11月,特务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红三支队成立后,领导群众打击豪绅地主,没收其财物分给贫苦群众,使游击队影响迅速扩大。1934年3月,中共神木县委成立。中共神木县委成立后,加强了对红三支队和群众工作的领导,在各地建立了贫农团、赤卫队、妇女会、少先队等组织,开辟了一块可以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红色区域。9月,府谷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七支队。后神府地区又先后建立了二十一支队、十一支队、六支队,各区成立了特务队。1934年9月18日,红三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三团。同日,神木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主席呼子威,副主席王恩惠。11月7日,神木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仍为呼子威。在此前后,建立了六个区的苏维埃政权及各乡、村的基层政权。苏维埃政府建立后,领导苏区群众开展了土地分配运动;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清除陈规陋习;发展生产和商业;兴办文化教育;建立群众组织,管制土豪劣绅。1935年初,国民党军队对陕北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先后调动5000余人,由府谷、佳县分进合击,苏区受到严重损失。5月,中共神府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成立。这一阶段,由于工委负责人决策失误,致使苏区大部分地区无法公开活动而转入隐蔽斗争。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决定成立中共神府特委,书记杨和亭。1936年3月,刘志丹率红二十八军进入神府根据地,配合红三团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神府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4月,神府特区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神府特区抗日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乔钟灵。7月,中国抗日人民红军独立第一师成立。到1936年底,神府特区先后建立了神木、佳芦、府谷3个县委和榆林、赤绥、神城、佳北四个工委及神木、佳芦、府谷、榆林、佳北5个县级革命委员会及其所属的区、乡政权。1937年4月,神府特区与国民党八十四、八十六师谈判,达成了停战协议,结束了神府地区的内战,进入了联合抗日的新时期。

第八节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共鄂豫陕省委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领导创建的根据地。根据地以商洛为中心,包括湖北郧县、

郧西,河南卢氏、西峡、淅川,陕西洛南、商南、丹凤、商县、山阳、镇安、柞水、蓝田、长安、宁陕、佛坪、洋县、旬阳等县的中心地带或边界地区。1934年12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长征进入陕西洛南县。12月10日,鄂豫皖省委在丹凤县庾家河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改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随后,红二十五军主力向郧西、洛南、卢氏、蓝田等地出击,号召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12月下旬,中共商洛特委和抗捐第一军成立。1935年2月,中共鄂陕特委和鄂陕游击总司令部成立。4月上旬,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山阳成立,下辖镇安县、五星县苏维埃政府及山阳县苏维埃筹备处。5月中旬,中共豫陕特委和豫陕游击师成立,同时成立了中共山阳西区区委和华阳、茅坪等游击队。在中共鄂豫陕省委领导下,红二十五军和各路游击师、游击队、赤卫队在鄂豫陕边区的广大区域内,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到1935年夏季已开辟出东起河南卢氏、西峡、淅川边,西至陕西佛坪、洋县边,南起湖北郧县、郧西和陕西旬阳边,北至陕西长安、蓝田边的一大块根据地。在镇安、柞水、山阳、郧西、旬阳、洋县、商南等全县或部分地区进行了土地分配。1935年7月,鄂豫陕省委得到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后,决定率红二十五军北上西北苏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并留鄂陕、豫陕两特委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继续坚持斗争。中共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后,中共鄂陕、豫陕两特委于9月9日在商南梁家坟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合并两特委为中共陕南特委,统一领导鄂豫陕边的革命斗争;合编各武装力量,成立红七十四师。中共陕南特委率领红七十四师在鄂豫陕边的广大区域内,坚持游击战争,先后取得了青铜关、华阳、双石铺等战斗的胜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陕南特委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率红七十四师驻防镇安、柞水、宁陕,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8月,红七十四师开赴三原,编入八路军一一五师。而根据地的党组织和人民仍坚持革命斗争直到全国解放。

第九节 西北革命根据地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陕甘边、陕北两个苏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根据地,也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仅存的一块根据地,是中共中央和三大主力红军长征的落脚点。1935年2月至1937年2月,西北革

命根据地经历了由中共西北工委、中共陕甘晋省委和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三个阶段。1935年6月,西北红军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使陕甘、陕北两个苏区连成一片,苏区范围扩大到北起长城,南至淳化、耀县,西接环县,东至黄河的广大地区。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与西北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永坪会议后,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撤销,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三支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中共陕甘晋省委成立后,没有建立统一的政权机关,陕西省苏维埃政府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依然分别领导着两个苏区、29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组织。红十五军团成立后,立即投入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先后取得了劳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此时,根据地内发生了错误“肃反”事件,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参与创建西北根据地的领导干部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一些共产党员和干部被诬陷错杀,根据地内处于恐慌状态,而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却有增无减,西北根据地陷于危机之中。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及时制止了错误“肃反”,释放了刘志丹等一大批被关押的干部。西北根据地进入了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阶段。11月,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配合作战,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中共中央到陕北后,重新调整了西北根据地的行政区划,将西北根据地分设为陕北、陕甘两个省和神府、关中、三边三个特区。1936年5月又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新辟的根据地内设立了陕甘宁省,统由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领导。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中旬成立了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西北根据地相继改称为陕甘宁特区、陕甘宁边区。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第六章 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西北红军和苏区的不断壮大和发展,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蒋介石集团调集军队向陕甘边、陕北及西北苏区发动数次“围剿”。在党组织的领导

下,根据地广大军民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殊死斗争,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

第一节 陕甘边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一、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1. 1933年4月的反“围剿”斗争

1933年4月下旬,国民党陕西当局调集正规军四个团及六个县民团的兵力,分四路“围剿”照金苏区。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及红二十六军二团举行联席会议,部署反“围剿”斗争。会议决定特委、游击队总指挥部、边区革委会领导群众和游击队在苏区坚持斗争,红二十六军二团转入敌后吸引敌人,寻机歼灭。会后,红二十六军二团转战旬邑、宁县、宜君等地,一路破敌,捷报频传。坚守苏区的军民团结一致,以灵活机动的战术袭击敌军,不断取得胜利,迫使敌人“围剿”草草收场。

2. 1933年9月的反“围剿”斗争

国民党军队多次围攻照金苏区的失败,引起国民党最高当局的震惊,蒋介石数次电令西安绥靖公署派重兵“围剿”照金苏区,限期攻克薛家寨。1933年9月下旬,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派刘文伯部一个步兵团、一个炮兵营,并纠集耀县、淳化、旬邑、宜君、同官等县民团,再次“围剿”照金苏区。此时,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失败,王泰吉率领的西北抗日民众义勇军、耀县游击队和在渭北根据地组建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在外线游击,边区游击队主力也在老爷岭、绣房沟一带同敌作战,苏区中心薛家寨仅有边区革委会保卫队留守。在战斗激烈时,苏区修械所、被服厂、红军医院的干部、工人纷纷拿起武器投入战斗。正在危急时刻,李妙斋、张秀山率游击队主力从绣房沟赶回,进行猛烈反击,取得薛家寨第一次保卫战的胜利。在此次战斗中,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中弹身亡。

10月12日,以国民党军孙友仁部为主力,集合毗邻照金的几县民团数千人,乘主力红军再次出征之机,携带大炮、重机枪等重武器,从黄陵、宜君、旬邑、淳化边界开始向照金苏区发动更大规模进攻。边区领导机关率领游击队、红军后勤人员奔向各处关隘,全力扼守,激战五天五夜,敌军连连受挫。

18日,敌军由叛徒陈克敏带路,乘夜从后岷岷旁边的一条石缝攀登上寨。次日凌晨,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边区党、政、军领导决定保存实力,分路突围。一路由张秀山、吴岱峰率领向党家山方向突围;一路由秦武山、惠子俊、刘约三带领,向黑田峪方向突围。边区领导机关除留下一部分游击队在照金地区坚持战斗外,率其余部队北上甘肃,与主力红军会合,开始了以南梁地区为中心继续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斗争。

二、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1. 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以南梁为中心区域的陕甘边根据地发动的“围剿”

1934年2月至4月,国民党军队对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其部署是:驻守庆阳的仇良民团、王子义团和谭世麟部合围红军和苏区;驻耀县的特务团,驻旬邑的何高侯团,驻洛川的冯钦哉部一个团及驻延安的张瑞卢团,陈兵相机堵截红军。红四十二师党委分析敌情后,制定了以第三路游击队牵制和袭击南线之敌,红四十二师率部到外线打击敌人的战略方针。2月,红军主力从耀县出发,相继攻打了耀县瑶曲,宜君石板、五里镇,黄陵店头等地。3月上旬和中旬,红军采取声东击西战术,袭击了保安蔺家砭,消灭国民党军一个营。接着奔袭甘肃元城高桥、赵梁子的敌军与民团。4月2日,红四十二师在合水西华池抓住有利战机,全歼“围剿”主力王子义团的两个营及1个机炮连,共歼敌700余人。

西华池战斗后,红四十二师南下支援第三路游击队作战。先后取得了三里原、和尚原、瓦子川战斗的胜利,迫使已窜入南梁的仇良民团和谭世麟部狼狈退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取得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2. 1934年10月,陕甘边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1934年10月,国民党再次部署了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围剿”。国民党军兵分六路,采取分兵蚕食的战术,逐步向苏区中心区域推进。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分析敌情后决定,留少数游击队配合赤卫军与敌周旋,主力部队转移敌后,寻机歼其一路,以打乱国民党军的进攻计划。首先红军骑兵团在吴堡川打了一个伏击战,随后红二团和骑兵团相继袭击了芦方坪张廷芝部和敌骑兵二团。11月16日,红军骑兵团和庆阳游击队又奔袭环县曲子镇,击毙敌区长朱文成,活捉民团团总李恒泰以下近百名。其他各路国民党军在红军和游击队的打击下,为保存实力亦纷纷撤退。国民党军分路蚕食苏区的计划破产。

第二节 陕北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1934年5月,国民党驻防陕北的井岳秀第八十六师在各县民团配合下,发动了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军事“围剿”。在绥(德)清(涧)中心地区,国民党军在清涧县城、高杰村、河口、店则沟等地驻扎军队,修筑寨堡,组织保甲,建立反革命据点,烧杀抢掠,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共清涧城区区委书记周继丰、霍建国、惠金瑞,高杰村区委书记白志强、白振纪、党员惠志儒,绥德县委书记崔文运等壮烈牺牲。在国民党军疯狂进攻面前,中共陕北特委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一面号召广大群众坚壁清野,一面集中力量开展游击活动,保卫红色根据地和革命成果。7月8日,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谢子长兼任总指挥,郭洪涛兼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总指挥部成立后即以第一、二、五支队为主力,在200多名赤卫队员的配合下,于7月17日攻入安定县城,打开监狱,释放了近百名被监禁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7月下旬,谢子长率陕北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和赤卫大队南下陕甘边,与红二十六军会合于南梁。两军在阎家洼子召开了连以上干部联席会议,决定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北上配合陕北游击队作战,以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8月,谢子长率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和陕北红军返回陕北根据地,17日首战安定县西区景武家塔,歼国民党军八十六师一个连。8月22日在绥德县张家圪台全歼八十六师两个排。8月26日在清涧县河口击溃八十六师一个连和一部分反动民团,残敌于27日在清涧国民党军接应下弃镇逃跑,清涧以南大片地区获得解放,排除了红军向延川发展的障碍。谢子长亲临河口前线指挥,中弹负伤。

与此同时,活动在神(木)府(谷)、佳(县)吴(堡)地区的第三、四、六支队也积极开展活动,不断打击国民党军。根据地军民经过三个多月的浴血奋战,终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第三节 西北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一、西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1935年初,蒋介石调集陕、甘、宁、晋的国民党部队六个师及各县民团约

五六万人,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为了合力抗击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1935年2月5日,建立了中共西北工委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委,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实行统一领导。

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成立后,即以全力领导根据地的党政军民积极开展反“围剿”斗争,并在反“围剿”中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国民党对西北根据地第二次“围剿”的部署是:井岳秀第八十六师五个团,由北而南对神木、府谷、佳县、米脂、横山、靖边、保安等县的农村进行“清剿”;马鸿宾第三十五师七个团,由西往东对合水、华池、庆阳的农村进行“清剿”;高桂滋第八十四师四个团,由南向北对延安、延长、延川、清涧、安定、绥德的农村进行“清剿”;晋军第七十一师陈兵黄河东岸,其二〇六旅已西渡黄河占据了吴堡、绥德一线。蒋介石还派出参谋团驻在绥德县城,协调各部行动,采用分区“围剿”,围堵结合,驻点修堡,合并村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办法,妄图把西北根据地的工农武装力量消灭。为彻底粉碎这次“围剿”,西北军委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兼任总指挥,高岗兼任政委,并于2月28日发出反“围剿”动员令。

在西北军委的领导下,统一指挥西北根据地的主力红军和地方军事组织,展开了反“围剿”斗争。主力红军是第二十六军和第二十七军,两军有六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总兵力三四千人。根据地有大小40多支游击队,约有3000人,各地还普遍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在陕甘边苏区有陕甘边直辖区赤卫军总指挥部、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新编西北抗日义勇军、红军第二路游击师,在陕北苏区有陕北游击队第一、第二五、第三纵队、神府独立第三团等。经过一段分散的战斗准备,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的主力,于5月1日会师于赤源县白庙岔,万余军民举行联欢大会,刘志丹在讲话中号召两支红军互相学习,加强团结,配合作战,用枪杆子打出根据地的新局面来。5月7日在吴家坪、吴家寨歼国民党军八十四师五〇〇团一部,击毙营长郭子封以下50余名,俘副营长以下550余名;缴获长短枪600余枝、轻机枪36挺。5月9日在马家坪再歼五〇〇团一部,击毙营长左向恒以下40余名,俘副营长以下450余名及逃亡地主和“铲共义勇队”百余名,缴获长短枪450余枝、轻机枪27挺、重机枪两挺、八二炮两门、单军服2000余套、银币2万余枚,医药和医疗器械八大驮及其他辎重。5月10日解放了安定县城和延川重镇永坪镇。安定县城是西北根据地首次解放的一座县城。

5月10日,中共西北工委在玉家湾举行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向南出击,在

运动中歼灭敌人,解放陕甘边苏区和陕北苏区之间的国民党统治区,把两个根据地联成一片。5月20日红军主力南下,在张家圪台歼灭国民党军八十四师四九九团一部,击毙连长以下20名,俘150名,缴获长短枪150余枝、轻机枪16挺。5月30日攻克延长县城,俘国民党延长县长董松寿和骑兵连长,击毙民团总指挥李鸣吾,共毙伤俘450余名,缴获长短枪400余枝、轻机枪15挺、无线电台一部、战马170余匹、银币15万枚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延川县城守军八十四师二五〇团一营和反动民团逃往清涧,红军于6月1日一弹未发解放了延川县城。

红军主力相继解放安定、延长、延川三座县城后继续南下。6月15日在延安县高桥镇击溃国民党一个连,俘二十余名。击毙延安民团总指挥李汉华,缴获长短枪二十余枝。6月20日解放安塞县城,国民党安塞县的新任和卸任县长均被俘获。6月22日攻克安塞县反动据点李家塌,缴获长短枪200余枝,23日经革命法庭公审处决了几名罪大恶极的反动头目。红军主力经短暂休整,又北上靖边一带。靖边县城守军是八十六师五一二团的第二营,加上县保警队、民团共约600余人。6月28日红军攻克靖边县城,击毙国民党军营长屈志鹏,俘国民党靖边县长、民团总指挥、肃反会主任、警察局长、县党部书记长等头目五人,共毙伤俘1600余名,缴获长短枪550余枝、七五炮两门、八二炮两门。在红军的威慑下,保安县城和金佛坪的两营国民党军弃城逃窜,保安县城于7月1日宣告解放。

红军主力解放靖边、保安后又挥师东进。7月17日与国民党八十四师的三个营激战于绥德老君殿,歼灭一个营,打伤团长艾捷三。8月11日打开晋军二〇六旅一个连固守的慕家原寨子,12日打援又获胜,共歼四个连。8月21日与晋军正太护路军第三旅激战于定仙塬,打死打伤副团长齐汝英以下200余名,俘1800余名,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其中有八二炮6门、重机枪12挺、轻机枪50余挺、长短枪1900余枝、骡马80余匹。9月11日奔袭横山县城,虽已占领城外各制高点和南关,但未能攻入城内。这次奔袭战虽未达到原来的目的,但迫使国民党八十六师收缩兵力,减轻了国民党军对神府工农武装的压力。

在红军主力由北到南,从南向北,再南下东进,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的同时,西南线和北线的作战亦取得胜利。在西南线,红二十六军一部和游击队拔除反动据点50余处,歼灭国民党军千余名,缴获长短枪千余枝,骑兵团还一

举攻入长武县城,处决了国民党县长和县党部书记长。在北线,中共神府工委率领神府独立第三团和游击队积极寻机作战,歼敌 500 余名,缴获各种枪 400 余枝。

在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指挥下,西北根据地的军民奋战七个多月,取得了辉煌战绩。以 7 月 1 日前连克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实现陕甘边苏区和陕北苏区联片为标志,粉碎了国民党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又为粉碎国民党已经开始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作了准备。新设立了陕甘边东区革命委员会和西靖边、肤甘、合水、中宜、子长、延长、延安等县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红军的实力大大增强,总兵力四五千人,武器装备也较前大有改善。

二、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

1935 年 7 月,国民党军队又对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其兵力部署是:北面为国民党军八十四师和八十六师的四个旅,长城外还有傅作义的一个骑兵师,西北的陕宁交界一线是马鸿逵的三个骑兵团;西南面是东北军的八个师;东面是晋军七十一师和正太护路军三个旅。蒋介石自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的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指挥 15 万大军“围剿”西北革命根据地。当时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指挥红军主力乘隙与之作战,先后在慕家原、定仙塬、横山等地予其以沉重打击,并迎来了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在西北根据地的会师和红十五军团的成立,增强了反“围剿”的军事力量。红十五军团辖三个师,总兵力六七千人。地方武装设有陕甘边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陕北第一军分区、神府独立第三团、米西游击师及各县游击支队。

红十五军团经过半个月的战前准备,于 10 月 1 日至 12 日,即取得了崂山、榆林桥战役的重大胜利。红十五军团对崂山战役的部署是,以一部佯攻甘泉县城,以大部埋伏在延安至甘泉之间的崂山梢林地带待歼延安南下援甘之国民党军。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一〇师师长何立中于 10 月 1 日率部增援甘泉,于崂山被歼,何中立被击毙、伤其 2000 余名,俘 4000 余名,缴获长短枪 5000 余枝、轻机枪 180 挺、重机枪 24 挺、七五炮四门、八二炮 24 门、无线电台四部。战后清查战利品时,从东北军之文电中得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已到甘肃的通渭、静宁地区,有进入陕北的迹象。中共陕甘晋省委和红十五军团即确定部队继续南

下打富县、洛川,牵制国民党军力量,迎接中央红军进陕北。

崂山战役的胜利对国民党军震动很大,驻守瓦窑堡之国民党军于10月2日仓皇逃往绥德县城。安定地方红军和游击队在其逃跑途中歼灭一个连,俘获赤源、延川、秀延、延安等地逃亡地主、恶霸200余名。至此,安定县全境解放。10月12日,红十五军团攻克国民党军驻守的富县榆林桥据点,全歼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〇七师三二〇团四个营,俘团长高福源。10月19日,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吴起镇后,将尾追的国民党军三个骑兵团全歼一个、击溃二个。11月下旬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并肩作战,取得直罗镇战役的全胜,歼一〇九师两个团和师直机关及一〇六师一部,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自裁,打死打伤国民党军官兵1000余名,俘5000余名,缴获长短枪3500余枝、轻机枪176挺、迫击炮八门、子弹22万发、无线电台二部。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也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第四节 神府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一、神府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斗争

神府苏区的创建和红军游击队日益壮大,使国民党当局再也不敢以“几个人,几支枪”看待。1934年9月到11月,国民党当局对神府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军事“围剿”。国民党军队采取“围堵”和“追剿”相结合的战术,以其八十六师二五八旅两个团在根据地边缘的石窑上、瓦罗、沙峁镇、新寨子、万户峪等地“围堵”;而以高锡庚、杨相枝两个营进入根据地“追剿”。

面对国民党重兵压境,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团(团长王兆相,政委杨文谟)机动果断地甩开敌人,北上直捣敌人后方。10月初,红三团突破国民党军两个营的包围线,直入府谷北区与红七支队会合。这时,红七支队已开辟了南到府谷孤山,北至麻镇、庙沟门,西抵新民镇,东接府谷县城的一小块苏区。红三团和七支队一举打进府谷北区重要集镇哈拉寨,消灭地方民团,处决了联保主任赵智,给群众平分了地主豪绅的粮食衣物,红三团也得到了一批过冬的给养。然后,红三团又巧妙地尾随“追剿”而来的国民党军两个营之间回兵南下佳县活动,再次甩敌而去。

11月下旬,国民党万户峪驻军五一二团八连中共地下党员张德超带领10

余名士兵起义,加入红三团,使国民党当局十分震惊。

两个月来,红三团利用地形熟悉,又有群众支持的有利条件,采取运动战术,同国民党军兜圈子,到处打民团、杀豪绅,使国民党军队围不住,追不上,反被拖得精疲力竭,不得不在11月底结束了第一次军事“围剿”。

二、神府根据地的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1935年初,蒋介石发动了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神府苏区也被列为“围剿”重点。国民党军队在神木城内设立了“剿共司令部”,由其八十六师二五八旅旅长刘润民担任总司令,调动三个团、一个骑兵营和一些地方民团约5000人,分别由府谷、佳县分进合击,“围剿”神府苏区;在黄河东岸保德至临县一带则由阎锡山之晋军布防封锁。战术上修堡筑点,合并村庄,编设保甲,胁迫自首,妄图以蒋介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消灭红军游击队,全部占领神府苏区。

在国民党军事“围剿”和政治瓦解的严酷形势下,神府苏区党的主要负责人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对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对反“围剿”斗争在思想、组织和行动上都没有做充分准备,离开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企图集中兵力同国民党军决战。结果反“围剿”接连失利,造成严重后果。

1935年3月22日至23日,神木县委在园条塔村召开会议。党的主要负责人坚持集中全部红军,调动大批赤卫队,攻打国民党军设防坚固的新寨子的方案,否决了多数同志提出的袭击战斗力较弱的驻花石崖国民党军骑兵的意见。3月26日,红三团及游击队400多人,党政干部200多人,赤卫队员近2000人集结在九五会村待命。由于大规模行动的消息被泄露,国民党军队秘密增加了一个连的兵力,并加固了防守工事。在对敌情变化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红军及游击队于29日拂晓向新寨子发起强攻,遂即失利,伤亡百余人,参谋长刘鸿飞英勇牺牲,干部群众情绪大受挫伤。

1935年5月初,神木县委在呼家庄召开扩大会议。根据特派员王达成的提议,决定取消特派员包揽决定一切的制度,成立神府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推选王达成任书记。为便于领导反“围剿”,将神木县委分为东、西、北三个县委。会议还决定改编原流窜甘肃、内蒙一带来到神府要求“合作”的史文华部队为中国抗日义勇军陕甘骑兵第一师(师长史文华,政委王兆相,下辖两个团)抽调16名红军干部任该师各连政治指导员等职。但时隔不久,该师

在转入外线作战中,史文华叛变投敌,带着这支武装投靠了国民党军高桂滋部。

1935年5月中旬,神府工委在白家沟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反“围剿”问题。决定乘驻太和寨的国民党军一个加强营立足未稳,发起进攻。当红三团逼近太和寨时,发现守军早有戒备,转而突袭毛家翠敌骑兵连,歼灭守军四五十人。这一胜利鼓舞了苏区军民,但形势仍然很严峻。红三团领导主张红军分散向外线作战,消灭小股国民党军。工委主要负责人却为毛家翠的胜利所陶醉,主张再打几个胜仗,扭转危局。在许家翠碾合岭召开的工委会议上,又决定进攻窟野河东国民党军据点瓦窑渠。6月19日夜,红三团在赤卫队配合下向瓦窑渠守军发起进攻。由于瓦窑渠工事坚固,防守严密,进攻失败。撤退途中又遭到瓦罗和沙岭、石窑三路国民党军夹击,红军伤亡较重。次日晚上又发生骑兵连被柴瑞欺骗的叛逃事件。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失利,苏区形势迅速恶化。

6月下旬,神府工委在何家沟、任家山连续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把红军和地方干部缩编为200人左右,不带枪的战士全部遣散回家;缩编后的红军和地方干部分为9个小分队,到各区自行游击;红十一支队过黄河在山西省兴县一带活动。

三、神府苏区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

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决定建立中共神府特委(书记杨和亭)。在中共神府特委领导下,神府苏区不断恢复和发展,红三团在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从1935年11月下旬开始,国民党孙长胜部晋绥骑兵旅对神府苏区南部和佳芦地区进行了第三次“围剿”。红三团采取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术,主动寻机消灭国民党军。1936年1月,在申家里击溃孙长胜部骑兵一个连,消灭常备队员数十人,俘50人,缴枪50枝,马20余匹;接着在乔家辿击溃驻陈家坪守军一个连。2月,袭击榆林香水梁民团,歼敌30余人;在佳芦县刘国忠村附近(今属神木县万镇乡)消灭万镇民团20多人。3月中旬,在九翠击溃驻沙岭骑兵连;在毛谷川截获“反共义勇队”运送的一批军衣、弹药等。红军连续打击使国民党军龟缩在据点里,不敢轻易出动。

1936年3月间,中央指示刘志丹、宋任穷率领红二十八军北上支援神府苏区反“围剿”斗争后渡河东征。3月20日,红二十八军进入神府地区,在桃柳沟

消灭国民党军一个排,缴获一批物资。21日,又在杨家塬和红三团一起消灭在该村抢粮的国民党军两个连,俘虏100多人。慑于红军两次战斗的胜利和红二十八军的声威,驻花石崖、太和寨、汉路子沟、龙尾峁、乔岔滩、安崖等据点的国民党军,纷纷逃回高家堡和神木城。3月24日,红二十八军包围了驻沙峁镇孙长胜旅的三个连,第二天该军乘隙逃走。驻瓦罗、栏杆堡、石窑的守军闻讯逃回府谷。至此,神府苏区基本恢复,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

四、神府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

1936年9月至11月,国民党当局对神府特区发起了第四次“围剿”。国民党军以晋军七十二师陈长捷部的四个团为主力,八十六师的两个团、一个骑兵营以及一些地主民团等配合,另调八十六师一个团到府谷,共计一万多兵力,南北夹击,密集推进。

10月1日,神府特委在阎家山召开会议,提出了“向南作战,先打晋军”的正确方针。部署中国抗日人民红军独立师(1936年8月1日建立,辖两个团及三个直属连)打击外线国民党军队,独立三营和游击队在内线各自为战,伺机截击小股敌人和破坏敌人交通;同时,动员广大群众坚壁清野,围困敌人。

10月中旬,阎锡山之晋军进犯到万镇、花石崖、乔岔滩一带,战线拉长,兵力分散。独立师乘隙进入敌后,首战泥河沟,歼灭晋军一个排;又在苏泥家打伏击战,消灭敌人两个连。随后独立师一团在王寿梁连续破坏敌人交通,歼敌100多人,迫使晋军放弃高新庄、衙院沟、任念功等据点;二团在万镇山上截击了敌人一个运输队,缴获驮骡30多头和一批大米、白面。各县、区独立营和游击队在本地打击牵制敌人的同时,也伺机绕到敌后破坏交通,不时出击。

由于傅作义在绥远(原为省治,1954年3月撤销,其辖区划入内蒙古自治区)对日作战,陈长捷部被撤回山西,由晋军二〇九旅段树华部进驻佳县通镇一带。府谷的国民党军因佳县封锁线被红军游击队突破,也被迫退出苏区。11月底,独立师在乔岔滩围点打援,消灭了乔岔滩民团和高家堡援军,使国民党军侵占的佳芦苏区大部分得到恢复,第四次反“围剿”又告胜利。

五、神府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1937年1月至4月,国民党陕、晋当局乘神府苏区与党中央联系中断之机,对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情况还不知悉之际,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八

十四师师长高桂滋任“剿共”总指挥,纠集该师李少堂团和史文华骑兵营、晋军段树华旅4个团、八十六师两个团和一个骑兵营近2万人,由佳县、米脂、榆林一线向北进犯,企图将神府地区红军压进一个狭小地区加以诱降或武力消灭。

神府特委虽然不了解西安事变的详情,但基于坚持自卫的原则和统一战线的政策,在军事上动员全体军民坚决抗击国民党军队的“围剿”,部署独立师继续主动出击,打入敌人后方消灭敌人,独立营和游击队坚持原地斗争,打破国民党军“肃反清剿”的阴谋;在政治上则积极开展统战宣传,争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1937年1月,独立师一团在佳芦县薛家会村设伏,打垮国民党军队一个连,击毙连长一人,俘虏数十人。二团在王家塬伏击战中,活捉了八十六师团附苏鼎臣等十多人。

同年2月,党中央派王宝珊、杨文谟、张江全来到神府,任命张秀山为神府特委书记,杨和亭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王宝珊为独立师政委,杨文谟为参谋长。神府特委决定,根据抗日的新形势决定继续反击国民党新的“围剿”,设法取得与党中央联系,主动给国民党八十四师、八十六师、二〇九旅写信,呼吁停战,一致抗日。为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决定独立师打进国民党统治区佳县、米脂一带,通过国民党报纸报道让党中央得知神府苏区仍处在“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中。

3月20日,独立师打进国民党统治区,纵横佳县、米脂、榆林等地。天上国民党军飞机尾随轰炸扫射,地面晋军从南向北追击,国民党八十六师一个团和一个骑兵营在北边堵截,但其恐中埋伏,不敢与红军接火。独立师的远征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围剿”部署,山西国民党报纸惊呼:“共匪人马两三千,装备齐全,在佳县、米脂一带猖獗活动,国军正在围剿之中”。国民党报纸的报道,果然起了向党中央报信的作用。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西安见报后,立即向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提出严正抗议,揭露他们破坏停战协议的行径,使其被迫停止了对神府苏区的“围剿”。

第七章 红军会师在陕西

第一节 陕北游击支队与南梁游击队会师

1931年9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来到陕北,改编为陕北游击支队。10月下旬,在阎红彦、杨重远率领下,陕北游击支队和杨琪、杨鼎、师储杰等领导的保商武装,按照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到达甘肃合水林锦庙一带,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师。会师后,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装及给养问题,刘志丹等决定利用陇东军阀陈珪璋谋求扩充势力的机会,将部队暂编为陈珪璋部十一旅,旅长谢子长,副旅长刘志丹。原陕北游击队及保商武装编为第一团,团长师储杰;南梁游击队编为第二团,团长由刘志丹兼任。不久,游击队脱离陈部,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

第二节 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七军会师

1935年1月,中共陕甘边特委、中共陕北特委经过协商,并征得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委派的巡视员黄翰的同意,拟建立统一的党组织领导两个苏区的革命斗争。为此,刘志丹专程从陕甘边根据地来到陕北根据地,在赤源县水晶沟探望了正在养伤的谢子长,就建立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机构以及组织第二次反“围剿”的作战方针等问题进行研究,并取得一致意见。2月5日,两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塬召开联席会,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两块苏区的党、政、军工作。从而把原由两个特委分别领导的两个苏区,统一为由中共西北工委领导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西北军委在中共西北工委的领导下,统一指挥西北根据地的主力红军和地方军事组织。西北军委下辖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两军共有六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和一支西北抗日义勇军,总兵力三四千人。根据地有大小40多支游击队,约5000人,各地还有陆续建立的农民自卫军。

为了粉碎国民党当局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西北军委成立了前敌指挥部，刘志丹兼任总指挥，高岗兼任政委。5月1日，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于赤源县白庙岔会师，万余军民举行联欢大会，庆祝两军会师。总指挥刘志丹号召两支红军互相学习，加强团结，配合作战，用枪杆子打出根据地的新局面。两支红军会师后，在刘志丹指挥下，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第三节 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

1935年7月，中共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主力北出秦岭，威逼西安，在得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会师川西，准备北上的消息后，突破国民党陕甘当局部署的层层封锁线，于9月16日抵达西北根据地延川县永坪镇——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驻地。9月17日，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和红二十五军在永坪镇会师。三支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下辖三个师，总兵力六七千人。红二十五军改编为七十五师；红二十六军改编为七十八师；红二十七军改编为八十一师。

第四节 红军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会师

1935年9月，中共中央率领的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甘南。22日，毛泽东在岷县哈达铺召开团以上干部大会，宣布红一方面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委由毛泽东兼任），继续北上到西北根据地与刘志丹等领导的西北红军会合。

10月17日，红军陕甘支队从定边县五股掌、铁角城分两路入陕。19日抵达吴起镇，进入西北革命根据地。11月6日，红军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于甘泉县象鼻子湾会师。此时恢复了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军陕甘支队改称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中共中央在象鼻子湾召开全军干部会议，毛泽东对红军长征进行了总结，号召各红军之间加强团结，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之间加强团结，共同完成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任务。

11月20日至25日，红一方面军在富县西北的直罗镇围歼了进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东北军，全歼其一〇九师两个团及师直属队，并追歼一〇六师一个团，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给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第八章 重大事件及会议

第一节 重大事件

1. 陕北事件

1927年8月4日,长期统治陕北的地方军阀井岳秀公开“清党”反共,强行查封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聚集的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简称绥德四师)和延安省立第四中学。绥德四师的教师和学生被武装遣散回乡,进步书籍被付之一炬。延安四中校长田伯英(中共肤施县委书记)被软禁,多数教师被迫回家,学生被迫离开学校。井岳秀直接控制的榆林中学也开除了一批进步学生。榆林各地的农民协会被解散,有的负责人被逮捕,中共绥德、肤施县委被迫解体。此后,白色恐怖笼罩陕北,党、团活动转入秘密。

2. 刘含初遇难

刘含初是大革命时期陕西著名的共产党员,时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常务执行委员、西安中山学院院长。1927年7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公开反共,下令封闭西安中山学院,撤销刘含初的院长职务。后来,国民党陕西当局缉捕刘含初的消息不断传出,中共组织认为刘含初处境非常困难,不宜留在西安,决定派他去苏联学习。刘即返回黄陵老家,准备安排好家眷后赴上海转往苏联。8月14日,国民党军驻洛川旅长杨甫珊得知刘回到黄陵的消息后,派遣便衣特务四处缉捕。当特务们得知刘含初的去向后,于15日下午赶到宜君县石铺村刘的岳父家。此时,刘含初正挥笔书写“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条幅,墨迹未干,特务已闯进门来。刘含初愤怒斥敌,话音未落,枪声骤起,刘含初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3. 宣化事件

渭南宣化高级小学为中共渭南西北区委机关。而暂寄宣化办学的渭南乐育学校,在一些反动教员的把持下,常与宣化高小作对。1928年2月28日,他们纠集暴徒捣毁宣化高小,将师生强行逐出校门,并打伤数人。事件发生后,中共渭南党、团组织立即组织农民和学生,于29日驱逐了强占宣化高

小的反动分子,并将反动分子薛明璋、刘明初等打死。宣化事件后,国民党陕西当局严厉镇压群众,渭南一带许多学校被关闭,先后有40多名党员和群众被捕。共产党员、渭南中学校长王文忠、教师冀月亭被惨杀。

4. 魏野畴皖北就义

魏野畴是陕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之一。1927年8月,魏野畴应杨虎城之邀赴安徽太和,任杨部国民革命军第十军政治部主任。1928年4月8日,魏野畴和李端甫、李力果、昌绍先、杜聿德等领导皖北国民党高桂滋部与当地农民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前,中共河南省委派人到皖北,传达中共八七会议精神,成立了起义的指挥机关——皖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魏野畴任总指挥。起义首先由魏野畴、杜聿德率高桂滋部教导团600多人在阜阳城内起义,并与守敌一个团激战多时,阜阳城未能攻下,起义部队遂分两路转移,一路由杜聿德等率领,到达王官集和当地农民赤卫队汇合后,立即宣布成立皖北苏维埃政府和皖北工农红军。两天后,军阀部队及地主武装2000余人包围了王官集,起义队伍被打散,昌绍先、杜聿德牺牲。另一路由魏野畴率领,行至老集时被当地国民党第十二军任应岐部收编的土匪部队和地主武装包围缴械,魏野畴被捕,壮烈牺牲。

5. 米脂中秋节事件

1928年9月下旬,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在米脂县城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陕西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形成的《全陕总暴动计划决议案》等文件。9月28日(农历八月十五日),会议尚未开始,前来参加会议的杜衡、焦维炽、贾拓夫、李文芳等人即被国民党地方当局逮捕,会议被迫中止。贾、李二人在米脂被关押半月,杜、焦二人被押往榆林,同年12月经中共组织营救获释。史称米脂中秋节事件。

6. 中共陕西省委遭受第一次大破坏

1929年2月初,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程士诚、团省委书记马云藩先后被捕叛变,致使党、团省委主要负责人曹趾仁、李子洲、蒲克敏、刘继曾、徐梦周、李大章、刘映胜、王又章等相继被捕,党、团省委机关遭受严重破坏。省委下辖的党组织,除陕北特委及所属县委外,关中地区仅余渭南、韩城、乾县、蒲城、富平等县委。全省党员从近3000名锐减到1300多名,关中地区仅余200多名。3月1日,幸免被捕的省委委员张国藩、王林、薛永寿三人以“现存之省委”的名义,在渭南龙背乡白家庄召开渭南、华县、蒲城、富平、长安等地党、团

组织负责人会议,成立陕西临时省委,负责领导全陕党组织的工作。

7. 三道川事件

1930年夏,刘志丹、谢子长乘陇东民团军总司令谭世麟招兵买马,扩充势力之机,在其部挂名建军。刘志丹招收的人马被编为骑兵第六营,刘志丹任营长。谢子长派李力果、阎红彦等将驻宜川后九殿民团杨庚武部的周维奇营百余人拉到庆阳北部三道川(今属吴旗县),编为一个营。两部合编为一个团,团长谢子长,驻防三道川。此时,土匪张廷芝投靠了谭世麟,合谋缴了周维奇营的枪械,并袭击了团部和第六营,致使党组织刚拉起的队伍受到严重损失。

8. 太白收枪

1930年9月,在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永宁山中共支部的配合下,刘志丹和曹力如等在永宁山一带组织革命武装。28日,刘志丹率部打着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的番号,以商筹粮草为名,进驻甘肃合水县太白镇。10月1日,伺机将驻太白镇的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营长黄毓麟等击毙,收缴了该营一、三连枪支,击溃了二连,收枪50余枝,马10余匹。刘志丹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百余人的革命武装,在保安、安塞、合水一带活动。

9. 固城整编

1931年1月,刘志丹领导的百余人革命武装在保安(今志丹县)、安塞一带遭到国民党井岳秀部高双城旅的“围剿”后,转移到瓦子川。2月,刘志丹率部进驻甘肃合水固城川,与赵连璧、同守孝、贾生财等武装汇合,并在固城川麻峪村进行整顿。不日,几支队伍在固城举行大会,进行整编,刘志丹任总指挥。400多人编为4个连,卢仲祥、同守孝、赵连璧、贾生财分任连长。整编后部队进驻甘肃宁县盘克原张皮村。

10. 倒水湾整编

1931年9月,刘志丹、马锡五来到甘肃合水县倒水湾,将分散活动于合水、庆阳山区的赵连璧、杨培胜、贾生财三支武装集合起来进行整编,建立起陕甘边区中共组织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亦称陕甘边境游击队),总指挥刘志丹,军需马锡五。下辖3个大队,300余人。

11. 三嘉原事件

1931年10月下旬,阎红彦等领导陕北游击队来到甘肃南梁,在林锦庙、西华池一带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亦称陕甘边境游击队)汇合。1932

年1月初,两支部队在正宁柴桥子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参谋长杨重远。全军分为两个支队和一个警卫队。第一支队队长师储杰,第二支队队长刘志丹兼任,警卫队长白锡林。同时建立了中共队委会。

1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开往甘肃正宁三嘉原,边宣传群众,边按照陕西省委指示进行整顿。在整顿过程中,谢子长和部分领导人认为第二支队成份不纯,部队不稳。在几位主要领导对同盟军如何整顿,苏区在哪里开辟和“官兵月薪”等问题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于2月6日发生了一支队缴了第二支队的枪,并打死打伤干部战士数名的事件。事件发生后第三天晚,师储杰带领旧部百余人出走,投奔国民党部队。对于这个历史事件,党组织曾多次总结过经验教训。1985年中共中央批转的冯文彬、宋时轮同志《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中指出:“队伍成份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一部分人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2. 汉中女师风波

1932年3月初,国民党汉中当局查封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印刷的纪念三八妇女节专刊,并将女师学生刘秀珍(共产党员)和石印局老板扣押。事件发生后,中共陕南特委立即组织各校党支部,通过学生自治会发动学生罢课,动员上千名学生上街游行,抗议国民党当局无理干涉言论自由和扣押学生的行为。愤怒的学生冲进警察局,砸毁门窗和桌椅。双方谈判时,当局又扣押了学生谈判代表,并于次日逮捕了陈浅伦、郑月波等三名教师。这一行径,激起了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强烈反对。在党组织的积极营救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汉中当局被迫释放了被捕的教师和学生,并将警察局长撤职。斗争取得了胜利。

13. 四二六驱戴事件

1932年4月25日,国民党陕西省教育厅在西安民乐园礼堂召开扩大纪念周会,由国民党中央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向西安市各中学学生进行讲演。在中共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安排下,学生要求戴季陶解释中央政府

对日本侵略东北后采取的不抵抗政策时,遭到拒绝。义愤的学生向主席台投掷石子,轰走戴季陶,并烧毁了戴的汽车。会后,学生抗日总会决定举行示威游行。26日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派军警包围了各中学校门,游行学生冲出校门至王家巷时,遭到军警镇压,数十人受伤,50多人被捕。

14. 东山惨案

1932年9月18日,陕北军阀井岳秀部八十六师炮兵营工兵连中共党员张怀树、何格兰、杨德厚等六人准备举行起义,组建游击队。因叛徒出卖,张怀树、何格兰、杨德厚被井岳秀部逮捕,秘密杀害于榆林东山。

15. 马儿岩事变

1933年3月,国民党汉中绥靖司令部五十一旅进抵西乡“围剿”红二十九军,并暗中收买了混进红军队伍的原地方神团首领张正万。3月底,张正万趁红二十九军主力部队外出作战,军部机关驻地马儿岩兵力单薄,失于戒备之机,阴谋策划叛乱。4月1日,中共陕南特委与边区苏维埃政府及红二十九军领导干部40余人在马儿岩开会,研究红军扩编等问题时,遭到率部叛变的张正万的包围。红二十九军军长陈浅伦、政委李良及孟芳洲、程子文、杜润滋等人被惨杀。马儿岩事变发生后,红二十九军大部被打散,余部百余人编为陕南游击队,继续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

16. 汉中谈判

1933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与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在汉中多次进行秘密谈判。由于中共陕西地下组织的努力和陕西进步人士杜斌丞的促进,在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区后,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主动派武志平(中共党员)与红四方面军接洽。红四方面军派参谋主任徐以新前往汉中,具体谈判两军互不侵犯,共同反蒋的秘密协议。1933年6月1日,徐以新和杨虎城的代表、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举行了第一次谈判,初步达成了两军互不侵犯的原则。6月24日,徐以新再赴汉中,与孙蔚如举行第二次谈判,双方达成秘密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1)双方互不侵犯,只要陕军不进攻川陕苏区,红军保证不进攻陕西;(2)如红军去甘肃攻打胡宗南部,陕军愿给红四方面军补充一些武器弹药;(3)红军可以在汉中设立交通站。至此,红四方面军与十七路军正式确立了合作关系。此后到1934年,双方往来频繁,并通过秘密协定的履行,开辟了陕南地下党通往川北苏区的三条秘密交通线,为红军输送了大量军用物资和军事情报。

17. 红二团南下渭华

1933年5月,国民党调集四个团和旬邑、淳化两个民团的兵力“围剿”照金革命根据地。6月中旬,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二团党委在照金举行联席会议,杜衡否定了刘志丹等人以桥山中段为依托,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意见,坚持红二团南下渭华,创建渭(南)华(县)蓝(田)洛(南)根据地。6月下旬,红二团南下渭华,渡过渭河进入蓝田、商洛山区。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红二团很快被打散,损失惨重。杜衡在南下途中跑回省委,不久被捕叛变。刘志丹等失散人员经渭华地区党组织帮助,以后陆续返回照金。

18. 中共陕西省委遭受第二次大破坏

1933年7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和红二十六军主要领导人袁岳栋、杜衡、贾拓夫、高岗在西安东大街福盛楼饭馆开会,研究王泰吉骑兵团起义后的发展问题。开会期间,国民党特务尾随而至,贾拓夫、高岗破门而出,袁岳栋、杜衡二人被捕叛变。此后,袁、杜二人带领国民党特务四处抓人,大批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相继被捕入狱,关中、陕南及甘肃等地党、团组织均遭破坏。省委遭此破坏后,陕西党组织虽经多方努力,多次组建临时省委,但省委机关始终无法正式建立,直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率中共中央代表赴西安才重新恢复了陕西省委。

19. 无定河惨案

1933年7月31日,中共陕北特委委员王兆卿与毕维舟、崔明道、高禄孝四人因叛徒出卖,在米脂县镇川堡(今属榆林市)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后国民党军又派兵在米脂县城逮捕了中共党员高庆恩和王守义。国民党当局把王兆卿等六人关押在米脂县政府看守所,施以酷刑,烙铁烙,压杠子,灌辣椒水,跪火铁绳,但他们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始终没有供出陕北中共组织和党员的名单。王兆卿等被捕后,中共组织和民主人士曾组织营救,但国民党当局提前下了毒手。8月3日,国民党军以将王兆卿等六人解押绥德团部为名,将其押至米脂城南十里铺官家湾,枪杀在无定河畔。附近农民冒着生命危险,抢回毕维舟、崔明道、高庆恩的遗体,装殓安葬。

20. 九间房事件

1935年4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在柞水县九间房设伏,误将中共组织掌握的陕西警备第三旅大部歼灭,旅长张汉民等30余名秘密党员被

俘后遭错杀。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追认张汉民等为革命烈士。

21. 西北苏区“肃反”

1935年10月初,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下,中共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及陕甘晋省委在西北苏区开展了错误肃反,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关押起来,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和陕甘边区县以上干部几乎全部被捕。“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审讯中实行逼、供、信手段,致使200多人被错杀。10月19日,中共中央抵达吴起镇后,闻知西北苏区在“肃反”中逮捕了一批领导干部,立即派王首道等人赶赴瓦窑堡,向中共陕甘晋省委传达中央关于停止捕人、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的命令。随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党务委员会对西北“肃反”进行审查。11月底,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平反大会,宣布刘志丹等人无罪,立即释放,并对主持“肃反”工作的聂洪钧、戴季英予以党内处分。从而挽救了西北党、红军和苏区。

22.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

1935年9月28日中央榜罗镇会议后,中共中央即决定率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进军陕北,与西北红军会师。10月2日,陕甘支队离开通渭县城,踏上了进入西北苏区的征程。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苏区吴起镇,与地方党和政府建立了联系,从而结束了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的长征。陕甘支队在这里进行了七天休整,并取得了“割尾巴”战斗的胜利。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行动方针的报告,指出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随后,红军继续前行,10月31日到达保安(今志丹)。11月2日,中共中央到达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甘泉县下寺湾,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11月6日,红一方面军总部、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在甘泉象鼻子湾会师。11月25日,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23. 三边事件

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共三边特委,任命谢维俊为三边特委书记兼三边剿匪总指挥。同时,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派刘景范、慕生桂、崔宗山、李玉英、杨琪等人前往三边开辟工作。不料,西靖边县苏维埃政府警

卫连连长宗文耀等人突然发动武装叛乱,杀害了谢维俊等10余名领导干部和游击队骨干,使刚刚组建的三边特委遭到破坏。

24. 中国共产党与杨虎城的谈判

为实现与国民党西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目的,1935年11月,南汉宸遵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派申伯纯到南京会见杨虎城,向其介绍了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的精神,建议双方合作抗日,杨表示赞同。12月5日,毛泽东亲自派汪锋携带他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亲笔信,前往西安会见杨虎城。汪锋到达杨部后,三次和杨会谈,消除了杨虎城对中共的误会,沟通了中共中央与杨虎城的关系。1936年4月,由杨虎城资助去德国留学的中共党员王炳南回国,中共组织即派王到杨部做联络工作。经过多方面的工作,1936年5月,双方就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电讯联系,西北军帮助红军运送物资,红军帮助改造西北军等问题达成协议。至此中共与西北军全面合作关系确立。

25. 洛川会谈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相继侵占了东北和热河,并不断向华北地区蚕食渗透,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为制定在新形势下的政策,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举行会议,决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并相应调整了党的各项政策。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以红军将领的名义发出《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愿与东北军首先停战,共同抗日。1936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派李克农、钱之光、戴镜元等到洛川,同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就红军与六十七军抗日合作问题进行协商,达成口头协议:政治上王以哲同意中共中央《八一宣言》提出的抗日要求;军事上双方互不侵犯;经济上王以哲部开放几个口子,以利红军给陕甘宁苏区运输物资。3月5日,中共中央电令红一方面军实施协议。

26. 肤施会谈

1936年4月8日,中共中央应张学良的邀请,派周恩来、李克农从瓦窑堡启程,前往肤施(今延安)与张学良举行会谈。9日晚,张学良、王以哲、刘鼎(中共秘密党员)乘飞机到达肤施。当夜,周恩来同张学良在城内的教堂里就联合抗日问题进行会谈,具体分析了逼蒋抗日的可能性,讨论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以及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具体协定。

27. 斯诺访问陕北

1936年6月,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由北平经西安进入西北革命根据地采访。在采访中,斯诺行程3000余里,历经4个月,先后采访了毛泽东、朱德等许多中共领导人和红军高级将领及普通战士,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同年10月,斯诺离开陕北,经西安回到北平,为英美报刊撰写了许多通讯报道,介绍西北根据地的情况。1937年,斯诺将这些报道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为《西行漫记》)一书出版发行,第一次向外界客观真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状况,扩大了中国革命在国内外的影响。

28. 艳晚事件

1936年8月29日晚,张学良在西安派兵包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查抄了特务的档案。按电报韵目代日29日为“艳”日,故称艳晚事件。当晚,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实际上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的情报机关)的便衣特务在西安西北饭店逮捕了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东救”负责人宋黎。在押送途中,碰上杨虎城的宪兵巡逻队,巡逻宪兵即将宋黎和便衣特务一起带回营房。张学良闻讯后十分愤怒,立即派人将宋接回,并派军队包围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查抄了特务档案和秘密材料,缴获诬告东北军的密电和准备逮捕的东北军将士名单。事后,张学良立即致电蒋介石,说明特务所捕人员并非共产党,是一般职员,认为省党部不与他商量即擅自捕人,是对他的极不信任;同时表示,查抄省党部不无急躁鲁莽之处,“自请处分”。蒋介石对此非常气愤,认为如不设法制止事态的发展,势必演成叛乱。于是在两广事变结束之后,他于10月22日亲飞西安,逼迫张杨继续“剿共”。张、杨被“逼上梁山”,于同年12月12日发动了西安事变。“艳晚事件”是西安事变发生的直接前奏。

29. 西安“一二·九”事件

1936年12月初,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中共西北特支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决定利用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机会,由西安学联和东救、西救出面,发动西安学生举行请愿活动。12月9日,西安近万名大中小学学生举行游行,向张学良、杨虎城和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请愿。张、杨同情和支持学生的正义呼声,蒋介石却下令军警向游行队伍开枪,致使东北竞存小学一名学生被击伤,引起学生的强烈愤慨。会

后,广大学生徒步去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得知后,一方面调派武装宪兵在十里铺一带严阵以待,准备屠杀群众;另一方面给张学良打电话,令其设法制止。张学良得知这一消息后,深知学生如到临潼,一定会发生流血惨案。他立即驱车追赶,在灞桥追上了学生队伍,尽力劝阻。学生表示不到临潼不罢休。张学良为学生的爱国激情所感动,表示:“我张学良是国家的军人,决不辜负你们的救国心愿,决不欺骗大家,一星期之内我以事实作答复。”学生随之返回城内。这次事件对促成西安事变的发生起了重要的作用。

30. 西安事变

1936年,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在西北苏区“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过程中屡遭失败,同时张、杨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与红军停止了交战,并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介石拒绝了张、杨的要求,调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逼迫张、杨进攻红军。12月上旬,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张、杨在多次要求联共抗日被拒绝后,于12月12日发动兵谏,在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逼蒋联共抗日,并通电全国,提出了旨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救国主张。史称西安事变,亦称双十二事变。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扩大内战,乘机夺取蒋介石的权力。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应张、杨之邀派周恩来、秦邦宪等到西安调停。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下,蒋介石接受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同意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派各界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方针等条件。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31. 国共两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

1936年12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应张学良、杨虎城之邀到达西安,参加西安事变的和平谈判。周恩来等先与张学良、杨虎城分别进行了会谈,建议应争取团结抗日的前途,并确定了双方与蒋介石谈判的五项基本条件。23日上午,谈判正式开始,宋子文代表南京方面,张、杨代表西安方面,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三方就具体问题进行了谈判。中共代表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六项主张:(1)停战,撤兵至关外;(2)改组南京政府;(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5)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6)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张、杨赞成六项主张。宋子文也表示基本同意并答应转达蒋。同日下午,三方举行第二轮会谈。宋

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抗日战争开始后再改造为抗日政府。双方就过渡政府的具体人选交换了意见,原则上取得一致。但在何时放蒋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谈判无结果。24日上午,三方举行了第三轮会谈,达成了九条协议,基本上同意张、杨在事变后发出的八条通电,也承认了中共、红军、苏区的合法地位。同日下午,周恩来单独会晤宋子文,宋表示希望中共能成为他抗日、反对亲日派的后盾,主动要求中共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同日晚,周恩来说明了中共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同意中共代表提出的六项主张,但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协议。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返回南京。至此,谈判结束,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32.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东北军撤离延安。16日,江华奉周恩来之命率陕北红军一团进驻延安,并建立了城防司令部,司令员白志文,政委江华。1937年1月13日下午,中共中央进入延安,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从此,延安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总后方,也成为当时进步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到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中共中央在延安达十年零两个月。

33. 二二事件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蒋介石回南京后,背信弃义,软禁了张学良。东北军中以张学良警卫团团长沙铭九、东北军政治处处长应德田等为首的少壮派表示蒋介石如不释放张学良,就不惜与南京政府决一死战,并在军中发起了主战的签名运动。但东北军中以王以哲、于学忠、何柱国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将领则认为与南京政府决一死战只会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所有努力尽付东流,全国抗日的大局将遭破坏,因而主张用和平的方式与蒋说理,迫其放张。主和派的言行引起了少壮派的不满。1937年2月1日晚,孙铭九、应德田等秘密开会,商定了立即枪杀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的计划。2日,孙铭九等主战派军官,以请吃饺子为名,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部分军官骗至家中,封锁院门,宣布刺杀王以哲、何柱国的所谓“除奸”计划,诬称王、何二人“准备投靠蒋”,并立即派人执行。王以哲在家中被杀,宋学礼、蒋斌、徐方三位军官亦于同日被害。刺杀何柱国的人员因被杨虎城申斥,未敢动手。事后,经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努力劝阻,多方斡旋,才稳定了局势,避免了东北军内部更大规模的相互残杀。

34. 国共西安谈判

1937年2月中旬至3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等就国共合作、中共的地位、红军改编、苏区改制、西路军等问题进行了会谈。谈判的中心是红军改编和苏区政权改制问题。红军改编问题,共产党提出红军改编成四个军、12个师,建立某路军指挥部,设正副总司令,后来中共又主动提出红军改编为四个师,每师1.5万人。在陕甘宁苏区改制问题上,中共代表主动提出取消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承认三民主义,承认国民党南京政府在全国的领导地位等。双方经过激烈争论,曾一度达成某些对中共比较有利的,基本上可以接受的协议。协议规定:中共承认、服从三民主义的国家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国民政府分批释放共产党员,共产党在适当时候公开;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红军驻地改为陕甘宁行政区,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呈中央政府任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军事委员会及蒋委员长之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补充,统照国民革命军同等待遇,各级人员由自己推选,呈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政训工作由中央派人联络;中共在政治上可参加国民大会,在军事上可参加国防会议等等。但是,此协议上报南京后遭到无理扣压,并被大肆修改。周恩来等愤而返回延安,有关重要问题要求面见蒋介石谈判解决,西安谈判遂告结束。

第二节 重要会议

1. 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

1927年9月26日至28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西安红埠街9号召开。耿炳光、李子洲等15人出席了会议。会议传达、讨论了八七会议决议和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会议通过了《接受中央八七决议案及其指示之决议案》和以反冯为中心的九个决议案,提出党到农村去,在土地革命政纲之下,加紧农村阶级斗争,准备总暴动,创造农协政权。会议正式改选了省委,耿炳光任书记。

2. 共青团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

1927年10月1日至2日,共青团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西安召开。张金印、程士诚、曹趾仁、王鸿俊、李畅英、段希贤等16人参加了会议。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李子洲、刘继曾出席会议并分别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省委第

一次扩大会议的各种决议和陕西共青团目前工作决议案,决定团的工作重点转入农村,团结广大青年反对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及一切新旧军阀。会议选举产生了共青团陕西省委员会,张金印为书记。

3. 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全体会议

1927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讨论了政治形势、健全组织及加强各地党、团工作等问题,通过了《两月来之工作回顾及政治问题决议案》,重申农民是陕西革命的主力军。

4. 中共陕西省委第二次全体会议

1927年12月7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根据团省委的意见,通过了重新修改的《两个月工作回顾及政治问题决议案》和重新起草的《K·M·T问题决议案》^①。

5. 中共陕西省委第三次全体会议

1928年1月4日晚,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依据中共中央文件精神,总结以往工作,错误地认为省委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机会主义的指导,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决定予以改组,撤销耿炳光省委常委、书记职务。

6. 中共陕西省委第四次全体会议

1928年1月5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调整省委领导成员,潘自力为代理省委书记。

7. 中共陕西省委第五次全体会议

1928年2月13日至14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大纲草案》及中共中央致陕西省委的第九号公函,通过了《陕西CP目前工作方针》。决定陕西党目前工作的总方针是:发动群众开展从经济到政治的斗争,使工农群众自发的暴动尽快高涨,由局部暴动汇合成全省的总暴动,造成陕西割据局面,以至建立全省的苏维埃政权。会议同时讨论了前省委书记耿炳光致省委常委会的信,认为其中有些意见是正确的,决定予以采纳。

^① K·M·T为国民党的英文缩写。

8. 中共陕西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

1928年2月18日至19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省委《政治报告》和《党务报告》;审查批准了省委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陕西 CP 目前工作方针》。会议决定在组织上自下而上的改造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在斗争中发展党的组织。会议选举潘自力、张金印、王松年三人为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陕西代表,在潘自力等离陕期间,由省委常委李子洲、徐梦周、刘继曾、候补省委委员张振海、团省委代表曹趾仁五人组成省委临时常委会负责党的工作。

9. 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8年4月中旬,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绥德苗家坪南丰寨(今属子洲县)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杜衡、焦维炽、杨国栋、冯文江、李文芳、柴培桂、赵通儒、景仰山、师应三等十余人。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和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精神,讨论通过了关于政治、组织、农运、青运以及陕北政治形势与当前任务等决议案,选举产生了中共陕北特别委员会,书记杜衡、组织兼农运委员冯文江、军事委员杨国栋、宣传委员马瑞生(未到职)、青年委员兼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焦维炽,候补委员白明善、赵通儒。特委机关设在米脂县城。

10. 中共陕西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

1928年6月13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在西安召开,省委委员和各地主要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全陕总暴动计划决议案》,要求各地继续组织暴动。会议改组了省委,常委潘自力(书记)、蒲克敏(宣传)、李子洲(组织)、杜衡(职工委书记)、曹趾仁(团省委书记)。

11. 共青团陕西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

1928年6月下旬,共青团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曹趾仁、李畅英、程士诚、杜松寿、马云藩、罗承运、王文彬等参加。会议总结了全省武装暴动的经验,部署了今后工作,并选举曹趾仁为团省委书记。

12. 中共陕西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

1929年1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在富平美原小学召开。会议学习讨论了中共六大有关文件和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根据六大精神,初步检查了省委在领导组织各地武装暴动中的失误,总结了经验教训。鉴于省委书记潘自力被捕入狱,会议选举曹趾仁为省委书记。

13. 共青团陕西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

1929年1月下旬,共青团陕西省委在蒲城县荆姚小学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六大和共青团五大会议精神,讨论革命低潮时期陕西团的工作任务。会议改选了团省委,选举马云藩为团省委书记。

14. 中共陕北特委张家岔会议

1929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西川张家岔(今属子洲县)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共陕西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大会接受了六大决议,承认革命形势暂时还处于低潮,在陕北还没有立即开展苏维埃运动的条件,目前党的工作是进一步加强农民运动,巩固好学校阵地,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安排党、团员到国民党军队中去,争取武装力量,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会议对特委代理书记杨国栋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评,但仍决定由其代理特委书记,增补白明善、霍世杰为特委委员、常委,选举谢子长为特委军事委员。会后,特委机关迁往榆林。

15.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第一次全体会议

1929年2月初,中共陕西省委、共青团陕西省委遭受大破坏,党、团省委主要负责人相继被捕。3月1日,省委委员张国藩、王林(王芾南)、薛永寿以“现存之省委”名义,在渭南固市召开有渭南、华县、蒲城、富平、长安等地党、团组织负责人参加的紧急联席会议,宣布成立临时省委,负责人王林,委员张国藩、薛永寿、张蔚森、徐振化、李凌云等。临时团省委书记由薛永寿担任。3月3日,临时省委就省委遭受破坏及成立临时省委情况向中共中央作出报告,称目前惟一工作是加紧职工运动,积极培训干部。并请求中央派干部来陕,成立正式省委。

16.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第二次全体会议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成立不久,原省委常委杜衡由陕北回到关中。同时,去中央送信的马子敬也由上海回到西安,并带回中央要陕西党团组织派代表去上海汇报工作的口头指示。为此,1929年3月23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在渭南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重新调整了临时省委成员,杜衡任书记。会议确定由杜衡、王林、薛永寿三人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工作。在此期间,由徐振化在西安组织临时省委机关,联系各地组织和失散的同志。

17. 中共陕北特委红石峡会议

1929年四五月间,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城北红石峡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

议,撤销了政治上右倾、生活上腐化的特委代理书记杨国栋的职务,决定由刘志丹任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会议提出搞武装斗争可以采取白色的(做争取国民党军队的工作)、灰色的(做非法武装的工作)、红色的(组建工农革命武装)三种形式,并决定以做国民党军队工作为主,同时决定加强党对灾民斗争的领导。会后,刘志丹、谢子长等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打入陕西、甘肃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从事兵运工作。

18.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第三次全体会议

1929年7月中旬,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在渭南辛市召开。根据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会议决定今后工作主要是恢复组织,抓紧士兵和救济难民工作。会议调整了省委成员,杜衡仍任书记。会后,临时省委派人分赴陕北、陕南和渭南等地整顿、恢复党组织。

19.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第二次常委会议

1929年8月23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召开第二次常委会议,重新调整省委成员,增加薛永寿为省委常委;吉国桢为正式委员,担任陕北特委书记;张蔚森改任候补常委,负责西安市工作;刘志丹去陕北开展兵运工作,不再担任省委候补常委。会议还决定派刚回陕西的陈征前往汉中,恢复陕南地区的党组织。

20. 中共陕西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

1930年7月1日至9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在蓝田巩村小学召开。根据中共中央第七十号通告精神,会议讨论通过了政治、职工、农民、士兵、组织、宣传及共青团等七项决议案,提出陕西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和发动群众斗争,准备武装暴动,建立局部以至全省的苏维埃政权。会议决定改临时省委为正式省委,杜衡任书记。

21. 中共陕西省委全体会议(1930年7月9日)

1930年7月9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和布置各地工作。会议决定由省委常委吉国桢兼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梁益堂为陕南特派员兼中共陕南特委书记,前往陕南恢复组织;赵伯平为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张仰成为团陕北特委书记(因病未到职)。会议着重讨论了陕北工作,通过了《对于陕北工作决议案》。

22. 共青团陕西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

1930年7月中旬,共青团陕西临时省委在蓝田草坪小学召开第四次扩大

会议,贯彻中共中央第七十号通告和中共陕西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精神。会议决定改团临时省委为正式省委,选举薛永寿为书记。

23. 中共陕西省委第三次常委会议

1930年8月5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三次常委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等文件精神,认为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对政治形势估量不足,犯有右倾错误,所形成的决议应予以推翻。

24. 中共陕北特委合龙山扩大会议

1930年9月底,新任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到达绥德。与此同时,中共北方局交通杨璞与中央派来的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孔祥祯和高维翰(李杰夫)也带着发动陕北游击战争的任务到达绥德。10月初,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城西合龙山古庙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扩大会议精神和陕西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通过的《政治任务决议案》、《对于陕北工作决议案》等文件。会议决定合并党、团特委和工会、农会等组织,成立陕北行动委员会,赵伯平任行动委员会书记,谢子长、刘志丹分别担任行动委员会总指挥和副总指挥,孔祥祯任军委书记。由于会议被国民党特务侦悉,刘澜涛、张德生在疏散时被捕,部分与会委员转往绥德义合镇继续开会,决定印发张贴反抗国民党、进行暴动的标语,发动神木驻军高志清部手枪连兵变。

25. 中共陕西省委全体会议(1930年12月)

1930年12月底,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举行全体会议。高维翰传达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和北方局扩大会议精神,杜衡传达了北方局关于解决陕西工作问题的决定。会议决定接受和拥护共产国际来信,接受和拥护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决议及三中全会后中央的补充决议,通过了年关斗争工作计划。会议调整了省委成员分工,杜衡任书记兼党报编辑。

26. 中共陕西省委全体会议(1931年1月29日)

1931年1月29日至31日,中共陕西省委全体会议在渭南辛市召开。会议通过了接受共产国际来信、反对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决议案及陕西工作决议案,建议共产国际远东局召开紧急会议成立新中央的决议案。会议在讨论陕西革命形势时发生争论,杜衡、高维翰认为陕西的革命形势是高涨的,张文华、李良认为是低落的。张文华因坚持己见,被取消省委委员职务。

27. 中共陕西省委全体会议(1931年3月6日)

省委一月全会后,在对陕西斗争形势的看法上,省委内部依然存在着严

重分歧,张文华、李艮以及张国藩、刘映胜等坚持他们在省委一月全会上的意见,并提出政治意见书,反对省委一月全会决议,认为省委一月全会的决议是“立三路线的继续”,要求召开省委扩大会议解决陕西工作问题。杜衡、高维翰则认为张文华、李艮等人的意见是右倾机会主义。为此,省委于1931年3月6日在西安宋家花园召开省委全体会议,除省委委员杜衡、高维翰、焦维炽、黄平、张国藩外,李艮、刘映胜、贾拓夫、杨荫川也参加会议。杜衡、李艮分别在会上作报告,阐述各自的观点。讨论中,双方争执不下,争论难以解决。为此,会议决定派代表到上海解决省委在四中全会后中央和罗章龙领导的“非常委员会”中央之间的依从问题,同时解决陕西工作中的问题和争论。会议同时决定,省委会议后立即去各地视察,准备召开全省党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省委一月全体会议决议依然有效。

28. 中共陕西省委全体会议(1931年3月)

1931年3月26日至29日,中共陕西省委全体会议在渭南辛市召开。省委委员杜衡、高维翰、张国藩、黄平、焦维炽以及渭南县委书记李艮、共青团代表刘映胜、贾拓夫、杨荫川出席会议。会议修改了省委一月全会起草的《陕西党的目前任务与工作方针决议案》,通过了《拥护四中全会反对右派分裂党的决议案》。会议认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及产生的政治局领导是正确的。承认省委在四中全会和罗章龙非法组织之间摇摆,犯了严重的错误。会议撤销了杜衡的省委书记职务和张国藩代理常委职务,选举高维翰为省委书记兼宣传及党报委员会主席。

29. 中共陕西省委会议(1932年3月20日)

1932年3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会议,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正式红军。并指示游击队迅速向三原发展,以配合武装农民和城市的革命,夺取陕西渭北的政治、经济中心三原,建立政权,然后进攻泾阳、高陵、咸阳,截断渭河交通。同时组织凤翔一带士兵暴动,使西路灾民斗争与渭北各县的斗争相呼应,开辟以三原为中心的大片苏维埃区域。21日,省委将上述会议决定报告中共中央,并申请红军番号。

30. 中共陕西省委会议(1932年8月25日)

1932年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会议。新任省委书记孟坚传达了中共北方六省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八一指示。会议作出《陕西省委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要求创造

陕甘边新苏区和红二十六军。并决定成立中共陕甘边特委及派干部去陕南开展党的工作。

31. 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1933年3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致信红二十六军,认为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已提到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阶段”,要求立即组成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4月5日,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耀县照金兔儿梁召开,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贫苦农民代表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粮食、经济、肃反等委员会,分别由王满堂、姬守祥、杨在泉、王万亮任委员。

32. 照金北梁会议

1933年6月17日,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人在耀县照金北梁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边区工作和红二团行动计划。杜衡无视客观实际,拒绝了刘志丹、金理科等人以桥山中段为依托,发展和巩固陕甘边区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意见,主张红二十六军离开照金,南下渭华,创建渭(南)华(县)蓝(田)洛(南)根据地,并不顾省委、边区特委的反对,强令红二团南下,致使红二团陷入国民党军队重围,失败于秦岭山。

33. 中共陕北特委高起家峁会议

1933年7月23日至25日,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高起家峁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对陕北工作的指示,总结一年来的工作。特委成员及各地代表马明方、马文瑞、毕维周、王兆卿、常学恭、鲁学曾、崔逢运、高朗亭、崔田夫、崔田民、贾怀智、张达志、高长久、张岗、高禄孝、王国昌、赵福祥等20余人出席会议。马明方代表特委作政治报告,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加紧开辟安定、绥(德)清(涧)、神府三个游击区域,建立和扩大游击队,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工农政权。会议通过了陕北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组织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选举崔田夫(书记)、马明方(宣传)、毕维周(组织)、崔逢运(秘书长)、王兆卿(军委书记)、张达志(农委)、鲁学曾(团特委书记)、马文瑞、崔田民、常学恭、高长久等11人为特委委员。高起家峁会议后,陕北党组织领导的革命武装得到迅速发展。

34. 西安党、团活动分子会议

1933年7月下旬,红二十六军和陕西省委主要领导人杜衡、袁岳栋在西安被捕叛变,对陕西党团组织构成巨大威胁。8月上旬,省委委员贾拓夫在西

安召集党团活动分子开会,要求做好应付敌特破坏的准备。会议决定派贾拓夫、刘宗沛赴上海向中共上海中央局汇报情况;派高岗到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红二十六军工作;三原等县工作由刘映胜代表省委就近领导;并由张新发、省委组织干事和西安市委负责人三人组成省委工作委员会,处理一些重大问题。

35. 陈家坡会议

1933年六七月间,红二十六军在杜衡的错误指挥下,离开照金根据地,南下渭华地区,惨遭失败,照金根据地的处境十分危急。7月下旬,驻防耀县的国民党十七路军骑兵团在团长王泰吉的率领下举行起义,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之后进入照金。与此同时,中共耀县县委领导的耀县游击队和渭北游击第一大队改编的红二十六军四团也进入照金。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耀县照金陈家坡主持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秦武山、高岗、习仲勋、李妙斋、张秀山、杨森、黄子祥、张邦英、王柏栋、陈学鼎等参加。会议决定坚持并扩大陕甘边根据地,恢复主力红军,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由已恢复党籍的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一领导红二十六军第四团、耀县游击队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

36. 包家寨会议

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举行联席会议,总结开展武装斗争和创建根据地的经验教训,讨论部队改编和根据地重建等重大问题。会议决定撤销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并先建立第四十二师;开辟以庆阳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建立三个游击区,成立第一、二、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第一路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以照金为中心)。三个游击总指挥部共同以南梁为中心开展活动,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帮助各路指挥部开展游击战争。8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平定川口莲花寺成立,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同时成立了红四十二师党委,书记杨森。

37. 中共陕北特委南坵村党团联席会议

1934年1月底,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南翠村主持召开党团联席会议,郭洪涛传达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示。与会人员不同意北方代表关于“陕北特委右倾、执行富农路线,对开展武装斗争消极怠工”的错误批评和指责,决

定继续执行高起家鞏会议确定的方针,加强陕北游击队一支队,发展二、三支队,新建四、五支队,开辟新的根据地;党、团组织分设,自成体系,并建立各种群众组织。

38. 中共陕北特委神堂沟会议

1934年4月上旬,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神堂沟召开会议,听取委员们对各地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会议再次抵制了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关于“陕北党犯了富农路线错误”等不切实际的指责,决定继续发展游击战争,创建一个师的红军;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

39. 王家畔会议

1934年5月初,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王家畔召开游击队和根据地代表联席会议,传达神堂沟会议精神,交流发展游击战争和武装开辟村庄的经验。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陕北新红军与苏区的决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7月8日,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总指挥谢子长,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

40. 南梁寨子湾会议

1934年5月28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党委在甘肃庆阳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决定恢复健全中共陕甘边特委(照金根据地失守后,中共陕甘边特委不够健全,边区党的工作实际由红四十二师党委代行),书记张秀山,组织部长张邦英,宣传部长张静元。同时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副主席边金山,参谋长吴岱峰,供给部长马锡五,秘书长杨再泉。并决定杨森任红四十二师师长,高岗任政委。

41. 南梁阎家洼子会议

1934年7月下旬,谢子长、郭洪涛、贺晋年率陕北红军游击队主力转战到庆阳南梁。2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四十二师党委和中共陕北特委、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南梁阎家洼子举行联席会议,谢子长传达了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指示信。指示信对红二十六军进行了错误的批评。会议决定,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北上陕北,配合陕北游击队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撤销高岗红四十二师政委职务,由谢子长兼任。

42. 寺塬里会议

1934年8月28日,中共陕北特委在清涧寺塬里召开会议。马明方作了关于第一次反“围剿”经验教训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陕北特委《关于冲破

“围剿”决议案》，决定在游击区内正式成立各级工农政权，开展分配土地工作；进一步扩大红军，开展游击战争。会议还决定将陕北游击队一、二、三支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一、二、三团。会后，特委书记崔田夫赴天津向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汇报请示工作，要求派干部加强陕北工作，并申请红军番号以统一陕北红军的组织和领导。

43. 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

1934年11月4日至6日，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甘肃庆阳南梁荔园堡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建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会议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主席习仲勋，副主席贾生秀、牛永清，政治秘书长蔡子伟（后为张文华）。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文化、工农监察、肃反、妇女等委员会。并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军委主席刘志丹，副主席边金山，参谋长吴岱峰；赤卫军总指挥朱志清，副总指挥郑德明、梅生贵。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重要决议。7月，在荔园堡召开了有3000多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并举行了阅兵仪式。

44. 庾家河会议

1934年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丹凤县庾家河镇召开第十八次常委会议。会议认为，鄂豫陕边一带国民党统治薄弱，群众基础好，适合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明确提出“立即建立鄂豫陕省委，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的战斗口号。为了加强党对创建新苏区的领导，会议决定改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创造鄂豫陕根据地。会议中间，因国民党第六十师尾追而至，省委成员均投入战斗，未来得及讨论产生鄂豫陕省委成员问题，新建的鄂豫陕省委仍由鄂豫皖省委成员行使其职权，书记徐宝珊。

45. 陕西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1935年1月25日，陕北苏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赤源县（原安定县，今子长县）白庙岔召开，到会代表100余人，会期三天。会议讨论了陕北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通过了《陕西省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法令。选举成立了陕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副主席崔田民、霍维德，秘书长兼国民经济部长惠子明，土地部长辛兰亭，粮食部长高旭光，劳动部长祁明珍，裁判部长薛兰斌，财政部长艾楚南，教育部长陈蓬飞，保卫局长刘子义，贸易局负责人白树标，巡视员强晓初、白栋材。

46. 周家硷联席会议

1934年冬,陕甘边、陕北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分别建成了大片的苏维埃区域,在此情形下,对两块苏区的党政军组织实行统一领导和指挥显得十分必要。1935年1月,经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巡视员黄翰建议,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军委主席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北上,到陕北苏区赤源县看望了正在养病的谢子长,并就两块根据地的统一及组织第二次反“围剿”等问题达成共识。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塬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陕北两块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西北工委隶属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的领导。工委书记惠子俊(未到职前由崔田夫代理)。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一说谢子长)。会议决定撤销陕北特委,保留陕甘边区特委和军委。苏维埃政府未建立统一机构,维持原状。

47. 虎坪会议

1935年2月19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湖北郧西县庙川虎坪召开常委会议。会议总结了省委两个多月的工作,通过了《为完全打破敌人进攻争取春荒斗争的彻底胜利创造新苏区的决议案》,要求扩大与加强红军,组织地方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抓紧时机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设基层政权,争取建立三个县的游击根据地。并就春荒斗争中的宣传、组织灾民救济等问题作了安排。

48. 华阳会议

1935年3月10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洋县华阳镇召开会议。会议进一步确立了以商洛为中心区域,向豫西、湖北地区发展,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指导思想。会议认为创建鄂豫陕根据地,对于配合川陕、陕甘边、陕北苏区与红军的行动有着重要的意义。在鄂豫陕根据地发展战略上,向东可以深入河南发展中原的苏维埃运动,向东南可以恢复鄂西及豫鄂边苏区,并与鄂豫皖老苏区取得联系,打通南北两个苏区。

49. 葛牌镇扩大会议

1935年4月中旬,中共鄂豫陕省委在蓝田县葛牌镇召开有地方和红军积极分子参加的扩大会议,总结了红二十五军入陕以来的工作;改选了省委,书记徐宝珊,副书记吴焕先。会议还不适当地批判了对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持有过不同意见的同志,并进行了组织处分。

50. 莫家山会议

1935年5月下旬,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湖北郧西县莫家山召开执委会议,讨论边区工作问题。会议根据中央苏区的反“围剿”经验,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先疲后打”的作战方针。会议布置了鄂陕、豫陕两个边区的工作,要求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红军初步的后方机关,举办流动训练班培训地方干部,优待红军家属等项工作。

51. 泮峪口紧急会议

1935年7月15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率红二十五军西征时在长安县泮峪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根据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川西,并准备北上的实际情况,决定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北上西北苏区,会合西北红军,首先争取西北苏区的巩固,集中力量消灭敌人,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会议还确定鄂陕、豫陕两特委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继续坚持鄂豫陕苏区的斗争。会后,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从泮峪口出发,继续长征。

52. 梁家坟会议

1935年9月9日,中共鄂陕特委、中共豫陕特委在商南县梁家坟会合,并举行联席会议。会议认为,在国民党军重兵“围剿”的形势下,斗争更加艰苦。但是鄂豫陕边的地理对红军有利,群众基础好,国民党地方势力较弱,虽然红二十五军主力已到陇东,但两特委已有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有近300名红军战士作骨干,只要依靠群众,团结一致,是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会议决定,树立独立斗争的思想,以陕南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首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在宁陕、佛坪边开辟新根据地,争取恢复原根据地;将鄂陕、豫陕特委合并,成立中共鄂豫陕特委,书记郑位三,统一领导鄂豫陕边的革命斗争;合编各游击武装,组成红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政委李隆贵,副师长兼参谋长方升普。

53. 永坪联席会议

1935年9月16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长征到达中共西北工委所在地延川县永坪镇。17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主持召开了有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会议着重解决了统一领导和粉碎国民党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问题。会议决定将三支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任政委,高岗任政治部主任。军团下设三个师;原红

二十五军改称第七十五师,师长张绍东,政委赵凌波;原红二十六军改称第七十八师,师长杨森,政委张明先;原红二十七军改称第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会议还决定撤销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组建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郭洪涛。改组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

54. 下寺湾会议

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会议,听取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苏区“肃反”及劳山、榆林桥战役情况的汇报。会议决定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的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审查西北苏区的错误“肃反”工作;恢复红一方面军和红一军团番号,红一方面军辖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撤销中共陕甘晋省委、西北军委和陕甘晋省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张闻天)、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秦邦宪);建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领导西北根据地党、政、军、民工作。并决定中央领导人分两部分行动,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同红十五军团会合,指挥反“围剿”战斗;洛甫(张闻天)等率领中央机关北上瓦窑堡解决西北苏区错误“肃反”问题。

55. 瓦窑堡会议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今子长县城)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扩大红军”的方针。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强调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同时要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56. 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37年4月12日至18日,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来自苏区、国统区、沦陷区和红军的312名代表参加了大会。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博古(秦邦宪)、林伯渠等出席大会并讲话。大会通过了《目前政治形势与青年救亡运动任务的决议》、《关于进行普及教育运动突击年的决议》。起草了《全国青年救国纲领草案》、《中华青年救国联合会组织简章草案》。决定成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冯文彬为主任。18日,毛泽东专门接见并宴请了李连璧、时春茂、樊一鸣、蒲望文、何贵生(何承华)、郭蔚林(罗文治)等25位

陕西国统区代表。

57. 中共苏区代表会议

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中国革命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218人参加。张闻天致开幕词。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指出“争取民主”、“巩固和平”、“实现抗战”,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党在目前新阶段的主要任务。博古作了《苏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林伯渠致闭幕词。

58. 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

1937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同年5月15日,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高岗、林伯渠、吴亮平、马明方、李富春、周兴、李坚真、郭洪涛、王达成、习仲勋、白治民、刘长胜、崔田民、张秀山、刘景范、崔田夫、李维汉为执委,罗梓铭、蔡畅、马锡五、王世泰、张邦英、马佩勋为候补执委。17日,第一次执委会选举郭洪涛为书记,确定王达成任组织部长,吴亮平任宣传部长,王涛任统战部长,李坚真任妇女部长,高克林任秘书长。边区党委成立后,中共陕北、陕甘省委逐步撤销(中共陕甘宁省委已于是年3月撤销),各级党组织按照边区党委的组织选举条例,自上而下实行选举,健全了各级组织。

59. 中共白区代表会议

1937年5月17日,中共白区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白区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张闻天作《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总结报告,朱德作军事问题报告。会议主要总结了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瓦窑堡会议以来华北地区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着重批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阐明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新形势下,党在白区工作中的基本方针和策略是: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而斗争。

60. 中共陕西省云阳代表会议

1937年5月22日至27日,中共陕西省委在泾阳县云阳镇召开中共陕西省代表会议,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杨尚昆等出席大会并讲话。省委书记贾拓夫作《目前陕西党的任务与工作》的报告,提出陕西党组织在新时期的任务是动员和领导千百万群众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为和平民主和抗战而

斗争,为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而斗争。在工作方法上,改变过去那种同国民党对立的、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采用和平的、合法的斗争方式。并提出陕西党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发展与巩固党的组织,加紧党员政治教育。

第九章 战役 战斗

1. 职田镇战斗

1932年2月13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攻克旬邑县职田镇,捣毁国民党区公所,捕杀了民团团长及劣绅。

2. 阳坡头战斗

1932年2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旬邑县阳坡头设伏,击溃前来追袭的国民党驻张洪镇警卫团三营与旬邑县民团,缴枪150余枝。

3. 坟滩、柿坪战斗

1932年9月上旬,国民党陇东绥靖司令部两个团从正宁、宁县等地自西向东,国民党军八十六师五一一团以同官(今铜川市城、郊区)为中心由东向西,陕西省警卫团和陕西省保安第一游击队由彬县、旬邑向东,富平、同官、耀县民团向西进攻,企图将红军陕甘游击队包围在照金消灭。陕甘游击队则由照金杨柳坪向后山撤退,诱敌深入。当国民党军队进入照金扑空后,陕甘游击队则回头在坟滩、柿坪等地设伏,歼灭民团一部,活捉了3县民团团总及党谢芳、蔡子发等7名民团头目,缴获长短枪300余枝。

4. 漫川关战斗

1932年11月11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到达鄂陕边境重镇山阳县漫川关以东云岭地区,国民党陕军三个团已据漫川关堵截,国民党四十四师、六十五师、五十一师、四十二师、一师等分别在漫川关东、北、南三个方向对红军形成包围。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决定集中兵力从漫川关以东敌人布防薄弱环节实行突围。11月13日,红四方面军十二师三十四团在团长许世友率领下,反复冲杀,终于夺取了张家庄垭口,打开一条通道,使全军胜利突出重围。

5. 王曲、子午镇战斗

1932年11月28日,红四方面军翻越秦岭,进入关中平原。红七十三师

于西安以南之王曲镇击溃国民党陕军混成旅和特务团,歼陕军四个营。11月29日,红四方面军后卫十一师在子午镇被国民党十七路军十七师截断,红十师先头部队立即折回支援,将国民党十七师击溃,歼灭两个营。

6. 焦坪战斗

1932年12月26日,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连夜行军80余里,攻打宜君焦坪镇获胜,俘当地民团60余人,缴枪60余枝。

7. 辘轳把战斗

1933年7月21日,国民党十七路军骑兵团团长王泰吉在耀县率部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28日,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在三原心字区辘轳把与杨虎城部孙友仁特务团遭遇,战斗失利。在红二十六军第四团接应下,西北抗日义勇军撤往照金根据地。

8. 张洪镇战斗

1933年9月底,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率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三支队及陕北游击队一支队,智取张洪镇(旬邑县治所),镇压了旬邑县民团团总。

9. 元墩子遭遇战

1934年2月初,中共陕南特委指示红二十九军第三、四游击大队向川陕苏区转移,靠拢红四方面军。2月6日,第三大队在勉县元墩子与王化志民团遭遇,激战一日,除少数战士在政委杨国光率领下突围外,30多人被俘。是月,驻勉县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警卫团团长张汉民(中共党员)得知后,命史唯然(中共党员)率一个加强排,以追捕逃兵为由,向王化志要人,并以民团隐匿士兵为口实,击毙了王化志,解救了被俘的游击队战士。

10. 甘嘴村战斗

1934年4月中旬,红四十二师三团在淳化甘嘴村与国民党何高候部两个连遭遇,在陕甘边区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的配合下,全歼何部两个连,缴枪100余枝。

11. 安定城战斗

1934年7月16日,谢子长率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和薛兰斌领导的赤卫队,经过一夜激战,于17日攻克安定县城,救出200多名革命同志和红军家属。10月15日,谢子长带伤指挥部再次攻打安定县城,在城内共产党员刘光汉、白应奎等接应下,攻入城内,击毙民团团总李培成。

12. 景武家塌战斗

1934年8月17日,谢子长率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和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在安定县景武家塌全歼国民党八十六师姜梅生部一个连。

13. 河口镇战斗

1934年8月26日,谢子长率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和陕北游击队奔袭清涧县河口镇,经过激战,击溃国民党八十六师一个连和一部分民团。战斗中谢子长胸部负伤,遂撤出战斗。河口守军亦于次日逃回清涧县城。

14. 哈拉寨战斗

1934年9月至11月,国民党调集两个团又两营兵力,对神府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10月初,神府红三团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北上府谷北区,与陕北游击队七支队会合后,一举打进府谷北区重要集镇哈拉寨,消灭一个民团,处决了国民党联保主任,并给群众平分了地主豪绅的粮食和衣物。

15. 青鹤观战斗

1934年11月8日,中共陕南县委、陕南县苏维埃政府机关驻地青鹤观被国民党镇巴县民团包围,县委书记潘天成率机关干部和游击队同民团激战竟日,终因力量悬殊,青鹤观失守。

16. 三要司战斗

1934年12月8日,从鄂豫皖根据地突围的红二十五军在豫陕交界的铁锁关(洛南县境的箭杆岭)入陕,在洛南县鸡头关击溃当地民团后,又在三要司九泉山歼灭堵截红军的国民党四十二师一个营。

17. 庾家河战斗

1934年12月10日,红二十五军在洛南县庾家河(今属丹凤县)与尾追之国民党第六十师激战整日,将其击退,毙伤敌800余人,缴获一批枪械弹药。

18. 陕南战役

1935年1月下旬,为配合中央红军入川,中共中央指示红四方面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红四方面军一面令红三十一军进行渡江准备,一面令红四、红九、红三十军向南进攻,以调动和迷惑国民党军队,掩护西进,并策应已进入陕南的红二十五军。2月3日,红军攻克宁强县城和阳平关,歼国民党守军胡宗南部一部分。2月4日,红军向阳平关、宁强东北推进,于8日歼灭十七路军孙蔚如部第十七师四十九旅大部。随后,红军占领沔县(今勉县),围攻褒城,直抵汉中近郊。胡宗南和川军邓锡侯部急将主力调往陕甘边境,红四方面军见调动国民党军队的目的已经

达到,遂于2月中旬回师川北。陕南战役历时十多天,歼灭国民党军队五个多团,缴枪5000余枝。陕南战役在军事上取得了一定胜利,但在政治上产生了不利影响,它破坏了红四方面军早先与国民革命军十七路军孙蔚如部签订的互不侵犯的秘密协定,影响了统一战线政策的实行。

19. 南沟岔战斗

1935年1月31日,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在安定县(今子长县)南沟岔歼国民党四九九团一个前哨加强连,缴枪100多枝。2月1日,红八十四师又在南沟岔消灭高桂滋部一个连,缴枪百余枝。

20. 蔡玉窑战斗

1935年2月1日,红二十五军主力在柞水县蔡玉窑打垮国民党一二六旅两个营,歼灭一个营。

21. 宁强战斗

1935年2月3日晚,红四方面军十师、十二师攻打宁强县城。4日拂晓,红军攻克宁强县城。此役消灭国民党三十八军独一旅二团一、二营,毙宁强县长白诚斋,俘虏团长杨竹荪以下五六百人。同日,在阳平关消灭该团三营,占领阳平关。

22. 文公岭战斗

1935年2月5日,红二十五军在蓝田县葛牌镇南之文公岭设伏,歼灭国民党一二六旅五个营。

23. 阎王砭战斗

1935年2月13日,红二十七军主力在陕北游击队新二支队的配合下,将驻守清涧县高杰村的国民党军两个排诱至阎王砭全部歼灭。新二支队长惠世良在战斗中牺牲。

24. 褒城战斗

1935年2月14日,红四方面军二十七师围攻褒城,攻城部队在迫机炮和机关枪的火力掩护下,携带云梯奋勇登城,与国民党守军展开白刃格斗,战斗异常激烈。国民党军队出动飞机狂轰滥炸,攻城战斗持续一昼夜,红军于16日撤至隐蔽地带集结,待机再战。此后,红军几次发起猛攻,在重创守军之后,于22日奉红四方面军总部命令撤出战斗,返回川北。

25. 贺家湾战斗

1935年3月初,红二十七军主力在清涧县贺家湾将向延川护送军饷的国

国民党军 1 个连全歼,缴获 2000 多枚银元和大量武器弹药。

26. 石塔寺伏击战

1935 年 3 月 10 日,红二十五军在洋县华阳镇石塔寺附近设伏,打垮尾追之国民党陕西警备第二旅五个营,毙、伤、俘国民党军 600 余名,击伤旅长张飞生。

27. 杨家园子战斗

1935 年 5 月 1 日,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七军于安定县白庙岔会师后,在刘志丹率领下,采用围点打援战术,于 5 月 6 日晚包围驻守杨家园子的国民党军八十四师第五〇二团郭子封部。7 日晨,在杨家园子以西吴家寨设伏,击溃国民党军一个连,郭子封率部倾巢增援,红军发动攻击,激战六小时,全歼郭营。同日,红军又在杨家园子以东马家坪,全歼国民党八十四师五〇〇团第三营和团属机炮连。

28. 马家坪战斗

1935 年 5 月 7 日至 8 日,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在数千名赤卫军和群众的配合下,将从清涧向瓦窑堡护送军用物资的一营国民党军围困在安定马家坪。9 日,西北红军主力赶到,将其全歼,俘副营长以下官兵 450 余人,缴获长短枪 450 余枝,轻重机枪 29 挺,迫击炮两门,军衣 2000 余套,银币 2000 余枚。

29. 张家圪台战斗

1935 年 5 月 25 日,西北红军主力在清涧张家圪台村全歼国民党军 1 个连,毙、俘连长以下 170 余名,缴获各种武器 100 余枝。

30. 夜村战斗

1935 年 6 月 5 日,红二十五军主力相继在商县夜村、商洛镇(今属丹凤县)附近,与国民党军一一〇师、一二九师遭遇,毙伤国民党军团长以下 200 余名,缴枪 100 余枝。

31. 富水关战斗

1935 年 6 月 14 日,红二十五军攻克商南县富水关,继而进占青山街,俘国民党军四十四师营长以下 170 余人。

32. 荆紫关战斗

1935 年 6 月 16 日,红二十五军奔袭豫陕鄂交界的荆紫关,歼国民党军一个连,活捉国民党军四十四师军需处长,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33. 李家塬战斗

1935 年 6 月 22 日,西北红军主力攻克安塞县国民党军最后一个据点李

家塌,毙伤官兵 600 余名,缴获各种武器 200 余枝。

34. 袁家沟口战斗

1935 年 7 月 2 日,红二十五军主力及鄂陕三路、四路游击师与国民党陕西警备第一旅在山阳县袁家沟口发生激战,将其全部歼灭,毙伤国民党军官兵 300 余名,俘旅长唐嗣桐以下 1400 余名,缴枪 1600 余枝。

35. 老君殿战斗

1935 年 7 月 17 日,西北红军主力挥师东进,在绥德老君殿击溃国民党军八十六师一个团,击伤团长艾捷三,缴获一部分枪支弹药。

36. 慕家原战斗

1935 年 8 月 11 日,刘志丹率西北红军主力千余人,采用围堡打援的战术,攻克吴堡慕家原寨子,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连,次日又击溃援军四个连。

37. 定仙塬战斗

1935 年 8 月 21 日,刘志丹率西北红军主力和陕北游击队第五、十四支队,在绥德定仙塬与国民党晋军激战竟日,毙伤副团长齐汝英以下官兵 200 余人,俘虏 1800 余名,缴获轻重机枪 60 余挺,长短枪 1900 余枝。

38. 崂山战役

1935 年 9 月 16 日,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延川县永坪镇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会师后,为集中兵力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西北根据地的“围剿”,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此时,国民党军以七个师的兵力分两路由洛川、富县一带向西北根据地进犯。红十五军团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以少量部队包围甘泉,主力在甘泉以北之崂山设伏。10 月 1 日,国民党东北军第一〇〇师由延安南援甘泉,途经崂山时遭红十五军团伏击,激战六个小时,被红军一举歼灭,师长何立中被击毙。

39. 切尾巴战斗

1935 年 10 月 19 日,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长征达到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国民党三十五师、三十六师的四个骑兵团尾追而至。当晚,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军高级干部会议,指出,长征到这里要割“尾巴”了,决不能把敌人带进根据地。20 日,毛泽东向红军作了战斗动员,部署并指挥“割尾巴”战斗。21 日,在毛泽东、彭德怀等指挥下,中央红军在吴起镇消灭尾追之马鸿逵部及国民党东北军一个骑兵团,击溃三个团。史称切“尾巴”战斗。

40. 榆林桥战斗

1935年10月,红十五军团在取得崂山战役胜利后,挥师南下,包围了酃县(今富县)榆林桥。10月25日拂晓,红军发起攻击,全歼榆林桥守军国民党东北军第一〇七师六一九团,俘虏团长高福源。

41. 直罗镇战役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长征到达陕北。11月,国民党调集五个师的兵力向西北根据地发动进攻,企图乘红军立足未稳之际,消灭红军并摧毁西北根据地。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红一军团隐蔽在直罗镇东北,红十五军团隐蔽在直罗镇附近的张村驿地区,并以少量部队诱敌深入。11月20日至24日,红军在直罗镇取得歼灭国民党军第一〇九师一个师及一〇六师一个团的重大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42. 宁陕战斗

1935年12月26日,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攻占宁陕县城,全歼守城之国民党保安团300余人,处决县长剧文绍,惩办反动分子二十多名,并将没收豪绅的财物分给贫苦农民。

43. 东征

1936年2月,为了巩固和扩大西北根据地,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东征,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2月20日,红军抗日先锋军冲破阎锡山的黄河防线,渡过黄河。3月31日,红二十八军也渡河参战。红军的这一行动,遭到阎锡山部队的抵抗,蒋介石也调集10个师的兵力增援阎锡山,同时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与之配合,企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西北根据地。为了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并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5月初,中共中央决定红军撤回河西,结束东征。经过两个月的东征,扩大了红军力量补充了给养。红军在山西的十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建立了一些游击队和游击区,为后来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在东征作战中,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

44. 西征

1936年5月初红军东征回师后,蒋介石仍然坚持“剿共”政策,调集16个师又3个旅的兵力,准备对西北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根据这种形势,中共

中央决定红军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西征,以巩固和发展西北根据地,扩大红军,首先争取西北抗日力量的联合。5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将以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和八十一师、骑兵团等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西征部队先以红一军团为左路,红十五军团等为右路,后又以红二十八军和八十一师、骑兵团为中路,于5月下旬至6月上旬相继出发。至7月底,三路红军给马鸿逵、马鸿宾等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攻克了甘肃东部的阜城、曲子镇、环县、洪德城等地,攻占了陕西西北部,直到宁夏的盐池、豫旺、同心城等地,开辟了纵横400余里的新根据地,并与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和地方武装都得到发展。

第十章 “左”倾冒险主义对陕西的影响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连续发生了三次“左”倾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给陕西地区党组织也带来严重影响,甚至出现危机。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左”倾错误方得以纠正。

第一节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在陕西的影响

1927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等文件,强调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党内的悲观情绪,会议认为大革命虽然失败,但全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反对退却,主张继续进攻,革命的方针是全国总暴动。

11月16日,中共陕西省委根据陕西反冯斗争暂时失败的情况,做出第二次《政治报告》,认为西北交通和文化落后,要求党员深入民众,继续努力反冯;到国民党军队中去,武装起来,准备总暴动。26日,共青团陕西省委收到团中央来信,批评团省委根据党省委7月11日报告所确定的工作方针。强调团与党目前的工作是与机会主义作斗争。28日,共青团陕西省委召开第二次

全体会议,讨论贯彻团中央《驻汉委员全体会议决议案》等文件及中共陕西省委准备提交全体会议审议的第二次《政治报告》,表示完全接受团中央的批评,“努力与机会主义拼命”。会议对中共陕西省委《政治报告》中认为西北农民非常落后的观点及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前途的看法提出尖锐批评,认为中共陕西省委执行的是“机会主义”政治路线。指出今后陕西党和团的任务应该是:加紧动摇反动统治,建立农民武装和政权,立即组织暴动,向由民权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发展,并要求中共陕西省委采纳中央这些决议。

11月,中共陕西省委派刘志丹赴上海向中央请示工作,带回了中央通过的号召全国普遍发动起义的文件。

12月4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团省委书记张金印陈述了团中央对省委7月11日《政治报告》和团省委对省委11月16日《政治报告》的意见,认为党省委提出的西北农民非常落后和发动起义要经过一个准备过程的意见是右倾机会主义,要求党省委重新讨论,省委书记耿炳光同这种意见进行了激烈争论。最后常委会表示接受团省委意见,修改政治报告和重新起草关于国民党问题的决议。

12月7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根据团省委意见修改通过了《两月工作的回顾及政治问题决议案》。决议承认省委“在最近的政治报告上又表现出机会主义的犹豫与动摇”,将准备总暴动修改为组织农民在农民协会旗帜之下,发动抗税、抗捐、抗粮及部分暴动,以至总暴动,推翻国民党在陕西的反动统治。并强调和机会主义继续作斗争,努力反对冯玉祥。

1928年1月2日,中共中央向中共陕西省委发出第九号公函,对陕西工作提出几项重大政策原则:(1)绝对放弃利用任何军阀的心理,以工农暴动消灭军阀战争,造成割据的局面;(2)迅速改正创造革命的国民党的观念;(3)宣传苏维埃政权,改乡村政权归农协为归农民代表会议;(4)工农运动要变和平的请愿运动为激烈的直接行动——抗租、抗税,杀豪绅地主,没收其土地财物分给贫苦农民,以达到暴动的局面;(5)党领导的军队驻地,应是农运有基础的地方,应选择得力同志投入反动军队,发展士兵支部;(6)彻底改造党组织,提拔勇敢的工农分子加入指导机关。这时省委亦收到了中央关于《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

1月4日至5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三次和第四次全体会议。依据中央精神,会议认为省委书记耿炳光仍然没有脱离机会主义的指导,对组织农民暴动持消极态度,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决定撤销耿炳光省委常委、书记职务,推选潘自力为代理书记。

1月12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第二十六号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工农武装暴动新政策下,反对一切大小军阀,开展游击战争,由部分暴动过渡到全陕总暴动,履行彻底的土地革命。为了便于指导,将全省划分为关中、陕南、陕北三个区域,关中又分为省东、渭北、省西、中区、东府等五个重要区域,每区设一暴动委员会,指挥各区游击战争。2月2日,省委又发出通告,取消暴动委员会,由各级党部直接领导。

2月12日,耿炳光致书中共陕西省委常委会,对省委第二十九号通告及党在陕西的机会主义错误,党、团关系和西北农民落后与否,特别是对发动农民暴动等问题申述了自己的观点,批评省委对暴动操之过急,认为暴动必须有相应的环境、时机和准备。目前陕西应集中党的力量于农运中心,实现由部分暴动到总暴动。

2月13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传达1927年11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的文件和中央第九号公函精神,制定了《陕西CP目前工作方针》。认为“陕西客观上亦到直接革命形势之阶段中”,陕西党目前工作的总方针是:发动群众开展从经济到政治的斗争,使工农群众自发的暴动尽快高涨,由局部暴动汇合成全省的总暴动,造成陕西割据局面,以至建立全省的苏维埃政权;同时要求自上而下地改组各级指导机关,提拔勇敢工农分子;宣传工作要打破灰色面孔,在群众中表明党的政治面貌。会议还讨论了耿炳光致省委的信,认为其意见大部分是对的。决定派耿炳光为陕南特委书记,耿认为难以完成年关组织暴动的任务而未就职。

3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陕西工作决议案》,指出陕西反动统治已在崩溃之中,因此实行工农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是陕西革命发展的前途。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第五次全体会议精神,在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先后爆发了渭华起义及旬邑、礼泉、淳化、澄城等地起义,以及三原、泾阳、礼泉、永寿等地农民的“交农”围城斗争。上述起义由于敌强我弱和缺乏斗争经验,又受到“左”倾盲动主义影响,在国民党镇压下均遭失败。起义失败后,国民党陕西当局层层设“清乡团”、“铲共团”,大批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

群众,致使大革命时期积蓄起来的一点革命武装损失殆尽,各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4月3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对“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会后,中央发布第四十四号通告,号召各地党组织执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纠正“左”倾错误。年底中共陕西省委才收到通告。

6月13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通过《全陕总暴动决议案》,要求各地继续组织暴动。6月,中共六大召开,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同时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提出党的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10月8日,中共中央给中共陕西省委发来指示信,指出:“过去党的暴动政策,犯了极深的盲动倾向,必须严厉纠正”。指示省委以六大决议为准绳,克服只是幻想暴动,一味盲目行动的错误。收到中央指示信后,省委即派蒲克敏去中央汇报工作,领取六大文件。12月底,蒲克敏由中央回陕,带回中共六大会议文件。

1929年1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在富平美原小学召开。根据六大精神,会议总结了“左”倾盲动主义失败的教训,检查了省委领导工作的错误,改选了省委,书记曹趾仁。至此结束了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在陕西的贯彻执行。

第二节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陕西的影响

193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七十号通告,指出党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促进和准备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向着中心城市发展,首先争取一省或几省的胜利。4月4日至15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向西路、陕北、各军支等党组织传达中央七十号通告精神,要求各地按照七十号通告精神部署工作。

1930年6月9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我们面前,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客观条件更加成熟。提出准备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战略总方针。

7月1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在蓝田巩村小学召开,讨论通过了政治、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兵运、组织、宣传及共青团等七项决议。提

出陕西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和发动群众,准备武装暴动。总的策略是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组织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兵变,创造并扩大红军。以西安、榆林、三原为中心,延安、绥德、潼关为次,建立全省的中心工作。会议决定改临时省委为正式省委,常委杜衡(书记)、王芾南、吉国桢。

7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第一号通告,指出:陕西革命的客观条件更比全国成熟,党的任务是在全党政治路线和任务之下,努力地加强主观力量,准备总的革命斗争,争取全省总暴动的胜利,建立局部的以至全省的苏维埃政权。目前陕西党内最严重的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及富农路线,因而反右倾的斗争与加强政治指导和中心工作的建立,是省委今后工作的主要方针和任务。

8月1日,《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等文件,由中央交通黄平带到陕西。黄平向陕西省委传达了中央关于“布置汉南、渭南工作,以配合武汉的取得”的口头指示。5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三次常委会。根据中央文件精神,会议认为省委五次扩大会议对政治形势估计仍然不足,犯有右倾错误,因此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应予推翻,决定由杜衡另行起草新的决议。23日,中共中央发布《九七纪念大示威通告》^①,指出九七示威是在武装暴动前夜,动员千百万群众与统治者进行阶级决战的预演,全党应以全力来组织领导这一运动。

8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在秋收斗争路线之下,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混战,组织各地政治示威,直到组织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士兵暴动等;每个支部和党、团员都要行动起来,由大小的政治、经济斗争做起,一直汇合到九七政治示威。根据省委通知精神,西安市委建立了行动委员会,发动了西安监狱小职员的斗争、广仁医院罢工等斗争。后因广仁医院罢工失败,九七政治示威未实现。

9月14日,中共陕西省委通过杜衡起草的《陕西省委政治任务决议案》。决议认为“陕西新的革命高潮的客观条件是完全成熟了”,党的战略总方针是坚决组织罢工,地方暴动,士兵暴动,创建与发展红军,汇合各种势力的武装暴动,推翻军阀统治,建立陕西苏维埃政权;在陕北、西安、渭南、华县、蓝田、陕南组织武装暴动以配合武汉的夺取,特别要以陕北为首先胜利之区,以促

^① 九七是1901年9月7日俄、英、美、日、德、法、意、奥、西、比、荷等11个帝国主义国家胁迫清朝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国耻日。

进全陕的革命高潮。

10月初,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召开扩大会议,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高维翰(李杰夫)传达6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会议决定合并党、团、工会、农会等组织,成立行动委员会,书记赵伯平,军委书记孔祥祯,行动委员会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并决定书写标语、传单。为在中心城市指挥暴动,将行动委员会迁到榆林。会议一结束,刘澜涛、张德生即遭逮捕(经营救获释)。

为了配合陕北暴动,党组织发动蓝田南区军阀驻军以及国民党驻神木、榆林一些部队起义,但无一成功。

10月8日,共青团陕西省委在西安组织飞行集会和游行示威时,遭到国民党军镇压,团省委书记薛永寿在南院门被捕。10月10日,党、团陕西省委主要领导人吉国桢、贾拓夫、王作宾(王曙)、马志敬等二十余人被捕。西安和各地党、团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

10月29日,中共中央给中共陕西省委发出指示信,对9月14日《陕西省委政治任务决议草案》提出严厉批评,要求根据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迅速纠正认识上的“左”倾错误。指出陕西党目前主要的任务是领导城市和乡村中自发的群众斗争,鼓动与争取公开的群众运动。至此,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陕西停止执行。

第三节 罗章龙分裂主义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 在陕西的影响

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通过《四中全会决议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支持下,王明在中央取得领导地位,指责以李立三为代表的错误是在“左”倾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冒险主义还“左”的错误观点,以王明为代表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全党。在此前后,中央出现了罗章龙分裂主义集团。17日,罗章龙、徐锡根、余飞等召集会议,反对六届四中全会,要求撤换国际代表。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批评全总党团会议领导人罗章龙等企图改变国际路线,分裂中央、分裂党的错误,号召全党坚决反对。31日,在罗章龙等操纵下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非常委员会

及其所属的全总党团、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处等到处散发文件，四处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1月中旬，杨珊由天津回到陕西，带回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的《紧急通知》（即中央九十六号通告）、《反立三路线讨论大纲》、《告全体同志书》。1月29日，中共陕西省委在渭南辛市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会前，“非常委员会”派人到陕西游说，省委常委接受了他们的观点。会议通过了接受国际来信、反对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决议案、陕西工作决议案；选举高维翰为参加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的代表。在讨论上述决议中，委员对陕西革命形势的认识发生争论。杜衡、高维翰认为陕西的革命形势是高涨的；张文华、李良认为是低落的，同时反对省委参加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处，因张文华坚持己见，被取消委员职务。

2月12日，中共陕西省委收到中央机关刊物《实话》五、六、七期后，始看到其中刊载的六届四中全会部分决议案，遂于15日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六届四中全会决议。会议认为“在国际路线之下召开的四中全会及其产生的新中央政治局是正确的”，省委四次全会建议远东局产生新中央的决议是错误的，决定做出补充决议，接受四中全会决议。常委会的补充决议尚未发出，罗章龙等领导的“非常委员会”与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处又送来文件且派人游说。省委看到这些文件后，又决定反对四中全会，同意参加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处。

2月，中共北方局派交通杨璞，中共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处派白明善，先后来到陕北，向陕北特委宣传各自的观点。中共陕北特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向下传达紧急会议筹备处的观点。

3月6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在讨论陕西省革命形势时，再次发生争论，赞成李良意见的居多数，杜衡认为李良的观点是右倾机会主义，必须给以打击。为解决省委在中央和罗章龙领导的“非常委员会”之间的依从问题，决定派代表同双方接触以后再做决定。并准备两月内召开全省代表大会，解决政治、组织上的问题，在问题未解决前，省委四次会议决议仍然有效。3月中旬，互济会代表刘公亭来陕，带来了六届四中全会全部文件。中共陕西省委遂又认为四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召开的，成立的中央是正确的。3月25日，李良、张国藩、刘映胜写了《目前陕西工作决议案》，坚决反对继续立三路线的陕西省委四次全会产生的《陕西工作决议案》。

3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在渭南辛市召开,认为四中全会及产生的政治局领导是正确的,省委在四中全会和罗章龙非法组织之间摇摆,犯了严重的错误。会议号召全省党员行动起来,深入反立三路线和罗章龙的右倾分裂主义。经过激烈争论,修改通过了省委四次全会起草的《陕西党的目前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拥护四中全会反对右派分裂党的决议案》。

4月8日,中共陕西省委常委会议通过《关于五月的工作决议案》,要求各级党组织转变狭隘的秘密工作方法,加强党对群众政治、经济斗争的领导。7月,中共中央巡视员刘少文来陕,带来中央5月24日给陕西省委的指示信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指示信对省委在四中全会和罗章龙右派组织之间犹豫动摇进行了批评,否定了省委四次全会决议。会议作出《接受中央来信与陕西党目前中心政治任务与中心工作》决议案,指出陕西革命运动发展形势是高涨的,但党对群众斗争的领导力量薄弱。目前中心工作是必须抓住日益严重的灾荒,迅速组织农民斗争,开展游击战争。并重申同李艮等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目前的中心任务。

省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后,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在陕西逐步贯彻执行,省委多次批评红军陕甘游击队“右倾”,不顾客观实际要求游击队向国民党统治中心城市三原发展,截断渭河交通。在国民党军队“围剿”陕甘边根据地时,省委派李艮为游击队政委,限定游击队在20天内完成建立政权和土地分配的任务,导致游击队在三嘉原、王浪波、五顷原三战皆败,损失惨重。1932年8月,在没有群众基础的情况下,发动蒲城晋王、永丰两地民团以及澄城警察局警察起义均失败。

10月,省委发出《关于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纪念运动的决议》,要在陕甘边根据地和原(三原)、富(富平)、耀(耀县)游击区动员群众举行纪念活动和示威游行。11月上旬,渭北革命委员会举行庆祝十月革命节活动,2000多群众参加游行,暴露了力量。国民党三原、富平、泾阳、淳化等六县民团组织力量对渭北根据地中心武字区进行“围剿”,中共渭北特委和革委会被迫转移,游击队解体。1932年底,省委派杜衡任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错误地指责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执行党的纪律,使红军力量受到削弱。1935年9月,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组成中央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与陕甘晋省委错误地在西北苏区开展所谓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受到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刘志丹等人的抵制。10月初在北方局驻西北代

表团主持下,西北苏区开展错误肃反,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关押,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和陕甘边区县以上干部几乎全被逮捕,200多人被错杀。此时,国民党当局正对西北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使西北苏区面临严重危机。10月,中共中央长征到达西北苏区后,才将错误肃反制止。

第十一章 中共组织举办的军政学校

1.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军政训练队

1932年1月,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三嘉原创办了训练队。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训练队随之命名为陕甘游击队军政训练队。训练队内分高级班和普通班。高级班训练班以上干部,普通班训练班长及优秀战士。课程有游击队怎样活动等。同年停办。

2. 红二十六军随营学校

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在宜君转角镇宣布成立(当时只有第二团)。翌年1月,红二十六军在部队中组建了军部所属的随营学校,校长高维翰,政委汪锋。到1933年5月,共培养军政干部200多人。1933年6月,红二团在“左”倾错误路线指挥下,南下渭(南)华(县)一带,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损失惨重,随营学校也随之取消。

3. 陕甘边区红军军政干部学校

1934年11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为了加快培养红军及地方干部,在南梁荔园堡建立了陕甘边区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吴岱峰任军事主任。该校共举办三期,培训军队、地方干部200余人。1935年春停办。同年10月,学校在安定(今子长县)恢复,并改名为陕甘宁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吴岱峰,主任赵希仲,军事主任黄洪藻。1936年2月,中央红军干部团部分教职员与之合并,成立红军学校,校长周昆,政委袁国平。6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西北抗日红军大学。

4. 西北红军干部学校

1935年7月,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在驻地延川县永坪镇建立了西北

红军干部学校,校长吴岱峰,政委张秀山。

5. 西北抗日红军大学

1936年6月1日,中共中央在红军学校的基础上,建立了西北抗日红军大学,校址在瓦窑堡(今子长县城)。西北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校长林彪,政委毛泽东,教育长罗瑞卿。第一期招收学员1063人,编为3个科。其中一科主要训练红军中团以上的高级干部;二科训练营、连干部。上述两科驻瓦窑堡,后迁保安(今志丹)。三科训练班、排干部和部分战士,学员有800多人,驻甘肃环县木钵寺。学校主要课程有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和军事战略学、战术学、游击战争等。11月29日,第三科与二、四方面军的随营学校于甘肃庆阳县城合并为红大第二校,校长周昆,政委袁国平,教育长郭化若。学员分红军班、排干部队,有1400余人。12月,红大第一期学员毕业。1937年1月,红大迁到延安,并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6.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创办于1937年1月。其前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江西瑞金创办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红军长征时,红大编入中共中央军委干部团随军到达陕北。1936年2月,干部团部分师生同陕甘边红军军政干部学校联合,在陕北瓦窑堡建立了新的红军大学。同年6月,中共中央在此基础上创办了西北抗日红军大学(简称抗大),校址设在保安(今志丹县)。1937年1月20日,抗大第二期开学之际,校址迁到延安。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兼政委,刘伯承任副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毛泽东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抗大培养了十几万军政干部,总校共办了八期。1938年秋,先后在各抗日根据地办了12所分校,学员的来源从单一的红军干部扩大到全国知识青年及海外华侨。抗日战争胜利后,抗大完成了历史使命,宣告结束。1946年10月16日,原抗大总校一部分教职工和学员在副校长何长工带领下,从陕西绥德出发,向东北进军,1946年2月到达东北通化市,筹办东北军政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校迁到北京,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

7. 鲁迅师范学院

1937年2月鲁迅师范学院在延安成立,这是陕甘宁边区创办的一所专门

培养小学师资的中等学校。校长先后由王志匀、林迪生担任。该校以推行国防教育,发展边区教育和文化为宗旨。学校下设师范班两个,预备班一个。师范班设有政治、普通语文、评论、国语、算术、历史、地理、自然、音乐以及军事课。1939年7月,鲁迅师范学院和边区中学合并,改称陕甘宁边区第一师范学校。

8. 中共陕西省委党员干部训练班

为培训抗日救亡运动及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1937年8月,中共陕西省委在泾阳县云阳镇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赵伯平任班主任,贾拓夫、张德生、赵伯平、汪锋、胡达明等担任教员。训练班开设党建、农运、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工运等课程。1941年训练班结束,共举办10期。

第十二章 中共组织创办的报刊杂志

1.《政治通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创办的内部刊物。1927年11月4日创办于西安。该刊以通报情况、交流经验为主,着重反映陕西政治、军事、农运等方面的情况,同时介绍国内政治、军事、农运及中央决议等方面的情况。1928年11月停刊,共出八期。

2.《西北红旗》

中共陕西省委创办的报纸。1928年10月12日创刊于西安。党报委员会主任王芾南。1931年5月停刊。

3.《前驱》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南特委创办的机关报。1930年秋创刊,以汉中省立第五师范学校自治会名义创办,辟有论文、论坛、杂感、文艺(主要是新诗)、读者呼声、编后谈等栏目。该刊披露大量的事实,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青年生活困境,号召青年组织起来,参加实际斗争,反帝反封建,“跟着有革命行动的党派去干”。后改名为《追求》。

4.《西北红旗》(月刊)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省委创办的机关刊物。1930年9月创刊。

该刊主要刊登政治时事评论、群众斗争、中心策略解释等。每期印行 200 份，陕北、陕南、蒲城设有翻印处。

5.《西北文化日报》

1930 年 9 月创刊于西安。1931 年 9 月，杨虎城将军任命宋绮云（中共党员）为副社长兼总编辑，总揽社务，该报逐渐成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宣传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进步报纸。西安事变的消息，就是从该报最先传播出去的。1937 年报社改组，社长李子健。后该报被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接管，成为国民党陕西当局的舆论工具。

6.《西北真报》

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刊物。1931 年 5 月 21 日创刊。宗旨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组织和领导群众斗争。从第 22 期起有系统、有计划地定期出版，内容有社论、红军消息、国际新闻、西安新闻、地方通讯等。还出有号外和特刊。

7.《红色中华》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张大型报纸。1931 年 12 月 11 日在江西瑞金创刊。原为周刊，后为双日刊。开始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机关报，1933 年 2 月改为中共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联合机关报。该报除经常发表社论，对根据地的实际工作进行指导外，还辟有红色区域建设、赤色战士通讯、党的生活等栏目，及时报道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情况。从 72 期起，增设不定期文艺副刊《赤焰》。长征途中停刊，1935 年 11 月 25 日在瓦窑堡复刊。1937 年 1 月 29 日在延安改名为《新中华报》。

8.《西北斗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北特委创办的刊物。1932 年 7 月 22 日创刊。先后由西北斗争社、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中共陕甘晋省委编印。其宗旨是拥护苏联，建立西北苏维埃，介绍西北革命；揭露国民党军阀压迫剥削西北劳苦群众的罪恶，介绍西北灾荒和工农生活痛苦的惨状，唤起人民的觉醒；批判一切反革命派别麻醉西北青年的反动理论和欺骗宣传，以启发西北青年革命觉悟，团结革命力量。

9. 西安《解放日报》

西安事变后，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委员会联合办公厅领导的三方（东北军、

十七路军和红军)对外机关报。1936年12月13日创刊于西安。该报由办公厅下设的宣传委员会具体领导,总编先后有丛德滋、张兆麟,中共陕西省委曾派韩进、魏文伯等担任编辑。该报系统地反映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1937年2月10日停刊,共出55期。

10.《学生呼声》

中共西安党组织领导西安学生运动的综合刊物。1937年1月1日创刊于西安,由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编印。主要内容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反对投降主义;宣传抗日救亡,引导学生运动和救亡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活跃学生文艺创作,促进救亡活动的开展。创刊号有柳青写的《献诗》,张语还写的《西北学生当前的任务》和《毛泽东访问记》。第三期有柳青写的《丁玲女士,敬礼!》等。出刊七期后被国民党陕西当局强迫停刊。

11.《民众前卫》旬刊

抗日战争时期陕西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机关刊物。1937年1月29日创刊于西安,主要负责人有王炳南、苏资琛、宋黎等。该刊主要是指导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2.《新中华报》

西安事变后,为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1937年1月19日,《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初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机关报,1939年2月7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并由五日刊改为三日刊。该报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反共阴谋,介绍陕甘宁边区抗日救亡运动和经济、文化事业发展的状况。1941年1月16日同《今日新闻》合并为《解放日报》。

13.《统一战线》

中共陕西省委创办的党内刊物。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根据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中共陕西省委于1937年1月创办了这一刊物。该刊主要刊登党的工作、党的建设类文章以及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的重要文件。同年6月2日改为《党的生活》。

14.《解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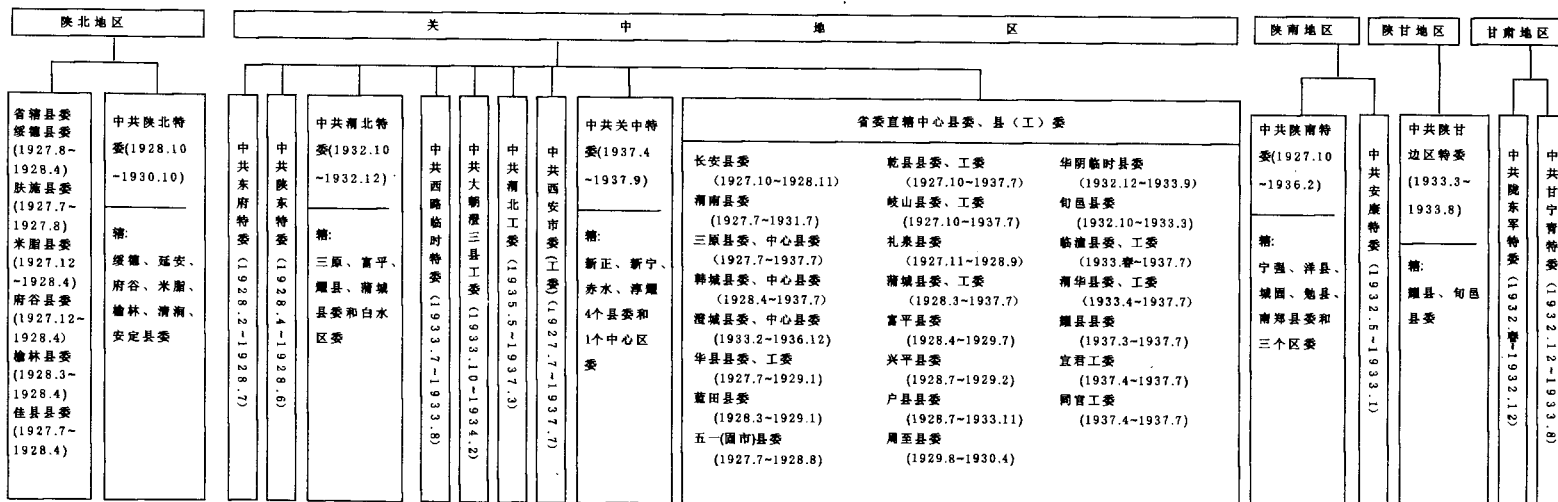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1937年4月24日在延安创刊,总负责人张闻天,编辑吴亮平。该刊主要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的方针政策,评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抗战与建设工作,介绍马列主义的理论著作。

15.《党的生活》

中共陕西省委主办的党内刊物。1937年6月2日创刊。其前身为陕西省委内部刊物《统一战线》，主要刊登党内工作、党的建设和关于建立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的文章。1940年2月停刊，共出30期。

中共陕西省委员会组织沿革序列表 (1927.7~1937.7)

中共中央 (1927.7~1927.10)	中共中央长江局 (1927.10~1927.12)	中共中央 (1928.1~1930.10)	中共中央北方局 (1930.10~1930.12)	中共河北省委 (1931.1~1931.5)	中共中央 (1931.5~1934.10)	中共中央 (1934.10~1937.7)	
中共陕西省委 (1927.7~1929.2) 书记 耿炳光 (1927.7~1928.1) 潘自力 (1928.1~1928.11) 李子洲(代理) (1928.11~1929.1) 曹德仁 (1929.1~1929.2)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 (1929.3~1930.7) 书记 杜衡	中共陕西省委 (1930.7~1933.7) 书记 杜 衡 (1930.7~1931.4) 高维翰 (1931.4~1931.8) 社 衡 (1931.8~1932.8) 孟 坚 (1932.8~1933.3) 袁岳株 (1933.3~1933.7)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 (1933.8~1933.11) 书记 刘映胜 (1933.8~1934.9) 余海平 (1933.10~1933.11)	陕西党团共同恢复 工作委员会 (1933.11~1934.3) 书记 韩学亚	中共西安中心市委 (1934.3~1934.10)① 书记 魏光波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 (1935.8~1936.12)② 书记 高克林	中共陕西省委 (1936.12~1937.7) 书记 贾拓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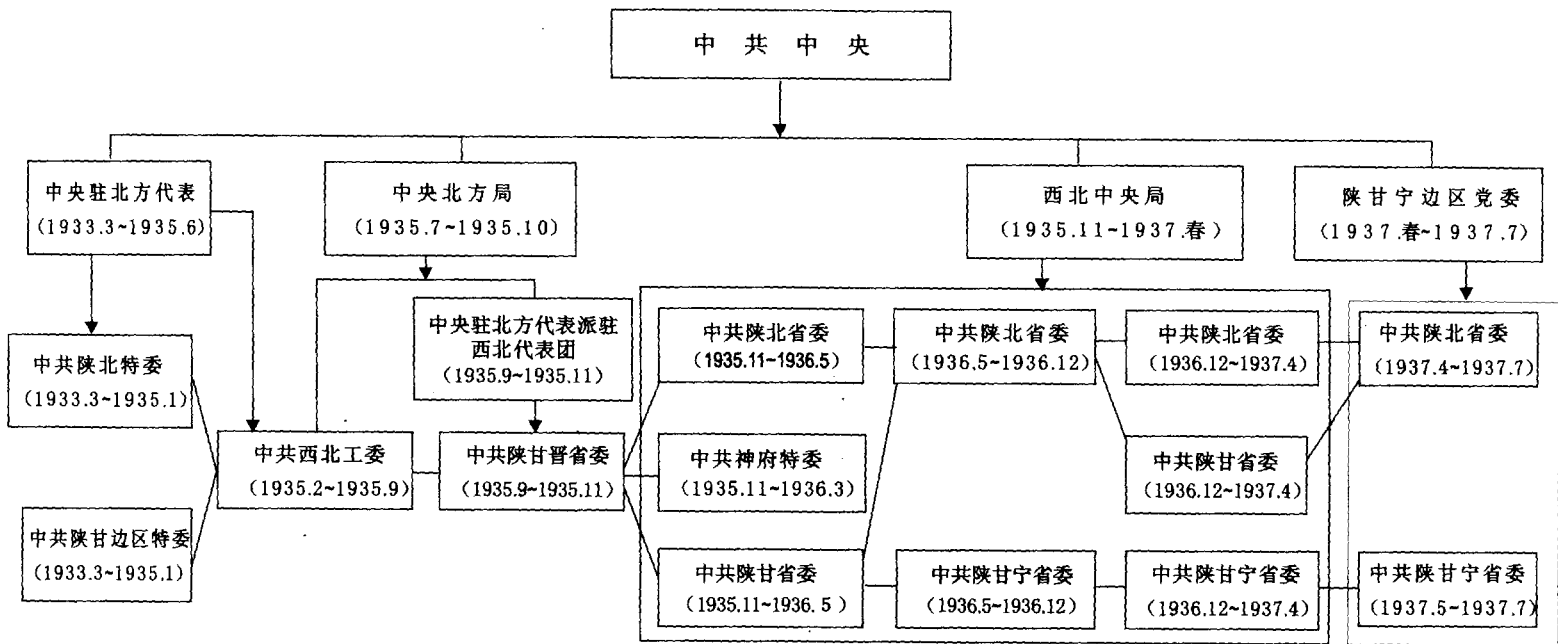


①1934年11月至1935年7月省委领导机关中断。

②1935年8月至1935年10月省委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

中共陕甘宁苏区组织沿革序列表

(1933.3~1937.7)



第三篇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组织及其活动

(1937.7—1945.8)

1937年7月7日,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中共陕西组织适时把党的工作转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方针上。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同消极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开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直接参加或配合友军奔赴抗日前线,抗御了日军的西进锋芒;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革命力量迅速扩大。在苏区,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将西北革命根据地更名为陕甘宁边区,相继建立了各级民主政权,边区成为当时抗日的坚强堡垒,延安成为中共中央指挥抗战的中心、举世闻名的革命圣地。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边区党委、边区中央局、西北局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与领导,在极端困难和复杂的条件下,领导和组织全边区人民群众,为巩固和发展边区,支援抗战,实施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有步骤地推进边区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文化等各项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政治清明,人民丰衣足食,把边区真正建成了全国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起到了先导、推动和示范作用。

第一章 中共组织与进步团体

第一节 中共组织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的组织分布在两个不同政治制度的区

域：一部分是陕甘宁边区管辖的陕西北部抗日根据地；一部分是国民党统治的关中和陕南地区。

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之后，1937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将陕甘宁苏区改为陕甘宁边区。陕北地区（不包括榆林城及其周围）和关中北部的淳化、旬邑、耀县的部分区域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中大部分地区和陕南地区为国民党统治区。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由于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和封锁，当时陕西境内各地方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无法实行统一领导，陕甘宁边区管辖的陕西地区党组织由陕甘宁边区党委（陕甘宁边区中央局、西北中央局）领导；国统区的中共组织由中共陕西省委员会领导。

到1994年初，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及陕西国统区建有1402个党支部，6779个党小组。分布情况为：延属分区485个支部，2954个小组；绥德分区332个支部，1845个小组；陇东分区239个支部，1117个小组；关中分区157个支部，425个小组；三边分区189个支部，43个小组。到1945年3月，中共西北中央局所辖陕甘宁边区的关中、三边、延属、绥德、陇东5个地委，党员达42195名（不含保安部队和神府县委），其中绥德分区有党员10541名，关中分区达3131名（抗战胜利前，陕西国统区党员达2647名）。

一、陕甘宁边区的中共组织

1. 陕甘宁边区党的领导机构

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后，由于形势变化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的需要，陕甘宁边区党的领导机构曾经有过三次变化：1937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陕甘宁特区委员会改称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郭洪涛、高岗先后担任书记，王观澜任副书记；1940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加强对陕甘宁边区党、政、军工作的统一领导，决定将陕甘宁边区党委改为陕甘宁边区中央局，高岗任书记，谢觉哉任副书记，常委有：林伯渠、萧劲光、高自立、张邦英、王世泰、刘景范；194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于同年5月将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与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为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仍由高岗担任，常委有林伯渠、陈正人、贺龙、贾拓夫等人，其机关驻地均在延安，工作任务和职能是领导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工作。

2. 陕甘宁边区党委、边区中央局、西北中央局直辖的陕北地区党组织

抗日战争开始后,为适应抗战的需要,使行政机构更便于对人民的组织领导,经中共中央批准,撤销了边区内省的建制。1937年7月撤销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分别成立了中共陕北东分区委员会和中共陕北西分区委员会。9月又撤销这两个分区党的委员会,其所辖安塞、子长等十余个县委由陕甘宁边区党委直接领导;撤销中共陕甘宁省委,同年10月,在定边中心县委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三边特区委员会,原陕甘宁省委领导的中共神府特区委员会名称未变;将中共陕西省委指导的关中特委划归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并改称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书记先后为习仲勋、张德生)。另外,边区党委还分别成立了秘密的中共绥德特别委员会(书记先后有:郭洪涛、马明方、刘澜涛、李合邦、张秀山)和中共洛川工作委员会(不久又改为特别委员会,书记先后有高克林、秦力生、强自修)。

截至1938年夏,边区党委下辖中共关中、神府、三边、绥德、洛川和庆环、陇东等七个分、特委,及清涧、安塞、子长等十余个县委。

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管辖的陕西境内地区一级党组织有:中共陕北东分区委员会(1937.7—1937.9,书记张达志)、中共陕北西分区委员会(1937.7—1937.9,书记马文瑞)、中共关中地方(特区、分区)委员会(1937.9—1945.8,书记为张德生)、中共神府分区(特区)委员会(1937.7—1945.2,书记先后为武开章、刘长亮)、中共三边地方(特区、分区)委员会(1937.10—1945.8,书记先后有:白如冰、刘英勇、白栋材、白治民、高峰、郭炳坤)、中共绥德地方(特别)委员会(1937.10—1945.8,书记先后为张秀山、李景波、习仲勋、李井泉)、中共延属地方委员会(1943.1—1945.8,书记先后为张邦英、王震、李景膺)、中共洛川特别(工作)委员会(1937.11—1943.3)。以上党组织先后隶属中共陕甘宁边(特)区委员会、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中共西北中央局领导。其中关中特委曾由陕甘宁省委、陕西省委领导,神府分委曾由晋西北区党委、晋绥分局代管。陕甘宁边区党委和西北中央局直辖陕西境内的县级党组织有中共延安市委员会、中共延安县委员会、中共安定县委员会、中共延川县委员会、中共延长县委员会、中共固临县委员会、中共甘泉县委员会、中共富县委员会、中共志丹县委员会、中共安塞县委员会、中共靖边(靖横)县委员会、中共南泥湾垦区委员会。

二、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

1. 中共陕西省委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陕西省委机关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泾阳县云阳镇,以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的名义做掩护,领导全省国统区党的组织和抗日救亡运动,省委隶属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中共陕西省委是在西安事变后重建的,省委领导成员也基本上是省委重建时的领导成员,省委书记贾拓夫,省委常委欧阳钦、张德生、潘自力、惠子俊、崔廷儒、张秀岩(女)、赵伯平、汪锋;省委委员共16人:贾拓夫、欧阳钦、张德生、潘自力、惠子俊、崔廷儒、张秀岩、赵伯平、汪锋、董学源、危拱之(女)、谢华、王俊、张策、李铁轮、阎揆要;省委候补委员陈煦、胡达明、刘拓。省委秘书长先后为崔廷儒、张中。省委工作部门设有组织部(部长张德生)、宣传部(部长先后为潘自力、欧阳钦)、军事委员会(书记欧阳钦,兼)、统战部(部长先后为欧阳钦、汪锋)、妇女部(部长先后为危拱之、张秀岩)、民运部(部长赵伯平,兼)、青年部(部长王俊)、工人工作委员会(书记胡达明)、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赵伯平,兼)、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张秀岩)、监察委员会、西北周刊(负责人欧阳钦,兼)。

到1938年8月,关中、陕南已有53个县建立了党的组织,其中同官(今铜川市城郊区)、宜君、耀县、临潼、蓝田、长安、高陵、韩城、渭南、华县、富平、宝鸡、岐山、凤翔、扶风、乾县、礼泉、永寿、麟游、勉县、洋县、城固、宁强、南郑、西乡等25个县建立了县委或县工委,三原、蒲城两县建立了中心县委。在此基础上又先后建立了西路^①特委(书记先后为张庚良、崔廷儒)、商洛工委(书记先后为王柏栋、彭一民)、陕东南工委(书记为王力)、汉中特(工)委(书记先后为杨永旭、余洪远)、沿河^②特委(书记王俊)和西安市委(书记先后为张德生、惠子俊)。此后,省委根据组织发展的需要,又决定成立了五个地委、一个工委,原陕东南工委改为安康地委(书记刘文彬),沿河特委改为沿河地委,汉中特委改为汉中地委(书记李铁轮);新建立了西府^③地委(书记吕剑人),东路地区^④未建立地委,设特派员指导各县工作。

① 西路地区是指西安至兰州的公路沿线各县,又称西兰地区。

② 沿河地区是指关中东部沿黄河西岸的各县,又称东府地区。

③ 西府地区是指西安至宝鸡沿陇海铁路各县。

④ 东路地区是指西安至潼关沿陇海铁路各县。

1938年至1939年上半年,省委领导成员变动较大,原任常委中潘自力、张秀岩(女)、崔廷儒、贾拓夫四人先后调离,惠子俊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中共中央于1939年5月任命欧阳钦担任省委书记,常委为张德生、赵伯平、汪锋,委员会由欧阳钦、张德生、赵伯平、汪锋、董学源、胡达明、李铁轮等七人组成,候补委员张林、陈煦,秘书长张中。省委工作部门有组织部(部长张德生)、宣传部(部长赵伯平)、军事委员会(书记先后为欧阳钦,兼、汪锋,兼)、统战部(部长汪锋)、社会部(部长余洪远)、青年部(部长先后为董学源、赵伯平)、职工部(部长胡达明)、妇女部(部长张德生,兼)。

为了缩小目标,防止国民党对中共地下组织的破坏,陕西省委于1939年9月决定,撤销地委一级组织,改用特派员联系指导各县工作,同时决定成立长安(书记李浩)、礼泉(书记先后为张思明、王育英、张思敬)、岐山(书记先后为王宏谟、张军)、洋县(书记江碇)四个中心县委。在巩固组织的过程中,陕南的商县、安康、岚皋,西府的眉县、周至,东府的澄城、华县等14个县还相继建立了县委或县工委。

1939年底至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陕西国民党统治区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省委机关受到严重威胁与限制,在此情况下,根据中央指示,陕西省委机关大部分人员于1939年12月从国统区泾阳县的云阳镇迁移到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淳耀县安社村,1940年夏又迁到耀县照金镇,1941年底迁到新正县马栏镇(今属旬邑县)。

1941年4月22日,中共中央鉴于中共陕西省委已由国民党统治区迁入陕甘宁边区境内的关中分区,为了便于统一领导,使国统区的工作有边区作依托,遂决定将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所辖的关中分区党委划归陕西省委领导,陕西省委改归西北中央局领导。中央书记处指示陕西省委应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国民党区域,并对省委领导成员作了较大调整,欧阳钦继续任省委书记。6月,欧阳钦调回延安,张德生接任省委书记,省委常委有欧阳钦、张德生、赵伯平、汪锋、习仲勋;省委委员会由欧阳钦、张德生、赵伯平、汪锋、习仲勋、文年生、张中七人组成,秘书长张中。省委工作部门有组织部(部长先后为张德生、赵伯平)、宣传部(部长赵伯平)、统战部(部长汪锋)、监察委员会、职工工作委员会(书记胡达明)、青年工作委员会(负责人黄葳,女)、调查研究站(站长吕剑人,兼)。

1942年底,西北中央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和“加强党的

一元化领导”的指示,决定将中共陕西省委与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合并。1943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与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正式合并,成立了中共关中地方委员会,隶属西北中央局领导,统一领导关中分区和陕西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张德生担任地委书记,常委有张德生、汪锋、张仲良、文年生,委员会由张德生、张仲良、文年生、汪锋、惠庆祺、晏福生、杜平、张鹏图、牛书申九人组成,秘书长张中。地委工作部门设组织部(部长惠庆祺)、宣传部(部长高仰云)、统战部(部长汪锋)。

2. 省委直辖的党的地方委员会

这一时期,中共陕西省委直辖的陕西境内的党组织有中共西安市(工作)委员会、中共西路地方(特别、工作)委员会、中共沿河地方(特别)委员会、中共西府地方委员会、中共商洛工作委员会、中共汉中地方(特别、工作)委员会、中共陕东南工作委员会、中共安康地方委员会、中共渭南(临渭南)工作委员会、国民党第三十八军中共地下工作委员会、中共礼泉中心县委、中共岐山中心县委、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中共蒲城中心县委、中共长安中心县委、中共洋县中心县委。中共陕西省委和省委与关中分区党委合并后成立的中共关中地委先后直辖的陕西国统区县一级党组织有临潼、临潼渭河南、临潼渭河北、蓝田、长安、高陵、户县、周至、韩城、富平、渭南、华县、蒲城、澄城、朝邑、合阳、华阴、三原、泾阳、乾县、永寿、宝鸡、凤翔、岐山、麟游、同官、宜君、耀县、商县、洋县、安康、石泉、旬阳、岚皋等34个县(工)委。

第二节 进步团体

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民族抗战的需要,在中共陕西地方组织领导下,各类进步的抗日团体在陕西境内蓬勃发展。这些进步团体分别在陕甘宁边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内建立,按照实际情况,在不同方面发挥着动员组织民众抗战的积极作用。

陕甘宁边区群众团体组织,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群众团体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人民抗战的坚强后方。为了适应抗战需要和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救国要求,结成更加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陕甘宁边区先后建

立了陕甘宁边区总工会、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陕甘宁边区农民会、陕甘宁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和陕甘宁边区民众抗敌后援会、陕甘宁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等群众团体，并且逐步建立健全了各自的分区与县级组织。在边区各级党委、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各群团组织根据自己的工作特点，组织各界群众在保卫边区，建设边区，支援前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抗日爱国群众团体主要有：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北队部、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西安学联”）、陕西青年救国联合会、陕西青年团体联合办事处和陕西妇女慰劳分会。此外还有一些受党影响的抗日群众团体，如西安文化协会、西安编辑人协会、西安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西安新文字促进会、新时代歌咏团、西北民众抗战剧社、西北作家协会、西北青年抗日决死队、西北青年文艺工作者协会、木刻漫画研究会、西安世界语学会、平津同学会等。这些群众团体在抗日救亡活动中，做过大量的工作，但却受到国民党的仇视、打击和破坏。

1. 陕甘宁边区民众抗敌后援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陕甘宁边区的群众抗日运动蓬勃发展，成立了各种抗日救国团体。为了使各群众团体行动统一，便于组织领导，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的指示，于1938年1月15日在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民众抗敌后援会筹备委员会，主任毛齐华。1938年1月29日由边区总工会、边区青救会、边区妇联会、边区农民会、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延安市商会、陕北公学学生会、陕北公学同学会、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同学会、国防教育研究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延安队部、世界语协会、新文字研究会、延安中华基督教会、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边区民众抗敌互济会、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国民外交协会、边区体育委员会、边区抗敌电影社、鲁迅艺术学院学生会、音乐界救亡协会、西北战地服务团、青年记者协会延安分会、实验剧团、边区中学学生会等26个群众团体，各派代表3人，召开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陕甘宁边区民众抗敌后援会。大会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民众抗敌后援会章程》，通过并发表了成立宣言，选举出毛齐华等21人为执行委员，吕骥、朱光为候补执行委员。第一次执委会推举毛齐华等11人为常务委员，李凡夫、张光远为候补常务委员，毛齐华、马豫章为正副主任。常委会之下设秘书长、宣传部、

组织部、农民部、职工部、青年部、妇女部、武装动员部、锄奸部、商民部。边区抗敌后援会先后隶属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边区中央局、西北中央局领导，机关驻延安市南门外新市场。下辖三边分区、神府特区和边区直属县(市)，以及甘肃境内的庆环(陇东)分区抗敌后援会。

抗敌后援会与边区以外的抗日群众团体加强联系，采取一致行动，推动和影响全国群众抗敌运动的开展。根据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1943年5月，边区抗敌后援会停止活动。

2. 陕甘宁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

1942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精神，西北中央局决定边区总工会、青救会、妇联会三个群众团体联合组成陕甘宁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但工、青、妇三团体名义继续存在。经三团体推选协商，组成筹备委员会。1943年5月13日正式成立陕甘宁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一说将陕甘宁边区民众抗敌后援会更名为陕甘宁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崔田夫，实行工、青、妇三家合署办公，精简了机构和人员。

边区抗联会在西北中央局领导下开展工作，内设宣传、组织、职工、青年、妇女等五个部，机关驻延安市南门外新市场，下辖神府分区、三边分区、边区直属各县和甘肃境内的陇东分区抗联会。

3. 陕甘宁边区总工会

1937年6月19日，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召开干部(包括陕西省工会全体干部)会议，除总结陕西省工会五个月的工作外，并决定筹备召开陕甘宁边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大会还对工代会代表的选举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决定采用最彻底、最民主的选举方法，逐级选举代表。会后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临时委员会，主任由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主任刘长胜兼任。

1937年11月26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临时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1938年3月18日(后推迟到4月17日)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并成立了一个由13人组成的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毛齐华为主任。

1938年4月17日至23日，陕甘宁边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代表226人。其中香港海员工会、码头工会、粤汉铁路、同蒲铁路、郑州豫丰纱厂工人生活维护会等工人团体也派代表出席。刘少奇在大会上作抗战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毛泽东就统一战线问题作了重要讲话。毛齐华代表

边区总工会临委会作了《边区抗战以来职工运动的总结和今后的方针》的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章程》，正式宣布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成立。会议选举由37名执委和9名候补执委组成的执委会。4月24日执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选九人为常委，毛齐华、管瑞才为正副主任。边区总工会的成立，标志着边区工会实现了组织上的统一，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

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成立后，把支援抗日战争和巩固边区民主政权作为工人运动根本任务。1939年3月10日至15日，边区总工会在安塞召开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庆环、三边、关中三个分区和20个县的工会组织及延安市各工厂代表共45人出席了会议。边区总工会主任毛齐华作了工作报告，与会代表经过讨论一致认为，各级工会的中心工作是努力生产和加紧学习，切实注意选拔和培养工会干部。1940年4月13日至22日，边区总工会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推选高长久为主任，萧彩峰为副主任。1943年5月，边区各级党政群机关团体实行精兵简政政策，边区总工会与边区青救会、妇联会合署办公，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总工会名义仍然存在。1944年5月1日至25日，边区总工会与边区政府共同在延安召开工厂职工代表大会，由于工厂职工的增加及原有执委的减少，大会补选赵占魁等18人为边区总工会执委，使执委会总人数达到49人，候补执委7人，会上还推选了7名常委，崔田夫为主任，萧彩峰为副主任。

1945年2月15日，边区总工会常委会作出《关于发起成立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的决定》，并致电各解放区工会，邀请派代表赴延安组织筹备会。1945年4月19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常委会召开会议，推举朱宝庭、赵占魁、崔田夫、李颀伯、萧彩峰五人为陕甘宁边区参加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的代表。1945年4月22日在延安成立了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委会。

边区总工会先后隶属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边区中央局、西北中央局和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领导。内设秘书处、组织部、文教部、抗战动员部、劳保部和工作调查组。机关开始驻延安市，1938年11月迁往安塞真武洞，1940年初又迁回延安。先后下辖关中、神府、三边、绥德等分区和直属各县及甘肃境内的庆环(陇东)分区的工会组织。

4. 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

1937年4月，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青救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西北青救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冯文彬任主任。

为了加强与全国青年团体的联系,进一步开展与扩大青年救亡运动,1937年12月初,西北青救会由延安移驻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安吴堡等地办公。在延安新成立了陕甘宁特(边)区临时青年救国联合会,统一领导陕甘宁特(边)区各级青救会和青年运动。

1938年10月10日至11月21日,西北青救会在延安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的有西北、西南、华北、华南、南洋等地代表314人,大会选举了西北青救会新的领导人。加强了各青年团体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团结和统一,大会成立了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办事处由55名执行委员组成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推选7人为常务委员,4人为候补常务委员,主任冯文彬,副主任李昌。西北青救会、中华青联办事处与同年5月成立的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3个机构在延安合署办公,一套班子,这样形成了以中共中央青委为核心,以中华青联办事处为主体的全国青年运动领导机关。

1945年初,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为了适应抗战胜利后形势与任务的要求,交流解放区青年工作经验,援助大后方青年的民主运动,争取沦陷区青年参战,中华青联办事处、西北青救会、陕甘宁边区青救会和陕甘宁边区学联于3月28日联合提出组织“中国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的倡议。1945年5月3日,西北青救会在延安组织召开了中国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会上由各解放区青年团体选出24人组成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筹委会,并推选出11人为常务委员,主任冯文彬,秘书长蒋南翔。

中国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筹委会的建立,标志着西北青救会、中华青联办事处完成了历史使命,青年运动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西北青救会设有组织、文化教育、宣传、青妇、社会、儿童、军事体育、联络、军事、经济等工作部门。先后领导过陕西省、陕甘宁省、陕甘省和陕北东、陕北西、关中、神府、三边、绥德、洛川等分(特)区和边区直属各县,以及甘肃境内的庆环(陇东)分区青救会,还在西安、渭北设有办事处。西北青救会还举办过著名的安吴青年训练班,组织过抗战剧团、孩子剧团、总剧团、青年艺术剧院和战地工作团,主办过《青年战线》杂志。

西北青救会成立之初机关驻在延安市,1937年12月迁至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1938年3月又迁到泾阳县安吴堡,1938年10月迁回延安。其主任先后有:冯文彬、白治民、高朗山。

中华青联办事处设有组织、干部、宣传、社会服务、经济、军事、管理等工

作部门,主办《中国青年》杂志,领导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和华北巡视团、边区青年工作团、绥(德)米(脂)考察团、少年儿童工作团。中华青联办事处机关一直驻在延安。

5. 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

1937年12月,西北青救会移驻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以后,为了继续加强对陕甘宁边区青年救亡运动的领导,即组建了陕甘宁边区青年临时救国会。边区青救会由九人组成,主任委员高朗山,负责各级青救会的改选工作,积极准备召开边区的青年代表大会,成立边区青年救国会。

1938年10月2日至7日,陕甘宁边区第一次青年救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代表204名。贺龙代表中共中央讲话,希望边区青年把模范作用推广到全国去。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要求边区青年担负起把全国青年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任务。高朗山向大会作了《边区临时青救会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武装边区青年参加抗战》、《加强边区青年文化教育》、《巩固扩大青救组织》、《改善边区青年生活》等决议案。大会正式成立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选举执行委员29人。1939年6月初,边区青救会召开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决定改乡俱乐部为乡青救会,学校一律成立学生会,军队、机关和自卫军组织青年队,各级青救会主任改称主席。

1941年9月,西北青救会派韩天石、杜绍西、黄爱民、田澍四人加强充实边区青救会,对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1941年11月,由西北青救会领导的延安市青联划归边区青救会领导。1942年春,西北青救会派往边区青救会加强工作的人员相继调离,边区青救会重新调整了领导成员。

1942年8月,为贯彻精兵简政的方针,边区总工会、青救会、妇联会三团体合署办公,组成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工、青、妇组织的名义继续存在。边区青救会先后隶属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边区中央局、西北中央局和西北青救会。边区青救会设有秘书、组织、文化教育、宣传、军事体育、青年妇女、儿童、少先队、统一战线、经济、青年训练班、巡视团等工作部门。主办过《新中华报》的“青年呼声”专栏和《边区青年》杂志。先后下辖关中、神府、三边、绥德、洛川等分(特)区,各直属县(市)和甘肃境内的庆环(陇东)分区青救会。边区青救会机关开始驻在延安市,1938年12月迁至安塞县真武洞王家岔,1940年初迁回延安市。主席先后有高朗亭、白向银、李瑞山、王治周。

6. 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根据洛川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制定的《妇女工作大纲》精神,作出《关于边区妇女群众组织的新决定》,要求在乡以上成立各界妇女联合会(简称妇联)。这一决定得到毛泽东、张闻天、李维汉、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及各界人士的支持,各机关、团体、学校400多人纷纷表示愿意发起赞助。1937年9月12日在延安抗大召开发起人与赞助人大会,选举由李坚真、蔡畅、丁玲、史秀云等15人组成的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李坚真、史秀云当选为正副主任。

边区妇女在筹委会的领导下,仅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改造并成立了县、区各级妇女联合会。边区妇联筹委会与边区内各群众团体、各机关及西安、汉口等国统区的各救亡团体建立联系。1938年3月8日,在延安师范学校召开陕甘宁边区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史秀云为主任。边区妇联会成立后,领导广大妇女积极地投入了更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边区妇联的会员由原来的17万人增加到27万人。1943年5月13日,边区妇联与边区总工会、边区青救会合署办公,组成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1944年春,边区开展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妇婴卫生运动需要有健全的妇女组织及大批妇女干部来领导,西北中央局决定,边区妇联会重新开始对外办公。1945年3月,边区妇联会作为中国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的发起单位,为建立中国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委会积极工作。

边区妇联先后隶属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边区中央局、西北中央局和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辖关中、三边、神府、绥德、洛川等分(特)区、直属县和甘肃境内的庆环(陇东)分区的妇女组织。刘秀梅、徐明清、白茜也曾任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主任。

7. 陕甘宁边区农民会

陕甘宁边区农民会是由贫农会改建而成的。1938年有会员42.1万人。陕甘宁边区农民会归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领导,机关驻延安市。负责人有李子厚、崔田夫。

8. 陕甘宁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

为揭露日寇灭亡全中国、灭亡回族的阴谋,提高广大回族群众的抗日热忱与信心,提高边区回族的文化水平,使回汉民族密切团结,共同发展,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成立回民文化促进会的决议,以谢觉哉、李维汉等39人组成的陕甘宁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筹备委员

会,积极进行各项筹备工作。

1940年10月7日至16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陕甘宁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暨陕甘宁边区回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边区各分区回民代表及延安市全体回民、各机关学校代表千余人出席。大会推选谢觉哉、林伯渠、邓发、高岗等25人组成主席团。大会由回族马青年致开幕词,朱德、王明、张闻天、高自立、谢觉哉到会讲了话。大会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宣布成立陕甘宁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支会,推选高岗、林伯渠、谢觉哉、周扬、张仲实、延安马阿訇、定边马阿訇、三岔马阿訇、关中马阿訇等30余人为理事,谢觉哉为会长;成立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鲜维峻为主任。翌年春,关中、陇东、三边分区相继成立了回民文化促进会支会。陕甘宁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和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先后隶属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西北中央局领导,机关均驻延安市。

9.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陕西地方组织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在陕西国统区建立于1936年10月,初期领导机关为民先西安队部。抗战开始后,民先西安队部通过学生工作团、寒假工作团、外县旅西安学生回乡工作团、平津流亡陕西学生中的民先队员,迅速在关中、陕南各县发展组织。1938年3月初,民先全国总队部由临汾迁至西安,加强和帮助陕西民先队工作,并于4月上旬、中旬分别召开民先西北代表大会和全国临时代表大会,成立了民先西北队部,统一了陕西国统区和西北其他省区民先组织的领导。同年2月和5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两次下令解散陕西国统区各级民先队,逮捕民先西安队部和西北队部负责人于志远、李连璧,迫使全国总队部于7月中旬迁往武汉,陕西国统区各级民先队由半公开活动转入秘密活动。同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扩大会议和省委青委扩大会议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陕西国统区青年运动面临的逆境,决定民先队等组织转变为其他能公开合法存在的青年团体。1939年上半年,民先队实行组织与工作转变,优秀队员多被吸收入党,其他队员转入其他公开合法组织,除个别地方民先队坚持到1940年外,大多于1939年夏停止活动。

民先西安队部成立于1936年10月,下设组织部、宣传部、训练部、《先锋报》、办公室等部门。1938年2月在全陕民先干部扩大会上改选了队部领导机关,于志远担任队长。1938年4月民先西北队部成立之前,西安队部除领导西安地区民先队外,还领导陕西各县和甘肃、新疆等省区的民先队。民先

西安队部设有党团,傅希荣、于志远、朱怀琳(朱平)先后任党团书记,归中共陕西省委西安学委领导;下辖西安地区的西安临时大学、西安师范、西安高中、西安省立二中等二十余所大、中、小学民先分队和大华纱厂、铁路分局、邮电局、电讯局、红十字会医院等15个企事业单位以及西安郊区农村的民先队,队员最多时达1100余人,先后以西安师范、西安省立二中、北大街平民坊五号等地为机关驻地。1939年夏停止了活动。队长先后有李连璧、于志远、朱怀琳。

1938年2月,陕西民先干部扩大会议决定继续在全省各地广泛发展民先组织,争取公开合法。同年4月4日至7日,民先全国总队部在西安师范学校主持召开民先西北代表大会,为加强对西北地区民先工作的领导,促进西北青年的团结和西北青年运动的发展,大会决定成立民先西北队部,民主选举了队部负责人,李连璧任队长。下设组织、宣传、青年服务、交际、统战、妇女各部。5月下旬,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策划逮捕民先全国、西北队部负责人,组织决定李连璧赴西路、渭北巡视工作,苏展代理队长。7月14日,李连璧被捕,西北队部其他负责人相继调离西安,中央青年委员会决定丁发善任西北队部队长。1938年12月省青委扩大会后,西北队部停止了工作。民先西北队部设有党团,李连璧、丁发善先后任党团书记,由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同时受民先全国总队部领导;下辖陕西国统区渭北、汉南地方队部及各县和甘肃、新疆民先组织;先后以西安师范学校、西安北大街通济坊为机关驻地。

10. 陕西省抗敌后援会西安学生分会

1937年8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了陕西省抗敌后援会,以统一领导群众救亡运动为名,于8月24日下令取消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等救亡团体。中共陕西省委及时指示学生必须有总的独立组织;巩固扩大学联基础并参加改组后的省抗敌后援会,坚持可以改名而不能取消组织的正义要求,领导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进行谈判,最终以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改称为陕西省抗敌后援会西安学生分会而取得西安学生组织的合法存在。9月25日,陕西省抗敌后援会西安学生分会(简称西安学生分会)正式成立,成为名义上由国民党陕西省抗敌后援会领导,实际上受中共陕西省委西安学委直接领导,包括西安大、中、小学2万多学生会员的公开合法组织。西安学生分会领导机构为秘书处。1938年3月改选后改为常委和主席常委制,内设中共党团,党团书记先后由刘日修、蒲望文(苏一平)、毕于仁(陈煦)、姚秀山、杨文秀(杨克)担任,是全国学联的主要成员之一。1938年4月派代表团出席

了全国学联代表大会。由于西安学生分会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反对倒退、分裂,所以始终遭受国民党顽固派的打击、刁难。1938年秋季西安学生分会改选时,国民党陕西当局下令取消西安学生分会和各校学生分会。鉴于西安形势逆转,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各校学生参加学校分会坚持抗日救亡,西安学生分会转入秘密工作。11月,随着日机轰炸西安和各校外迁,西安学生分会停止了活动。

11. 陕西青年救国联合会

西北青救会于1937年10月在泾阳创办青训班之后,又相继设立了西安办事处和渭北办事处。从1938年初开始,西北青救会和西安办事处陆续派干部和青训班毕业学员到陕西国统区关中部分县建立青救会组织,并在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取消青救会的斗争中不断发展,会员达3000余人。11月,西北青救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后,西北青救会为加强对陕西国统区青救会的领导,在形势好转时与国民党领导的陕西三青团开展统战工作,决定黄爱民负责筹建陕西省青救会。12月初,陕西省青救会在泾阳县安吴堡召开成立大会,到会关中各地青救会代表30余人,选举了陕西省青救会领导成员,主任黄爱民。陕西省青救会隶属西北青救会和中共陕西省委青委领导,以泾阳县安吴堡为机关驻地。1939年春在实现工作与组织转变中停止了活动。

12. 陕西青年团体联合办事处

1938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青年工作委员会为了加强党对陕西民先队、青救会等青年团体的领导,促进陕西青年统一战线的发展和组织形式、工作方式的转变,决定成立陕西青年团体联合办事处(简称青联办事处)。1939年1月,青联办事处正式成立,机关设在泾阳县安吴堡,负责指导陕西国统区各地青年组织的工作。主任先后为宋继唐、李连璧。青联办事处一直坚持到1940年4月省委机关撤退到陕甘宁边区,方停止工作。

13. 陕西妇女慰劳分会

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于1937年8月1日在南京成立。陕西妇女慰劳分会是1937年8月16日在西安妇女救国会的基础上改组建立的。妇慰会以当时的省政府主席孙蔚如的夫人李定荫为会长,以共产党员为骨干,以西安女学生和女教职员工为主要会员的公开的、合法的抗日救亡团体,由中共陕西省委妇女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1938年夏季以后,妇女慰劳分会不断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刁难、打击、破坏。1939年5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对妇

慰会进行改组,妇慰会从此被国民党所控制。

14. 西北民主青年社

西北民主青年社是在抗战后期国统区民主运动再次高涨的形势下,由陕西国统区地下党组织领导和民盟西北总支指导下,秘密建立的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进步青年组织。1945年初,先在西安、城固、武功、咸阳等地大专院校和中学建立了各种名称的基层组织。4月,在西安老关庙街五号建立了领导机关——西北民主青年社,成员以学生为主,并有一部分中、小学教师和其他职业青年。领导机构是五人小组,其成员是李敷仁、武伯伦、王维祺、张光远、郑竹逸,均为共产党员。对内接受中共关中地委领导,对外是西北民盟总支青年部,以民盟名义公开活动。机关刊物是《文化周报》。

15. 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派出中央委员郭则沉为西北盟务特派员,来西安筹建西北民盟支部,邀请杜斌丞加入民主同盟。杜与杨明轩、王菊人、郭则沉等人发起成立民盟西北总支筹备委员会,提出“亲苏,友共,努力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1945年2月,民盟西北总支部在西安秘密成立,杜斌丞、王菊人、杨明轩、成柏仁、李敷仁等为委员,杜斌丞为主任委员。1945年秋,杜斌丞与杨明轩等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促成陕西进步报纸《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成为西北民盟机关报,杜斌丞任发行人。到1945年底,西北民盟发展盟员达千人,在陕西的27个县市和甘肃、宁夏等地都建立了组织。抗战胜利后,西北民盟反对内战,坚持民主,为蒋介石所嫉恨,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制造事端,迫害西北民盟,1947年10月7日,枪杀了西北民盟主委杜斌丞。从此,西北民盟的活动受到限制。

16. 西安新文字促进会

成立于1936年12月,负责人有杜松寿、蔺克义、时春茂。1938年上半年改名为西北中文拉丁化研究会,内设党团,隶属中共西安学委领导。2000多名会员多属西安学生中的新文字爱好者,各校设有分会,以新文字为武器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8年2月和5月两次被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通令取缔;6月,其主要负责人蔺克义被捕;同年9月该机构被迫停止活动。

17. 西北文艺青年工作者协会

前身是西北文艺青年协会,成立于1937年1月,以西安学生中的文艺爱好者为主要会员,利用文艺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以《沙河》刊物和旅

行剧团为主要宣传阵地。内设党团,隶属中共西安学委领导。负责人有方晨、何梦溪、张路、郑克昌、刘蕴华(柳青)、赖斯徒、王庆昌、张翰文、许冷梅。1938年5月被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宣布为“非法团体”通令取缔后,被迫停止活动。

18. 西安平津同学会

是1937年9月21日在西安成立的公开合法的救亡组织,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大学迁到西安后成立的西安临时大学学生和其他各地流亡到西安的学生为会员,以解决流亡学生求学与生活困难,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为主要任务。受中共西安学委、西安学生分会、民先西北和全国队部指导。创办有《平津学生》、《怒吼》刊物和平津学生演剧队。总务部长先后有种肇煦、钱万生。1938年秋西安政治形势恶化后停止活动。

19. 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

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于1940年9月5日在延安成立。是抗战时期的归国华侨进步团体,简称“救联会”。主要成员为延安鲁艺、抗大、女大、陕北公学等学校中的东南亚及美、法等国归国华侨。该会积极组织延安地区归国华侨参加抗日工作,并发起成立西北华侨实业公司,参加延安大生产运动,为抗战事业和边区建设做出了贡献。抗战胜利后,改名为延安华侨联合会,继续率领爱国华侨投身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第二章 抗日救亡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共陕西省委,以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机关驻泾阳县云阳镇)的名义作掩护,领导关中、陕南国统区中共组织和群众开展了广泛的群众性抗日救亡活动。

第一节 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中共中央就提出了一系列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1937年5月22日至27日,中共陕西省委在泾阳县云阳镇召开了中共陕

西省代表大会,省委书记贾拓夫向会议作了《目前陕西党的任务与工作》的报告,提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就是要动员和领导千百万的群众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为和平民主与抗战而斗争!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并取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斗争!”

当时,陕西党组织内部有不少同志还习惯于国共两个政权对立时期的斗争方式,对于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理解,对党的斗争策略、政策变化想不通。也有一些同志从另一个极端看问题,认为国共合作,太平无事,党员无事可做了。针对党内一时出现的糊涂认识,省委在党内刊物《党的生活》上发表了《谈谈斗争方式的新变化问题》等文章,严肃地批评了党内这些错误观点。指出:斗争不单是黑铁和赤血的敌对行为,这只是斗争发展到最高限度的一种形式;无产阶级为了达到自身阶级利益所要求的目的,除武装斗争之外,还有和平的、合法的、批判的各种斗争形式;如果只是把斗争狭隘地局限于生杀决战上面,那就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也就不能完成党的促进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因而我们不是要取消斗争,而是要加强群众斗争的力量,团结全民族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保证党在群众斗争中能够始终起到核心的领导作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共陕西省委为贯彻中央的方针,动员国统区的人民团结抗日,于7月10日发表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事件告西北各界同胞书》,号召西北各界同胞立即团结起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而奋斗到底。7月12日,中共陕西省委又发出《关于日本进攻平津与党的任务及工作的指示》,要求全省各地党组织立即加紧进行抗战的宣传鼓动工作和抗日人民的组织工作,争取抗日救国的民主、自由,为发动全民族的全面抗战而奋斗。10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致书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要求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立即扩大救亡运动,组织民众、武装民众,给民众以抗日救国之民主自由,彻底实现陕西人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了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断扩大统一战线范围,尽可能多地团结各方面的力量,省委设立了统战部,省委常委欧阳钦、汪锋先后担任统战部长,省委常委会、省委扩大会也经常讨论、布置统一战线工作。此外,省委还通过“西北社”、“留守处”、“联络站”、“青训班”等公开或半公开的机关,推动国民党政府及各阶层人士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起初,省委统战工作的对象局限于上层人士中的进步分子,国民党第十七路军

中进步的中下层军官,省、县级公务人员及教育界的进步名流等。到1937年底,省委统战工作的范围扩大到国民党政权阶层、中间人士(各地绅士)和广大农村,使国统区城乡的抗日救亡活动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1937年12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贾拓夫作了《一年来陕西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及目前工作方针》的报告,从六个方面列举了一年来省委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取得的成绩。其中最突出的方面是广大群众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由不明白、很模糊、很怀疑到坚决相信拥护,救亡统一战线的阵容由先进觉悟的群众发展到中间甚至消极落后的群众,救亡运动的范围由西安发展到外县广大农村,参加人员由学生、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发展到工人、农民。在开展救亡运动的过程中,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大大提高了党的威信,加强了党对救亡运动的领导。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陕西当局也疯狂地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迫害共产党员,查禁进步书报,撤换保甲长中的进步分子,由地方上最坏的地主豪绅和反共顽固分子代替。针对这些新的变化,中共陕西省委采取了许多相应的对策。张德生在1939年4月省委组织部长联席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党的独立性,坚持党的马列主义的政治路线,坚持对其他同盟者的阶级批评,警惕一切反共的阴谋和企图。7月24日的省委会议则更明确地指出:今日抗战形势中的最大危险,即是由于日寇政治诱降的恶毒阴谋、中国投降妥协分子之投降与分裂的活动所造成的中途投降与内部分裂的危险;因此我们的紧急任务是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为了适应政治形势的变化,省委在统一战线工作上采取了相应的对策,最大限度地利用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国民党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在陕西主要表现为西北军与国民党中央的矛盾,地方士绅名流与国民党政府的矛盾。省委对国民党内部不同政治态度的人采取不同策略,孤立打击坚决反革命的顽固分子,争取中间势力,团结开明进步人士,以有效地分化他们,增加统战力量。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还在国民党的行政、教育、军事、党务系统中取得职务,有的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开展工作。如在临潼国民党县党部工作的张依中,在眉县任三青团干事长的李骥德,出任国民党临潼、渭南、华县、合阳县长的张锋伯、崔孟博、吕向晨、苏资琛,麟游县国民党县政府教育科长赵伯经,大荔中学校长黄绪森,渭南赤水职业学校校长王璋峰

(王尚德),临潼徐阳中学校长刘继曾,中正中学校长孙巽山以及何寓础、冯树梅、冯一航、赵曼青、李敷仁等知名人士,他们以自己的公开身份安插进步人士,掩护共产党员及革命青年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张依中借在县党部工作之便,将县党部两次查询共产党员董实丰之事及时告董,使董安全撤回省委。民主同盟的杜斌丞、韩兆鹗,国民党三十八军的陈雨皋,教育界的李瘦枝,竞存中学校长、东北籍知名人士车向忱,泾阳县云阳镇的崔冠一等民主人士,均同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为人民立下了重大功绩。

第二节 支援八路军出师抗日

193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刚刚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即誓师出征抗日。8月至10月,八路军总部及所辖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三支主力先后从三原县、富平县出动,进入渭南境内,经蒲城、澄城、合阳,入韩城县,由芝川镇渡口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省荣河县(今万荣县)境内,奔赴华北抗日前线。红军在出征过程中,总部及各支部队均由陕西渭南地区的富平、蒲城、白水、澄城、合阳、韩城(今韩城市)一线经过,由韩城县芝川镇东渡入晋,前后共40余天。八路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斗志昂扬,宣传群众,鼓舞人民,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沿途各地的中共组织也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界人士,以及国民党的地方政府,以各种方式,表示了对八路军的由衷钦佩和热烈迎送,从多方面给部队以支援,支持八路军出师抗日。其他地区的党组织、人民群众也以不同方式,支援八路军出征。

一、举行欢送活动

八路军出师抗日的路线是由共产党提出,经与国民党方面谈判,双方一致同意的。在八路军出动前,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给沿途各县下达命令,由地方政府负责组织欢迎和支应等事宜。八路军总部路经蒲城县陶池村一带时,国民党蒲城县县长到朱德总司令的住处拜见。为了欢送朱德总司令和八路军上前线抗日,澄城县政府在县城举行迎送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各界人士和从远处赶来的群众数千人。总部抵达合阳县城,国民党当局在县政府召开欢迎八路军出师抗日前线大会,县府官员、城区学校师生等参加大会。朱德在大会上讲话,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说明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重

要意义,号召后方人民努力生产,支援前线。在八路军到达韩城县一周前,县政府就成立了有工商界和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参加的韩城各界人士欢迎八路军筹备委员会,筹备欢迎各项事宜。总部由合阳县向韩城进发时,韩城县县长到县城南40里的马陵庄迎候朱德总司令和八路军。八路军其他各部经过渭南地区时,也受到了地方政府的迎送。

1936年12月底中共陕西省委恢复后,逐步整顿、恢复各地党的组织。八路军出师抗日时,这一带党组织还未完全恢复,同时八路军与地方党组织不直接发生联系。八路军过境时,地下党尽管处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仍开展了多方面的活动。一是通知各支部刷写、张贴欢迎标语;二是组织学校师生欢迎、慰问八路军指战员;三是指示党员和进步教师请部队的人员到学校给师生讲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四是组织群众欢送青年参加八路军。部队经过合阳、韩城许多村庄的学校时,都有共产党员组织的欢迎活动。地下党组织还利用直接或间接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进行欢迎活动。

广大群众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对共产党、八路军(红军)的热爱,殷切盼望八路军早日驱逐日寇,收复失地,救民出水火。在八路军沿途经过的大小村镇,群众在村口、道边摆放长桌,上面放满了糕点、水果和其它食品,准备了开水,慰问出征的将士。经过县城和大的集镇时,各界代表和商会、市民搭起牌楼,张贴标语,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夹道欢迎八路军出师抗日。部队路过这里一个多月,几百里路上的欢迎活动始终不断。

二、人民群众支援八路军

一二〇师的前身为红军第二方面军,是1936年12月来到富平的,驻扎在富平九个多月,和人民群众建立了鱼水情谊。部队改编后誓师出征,当地群众依依不舍。强村的张怀仁,大魏堡的魏合、王恒合等许多群众都套了大车为出征的部队送行,仅流曲镇就出动了十多辆大车给部队运送物品。大魏堡的赵建吉、李经用手推车给部队运粮,一直送到蒲城县的上王村,沿途的群众把精心做的鞋、鞋垫、袜子和各种食品送给战士们,表示自己的心意。蒲城县蔡邓村的知名人士安寿山、李亚轩(老同盟会员)、韩富学等在蔡邓学校成立了当地的抗敌后援会,收集群众交来的鞋、袜等物,送给部队。

为了使八路军尽快地奔赴抗日战场,沿途的群众主动给部队当向导。部队到富平县淡村乡石桥村时,石川河水涨得有半人多深,当地群众七八十人

不怕水凉和危险,自动下河为部队探路。老南社的袁定才、袁振基两人给部队带路到韩家村,直到夜间才返回;澄城县尧头镇曹村的孙三运不辞辛苦地给部队带路,把部队送了很远。渭南地区的人民群众就是这样一段又一段地把八路军送过了黄河。

八路军出师是以师、旅为单位行动的,每支部队的人数都很多,加之秋雨连绵,因此,部队每到一地,住房就显得紧张。但是,当地群众想方设法克服困难,为部队腾好房子,保证指战员们休息;还把自己家里的粮食、蔬菜等送给住在家里的战士们做饭,同时将灶具和其它用具给部队使用,在生活上多方给以关心,提供方便条件。

国民党的地方政府和各界人士也为解决部队的食、宿问题做了很多工作。八路军总部到澄城县时,当地知名人士姬辅诚先生主动向国民党县长要求给八路军办理粮秣。合阳县百辛联第六保保长房卫民,受国民党县长的委托,设立粮秣站,为八路军筹集粮食4万斤。

三、进步青年参加八路军

八路军来到渭南地区,把该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广大群众在八路军的宣传、教育下,进一步了解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明确了抗日的伟大意义,又目睹了八路军为祖国、为民族上前线的抗日义举,提高了觉悟,以各种形式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许多进步青年纷纷参加八路军。红二方面军到富平后,渭南地区各县有很多人加入了红军,仅富平一县参军的即达千人。八路军路过渭南地区时,因战斗在即,没有大规模号召参军,但主动投军的仍然不少。澄城县参加八路军的有数十人,其中李少邕、同振国等后来都牺牲在抗日战场上。韩城县范家庄的张老四亲眼看到八路军官兵平等、生动活泼的生活,就主动送儿子参了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当过赤卫队员的冯抗勇,从很远的赵峰赶来参军。一二九师到达韩城后,地下党组织以五保抗敌后援会名义与部队联系,在芝川镇府君庙联合召开了欢送三名抗日青年参军的群众大会。大家情绪激昂,当场又有几名青年报名参军。1937年秋,咸阳地区旬邑县抗日救国会召开征兵动员大会,当场有300多名青年报名参军,后经关中分区独立营集中训练后,补充了八路军三八五旅。

四、运送八路军渡过黄河,奔赴抗日前线

八路军是由韩城县芝川镇渡过黄河的。当时八路军总部及各师主力次序出动,故到达韩城的时间先后不一。部队等船过河,就在芝川一带暂歇。部队在芝川周围驻扎过的村庄有:南原上的白家庄、三甲村、新庄、大朋、后窑头、东范家庄、西范家庄、东论功村、西论功村、马陵庄;城北、城南、姚家庄;芝川川道的郭家庄、柏香村、吕庄、芝川镇、西少梁、八仙镇等。

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令地方政党负责八路军渡河各项事宜。韩城县政府委派专人按期调集民船 100 余只,多数为韩城的船,另有合阳县的船八只。中共韩城地下党组织派党员、水手徐岱云负责调动船工工作。部队到来前,船只已集结完毕,编队待发,舵手、船工热情很高。当时黄河的主流在西岸,因连续阴雨,渡口一带的路十分难走,群众就把自己家里的木板或门板搭在船边,以便上下。

八路军各部渡河前,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向指战员们发布了严格的渡河命令。总部渡河前,朱德总司令对部队讲话说:为了抗日,我军坚决渡黄河,保卫华北,首先争取行军胜利,渡河胜利,渡河为打仗,打仗靠命令,所谓军令如山;渡河靠水夫,只能听水夫的指挥,这可以叫做水令如山。他又对船工们讲,渡河时我把军队行动权交付给你们掌握。在军民的共同努力和配合下,渡河工作进行得有组织有秩序。9月15日,朱德、任弼时、左权等同乘一船,安全地渡过 20 华里宽的黄河,到达东岸。

在总部渡河后,负责渡河船只工作的国民党芝川联保主任张留仙,接受贿赂,放走船只。刘伯承率一二九师先遣队于 10 月 3 日赶到芝川时,因无船只,不能按期东渡,遂严斥了张留仙破坏抗战的罪行。当晚,在中共地下组织和群众的努力下,从各方调集了 100 多只船,保证了部队胜利渡河。

第三节 与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合作抗日

西安事变以后特别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原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组织不断健全和加强。1937 年 5 月,南京国民政府撤销西安绥靖公署及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部,第十七路军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兼任军长,辖十七师(师长赵寿山)、一七七师(师

长李兴中)、陕西警备第一旅(旅长王俊)、第二旅(旅长孔从周)、第三旅(旅长王镇华)以及教导团、骑兵团等部,计官兵3万余名。此后,该部队曾经多次改编。该部中的党组织在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教育改造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组织武装起义等方面,都进行了艰苦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使这支形式上隶属国民党,并由国民党政府供给的军队,实质上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许多共产党员与其他将士并肩战斗,合作抗日,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第三十八军的工作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从各个方面更加关心和帮助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努力做三十八军的工作,使它在蒋介石分化、瓦解、削弱的险恶环境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事变之后,加强了对十七路军的工作,专门成立了西北军工作委员会,以欧阳钦(杨清)为书记,重点做十七路军的工作。首先,改变过去极左的路线,放弃在这支部队中搞兵变的做法,教育改造部队抗日爱国,帮助部队搞好团结,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尤其是对上层领导人、军官的统战工作。其次,省委号召在十七路军中工作的全体共产党员要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做抗日的楷模,以实际行动带动广大官兵坚决抗战。再次,省委大批派进干部,加强部队中党的力量,广泛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巩固部队内部团结。派进干部一是经过个人的上层社会关系,介绍党员到该部任军官、参议,如杨晓初介绍孔祥祯、崔仲远等,专做上层统战工作;二是帮助举办干训班、教导队等,选派大批党员干部和进步青年,受训以后打入基层,如十七师教导大队、三十八军教导大队等;三是省委直接领导一些在部队中担任重要职务、掌握一定兵权的中共党员发挥其特殊作用,有力配合部队中党组织的工作。

在中共陕西省委全面展开对十七路军工作的同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西北特委、西北局、北方局、华北局,八路军前总、驻重庆和西安办事处、河南军区、豫西二分区等以及十七路军驻地各地方党组织,党和军队的许多领导人,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叶剑英、罗瑞卿、杨尚昆、习仲勋等,都非常关心十七路军,或派遣干部进行统战工作和联络工作,或在军事上、舆论上、物资上予以支援,帮助十七路军顺利发展。

毛泽东历来十分关心对十七路军的工作,他不仅多次听取汇报并做部队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而且自1942年底至1944年初,亲自领导党在三十八军的工作。1938年1月中旬,毛泽东亲切接见途经延安的赵寿山,与赵详谈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教育他要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并建议他培养新干部,用新的政治工作和战术教育改造部队。临行,毛泽东又给赵寿山一本密电码,嘱咐他有事可随时与延安联系。1941年皖南事变后,三十八军处境尤为艰难,蒋介石借调训之名迫害部队中的中共党员。毛泽东在接见三十八军工委派来延安汇报工作的张西鼎时及时指示:要去受训,进行合法斗争;目前不宜拉队伍起义,要顾全大局,但要有所准备。

1942年8月,三十八军面临被蒋介石嫡系汤恩伯部队包围消灭的危险,赵寿山与部队党组织商议准备起义。11月7日,毛泽东电召代表赵寿山和部队党组织双方的郝克勇(范明)赴延安汇报。12月下旬,毛泽东就部队的发展和部队党组织的工作,作了详尽而全面的指示。首先肯定了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十七路军党组织,善于把统战工作同地方武装实力相结合,不仅保存了党组织,而且发展壮大党的力量,掌握了部队实力的好经验。其次就中共在国民党部队工作的方针、政策、斗争策略等方面做了说明。同意向赵寿山公开部队党员名单,批准赵寿山入党,并指出今后三十八军工委直接归中央领导,工委要起到军政治部的作用,部队要作好起义的多种腹案和准备工作,并向赵寿山和部队党组织提出做好十七路军其他将领工作以及大力培养干部、发展壮大力量的希望。从此,毛泽东亲自领导三十八军工委工作。

1944年初,蒋介石嫡系张耀明任三十八军军长,毛泽东亲自部署部队党组织撤退一批难以继续工作的党员干部,保护部队党的力量不致受到大的损害。

从1942年底起,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毛泽东给十七路军党组织及赵寿山的电报达百余份,事无巨细,精心指导,倾注了大量心血。

二、中国共产党与三十八军团结抗日

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下,中共陕西省委对三十八军及时制定了“从政治上争取抗日与组织上巩固团结”的工作方针,确定提高官兵“民族意识与抗日情绪”、“开展地方武装工作”为具体任务。部队党组织坚决贯彻执行省委指示。

1. 调整工作方针,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西安事变之后,十七路军中共组织首先教育党员,改变一切关门主义的做法,反复讲解联合抗日的意义,排除一切阻力,及时制止为起义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努力适应新形势下新的要求。五二九旅党组织一方面向党内传达周恩来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话精神,统一认识,为把十七路军改造成为坚强的抗日部队作贡献;另一方面,召开群众大会,以公开的形式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界人士一致抗日。该旅一〇五七团有个由孤儿、流浪儿组成的“娃娃连”,在共产党员周益三、秋宏等带领下,选派骨干去八路军部队中学习抗日文艺宣传,回部队后成立“青年剧社”,演出各种宣传抗日的文艺节目。在各部队的演出中,经常出现台上台下共鸣,“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口号此起彼伏的场面,很受部队广大官兵欢迎。警一旅、教导团、辎重营、十七师等部党组织翻印抗大教材,订阅党内刊物,组织党员和进步官兵讨论学习。同时还创办刊物,出墙报,组织业余剧团,教唱救亡歌曲,做了大量的抗日宣传工作,团结抗日的气氛空前热烈。

2. 共产党员以身作则,献身疆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十七师、五二九旅、教导团先期奔赴华北前线对日作战。中共陕西省委7月14日发出《对开赴国防前线部队中党的工作的指示》,号召部队中的共产党员投身抗日第一线,不惜一切牺牲英勇参战,在抗日战争中起模范带头作用。部队党组织及广大党员积极响应,党的负责人身先士卒。仅在1937年下半年的前几个月里,三十八军三支参战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即伤亡大半。十七师原有50余名党员,伤亡仅剩20余名;五二九旅一〇五七团原有260余名党员,伤亡仅剩五六十名。共产党员以身作则,献身疆场,深深教育和鼓舞了三十八军广大官兵,使他们更加坚定了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抗战到底的决心,更加英勇作战,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一〇五七团第三营一上战场即与团部失去联系,接着在灵寺与日军遭遇,激战一日撤离战斗,仅剩百余人,军官只剩九连副连长石纪才和排长程明山两人,士兵情绪低落,三三两两想离队自寻出路。当此紧要关头,石纪才等四名党员成立中共临时支委会,以支委为核心召开党员大会,要求团结士兵抗战到底,决不后退。会后十几名党员分别找士兵谈话,在工作准备基本成熟后,宣布组建新的连队,收容散兵扩大队伍,组成一个以党支部为核心,有组织、有战斗力的完整连队。

3. 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掀起军民合作抗日的热潮

在十七师、五二九旅、教导团北上抗日的同时,一七七师师部、五三〇旅和警备二、三旅开赴陕东,守备黄河,积极准备对日作战。三十八军河防部队的任务是守卫黄河,并协同地方政府宣传组织广大群众起来抗日救国,支持地方政府一切有利于抗战的活动。一七七师党组织和正在恢复的地方党组织,宣传动员、组织训练群众,准备迎击日寇的西犯。一七七师特派员吕剑人、张庚良等先后领导部队党组织与地方党组织密切配合,抽调人员到农村,协助地方开展群众工作,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以及各界群众宣传抗日,进行军事训练;派出军官到地方集训队讲课;组织民兵武装,帮助地方自卫大队训练基层干部;抽派随军党员家属,多次开办妇女训练班,开展地方妇女工作等,使沿河一带抗日救亡群众运动蓬勃发展。1938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西安学委以省妇女慰劳会名义发起组织西北青救会、平津同学会、西安抗协总会、东北救亡会等二十余个救亡团体,先后赴沿黄河各县宣传抗日,动员民众保卫陕西、保卫西北。大荔、合阳、韩城等县对中學生进行军事训练,随时准备投入保卫陕西战斗。渭北地区各县青年、妇女、民先等抗日救国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相继建立,以公开的合法的斗争形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是年春,汉中党组织和民先队组织各校学生参加抗日救亡农村宣传队,轮流下乡宣传,持续三个多月。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三十八军中长期、广泛、深入地做团结抗日工作,部队中广大党员不怕牺牲、英勇抗战的模范带头作用,使得三十八军成为抗日的一支劲旅。在八年抗战中,率先参加了保定战役、娘子关战役、忻口战役,粉碎了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打了空前惨烈的永济战役,坚守中条山两年余,打退日军11次进攻和“扫荡”,使得日军视中条山为中国战区的“盲肠”,卫立煌称赞三十八军为“中条山的铁柱子”。在守卫洛阳至郑州段黄河防务期间,三十八军发动了广武战役,开展了豫北游击战,将日军围困在黄河桥头两年不得挪动。在河南战役中,坚守巩东阵地,血战虎牢关,后又拒敌于洛宁、卢氏一线,保证了西安及关中的安全。三十八军成为抗日战争中最坚强的抗日部队之一。

第四节 团结国民党地方武装 合力保卫陕西

1938年春,日寇向晋西北发动进攻,同时占领晋南的风陵渡,隔黄河与潼

关相峙,大炮日夜袭击,陇海铁路的列车只有夜间关灯才能驶往陕西,形势非常危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陕西省委于3月8日发出《为保卫陕西宣言》,指出陕西及西北处在敌人的进攻面前,因此必须扩大统一战线,加强各抗日力量之间的团结,摒弃一切党派成见,在保卫陕西的神圣战斗中真正团结起来,共赴国难。8月12日,省委在泾阳县云阳镇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县级以上干部30多人参加。贾拓夫作《关于巩固团结、保卫陕西当前的迫切任务与工作的报告》,根据日军直逼黄河东岸,陕西有可能变为沦陷区的形势,指出省委工作的重点是作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工作和改造民间武装,随时准备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8月20日,以贾拓夫、欧阳钦、张德生、汪锋、赵伯平等人的名义发出《我们对于第三期抗战中保卫陕西与保卫西北的意见》,指出:“陕西以及整个西北,目前仍然处在敌人积极进攻的严重形势前面”,因此,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加强各抗日力量之间的团结,是保卫陕西、保卫西北的基本保证。文章明确指出,保卫陕西、保卫西北和争取全国抗战胜利一样,绝不是一党一派的力量所能胜任的,必须把全陕所有抗日力量团结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摒弃一切党派成见、自私自利观点与摩擦等现象,在保卫陕西的神圣战斗中,真正团结起来,共赴国难。为此,党组织十分重视与国民党的关系,对国民党当局愿意抗日的一些举措都积极表示支持,特别是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颁布后,中共陕西组织立即广泛动员群众拥护这一纲领,以实际行动表示中国共产党是服从抗战利益与真诚拥护团结的党。

鉴于日寇直抵黄河东岸,陕西有可能变为沦陷区的实际情况,党组织特别重视武装工作,准备随时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在1938年8月18日党的全省积极分子会议上,详细讨论了开展游击战争及武器来源等问题。贾拓夫在讲话中指出:陕西地方武装和散存在社会上的枪支估计有10万枝以上,各地党组织要赶快加紧在一切武装中开展工作,重点是作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工作和改造民间武装,在这些武装中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工作的对象大至杨虎城部队、东北军,小至国民党民团、保警队,派党员去做统战工作。临潼县的交口、栎阳两个镇的地方武装长期由共产党员谈国帆、毛瑞甫等控制,两个镇都有修械所,能自造枪支,团结领导了一批革命群众,能调动数以百计的武装人员。省委在耀县柳林镇的工作据点负责人邢志舟和国民党耀县保警队长关系甚好,通过保警队长,掩护地下党员出入边区。陕西的民间武装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仅10个县不完全统计就有53股,约1.5万至2万人,长

短枪 7000 余枝。当时党对他们的政策是争取团结抗战,逐步说服改造,帮助进步,保存枪支,准备在时局变化时,作为开展游击战争的力量。在工作方法上先是从上层着手,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以私人名义交朋友,结拜兄弟,帮助解决困难问题,建立威信,协助改造不良习气。

做国民党退伍回乡军人的工作,也是党组织开展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批人数量多,能量亦大,大都是地方名流,与地方政权、士绅及在职军人都有联系,与国民党中央系有较深的矛盾,同情共产党。国民党对他们开始排斥打击,后来又采取怀柔政策,拉打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则是“集中力量争取之”,与他们广交朋友,讲究社会道德,重人情世故,谦虚谨慎,尊重礼遇,并针对不同对象,开展工作。对进步的,帮助其巩固扩大社会基础;中间的,通过一切办法,使其接近我们;有成见的,循循善诱,解释误会,使其逐渐转变态度。经济文化方面予以合作,吸收他们共同办工厂、学校、报刊,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照顾其经济利益,使之成为抗日的可靠的同盟者。与此同时,合阳几十个联保成立了自卫队;高陵游击队建成两个中队;韩城自卫队恢复活动。

1938 年 12 月 15 日,贾拓夫在中共陕西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决议》的报告。要求“陕西全党同志,更加团结,更加紧自己的工作,准备迎击敌人向陕西的进攻!准备把抗日后方和近战区的陕西工作在敌人进攻时顺利地转变到直接战区的环境中去。陕西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更加紧学习军事,学会打仗,时刻准备上前线!共产党员应当站在保卫陕西与保卫西北的斗争前线!为坚持长期的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而奋斗到底!”

第五节 支持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开展抗日工作

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个公开的合法机构。1937 年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通电就任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当天即于西安七贤庄一号院门挂起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牌子,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正式成立。9 月 12 日,按照国民政府各战区的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称为十八集团军。李涛、伍云甫、周子健先后任处长。抗

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全面发动内战,办事处于1946年9月撤回延安。

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在抗日战争时期做了大量的工作。主要是:(1)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争取抗战的完全胜利,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合法的斗争。(2)为延安和前方抗日的八路军采办运输了大批的物资。(3)热情接送来去延安的各类人员,最多的是去延安学习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大约有2万多人次。群众称办事处是“红色的桥梁”。

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设在西安国民党统治区的办事机关。先后出任中共中央驻陕代表的林伯渠、董必武以及八路军总部驻西安的高级参议宣侠父就住在这里。

为了配合“八办”工作,中共陕西省委的一些工作人员以“八办”的工作人员名义对外联络办事,省委领导的爱国进步人士及著名高级知识分子中的秘密党员以民主人士、专家、学者的身份配合“八办”工作,更有许多处于地下的共产党员通过基层群众工作为“八办”服务。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等在“八办”期间,和陕西的一些爱国进步人士如杨明轩、杜斌丞、张性初、车向忱、马德涵、刘古风、郑伯奇、曹靖华、于振瀛、陈建晨、侯外庐、张知道、宋联奎、李敷仁等保持经常联系。特别是被毛泽东称为“共产党人的忠实朋友”的杜斌丞先生,多次同林伯渠、董必武促膝谈心,结成挚交。杜不仅在政治上支持、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竭力支持和帮助“八办”开展统战工作,并利用他曾担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的身份和在陕西的声望,在财力、物力等方面给中共和八路军以具体帮助。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时,他不畏艰险,帮助中共散发许多党的文件和毛泽东揭露顽固派的文章。东北军子女学校——竞存学校校长车向忱,任用进步青年及共产党员担任教师。救亡歌曲《松花江上》的作者张寒晖就是该校的教师。车向忱还亲自向“八办”介绍进步学生去延安参加革命。东北军调离陕西后,他办的学校经费发生困难,“八办”从统战费中每月抽出200元发给学校,帮助学校渡过难关。陈建晨主编的《大团结》报,刊载过林伯渠、宣侠父的讲话,向国民党管辖各界介绍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的情况。更可贵的是他开办纺织厂,招收抗日军人家属进厂做工,尽力支持抗日救亡运动。“八办”也为加强中共陕西省委的工作尽了相当的努力。为要求国民党陕西当局释放西安救亡团体的五名负责人,林伯渠曾

直接与陕西军政当局进行交涉,配合陕西省的抗议活动,终于获得了胜利。

第六节 反对国民党解散救亡团体

中共陕西省委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救亡团体,始终坚持全面抗战的立场,坚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陕西省党部 1937 年 6 月 15 日恢复后,共产党所领导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陕西省学生救国联合会、西安市各界救国会等 14 个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即于 16 日书面请求其领导,要求参加更广泛的抗日救亡活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提出组织抗敌后援会,中共陕西省委即于 7 月 19 日致函表示赞同。为了开放民众运动,增强抗日力量,省委还向国民党省党部提出六项建议,促使进一步扩大抗日救亡活动。

但是,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坚持蒋介石片面抗战的路线,从开始恢复组织就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采取了敌视、限制、打击、取缔的方针。1937 年 8 月 24 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西京日报》刊登了取缔西救、学联等抗日救亡团体的十八号通告,不准青年学生上街募捐,不准下乡宣传,不准组织战地服务团,不准上街讲演、演救国戏剧,不准召开群众大会,不准出版和销售进步书籍杂志,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设置了重重障碍。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中共陕西省委于 1937 年 10 月 10 日致书国民党省党部,“坚持要求省党部立刻自我批评,改变自己过去对民众运动的种种错误政策,立刻开放民众运动,给民众救国抗战的民主自由”,“彻底实现陕西民众救亡统一战线”。10 月 19 日,西安学生 1 万多人在易俗社广场召开大会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参加大会的群众一致高呼“开放民众运动!”“改组抗敌后援会!”“实施国难教育”等口号,高唱救亡歌曲。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郭紫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任觉伍和十几个带枪的侦探也来到会场,准备进行破坏。但因群情激昂,郭紫峻和任觉伍无机可乘,在开会前都溜走了。会上代表纷纷发言,严厉谴责国民党压制民运的错误政策,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最后大会一致通过提案,选出总指挥,整队游行,到国民党陕西省教育厅请愿,厅长周伯敏躲藏起来不敢露面。队伍即往省政府请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出面表示接受请愿队伍的某些要求。

1938 年 2 月 23 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又在西安各报发表通告,借口未经

“合法登记”，提出解散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北青年救国会、西安文化界协会、西安编辑人协会、西安市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等 13 个抗日救亡团体。5 月 17 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又重申前令，限各团体七天内一律结束，宣告解散。5 月底至 7 月，反动军警逮捕了民先、青救、新文字协会的负责人于志元、蔺克义、何志诚、李连璧、陈宇等五人。6 月 7 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负责人于西安各报发表谈话，攻击各抗日救亡团体是“不法青年团体”。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刊物《西北》周刊发表了《关于解散西安十三个救亡团体》的社论。要求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抗日救亡的大前提下，给予各救亡团体以合法地位，以发挥其抗战积极性，为国效命。6 月 15 日，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对新闻记者发表了关于当前陕西救亡运动一些问题的谈话，6 月 22 日欧阳钦又在《西北》周刊上发表了《我们的意见》一文。指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解散救国团体，逮捕爱国青年，是违犯抗战建国纲领、破坏抗日团结、分裂抗战力量的行为，必须立即停止。各救亡团体也纷纷发表告各界同胞书，抗议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这一反动行径，要求他们收回成命。社会舆论和广大爱国群众积极声援和支持抗日救亡团体，数千人签名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在人民群众的压力和指责之下，被捕的爱国青年于 1938 年 9 月 4 日被释放。

国民党陕西当局为了进一步推行他们压制和取消群众抗日救亡活动的反动政策，加紧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统治，于 1938 年 8 月开办了陕西省战时行政人员训练班。训练的中心内容是防共反共，规定毕业学员必须加入国民党及其执行防共反共任务的小组，企图实现其“全党特务化”、“社会化”的法西斯口号。为了控制青年运动，毒害青年，国民党还采取以数量胜质量的办法，大量发展反共的法西斯青年组织——三青团。1939 年 4 月 16 日，他们以国民党御用的青年组织西北青年抗敌协会、西北青年抗敌先锋团为基础，成立了三青团陕西支团部，胡宗南为支团部主任。其主要任务是进行反共活动，依靠其中忠实于反动派的骨干及其一些核心团员作政治调查、社会调查及特务调查。其内容除一般的团务外，着重了解当地共产党活动情形及青年动向。为了更广泛地扩展组织和进行特务活动，国民党和三青团还以举办社会服务事业为幌子，建立了许多外围组织，设立青年服务社，开办青年食堂、合作社、民众学校、俱乐部、补习班、职业介绍所等，举办各种集会、竞赛和娱乐活动。通过这些机构和活动的伪装，把他们的法西斯触角延伸到青年活动

的各个领域。当时,一般青年大都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不愿参加三青团。国民党、三青团使用保证学业,保证出路,发奖学金,加薪升级等办法诱骗青年。

对那些不受利诱和威胁的人,则采取打击、排挤、迫害的办法,甚至以“思想不纯”为借口逮捕监禁。1939年底,国民党又颁布了所谓“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纲领”,严禁各抗日救亡团体活动,加上在农村实行联保统治,使国民党在陕西广大城乡一党专制的法西斯统治进一步加强。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书记处在1940年8月16日《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中指出:必须“充分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可能去进行群众工作,应把进行公开合法团体中的工作,看作目前群众运动的主要方向。”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和中共中央、陕西省委的工作部署,陕西各地党组织在领导群众斗争中,注意在群众中建立广泛、公开、合法的、各种各样的小型组织。在学校和青年学生、教师中建立学生自治会、教师联合会、学术研究会、灶务委员会、读书会、篮球队等;在农民中建立夜校、自乐班、孝义会、冷娃团、兄弟会、姊妹团、识字班等。如西乡县1939年仅夜校、识字班即办了30多个。在斗争方法上,坚持摒弃一些过“左”的做法,注意脚踏实地,从群众最关心的生活问题开始,逐渐引导群众参加一些政治斗争。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开始,各地党组织领导的比较大的群众斗争即有50多次。同时,党组织还十分重视在斗争中培养群众领袖,要求党员和斗争中的骨干分子经常关心群众的生活,为群众谋利益,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真正取得群众的信仰,说话有人听,做到必要的时候一呼百应,又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第七节 开展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12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恢复以后,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党组织通过1936年冬建立起来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队部、西北队部、东北民众救亡会等群众团体,深入地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开展和平、民主、抗日的群众运动。从1936年12月到1937年2月,各地的工人、农民、学生、教职员、公务员等各行各业的人员,纷纷成立抗日救亡团体,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抗日宣传、示威游行和武装自卫等救亡活动,“对内和平”、

“对外抗战”、“铲除汉奸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成了全民一致的呼声。这几个月的群众运动,以拥护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提出的八大救国主张,和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五周年所出现的两个高潮,声势大、影响深。在党组织的宣传、组织和推动下,西安大华纺织厂、华丰面粉厂、咸丰面粉厂、中南火柴公司及各行业的工人、城郊农民 1.5 万人,于 1937 年 1 月 9 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接着蓝田、蒲城、三原、宝鸡、凤翔、山阳、户县等 20 余县共约 60 万人参加了当地的游行示威和武装自卫大会。会上,各界代表纷纷谴责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卖国罪行;坚决拥护张、杨的八大主张;表示愿意忍受一切困难,全力支援抗日;要求蒋介石实现诺言,发动抗日,制裁亲日分子;要求全民组织起来,共赴国难。在 1 月 28 日淞沪抗战五周年纪念时,西安各界群众团体组织了 15 万人,在革命公园召开一二八淞沪抗战五周年纪念大会。会议痛斥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错误国策,号召不愿作亡国奴的广大群众,一致团结起来,抗日援绥(即支援绥远抗战),保卫华北,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次日,西安人力车工人 2000 余人又在革命公园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进行了示威游行。

全国性抗战发动之后,政治形势蓬勃发展,抗战救亡运动不断掀起高潮。国民党对于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虽有种种限制,但由于抗战本身的需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国民党不得不允许人民群众进行一些抗战宣传活动。7 月 12 日,中共陕西省委在《关于日本进攻平津与党的任务及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必须抓紧卢沟桥事件及其发展的形势,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广泛与深入的抗战宣传鼓动”,把“一切可能利用的宣传工具及方式,都拿到我们手中,或在我们影响之下,为抗战而宣传鼓动,这样去提高广大群众抗日情绪及斗争勇气”。在省委的号召与领导下,陕西人民的抗日热情极为高涨。各地群众相继发动了“捐献一日所得运动”、“募集钢丝麻袋运动”。各界人民的抗日救国团体纷纷成立,展开各种宣传活动,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反侵略宣传周,抗日救亡运动逐步深入,并由中心城市逐渐发展到广大农村。1937 年冬至 1938 年春,一些群众团体先后三次发动西安学生组成 150 多个工作团、队,分赴关中各县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他们在各地召开抗敌大会、农民大会、讲演会、座谈会,并用散发张贴标语、传单、漫画和组织街头演唱等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战形势、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日寇的侵略暴行以及防空、防毒、救护常识,号召人民起来参加抗战,捐献钱物,慰劳抗日将士等。

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和西安工委指示,西安学生分会和民先队部组织 70 多个学生寒假农村工作团和流动宣传队,奔赴陕南、关中、沿黄河农村以至河南、山西战区进行救亡宣传,发展民先组织。1938 年 5 月,当日寇逼近潼关,炮击陕西河防阵地时,20 多个战时工作团深入临近战区的潼关、华阴、朝邑一带,进行抗日宣传动员工作。

在西安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蒲城中学、韩城中学、合阳中学、华县咸林中学、渭南赤水职校、凤翔师范学校、三原三中、三原女中等学校,也组织工作团,深入农村,开展救亡宣传活动。据不完全统计,至 1938 年,在党领导下建立的较大抗日救亡团体就有 15 个,人数近 4 万。

党组织不仅在青年学生中进行了大量工作,而且在工人、妇女中也进行了工作。如建立工人识字班、读书会,成立民族先锋队、抗敌后援会、工人剧团,还成立邮工工会等,提高了工人觉悟和斗争热情。在妇女工作中,深入农村,办夜校、识字班,组织妇女参加救亡活动,进行募捐及救护伤兵等,还出版妇女刊物,尽力发挥妇女在抗战中的力量。

在抗日救亡活动中,教育界的群众团体,还有“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简称“教盟”)和“西安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简称“教联”)。这两个组织,得到中共地下组织的支持,有不少地下党员参加。其中起主要作用的骨干活动分子有杨明轩、李寿亭、何寓础、武伯伦、车向忱、张耀斗、张寒暉、余达夫、李敷仁等。两组织不仅在西安各校进行抗日进步活动,而且扩及到三原、渭南、华县、凤翔等地的学校。

此外,中共地下组织充分利用抗日运动高涨的各种有利条件,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报刊进行宣传工作。省委出版的报刊有《西北三日刊》、《西北战线》等。其中心内容是,宣传党的抗战主张,批评国民党对抗日救亡运动的统治政策,动员人民群众起来支援和参加抗战,在群众中产生了深刻影响,对抗日群众运动起了重要指导作用。1938 年 1 月,省委机关刊物《西北》在西安公开出版发行,毛泽东题写刊名。主编李初梨。《西北》先为周刊,后改为不定期。主要刊登中共中央及省委负责人撰写的文章,宣传全面抗战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压制群众救亡运动的错误行径;反映陕西各地救亡运动的消息、经验及国共两党的重大活动。

在党的领导与影响下的报刊,如《老百姓报》、《西北文化日报》、《工商日报》、《学生呼声》、《国风》、《大团结》、《西京民报》、《救亡周刊》、《西北妇女》、

《抗敌妇女》、《东北》和《西北大众》等 20 多种。还有群众抗日团体出刊的进步墙报等。由党组织和党员主办的书店有骊山书店、生活书店、养正书店等 11 家。地方党组织有些领导人把书店作为活动据点。临潼县委书记刘庚为了便于活动,扩大宣传,专门开设了骊山书店。华县的王立人、合阳的李云(管建勋)、凤翔的王田夫等都曾以书店为掩护进行活动。党组织出版的党内教育材料有《怎样作宣传工作》、《政治常识》、《党的建设》等十多种。这些工作对于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宣传抗战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八节 打退国民党顽固派三次反共高潮中 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

日寇从 1938 年 10 月占领武汉以后,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逐步加强对敌后解放区的进攻,以争取蒋介石投降。在日寇诱降,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敌之后,蒋介石国民党逐步走上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道路。1939 年 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使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国民党陕西当局也加剧了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与顽固派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打退了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

一、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

1939 年 9 月,法西斯德国与英、美之间的战争爆发后,英美无力东顾,企图与日妥协,便加紧劝降活动。蒋介石更加动摇,为准备实行对日投降妥协阴谋,便加紧破坏抗战,分裂团结,积极反共反人民。从 1939 年底到 1940 年春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陕甘宁边区是被进攻的主要目标。

国民党把陕、甘、豫作为防共线,而以陕西为中心,在陕西又以汉中为“巩固区”,关中为“肃清区”,陕北为“斗争区”。国民党陕西当局进一步加强特务统治,把全省各地联保处、三青团等组织一律特务化。在西安设立大批特务性质的机关,职业特务达四五千。在商县、户县等地设立“特工训练班”,在华阴设有“党政工作队”。武装特务到处进行侦察、逮捕以至暗杀。西安劳动营和各县监狱关押许多共产党人和爱国青年,他们受尽各种折磨和摧残,并

且许多人遭到杀害。1939年10月,国民党特务在西安西郊抢走西安“八办”汽车五辆,绑架随车人员。后经“八办”抗议交涉才索回汽车。国民党蒲城当局逮捕50余名进步学生。渭南共产党员王化东、刘生哲被反动当局杀害,共产党员赵玉机、朱思文等人被捕。

对于抗日的群众活动,国民党陕西省当局采取各种手段压制和打击。以不合法为借口,取缔中共领导的西安及各县一切进步抗日群众团体,对热心抗日的进步分子,指为“左”倾或“危险分子”,百般加以迫害;对积极参加救亡活动的青年学生,迫令写“悔过书”,否则不准入学,或毕业后不准工作,甚至逮捕;强迫职工群众加入国民党,如果不从就撤销工作。

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加强封锁。1939年7月蒋介石发布命令,在陕甘宁边区东起耀县小丘镇,西至彬县龙马高村和甘肃正宁县境修筑一条封锁线,共筑碉堡434处,碉堡之间都有壕沟。同时,不断挑起摩擦事件。1939年3月,国民党合水县(甘肃省)店子区区长解除八路军一连长的武装,并指使保安队伏击八路军战士。与此同时,八路军一部分伤残战士由泾阳县云阳镇移往旬邑土桥镇后,被国民党保安队800多人包围,肆意凌辱殴打,强迫退出土桥。国民党安定县长田杰生无故拘捕边区安定县长薛兰斌,并调集保安队数百人包围驻防瓦窑堡的八路军,杀死警四团连长一名、士兵五名。4月,八路军护士等27人奉命由西安赴延安,途经中部县(今黄陵县)被国民党军警劫留。国民党宁县县长调集保安队七八百人袭击驻宁县的八路军,国民党军队一六五师亦向宁县进攻,八路军伤亡严重。5月,国民党军队一个营围困镇原县城,断绝城内八路军与外界交通。同月,驻旬邑县的八路军残废院军人陈通外出,被当地保安队杀害,该院20多名代表前往旬邑县政府请愿又被全部枪杀;同时邻近几个县保安队千余人会同国民党陕西保安队六团一营围攻八路军驻防部队独一营和荣军排,独一营撤出旬邑城时又有17名伤残军人被捕遇害。

1939年12月,蒋介石命令早已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嫡系部队,侵占边区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等县城和边区边境16个区、48个乡,并公开声称奉上级命令进攻边区,高喊“消灭八路军”,“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率保安队攻打八路军,捣乱边区地方。从1939年11月至1940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制造摩擦破坏事件124起,其中包括63次武装进攻。

为了打退反共顽固派的进攻,1939年7月,中共中央提出“坚持抗战,反

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并指示全党团结全国一切爱国人士，进一步动员全国群众，展开反对妥协投降的斗争，孤立投降分子和反共分子，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毛泽东在9月16日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对国民党顽固派向解放区的进攻提出了严重抗议，郑重宣布了中共关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

根据自卫原则，边区军民扩大自己的武装部队，加强边防力量，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针锋相对地给以有力还击，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反摩擦斗争，打退了国民党反共高潮中在陕西地区的进攻，平息了何绍南的叛乱，驱逐了绥德分区五县的国民党反动官吏，肃清了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五县的反共顽固势力，巩固了绥德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随后，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联名致电国民党最高当局，要求立即逮捕何绍南，交由民众公审，同时建议将绥德警备区所属五县的行政事宜隶属边区政府，并委任王震司令员为绥德行署专员，以利保卫河防。

为配合蒋介石发动的反共高潮，阎锡山妄图切断辖区与晋西北的联系，发动了“晋西事变”，“讨伐”新军（抗日决死队），以达其独占山西的目的。经过八路军英勇斗争，粉碎了阎锡山的军事进攻，统一了晋西北，使其成为边区的东部屏障。

二、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

1940年9月，日本与德、意法西斯签订了重新分割世界的三国军事同盟之后，急于结束对华战争，以便于德、意的欧洲攻势相配合，南取南洋，北攻苏联，因而加强了对蒋介石集团的诱降活动。蒋介石集团为了与日寇“联合反共”，于10月开始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至1941年1月制造“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最高峰。国民党顽固派为配合进攻皖南新四军，阴谋伺机向陕甘宁边区发起进攻，妄图夺取延安，一举吃掉边区。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胡宗南等调集40万军队，从四面包围陕甘宁边区。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邓宝珊部和3个保安旅、10个保安队，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迄黄河，北经长城，分3个封锁地带，5条封锁线，对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在南线，胡宗南军队进驻三原、泾阳、淳化、旬邑、彬县作为进攻边区的主战场。并在关中分区的赤水、姚曲，三边分区的张家畔，绥德分区的绥

德、米脂、佳县，陇东分区的望宁堡等地，发动了多次军事挑衅和摩擦战斗。还派特务潜入边区，进行破坏活动，袭击和残杀八路军战士及地方干部，抢劫物资。

陕甘宁边区军民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积极进行自卫。中央从前方调回三五八旅、独一旅、新四旅和炮兵团，加强了边区的防御力量。对反动派的军事进攻，依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坚决地予以回击，打退了反动派在各地的屡次挑衅和进攻。在每次反摩擦事件中，不断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阴谋和反共罪行，动员和教育了边区和全国人民，对边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其团结抗日。

由于陕甘宁边区军民和全国人民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向蒋介石集团企图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罪恶阴谋进行了坚决斗争，使蒋介石集团的反共阴谋完全暴露并在政治上陷于极端孤立，不敢发动内战。这次反共高潮，于1941年3月遭到粉碎性打击。

三、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三次反共高潮

经第一、二次反共高潮之后，国民党顽固派又于1943年春夏，大做反对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的舆论宣传，并调集数十万大军收紧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准备举兵闪击延安，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

1.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准备

首先，制造反共舆论。1943年3月，蒋介石抛出由汉奸陶希圣替他起草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该书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封建法西斯主义，不仅着重攻击共产主义，而且也反对自由资本主义（主要指一般的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诬蔑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暗示两年内要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

5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根据国际斗争新形势的需要，宣布解散共产国际。蒋介石视此为取消共产党及陕甘宁边区的天赐良机，叫嚷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提出所谓国家统一的口号，污蔑抗日根据地是“封建割据”，要求共产党“交出军权政权”。6月12日，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复兴社特务头子张涤非召集主要是CC特务参加的所谓西安文化团体座谈会，奢谈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打击、解散中共之必要。宣读事先拟就的给毛泽东的电

文,提出所谓第三国际解散系为加强盟国团结,中共亦应解散,交出边区,以加强中国的团结。7月6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竟对这一破坏团结、假造民意的所谓会议大肆宣传报道,称:会议“决定联名请毛泽东先生,促其自觉,及时解散共产组织,放弃边区割据。”此外,顽固派还在全国各地策动所谓“民众团体”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印发所谓告边区父老书,造谣说民主人士、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已被革职,挑拨人民群众与共产党的关系。

其次,加紧进犯边区的军事部署。早在1943年2月,驻兰州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即以绝密件向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及该战区所属驻宁夏的马鸿逵、驻青海的马步芳,下达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指令有关部队“于现在掩蔽,作攻势防御”,俟机“转取攻势”时,“先迅速收复囊形地带”,进而“收复陕北地区”。胡即按此计划部署兵力。5月初,该部参谋处炮制了进攻边区的作战命令与计划。随之,重庆方面指示胡宗南:“如有军事行动,即按既定计划歼灭之”(指歼灭共产党领导之军队)。胡即令五十三师由韩城河防开赴洛川,接替暂骑二师防务,暂骑二师于17日集结耀县。当天,五十三师一部开富县,抢占阵地,强拉民伏,修筑碉堡,埋置地雷,抢劫财物,捕杀区乡干部。一六七师由河防开至彬县,赶运粮弹补充宜川、洛川、中部、宜君一带部队,并调查边区地形、工事、粮食、交通情形。还将淳化、耀县、旬邑、三原一带的10个营编为警备师,归属陕西保安系统。并调动工兵、炮兵等一批特种部队开至边区南线。23日,胡向蒋介石呈报具体作战计划,共分三期:第一期以陶峙岳、范汉杰分任总司令,在关中、陇东两地完成攻防准备,实行封锁;第二期加强关中地区实力,“收复”囊形地带;第三期保持重点于咸榆公路,请派空军及二战区协助,“收复”马栏、关中、陇东全部。在此前后,蒋介石曾密电胡宗南:共产国际解散对奸党是沉重打击;应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6月底完成部署,行动绝对保密。为此,对共产国际解散不公开置评。当时内定由三十八集团军迅速攻占囊形地带后,协同三十七集团军攻占陕北地区(后因三十八集团军镇压甘肃民众自发武装未能抽身,蒋遂令胡抽调三十四集团军所属第一军和九十军负责攻占囊形地带)。为避免过早暴露意图,胡密令各参战部队先派少量先遣人员,在大部队发起进攻前两日,开到指定的前进位置。并预定7月9日为进攻日期。在此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西线北达三边,南至淳耀这一半月形地带制造的反共摩擦事件有增无减,陇东方面尤甚。

6月,情势更加紧张。国民党各部队频繁调动,辎重相继向洛川方向集结。九日,胡宗南随1日到西安的何应钦、白崇禧赴耀县开作战会议。15日点验新二十七师及一六五师。18日,复随同陶峙岳、九十军军长李文及六十一师师长邓钟梅、暂二十五师师长刘英、新三十七师师长徐保等北上洛川,召开师级以上指挥官军事会议,决定调动抵御日军的部分河防军队,连同原有包围陕甘宁边区的部队约50万人,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同日,第一野战军医院开赴洛川,九十军对八路军作战计划亦携至洛川交胡宗南。

到7月初,国民党除原驻边区周围担任封锁的军队早已积极准备进攻外,又从抗日河防调至边区周围的部队有:第一军主力七十八师、一六七师,第九十军二十八师、五十三师,第五十七军第八师,第十六军重炮营,驻西安之炮兵旅等,赶赴固原、平凉、长武、彬县、旬邑、淳化、三原、耀县、宜君、洛川、宜川一线,使陈置于边区周围的兵力,一时竟达二十余个师,尚有大批军队待命出动,千里河防仅剩第一师、预一师、预三师、一〇九师、暂二十五师等五个师兵力。咸榆公路、西兰公路、陇海铁路上兵车运输络绎不绝。还在与边区接壤地区,新建飞机场、油弹储备库多处。陶峙岳也于7月2日限令各军于8日准备完毕,听候胡宗南手令动作。至此,无论是将河防部队大部撤出陈置于边区周围,还是辎重部队的配属、兵站的开设、通讯联络的调整、部队必需品的调补、战前教育的实施,都是空前的,表明反共军事部署已全部就绪。7月4日,国民党一个营攻打富县峪口村;7日夜,一六五师炮击八路军关中分区警戒阵地,落弹二十余发。此时,内战危机,已是一触即发。

2. 边区军民坚决制止第三次反共高潮

在国民党军队欲闪击延安,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交织的复杂情况下,中共中央认为,中日民族矛盾依然是基本矛盾,而国内阶级矛盾仍处于从属地位。假如祸起萧墙,箕豆相煎,则中国人民六年浴血奋战创立的抗战大业必将功亏一篑。从民族大义出发,必须制止内战,争取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为此就要与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5月13日,朱德致电傅作义,指出陈长捷、何文鼎率部南下,迫近八路军防区,“难免引起不幸事件,实于团结抗战大相妨碍”,要求予以制止。6月中下旬邓宝珊途经延安,毛泽东多次与之晤谈,针对蒋介石正在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阐述了中共政策,并希望邓给予合作。7月3、4两日,毛泽东又连电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令转行将由渝抵西安的周恩来“就近向胡(宗南)提出

交涉,退出侵占地区”,“并向胡商谈军事冲突对抗战团结之利害”。9日,周恩来抵西安,立即研究多方情况,至13日,分别会见了胡宗南、熊斌、邓宝珊、孙蔚如、彭昭贤、胡公冕等人,反复申明中共立场,并向中央提供胡的军事动态。四六两日,朱德分别致电蒋介石、何应钦、胡宗南等,揭露他们的内战阴谋,疾呼团结,避免内战,告诫他们:“若遂发动内战,必至兵连祸结,破坏团结抗战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6日,萧劲光致电陈置于边区周围的国民党各将领,指出国内政治问题宜用政治方法解决,企图采取闪击方式以压服共产党,绝无可能。9日,朱德再次致电蒋介石、胡宗南等,抗议南线蒋军炮击关中分区,并指出有分九路进攻边区讯,请予制止。

边区各行业、群众团体纷纷发通电,各新闻媒体连日刊载专论、社论、时评,公开揭露、谴责蒋的内战阴谋,形成了来自边区内部强大舆论攻势,仅《解放日报》发表的重要文章就有: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秦邦宪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以及社论《起来!制止内战!挽救危亡!》、《全体人民动员起来,把敢于向边区进攻的反动派打出去》、《根绝国内的法西斯宣传》、《质问国民党》(毛泽东撰写);边区抗敌联合会《为反对内战保卫边区告全边区父老兄弟姊妹书》、《延安民众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等。对国民党顽固派取消边区、解散共产党的谰言予以痛斥,敦促蒋、胡命令军队返回原防,避免内战;忠告那些接受密令,准备内战的官兵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际不要枪口对内。毛泽东更以典故“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劝告国民党立即撤退边区周围大军,开赴抗日前线,与中共一道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周恩来、董必武也多次与黄炎培等民主人士交谈,揭露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阴谋,呼吁全国人民同心协力制止内战。

中国共产党同时致力于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7月4日,毛泽东电示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主任董必武:“战事有于数日内爆发可能,形势极度紧张”,“请你立即将此消息同外间传播,发动制止内战运动,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同时找张治中、刘为章交涉制止,愈快愈妙。”5日,驻渝外国人士同时收到朱德的电函。7日,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外国记者纷纷起而质问部长张道藩。英美苏各国大使亦紧急开会,研究中国时局。他们惟恐一旦国共合作破裂,日军将从中国脱身,直接影响到美军在太平洋的

作战。因而警告蒋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停止援助。美苏等国内舆论也纷纷著文,抨击蒋介石倒行逆施的独裁政治。苏联中国问题专家罗果夫发表《中国内战的可能性》、《对于中国政府之批评》等文,揭露“中国之失败主义者准备投降与企图发动政治阴谋,即发动内战”。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冈野进也指示留延日人一致参加保卫边区的斗争。7月9日,中共中央又指示董必武:速将“七七”宣言,朱德致蒋、胡通电,延安新华社揭穿西安特务假造民意的新闻及延安民众大会通电,秘密印发各报馆、各外国使馆、各中间派、文化人士,并设法寄往成都、桂林、昆明各界及地方实力派。

边区留守部队也紧急动员秣马厉兵,开赴边界,严阵以待。兵力部署大体为:三八五旅驻防陇东分区、三五九旅驻防延属分区、警一旅驻防关中分区、警三旅驻防三边分区。对于肆意挑衅、制造事端者给予适度的军事上的打击。6月12日,国民党一骑兵连侵占关中柳林南之陈村,并向让马村进犯,兴修工事。八路军驻军即予以迎头痛击,俘其数名官兵。但为避免事态扩大,以利团结,随即将人枪退还。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号召下,边区各阶层、各族各界人民群众紧急动员起来,准备武装保卫边区,自卫还击一切挑衅和进攻。7月9日,延安各界举行了万余人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朱德、贺龙、林伯渠等讲话号召边区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制止内战,保卫边区。各分区、县、各系统亦纷纷开会动员,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进攻边区的阴谋,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大计及保卫边区的办法。地处黄河之滨的神府分区党委还就保卫神府,打击顽固派的进攻发出了紧急动员指示。

边区南线各县民众积极参加并设法筹集武器,均建立了脱产的人民武装自卫队;基干自卫队扩大20%,人人有武器;普通自卫军扩大10%,均有刀矛、土枪等。中直、军直、边直等各机关学校工厂也成立了自卫军。他们积极进行侦察、引路、送信、清查户口、警戒、盘查捉拿坏人等治安保卫工作,并加紧战斗训练。

为保证前线部队的粮食供给,动员一开始,政府即进行夏粮征购。虽然产麦区夏粮歉收,却比往年完成得快。富县、甘泉两县4100石公粮15天全部入仓;关中分区五县10天完成8000余石任务;同(官)宜(君)耀(县)1200石粮食八天全部入仓,该县边境区域布置的任务当天全数入仓。

各级政府、民众为部队炒干粮,做军鞋,捐现金,组织运输队、担架队,为

上前线的军队代耕,为参战部队送食物。富县群众不到五天自动送柴 22 万斤、菜 3 万斤;张村驿一夜动员 120 头牲口帮军队运输;甘泉县三天做军鞋 1000 双;富县、甘泉群众 7 天为军队炒干粮 10 万斤。延安中直、边直各机关、各界争相捐薪金、食物、日用品,集市商民仅半小时就捐物资约值 10 万余元边币。

7 月 4 日,中央军委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通报“胡进攻边区之部队已经集结完毕,部队的动员、粮弹的准备,均已完成,只须待命进攻,胡将河防部队大部撤出置于边区周围,这是历来所未有。”8 日,中共中央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各地响应延安的宣传,在 7 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之通电,发给新华社,以便广播,造成压倒反动气焰之热潮,并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斗争。”顽固派制造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消息不胫而走,激起各抗日根据地人民的义愤。各地根据中央指示立即行动。13 日,晋察冀边区举行制止内战挽救危亡各界民众大会,并发出通电;一二〇师全体官兵、晋冀鲁豫文化界也分别发出通电。15 日,太行两万军民举行声援边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示威大会。广大民主人士也群起谴责。如国民党元老、晋西北行署主任续范亭等人,通电全国,呼吁“发动舆论,制止内战,挽此危局”。并致电林森、蒋介石,要求立即制止内战,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部队,枪口一致对外。

3. 国民党顽固派第三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由于中共中央在国民党军队进攻计划已定,而大部队尚未就位时采取了一系列反击性措施,在国内外充分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阴谋,使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特别是朱德对国民党的通电中“日寇渔利”、“妨碍盟邦”两句更是击中要害,从而在全国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内战运动,使蒋介石顽固派四面楚歌,政治上极端孤立。又由于边区军民紧急动员,全力投入战斗准备,准备给来犯者以沉重打击。这样,不但政治上,而且在军事上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使蒋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得不暂时搁置进攻计划,于 7 月 10 日,令胡宗南停止行动;11 日,蒋、胡均复电朱德表示无意进攻边区,说是误会;12 日,胡宗南下令开始撤退一个师及两个军部。14 日,九十军军部由孙家沟一带返回韩城竹园村;15 日,第二十师、二十六师由前线撤至彬县县城集训;17 日,第一军直属队由兴平返华县;18 日,二十八师由石益镇退回合阳

南和堡;23日,七十八师由彬县返赤水;六十一师返薛家坪。至此,第三次反共高潮偃旗息鼓,内战危机逐步缓和。

8月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此次反共高潮已被打退。正如毛泽东在这年7月13日给山西前线的彭德怀拍发的电报中指出的,“是我抓紧时机,捉住反对内战,反对侮辱共产党两个要点,出其不意给以打击。”应该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制止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重要关键点。

第三章 巩固、发展中共地方组织

1938年10月以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为了准备投降,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在反共活动日益猖獗的情况下,在党组织经过一段大发展之后,193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我们今天极端严重的任务”,并提出了“党的发展一般的应当停止”及“详细审查党员成分,清洗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商人),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加紧党的秘密工作”等一系列措施。适应这一斗争环境的变化,国统区党组织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活动方式逐步转入更加秘密的状态,纠正了在组织大发展中一些地方片面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等现象,加强了巩固党的工作。

第一节 执行隐蔽精干政策

1940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国统区党组织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8月1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指出陕西党三年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在大量发展党组织工作中存在着不足。因此,要求陕西党必须严格执行隐蔽精干政策,加强与社会的广泛联系,以达到长期埋伏与积蓄力量的目的。并要求审查干部,肃清内

奸、自首分子,坚决调动在国统区已暴露和不适宜继续工作的干部回边区。各级领导必须深入社会与群众,力求职业化、群众化,扩大与友军的交朋友工作,停止在友军中发展组织,允许一般党员加入国民党,避免加入小组织。

1940年9月2日至7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照金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对陕西工作的决定,欧阳钦作《讨论中央对陕西工作决定的结论》的报告,决定大力进行巩固党的工作,一般停止发展党员;撤回各地特派员和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改变党的活动方式,尽量不开或少开会议,不搞公开的大规模的群众活动;党组织和党员之间绝对采取单线联系,也可以采取异地联系的领导方法,不得发生横的关系;立即整顿和缩减各级组织,有意识地中断同一些党员的联系,防止敌特破坏;在国统区已取得社会职业的党员,力求巩固社会职业,转入隐蔽活动。12月18日,省委制定《关于保卫党的组织条规》23条,将隐蔽精干政策进一步具体化。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中共西安职工委要求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从思想上、组织上和方法上实行转变,隐蔽精干,长期埋伏,减少活动,避免暴露,保持极端秘密状态。1941年1月9日,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组织根据具体情况,迅速将已暴露的党员、干部介绍到省委。至11月,全省共调动170多人,到1942年以后,县级以上干部几乎全部调回边区。

1941年2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照金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中央对陕西的指示。欧阳钦作《目前时局下的陕西工作》报告。提出党的组织必须从单一形式改变为复杂的多样的形式,以避免国民党对中共组织一网打尽的阴谋。党员必须做到社会化、职业化,广交朋友。必要时可参加国民党各级小组织。省委还作出全面审查党员决定。在省委常委会议上,省委常委汪锋就西北军工作作报告,指出对西北军总的工作方针是巩固与扩大以赵寿山为首的进步派的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与分化中央派的力量。保持、巩固、扩大西北军,使之成为西北坚强的抗日力量,希望将来能变为党的外围军。党在其部队中的关系联络要简单,隐蔽力量便是党的工作。

2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防止国民党破坏组织的指示,强调坚决撤退暴露的党员、干部,立即销毁党内文件。并指出目前一切工作应以巩固党的组织为中心。随后,省委派省委统战部吴柏畅以特派员身份,到西安、宝鸡与河南等地秘密活动,传达上级指示,听取下面汇报。吴到西安常与杨明轩、刘继曾、崔一民等人联系,并与西安“八办”伍云甫、李华等联系。省委派王俊

到西安联系与管理部分单位的党组织,要求认真贯彻隐蔽精干的方针,利用一切机会打入敌人内部,以保持党的力量。省委派杨槐到汉中地区,向中共汉中工委书记江硇及各县委传达中央及省委关于“隐蔽精干”和白区工作必要时可以“保持睡眠状态”,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精神。省委于10月派张克斌到渭南传达省委指示,调权秉华回省委。此后直到1945年,省委对渭南县党组织主要采取派人联系指导工作。

省委将调回边区的党员、干部50余人集中起来,建立干部训练队(简称干训队),下辖3个队。一队为区委、支部干部及学生党员,二队(亦称研究班)为地、县委书记;三队多是农民党员、干部。主要学习军事、政治。

3月底,中共陕西省委致电毛泽东、张闻天并转中央书记处,提出国民党中央对西北军赵寿山部压迫到无法再忍受的地步,指名限期调30余名干部到劳动营受训,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赵部之中坚,大部分又是共产党员。其受训实质是被扣留或撤职,吞并瓦解赵部。赵寿山已下决心抵抗,拉出部队。他要该部中共组织的张西鼎到延安向毛泽东请示。情势紧急,请中央立即指示。4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陕西省委,让欧阳钦、张西鼎立即到延安面商三十八军问题。5月9日,再电省委,指出日寇已集中兵力于信阳、临汾两地,有向郑州、西安进攻可能。三十八军仍应忍耐敷衍过去,避免决裂。

5月11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照金召开委员会,书记欧阳钦作《新形势下陕西党的任务的结论》报告,提出日军集结兵力准备进攻陕西,国民党顽固派封锁陕甘宁边区,陕西形势非常严峻。因此,省委必须密切注视时局发展,团结陕西人民,为保卫西北而斗争。强调加强军事工作,巩固边区,注意在友军、地方武装、在乡军人及一切民间武装中广交朋友,巩固统一战线;加强党的教育。进一步提高党与巩固党。省委于12日发出《关于目前支部工作的指示》,指出在日寇有入侵陕西可能,陕西国民党区域反共特务活动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党组织的任务是粉碎敌人大破坏的阴谋。支部工作的方针是隐蔽精干,多交朋友,长期埋伏,以待时机;支部组织形式力求短小精干、形式多样;支部生活要灵活机动以保存力量,必要时可停止一切活动,埋伏待机;支部对党员实行异地领导、插花领导,领导关系减少到必要的程度;支部的群众工作要利用各种形式进行交朋友,使党员能长期埋伏隐蔽在群众中、社会中,以待时机。

1941年6月,欧阳钦、张德生先后去延安向中央汇报,西北局统战部长贾

拓夫和欧阳钦、张德生参加了中央组织部长陈云主持的座谈讨论会。陈云听取了陕西党的工作汇报后指出,在国民党反共日益严重情况下,地下党只有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才能生存和发展。陈云为中央写了一个决定草案和有关文稿,报中央政治局审定。同年10月,贾拓夫根据讨论,整理了《陕西工作问题提纲》,经西北局常委讨论,报经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修改定稿,由西北局下发陕西省委执行。这就是1941年12月29日的《西北中央局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

中共中央于4月决定,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所辖之关中分委由陕西省委领导。5月又决定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简称西北局),中共陕西省委受西北局领导。7月,西北局决定将关中分委领导的边区以外党组织交陕西省委直接领导。

第二节 国统区中共组织活动方式的 改变与组织的巩固和恢复

根据秘密状况的需要,党改变了活动的组织形式与领导方法,开展灵活多样的斗争。1941年9月,省委交通科在同官县(今铜川)冯家桥建立地下交通秘密联络点,冯明学任交通员。之后,中共关中地委交通员孙光明先后十多次经该联络点,与陈炉、黄堡、同官地方党组织接头。其交通路线:柳林—老池—王堵村—冯家桥。1942年,中共中央社会部派冯如春负责西安至同官的交通工作,他以同官新裕煤矿跑外职员身份为掩护,往来于西安、同官之间,进行秘密交通活动。1941年,中共陕西省委建立调查研究室,研究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情况,并承担与各地组织的联络任务。12月,中共中央社会部西安情报处建立了西安、华阴、大荔、朝邑、澄城、延安交通线、站,负责传递情报。1942年1月,省委在西安设立调查站,决定吴柏畅担任站长,专搞情报工作,并分管西安一部分地下党员。共产党员吴卜亭在1941年建立了西安情报处赴延安交通线澄城交通站,归中共中央四局领导。这个秘密交通站一直坚持到1947年,为安全传递西安与延安间重要情报和护送党的干部做了大量工作。1943年中共关中地委建立调查站,站长由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吕剑人兼任。驻守旬邑封锁线的国民党保安大队队长董策成不满国民党反动政策,与中共关中地委建立统战关系,使这个大队的防线成为

向边区运送物资、接送干部和青年学生的一条红色地下交通线。

1941年11月,中共陕西省委机关由照金迁往边区新正县马栏镇(今属旬邑县)。12月29日,西北局作出《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肯定两年来陕西党在执行中央新的策略、调查研究、精干隐蔽、巩固组织、审查党员等工作中做出了相当成绩,虽然党组织受到一些破坏,但保留了党的基础。鉴于陕西处于国民党重点统治区域,西北局决定,中共陕西省委必须肃清主观主义与关门主义倾向,扩大社会活动,采取公开合法的斗争方法,适应环境,随机应变;在整顿和发展组织中以精干、短小、分散、多样、自然为原则;党员可以利用一切机会加入国民党、三青团及其小组织;有中上层社会职业的党员,一般不编入支部,单线联系;停止印发秘密文件,改用口头传达;继续审查党员,清洗不坚定分子。遵照这一指示精神,未被破坏的党组织和未暴露的党员同省委中断了联系后,一般以合法职业作掩护,有的打入国民党的党务、行政、教育等部门,做到“内红外灰”或“内红外白”,党的组织处于更隐蔽的状态。

1942年1月15日至27日,中共陕西省委在马栏召开省委扩大会议,省委委员、各部部长及在马栏的县委书记、机关科长以上干部出席。会议主要传达和讨论西北局《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认为执行中央隐蔽精干政策以来,陕西党组织不仅“保存了量”,而且“提高了质”。决定进一步贯彻隐蔽精干方针,彻底改变党的组织形式与领导方法,一般不发展党员,达到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目的。张德生在总结报告中指出,陕西党目前的任务是,从思想上肃清主观主义和关门主义残余,实行隐蔽精干政策。社会活动的方针是“公开合法,适应环境,随机应变,长期生存”。会议还强调加强调查研究,开展社会活动,扩大统一战线,教育地下党员,必须执行长期隐蔽,埋头苦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斗争策略,学会和国民党斗争的方法,以保存党的力量,巩固党的组织。会后,省委派出20多名干部利用春节期间探亲访友等形式,到50多个县传达西北局决定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

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导下,经过各种斗争,击破了敌人摧毁中共秘密组织的阴谋。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共党员虽然从1939年的7720人减少到1942年的3365人(减少数字内包括调回边区与去外地的),但党员质量却大大提高,党组织更加严密,活动更加隐蔽,对敌斗争更加熟练,战斗力大大增强。在其他县市和广大农村党组织,也都迅速实现了这一转变。采取各种形式,来隐蔽和巩固党的组织,领导群众开展灵活多样的斗争。有些地方由党员直接掌

握了武装力量,或以保甲武装的方式掌握民间枪支,保存了地方实力。如在临潼交口一带就有 500 多名武装群众,直接受共产党员的领导,进行抗日活动,保卫群众利益,坚持同国民党反动派及地方反动势力进行斗争。洋县共产党员孙鸿长期潜入太白林区开展游击活动,发展游击队员,在太白山大包围正式成立秦岭游击队,孙任队长。游击队下设 4 个分队,有正式队员 50 多人,广泛活动于秦岭山麓的太白县、岐山县、眉县、留坝县、城固县、佛平县、洋县等交界的数百平方公里的山区。1944 年 6 月,在洋县佛爷坪袭击拉民夫修筑碉堡的县保警队,解救民夫上千名。游击队频频出击,给敌人以很大打击,队伍不断壮大。1945 年在敌人重压下,游击队解散,停止活动。

这一时期,在省委有计划的统一部署下,开展了社会调查工作,掌握了大量材料,这对领导机关了解情况和研究斗争策略有重要意义。

1943 年初,根据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精神,西北局决定中共陕西省委与中共关中分委合并,建立关中地委。地委机关驻地设在马栏。关中分区和陕西国统区党的工作统一由关中地委领导。这时由于全力投入整风和反奸斗争,暂时停止派干部到国统区联系工作,基本中断和地下党的联系。

1944 年秋,关中地委陆续派干部到国统区各地恢复和地下党的联系,在恢复各地党员组织关系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党的组织机构。到 8 月,关中地委共派出 13 人,到韩城、澄城、临潼、渭南、华县、华阴、三原、富平、麟游等地与县委、区委干部和党员 27 人取得了联系。例如派权秉华到渭南整顿恢复党组织,新成立了固市等三个区委,恢复了龙背等三个区委。派在陕甘宁边区学习的共产党员李世华返回商县,建立麻街地下交通站,广交朋友,建立关系,掩护过往同志,发展抗日武装,到 1945 年 7 月,麻街交通站成立,由王治邦负责。地委先后派联络员王军、韩夏存在西安与王维祺建立了直接组织联系。汇报了举办《文化周报》和建立西北民主青年社问题,得到地委的批准。随后在杨明轩、杜斌丞的积极支持下,由共产党员李敷仁、武伯伦、王维祺、张光远、郑竹逸五人小组领导的西北民主青年社在西安正式成立。同时由王维祺主编的民青机关报《文化周报》也在西安创刊。抗日战争胜利后,关中地委根据时局发展的需要,派关中分区教导团区队长巩德芳率刘兆英等返回商洛,建立和发展党的游击武装,创建“隐蔽根据地”,积极策应陕甘宁边区准备对付国民党军可能发动的军事进攻。巩回商洛后,使党领导的游击武装很快发展到 200 多人枪。以较大点的部队作中心,周围星罗若干小部队,分散活动,

分成母子队,建立起党的隐蔽根据地。他还动员张奎领导的地方武装参加了游击队,壮大了革命力量。地委并派刘邦显、王平凡、张万照等到华阴县,恢复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关中特委书记强自修组建雁门工委,薛志仁任工委书记。机关驻地设在宜君双龙镇,下辖富平、同官、宜君、中部(今黄陵)及白水、蒲城一部分。雁门工委主要任务是组织党的武装力量,出击中部、宜君、金锁关 100 余里的咸榆路段,破坏敌人交通线,牵制进攻延安之国民党军队,并在蒲、白、洛、富、同交界地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同期,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从西北党校学员中选调原三十八军中共地下党员伍力、高秦生赴汉中,负责领导三十八军系统中共地下组织的工作。他们与汉中地下党员赵冠群、薛绍裕等在洋县五间桥杜家村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汉中工委,隶属西北局统战部领导。当时要求各地党组织形式,以“精干、短小、分散、多样、自然”为原则,不仅可以防止敌人大破坏,且有利于普遍发展组织。至 1945 年,党组织在关中、陕南地区,特别是在渭南、陕东等地很快恢复起来。

第三节 中共陕西省委和关中地委的干部整风

按照上级党组织关于整风的统一部署和隐蔽精干的工作方针,从 1942 年 6 月起,中共陕西省委将在国统区工作的领导人、干部集中到马栏进行整风学习。各县委也认真组织干部学习文件,加强对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引导党员认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民族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正确关系,克服各种错误认识和糊涂观念,从思想、作风、组织上进行整顿,以巩固党的组织,提高党员素质。

鉴于干部变化大,许多新干部未能深入学习整风文件,从 1943 年 3 月起,由陕西省委与关中地委合并而成立的关中地委安排继续学习整风文件,研究高干会决议,深入整风学习。这年,关中地委也开展了审干运动,1 至 4 月为初步了解和配备干部时期;4 至 6 月开始对保卫、组织、机要、统战等部门的少数干部进行在职审查。5 月 28 日,地委建立了地方干部整风训练班,先后将 90 多人集中起来进行学习和审查;7 月,由于环境变化,遵照西北局的指示,将一大批知识分子新干部送延安学习、审查,7 至 10 月送去 237 人。8 月 29 日,中共关中地委作出关于分区一级机关整风学习的决议,确定从 9 月 1 日

起,地委、专署、保安分处、整训班,及其他机关主要负责人和管理干部的同志,以审查干部思想历史、清查奸细为主,并配合学习高干会文件,复习已学过的某些整风文件,其他机关应以学习文件为主。9月5日,军队整风队成立,有300多人参加。10月7日,关中地委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贯彻上级指示精神,正式布置各县普遍审查干部工作。11月底,除淳耀外,各地审查干部工作普遍展开。审干中,出现“左”的倾向,地委召开了各机关在职干部大会,号召开展坦白运动。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发生了“逼供信”。康生一伙诬蔑陕西地下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党”、“假党”,很多人被打成了“特务”,分区军队整风队与地训班的坦白运动发展到最高点,一些地直单位和县在审干中也都发生了“左”的偏向,极大地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伤害了大批干部和工作人员。1944年春,中共关中地委按照中央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给受委屈的同志甄别平反,赔礼道歉,并认真总结发生“抢救运动”的教训,这是由于缺乏调查研究,混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及敌我界线,夸大敌情,不实事求是而造成。到秋天,审干和平反工作基本结束,地委陆续派干部到各地开展工作。

第四章 陕甘宁边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

陕甘宁边区在坚持抗战的同时,大力推行了新民主主义建设。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系统完整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纲领,及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内容。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第一节 党的建设

边区党的组织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各项政策,在组织、思想和作风建设方面均取得很大成就。

一、党组织的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后,陕甘宁特区党委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撤销陕西省委,分

别成立陕北东分区和西分区党委。东分区党委(书记张达志)驻延长县城,辖固临、延川、延长、延水(1937年8月并入延川县)等4个县委、36个区委和绥德、清涧、吴堡、佳县、米脂等县秘密组织,党员约1.2万名。西分区党委(书记马文瑞)先后辖延安、富县、甘泉、子长、秀延、志丹、安塞、横山、新城、靖边等10个县委、41个区委,党员9118名。原归陕西省委管辖的神府特委,改由陕甘宁特区党委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经中共中央批准,陕甘宁特区党委也随之改称陕甘宁边区党委。同时,边区党委决定,撤销陕北东分区党委和西分区党委,其所属县委由边区党委直接管辖;撤销陕甘宁省委,成立庆环分区党委(书记马文瑞)。1937年10月,在庆环分区党委所辖的定边中心县委的基础上,成立三边特委(书记白如冰);1937年9月,陕西省委所辖的关中特委改由边区党委领导。10月,改关中特委为关中分区党委。此后,边区党委还在八路军驻防的绥德警备区和边区南部的洛川一带,分别成立秘密的绥德特委和洛川工委(不久改为特委)。1938年4月,党中央决定,高岗接替郭洪涛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同年冬,边区党委辖关中、神府、三边、绥德、洛川、庆环、陇东等7个分(特)委,以及清涧、安塞、子长等十余个县委,党员3.8万余人。

1938年3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据此,边区党委以“大量发展而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为方针,抓紧有利时机,大量吸收新党员,至1939年底,党员由1937年5月的3.2万余人发展到5.4万多人;所有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乡镇都建立了党组织。各级党组织在建立工作制度、加强组织纪律的同时,清洗了一批自首分子、腐化分子和堕落分子,选拔了一批新干部。

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党的发展一般的应当停止,而以巩固党的组织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之后,边区党组织即由发展阶段逐步转入巩固阶段,开始加强马列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知识教育,并进行整风学习。

1939年11月,边区召开第二次党代会,176人出席。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指出边区党的各级组织要“提高自己,帮助别人”,再次号召要把边区建设成为全国的抗日民主模范区。高岗、陈云分别作了《关于抗战新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的报告、《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大会号召各级党组织进行一次深入而普遍的学习动员,并通过八项决议,强调全力提

高党员尤其是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是巩固党组织和提高其战斗力的关键。大会重新选举产生了边区党委,高岗为书记,王观澜为副书记。这次大会对加强党的建设,推动各项工作的发展,把边区建设成抗日民主的模范区具有重要意义。

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后,边区党组织由以发展党员为主逐步转入以巩固为主的阶段。1940年10月,根据党中央9月11日的决定,在边区党委的基础上,成立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高岗,副书记谢觉哉。鉴于西北国统区的政治形势不断恶化,西北工委领导的陕甘宁三省的秘密机关陆续迁入陕甘宁边区。1941年5月,党中央决定西北工委与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西北中央局,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为委员,贾拓夫、李卓然为候补委员,高岗为书记,谢觉哉为副书记,统管西北地区的工作。1943年1月,党中央批准高岗、林伯渠、贺龙、陈正人、贾拓夫为西北中央局常委。1944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陈云任西北中央局委员。1945年10月以后,高岗调东北工作,习仲勋任西北中央局书记。

西北中央局成立后,撤销庆环分委,成立陇东分区特委。1941年11月,洛川特委并入富县县委。1942年底,西北中央局决定将陕西省委与关中分委合并,成立关中地委,隶属西北局,统一领导关中分区和陕西国统区的党组织。这一时期,西北中央局对边区党组织的机构和职能进行了调整:陇东、三边分委分别改为陇东、三边地委,成立延属地委;各地委书记都兼任警备司令部或军分区的政委。

截至1941年春,边区各县都成立了党委,基层党组织遍布乡镇、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直属县(市)委包括延安、延长、延川、固临、甘泉、富县、安塞、保安、安定、靖边、延安。关中分委辖赤水、淳耀、新正、新宁等县委。三边分委辖定边、盐池等县委。绥德区委辖绥德、米脂、吴堡、佳县、清涧等县委。另有神府分委、洛川特委、伊盟工委,201个区委,1326个支部(不包括军队)。当时,党员总数为5.4万余人。1942年高干会后,西北局下属关中、绥德、三边、延属、陇东等五个地委。

1943年以后,八路军和新四军等人民武装逐步展开反攻。在新的形势下,需要进一步壮大党的队伍,发展革命力量。但因边区在巩固党的过程中一般不再发展党员,所以党员增加甚少,年龄偏大。在边区建设中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为吸收党员提供了有利条件。1944年4月,西北局召开党务工

作座谈会,决定“吸收各个战线上发现的积极分子到党内来”。发展党员的主要对象是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反顽除奸和减租减息的积极分子,有威信的青年、工人和学生。会议还规定,凡符合党员条件的青年,满15岁不满18岁者,可以吸收为预备党员;满18岁以上者,可以吸收为正式党员。会后,各级党委及时制定发展计划,努力培养积极分子,经过严格审查,广泛吸收党员,截至1945年3月,边区的五个地委共有党员4.2万多人(不含保安部队和神府县委)。

二、党的思想建设

与组织发展的同时,党组织注重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政策教育,并加强文化学习,以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文化素养。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向全党发出关于开展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竞赛的号召。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根据边区广大党员干部的实际情况,于1939年6月作出决定,将边区党、政、军干部按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平,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学习《联共(布)党史》;乙类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问题;丙类学习《解放》周刊和《新中华报》上的社论、重要文章等。1939年11月召开的边区第二次党代会特别强调要以全力提高党员,尤其是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提出这是提高党的战斗力和巩固党的关键。号召在全边区党组织中来一个深入而普遍的学习动员,认真而努力地学习,并规定了干部教育、普通党员教育和文化教育的具体办法和要求。会后两年间,主要对党员进行审查和教育,重点放在组织党员首先是干部的学习上面。1940年春,边区党委对全边区在职干部的学习进行检查、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取组织措施,明确规定党、政、军机关均增设干部教育科,配备得力干部,建立干部学习日制度,定期组织干部进行学习讨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和边区第二次党代会的决议,边区党在对党的干部和党员进行教育中主要采取了如下方法:在政治教育方面,有计划地选调干部到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扩大并提高边区党校,轮流训练区级干部及乡级主要干部;各分区及中心县设立下级干部训练班;对在职干部实行每日两小时学习制,按理论文化程度不同将干部分为四类,学习不同内容;由县委帮助区委到各乡开办党员训练班;由边区党委供给“以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和怎样开展支部工作”为主要内容的教材。由边

区干部和小学教师的党员担当训练班教员。在文化教育方面,有计划地在短期内改变区级以上干部不识字的情况;动员支部中所有党员参加当地的识字班、夜校、冬学及其他补习学校。

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提出“理论与实际统一”的马列主义基本原则;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据此,中共西北中央局于9月组织农村考察团到固临进行调查研究,并写出《固临调查》一书;12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边区政府考察团去富县、甘泉,深入区、乡实地调查研究;与此同时,高岗也率领一个农村考察团赴绥德、米脂县进行调查,写出《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一书。随后,边区政府经济指导处各研究组分赴各县,对边区的工农业生产和发展方向进行了实地考察。

经过两年的学习和调查研究工作,党员和干部的政治理论和文化水平普遍得到了提高,对边区的实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有了改进;党的组织进一步巩固,党的领导有了明显的改革和加强,党的政策得到较好的贯彻执行。

但是,这个时期党内还存在着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存在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正之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在一部分同志中还相当浓厚,不少同志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从根本上说,王明“左”倾和右倾错误路线的遗毒还没有肃清,还常常在党内兴风作浪。这些问题,在普遍整风运动开展以后,逐步得到解决。

第二节 政权建设

一、政权体系与职能

陕甘宁边区的各级政权是由民主普选而产生的,其职能也是依据民主原则确定。边区的政权组织由三部分组成,即:参议会、政府和司法机关(边区设高等法院,专区设高等法院分院,县设法院,院长由同级参议会选举产生)。

边区参议会是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由边区人民选举产生,具有人民代表大会性质。其职权是:选举或罢免边区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委员及高等法院院长;监察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的政务人员;批准关于民政、财政、经济建

设、文化教育、地方军事等项计划；通过和审查边区政府的预决算；决定征收、废除或增减地方捐税，发行地方公债；审议和决定议员的各项提案及其他兴革事宜。议长、副议长和其他常驻议员，也由参议会选举产生。由常驻议员组成的常驻委员会，在参议会闭会期间，监督政府执行参议会的决议案，听取工作报告，提出询问和建议，出席政府委员会议和召集临时参议会。边区参议会选出的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组成政府委员会，是参议会闭会期间的最高行政机关，负责边区的政务，并向参议会负责和报告工作。

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是边区政府的派出机关，设专员、副专员，按照边区政府的命令和指示，指导和监督所辖各县政务及边区政府驻分区的附属机关。

县政权是推行边区各项任务的枢纽。县参议会是县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全县人民选举产生，其性质、职权在本县范围内和边区参议会大体一致。县参议会选举县长、副县长和县政府委员，组成县政府委员会，在参议会闭会期间决定政务。县政府下设秘书、民政、财务、建设、教育、粮食、保安等科室，及司法处、保安大队等机构。县派出代表机关：乡公署，协助县政府指导所属各乡的政权工作。

乡政权是边区的基层政权组织。乡参议会是乡的最高权力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不设议长和常驻议员，只在每次开会时推选三人组成主席团（乡长为当然成员）主持会议。在乡一级实行议行合一的民主制度，乡参议会选举乡长、乡政府委员会，执行全乡任务，并对上级政府和乡参议会负责及报告工作。其下设行政村，行政村辖若干自然村。

二、边区的两次民主普选与两届参议会

边区的选举制度，是使一切抗日阶级、阶层、党派和各族人民享有充分民主权利的选举制度。抗战期间，边区共进行了两次民主选举。

1937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林伯渠主持西北办事处的工作，开始筹建陕甘宁边区政府，进行“更名改制”工作。即，将西北办事处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将工农民主制（即苏维埃制）改为普选的不分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同时，将苏维埃政策及其工作方式、方法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及其工作方式、方法。5月，《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和《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公布，其中规定了边区民主的组织形式和具体内容：在边区实行议会民主制，“各级议会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各级行政长官——乡长、县

长、边区主席,由各级议会选举”,“各级政府直接对各级议会负责”,“凡居住在陕甘宁边区区域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16岁的,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些规定,奠定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治的基础。与此同时,成立以蔡树藩为主任的特区政府选举委员会,开始选举筹备工作。各县、乡组织选举委员会,利用各种宣传形式进行宣传鼓动。6月9日,边区党委提出《民主政府施政纲领》,并举办了边区选举人员训练班;一些县的党组织也根据实际分别提出了地方施政纲领。9月6日,经党中央提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7月,边区选举运动经过试点后,即由下而上地逐步展开,各阶级、党派和社团提出各自的竞选名单。实施方法是:每20人选出一名乡代表,由代表会推选乡长;每50人选举一名区议员,由区议会推选区长;每200人选举一名县议员,由县议会推选县长;每1500人选举一名边区议员,由边区议会推选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8月底,乡选普遍完成;到10月,区、县两级选举普遍完成;70%的选民参加了选举,2/3的选民提出了具体的提案、批评和建议。11月,开始进行边区议会的选举,边区党委重提《特区政府施政纲领》,各县市的党委陆续提出特区代表大会候选人名单。经过各地直接选举或县代表大会选举,于12月选出特区代表500多名。至此,历时半年多的选举运动全部结束,乡、区、县三级分别召开代表会和议会,选举产生了同级政府。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直到1940年,各级政权仍然全部或大部掌握在工农手里,一些县政府委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这一问题在第二次普选中得到了解决。此前,1938年11月25日,边区政府发出训令,按照国民政府公布的《省参议会组织条例》,改边区议会为边区参议会。

1941年,边区进行了第二次民主普选,这是一次贯彻“三三制”(即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国民党左派各在政权机关各占1/3。)精神的选举运动。早在1940年3月,党中央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中,提出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构成原则,即“三三制”。为贯彻这一精神,边区首先在绥德、陇东两个分区及富县试行“三三制”,以取得经验。1941年1月30日,边区中央局发出《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5月1日,又颁布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则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纲领规定,中共“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1/3,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

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 2/3 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从 5 月开始,边区各级参议会和政府选举按照“三三制”原则自下而上地普遍展开。6 月、7 月,乡(市)选举陆续完成,边区 80% 的选民参加了选举,1549 个乡共选出乡(市)参议员近 3 万名,共产党员占 1/3 强。各乡召开了乡参议会或代表会,选举了乡长,组成了新的乡政府。之后,又开展了县和边区两级参议会的选举,选出县参议员 2624 名、边区参议员 242 名(含 31 名候补参议员),并召开县参议会,推举出县长和县政府委员会的成员。选举边区参议员时,由于中共各县委对“三三制”原则认识不足,致使很多党外候选人落选。为补救这一缺陷,中共西北中央局于 10 月 15 日发出《关于边区政府聘请非党人士为边区参议会的通知》。随后,边区政府正式聘请 46 名非党人士为边区参议员,一些县政府也聘请了一些非党人士为县参议员。经过选举和聘请,边区和各县参议员的成份大体符合“三三制”的原则。

在第一次普选的基础上,1939 年 1 月 17 日至 2 月 4 日,边区参议会在延安召开,到会的参议员共 146 名。会议听取并讨论了林伯渠、高自立关于边区政府两年来的工作报告,以及政府各厅、院、处负责人对部门工作的总结,并作出了对边区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对边区政府所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缺点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边区今后工作的总方针,讨论并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和重要提案 12 件、条例五种;选举高岗为边区参议会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毛齐华、崔田夫、陈伯达、周长安、路志亮(女)、王观澜、高述先为常驻参议员;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林伯渠、高自立、雷经天、王世泰、周扬、曹力如、刘景范、周兴、阎红彦、霍维德、马锡五、王兆相、贺晋年、李子厚、乔钟灵为委员(前 7 位为常务委员),雷经天为高等法院院长。第一届民选边区政府正式成立。

在第二次普选的基础上,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于 1941 年 11 月 6 日至 21 日在延安隆重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正式参议员 201 人、候补参议员 18 人。这次会议的显著特点是实行了党中央提出的“三三制”原则。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演讲。会议审议了林伯渠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张邦英作的参议会常驻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的军事工作报

告、财政厅厅长南汉宸的财政工作报告、建设厅厅长高自立的经济建设报告和谢觉哉关于民主建设的报告,通过了总决议和其他决议。大会接受并通过中共边区中央局提出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这一纲领共 21 条,成为中共共同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人士共同的政治纲领。大会还通过二个决议、九个重要条例和 400 余件提案;选举高岗为边区参议会议长,谢觉哉、安文钦为副议长,高岗、安文钦、谢觉哉、李丹生、乔松山、任绍亭、王锡成、刘培基、崔田夫为常驻议员,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为副主席,林伯渠、李鼎铭、高自立、南汉宸、萧劲光、贺连城、刘景范、马明方、柳湜、霍子乐、那素滴勒盖(蒙)、毕光斗、萧筱梅、高步范、杨正甲、马生福(回)、高崇珊、徐特立为委员。选举结果,共产党员为七名,超出 1/3。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由党外人士白文焕递补。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的召开,为“三三制”的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边区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1944 年 12 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会上,林伯渠作了《边区民主政治的新阶段》的政府工作报告,毛泽东发表了《1945 年的任务》的演说。陈毅在祝词中说:“中国民主运动的浪潮,其发源地就是陕甘宁边区。”

在政权建设中,边区既从质量上保证了党的领导权,又注意把“三三制”的原则贯彻到政府的各项工作、各级各类组织机构,乃至征粮委员会之中,充分团结非党进步人士和中间分子,让他们有职有权,发挥他们从事抗战、建设边区的积极作用。边区政府经常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征询对政府大政方针的意见;共产党员领导干部与民主人士领导干部深交朋友,虚心听取意见。边区政府还切实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在三届参议员中,少数民族名额按人口比例高于汉族,边区参议会的议员中,少数民族议员六名。党外人士也从心底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同共产党合作得非常融洽。1943 年,国民党在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造谣说,李鼎铭“副主席也被撤职”。李鼎铭当即在报上发表《驳斥关于我被“撤职”的谣言》,说:“我还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我依然受陕甘宁边区二百万人民的重托而正在兴奋地继续工作着。”“我身为党外人士,与共产党合作两年,并没有感到共产党的任何歧视与排斥,我亲眼看到全边区参加三三制政权的党外人士,同样没有一个人感受到共产党的歧视与排斥。共产党对于民选来的党外人士是开诚相见,崇尚友谊,表现了最高的信任与尊重。”后来,当一名英国记者问起他是否有职有权时,他发自内心地说:“我是有职又有权”。

三、精兵简政与制度建设

精兵简政是政权建设中的一项重大改革。从1941年12月至1943年,边区政府进行了三次精简,基本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

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通过了党外民主人士李鼎铭等11人提出的精兵简政的议案。毛泽东看了议案后批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此后,精兵简政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在边区贯彻执行。第一次精简从1941年12月开始,到1942年结束,共裁减归并机构百余个,缩减人员1598人,占边区机关原有人数的24%。缩减的人员大部分充实到区、乡级行政机构。第二次精简从1942年5月部署,到9月结束,采取的措施是建立边区政府的工作制度,实行合署办公,政务与事务适当分工,提高县政府的职能。1942年12月13日,边区政府通过《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次年3月,纲要公布后,边区政府开始进行第三次简政,把35个机构减为22个,409人减为279人,其他各级政府也相应做了精简。经过三次简政,达到了机构精干,工作效能提高,作风改进,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党政军组织的统一领导等目的,使抗日民主政策得到了更好的贯彻,为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创造了重要条件。

边区政府还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开展了整风运动。1942年2月,成立了以林伯渠为主任的边区学习指导委员会;4月,成立了边区政府系统学习委员会,负责领导边区政府所属各厅、处、局和学校师生的整风学习。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林伯渠作了《政权工作中的两个根本思想问题》、《简政整政问题》和《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等报告和发言。会后,边区政府在原已公布的各项规章、条例的基础上,又陆续公布了一些规范政府公务人员的行为,使各级政府组织、各项工作制度化的条例,如《修正陕甘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条例》、《修正陕甘宁边区县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等。

边区对司法工作也很重视,逐步健全了司法机关,先后颁布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等各种条例。在司法工作实践中,结合边区实际形成了马锡五审判方式。这种审判方式的主要特点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把握案情;依靠群众,尊重群众,合理

合法地处理案件;就地审判,不拘形式;可以调解的尽量调解。

第三节 经济建设

由于边区处于分散的经济落后的农村环境,中共中央、中央红军以及大批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奔赴延安,使边区的脱产人口剧增;加之1940年以后,国民政府不仅停发八路军每月60万元的军饷,而且对边区实行军事和经济封锁,使边区断绝了一切外援,边区经济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如同毛泽东所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这种实际状况,使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在边区大力发展经济,对于打破国民党的封锁,支持长期战争,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提出“用发展边区的农业、工业各种生产和商业贸易,保证我们在财政经济和物质上的供给。”(李富春:《加紧生产,坚持抗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自力更生”的伟大号召,要求全体军民“自己动手,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支持战争”,要求边区军队和机关、学校一律参加生产,并迅速建起自给性的国营经济。并从边区经济状况的实际出发,确定了农业第一,工业(主要是手工业)第二,商业第三的经济建设方针。此后又进一步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和一系列重大政策。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边区军民大力开展经济建设,农业、工业、商业等各行业均取得巨大成就,初步实现了丰衣足食,保障了军需民用,支持了战争的需求,形成了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经济成分在内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

一、农业建设

土地问题是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关键。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边区已有半数以上人口的地区实行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剥削。未经土改的地区有绥德分区的米脂全县,绥德、佳县、子洲等县的大部地区,陇东分区的庆阳、合水和镇原三县,关中分区所属各县的大部或一部。抗战期间,在这些地区实行了减租减息。1942年以前,减租减息工作主要是一般宣传和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保护土地私有制,恢复地主、富农的公民权,调整阶级关系。1941年11月,边区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通过的《保障人权财权条例》规定:租佃、债权债

务双方,须遵照政府法令实行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1942年10月11日,西北中央局发出《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后,未经土改的地区召开租户会议,成立农会、减租会、减租保地会、租户会等群众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实行彻底的减租减息。地租一般限制在37.5%以下,利息限制在1—1.5分以下。据绥德六个区、米脂三个区、子洲五个区、清涧三个半乡、佳县个别村的综合统计,除按条例减租外,还勾销欠粮3.17万多石,退租1800多石,并在抽约换约的同时进行土地回赎。通过减租减息,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条件,也使地主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保障。从而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农业是边区经济的主体。抗战期间,边区的农业生产经历三个发展阶段。

1937年至1938年为恢复阶段。这个阶段实行争取外援、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在内战时期遭到很大破坏的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在这个阶段,由于有国民政府发给军饷和外来援助,边区政府取之于民的很少,1937年和1938年两年共征收公粮2.9万余石,1939年也只征收5万余石,大大休养了民力,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动员报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号召边区军民自己动手,开展生产运动。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吃饭是第一个问题”,号召一切可能的地方发展农业和工业,开展合作化运动,自己动手,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困难,以利抗战。这一年,全边区开荒105.5万多亩,耕地面积由1936年的843万亩增至1000多万亩,粮食产量由103万石左右增至137万多石,牛、驴由十几万头增至28万多头,羊由50万只左右增至117万多只。

1940年至1942年为自力更生、克服严重困难阶段。从1940年10月开始,国民党停发八路军每月60万元的军饷,并在边区周围实行经济封锁,断绝了外援,一切军需民用都要自给自足。加上边区脱产人员增多,使财政经济遇到极大困难。11月,中共边区中央局作出《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强调“广泛地开展边区经济建设,是边区当前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没有有效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边区的巩固和发展是不可能的”。12月3日,中共边区中央局在延安召开经济自给动员大会,提出“现在我们的任务

是要完全的自给”。1941年至1942年,边区党政机关把重点转到组织和领导群众生产上来。1942年,粮食产量达到150万石,棉花140.3万余斤,公粮征收由上年的20万石减为16万石。1940年至1942年三年中,军队和机关、学校靠自己动手获得的收入占了经费支出的部分或大部分,有的还做到自给有余,上缴公粮。终于渡过了最困难时期。

1943年以后,是为“丰衣足食”而斗争的全面发展阶段。在1942年10月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上,总结了几年来生产运动的成就和经验,批判了那种离开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的错误思想,和那种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而只注意向人民要粮要钱的错误作风。毛泽东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阐明今后发展生产事业的基本政策,规定生产和教育为边区的两大任务,而以生产为第一。据此,西北局决定边区生产以农业为第一的方针。1943年1月,党中央、毛泽东发出当年达到“丰衣足食”的号召。3月4日,中央生产委员会召开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生产总动员大会。以此为契机,边区军民开展了以“丰衣足食”为目标的大生产运动。11月,边区举办第三届生产展览会。从展出的情况看,全边区开荒97.6万余亩,耕地面积约1338万亩;粮食总产量约181万石,除满足消费外,尚节余21万多石;总劳力33万多人,参加互助的占1/4;改造二流子约4500人,安置移民约8000户;棉花种植面积达15万余亩,产棉约173万斤,达需要量的50%以上;前9个月产布约1.6万大匹,自给率达73%。1944年以后,农业又有新的发展,基本上实现了边区政府提出的“耕三余一”的要求。到1945年,耕地为1520多万亩,植棉约35万亩,牛驴约40万头,羊约196万只,与战前相比,分别增长约79.4%、200—300%、300%左右。公粮数降至12.4万石。

二、工业建设

边区原没有工业基础,中共中央初到陕北时,所需布匹、药品、文具、纸张、通讯器材等,基本上依靠外地。从1938年起,边区开始建设公营工业。1939年,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同时,积极发展手工业,为此,边区政府曾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工业发展的优惠政策,鼓励私人开办企业,为工业投资;欢迎海外华侨到边区兴办实业。1941年,边区的公营工业有了飞速发展,政府、部队、机关、学校都创办了一批工厂。三四月,延安公营工厂职工开展竞赛月活

动,大大加强了劳动纪律、提高了生产率,平均产量超过原计划的43%,产品质量显著好转,涌现出许多先进人物。这一年,政府经营的纺织、化工、造纸、铁木、瓷窑、被服、印刷等厂共22个。1942年,在对边区国营工厂进行调整合并,提高质量、增加产量的基础上,工业有了较大发展。年底,边区已有纺织、被服、造纸、印刷、化学、工具、石炭等工厂74个,资金约5967万元,职工4036人,连同私营和生产合作社,职工达21万多人(小手工业工人未计)。这一年,边区产土布约10万大匹、造纸约6900令。在这方面,国营工厂发挥了骨干作用,许多产品结束了零的历史,全部或部分地满足了军需民用。同时,私营工业也有很大发展,农村约有土织布机1.2万架、手拉机6.8万架,纺妇约7.5万人、织妇约1.3万人,年产土布约5.4万匹;造纸厂48家。1942年9月整理财经会议后,西北财经办事处提出1943年边区工业发展计划,规定该年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纺织、造纸,保障布匹、纸张的供给;发展煤矿及榨油等工业。1943年3月召开的厂长联席会议,依据发展生产、保证数量、提高质量的原则,研究提出了工作计划。之后,在进一步开展赵占魁运动的基础上,对国营工厂进行整顿,改进领导作风,肃清自由主义、官僚主义,调动工人当家作主的责任感和参加工业建设的积极性。1944年5月,边区举行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确定了为今后二年全面实现自给与提高质量而斗争的工业生产方向和任务,提出了公私兼顾,先公后私,科学技术与工人群众的创造性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工人品质与生产技术相结合,工厂企业化等原则。这次会议开始了边区为两年内做到工业品首先是布和铁全部自给的发展时期。7月,西北局作出《关于争取工业品全部自给的决定》,要求各工业管理部门努力发展工业生产,提倡群众使用边区工业产品;有计划地发展合作社和民营纺织、造纸、煤矿、陶瓷等工业;提高工业品质量;重视技术,尊重技术人员;加强领导和深化赵占魁运动。在这些正确方针的指引下,边区工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1944年底,国营工业已建立纺织、被服、陶瓷、玻璃、肥皂、火柴、造纸、印刷、煤矿、石油、化工、炼铸、盐业、机器制造和兵工等大小工厂123个,职工达1.2万余人。私营工业也有很大发展,各种工厂、作坊多达1400多家,职工4500多人。棉布的自给率约达70.3%,其他日用工业品也实现了自给或半自给的要求。到抗战胜利时,在重工业和化工方面,能炼铁、炼油、修造机器、配制军需品,制造盐酸、硝酸、硫酸、玻璃和陶瓷;在轻工业方面,年产土布15万大匹以上、纸张近2万令,还创办了火柴厂;民间纺妇达15万人以上、

织妇近 5 万人,各种织布机近 3 万架。

三、交通、通讯建设

边区的交通运输工具主要是毛驴等牲畜。为了发展经济、沟通边区内部以及与外部的联系,边区下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事业。1937 年秋冬,边区政府建设厅与陕西省政府建设厅协作,组织修复了富县至清涧段的 211 公里的咸榆公路。此后,边区政府又组织补修,并由清涧延至米脂,使这段公路增长到 365 公里。到 1940 年,边区政府拨款 200 万元修通了延定、安庆两条大车路,整修了富延路。此外,至 1945 年 8 月,运输合作社发展到 317 个,运输牲口由 1942 年的 246 头,发展到 1944 年 6 月的近 6900 头。以公营、公私合营或私营等形式,在各交通要点还设立了交通站,包括过载站、骡马店、草料店等。

边区通讯站于 1938 年 5 月成立,主要任务是传递境内党政军民的各种报纸、文件、信件、书籍等,并与晋西北沟通联系。到 1940 年 3 月,通讯站系统的组织机构大体形成,总站下设绥德、关中、庆环、陇东、三边五个分站,分站下设 15 个县站,另设 13 个联络站,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以延安为中心的通讯路线十余条。之后,撤销了陇东、庆环两个分站,设立庆阳分站,新增 9 个县站和 33 个宿站、20 个食站,各站干部合计 52 人、通讯员 129 人。1946 年 4 月,边区通讯站改名为边区邮政管理局。

四、财政、金融及商贸工作

边区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保证抗战需要,促进生产的发展,平衡财政收支,稳定市场。抗战开始后,边区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客观需要与财力薄弱不适应的矛盾。解决财政问题关键在于发展经济,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边区财政工作大体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1940 年以前,是边区财政工作的创建时期。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和基本任务是,争取外援与休养民力。1937 年,外援占全部国民经济收入的 77.3%、1938 年占 51.6%、1939 年占 85.79%、1940 年占 74.7%。财政收入首先用于扶助农民发展生产,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减轻人民负担。1937 年征粮 1.4 万石,人均一升多(一升为 1.5 公斤),1938 年征公粮 1.59 万石,人均 1.2 升。边区各级工作人员厉行节约,减少开支,实行极低的津贴制,最高津贴每人每月 5 元,县长每月 2.5 元。1939 年,机关、部队、学校开展生产劳动,减少了财

政支出,增加了对生产建设的投资,颁布一系列税收条例,加强税收工作,使税收从1938年的27万余元增至1940年(前10个月)的80万元。

1941年,由于外援断绝、脱产人员增加,物价上涨、财政遇到极大的困难而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向人民征募救国公粮20万石、公草2600万斤;首先扶持农业,为农业投资500万元;禁止法币、发行边币,以巩固金融、稳定市场;成立税务机构、统一税制;开发食盐业,促进农工业的发展。采取这些措施后,基本上解决了吃穿问题,增加了财政收入。

1943年,边区军民为实现丰衣足食开展了空前规模的大生产运动,财政对经济建设的投资逐年增加,1943年比1942年增加九倍;1944年比1943年增加50%;1945年,仅农业投资就超过1944年全部经济建设投资的总和。各机关、学校、部队都建立了自己的家务。据1945年27个县统计,生产收入平均占财政支出50%以上的为10个县,占33%以上的为7个县,占20%以上的为4个县,不足20%的为6个县。这一年,各县基本上实现了经费自给,政府取之于民的部分开始减少,1943年征收公粮18万石,1944年减为16万石。其他税收也有减轻,党政军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提高。1943年至1944年,边区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保证了抗日战争的供给,促进了经济建设的发展。

早在1937年边区政府成立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就改为边区银行,当时,边区境内流通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1938年,边区银行以“光华代价券”的名义发行六种代价券,以解决市场辅币之不足。1939年,党中央决定停止法币流通,建立以边币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1941年1月30日,边区政府颁布停止使用法币的布告;2月18日,授权边区银行发行面值为1元、5元、10元的边币,作为边区惟一本位币,并逐步收回光华券。1943年以后,大生产获得大丰收。但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准备进犯边区,一切必需品全被封锁,市场物资缺乏,法币兑换只出不进,物价大涨,边币与法币比价大跌,造成边区金融的大波动。在此情况下,1944年5月,西北财经办事处决定发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流通券1元等于边币20元,与法币比价为1:2.5。边区以民办公助、统一领导、入股退股自由为原则,倡办农村信用社。1945年,信用社发展到80余处,吸收存款约15亿元,起到了小银行的作用。与此同时,银行的主要财力则用于发放贷款、发展生产等方面。

经济的发展活跃了商业贸易。边区政府推行保护商业,团结保护私营工商业者,鼓励边区以外工商业者到边区投资经营的政策,对商业给予扶持帮

助。1938年3月,边区建立的第一个国营商业机构——光华商店,积极组织物资进出口,并鼓励开办商店。到1940年,商品流转量已由初期的约400万元法币增加到约2000万元;国营商店,仅延安就有46家;到1943年,私人商店仅延安就有473家,资本22亿元;到1944年,机关、学校分散经营的大小商店,仅延安就有67家。1938年1月,政府开始大力提倡消费合作社,成立了边区合作总社,各县建立县联社。1940年有消费合作社132个,1944年达281个,方便了社员的交换,改善了人民生活。南区合作社成为典型。

在边区受到国民党军重点封锁之后,边区政府采取有力措施,迅速发展公私商业,积极开展内外贸易。1941年2月,恢复了边区贸易总局,并规定了“对外调剂,对内自由”的贸易政策。1943年,边区出口总值达53万余元。1944年,仅盐业公司就卖出食盐24万多驮;土产公司换进法币10亿多元,另有金券约13万元、银元约14万元,以及大量金子、银器等;进口总值299万余元,出超19万余元。1945年出口总值39万余元(券币),出超近1.8万元;资本增值极快,仅土产公司就增值约22亿元,相当于该公司1942年成立时资本的202倍。国营企业以其雄厚的资金,控制着边区的内外贸易,成为边区商业贸易的骨干和开展贸易斗争的基石。此外,还在商业集中的城镇形成了一些以公私商店为主的街市,恢复和发展了农村集市和骡马大会,日成交额可达百万元。

第四节 文化教育建设

陕甘宁边区所辖之区域,自古几为文化荒漠。进入现代以后,除绥德、米脂国民教育略积淀起一些基础外,从总体讲,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封建、迷信、文盲和不卫生充斥社会生活之中。文盲约占全边区人口99%,除城镇外,农村连小学都很少,许多穷苦农民,人老几辈不识字;文化设施和卫生条件很差,缺医少药,疫病流行,人口死亡率很高。尽管在工农民主政权建立后,政府兴办了一些文化教育事业,提倡移风易俗,但限于战争环境,文教事业无论从内容到形式的发展都是极其有限的。全面抗战爆发后,海内外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给边区发展文教事业带来了各类人才;同时,边区处于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有条件发展各类建设事业。因此,与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亦极其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明确边区文化

教育的方针是：“必须努力除去革命前旧制度对于广大民众所遗留的文化落后状态——文盲、迷信、不卫生等，深入边区人民对于当前革命的民族、民主、民生纲领的认识。”“必须立足进步的科学理论的基础上，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而斗争。”在正确方针指导下，边区的文化教育各项事业有了长足发展，有些方面甚至实现了零的突破。但是，在大力兴办文化教育事业的过程中，在许多方面逐渐出现了形式不一、程度不同的脱离边区建设实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强迫命令的现象。为了纠正这种偏向，使之更加适合抗战和边区建设的需要，边区党和政府适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特别经过1942年全党整风和延安文艺座谈会，端正了文化教育工作的方向，边区广大知识分子深入实际与民众之中，为抗战事业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教育、文艺、卫生、宣传等各行各业蓬勃健康发展起来，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

一、教育工作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即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兴办了一些文化教育事业，但由于游击战争环境的制约，文教事业的发展微乎其微，远远不能适应抗战和人民群众的需要。

边区政府成立后，即对发展国民教育、群众教育给予了高度重视。1938年4月，在延安召开了边区国防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国防教育会。随后，边区政府教育厅制定了《边区国防教育的方针与实施办法》，强调边区国防教育的任务是：“提高民众的民族觉悟、胜利信心和增加抗战的知识技能，以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战，训练千百万优良的抗战干部，培养将来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建设者，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1939年1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第一届参议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为要普及边区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教育民族新后代，提高边区人民文化政治水平，加强国防教育工作是当前迫切的任务。”同年12月，中共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又通过了《关于发展边区教育提高边区文化的决议》。之后，边区政府颁布了许多决定和指示，对国民教育、干部教育工作作了具体部署，并从上至下建立健全了教育行政领导机构和各项规章制度。在1943年12月召开的边区政府第三次委员会议上，又明确了边区教育的方针是：“为抗日战争与边区人民服务，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在这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组织的保障下，边区的国民教育迅速发展起来。

1937年春,全边区仅有小学320所,在校生约5600人。到1940年春,已有小学1340所,在校生4.1万余人,学校增加3倍多,学生增加6倍多。此后,小学教育不断发展,并增多了民办小学。1940年8月13日至9月2日,边区召开了教育工作会议,会议强调在教育工作上要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提高教育质量,大量培养师资,提高小学教员的地位和待遇,解决教材困难。后经过精简、巩固、整顿、再发展几个阶段,到1944年上半年,小学达1377所,其中民办小学1057所,在校生约3.4万人。1937年以前边区内没有中学。1937年3月成立鲁迅师范,1938年成立边区中学。1940年,边区中学在数量上大为发展,由2所增加到7所,到1942年建成10所,其中普通中学2所、师范5所、中等专业学校3所,在校生2000多人。各中等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大都被分配到各个岗位从事革命工作。

边区还加强了以成年农民为主要对象的不脱产的社会教育。1937年9月,边区政府提出开展识字运动,并开始办了冬学,建立了以小学为中心的半日校和夜校,进行不脱产的扫盲教育。1940年10月6日,边区党委宣传部、边区政府教育厅、保安司令部、总工会、青救会、妇联合会联合发出《关于办理冬学给各界的指示信》,要求动员14岁至40岁的文盲、半文盲入学学习,县、区、乡建立冬学委员会,主持这一工作。此后,边区政府教育厅陆续发出关于冬学的指示,使冬学运动在边区广泛开展起来。到1941年,在政府加强领导并在干部、课本和经费等方面予以必要帮助下,以民办公助为基本方针,以需要和自愿参加为原则,以读报识字组、夜校、半日校、冬学、读书班、民教馆等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在边区大为发展,通过各种形式,对广大农民进行文化教育,以求达到逐步消灭文盲、破除迷信、讲究卫生,提高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激发抗日救国热情,掌握抗战建国和边区建设所必需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的目的。到1944年,各类识字、读报组几乎遍及各村,有五六万人参加;全边区有冬学3470所,入学农民约5万人,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读、写、算和群众迫切需要的卫生知识。通过一冬三个月的学习,有的学会了写信,能读《边区群众报》;有的学会了珠算,能记账;特别是在冬学里进行妇婴卫生的教育,使冬学的发展往前推进了一步。

与发展国民教育的同时,适应大批知识分子来到边区的实际和抗战需要,边区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培养教育抗日干部的工作,把干部教育放在各类教育之首。1939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干部教育动员大会,边区党

委宣传部即成立专门机构负责管理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学习,各单位召开学习动员大会,制定学习计划,学习运动开展起来。这年底,边区第二次党代会通过《关于党内干部教育问题的决议》,决定普遍地有计划地组织在职干部的学习;建立一定的学习制度。规定“边委应逐年有计划地抽调在职干部到边区党校、中央党校、女大及马列学院等处学习。”1940年,中共中央相继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等多项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把干部教育作为党的重要工作,把加强提高学习质量作为在职干部教育的基本任务。1942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特别强调“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边区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及时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在干部中进行了广泛的动员和具体的部署。边区一级机关,按干部文化程度,分甲、乙、丙三类组织学习组,每天学习2.5小时,学习内容主要包括文化、马列主义、党的建设;各分区、各地,按实际情况组织在职干部学习。此外,中共中央把创办干部学校当做教育工作的头等大事来抓,先后创办了马列学院、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央研究院、军事学校、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泽东干部学校、自然科学学院、民族学院、医科大学、俄文学院、延安大学、中国女子大学、西北局党校、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等。这些学校,有的属边区的,有的是中共中央创办而与边区互相合作的。它有来自东西南北海内外各民族的优秀青年,培养了成千成万分散在全国各抗日战线的干部。此外,边区党委、边区中央局、西北局分期培训边区县区干部达3700多人;在边区师范、三边师范、绥德师范等学校附设行政人员训练班,培训干部400多人。1943年以后,每年冬季各县都举办区乡干部训练班,参训人数约2000名,主要学习党的政策,总结交流工作经验。边区的干部教育取得了突出成绩,不仅使边区的干部得到了提高,也为其他解放区输送了大批革命干部。八年抗战期间,为其他解放区训练了4万名以上的政治、军事干部,及成千的文化和技术干部。

二、卫生工作

随着边区的政治经济建设的开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政治民主权利都得到了提高,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缺医少药、迷信、愚昧和不卫生习惯还严重存在,疾病流行,巫神横行,人畜死亡率很高,一些地方婴儿死亡率曾高达

60%，成人死亡率达3%。这一严重问题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重视。1939年11月，边区二次党代会通过《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指出：“应在边区人民中进行普遍的清洁卫生教育，提高人民讲究清洁卫生的知识，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医药卫生工作，研究中药，发展制药厂，设立医药合作社，增设各地卫生所，发展医疗工作”。1940年以后，边区医药卫生工作逐步发展起来，成立了专门的医药卫生工作管理机构。5月，成立了延安防疫委员会，各单位成立防疫分会，普遍开展卫生宣传和防疫工作。6月，边区召开国医代表大会，成立了边区国医研究会。之后，边区医药学校、白求恩护士学校、中华医药研究会、边区医药学会等一些医药教育研究机构成立，全边区开展了广泛的卫生运动，改善了卫生状况。1944年春，延安数县传染病急剧流行。蔡畅在5月6日西北局召集的边区医药卫生工作负责人会议上提出，要为边区群众解决“财旺人不旺”的问题。边区政府成立以傅连璋为主任的防疫委员会领导防疫工作，组织流动医疗队下乡扑灭疫病。6月30日，在延安召开了边区卫生动员大会，号召人民群众讲究卫生，医务工作者热心为群众服务，造成热烈的群众卫生运动，做到人财两旺。会后，举行了夏季卫生运动宣传周，各医疗队在乡村医疗治病，举办巡回展览、助产训练班，给群众讲解卫生常识，开展群众卫生工作，使疫病得到控制。在边区政府发出的卫生第一、婴儿死亡率降至60%以下的号召下，各地在冬学运动中还创办了一批以妇婴卫生为主要内容的妇女卫生冬学，推广新法接生，宣传科学卫生道理和妇婴保健常识，启发群众起来同愚昧、不卫生习惯作斗争。

到1944年10月，边区有医院11处、卫生所75处、休养所7处、西医276人、中医1074人、兽医54人、接生员61人、药店390家。提倡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组织医疗人员下乡，广泛宣传和普及科学生产知识，同封建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提倡打水井、修厕所、建猪圈、消灭虱子、取缔巫神；培养医护卫生人员、接生员，推广新法接生；进行妇婴、饮食卫生等教育，禁止幼女缠足等。逐步改变了农村不讲卫生的陋习，增强了人民的体质。

三、文学艺术工作

边区的民主空气与自由环境，为文学艺术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尽管当时生活异常艰苦，物质十分匮乏，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文化人云集延安，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发展革命的文化工作，各级文艺领导机构和各

种文艺团体相继成立,运用各种形式,开展抗战宣传活动,产生了一大批优秀作品。

1936年11月,在陕北保安成立了第一个文艺领导机构——中国文艺协会;1937年11月24日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边区文协)之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边区分会、陕甘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等专业协会相继成立。边区文协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其下含有社会科学研究会、国防教育会、国防科学社、战歌社、海燕社、世界语者协会、新文字研究会、民众娱乐改进会、抗战文艺工作团、文艺界抗战联合会、文艺突击社、诗歌总会、戏剧界抗战联合总会、文艺顾问委员会等众多文化工作团体。这些文化团体的任务“在于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唤起我们伟大人民群众之民族的自觉,争取思想界的民主,扩大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运动”。

组织起来的文化人投身于伟大的抗战宣传工作之中,宣传群众、发动群众起来抗战。1938年8月,以丁玲、周巍峙等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东渡黄河,活跃在敌后抗日根据地,足迹遍及晋察冀,进行广泛的宣传和战地服务。此外,当时影响较大的文艺队伍还有抗战剧团、民众剧团、西北文艺工作团、鲁艺实验剧团、延安电影团、延安青年艺术剧院、烽火剧团、边保剧团、联政宣传队、延安平剧研究院等。据1940年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时的统计,在美术方面,抗战以来,各种宣传画、漫画、木刻、壁画等的创作在3500件以上;音乐方面的创作,从小调歌曲直到大合唱,共计300个以上;戏剧作品,由活报杂耍到两三幕的大戏,有10种以上;文学创作如诗歌、小说、报告文学数量之多,无从估计。

但是,在文艺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缺点,如文艺工作者轻视实践、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在思想感情上、艺术趣味上往往同工农兵格格不入,他们不了解新的环境、新的时代、人民新的需要,仍然因循守旧,重演旧的剧目,追求上演大戏,照搬外国的东西,对革命文学艺术应该表现什么,怎样表现,为谁服务等根本问题缺乏清楚的认识,不屑于群众所喜闻乐见的短小精悍的节目,在创作上公式主义、小资产阶级自我表现的倾向严重。这些都严重阻碍了革命艺术的健康发展。

中共中央、毛泽东及时看到了这种状况,看到了文化人转变立场、改造思想的迫切性与重要性。为了澄清各种糊涂观念,明确方向,指导文艺工作沿

正确方向发展,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召开了一次文艺座谈会。为了开好这次会议,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与作家、艺术家广泛交谈,了解情况,探讨问题,沟通思想。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召开,当时在延安的中央有关负责人和文艺团体的负责人,以及文学艺术工作者约百余人到会。会议先后开了三次大会,并分作小组进行讨论。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就文艺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并作结论,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地回答了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强调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的问题。他指出:“现阶段中国的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我们应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共产党员应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我们的文艺是为最广大的人民,即占人口90%以上的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服务。为完成这一任务,文艺工作者就要在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把立足点逐渐地移到工农兵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详情当时没有见诸报端。直到1943年3月13日,《解放日报》首次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部分内容;10月19日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日,正式发表全文。11月7日,中宣部作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要求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整风必读文件,在全体党员和干部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作为干部今后的必修课。

座谈会后,文艺界开始进行整风学习。1942年5月29日,陕甘宁边区文委召集有关文艺团体会议,决定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实行战时文化动员,号召文艺工作者到部队去,到地方民兵里去,文武结合,进行对敌斗争。1943年3月10日,中央组织部和中央文委在延安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50多名党员文艺工作者出席。会上,中宣部副部长凯丰作了《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的讲话,中组部陈云作了《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的讲话。会议号召文艺工作者到实际斗争中去,到工农兵中去,一面参加实际工作,一面体验生活,改造自己,为创作打好基础。3月22日,中共中央文委开会讨论工作总方针,确定各抗日根据地戏剧工作的总方针是为战争、生产及教育服务。首先在陕甘宁边区执行这一方针,取得经验,指导各根据地的戏剧工作。文艺界提出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

的行动口号,纷纷下乡、下厂、下部队,实行党的文艺政策,写出了许多优秀作品。1943年11月21日,西北局宣传部召集各剧团负责人开会,动员和组织剧团下乡。会后,鲁艺秧歌队去绥德,民众剧团去关中,西北文艺工作团去陇东,青年剧团去三边,他们走遍边区的城镇、乡村,演出文艺节目,并帮助群众制订生产计划,组织变工队,同群众打成一片,深受欢迎。这年春节,在延安和边区兴起了新秧歌运动,秧歌队的足迹遍布边区的乡镇山村。1944年4月28日和5月2日,西北局文委两次召开会议,总结剧团下乡和当年春节延安宣传队工作,强调戏剧的创作要为政治任务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秧歌剧运动要有群众性,从实际出发,以普及为主。

延安文艺座谈会带来了延安文艺界的勃勃生机,加之1943年全边区大生产运动取得丰硕成果,为文化运动的大规模开展奠定了厚实的物质基础,边区的文艺工作空前活跃起来,创作了大批反映群众斗争生活、抗日战争重大题材的作品。广大文艺工作者背起行李纷纷走向农村、工厂、前线,深入现实生活,投身于工农兵火热的革命斗争之中,在戏剧、诗歌、秧歌剧、歌舞、美术、文学创作等各方面硕果累累,许多优秀作品如《兄妹开荒》、《改造二流子》、《南泥湾》、《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血泪仇》、《白毛女》、《黄河大合唱》等风靡边区,并迅速传播到其他根据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流传至今。边区革命斗争的实际造就了一大批有作为的文艺工作者,除专业文艺社团外,到1944年10月,全边区有994个秧歌队、114个自乐班、62个皮影班、25个旧戏班,另有说书等民间艺人散于各地。专业性协会有边区音协、剧协、美协等,文艺刊物达二十多种,如《文艺突击》、《文艺战线》、《文艺时报》、《大众文艺》、《部队文艺》、《新诗歌》等。电影从无到有,先后拍摄了《南泥湾》、《延安与八路军》等十分珍贵的纪录片。艺术院校除业余的星期音乐学校和星期文艺学校外,另有三所专业的正规学校,即鲁迅艺术学院、边区艺术干部学校、延安部队艺术学校。这一时期,文艺运动的特点是:文艺与人民,特别是与工农兵群众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艺术创作者和劳动人民在思想感情上大幅接近、结合;艺术主体形象中劳动人民大幅度地替代了社会其他层次的人物和生活;艺术欣赏者突破知识阶层大幅度地走向劳动阶层之中。

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号召并组织陕甘宁边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奔赴敌后解放区。之后,延安文艺工作者百余名组成各个文艺工作团分赴东北、华北解放区,直接为人民解放战争服务。

四、新闻宣传工作

中共中央、边区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新闻、广播和出版事业的发展,先后创办了《新中华报》、《解放日报》、《打日本》、《边区群众报》、《抗战报》、《救亡报》、《战声报》、《部队生活报》、《关中报》、《三边报》、《绥德大众报》、《佳县报》、《靖边报》、《战旗报》、《米脂报》、《赤水报》等等,到1949年10月,边区共出版报纸40种,为报纸写稿的通讯员达1952人,其中1114名是区、乡、村干部。边区内发行报纸2.1万多份,平均每70人有一份定期的报纸;边区还陆续出版了《解放》、《共产党人》、《学习导报》、《文艺战线》、《中国文化》、《大众文艺》、《诗刊》、《国防卫生》等60多种刊物。此外,还有668块黑板报,各部队、机关、学校都有墙报。在传达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介绍国内外大事,介绍生产、文教、卫生情况等方面,起到了党的喉舌的作用,对于宣传、教育、动员、鼓励战士和群众,响应党的号召,搞好生产,支援前线,传播新文化、新知识,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开展学术研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图书出版方面,成立了解放出版社和边区出版社,开办了新华书店,翻译出版发行了大量的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以及中、小学的文化课本。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建成并首次播音,主要广播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重要文告及国内外新闻。

第五章 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力量

1937年9月,八路军主力东渡黄河抗日,陕甘宁边区的军事武装力量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正规军队,由八路军抽出留守陕甘宁边区的兵力组成;另一部分是地方人民武装,即保安部队。此外,边区还有一支地方性的群众武装团体——自卫军。这些军事武装力量,担负着保卫河防,对外保卫边区的安全,对内打击土匪、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维护社会安定,动员与组织民众,抗日救国等任务。

第一节 八路军留守兵团(后方总留守处)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八路军主力东渡黄河进入抗日前线,中共中央军委把从八路军各师抽出留在陕甘宁边区的兵力组成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下设东、西地区留守处。抽出的部队有:第一一五师之炮兵营、辎重营;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之第七一八团及特务营、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第一二九师之三八五旅(缺第七六九团)及特务营、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等,共约9000人。10月2日,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将各留守部队统一整编为警备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团。尔后又将第七、八团改编为警备第八团,原第七七〇团及骑兵营、富甘独立营番号未变。同年12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改编为留守兵团,主要任务是:保卫陕甘宁边区,肃清土匪,安定人民生活,保卫河防,保卫中共中央,巩固与扩大留守部队,加强正规化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培养与积蓄干部。司令员及政委均为萧劲光。

1938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为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武装部队,加强河防,将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及其所属地方部队统归八路军留守兵团指挥,共有部队一个旅10个团,10个保安大队和一个独立营,总兵力达15514人。为了加强边区保卫力量,1939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一二〇师三五九旅调回陕甘宁边区,归留守兵团指挥,接替绥德警备区防务。12月,以绥德警备司令部为基础成立了警备第一旅,调防关中地区。至1940年,留守兵团共有3.1万余人。为适应陕甘宁边区武装斗争的需要,1941年5月至8月,八路军留守兵团先后对所属部队进行整编。5月,将边区保安司令部的10个保安大队改编为五个保安团。到1941年底,留守兵团总兵力为31777人。1942年6月10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在延安成立,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留守兵团划归其指挥。同年9月15日,留守兵团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经整编,三八五旅驻防陇东分区;三五九旅驻防延安分区;边区保安司令部,警备一团、五团,保安二团合编为警备第三旅,驻防三边分区;留守兵团直属骑兵团、三五九旅骑兵大队和保安骑兵团,合编为骑兵旅,驻防葫芦河。总兵力为5个旅21个团32292人。此后,中共中央为保卫边区,迎接抗战反攻的到来,边区屯兵最多曾到9个旅30个团52481人。留

守兵团先后统辖第三八五旅兼陇东警备区司令部、第三五九旅、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司令部、绥德警备区司令部、两延河防司令部、神府河防司令部和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等。机关驻地延安。

第二节 边区保安部队

保卫和巩固边区,除正规化的留守兵团外,边区还建设了一支地方人民武装,即保安部队。

1937年8月15日,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在延安成立。高岗为司令员,周兴为副司令员。主力红军改编后,将未编入留守兵团的地方武装按其政治素质与战斗力的强弱,编为10个保安大队和若干保安队、警卫队,原则上每个县都有一个保安队,总兵力为4000人。其主要任务是:动员与组织民众,参加抗日救国,镇压汉奸和一切反动派的阴谋活动,协助八路军留守兵团保卫陕甘宁边区。1938年3月,边区保安司令部划归八路军留守兵团指挥。1939年上半年,为了促进战斗力的提高,并逐步向正规部队过渡,又将保安队改编为独立营。在边区党委的领导下,对保安部队加强了军事、政治和文化教育。保安部队的政治教育以时事教育、阶级教育为主,提高政策水平,坚定阶级立场。军事训练以提高射击技术为主,经过训练,射击命中率由50%提高到78%,投弹也由平均23米增加到30米。1942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边区保安司令部对外仍保留名义。1942年10月1日,边区保安司令部改编为警备第三旅。保安部队在边区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积极配合留守兵团完成保卫边区、维持地方治安的任务,成为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先后隶属中共中央军委、八路军留守兵团、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和中共陕甘宁边(特)区委员会、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中共西北中央局。下辖庆环、陇东、三边、神府、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

第三节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1942年,鉴于陕甘宁边区、晋西北边区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联系日益紧密,需要统一指挥,在中共中央作出成立陕甘宁与晋西北联防军政治部决

定之后,中共中央军委于5月13日作出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决定,任命贺龙为司令员,徐向前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关向应为政治委员(关养病期间,由高岗代理),林枫为副政委。联防军司令部任务为: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两个区域的军事指挥及军事建设;统一两个区域的财政经济建设;统一协调两个区域的党政军民关系。6月8日,联防军司令部正式成立。下辖:八路军一二〇师、八路军留守兵团、晋西北新军、三五八旅、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炮兵团。9月15日,中共中央命令,将联防军司令部与留守兵团司令部合并(对外称留守兵团司令部),指挥晋西北与陕甘宁边区部队。增任萧劲光为副司令员,张经武接任参谋长。不久,又任命谭政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1943年5月,国民党军队计划闪击陕甘宁边区。为了保卫中共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和独立第一旅先后由华北调入边区。1944年春,又从华北调入三支部队:一支是由杨得志率领的由冀鲁豫军区六个团组成的西进支队,8月改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一旅;一支是由黄永胜、邓华率领的由晋察冀军区六个团组成的机动旅,同年秋改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二旅;一支是由王近山、徐立清率领的第一二九师三个团组成的新编第四旅。为开辟新的根据地,1944年10月,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第三五九旅一部改编为八路军第一游击支队,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治委员,南下湘粤边。1945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又决定第三五九旅留驻陕甘宁边区的部队组成八路军第二游击支队,刘转连任司令员,张启龙任政治委员;警备第一旅一部改编为八路军第三游击支队,文年生任司令员,雷经天任政治委员。6月,这两支队伍6000余人由延安出发南下。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隶属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共西北中央局,下辖晋绥军区及其所属军分区、骑兵旅、独立第一旅、教导第一旅、教导第二旅、新编第四旅、第三五八旅、绥德警备区司令部、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区司令部、警备第三旅兼三边军分区、第三八五旅兼陇东军分区、第三五九旅兼延属军分区。

第四节 边区自卫军

边区自卫军是一支不脱离生产任务的地方性的群众武装团体,边区18—45岁的成年男女均可加入。自卫军成员平时参加生产,农闲进行操练,战时

担任后方勤务,协助主力部队作战。中共边区委员会和边区政府十分重视自卫军的建设,1937年10月制定了《抗日自卫军条例》。为了加强对群众武装的领导,联防军司令部专设了人民武装科,各县设大队部,县长兼大队长,县委书记兼政委,另设脱产的大队附一人。区设营,区长兼营长。乡设连或排。自卫军利用生产间隙和冬季闲时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文化教育,使军事素质与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到1940年底,边区自卫军有14.535万人,其中基干自卫军21803人。自卫军在维护地方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方面做出了贡献。

第五节 其他军事组织

1. 陕北东分区保安司令部

1937年7月成立,司令员黄罗斌,归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共陕北东分区委员会领导,下辖东分区各县保安队和游击队。机关驻延安县城。1937年9月,陕北东分区保安司令部撤销,所辖各县军事组织归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直接领导。

2. 陕北西分区保安司令部

1937年7月成立,司令员吴岱峰,归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共陕北西分区委员会领导,下辖西分区各县保安队和游击队。机关驻蟠龙镇。1937年9月,陕北西分区保安司令部撤销,所辖各县军事组织归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直接领导。

3. 关中特区司令部、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区司令部

1937年10月,原关中特区司令部(司令员张仲良,政委习仲勋)改为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先后为张仲良、文年生,政委先后为习仲勋、张德生),属中共关中分委和陕甘宁保安司令部领导,下辖三个保安大队(后改为三个独立营)。1941年10月,将三个独立营改编成关中保安第一团;又将中共陕西省委直辖的警卫营、独立五营和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所辖的青年营合编为保安第三团。同时,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之一、二团由富县移防关中分区。1942年底,警备第一旅与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合并,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区司令部(司令员先后为文年生、王世泰,政委为张德生)。1943年3月,原关中保安第一团和第三团改成警三团。这时警备区司令部直辖警

一团、警二团、警三团,机关驻新正县马栏镇(今属旬邑县),属中共关中地委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领导。1945年5月间,警备第一旅一、二团组成八路军第二、第三游击支队出发南下。关中警备区司令部只剩下警三团。王世泰率警三旅一部奉命从三边到关中加强武装力量建设。同年7月,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调集三个师的兵力向关中分区发动进攻,中共中央军委调派新编第四旅、教导第一旅和教导第二旅部队增援关中。关中警备区司令部动员全分区军民积极参战,有效地配合正规部队,取得爷台山反击战的胜利。关中警备司令部随即改为关中军分区。

4. 神府保安司令部、第一河防司令部

1937年8月,驻神府特区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独立第一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电令整编为一个团(辖三个营),对外称一二〇师工兵营。9月底,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电令,团部带两个营东渡黄河,到达山西抗日前线,12月,整编为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警备第六团。留在神府的一个营改编为神府保安第六大队,后改为独立第六营。1938年1月,成立了神府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黄罗斌、政委张秀山)。3月,将保安司令部改为第一河防司令部(司令员先后为黄罗斌、杨文谟、杨嘉瑞、马红侠、刘忠,政委先后为张秀山、武开章、刘长亮)。第一河防司令部归中共神府特(分)委和留守兵团司令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领导。

5. 三边分区保安司令部、警备第三旅兼三边警备区司令部

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决定成立三边分区保安司令部,为三边地方部队的领导机关,司令员先后为白寿康、朱子休、郭炳坤,政委先后为白治民、高峰。三边分区保安司令部属中共三边特(分)委和边区保安司令部双重领导,机关驻定边县城西街,下辖保安大队、骑兵营和定边、盐池、靖边三县保安队。1943年1月,在驻三边警备一团和三边分区保安司令部的基础上,成立警备第三旅兼三边警备区司令部,隶属中共三边地委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司令员贺晋年,政委王世泰,机关驻地定边县城。下辖第七团(驻盐池)、第八团(驻定边)、第二团(驻张家畔)和骑兵团(驻绥远城川)。

6. 三五九旅兼延属军分区

1942年12月,延属分区成立以后,八路军三五九旅由绥德警备区移防延安,兼延属军分区。机关驻延安市东关。司令员王震,政委先后为张邦英、王震(兼)。延属军分区属中共延属地委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领导,下辖

延安市和延安、甘泉等 10 县(市)地方武装。1944 年 11 月,王震率三五九旅南下湘粤边,延属军分区撤销,只在延属专署设了武装科领导各县、市地方武装。

7. 两延河防司令部

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 1937 年 11 月成立,司令员何长工。机关驻延长县城,归八路军留守兵团指挥,主要承担两延地段黄河的防务。

8. 绥德警备区司令部

1937 年 10 月,日本侵略军侵入山西柳林一带,并隔河炮击陕北的宋家川等地。经过国共双方商谈,决定划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五县为警备区。原驻绥德的国民党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奉命调离,由八路军陈奇涵部接防。警备区司令部设在绥德城内,隶属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下辖警备八团、警备一团、警备三团。1939 年 8 月,为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摩擦,加强河防,保卫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从抗日前线调回绥德警备区,接替陈奇涵部的防务,王震任司令员。警备区司令部下辖七一七、七一八、七一九 3 个团和一个保安团(即独立团)。

绥德警备区司令部建立后,承担了上自佳县万户峪、下至清涧河口全长 380 华里的河防守卫任务,抗击日军的进攻。自 1941 年春到 1942 年冬,三五九旅先后分三批开赴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八路军一二〇师独立第一旅接替绥德警备区的防务。绥德警备区司令部先后属中共绥德地(特)委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司令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领导,其司令员先后为陈奇涵、王震、王尚荣,政委先后有郭洪涛、王震、袁任远、习仲勋、李井泉。

9. 直辖县军事组织

为了抵抗日军的进攻,粉碎国民党制造的武装摩擦,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的领导下,边区直属的延安市和延安、安定(子长)、延川、延长、固临、甘泉、富县、志丹、安塞、靖边等县都建立和扩大了自卫军、游击队、保安大队。1942 年 12 月,延属军分区成立,各直属县军事组织归其领导。下辖延安市自卫军、延安县自卫军大队、安定(子长)县保安大队、延川县保安大队、延长县保安大队等。

10. 中共关中地委教导团

1945 年 5 月,国民党第三十八军部分中共党员和赵伯经率领的宝鸡地区一些党员进入中共关中地委所在地马栏镇,中共关中地委将其与省委干训队

合编,建立了关中地委教导团。赵伯经任团长,谈国帆任副团长,秋宏任政委。教导团有300余人,下设4个区队。教导团参加了解放淳化县和收复爷台山的战斗。

第六章 陕甘宁边区的重大运动

第一节 整风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为了彻底清算党内产生“左”、右倾机会主义和其他错误的思想根源,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开展了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从延安开始,并以这里的整风运动为典型代表,故称延安整风运动。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

一、边区整风运动的组织领导

1942年2月,以毛泽东作的《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报告为标志,进入了全党普遍整风的阶段。在以毛泽东为主任的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领导下,延安整风运动分五个区进行,即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系统、中央军委系统、中央党校和中央文委系统、陕甘宁边区系统。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之后,4月14日,成立了边区总学习委员会,由任弼时、高岗负责,领导边区系统的整风运动。边区总学委又按照政府、军队、党和民众团体,组织了三个学习委员会,领导各系统的整风运动。

党和民众团体学习委员会由陈正人负责,杨清任秘书,张邦英、李卓然、贾拓夫、杨清、高长久、高朗山、白茜参加,负责领导西北局各部局和总工会、边区青救会、边区妇联、边区党校、民族学院等机关学校的整风学习。政府系统学习委员会由林伯渠、谢觉哉负责,高自立任秘书,高自立、刘景范、南汉宸、周兴、周文等参加,负责领导边区政府所属各厅处局及学校的整风学习。八路军留守兵团和保安司令部系统学习委员会由萧劲光负责,莫文骅任秘

书,王震、王世泰、莫文骅、曹里怀、吕振球等参加,负责领导边区部队系统的整风学习。全边区一级、分区、县、区四级干部约 2000 余人,分别组成 200 多个学习小组。各机关、学校、部队、团体,由行政负责人兼任学习委员会组长,党支部与行政负责人配合,具体负责领导本单位的整风运动。

二、边区整风运动的内容、任务和方法步骤

整风的主要内容是根据“四三”决定等 22 个文件精神,联系边区历史实际,以整顿思想方法、思想作风为主,开展“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清除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和流毒。整风的基本要求是,提高认识,掌握思想武器,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学风。

4 月 21 日,边区总学习委员会召开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任弼时作动员报告,指出在三个月内,整风的头等重要工作是把中央规定的 22 个文件学好,并就边区整风的目的、计划作了说明。高岗、谢觉哉也讲了话,并对整风学习、讨论、总结、考核等作了具体安排。边区一级的整风步骤、方法与中央直属系统基本一致,时间自 4 月 21 日开始。

三、分区、县级的整风学习

1942 年 4 月中旬,西北局向各地党委发出关于准备整顿三风工作的信。指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号召的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顿三风,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是彻底转变工作作风和团结全党最重要的问题。”决定自 6 月 1 日到起 8 月 31 日止,为省委、分委、县委学习研究整风文件时间。5 月 30 日,西北局又发出《关于在各分区及各县学习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等 22 个文件的指示》,规定“各级党委宣传部必须把领导学习整风文件作为 1942 年下半年最中心的任务”。要求各地主要负责干部,以身作则,积极参加整风学习,并以领导学习文件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亲自检查、指导、帮助所属机关干部的学习。根据县区实际情况,规定分区和县级整风学习从 7 月 1 日开始,区级 7 月 20 日开始,时间为 6 个月。

针对县、区干部下乡多、流动性大,“无人学”和文化水平低“学不懂”,以及纸张缺乏、文件少等困难,各县一般采取每月以 15 天或 10 天集中学习,或给每个干部规定具体任务,走到哪里学到哪里。有的县学习委员会提出:没

有文件自己抄,没有时间自己“挤”,读不懂要“钻”,下乡要带文件自己学。有的县举办轮训班,采取上课办法解决文化低的问题。

四、文教界的整风学习

针对干部教育中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西北局根据毛泽东关于干部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的指示,于1942年1月29日在讨论行政学院的教育方针时,确定了三条原则:一、学习课目与政府工作沟通;二、学习课目与社会现实沟通;三、学习程序由具体到理论。2月10日,边区党校拟定教学方针为:“学用一致,言行一致,和社会现实沟通,教导一致”。确定党校办学的目标,在于培养党的县、区级干部具备相当的文化水平,能够了解具体情况,掌握政策。“教育实施的原则在于使理论和实践统一,教、学、用一致,实行由近及远,由浅而深,由具体到抽象,由文化而理论的原则。”

边区教育厅和边区中等学校,以整风文件为武器,联系校史检查办学指导思想,既批判严重脱离边区实际,甚至照抄国民党的所谓正规办学内容和方针的错误,又批判空洞搬弄马列主义名词的教条主义倾向,使教育与实际紧密结合起来。

文艺工作者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针,批判了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的倾向。以柯仲平、柳青为代表的许多作家,深入农村、部队体验生活。他们或者把笔头和锄头、铁锤、枪杆子结合起来,或者“流动演出”、“街头演出”、“田间演出”,或者到抗战前线,同战士们边行军边创作。柯仲平等领导的秦腔民众剧团,多次深入到陇东、关中等分区巡回演出,并创作了《查路条》、《十二把镰刀》、《穷人恨》、《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优秀剧目。

历时半年,经过学风、党风、文风三个阶段的学习,广大党员干部领会了文件精神,联系实际、反省思想、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了觉悟,基本达到改造思想、转变作风、改进工作的目的。1942年冬到1943年春整风学习基本结束。

五、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

为了进一步提高边区高级干部的认识水平,解决边区党历史上的争论问题,在整风运动取得成绩的基础上,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

在延安召开了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有四项:整顿三风(即整党、整政、整军、整关系、整民、整财、整学)问题;统一党政民的领导问题;精兵简政问题;财政经济问题。会议以整风形式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解决了边区党的历史争论问题和若干重大工作方针问题。

西北局高干会后,整风运动有了更深入的发展。其主要特点是把整风与改造思想作风,解决党政军民财等实际问题相结合。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传达贯彻高干会精神,着重解决干部思想作风问题,扫除贯彻领导一元化原则的思想障碍,巩固加强党的领导。

第二阶段,根据整风精神,改造各部门工作。

(1)整党。重点是整顿基层党组织,加强对党员的教育,洗刷少数坏分子。支部工作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建立党政工作的正常关系。

(2)整民。纠正民众团体领导机关脱离下层广大群众的官僚主义,打破形式主义的组织工作方法,把民众团体工作中心转到组织群众发展生产和加强教育两大任务上去。

(3)整军。目的是使部队进一步正规化、党军化。主要任务是克服军阀主义倾向,加强军政、军民团结。整编部队,充实主力,加强训练,提高战斗力。

(4)整政。进一步执行“三三制”政策和贯彻精兵简政政策。克服党内关门主义残余,与党外人士真诚合作,使其有职有权,充分发挥其主动性、积极性。贯彻精兵简政政策,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

(5)整财。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实行公私兼顾的原则。发展生产,首先是发展农业生产,以改善人民生活。

同时还进行“整关”,即整顿和协调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其中主要是党同军政民之间和军队同政府及人民之间的关系。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为把边区建设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

第二节 “抢救失足者”运动

在延安普遍整风阶段,中共中央鉴于日本帝国主义侦探奸细和国民党特务活动加剧的情况,决定从1942年12月进行干部审查工作,即清除内奸,开展反特务斗争。12月6日,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关于反奸细的报告,夸大敌情,提出了开展反奸细的斗争。从此,便在少数单位内进

行了审干和反特斗争。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在整风中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普遍的组织审查,指出:“整风的主要目标,是纠正干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同时还指出:“纠正错误思想与肃清内奸分子,是在整风过程中互相联系着,但在性质上又互相区别、绝对不能混同的两件事。”但是,康生却在审干和反特斗争中发动了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偏离了审干运动的正确轨道。

早在1942年11月,康生向中央报告,说社会部破获了一起重要的敌特案件,即所谓“张克勤案件”。张克勤当时19岁,1937年底在甘肃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然后经中共地下党甘肃省工作委员会和林伯渠同意,调到延安西北公学学习。11月,康生在西北公学搞审干试点,将张逮捕审讯。在严刑逼供下,他胡编乱造,诬陷了不少好人,胡说甘肃地下党是“红皮白党”的“红旗党”,他本人就是一个特务。康生即据此得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都不可靠,要“重新估计”的错误结论。随后又大规模地追查从甘肃、河南、湖北等地来延安的干部。康生还让张克勤以一个“悔过自新的特务”的身份到处做报告,“现身说法”,在各机关和部门采用了劝说运动、控诉运动、个别谈话、大会揭发等各种形式进行反特斗争。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短短三个月内便有400多人坦白自首。针对审干中出现的“左”的倾向,1943年7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康生,明确提出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但是,7月15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继续夸大敌情,认为“特务如麻”。一时间,“抢救运动”一哄而起。许多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员都成了被追查和逼供的对象,“特务”、“内奸”越整越多。陕西、河南、四川、甘肃、内蒙、浙江、湖北、贵州等十几个省的地下党组织都被诬为“红旗党”。不久,康生又批转了《绥德全县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群众大会经过》一文作为“经验”推广。这个“经验”说:在党的宽大政策的感召下,绥德师范学校“失足青年”纷纷悔过自首。群众大会开了10天,参加者2600人左右,自动坦白的280多人,被揭发的190人。有的学校半

数学生是“特务”。康生发动的“抢救运动”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导致了反特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

“抢救运动”的严重后果,很快引起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注意。为了纠正错误,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指出“逼供信”的作法是完全错误的,重申了毛泽东提出的“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九条方针,提出要“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禁止主观主义的逼供信方法”。10月19日,毛泽东又在批转绥德反奸大会的材料上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这时,历时数月的“抢救运动”才开始有所遏止。

同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审干和“抢救运动”中受到冤屈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为此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反复强调审干的九条方针,规定逮捕人犯必须经上级批准,要求经常检查有无逼供信行为。绝大部分被冤屈的同志都得到平反昭雪,只有少数人的问题一时难以查清,只好暂时挂起来。

1944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对于坦白人员进行甄别平反的指示。这样就在实际工作中逐步纠正了错误,保证了审干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使整风运动又回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正确轨道上来。

第三节 大生产运动

1941年以后,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对于增强物质力量,支持长期抗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黄土高原,经济落后,地瘠民贫。边区所需布匹、药品、文具纸张、通信器材等基本靠输入。要将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担负着全国抗日指挥中心的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客观需要与财力薄弱的矛盾。抗战初期,全国各地及海外华侨青年学生纷纷奔赴延安,边区脱产人员增加。而这时,边区财政来源主要靠外援。1937年外援岁入占77.2%,1938年占51.6%。1937年至1939年边区经济是休养民力时期,所以,从1938年起,只是在部队因经费不足而开始了生产活动,一些部队试行种菜、养猪、打柴、做鞋等生产。7月,八路军留守兵团兵团军政首长会议上,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提出“生产、学习”的口号,部署部队

生产,决定各兵团要开展群众性的生产活动;12月,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第一次党代会上又提出“以战斗的姿势加紧生产,变部队为集体的生产场所”。这种生产活动虽只是为了改善战士们生活而只限于军队中,却为后来机关学校的生产提供了可行的经验。

1939年至1940年。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其政策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加紧反共摩擦。形势的逆转使外援已不可靠。加之边区的机关学校增多,脱产人员不断增加,外来经费已感不足分配,财政供给问题日益严重。形势要求全体动员从事经济自给运动。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指出生产和学习是全党和根据地的中心工作,要广泛开展生产运动。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进一步提出:“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号召“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运动,用自己动手的办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边区政府、中直机关及八路军留守兵团成立总生产委员会,指导生产运动。根据中央财政部通知,3月中旬至4月上旬,各机关学校部队开展了生产突击运动,共开荒5.4万亩,掀起了生产热潮。此间边区政府颁布《生产运动奖励条例》,以促进生产运动的开展。到8月底,全边区共开荒105万余亩,超过原计划75%。其中机关部队学校共开荒11.3万亩,收获粮食2万多石,蔬菜约120万斤,解决了2万人所需粮食的1/4,蔬菜肉食部分自给,马草自给一半。1940年2月3日,中共中央财政部通报《1939年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总结》,要求华北、中原、江南各级党部及政治部参考,切实发展生产运动。这一时期的生产运动,促进了大家对生产运动的认识,改善了生活,边区留守兵团解决了一个半月的粮食及部分装备。但运动还局限在机关部队学校,而没在广大农民中推广。外援仍占边区财政收入很大比例:1939年占85.7%;1940年前9个月占70.5%。

1941年到1942年。这是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最困难时期。由于国民党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侵占陕甘宁边区5座县城6个区43个乡,边区范围缩小;又在边区周围部署20多万军队,构筑五道封锁线实行经济和军事封锁;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边区同外界一切联系被切断,外援完全断绝;加之脱产人员从1940年的6.1万人猛增到7.3万人,脱产人员与边区人口比较所

占比例太大,边区每百人至少养活四个脱产人员,边区财政经济遇到极大困难。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自给运动,建立自己的公营经济,解决军需民用问题,成为克服困难实现经济自给伟大的政治任务。1940年12月3日,中共边区中央局在延安召开1941年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到会阐述生产自给的迫切性;林伯渠宣布经中共中央批准的边区1941年自给自足计划和任务。规定边区经济建设的方针是由半自给的地位发展到自给自足的地位,摆脱对外的依赖性,以适应抗战和民主建设的需要,打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随后,边区政府发出训令:各级党政军民教等,1941年除粮食和三个月生活费由政府供给外,其余一切经费实行自给。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陕甘宁边区部队生产工作的指示》;边区中央局发出《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及《对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强调把经济建设作为当前最迫切的工作之一,以实现自给自足的目标。党中央在工作人员生产运动的同时,更加强调边区群众的大生产运动。从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到每一个干部、战士都参加了生产运动。春季,王震率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官兵无一例外参加生产开荒种地。1942年粮食自给一部分,蔬菜、肉、油及鞋袜全部自给;1943年开荒10万亩,粮食全部自给;1944年经费、物资全部自给,粮食做到耕二余一,并开始向边区政府交纳食粮。昔日荒凉的南泥湾变成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的好“江南”。在1942年的西北局高干会上,王震与其他21人一起受到嘉奖。在南泥湾政策影响下,边区各部队基本实行了屯田政策,先后出现槐树庄、金盆湾、大风川、小凤川等垦区。对边区大生产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为解决自给自足问题,边区除农业生产外,还大力组织妇女纺织和运销食盐。1941年,边区的部队、机关、学校生产细粮10万石,做到部分自给或完全自给。农民增产细粮十几万石。并生产了毛巾、袜子、火柴、铁、肥皂等各种工业用品。1942年,边区财经还处在一个达到自给自足的过渡阶段,经济建设贯彻“以农业为主,发展私人经济”的总方针。边区一级党政机关生产共获利260万元,约弥补经费40—50%、蔬菜自给一半;边区一级群众团体获利60万元,弥补经费60%。边区耕地面积从1938年的899.4万亩增加到1248.6万亩,植棉从1937年几乎没有增加到9万多亩,植树约26万株。安置移民增加10795人。公营工厂发展到62个、职工3990人,产布2.2万匹,振华纸厂产纸3300令。为了统一财经力量,6月,中共中央决定统一晋西北和陕甘宁两个区域的财政经济工作,组织财经委员会,下设财经

办事处,贺龙负责。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陕甘宁边区工作方针的决定》,指出,根据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特点,边区应从发展经济与平衡出、人口方面着手,以解决人民生活与政府财政的问题。发展经济应以民营为主(第一是农业),公营为辅。平衡出、人口,只有增加盐的运输,以官督民运为主,自由运输为辅。党政军各方应统一意志与行动。9月,财经委员会召开整财会议,讨论边区的公营商业、工业、金融、贸易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形成财政经济工作大纲。在10月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上,毛泽东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著名报告,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工作总方针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等原则和一系列重大政策。在此期间,边区政府委员会确定边区的任务是“生产第一、教育第二”。这些方针原则的确定及两年来在大生产运动所积累的物质基础和丰富的生产经验,为来年轻边区生产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3年是边区生产运动大进步的一年。中共中央提出达到丰衣足食的号召。1月8日,李富春在边区各系统生产会议上作《丰衣足食,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的报告,指出生产是当年各机关的中心任务之一,都要制订丰衣足食生产计划。3月4日,召开生产总动员大会,会议提出边区各系统当年生产的总任务是达到丰衣足食;要建立革命家务,开展劳动竞赛。这次大会标志着边区大生产运动进入为实现丰衣足食而奋斗的新阶段。广大人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一切男女劳动力组成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展开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党政军负责人带头,林伯渠、李鼎铭首先制定了个人的生产节约计划;毛泽东亲自开荒种菜;周恩来、任弼时带头纺线并被评为纺线能手。生产中广泛展开了劳动竞赛和劳动互助运动,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辈出不穷。这年生产更突出计划性、群众性、自觉性与组织性,开始掌握生产规律,改进生产技术,实行集体生产与个人生产的结合。边区军民的大生产带来了丰裕的物质,耕地面积扩大为1338万亩,粮食总产量184万石;全边区劳力33万,参加集体劳动者占1/4;改造二流子4500个人;安置移民8000户。部队开荒21万亩,约占群众的1/3。植棉面积为三年前的10倍,产棉花173万斤;产盐60万驮;合作社255处;公营工厂百余家,各种用品基本自给;纺织妇女达13.76万人,1月至9月产布15840大匹,比1940年增长近5倍,棉布自给率达73%。党政军民学开支总数中64%由自己生产解决。为总结推广大生产运动的经验,检阅成果,年底,在延安举行了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代表

大会暨生产展览会,为日后农业、工业、合作事业、畜牧等各行业及部队机关学校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毛泽东在会上发出“组织起来”的号召。

1944年至1945年。边区军民在“组织起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耕三余一,争取工业品自给,准备反攻和备荒等口号动员下,将大生产运动向纵深发展。西北局相继作出《关于贯彻合作社联席会决议的决定》和《关于争取工业品全部自给的决定》。1944年,机关部队学校生产细粮10万石,全边区增产细粮20余万石,连同过去的结余,边区积存粮食70万石以上,实现了“耕三余一”的目标;植棉30万亩,收棉花300万斤,可织布150万匹。三年间,边区工业从无到有,由少到多,先后建立起纺织、被服、陶瓷、玻璃、肥皂、石油、化工、机器制造和兵工等大小工厂120多个,职工达1.2万人。日用工业品实现了自给或半自给。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商业也繁荣起来。边区部队基本实现了生产自给,创造了“当兵不脱产”的中外奇迹。大生产运动的成绩使民负减轻。1941年征公粮20万石,1942年即降为16万石,1945年降至12万石。农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手工业工人的实际工资比战前提高1—3倍,国营企业工人工资提高60—80%,机关学校部队供给标准也有很大提高。1944年底至1945年初,同时召开了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及边区建设展览会,有476位代表出席,总结交流了劳模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的经验。展览内容除工农业外,还增加了军事、政治、文化建设,反映了一年来边区在各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边区大生产运动能够从小到大取得巨大成绩,除中共中央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加强组织领导外,还在于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吸收移难民。给移民难民各种优厚待遇,移难民开公荒有长期使用权,三年不交公粮;垦私荒三年不交租,以吸引移难民,增加边区劳动力。(2)开展劳动竞赛、劳动英雄运动。民众之间、军民之间展开生产大竞赛,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率;树立各行业的劳动英雄典型;工业上开展赵占魁运动,农业开展吴满有运动,成千上万劳动英雄层出不穷,在生产中发挥了带头、骨干、桥梁作用,成为团结人民组织人民的核心。(3)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以调整地主与农民关系,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4)军队屯田。以部队强壮众多的劳动力投入到生产运动中去,以减轻民负,密切军民关系,改善生活,建设边区。(5)实行以个体经济为基础并以自愿为原则的劳动合作政策。劳动互助形式有变工、扎工、互助组等;合作社的业务有生产、消费、运输、信用、

手工业等各行业合作社。(6)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为发展农业生产,调剂农村金融,资助农民发展生产,1941年发放建设公债500万元;1943年发行农贷2080万元,并发放1000万元资助群众运盐。(7)改造二流子。(8)研究推广增产技术,提高农作产量。创办光华农场,进行农业科学研究,推广农业先进技术,指导科学种田。(9)统一税法,建立税法管理制度,以促进生产发展。(10)发展以盐业为基础的对外贸易。

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推动影响了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他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利用战争空隙从事生产劳动,达到了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要求。

第四节 “双拥”运动

“双拥”运动,即政府与人民群众拥护军队,军队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首先开展了这项运动,后在各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

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不久,即采取措施,发动民众代替抗日军属种地,改善抗属生活,创办抗属学校,开展经常性的优待抗属工作。同时开展为八路军捐鞋袜,送军粮,慰劳前方抗日战士等活动。在边区施政纲领中也写入“增进部队与人民的亲密团结”,“加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工作”等条文,并颁布了优待抗日军属,为抗属代耕等条例。这些具体措施和政策规定,促进了军民团结。

20世纪40年代初期,陕甘宁边区由于处于较为和平的环境,在部分政府工作人员中滋生了忽视拥军的观念,甚至把爱护人民利益与爱护军队对立起来,工作中只考虑本身的困难,忽视照顾军队中的困难;军政、军民间有了矛盾,不是首先检查自身,而是推卸责任,抱怨军队。同时,军队中的一些人产生忽视拥政爱民观念,时有把军队和政府、人民对立起来的现象,一些人员存在军阀主义的残余思想,违犯政府法令,不尊重政府,侵犯群众利益及违犯群众纪律,抱怨政府和老百姓对军队帮助、照顾不周。为此,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在延安整风运动和同年秋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都将党政军民的关系作为重要议题,各方面深刻反省检查了自身存在的问题。高干会还决定,分别由八路军留守兵团掀起拥政爱民运动,由边区政府和各民众团体发起拥军运动。

1943年新年伊始,边区政府公布《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指出八路军是值得政府和人民拥护的军队;拥护军队是各级政府与全体人民应有的责任与义务。各级政府应将拥军工作作为经常性的重要工作。决定1月25日至2月25日为边区拥军运动月。并颁布了拥军公约,内容是:拥护军队,保卫边区,帮助生产,参加战争。军人过往,招待殷勤,转运伤病,爱护关心。防奸严密,消息灵通,优待抗属,建立家务。退伍残废,立业成家,潜逃战士,归队不差。过年过节,慰劳有加,军民团结,战胜日寇。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还为《解放日报》写了题为《造成拥军热潮,增强拥军工作》的代论。与此同时,八路军留守兵团也作出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发出了关于开展拥政爱民运动月的决定,公布了拥政爱民公约,内容是:(1)服从政府法令;(2)保护政府,帮助政府,尊重政府;(3)爱惜公共财物;(4)不侵犯群众利益;(5)借物要送还,损坏了要赔偿;(6)积极参加生产,减轻政府和人民的负担;(7)帮助人民春耕秋收和冬藏;(8)帮助人民进行清洁卫生运动;(9)了解民情风俗,尊重民情风俗;(10)向人民宣传,倾听人民意见。贺龙也为《解放日报》写了题为《开展拥政爱民运动》的代论,要求边区部队无条件地保护、拥护和帮助边区的政府和人民,坚决服从和执行政府的一切法令和决定,发展生产,减轻人民的负担。边区政府与八路军留守兵团还联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调整军政军民关系,维护革命秩序暂行办法》等文件。1943年春节前后,轰轰烈烈的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运动在边区以各种形式开展起来,并成为经常性的工作。

军队中,普遍进行了拥政爱民教育,加强了部队纪律,并努力生产以减轻人民负担,自己运粮草以节省民力,帮助人民生产、砍柴挑水、治病办学、救济难民、训练民兵,并普遍举行军民联欢、清理旧案、赔偿还物运动。1943年,全边区部队开支的82%靠自己的生产得到了解决,驻扎在南泥湾的三五九旅达到粮食全部自给。在民众、政府中,经过广泛拥军教育,大大提高了拥军热忱,对驻军、伤病员、伤残军人及抗日军属实行普遍的物质和精神慰问,加强战勤及优待抗属工作,帮助军队搞好生产生活。军队和党政民本着“厚责于己而薄责于人”的精神,主动征询对方意见,对各自的缺点进行自我批评,并努力改正。边区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优待抗属、荣誉军人的法令、条例。

1943年春节,边区政府拨出6.2万多元,林伯渠等亲率慰问团慰劳延安附近的驻军和抗属。各地驻军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无不欢欣鼓舞,他们在驻

地修筑道路,平整场地,搭扎彩门,张灯结彩,热烈欢迎慰问团。慰问团带着慰问品,带着延安及边区人民对自己军队的无限热忱、关心与爱护,来到南泥湾、金盆湾,对连队、部队工厂、家属合作社进行慰问,所到之处,一片欢腾。在南泥湾举行了阅兵式,驻军举行了拥政爱民大会。在这里,林伯渠看到了八路军将昔日的烂泥湾改变为陕北的好江南的繁荣景象,深深为军民水乳交融的浓烈氛围所感染,他发自肺腑盛赞道:“农可属于兵,犹兵寓于农。执枪杀贼寇,释枪事田垄。兵农一身任,是为真英雄。伊谁先示范,三五九旅功。”

通过一系列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工作,边区的党政军关系进一步融洽,各自明确了在统一目标和统一任务之下所应负的责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军政民互助互让,亲密无间。

中共中央对陕甘宁边区的经验极为重视,于1943年10月发出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在1944年农历正月普遍地举行大规模的拥政爱民与拥军的群众运动,彻底检查军队与党政民方面的缺点与错误,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彻底改正之。1944年元旦,朱德在干部晚会上作了《开展拥政爱民运动》的讲话,西北局作出《关于拥政爱民及拥军工作的决定》,推动了边区及其他各抗日根据地的“双拥”运动更广泛更深入更健康的发展。此后每年春节期间,各抗日根据地都广泛开展“双拥运动月”活动,并使“双拥”活动制度化。

第七章 武装斗争

第一节 国统区抗日武装的发展

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侵略军节节逼近陕西,临近晋、豫、鄂战区的陕东南地区的战争威胁随时可能变为现实。1939年2月,中共陕西省委在《目前陕西党的组织工作的几个问题》中指出,要“加强各级领导机关,准备进入战争环境”,“各地党都在积极准备武装力量,准备将来进入战区”。在中共陕西省委和各地组织领导下,渭南、商洛、安康等各地近战区采取各种形式,积极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准备随时打击来犯的侵略者,渭南地区甚至组织多支武装力量,东渡黄河,入晋与日军战斗,为保卫陕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

有的贡献。

一、渭南地区抗日武装活跃在黄河两岸

1938年2月,日军侵入晋南,地处黄河西岸的韩城、合阳、平民(1950年撤销,其辖区归入朝邑县)、朝邑(1958年撤销县制)、潼关成为陕东的抗日前线。陕东的各级党组织广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以各种方式积极进行抗日武装斗争。他们首先通过各种合法形式,诸如流动图书会、正规学校教育等,训练进步教师和学生,传授政治、军事课,进行军事训练,培训党员,形成抗日救亡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1938年春,国民党军一七七师内的中共地下组织通过统战关系,举办了沿河各县中学生军事训练班,200多名中学生参加了学习。结业时,设立了沿河学生军训队同学联络处,促进抗日救亡运动。此外,陕东各地党组织采取不同形式,宣传动员民众支持抗战,组织武装。当地党组织指派共产党员联络各阶层爱国志士,先后开办了十多个书报社或书店,发行进步书刊,大部分书店和书报社经营书报数十种,有的日销量近千份,其中合阳、朝邑、韩城书店和书报社多次将书报送往山西抗日前线。

在鼓动民众武装抗日激情的同时,地方中共组织积极组织民众抗日武装力量,积极准备开展游击战争。华县赤水三张村党组织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织进步青年收集长短枪十余枝,以村保警队名义,率先成立民众抗日武装。渭南县党组织协助县政府筹建的常备抗日义勇军壮丁队,共产党员宋蔚青任队长,迅速发展到了150余人、枪100多枝,由县城移驻沈河川望岗岭,挖战壕,修工事,准备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在中共沿河党组织大力倡导,一七七师配合下,成立了合阳县抗日民众自卫队总指挥部,苏资琛县长兼任指挥,共产党员、一七七师参谋梁步六任副指挥,全县23个联保分别建立自卫队中队,总计约2万名队员。一批共产党员到各中队担任指导员,二尹联、共和联、如意联等五六个自卫中队,在共产党员带动下,先后随一七七师东渡黄河,在山西荣河、稷山等地奋勇杀敌,三名队员阵亡。在中共富平县工委大力支持下,由共产党员师源、刘茂坤发起,组织60余名爱国青年,成立富平县抗日义勇军,随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胡景铎营开赴抗日前线,与日军激战多次,12名战士为国捐躯。中共蒲城中心县委以共产党员为核心,联络农村进步青年,组织特务队,进行操练,准备战时打游击。华县党组织积极协助县政府,组织起有450余人参加的自卫军游击队,配发枪支150多枝,并在各乡建立警

备队。中共韩城县委在民先队基础上组织义勇队,共产党员自己拿钱购买枪支弹药,并建立造枪所,制造枪数十枝,随时准备打击来犯之敌。朝邑、澄城县党组织以共产党员、民先队员为核心,购买、收集枪支,组织武装,依托黄龙山,准备抗日游击战争。此外,党组织还大力支持坚持抗战的县长的的工作,配合他们组织抗日武装。

1937年冬至1938年初,爱国志士崔孟博、吕向晨、苏资琛、张法杰、续俭等到陕西几个县担任县长,在中共渭华工委和爱国人士鼎力相助下,崔孟博主持成立了渭南抗敌动员委员会,委任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县政府、动员委员会、民众教育馆、教育局及地方武装的要职,建立渭南抗日义勇军壮丁队。中共华县党组织与县长吕向晨精诚合作,动员群众建立抗日武装,配发枪支,清除匪患,与渭南、华阴、临潼建立军事联防,积极准备开发抗日游击战争。合阳县长苏资琛同中共沿河特委合作,以县政府名义举办各种训练班,培训出一大批抗日骨干,组织战时工作团、抗日宣传队、救国会、慰问队、募捐队、老人指导队、儿童队、妇女训练队等数十个抗日救亡团体,先后捕获汉奸、敌探数人。中共朝邑县委与县长张法杰、陕西警备第二旅建立统战关系,支持朝邑学生战时工作团,到各乡进行宣传,成立教育会,与社训队、各联保及地方武装建成抗日统一战线,迫使国民党县党部中的顽固分子多次让步。平民县县长续俭根据毛泽东“打日本,救中国”的指示,组织42名身强力壮、水性娴熟的青年,编为平民县渡河杀敌游击队,东渡黄河到山西永济县打游击,坚持47天,参加大小战斗数10次,17人负伤,12人壮烈牺牲。朝邑、合阳、平民等地群众多次向东岸抗日官兵送饭送菜,主动承担侦察、联络、通信等任务。有的驾起渔船,将抗日官兵连夜运送到敌后侦察。

二、安康发展抗日武装工作

抗日战争初期,安康地区已是面临鄂西北战区的近前方,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精神,安康地区党组织积极发展武装力量,准备一旦安康变为战区,在秦巴山区开展抗日游击活动,打击日本侵略者。1938年秋,中共陕西省东南工作委员会书记王力得知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离开安康后,部分掉队战士和伤病员由沈继刚等人组织起来,仍在秦岭山区坚持游击活动,即派党员马应举与其联络,因沈部流动太快,没有成功。此时,王力在安康县恒口发展在乡军人李洪保等入党,随后建立了恒口军人支部,支部书记鲁宗圣在岚皋、平

利等县保安队中开展联络工作。宁陕县四亩地,曾是红二十五军、红七十四师和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开展游击活动的地方,有部分伤病员和掉队人员,四亩地党支部联络了这部分红军战士,收集了少量枪支。四亩地区长、保安队长手中有 150 多人枪。党支部书记彭易乾利用亲属关系,计划将这支武装力量改造成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经反复做工作,未达目的。1939 年 8 月,省委派军事干部张子俊到岚皋县,经地委委员李开藩介绍打入佐龙联保处,争取联保的 20 多人枪,因引起敌人怀疑而未成功。旬阳县城附近有一批参加过国民党地方游杂部队的在乡军人,生活困难,不能安居,对国民党政府强烈不满。中共旬阳县工委同他们联系,准备在必要时建立抗日武装。为了掌握这批武装力量,1939 年 7 月,王力到旬阳检查工作后,特意带领工委委员李兆众到省委训练班学习,又送他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军事。1940 年 2 月,县工委增设军事委员,领导武装工作。1940 年 2 月,在地委第二次会议上,专门作出“必要时在巴山深处建立武装根据地”的决议。上述这些计划和决议,大多未能实现,有的还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残暴镇压,但安康地区党组织为建立抗日武装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与准备。

三、商洛的抗日武装斗争

1937 年 11 月,中共陕西省委派任地方科科长王柏栋回乡,任中共商洛地区工作委员会书记,领导商洛地区抗日救亡工作。王柏栋回到商洛后,以商县商洛镇、两岭村(今均属丹凤县)和龙驹寨(今丹凤县城)为工作基地开展工作。广泛团结进步青年,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抗日救亡组织。组织民先队员等进步青年群众,深入山村,宣传演出,燃起抗日烈火。王柏栋还在工作中注重积极联合友军,团结各界人士,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建并掌握抗日武装。丹凤民先队为反击日寇进攻,两次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训练和演习。

1938 年 2 月,王柏栋派民先队员王柏梁和抗日积极分子谢华、余谦等,去商南县大岭观联系由共产党员魏志毅掌握的国民党抗日游击支队和湖北省郧阳陶成林、河南省荆紫关雷会民等地方武装,筹建抗日游击纵队。后因湖北省第八行政督察区专员关麟书的破坏而未能成功。与此同时,他还先后通过信函、派人联络、亲自登门等办法,做商县商洛镇联保主任石振邦,寺坪(今属丹凤县)联常备队长杨培万,老君(今属丹凤县)联保主任、常备队长张仰

之,夜村地方武装头目刘松林等的工作,并结识了龙驹寨、商洛镇开明人士王佑卿、王建三、陈知礼及进步知识分子刘筱斋、宋昌艺,联合各方力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商县(今商州市)杨家斜联队附吴子俊阻碍抗日,谢华、余谦组织武装,一举将其击毙。

但是,顽固派对抗日救亡工作竭力破坏。1938年3月,商县第六、七区保安中队长冯麟生,诬指商洛镇联武装是“土匪”,唆使驻军收缴了该联110多枝枪,破坏民众抗日武装。商洛工委组织了1000多人参加的“商洛镇联民众请愿团”,打着横幅标语,到龙驹寨示威请愿。王柏栋等为代表据理揭露了冯麟生的阴谋,说服驻军如数归还了枪支。随后,王柏栋为了争取合法身份,掌握抗日武装,即担任了商洛镇联队附,并将共产党员彭一民、张银治等安排到该联常备队担任班长。1938年7月25日,王柏栋不幸遭地方顽固势力暗杀。

王柏栋被暗杀后,中共陕西省委即派在省委学习结束的彭一民回商洛任中共商洛工委书记,继续开展统战与抗日武装工作。1938年10月,国民党商洛当局顽固派又逮捕了来商洛视察工作的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赵希愚(即陈希,后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派员救出)。原在茶房联担任保甲队长的雷振杰在延安学习期间加入共产党,返回后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常备队队长谢孝廉将其排挤出队,并多次密谋杀害。常备队副队长巩德芳、原护兵班班长薛兴军加入共产党后,亦被谢孝廉发现,谢提出要“清理内部”。中共商洛工委决定除掉这个反共顽固分子,掌握这支武装。工委成员雷振杰被迫离开常备队时,与巩德芳、薛兴军一起研究了计划,交巩、薛实施。1939年7月4日,在共产党员的领导下,由茶房常备队爱国青年张德盛、周保娃、巩全林击毙了谢孝廉。这一震撼商洛山区的武装行动,主要领导人是巩德芳,薛兴军参与了领导工作,蔡生成和陈效真等起了重要作用。击毙谢孝廉后,巩德芳将茶房常备队的爱国青年拉上山,组建起一支由中共商洛工委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一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共产党组织及进步爱国人士受到严重威胁。

为了坚持抗日,打击阻碍抗日的顽固势力,1940年3月新成立的中共商县县委决定由王连成亲自安排,彭一民积极协助,以巩德芳、薛兴军领导的武装力量为主,用武装击毙商县第六、七区保安中队长冯麟生。1940年6月23日,王连成和巩德芳、薛兴军率200余人,在商县茶房四方岭击毙了去商县参

加“剿共”会议后返回龙驹寨的冯麟生,毙俘分队长以下 30 余名,缴枪 60 枝。又一次打击了地方反共顽固派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军民抗日热情。后因该地反动顽固势力围剿、搜捕共产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中共商县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隐蔽疏散人员,实行异地领导。

1941 年 6 月,中共商县县委决定由分管军事的委员陈忠茂等返回商县建立抗日游击队。一个月后,抗日游击队成立,陈忠茂任队长,活动在商县、洛南、卢氏、山阳边境广大地区。此后,巩德芳、薛兴军等活动在丹江以北的商县涌峪、楸树坪(今均属丹凤县)一带,遭国民党正规军及地方武装 800 余人的“围剿”。巩、薛率队迂回到商县留仙坪米家寨(今属丹凤县)利用有利地形,击毙了“剿共”总指挥刘兆玉及其以下 30 余人。

1944 年 8 月,日军企图渡黄河西犯,陕西危机。中共关中地委派干部到商洛等地了解情况,找寻关系。是月,国民党组织的河南战役失败,豫西失守,日本侵略军占领西峡,陕东南处于抗日前线。为了适应突发事变,增强人民抗日力量,商洛的党组织进一步加强了人民抗日武装的发展工作。截至 1944 年 11 月,商县、山阳共产党员掌握的武装人数 300 多、枪 200 多枝;商县、镇安、柞水受共产党员影响的武装近 3000 人、枪 2000 多枝;12 月,关中地委又派在耀县柳林镇担任“德记店”分店经理的共产党员李世华等回商县麻街,建立交通站,接待过往同志,多交朋友,发展抗日武装。次年 7 月,麻街交通站正式成立,王治邦为负责人。以后又成立了以李世华为书记,王治邦、赵文杰为委员的中共商县麻街支部,支部派党员打入国民党地方政府内部,进行地下工作,安全护送中共中央委员郑位三等往来的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 200 多人次。

四、其他地区的抗日武装工作

1938 年初,在日寇进逼潼关,炮轰陕西河防,陕西即将成为国防前线和战区之时,中共陕西省委号召全陕军民奋起保卫陕西,号召青年武装起来参加战争和军队。除上述陕东南三个地区外,陕西国统区其他地方的党组织也积极行动,组建抗日武装,动员青年参军参战。西安民先队相继动员了 300 以上的队员到前线参战,组织了近百名队员投考国民党在武汉举办的战干团和空军学校,还在城南宋家花园举行了四五千人参战的军事演习。西安各救亡团体发动十七八个战时工作团到临近战区的沿河各县,进行战时动员和组织工

作,联合组织了前线慰劳队到黄河沿线的国民党驻军中慰劳并做宣传鼓动工作。户县青救会改造、争取了土匪武装“白带子会”,成立了一支武装游击队。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和抗协也组织了陕西学生战地服务团,到山西战区进行战地服务。

第二节 恒口起义

40年代初,为反对国民党安康当局的反动统治,经过长期酝酿筹划,中共安康县委于1941年7月制定了《恒口暴动计划》,并赴省委请示汇报。在此期间,受中共安康县委和西区委双重领导的中共恒口在乡军人支部的江中连,率十余名青年于10月29日晚提前举行起义,顺利夺取恒口镇公所警备班全部枪支,长枪22支、手枪1支及一批弹药。之后,起义人员按预定计划,迅速转移安康北山一带活动,准备寻找八路军。

10月30日,国民党安康当局派出大批武装进抵恒口镇,命陕保十一团两个连向北山一带“围剿”起义人员,在国民党当局重兵“围剿”和残酷镇压下,游击队员有的被俘后遭枪杀,有的叛变,江中连突围后潜入西安。起义失败。

第三节 杨逢合起义

1945年3月6日,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驻淳化国民党陕西保安第三团的杨逢合因不满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率领二十余人宣布起义,奔赴陕甘宁边区。驻淳化的国民党第二守备区第五分区指挥官梁干乔得知消息后,施行报复,在通润镇、方里镇及周围村庄残杀群众及士兵118人、关押200余人。

第四节 淳化起义

1945年5月,由于国民党第二守备区第五分区指挥部指挥官梁干乔在淳化通润镇、方里镇及周围地区滥杀无辜,引起当地群众和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5月19日,国民党省政府以“破坏行政,纵属扰民”为由,撤了梁干乔的职,委派李静谋任总指挥。李静谋到职后,迫不及待地往各团、队安插亲信,

排除异己,把打击的目标集中在梁干乔的旧属刘文华(保二团团长)、杨恒安、曾广学(营连干部)等人身上,李静谋对梁的旧属破口大骂,动辄训斥。李静谋的言行引起了梁的旧部大多数官兵的恐惧和不满。于是,刘文华即决定,于6月26日晚,由保二团杨恒安、马文辉带连队主攻驻淳化县城的指挥部;由曾广学带机枪连守卫淳化县北城门,负责掩护主攻部队;独立大队攻打淳化县县府。并规定士兵翻戴帽子,联络暗号为“曾、杨、蒋”(即曾广学、杨恒安、蒋允明)。刘文华坐镇通润镇家中等候消息,以作好应付情况突变的准备。

6月26日午夜,杨恒安等指挥保二团、独立大队、机枪连的官兵发起了对西城下国民党守备区指挥部的强攻。李静谋的卫队70多人仓皇应战。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约在黎明时分,除李静谋逃跑外,指挥部卫队被全部消灭。曾广学等率人冲进县府,赶走了县长,打开了监狱,释放了被押的群众。

李静谋指挥部被消灭后,刘文华等立即率部队撤到通润镇北城驻守,淳化县城空虚。这一事件在西安、重庆国民党军政界中引起很大震动,当时胡宗南主抚,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主剿。电话电报纷传,各路要员在西安、三原、淳化等地穿梭奔走。国民党在通往淳化县以东的口镇增加了军队,形势对刘文华等人非常不利。面对这种情况,刘文华决定率部队起义,投奔共产党,把部队带进边区。他们先派人和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取得联系,征得同意后,于7月10日晚,刘文华让其妻子刘仕英把家里的电话机拆走带上,连夜进了边区。11日早,刘文华以打野外为名,将起义部队拉出通润镇,携带了大量物资和枪支弹药,向陕甘宁边区进发。起义部队冲过封锁线,分几路进入关中分区所在地马栏。关中分区三团三营营长武自升亲自迎接起义部队。随后,关中分区召开了欢迎大会,八一剧团还为起义部队演了《苏武牧羊》,以示慰问。

不久,刘文华到延安,受到了朱德、彭德怀、叶剑英的接见。同年10月,任命刘文华为第十八集团军总部高级参议,将起义部队编入八路军。从此,陕保二团起义官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了贡献。

第五节 方里民意运动

1945年6月淳化事件之后,驻淳化方里镇的国民党陕西保安三团团长曾

海藩决意消灭对其构成威胁的方里镇镇保武装,并下令捉拿前镇长张锡畴。张知悉后,速与镇长宋增录商议,以催粮为名,将镇保武装拉到南山汉寨村。同时派人与保安三团四连二排的中共党员余增贤取得联系,并用鸡毛信通知各村寨紧急集合所有武装人员,准备攻打曾海藩团。7月5日,余增贤率部发动起义,杀死该排孙排长,拉出120多人,与宋增录镇保武装联合。至7月14日,共捣毁东柳至长村十余里封锁线上碉堡40余座,缴获步枪千余枝及机枪、炮等重型武器,并与前来助战的当地群众合力包围了保三团团部。曾海藩率残部二三十人逃往耀县。起义部队进入陕甘宁边区。

方里民意运动及先前发生的淳化事件,成为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借口,并引发了后来的爷台山反击战。

第六节 爷台山反击战

从1945年7月15日起,蒋介石令胡宗南将河南前线、韩城、朝邑河防线及西安、华阴等地驻军11个师,开往边区南线附近之铜川、耀县、三原、泾阳、兴平、乾县、淳化、旬邑等地。7月21日拂晓,国民党军暂编五十九师和骑兵第二师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淳耀县的爷台山驻军发动进攻。其他各部也纷纷自西安、耀县、兴平等地向淳化方面开进。

23日,国民党军又以预备第三师加入进攻。驻守爷台山地区的八路军新编第四旅的六个连进行了坚决自卫。关中分区组织的1129人的56个游击小组和37人的3个爆破组,有效地配合了正规军作战。至27日晚,八路军在给予敌人重大杀伤后,开始主动撤出爷台山及其以西的官庄、于村、野狐嘴、十里原、符子沟等41个村子。

国民党军队在侵占爷台山地区后,即大肆烧杀奸淫,拉丁抓夫,赶筑工事碉堡;以六个师三个团的兵力集结在边区边境的官庄、梁庄、龙高、早胜、彬县、耀县、小丘、黄陵、洛川一线,企图再次扩大进犯。

为粉碎蒋介石国民党发动新的进攻和扩大内战的阴谋,八路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决心在国民党军立足未稳时予以及时反击。抽调正在生产的新编第四旅、教导第一旅、教导第二旅及准备开赴抗日前线的三五八旅增援关中,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八路军驻关中各部,关中前线各部队召集了动员会议,进行战斗演习,根据地形及国民党军配

备,选择爷台山为战役主要突击方向,以新编第四旅五个营为主攻部队,三五八旅为助攻部队,教导一旅、二旅为战役预备队。边区群众亦动员起来为部队做饭、抬担架、做向导,组织游击队,配合作战。8月7日,各部奉命出发,于8月8日展开总攻。为迅速解决战斗,三五八旅第八团投入战斗,配合新四旅十六团攻占爷台山。经顽强战斗,至10日战斗胜利结束,八路军收复爷台山等全部失地,并将进犯之国民党军全部驱逐出境。

第七节 支援敌后战场对日反攻

从1944年起,解放区战场转入对日军的局部反攻。8月,中共中央作出战略决策:在巩固和发展华北、华东等抗日根据地的同时,从边区派遣部分八路军主力和一批干部挺进华南,奔赴东北,打开南北通路,在南方建立重要的战略基地,配合全面反攻。

1944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将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欠一个团)和三八五旅七七〇团,以及中央组织部选派的一批干部共5000余人,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辖四个大队,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治委员,王恩茂任副政治委员。南下支队于11月9日离开延安,开始了中共历史上被称为第二次长征的南下远征。

南下支队东渡黄河,越过同蒲铁路,由太岳区再渡黄河,越过陇海铁路,于1945年1月27日在鄂豫抗日根据地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师于大悟山。在第五师的配合下,南下支队转战鄂南、湘北、湘南,在通城、崇阳、郴县、宜章地区开辟了南北130余公里、东西180余公里的湘鄂赣新解放区。南下支队经过陕、晋、豫、鄂、湘、赣、粤等七省,渡过了黄河、长江、湘江、赣江等江河,翻越了吕梁、大别、伏牛、衡山等大山,跨越了同蒲、陇海等重要交通线,行程7900公里,战胜种种艰难困苦,战斗百余次,给日寇以沉重打击。

1945年上半年,人民军队实现了战略转变,由游击军转变为正规兵团,由游击战转向运动战,并相继开展了春、夏季攻势。

1945年春,绥远八路军在司令员姚喆、政委高克林的领导下发动强大攻势,使绥南根据地与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这时,国民党顽固势力“自卫军”、“挺进第五纵队”和顽匪郭友三、苏美龙到绥西、绥中一带,勾结日寇,破

坏解放区。1945年3月,中共中央从陕甘宁边区抽调康健民、朱子修领导的骑兵旅,开赴绥远大青山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和开辟解放区的工作。绥远八路军得到骑兵旅的配合,集中兵力在后脑包全歼敌“挺进第五纵队”,连克武川、陶林等地,使绥西、绥中、绥东等根据地连成一片。

1945年5月,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八路军、新四军各战略区被分割的局面开始改变。为了收复失地,扩大解放区,配合战略反攻,中共中央又从陕甘宁边区抽调干部和军队南下及开赴东北。6月,中央从边区抽调警备一旅旅直一部及二、三团,独立一旅、教导一旅五团、独立团,抗大七分校一、三大队等部,先后开赴晋西北、华北,开辟新的解放区。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将留守部队三五九旅之七一七团、七一九团(缺一个营)和三五八旅教导营,共2000多人,组成南下第二支队,由刘转连任司令员,晏福生任政治委员;将边区警备一旅编为南下第三支队,由文年生任司令员,张启龙任政治委员。这两个支队的任务是:南下同王震率领的部队会合并开辟新解放区;护送中共中央派往中原工作的第五干部队和派往两广工作的第九工作队。为了加强领导,统一指挥,南下二、三支队成立了南下临时指挥部,指挥文年生、副指挥刘转连、政委张启龙、副政委晏福生。6月11日,南下二、三支队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进入太岳根据地。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投降。中共中央指示从二支队和第五、第九干部队抽调200多人,由张启龙、陶铸率领开赴东北。不久,南下二支队主力在刘转连、晏福生率领下也开赴东北。陕甘宁边区虽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进犯,爷台山反击战刚刚结束,但仍从大局出发,克服自身的困难,按中共中央的要求,抽出三五九旅留在边区的一个团及优秀干部奔赴东北。9月,驻延安的军委炮兵学校学员亦调往东北。陕甘宁边区军民为实现中共中央抢占东北的战略意图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八章 重大事件及会议

第一节 重大事件

1. 黄克功事件

1937年10月5日晚,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六大队队长、共产党员黄克功,

因与陕北公学学员刘茜恋爱遭拒绝,将其枪杀。

刘茜(16岁),原名董秋月,山西定襄人。同年8月来到延安,先入抗大十五队学习,后转陕北公学。黄克功(26岁),江西南康人,抗日军政大学的干部,长征到达陕北,先后任红军某团的团支部书记、宣传科长、政治委员。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董必武院长的主持下,严加办案,认为黄克功这种为着个人恋爱,以最残忍的手段杀害革命同志,严重破坏了红军的纪律,违犯革命政府法律。为维护边区革命纪纲,特决定判处黄克功死刑,并呈报党中央批准。黄克功得知被高等法院判处死刑后,于10月9日再次上书法庭,并致信毛泽东,要求念他十年艰苦奋斗,留一条性命。

毛泽东接到边区高等法院的判决意见及黄克功的信后,立即召集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细致审查了边区政府的报告,同意将黄克功处以极刑,并建议说:鉴于此案典型,为教育群众,望能在死者学校公开审判,并当黄克功之面宣布他给审判长雷经天的复信,然后将黄克功依法处决。毛泽东在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10月11日,边区高等法院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刘茜生前所在的陕公大操场召开了数千人参加的公审大会,抗大政治部胡耀邦、边区保安处黄佐超、边区高等法院检查官徐时奎为公诉人,由审判长雷经天,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选出的代表李培南、周一明、王惠之、沈新发四位陪审员以及书记员任扶中共同组成审判庭。按照公审程序,经过审讯被告,询问证人,群众代表发言和辩论,最后当庭宣判审理结果。此时,黄克功借法官询问他的经历机会,便指着他左背上的伤疤,还想脱下衣服来让人看看。审判长庄严宣布:“本庭判决凶犯黄克功,因恋爱问题而枪杀革命同志刘茜,经公审,处以死刑。”并宣读了毛泽东同志的信。验明正身,就地处决。

2. 张国焘叛逃事件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张国焘被任命为边区政府执行委员会(后改为政府委员会)副主席。在此期间,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林伯渠主席常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任八办党代表),边区政府的工作由张国焘代主席主持日常事务。

1938年4月3日,经边区政府主席团(后改为常务委员会)批准,派张国焘前往中部(即今黄陵县)祭黄帝陵。祭陵完毕后,张国焘不通知中共中央即自行到达西安。到西安后他没有与驻陕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在离开西安之前,才电话约林伯渠在火车上略谈几句,即自行去武汉。

当中共中央得知张国焘祭陵未归,而且在国民党西安行营蒋鼎文及胡宗南的保护下逃出陕甘宁边区时,为了挽救张国焘本人,立即电告当时驻武汉的周恩来、博古等,让规劝张国焘返回边区。后经周恩来等人做工作,才使张国焘勉强搬到办事处。张国焘还曾电告中共中央谓:“不辞而别,歉甚,愿在武汉做些工作。”但后来张国焘在晋谒蒋介石时,向蒋表示“在外糊涂多年”。之后,张在返回办事处途中,到江汉关码头时,乘周恩来与一同行朋友谈话之际,抽身疾驰而逃。开始在汉口继在武昌各大街小巷乱跑乱撞数小时,然后始在武昌寓住一个事先与别人约好的旅馆中。周恩来及办事处同志四出寻找,找到张国焘后,张表示“愿暂脱离政治生涯”。当周恩来等看到张国焘如此反常和悲观,便在谈话中向他指出了三点:(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最希望的);(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时期;(3)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当时张国焘回答认为第一条不可能,可以在第二条第三条中考虑。不料4月17日晚,张国焘竟在谈话后不及一小时便跑到太平洋饭店,乘一辆有三人保护的汽车而去。临行时,他在写给周恩来等人的信上说:“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寓别处,请不必派人找。”由此,张国焘便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据此,中共中央4月18日正式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并给共产国际写了报告。4月20日,周恩来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党员大会上宣布上述决定,并教育大家在艰苦复杂的斗争面前坚定无产阶级立场,永远忠于党,革命到底。22日公布此决定。1938年4月2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命令,认为:“在此全国抗战紧急关头,张国焘此种行为,实属有违革命利益和革命纪律,特由本府执行委员会决定开除其本政府执行委员及其一切职务。嗣后凡张国焘一切言论行动本政府概不负责。”

3. 日本飞机轰炸陕西

抗日战争时期,陕西是大后方的基地,也是日机狂轰滥炸的主要目标之一。从1937年11月7日日机首次轰炸潼关、13日轰炸西安起,一直到1945年1月4日最后轰炸安康的七年多时间内,日机对陕西轰炸总计560余次,投弹1.36万余枚,炸死1万余人,毁房4.3万余间。一次死伤在百人以上的市县有西安、宝鸡、汉中、安康等,其中西安多达六次。其中损失惨重的有:1938年11月23日,日机20架轰炸西安回民区,毁民房150余间,死伤民众200余人;1939年3月7日,日机14架轰炸西安市区,投弹百余枚,死伤平民600余人,毁房屋千余幢;1939年9月8日,日机两批轰炸延安,共投弹200枚,毁房屋150余间,死伤58人;1939年1月19日,日机轰炸宝鸡,投弹58枚,死伤147人;1939年9月3日,日机36架轰炸安康,投弹200余枚,安康城区大火三日不灭,死难者850余人,受伤者2300余人,毁房千余间。在反轰炸斗争中,陕西人民建组织、搞宣传、定管制、抓演习、行疏散、挖工事、设救济、捐钱物,使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曾受国民政府特令嘉奖。

4. 宣侠父遇难

抗战爆发后,宣侠父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在西安等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的活动,引起蒋介石和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等人的不安,派出特务对宣的行动不断跟踪监视,但屡屡不能得手。1938年7月31日下午,宣侠父在西安革命公园参加完体育活动后,骑车回家,不料在西京医院门口被国民党特务拦住去路,夺走自行车。宣侠父虽厉声怒斥,但特务们强行把他架上汽车,在车上用绳索将宣缢死,随后将尸体投入下马陵附近的一口枯井里,后又移埋于城郊野外。

5. 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

1944年夏,由外国记者和中国记者组成的参观团,到延安进行参观访问,时称“中外记者参观团”。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意大利法西斯宣布投降后,英、美等国为了最后战胜德、日侵略者,特别是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需要充分利用中国的军力和财力,不得不重视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于1944年3月向中国共产党提出要求,派遣英、美、加、澳等国记者,到延安及黄河以东各解放区了解八路军力量和敌后斗争情况,并考察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各种政策的实

施情况,其目的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配合反攻日本。

对英、美等国的要求,中国共产党表示极大的热忱。3月9日,周恩来致电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团说:“我受毛泽东、朱德两位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电你们表示热烈欢迎。”同时,并请董必武通知驻渝《新华日报》社记者龚澎及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交通科长龙飞虎,护送记者团赴延安。

外国记者团访问延安,国民党顽固派惟恐冲破他们的新闻封锁,揭穿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解放区的种种造谣诬蔑,因而设置重重障碍;加以刁难和拖延。但是,这一要求有英、美等国和各国外交使节的支持,国民党也不敢公开拒绝。为了控制记者团,却把外国记者团改名为中外记者团,主要由国民党“中央社”、《中央日报》、《扫荡报》等记者参加,并派CC特务重要骨干加强“领导”,规定由国民党人士担任团长、副团长、以控制中外记者的行动。

记者团的正、副总领队是谢宝樵(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邓友德(新闻检查局副局长)。

外国记者有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史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的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的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的夏南汉神甫,塔斯社的普科金。

中国记者有中央日报社的张文伯,中央社记者徐兆镛、杨家勇,扫荡报采访主任谢爽秋,大公报孔昭恺,时事新报记者赵炳焯,国民公报编辑周本渊,新民报主撰赵超构,商务日报总编金东平。还有国民党中宣部负责检查外国稿件的宣传处长魏景及其助手陶启湘,管业务工作的张湖生,搞党务工作的杨西昆等。

由于中外记者团是来延安的大型团体,有国内外各大报著名记者参加,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其接待工作,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副主席亲自主管这一项工作,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直接领导交际处的具体接待。周恩来专门召集会议,向参加接待工作单位介绍记者团的情况及采访目的,交待方针政策,指出接待工作中应注意事项。并从各机关抽调一批优秀干部和翻译人员协助做好这次接待工作。

1944年5月31日,记者团由山西平渡关西渡黄河进入陕北,宿营于凉水崖。6月1日,十八集团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从延安前往迎接,与记者团当日

同行至固临。6月3日,记者团到达延长,参观油田。6月4日,起程时个别中国记者进入边区单独乱窜,图谋不轨,受到王震的严厉批评,弄得中央日报CC分子张文伯狼狈不堪。6月6日,记者团抵南泥湾,参观了三五九旅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成果及缴获的日寇兵器,参观了干部休养所和伤兵医院。当外国记者看到边区医院因被封锁而缺医少药,甚至连“磺胺”为何物都不知道时,十分不平。有的提议当即以记者团名义电请国民政府运药品到边区,部分中外记者表示一定要把情况反映出去。6月9日,离开南泥湾,当日抵延安,下榻于边区交际处。

1944年6月9日下午5时,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举行招待宴会为记者团洗尘。6月10日,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礼堂为其举行欢迎晚会。6月11日,全体中国记者参观新华社、解放日报社和中央印刷厂,并进行新闻业务座谈。12日,毛泽东接见了中外记者参观团全体成员,并就国内外形势详尽地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以后,记者团中有人提出单独见毛泽东主席,由美国记者史坦因带头,所有外国记者和几个中国记者冲破参观团的统一纪律,陆续单独地见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22日,叶剑英参谋长在王家坪礼堂向中外记者参观团发表《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谈话。24日,延安文艺界举行招待集会。25日,朱德、叶剑英应美报记者史坦因、英报记者福尔曼要求分别与他们谈话。2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李鼎铭副主席、罗迈(李维汉)秘书长接见中国记者,并与他们谈话。29日,李鼎铭、罗迈接见外国记者,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从6月11日开始,中外记者访问边区政府、自然科学学院、日本工农学校、兵工厂、被服厂、难民工厂、皮革工厂、振华纸厂、光华农场、中央医院、和平医院、洛杉矶托儿所等,对边区各方面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7月上旬,记者们都想赴前线访问八路军,由于总领队谢宝樵、邓友德的阻挠并采取分裂记者团的办法,迫使中国记者返回重庆。7月6日,周恩来副主席为其饯行。11日,朱德总司令再次为之饯行。12日,中国记者离延安返渝。

中国记者返渝后,许多人在报上或私下介绍了在陕甘宁边区实际考察的所见所闻。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公开出版了他的《延安一月》,较客观而巧妙地介绍了在延安参观访问之所得及感受,在重庆,“透露出一线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一角的曙光”。

1945年3月,董必武在一次报告中说:“一个外国新闻记者对我说,他在

来延安前,觉得我们的宣传有些夸大,来延安后,他觉得我们的宣传太不够了。”

外国记者除夏南汉随中国记者返渝外,其余留延。经过一番准备工作之后,于8月离延赴晋绥根据地参观,行前毛泽东亲自去交际处为其饯行。沿途他们考察了党政机关工作情况和人民群众努力生产、支援前线的情况。

外国记者返归大后方及故土后,翔实宣传延安和解放区欣欣向荣、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伟大战绩。如福尔曼1945年在美国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报导》,引起美国人民的普遍关注。史坦因写了比福尔曼更好更深刻的书《红色中国的挑战》,1946年于美国出版。同时,写出《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八千六百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等文章,比较客观。特别是爱泼斯坦给《纽约时报》、《时代》杂志写过不少有说服力的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希望之所在。

6. 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

1944年,经多方磋商,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其目的在于了解中国共产党及领导的军队、根据地的情况,以实施美国战时利用一切力量击败日本,战后控制中国为它的势力范围,以防苏联染指的对华政策。

美军观察组,亦称迪克西使团,团长包瑞德上校,共18人,于7月22日和8月7日两批乘飞机抵达延安。

中国共产党对美军观察组来延安访问、观察和美援武器,给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抗日军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建议,采取主动争取和热情欢迎的态度。中共中央在《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指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新民主主义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成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成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亲自同他们谈了话,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共对形势、任务及中美、国共关系的看法。特别是毛泽东对谢伟思(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兼史迪威司令部的政治顾问、观察组收集政治方面情况的负责人)作了多次长谈。概括起来是:第一,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明确的、坚定的,不管外国人赞成与否,中共都将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奋斗;第二,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反对内战,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如果暂时不能,也愿意与国民党谈判;第三,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美国对中国

民主事业的支持,和抗日方面的合作,不论美国在战时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中共都将予以合作,战后仍需美国的友谊和支持,但中共是独立的政党,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美军观察组除在延安活动外,还到晋绥和晋察冀等根据地访问和考察。卡斯伯格还曾带领先期到达延安的美国著名记者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去晋东北调查访问。

他们在延安和其他根据地访问、观察期间,发表了很多讲话,写了不少调查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及中共的方针、政策。特别是谢伟思先后写了50份报告,更加使美国政府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具体的了解。戴维斯1944年11月7日的报告,就是根据谢伟思向“中缅印战区美军将级指挥官、转指挥阶层”的报告写的。他的报告说:“中共已经强大得可以指望在战后至少能控制华北。中共不仅也可能保持扬子江流域目前中共统治下的若干部分,并且可能保持华中、华南的新地区。”“他们经历了不只是比中国中央政府军队所曾受的更大的压力,并且也经历了蒋的严密封锁。”“他们生存下来,并且壮大了。”“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

美军观察组虽然有的人对于解放区的社会性质持有不同看法,但却一致承认中国共产党已得到所有民众的支持。

7. 赫尔利访问延安

1944年,由于国共关系发生逆转,矛盾日益激化,美国为统一中国所有军事力量以击败日本,主动提出要当中间人,以协调国共关系。11月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以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和国共两党调解人的身份抵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与他进行了两天会谈。毛泽东提出了国共两党通力合作,打败日本,复兴中国,建立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等五项建议,赫尔利表示同意。11月10日,双方签署了五点协议草案:(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应通力合作,为击败日本而统一国内武力,并共同致力于中国的复兴工作;(二)国民政府应即改组,成立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联合政府,成立代表所有抗战力量的联合统帅部;(三)实行民主改革,给人民以自由;(四)承认中国所有抗日的武装力量,公平分配所有获自友邦的军事装备;(五)承认所有党派的合法地位。10日,赫尔利离开延安赴重庆,因蒋介石拒

绝上述决定,赫尔利也背弃了他在延安的诺言。

8. 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8月15日,当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以后,霎时,全城沸腾起来,万众狂欢,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到处红旗飘扬,人们沉浸在一片胜利的欢乐之中。当天晚上,延安市举行盛大的火炬游行,无数火把映红山巅河畔,火红的巨流从东南北三道大川涌向市区,机关与群众的乐队、秧歌队纷纷上街,载歌载舞,欢呼雀跃。许多商人市民扎起火把参加游行行列。人们潮水般涌来,汇成一片人海。大家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动员起来支援前线,保卫边区!”“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口号声、欢呼声、锣鼓声、鞭炮声震撼山谷。斯大林元帅、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巨幅画像在熊熊的火炬中高高举起。大家高声唱着“前进!人民的解放军!解除敌人的武装,去恢复交通和城镇!坚决大胆,迅速向前进,谁敢阻挡,就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美军驻延安观察组闻讯后也乘汽车赶来,随秧歌队扭起秧歌来。在群众极度的欢呼声中,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也来到新市场,与军民共同庆祝抗战的胜利。群众一齐向他涌来,双手捧起大海碗向这位在抗日战场叱咤风云的功臣敬酒。彭大将军接过一碗酒,深情地说:“我接受大家的酒,让我们一起为那些死难的抗日壮士和为中国独立自由而献出宝贵生命的国际友人献上这碗酒吧!”说罢双手托碗,将酒轻轻地洒在黄土地上。延安市的灯火彻夜通明,庆祝活动通宵达旦。就在这天晚上,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举行鸡尾酒会,招待在延安的盟国友人,庆祝反对日本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为了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了延安各界庆祝抗战胜利、迎接和平建设新时期大会筹备会。陆定一、邓洁、杨清、肖向荣、李卓然、曹力如、周扬、柯仲平、赵伯平、常黎夫、张汉武、杨作义、胡绩伟、史唯然等参加筹备会的工作。筹备会除确定举行庆祝大会的时间地点外,还制定出15条大会标语,并指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文工团、鲁迅艺术文学院和延安市民秧歌队等,应立即上街进行宣传活动,各机关要进行宣传动员,为庆祝大会作好准备。

9月5日,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和群众两万多人,排着漫长的行列,从东南北各方向,穿过红旗招展、彩楼林立的街道,汇集于南门外广场。秧歌队喧闹的锣鼓声,随着潮水般人群的欢呼声此起彼伏,会场的气氛异常热烈。

会场四周新竖立的木牌上,张贴着各色标语,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经过八年苦斗所换来的欢愉。盛大的庆祝大会在同盟国进行曲乐声中,由曹力如宣布开会。推选朱德、刘少奇、林伯渠、高岗、李鼎铭、谭政、邢肇棠、刘少白、黄齐生、蔡畅、崔田夫、柯仲平、吴满有、王克温、马豫章、曹力如等16人为大会主席团。

在庆祝大会上,朱德总司令首先发表演说,他指出,中国人民几十年来受日本的侵略,今天得到了解放,这个胜利的获得,是与陕甘宁边区军民的大力支援,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浴血奋战,以及全中国人民的努力分不开的。他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坚持和平、民主、团结,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接着,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讲话中略述了半个世纪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血泪史后指出:我们解放区人民成立了民选的地方性联合政府,实行了减租减息,发展了生产,开展了文教运动,使大家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同心合力,致力抗战建国的大业。现在抗战胜利了,解放区同胞必须努力发扬民主团结、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做全国和平建设的模范,以实际行动来巩固已得到的胜利果实。延安大学校长吴玉章、老教育家黄齐生、晋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刘少白和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也先后发表讲话,赞颂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八年抗战中的卓著功绩,表达了对人民军队无比信赖的心情和争取中国走上和平建设光明道路的强烈愿望。

边区军民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在口号声中结束,但狂欢的庆祝活动仍在继续。边区所属各机关、部队、学校以及各分区、县继续采取火炬游行、联欢会、文艺演出、闹秧歌等多种形式开展庆祝活动,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节 重要会议

1. 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

1937年12月21日至25日,中共陕西省委在泾阳县云阳镇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省委书记贾拓夫作《关于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省委常委欧阳钦在会上讲话。会后,省委派出干部到各地传达会议精神,并到党组织空白区恢复和发展组织。

2. 中共陕西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

1938年11月22日至12月11日,中共陕西省委在泾阳县云阳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省委委员、省委各部及各地党组织负责人40余人出席会议。省委书记贾拓夫作《关于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决议》报告,传达了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检查总结陕西党两年来的工作。会议提出关于发展与巩固统一战线、促进抗战的八项主要工作,发出《致中共中央电》、《致八路军、致新四军电》、《告陕西全西北同胞书》,表示坚决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抗战工作。会议补选阎揆要、李铁轮为省委委员。

3.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

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举行。出席会议的参议员145人,其中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和无党派人士;有工农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有商人地主富农的代表。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出席开幕式并讲话。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向大会作《两年来边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边区今后工作方针及具体任务。指出:“边区今后工作的总方针,就是团结边区全体人民,坚持持久抗战,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实现三民主义新中国而奋斗。”各厅、处、院的负责人也分别就本部门的工作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战时施政纲领》及边区选举条例、政府组织条例、各级议会组织条例、土地条例、婚姻条例、高等法院组织条例等单行法规。选举高岗为边区参议会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高岗、张邦英、毛齐华、崔田夫、陈伯达、周长安、路子亮、王观澜、高述先为参议会常驻议员;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2月4日,毛泽东在闭幕式上讲演,指出革命的三民主义是一切从事抗战建国事业的人所愿意接受和实行的,批驳了取消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错误论调,指出应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对付国民党顽固派专搞反共磨擦的人。6日,边区政府委员宣誓就职。

4. 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

1939年11月13日至12月17日,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陕西西安塞县徐家沟举行。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有:庆环、关中、三边、伊克昭盟、神府、绥德、洛川、宁夏、安塞、延安、志丹、靖边、延安市、延川、延长、固临、甘泉、安定及边区党政群等101人;地方武装党代表14人;中央及留守兵团代表34人;工厂党代表四人,共计153人,加上边区党委执委会23个成员,共176

人。在开幕式上,边区党委书记高岗致词,宣布这次大会是要总结第一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提出了“如何把边区更提高一步,把边区更加巩固起来”的任务。会议总结了边区第一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确定了边区继续抗战动员、加强锄奸保卫、发展经济、提高人民文化生活水平等八项任务。11月14日,毛泽东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代表中共中央对边区党委所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向边区各级党组织提出:“提高自己,帮助别人”的任务,号召将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全国抗日民主模范区。高岗向大会作了《抗战新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的工作总结报告;萧劲光作了《军事报告》;张邦英作了《关于组织工作的报告》。中共中央及边区各部门负责人张闻天、王稼祥、陈云、吴玉章、李富春、李维汉、高自立、唐洪澄等讲了话。会议通过了《大会总决议》、《关于拥护和扩大八路军的决议》、《关于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关于边区征收农业税和商业税的决定》、《关于发展边区教育提高边区文化的决议》、《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关于深入乡村工作的决议》、《关于党内干部教育问题的决议》等决议,发出告全体党员书及告全边区民众书。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边区党委会,高岗为书记、王观澜为副书记。

5.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

1941年11月6日至2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举行。到会议员219人,其中,共产党员123人,民主党派25人,无党派人士61人,居住在边区的东方民族(日、韩、印度、荷属印尼)和蒙、回、藏民族代表10人。毛泽东、朱德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代表、国民党中央军委驻第十八集团军高级联络参谋陈宏谟等出席了开幕典礼。高岗主持了会议,毛泽东在开幕典礼上作了重要讲话,说明参议会的目的是为了团结各阶层人民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强调要同党外人士民主合作。会议审议了林伯渠代表边区政府所作的工作报告及参议会常驻会的工作报告,接受了中共中央西北局提出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并作出了《通过施政纲领决议》和九个单项条例;审议了边区政府的财政概算;通过了包括李鼎铭等11名参议员提出的“精兵简政”等400件提案。会议按“三三制”的原则,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高岗为边区参议会议长,林伯渠、李鼎铭为边区政府正副主席以及9名常驻议员、18名政府委员。

6. 中共陕西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

1940年1月2日,中共陕西省委在陕西淳化县安社镇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省委特派员、有关县委书记及省委机关科长以上干部参加。张德生作了《关于巩固党的工作》报告。会后,发表了《为克服投降分裂倒退危机,争取时局好转,告全陕同胞书》。

7. 中共陕西省委扩大会议

1942年1月15日至22日,中共陕西省委在陕甘宁边区新正县(今旬邑县)马栏镇召开扩大会议,省委委员、各部门负责人及在马栏的各县委书记、省委机关科长以上干部出席了会议。会议传达和讨论了1941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省委书记张德生在22日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陕西党组织目前的任务是从思想上肃清主观主义和关门主义残余,实行荫蔽精干政策,社会活动的方针是“公开合法,适应环境,随机应变,长期生存”。

8. 延安文艺座谈会

1942年5月2日至23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主持召开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当时在延安的中央有关负责人和文艺团体的负责人,以及文学艺术工作者共约百余人到会。会议先后开了三次大会,并分作小组进行讨论。会议围绕关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作家、艺术家的立场、观点、方法问题;文艺与抗战及政治的关系问题;作家、艺术家要不要深入生活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23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并作结论,联系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深刻地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地回答了现代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确定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次座谈会延安文艺界的整风运动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943年3月13日,《解放日报》首次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部分内容;1943年10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9. 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在延安召开了为期88天的高级干部会议(又称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共266人,其中有陕甘宁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学各系统的负责干部,各分区党政及军

队旅一级的负责干部,县级党政及军队团一级的干部。中央高级学习组和中央党校的大部分重要干部都到会旁听。讨论政府工作和财政工作时,还邀请了有关部门的共产党外的负责干部和技术干部参加。

中共中央西北局为这次会议确定的任务是“整党、整政、整军、整民、整关(系)、整财、整学等七整,并在这七整中,来贯彻整风与精兵简政”。会上,陈正人作了关于整党整民的报告,林伯渠作了关于整政的报告,贺龙作了关于整军的报告,高岗作了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检讨的报告和关于统一党的领导及大会总结,林伯渠致会议闭幕词。毛泽东在会议开幕和闭幕时均到会讲了话。会议进行中毛泽东作了关于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十二条的讲演和关于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陈云、彭真、叶剑英、吴玉章、徐特立、康生等也到会讲了话。会议着重讨论了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正确总结了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经验,肯定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志丹、谢子长等人领导的西北地区土地革命斗争,批评了少数人在苏维埃时期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和肃反的错误,解决了长期以来对陕北地区党内历史问题的争论。会议检讨了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主要偏向,对边区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的倾向及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等错误倾向,都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为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奠定了基础。会议还为陕甘宁边区的政府工作、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指出了正确的方向,确定了发展农业、生产自给、保障供给等财政经济方针,明确了发展生产和教育,加强边区建设,是边区党的基本任务。为了加强党在边区的一元化领导,会议决定,陕甘宁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工作都统一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分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工作都统一于党的地方委员会,其余县、区依此类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的召开,推动了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解决了陕北地区党内历史遗留问题,纠正了边区党、政、军、民、学工作中的错误和不良倾向,从而推动了边区各项工作的开展。

10. 边区文教工作者代表大会

为了总结文教工作的经验,表扬和奖励文教工作的模范,更进一步明确继续发展文教工作的方针,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边区文协于1944年10月11日至11月16日在延安联合召开了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绥德、延安、三边、关中、陇东五个分区和部队,延安的机关学校、少数民族等八个代表团共450余名代表出席,朱德、吴玉章、徐特立、李鼎铭等中央

和边区的领导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会议期间,高岗、刘景范、柳湜、李卓然、萧向荣、周扬等分别向大会作了报告。毛泽东到会作了题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重要讲演,阐明了文化统一战线的方针和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为边区文教工作指明了方向。

这次大会着重讨论了新民主主义的群众文化运动,总结了过去教育、卫生、艺术、报纸工作的情况,特别是整风和大生产运动以来文教工作的成绩和经验,通过了《关于培养知识分子与普及群众教育的决议》、《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关于发展群众读报办报与通讯工作的决议》、《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议》、《关于加强荣誉军人教育及娱乐活动的决议》、《关于发展工厂文教工作的决议》、《关于机关学校文教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决议》等。大会通过确认邹韬奋为模范革命出版工作者的提议,对81个先进单位和202名模范人物进行了奖励,李维汉代表边区政府作了《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文教运动》的总结,大会提出了新的任务。这次大会,对开创边区文教事业的新局面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1.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

1944年12月4日至19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在延安举行,到会议员187名,华北、华中各解放区代表参加了会议。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大会上作《边区民主政治的新阶段》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边区民主政治新阶段的任务是,“更进一步地团结全边区各界人民,建设出一个很好的地方,协同整个中国解放区,为全中国人民作出榜样,并和全国人民一齐努力,达到驱逐侵略者与建设新中国之目的。”周恩来、朱德、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陈毅、任弼时、刘伯承等到会并讲话。15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题为《1945年的任务》的演说,指出,1945年惟一的任务是打倒日本侵略者,而只有用人民的力量促成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民主基础上召集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李鼎铭作了关于文教工作方向的发言。会议通过《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等四项法规和35件提案,一致通过“要求蒋介石撤销封锁边区大军,调赴抗日前线,和向大后方人民号召在全国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奋斗的通电”。

第九章 中共组织创办的学校与报刊

第一节 中共组织创办的学校

1. 中共陕西省委党员干部训练班

为培养抗日救亡运动及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1937年8月,中共陕西省委在泾阳县云阳镇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贾拓夫、张德生、赵伯平、汪锋、胡达明等省委领导兼任教员。训练班开设党的建设、农民运动、工人运动、统一战线、游击战争等课程。学习结束后,学员由省委组织部统一分配,一些留在省委机关;未暴露身份的仍回原地工作;已暴露身份的送到延安安排工作。1941年训练班结束,共举办十期。

2. 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

全面抗战爆发后,一方面是沿海大城市和广大战区的大批青年学生向内地流亡,另一方面是全国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迫切要求参加抗战,接受战时教育。为培养大批战时工作的青年干部,满足青年战时教育的要求,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主持开办了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1937年10月11日第一期在陕西泾阳县斗口镇开学,主任冯文彬、副主任胡乔木。中共西安学委、西安学生分会和关中各地民先队输送的100多名民先队员和学生共产党员参加首期学习。青训班后迁至云阳镇,1938年1月迁至泾阳县安吴堡。

训练班以培养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青年干部为目的。学员一部分是来自国统区的爱国青年,一部分是来自海外的华侨青年。课程设置以政治、军事和群众运动理论为主。并根据不同的班次加授特殊科目。学制不等,有两星期、三星期、一个月、三个月班。1938年11月以后,青救会根据形势的需要,确定把青训班改为训练青年工作干部的专门学校,学习期限也从三个月延长到一年。1940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后,训练班撤回延安,学员进入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继续学习。青训班共举办14期,培训学员1.2万名。

3. 边区行政学院

1940年7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创办了边区行政学院。领导人先后为林伯渠、王凌波、王子宜等。学院以培养适应边区建设需要的区以上行政干部,提高干部的文化程度、政策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为目的。学员主要为边区各级行政人员。学院设有:行政、司法、教育、财经四个系和经济建设、财政等班。1944年5月,根据西北局常委会决定,行政学院并入延安大学,成为延安大学三大学院之一。行政学院成立后在单独办学的4年中,为边区的各部门培养训练了2000名行政干部,他们在领导和管理边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建设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

4. 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部队艺术学校

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部队艺术学校于1941年4月1日在延安创办。莫文骅兼任校长,王震之任副校长兼教务主任,史行、曼甬任教务处副主任。学校设戏剧、音乐、文学、美术四个系和一个培养演员的普通班。1942年初,在延安、陇东、鄜县(今富县)设立三个分校。学校成员以留守兵团政治部烽火剧社和鲁艺部队干部训练班为基础,吸收奋斗剧社、吕梁剧社、七月剧社、前线剧社、战士剧社、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宣传队和烽火剧团的三个分社的部分人员组成。1943年冬,艺校与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合并。

5. 中共陕西省委干部训练队

1941年5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将调回边区(马栏)的党员、干部50余人集中起来,建立干部训练队。干部训练队下设三个队。一队为区委、支部干部及学生党员;二队(亦叫研究班)为地、县委书记;三队多是农民党员、干部。训练队主要学习军事、政治,培养军、政人才。

6. 西北党校

1941年9月,由陕甘宁边区党校更名而成立西北党校,属中共西北中央局领导,校址设在延安小砭沟,后迁至七里铺。1942年,西北局将西北党校的教务工作委托中央党校指导。校长先后有张邦英、高岗,副校长先后有李景膺、赵伯平、马国瑞。学员主要来自西北、华北、华东地区。课程有联共(布)党史、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政策、社会科学常识、国语、拉丁化新文字、历史、地理、自然、算术、时事常识等。1944年2月,西北党校并入中共中央党校,为中央党校五、六部。1945年8月,中央党校五部又改为西北党校。1952年1月,西北党校更名为西北局党校。

7. 医药学校

1941年12月由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办于延安,校长李治。该校以为边区发展卫生事业,培养医药人才为目的。设医疗、护士、司药三科。课程有:解剖学、药理学、微生物学、组织学、调剂学、药物术、化学等。

8. 工业职业学校

1942年2月由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建设厅筹建于延安。6月与农业学校合并为职业学校,校长王荫圃。以培养工农技术人才,发展边区经济为目的。课程有机械、化学、采矿、纺织、土木工程、农副业、商业贸易等。

9. 新文字干部学校

1941年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办的一所培养推广新文字教育的专门学校。校址设在延安清凉山,校长吴玉章。1943年3月,学校并入延安大学。

第二节 中共组织创办的报刊

1.《新中华报》

1937年1月29日,《新中华报》由《红色中华》第325期起,更名诞生。从9月始由油印改铅印。初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机关报,1939年2月7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由五日刊改为三日刊,在延安出版,向仲华任总编辑。该报着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全面抗战路线,揭露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的阴谋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反共行径,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和全国人民抗战业绩、抗战经验,以及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的建设情况。主要栏目有:社论、专论、短评、三日新闻、三日战况、国内要闻、边区新闻、各县短讯、通讯、专访、人物介绍、生产运动、读者信箱等。该报旗帜鲜明,针对性强,形式活泼。毛泽东曾称赞《新中华报》是全国报纸中最好的一家。至1941年5月15日,共出230期。5月16日,该报同《今日新闻》合并,改为《解放日报》。

2.《西北战线》

1937年10月10日在泾阳县云阳镇创刊,为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刊物,油印,由省委组织部编辑,设有社论、时事述评、自由论坛、各地通讯等栏目。1941年9月在耀县照金停刊。

3.《老百姓报》

1937年11月12日,由著名教育家、民俗学者、中国共产党党员李敷仁在西安创办,李任主编,编委有武伯伦、张寒暉等。该报宗旨是:宣传抗战,宣传民主。经常刊登歌颂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英雄的文章。开始为油印旬刊,后改为铅印周刊。主要在陕西关中以及陇东、晋南、豫西一带发行,并逐渐普及到全国13个省、市,还翻译成世界语,发行到法国、英国、美国、匈牙利、瑞典、苏联、意大利、加拿大等国。是抗战时期全国影响最大的通俗报纸,发行达万份。该报文章短小通俗,常采用快板、鼓词、莲花落、歌谣、谚语、梆子腔、新诗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纯朴的乡土语言,鼓动群众关心国家大事,反映老百姓的心愿,讲解国际形势,动员人民抗日,控诉日寇暴行,揭露反动统治的黑暗,受到广大进步人士和劳苦群众欢迎。《老百姓报》辟有社论、评论、一周国际、七日内政、科学讲座、各县通讯、名人传记、老百姓办公处等栏目。1940年2月15日,《老百姓报》被国民党陕西当局查封,4月17日停刊。

4.《救亡》

1937年11月28日创刊于西安。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机关刊物,周刊,以宣传抗日救亡、民主进步为宗旨,主编郑伯奇。

5.《西北》

1938年1月21日创刊于西安。中共陕西省委的机关公开刊物,周刊,主编李初梨、张寒暉。该刊以“加强抗战力量的团结,保卫陕西,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争取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三民主义新中国”为宗旨,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发动群众,团结抗战为中心任务,辟有:社论、时评、专论、通讯、启事、文艺、读者信箱、读者论坛、诗歌、大众抗战故事、一周时事等栏目,并转载《新中华报》、《新华日报》的社论、专论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洛甫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文章和讲话。从第22期起改为半月刊。该刊发行近万份,香港、九龙、广州、武汉等地及国外都有订户与代销处。是西北各种刊物中销售量最多,发行最广的一种刊物。1938年12月被国民党陕西当局迫令停刊。后经各方努力,1939年7月1日在延安复刊。毛泽东、林伯渠等为复刊后的《西北》题词。1940年3月停刊,共出48期。

6.《关中报》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关中地委机关报。1939年春创办于关中分区所在地马栏镇。主编高仰云等。该报主要刊登国内外大事,宣传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内容通俗易懂,形式生动活泼。重视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歌、民谣、小调、歌词、故事、常识、谜语等进行宣传鼓动。在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拥军优属、自力更生发展农副业生产,开展办学、识字、读报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深受基层干部和群众欢迎。1950年停刊。

7.《边区群众报》

1940年3月25日创刊于延安。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机关报,总编辑胡绩伟,其他领导人和工作人员有周文、李季、闻捷、钟纪明、杜鹏程等。创刊时为四开四版,石印、旬刊。第十期之后,改为四开四版的周刊、铅印。毛泽东为该报题写了报头。该报始由延安大众读物社主编,1942年2月18日大众读物社结束,成立边区群众报社,谢觉哉任社长。该报是以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的通俗小报,主要任务是:教育人民群众,提高觉悟,加强建设,保卫边区,支援抗日战争。该报从内容到形式都力求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使识字少的人能看懂,不识字的人能听懂,因而受到边区人民的欢迎。1941年,陕甘宁边区党委改为中共西北中央局,该报又成为西北局的机关报。1946年改为三日刊。1947年3月后随西北局转战陕北,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出版,出过油印和铅印小报,改过日刊、三日刊和周刊,并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过《边区群众副刊》。1948年1月10日在绥德更名为《群众日报》。同年4月解放军收复延安后,迁回延安继续出版。1949年6月迁往西安。1953年1月成为中共陕西省委机关报。1954年10月26日改为《陕西日报》。

8.《解放日报》

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由原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和专门刊载新华社电讯的小报《今日新闻》合并后改版印行,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个大型日报,博古任社长,总编辑先后为杨松、陆定一;艾思奇、余光生任副总编辑。毛泽东为该报题写报头并撰写了《发刊词》,中共中央许多领导人亲自领导并参加了该报的工作。该报为中共中央机关报,1942年9月后又兼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报。为了集中办好该报,中共中央先后决定停办了《解放》周刊、《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等杂志,抽调一批适合办报的知识分子到该报工作。该报以“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为使命,根据中共中央决定,该报社论均由中央负责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自1941年9月16日第124号起,该报改对开二版为对开四版。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该报于1942年4月1日改版,改版后第一版主要刊登各解放区的要闻;

第二版为陕甘宁边区版；第三版为国际版；第四版是副刊和各种专论，在宣传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抗日军民的战斗业绩，以及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47年3月由于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延安，《解放日报》迁至瓦窑堡，改为八开四版，一直到3月27日停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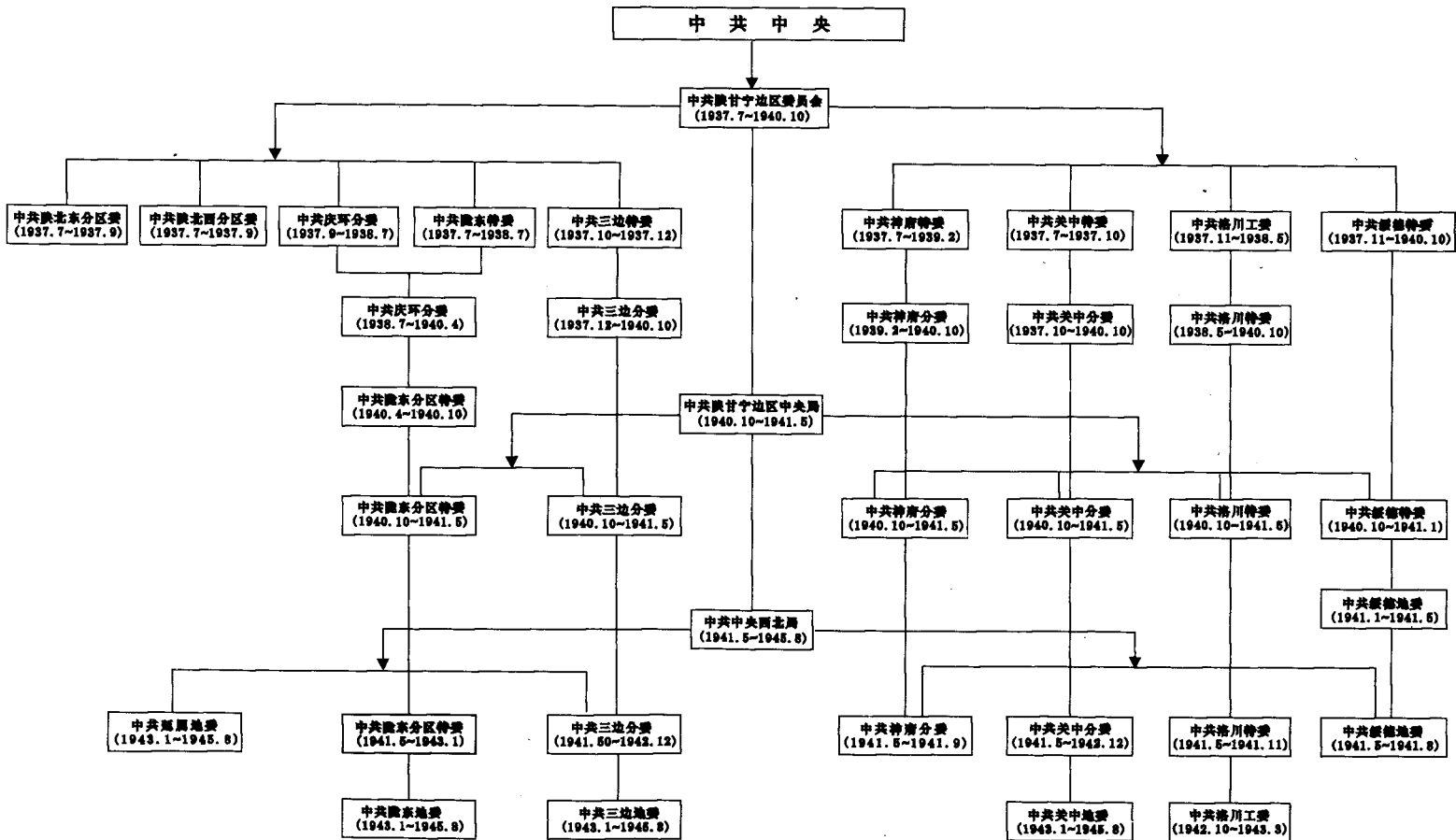
9.《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

该报1943年6月13日创刊于西安，是抗日战争时期陕西著名的地方时事报纸。该报是民盟西北总支部接受周恩来的建议，促使《秦风日报》和《工商日报》合刊而成。是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的机关报。由成柏仁、刘文伯领导报务工作，梁益堂、张性初、李敷仁、耿炳光、关梦觉、李子健、葛凤梧等分别担任编辑、经理和采访等工作。主要内容是转载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的重要社论和文章，揭露国民党政府独裁统治、贪赃枉法的行径，报道抗日战争和国内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状况。抗日战争胜利后，该报响应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呼吁释放政治犯、释放杨虎城将军，发出反对内战和独裁的呼声，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地方民办报纸，因此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限制、摧残，直到捣毁。1946年5月3日被迫停刊。

10.《文化周报》

1945年4月4日在西安创刊，为西北民主青年社机关报，主编王天人（王维祺）。该刊初为16开本期刊，出版了5期，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压制而一度停刊。该刊以“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坚持抗日，反对投降；进行启蒙教育，反对文化愚昧与专制”为主要内容，并以时评、杂文、通讯、诗歌等形式，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与腐败，介绍战后苏联和东欧一些民主国家的情况。1946年春，陕西民主运动处于高潮，西北民主青年社为指导运动，决定恢复《文化周报》，版面改为四开型报纸，文体短小精悍，主要报道各地特别是各高等学校的民主运动，并辅以短评和杂文，同时对国际斗争和战后苏联、东欧民主国家的情况加以介绍。1946年5月1日《文化周报》再度被迫停刊。

中共陕甘宁边区组织沿革示意图 (1937.7~1945.8)



第四篇 解放战争时期的 中共组织及活动

(1945.8—1949.10)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力图避免内战,为争取“民主、和平”进行了不懈地努力。但是,坚持独裁统治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的支持下,悍然撕毁政协协议,于1946年发动了全面内战。

此时,陕西境内存在着两个根本不同的政治区域。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陕西解放区,一个是中国国民党在陕西的统治区。保卫陕西解放区和解放陕西国民党统治区,是解放战争时期,陕西的中共组织和人民的两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

1947年春,国民党在全面进攻失败以后,对山东和陕西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由于敌强我弱,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暂时放弃延安,转战陕北。解放区内各级党政军群组织和人民群众在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西北军区)的领导下,全力以赴配合西北人民野战军,开展自卫战争,不仅保卫了陕西解放区,收复了延安,而且使陕西解放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陕西国民党统治区的解放,从1945年10月三边国统区解放起,到1950年1月最后一个县镇坪解放,经历了四年又三个月。分别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在陕北北部战场、陕北南部和关中战场、陕南战场等三个相对独立的战场进行。一小部分地方是1946年前解放的,绝大部分地方是1947年秋中原解放军挺进鄂陕豫边和1948年2月西北人民解放军转入外线作战后解放的,其中一些地方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几经较量,才能获得最后的解放。解放的形式有战争的与和平的两种,绝大部分是人民军队打下来的,只有少数地方是和平解放的。

在保卫陕甘宁边区和解放陕西国统区的斗争中,陕西地方党组织配合人

民解放军作战,作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为解放陕西,解放大西北,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第一章 中共组织与进步团体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的各级组织及其所领导的群众组织,是随着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和解放区的不断扩大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由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边区在陕西境内所辖的陕西解放区,有完整的各级党的组织。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以下,有延属、绥德、三边、关中四个地委;在陕西国统区,由于抗战时期执行了“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党的组织绝大部分处于“休眠”状态。1946年初,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成立陕西省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关中和陕南国统区党的工作,“唤醒”党员、恢复组织。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对陕西解放区的包围进一步加剧。1946年10月,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胡景铎部在横山、镇川一带发动了反内战起义。中央西北局于10月底在这一地区成立了中共榆横特委。截至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延安前,陕西解放区的党组织有绥德、三边、延属、关中四个地委和黄龙特委、榆横特委(1947年12月撤销)。

1947年3月至4月,西北野战军先后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使陕北战场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接着又收复了陇东,攻克三边。8月初,西北野战军开始对榆林外围实施进攻,为了配合西北野战军对榆林外围的军事行动,西北局成立了中共榆林地方委员会。1948年初,西北野战军一度解放了黄龙、白水、宜川、韩城等县,在这些县相继建立了党、政组织。根据这一新的形势,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黄龙特委改为黄龙地委。至此,陕西解放区党的组织有绥德、三边、关中、延属、黄龙五个地委。

随着陕北和关中解放区的不断扩大,中共中央西北局和关中地委不断调整和加强国统区原有的组织,建立新的组织。1948年2月,关中地委领导的东府工委撤销,其所辖党组织划归黄龙地委领导。4月中旬,西北野战军出击西府,解放了宝鸡及周围大部分县城,4月22日建立中共西府地委,由中央西北局直

接领导。撤销西府工委,所辖各县归西府地委领导。6月,路东工委改归黄龙地委领导。7月,中央西北局决定成立东府工委,10月成立东路工委,12月成立中共西安市工作委员会,同年年底恢复榆林地委。1949年2月,东府工委改为东府地委。3月,东府各县全部解放,东府地委改为大荔地委。同月,在延安组建了渭华地委,东路工委撤销,其所辖各县工委由渭华地委领导。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中央西北局宣布成立了中共西安市委。在西安解放前后,西府地委撤销,分别成立了中共宝鸡地委和中共彬县地委,关中地委改为三原地委,渭华地委改为渭南地委,成立了咸阳地委。这一时期,西北局下辖的地委一级党组织有延属地委、绥德地委、三边地委、关中地委、三原地委、榆横特委、榆林地委、洛川工委、黄龙地(特)委、西府地委、宝鸡地委、彬县地委、东府地(工)委、大荔地委、渭南地委、咸阳地委。

西安解放后,中央西北局迁至西安。同时在延安王家坪成立中共陕北区委员会,领导陕北老解放区党的工作。下辖绥德、榆林、黄龙、三边四个地委。

1946年初,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工委先后向陕南地区派遣党员,恢复发展党组织。巩德芳等在商洛山区集中和发展了分散的武装力量,建立了“隐蔽根据地”。

中原军区北路突围部队进入商洛,与陕西省工委派来的200多名干部及巩德芳领导的游击队会合,于1946年9月开始创建豫鄂陕根据地。24日成立中共豫鄂陕边区委员会,隶属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下辖五个地委。1947年2月,奉中共中央命令,豫鄂陕边区主力部队北渡黄河休整。在根据地内则成立了中共陕南工委,继续坚持斗争。

1947年9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四纵十二旅、三十八军十七师和教导团一部,分三路向商洛进军,与留在豫鄂陕根据地的中共陕南工委汇合,开始创建豫陕鄂根据地。11月中旬,成立了第二地委。同月,第四地委成立,辖陕西境内的镇安、山阳等县。

1948年5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将豫陕鄂边区党委划分为豫西和陕南两个区党委。6月7日,中共陕南区委员会成立,归中原局领导,下辖原豫陕鄂边区第二、第四地委。1949年1月,陕南区第二、第四地委改称商洛地委和两郧地委。5月,安康地委成立。6月,中共中央电令陕南区党委改由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7月,汉中地委成立。到9月底,陕南区党委辖商洛、两郧、安康、汉中四个地委。

1949年解放时,全省基层党支部已有2974个,党员达6481名。支部主要集中在农村和党政机关,具体状况为:工业13个,农业1815个,文卫115个,机关1009个,其它22个。党员遍布全省各县。

第一节 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北解放区的中共组织

一、中共中央西北局

解放战争时期,高岗、习仲勋、贺龙、彭德怀等先后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主要领导职务。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机构开始设有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社会部、职工运动委员会(后改为职工工作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后改为青年工作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后改为妇女工作委员会)。后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实际工作的需要,增设了城工部、党务委员会、监察委员会、边区民众工作委员会、前敌委员会、后方工作委员会、敌军工作委员会、西北财经委员会等工作部门,此外还设有西北党校、《边区群众报》(1948年1月10日,改名为《群众日报》)。

1947年3月,蒋介石纠集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集团共25万兵力,向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先后迁至安塞县白庙岔、子洲县马蹄沟、山西临县及绥德义合等地。1948年4月21日延安光复后,回驻延安,西安解放后,进驻西安。

中共中央西北局下辖组织随形势发展和需要不断加强。先后组建和领导了陕西省工委、西安市委、宁夏省委、甘肃省委、青海省委、新疆分局、晋绥分局、陕北区党委、陕南区党委、伊蒙工委、晋西工委、晋南工委等党组织;并直辖陕甘宁解放区陕西境内的绥德地委、三边地委、关中地委、榆横特委、榆林地委、洛川工委、黄龙特委、黄龙地委、西府地委、宝鸡地委、彬县地委、东府工委、大荔地委、渭南地委、三原地委、咸阳地委等党的组织。

二、中共中央西北局下辖地委组织

1. 中共延属地方委员会

在解放战争期间,延属地委归中央西北局领导,地委机关驻延安城,地委

下辖延安、子长、延川、延长、志丹、安塞、甘泉、富县、固临九个县委和延安市委。1947年3月,胡宗南部队侵占延安,延属地委机关活动于安塞、子长、延川等地。为适应战争环境,便利指导各县配合西北野战军主力作战,延属地委决定在延属分区东、西部分设东地、西地两个工委。东地工委驻延长,白清江任书记,下辖延川、延长、固临、南泥湾垦区等四个县(区)委。西地工委驻富县,张育民任书记,辖志丹、富县、甘泉等三个县委。1948年4月21日,延安收复,东、西地工委先后撤销,延属地委机关迁回延安,驻新市场沟。1948年7月,固临县委和南泥湾垦区区委合并,成立临镇县委,1949年1月撤销。1949年3月,撤销延安建制,并入延安县,将富县划归黄龙地委管辖。1949年5月,中共陕北区委成立,延属地委随之撤销,其所辖延安、甘泉、志丹、安塞、子长、延川、延长等七个县委归陕北区党委直属。

中共延属地委书记先后为李景膺、白清江。

同时设有同级的政权组织延属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先后辖九县一市,后撤并为延安、延长、延川、子长、安塞、志丹、甘泉等七个县政府。专员先后为曹力如、李景林。

2. 中共绥德地方委员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绥德地委仍负责领导绥德警备区党的工作。地委归中央西北局领导,下辖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子洲等六个县委。地委机关先设在绥德县城九贞观内。1947年3月,迁到韭园沟一带。

1947年8月和11月西北野战军发动了两次榆林战役之后,驻榆林的国民党二十二军困守孤城。12月,为了加强对该军的统战工作,促使其接受改编,和平解放榆林,中央西北局决定在榆林的镇川建立中共榆林工作委员会,受中央西北局和绥德地委双重领导。

1947年底,中共榆横特委撤销,其所辖的镇川和横山两县委划归绥德地委管辖。此时,绥德地委下辖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子洲、镇川、横山八个县委和榆林工委。

1949年3月,镇川、横山两县划归榆林地委管辖。5月,陕北区党委成立,绥德地委隶属陕北区党委领导,下辖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子洲六个县委。机关驻绥德城内九贞观。

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先后为李井泉(代理)、白治民、张邦英(代理)、杨和亭、杨彩霖。

同时建有绥德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先后为杨和亭、霍祝山。先后下辖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子洲及横山、镇川两县政府。

3. 中共三边地方委员会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三边地委归中共中央西北局直属,地委机关驻定边城内。地委开始辖定边、靖边、吴旗三个县委和宁夏的盐池县委。1945年10月25日,经三边地委做工作,当地国民党驻军十一旅起义,解放了安边城。12月,成立了安边县委。1946年5月20日,为加强宁夏工作,西北局常委会决定成立宁夏工作委员会,高峰兼工委书记,孙殿才任副书记,安边县委和宁夏工委均归三边地委管辖。

1947年3月,蒋介石命令马鸿逵配合胡宗南部队进犯陕甘宁边区。马鸿逵部队乘三边西线、北线空虚,接连侵占盐池、定边、安边等县。6月,彭德怀司令员率西北野战军于陇东战役之后转战三边,至7月7日,安边、定边、盐池相继收复。8月13日,西北野战军东进,定边二次失守。此时,三边地委撤至吴旗,继续领导三边人民进行游击战争。1949年8月,定边县光复。三边地委迁回县城原址。1949年5月陕北区党委成立后,三边地委归陕北区党委领导。下辖盐池、定边、靖边、安边、吴旗五个县委。机关驻吴旗镇。1949年9月27日,三边地委撤销,所辖的盐池县划归宁夏管辖,安边、吴旗县制撤销,定边、靖边两个县划归陕北区党委直辖。

中共三边地委书记先后为高峰、郭炳坤、朱敏。

同时设有三边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先后为吴志渊、陈思恭。先后下辖定边、盐池、靖边、吴旗、安边五个县政府。

4. 中共关中地方委员会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关中地委领导陕甘宁解放区关中分区及陕西省国统区党的组织,它隶属中央西北局领导,机关驻新正县马栏镇。1945年9月2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调高锦纯为关中地委书记,汪锋为副书记。当时关中地委以边区工作为主,下辖陕甘宁解放区关中分区的新正、新宁、赤水、淳耀四个县委和双龙镇中心区委。地委所管辖的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还没有从隐蔽状态下恢复、发展起来。

1946年初,为了进一步恢复和加强陕西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组织,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抽调原在陕西省委工作过的关中地委领导干部汪锋、赵伯平等,成立中共陕西省工作委员会,专做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

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2月19日,关中地委和陕西省工委机关所在地马栏失守。为了统一领导关中的军事力量,以适应关中游击战争和国统区党的工作的开展,中央西北局于3月7日决定,将关中地委与陕西省工委合并;关中地委设国统区工作委员会,专做国统区工作。合并后的关中地委先后驻高尧子、金盆、庙湾和宁县五亭子等地,1947年8月24日,关中分区重镇马栏收复,地委机关又迁回马栏。合并后的关中地委除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双龙镇中心区等县(区)委外,还领导国统区原陕西省工委所辖的党组织。1949年4月4日,中共关中地委改为中共三原地委。

中共关中地委书记先后为张德生、高锦纯、赵伯平、杨伯伦(代理)。

同时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先后为张仲良、张鹏图、杨玉亭。先后下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旬邑、淳化、中宜、三原、彬县、白水、耀县等县政府和双龙镇中心区。

5. 中共三原地方委员会

1949年春,西北野战军先后解放了渭北的同官、耀县、富平、三原、高陵等县,逼近西安,各县人民政权相继建立。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自4月4日起,关中地委正式改称为中共三原地方委员会。白治民、郭文学等四人为地委常委,书记白治民,三原地委属中央西北局领导,下辖三原、同官、耀县、富平、高陵、泾阳、淳化七个县委。至5月19日,全区各县相继解放,地委机关进驻三原县城。

1949年6月,新正、新宁两县委正式划归甘肃陇东地委。同年夏,人民解放军华北兵团进军西北,在三原分区境内集结,准备消灭企图反扑的国民党军队。地委主要工作是有秩序地接管新解放区的城乡政权,恢复生产和建设,动员群众全力支援解放战争。随着支前和接管工作的顺利开展,党的组织也在不断发展壮大,截至8月份,全区共有党员2102人。

同时将关中分区改为三原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杨玉亭。先后下辖新正、新宁、三原、同官、耀县、富县、高陵、泾阳、淳化等县政府。

6. 中共榆横特别委员会

1946年10月13日,胡景铎等率横山驻军二十二军八十六师和新编十一旅部分部队及榆林保安指挥部保安九团5000多人起义,并发表通电反对蒋介石、胡宗南发动内战消灭异己的罪行。起义部队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部队解放了榆林的镇川、清泉、上盐湾、鱼河和横山县的武镇、响水等30多个城镇。

10月31日,在米脂县龙镇成立了中共榆横特委,书记刘文蔚,归中央西北局直接领导,下辖镇川、横山两个县委。机关驻地由米脂县龙镇迁到镇川。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边区时,特委曾一度从镇川转移到龙镇,不久又回到镇川。在榆横特委领导下,镇川、横山两县党组织曾率领群众,配合部队,摧毁了国民党的保甲组织,建立了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1947年12月,中共榆横特委撤销,所属镇川、横山两县归属绥德地委领导。

同时设有榆横政务委员会,主任由胡景铎兼任。下辖镇川、横山两县共12个区。

7. 中共榆林地方委员会

1947年8月中上旬,西北野战军为歼灭榆林守敌,迫使胡宗南部向北增援,以配合陈(赓)谢(富治)兵团渡黄河南下,开始对榆林外围进行攻击。与此同时,中央西北局决定成立中共榆林地委,下辖榆林、横山等县委。地委一直随西北野战军总部转移。自8月中旬至12月中旬,西北野战军在重创榆林守敌之后,相继撤出战斗。此时,地委干部有的随军转移,有的另行分配工作,榆林地委撤销。

1948年秋,榆林地区除榆林城及周围少数地方仍驻有国民党二十二军和地方民团外,其它地区全部解放。1948年12月,中央西北局为了加强榆林解放后的接收工作,确定在镇川建立榆林分区的指导机关,1949年2月5日(刘长亮回忆为1948年10月),成立了榆林地委,属中央西北局领导,机关驻地绥德镇川。原由晋绥一地委所属神木、神府、府谷及绥德地委所属的镇川、横山等五个县委划归榆林地委领导。1949年6月1日,榆林城和平解放,地委机关随部队迁入城内。这时,榆林地委还下辖有榆林市委。全区共有党员4649人。5月,榆林地委归陕北区党委领导,下辖榆林市委和榆林、神木、神府、府谷、横山、镇川六个县委,机关驻镇川堡。1949年6月,迁驻榆林城内军马场。

中共榆林地委书记先后为张德生、刘长亮、朱侠夫。

同时设有榆林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先后由张德生、朱侠夫兼任。先后下辖榆林、横山、神木、神府、府谷等县政府。1949年6月榆林解放,成立了榆林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曹力如,后朱侠夫代理。

8. 中共洛川工作委员会、黄龙地方(特别)委员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洛川工委仍由中央西北局领导,以延属地委统战部名义开展工作。工委主要在黄龙山澄(城)蒲(城)合(阳)朝(邑)一带活动,为了

发展党的力量,把被破坏的党组织恢复起来,洛川工委在所辖区域内设立若干工作点,派干部负责工作,积极与隐蔽的党员取得联系,并举办干训班、教导队,培养党的干部及军事人才,发展党的组织。1945年10月,在双龙镇工作点成立了雁门工委,主要负责领导宜君及富平、同官、中部、白水、蒲城一部分地区党的工作。1946年夏,雁门工委归黄龙特委领导。

1946年7月,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紧急动员,准备战争,保卫边区的指示》,并根据洛川、黄龙一带山大沟深,有利于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将洛川工委改为黄龙特委,特委归中央西北局领导,机关驻地富县川口村。

为了统一和加强黄龙山以南各县地下工作的领导,黄龙特委根据中央西北局二月决定,正式成立中共黄龙山区工作委员会,归中央西北局和黄龙特委双重领导,下辖黄龙、韩城、合阳、澄城、宜川等县党的组织。工委机关驻黄龙县庙后川健儿沟。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陕西东部的韩城、合阳、黄龙等县边缘的黄龙山,曾是陕西省委领导下的东府工委和中央西北局领导下的洛川工委(1946年7月改为黄龙特委)两个系统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中心。为协调这一地区党组织的活动,1947年夏季,中央西北局决定合并东府工委与黄龙工委的领导机构,组成陕西东部地区工作委员会,工委成员由黄龙工委和东府工委两部分人员组成。原陕西省工委组织部部长王俊在黄龙山南部地区传达了中央西北局的指示,黄龙特委也专门做过研究,但因战争环境,领导成员始终没有确定,因而陕东工委实际上没有成立起来。东府工委和黄龙工委继续单独活动,直至黄龙地委成立。

1947年春,中央西北局为了把黄龙南部地区的武装力量统一起来,决定成立中共黄龙南部地区工作委员会(简称黄南工委)。8月,在健儿沟正式成立。黄南工委归中央西北局和黄龙特委双重领导,下辖黄龙、合阳、澄城、韩城和白水县的北部地区党的组织。主要任务是支援部队作战,开展游击战争,发展党组织。1947年10月,黄龙县城第一次解放,黄南工委宣告结束。

1948年初,黄龙特委所辖各县党组织和游击武装力量不断壮大,黄龙地区不少地方已解放,并相继建立了政权组织。1月2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黄龙特委更名为黄龙地委,1948年4月洛川县城解放,地委机关进驻洛川县城,黄龙地区党的工作由地下转入公开。6月6日,成立了黄陵、宜君、洛川、黄龙、宜川、韩城、合阳、澄城、蒲城、白水、富平11个县委。1949年3月,

将黄龙地委所辖的韩城、合阳、澄城、白水四个县委划归大荔(东府)地委,富平县划归关中地委,原延属地委的富县县委划归黄龙地委。5月,黄龙地委归陕北区党委领导。下辖黄龙、富县、宜川、宜君、黄陵、洛川六个县委,机关驻洛川县城。

中共洛川工委书记先后为强自修、杨西林、白清江(兼)。中共黄龙特委书记强自修。中共黄龙地委书记先后为强自修、黑志德。

1948年1月,建立了黄龙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黑志德。先后下辖黄陵、宜川、韩城、合阳、澄城、蒲城、富平、白水、黄龙、富县、宜君、洛川等县政府。

9. 中共西府地方委员会

中共西府地委是由陕西省工委领导的西府工委沿革而来。1947年3月,关中地委与陕西省工委合并后,西府工委归关中地委领导。1948年4月,西府工委奉命率西府总队随野战部队南下参加西府战役。在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下,西府各地相继解放。在此形势下,中央西北局决定以西府工委为基础,成立中共西府地方委员会,由李景膺任书记。5月20日,中央西北局又任命了西府地委委员、常委、书记和工作部门的负责人。地委隶属中央西北局领导,下辖彬县、长武、永寿、礼泉、乾县、兴平、武功、麟游、扶风、凤翔、宝鸡、岐山、千阳、陇县、眉县和甘肃灵台等县的党组织。

1948年4月,建立了西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先后为杨伯伦(未到职)、赵伯经。下辖彬县、长武、永寿、礼泉、乾县、武功、麟游、扶风、岐山、凤翔、宝鸡、千阳、陇县、凤县、眉县和甘肃的灵台等县政府。

10. 中共宝鸡地方委员会

1949年4月,西北野战军向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部发起了全面攻击。5月,西安市及其周围各县相继解放。为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北进军,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原西府地区划分为宝鸡和彬县两个分区。5月8日,经中央西北局批准,成立中共宝鸡地委,书记吕剑人,归中央西北局领导,下辖宝鸡、凤翔、岐山、扶风、眉县、千阳、陇县、凤县八个县委和宝鸡市委。7月11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开始向西安以西之敌发起攻击,在扶(风)眉(县)战役后乘胜追击,于14日解放宝鸡。15日,宝鸡地委进驻宝鸡市城区。

同时设有宝鸡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张育民。下辖宝鸡、凤翔、岐

山、扶风、眉县、千阳、陇县、凤县八个县政府及宝鸡市政府。

11. 中共彬县地方委员会

1949年5月18日,经中央西北局批准,中共彬县地委正式成立,书记杨伯伦。地委初建立时,下设组织、宣传、社会三个部和一个干校。随着各项工作的逐步开展,地委又陆续建立了秘书处、统战部和职工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彬县地委属中央西北局领导,下辖长武、彬县、永寿、乾县、麟游、礼泉、旬邑共七个县委。5月18日以后,礼泉、乾县、永寿、麟游以及彬县和旬邑大部分地区得到解放。地委机关先在永寿、乾县、礼泉一带活动。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撤离乾县、礼泉时,地委机关随之转移到三原一带。6月下旬以后,第一野战军重新收复礼泉、乾县,并相继解放了永寿、麟游、彬县、长武、旬邑各县,到7月下旬,彬县分区所辖各县全部解放,地委机关进驻彬县县城。

同时设有彬县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赵伯经。下辖长武、彬县、永寿、乾县、麟游、礼泉、旬邑等七个县政府。

12. 中共东府地方(工作)委员会、大荔地方委员会

1948年春,西北野战军在西北战场上全线出击。为了适应这一军事行动的需要,加强对东府地区的领导,1948年7月5日,中央西北局决定重新成立中共东府工作委员会。9月初,东府工委在韩城中学正式成立,隶属中央西北局领导,管理平民、朝邑、大荔等县区工作,下辖平(民)朝(邑)工委,并督导韩城、合阳、澄城等县工作。1948年10月,中共平朝工委撤销,朝邑县委成立,归东府工委领导。东府工委机关先在韩城,后移至合阳,没有固定的驻地。东府工委的主要任务是配合西北野战军解放东府地区,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训练开辟新区工作干部。

1948年10月,经过西北野战军发动的荔北战役和冬季攻势,解放了东府大部分地区。1949年2月,奉中央西北局指示,东府工委改为地委,隶属中央西北局领导,下辖蒲城、大荔、朝邑、平民、韩城、澄城、合阳、白水八个县委。地委机关驻地合阳黑池镇。3月4日,大荔、平民等县解放,东府地委机关随之从合阳县黑池镇迁至大荔县城。东府地委更名为大荔地委。3月中旬,胡宗南部沿咸榆公路向渭河以北反扑,西北野战军为了相机歼敌,主动放弃大荔、蒲城等县城,地委机关于3月18日前随主力北撤,重驻合阳县黑池镇,几天之后,又移驻合阳县城。4月底5月初,胡宗南残部在西北野战军的打击

下,败退到渭河以南,大荔分区地方部队乘胜出击,收复大荔分区全境,5月5日,大荔地委机关从合阳县城再度进驻大荔县城。1950年5月1日,大荔地委与渭南地委合并,组成新的渭南地委。

中共东府地(工)委书记、大荔地委书记刘文蔚。

1949年3月,大荔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建立,专员王恩惠。先后下辖大荔、朝邑、平民、蒲城、韩城、合阳、澄城、白水八个县政府。

13. 中共渭南地方委员会

1949年2月下旬,第一野战军向关中国民党统治区出击,两度解放渭南和临潼渭河以北地区。为了迎接渭华地区的解放,3月,中央西北局决定,并报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延安王家坪组建了中共渭华地委。5月8日,任命了渭华地委领导成员。5月9日,地委机关及180余名干部,由秘书长李经纶、组织部长李光业带队,从延安出发南下,于5月20日前在渭南交斜镇与东路工委汇合,布置进城后的接收工作。5月24日地委机关进驻渭南县城。

5月20日,中央西北局决定渭华分区更名为渭南分区,随之,中共渭华地委更名为中共渭南地委。5月下旬,渭南分区各县相继解放。地委建立后,主要抓了剿匪反霸、建党建政、支援前线等工作。截至9月底,全区辖有蓝田、临潼、渭南、华县、华阴、潼关六个县委。1950年5月1日,渭南地委与大荔地委合并,组成新的渭南地委。

中共渭南(华)地委书记白清江。

同时设有渭南(始称渭华)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谢怀德。下辖渭南、临潼、华阴、华县、潼关、蓝田六个县政府。

14. 中共咸阳地方委员会

1949年5月中旬,西安周围各县先后解放,为了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北进军,5月12日,中央西北局决定成立咸长分区及中共咸长地委。5月20日,中央西北局决定将咸长分区改为咸阳分区,咸长地委相应改为咸阳地委。咸阳地委归中央西北局领导。下辖咸阳、长安、兴平、武功、周至、户县6个县委。5月19日,咸阳县解放,接着所辖各县陆续解放,地委机关设在咸阳县城。

中共咸阳(长)地委书记张中。

同时设立了咸阳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吴志渊。下辖咸阳、兴平、武功、长安、周至、户县六个县政府。

15. 中共陕北区委员会

1949年初,西北解放战场逐步由陕北向关中推进。中共中央西北局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在西安解放后将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西北军区迁至西安,在延安成立中共陕北区委员会,领导陕北老区工作。1949年5月5日,在延安王家坪成立了中共陕北区委员会(下称陕北区党委),由13名委员组成。机关驻延安王家坪。陕北区党委隶属中央西北局领导;下辖绥德、榆林、黄龙、三边四个地委和延安、延长、延川、子长、志丹、安塞、甘泉七个县委。与此同时,成立了陕北党校和新华社西北总分社陕北分社。

1949年6月,榆林和平解放,三边重新收复,陕北地区全境解放。7月26日至8月8日,中共陕北区委员会在延安召开了为期12天的党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绥德、榆林、黄龙、三边四个地委和七个直属县委以及陕北军区党委的代表,共计正式代表85名,列席代表42名。会上陕北区党委书记李合邦作了《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报告。陕北区行署第一副主任李景林作了《关于生产建设问题》的报告。会议总结了1948年7月地委书记会议后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讨论了生产建设和军事、保卫、文教等问题。还确定了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总方针和1950年的生产计划。在陕北区党委领导下,陕北老解放区围绕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任务,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使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队伍迅速发展。

同时设立了陕北区行政主任公署,主任曹力如,代主任崔田夫。下辖绥德、榆林、黄龙、三边四个专署和延安、延长、延川、子长、志丹、安塞、甘泉七个县政府。

16. 中共西安市委员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安党组织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1948年12月下旬建立了秘密的中共西安市工作委员会。在西安解放前夕,市工委为西安的解放和接管做了积极的准备。1949年3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了接收西安准备委员会,着手研究、部署解放西安的接管工作。4月16日,市工委提出《关于接收西安的几点意见》,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当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布成立中共西安市委员会,并任命市委正、副书记各一名,市委常委六名,市委委员18名。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贾拓夫。市委隶属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市委成立后,领导展开了接管,安定社会秩序,积极恢复生产,安排人民生活,开展剿匪、反霸、肃特斗争和支前等工作。领导建立了西安市各级党政

组织及各机关和部分工厂、企业、学校的党组织,截至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不久,全市共有12个临时区委,四个党总支部,62个支部,共有党员986人。市委机关驻地先在西安市西华门,后迁新民街。

5月25日,西安市人民政府成立,市长贾拓夫。下辖12个区人民政府。

第二节 国统区的中共组织

一、中共陕西省工作委员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争取和平、民主,制止和反对蒋介石制造内战,侵扰陕甘宁边区南部,中共中央西北局从中共关中地委抽出一批干部,于1946年1月组成中共陕西省工作委员会,领导恢复、发展国统区共产党组织,开展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和武装斗争。中共陕西省工委隶属中央西北局领导。机关驻关中分区新正县(今旬邑县)马栏镇。

陕西省工委根据中央西北局关于“整顿恢复组织,注意发展党员”的指示,向关中和陕南各县派出337名干部,秘密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陕西省工委先后建立了中共蒲(城)澄(城)工委、商洛工委、长(安)柞(水)工委、西府工委、平(民)朝(邑)工委、泾(阳)三(原)工委、富(平)同(关)工委、蒲(城)白(水)工委、东府工委、渭北工委、华(阴)潼(关)工委和陕西(陕鄂)边界工委等12个跨县区的地区工委以及眉县、韩城、渭南3个县委和临潼、高陵、周至、咸阳、凤翔、澄城、耀县、户县、三原、泾阳、乾(县)永(寿)、礼泉等12个县工委。同时与长期失去联系的党员恢复关系,到1946年11月,已经恢复联系的党员达2255名。1946年7月在商洛和关中积极建立武装,开展武装斗争,迎接中原五师突围部队。

1947年2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对陕甘宁边区南部发动大规模进攻。2月19日,省工委驻地马栏镇失守。为了适应战争形势,中共中央西北局于1947年3月7日决定:将中共陕西省工委与中共关中地委合并。关中地委内部设立国统区工作委员会,由地委副书记赵伯平兼任国统区工委书记,专做国统区工作。省工委原来所辖的党组织和游击队,均由关中地委领导。

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先后为汪锋、赵伯平。

二、中共陕西省工作委员会下辖组织

1. 中共蒲(城)澄(城)工作委员会

1945年冬,中共关中地委派张军、杨力生等分别回到蒲城、澄城二县,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统战工作。1946年2月,中共蒲澄工委成立,书记张军,隶属中共陕西省工委领导。机关驻澄城县赵庄镇。领导蒲城、澄城两县党组织和游击队,共有党员100余名。同年9月,蒲白工委成立后,蒲澄工委即行结束。

2. 中共长(安)柞(水)工作委员会

长安县和柞水县地处豫鄂陕边区伸向关中腹地前沿地带,为了配合中原解放军五师在陕南开展游击活动,创建豫鄂陕根据地,中共陕西省工委根据中央指示,在长柞地区党的工作的基础上,于1946年8月成立了中共长柞工委,书记严丕显,隶属省工委领导。长柞工委成立后,在长柞山区及山外先后恢复和创建了红崖子、陈家沟、大荆坪、杜曲、石门岔、夏侯村、汤房庙、临潼行者桥、尹村、桥梓口等十个联络点,有党员30多名。同年8月,中共中央中原局率北路突围部队到达商洛,开辟豫鄂陕根据地,长柞工委奉命受中共中央中原局和陕西省工委的双重领导。9月以后,隶属陕西省工委和豫鄂陕边区五地委领导。翌年2月,五师主力部队撤离陕西,胡宗南部队加紧封锁搜捕,长柞工委撤离山区,停止活动。

3. 中共西府工作委员会

1946年8月,王震率领的从中原突围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到达陕南的留坝等地,接中央命令,计划经陇东返回陕甘宁边区。蒋介石、胡宗南调集19个团的兵力,企图聚歼该部于千阳、陇县一带。为了牵制胡宗南军队,接应三五九旅南下支队返回陕北,并以麟游山区为依托开展游击战争,陕西省工委根据中央指示,于同年8月在新正县马栏镇(今旬邑)组建了中共西府工委(书记赵伯经)和西府游击支队。西府工委隶属陕西省工委领导,机关驻地在新正县马栏镇一带。领导彬县、长武、永寿、乾县、礼泉、兴平、武功、扶风、麟游、岐山、凤翔、宝鸡、千阳、陇县和甘肃省灵台县等地党组织和游击武装,并联系分散的党员。1947年3月,陕西省工委撤销后,西府工委隶属关中地委领导。

4. 中共平(民)朝(邑)工作委员会

1946年9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工委的决定,在朝邑县下鲁坡村成立了中

共平朝工委,书记韩增友,下辖平民、朝邑、大荔、合阳四个县的部分地区党组织。共有党员 200 多名,工委成立时,直属陕西省工委领导。同年 10 月划归中共东府工委领导。

5. 中共泾(阳)原(三原)工作委员会

1946 年 9 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工委的决定,成立了中共泾原工委,书记张中涛,机关驻在耀县寺坡村。辖泾阳、三原两个县工委。1946 年 12 月,泾原工委划归中共渭北工委领导。

6. 中共蒲(城)白(水)工作委员会

1946 年 10 月,中共陕西省工委决定,将蒲澄工委改为蒲白工委,书记张军。工委机关无固定驻地,主要领导成员随西北民主联军第六总队活动,并领导蒲城、白水两县的 50 多名党员开展武装斗争。1947 年 3 月,省工委撤销后,蒲白工委改属中共关中地委领导,关中地委决定将蒲白工委与富同工委合并,组成路东工委。

7. 中共富(平)同(官)工作委员会

1946 年夏秋,中共陕西省工委先后派王徐明、雷炜等分别回富平、同官两县开展党的工作,先后恢复与发展党员 130 名。10 月,陕西省工委书记赵伯平和关中军分区司令员高锦纯,在新正县马栏镇宣布成立中共富同工委,书记雷振东,隶属陕西省工委领导。工委机关活动于富、同交界沿山一带,下辖富平、同官两县交界的党组织。1947 年 3 月,省工委撤销后,富同工委与蒲白工委合并,组成了路东工委。

8. 中共东府工作委员会

1945 年 8 月至 1946 年 8 月,中共关中地委、陕西省工委派罗文治任东府特派员,在韩城、合阳等县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1946 年 10 月,为了有效地开展国统区党的工作,牵制国民党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兵力,中共陕西省工委在马栏镇成立了东府工作委员会,书记苏史青。工委机关没有固定驻地,下辖韩城、合阳、澄城县工委、平(民)朝(邑)工委和韩宜中心区委。至 1946 年 11 月共有党员 367 人。1947 年 3 月以后,东府工委划归中共关中地委领导。

9. 中共渭北工作委员会

1946 年 7 月以后,渭北各县先后建立了党的工作委员会,为了加强对各县的统一领导,经陕西省工委研究决定,于同年 12 月在耀县寺坡村成立了中共渭北工委,书记谈国帆,隶属陕西省工委领导。工委机关 1947 年元旦遭国

民党军队袭击,由耀县寺坡村移驻高高原村。同年2月,由于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工委机关随渭北游击队行动。工委辖中共泾原、泾阳、三原、高陵、临潼、耀县6个县工委,共有党员354人。1947年3月以后,中共渭北工委划归中共关中地委领导。

10. 中共华(阴)潼(关)工作委员会

1945年10月,中共关中地委派刘邦显、王平凡、张万照等回到华阴县恢复和发展地下党组织,1947年2月成立了华潼工委,书记刘邦显。机关设在华阴县定远乡第二中心小学,隶属中共陕西省工委领导。下辖华阴、潼关、大荔三县党组织,有党员70多人。1947年3月,省工委撤销后,华潼工委改属中共关中地委领导。

11. 中共商洛工作委员会

1945年10月,中共关中地委派巩德芳返回商洛地区,恢复和建立武装组织。1946年3月,中共陕西省工委派王力、薛兴军等40余人回到商洛,恢复和建立党组织。同年5月,中共商洛工委在商县青岗坪成立,书记王力,隶属中共陕西省工委领导。主要活动在山阳、商南、商县和今丹凤等四县的中心地带或边境地区。同年8月,中共中央中原局率中原五师突围部队到达商洛,开辟豫鄂陕根据地,商洛工委奉命撤销。

12. 中共陕西边界(陕鄂)工作委员会

1946年冬,中共陕西省工委派黄正甫回到白河县,开展建党活动,先后发展30多名党员。1947年3月,在白河县卡子街建立了中共陕西边界(陕鄂)工委,书记黄正甫。工委主要活动于陕西省白河县和湖北省竹山县的交界地带。

三、中共关中地委所辖组织

1. 中共西府工作委员会

西府工委1946年8月成立,原属陕西省工委领导,1947年3月归关中地委领导。1947年6月,为了加强党在西府地区的工作和便于开展游击战争,中共关中地委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决定原西府工委改组,组成新的中共西府工作委员会,吕剑人继赵伯经任书记。西府工委下辖扶风、礼泉、乾(县)永(寿)、岐山、凤翔、麟游、彬(县)旬(邑)七个县工委以及宝鸡、兴平、长武、武功和甘肃灵台等县党的组织,并联系分散的党员。1948年4月,西府工

委奉命率西府总队随野战部队南下参加西府出击。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西府各县相继解放。4月23日,中央西北局指示,以西府工委为基础成立西府地委,隶属中央西北局领导。原西府工委所属各县划归西府地委管辖。

2. 中共东府工作委员会

东府工委1946年10月成立,原属陕西省工委领导,1947年3月改属关中地委领导,书记苏史青,下辖韩城、合阳、澄城三个县(工)委和平(民)朝(邑)工委、韩(城)宜(川)中心区委。1948年2月,东府工委撤销,工委所属党组织划归黄龙地委管辖。

3. 中共华潼工作委员会

华(阴)潼(关)工委1947年2月成立,原属陕西省工委领导,1947年3月归关中地委领导,书记刘邦显。管辖华阴、潼关、大荔三县党的工作,共有党员七八十人。1948年10月陕西东路工委成立,华潼工委随即撤销。

4. 中共渭北工作委员会

渭北工委1946年12月成立,原属陕西省工委领导,1947年3月归关中地委领导。1947年6月前下辖泾(阳)(三)原、泾阳、三原、高陵、临潼、耀县等六个工委,有党员354名。同年6月,泾原工委撤销,路东工委合并于渭北工委,渭北工委领导成员作了重新调整,原路东工委所辖的同官、富平、蒲城、白水四县工委统归渭北工委领导。1947年9月,原路东工委全体人员和游击支队东去,配合西北野战军四纵队作战。1948年2月,关中地委决定路东工委与渭北工委分开,同、富、蒲、白四县仍归路东工委领导。此时,渭北工委下辖泾阳、三原、高陵、临潼、耀县、咸阳六个县工委,共有党员872名,到1948年12月,中共关中地委为了减少中间环节,加强各县和国统区的工作力量,做好解放陕西全省的准备工作,撤销了中共渭北工委。

中共渭北工委书记先后为谈国帆、张凤岐、郭进亭。

5. 中共路东工作委员会

1947年初,为了发展敌后武装,牵制敌人,关中地委决定成立路东工作委员会。同年3月,路东工委在耀县文王山下成立,属关中地委领导,下辖富平、同官、蒲城、白水四个县(工)委。同年6月,关中地委决定路东工委并入渭北工委。但由于敌人封锁,咸同铁路阻隔,实际上渭北工委并未对路东工委的四个县实行过领导。同年9月,为配合解放蒲城、白水,关中地委决定成立路

东临时工委,属渭北工委领导,临时工委领导成员仍为原路东工委成员。11月,临时工委在白水、同官交界处的瓦渣岭遭到敌军主力“围剿”,工委成员被打散,书记张凤岐辗转回到关中地委,路东临时工委停止了活动。1948年2月,为了配合主力部队出击,关中地委决定重新建立路东工委,直属关中地委领导。下辖蒲、白、富、同四县(工)委。同年6月,中央西北局决定,路东工委改属黄龙地委领导。同年11月,根据中央西北局决定,路东工委撤销。

中共路东工委书记先后为张凤岐、郭廷藩。

6. 中共东路工作委员会

1948年10月,为了做好解放关中东部的组织准备,关中地委在新正县马栏镇成立了陕西东路工作委员会,书记刘邦显。东路工委隶属关中地委领导,下辖华阴、华县、渭南3个县(工)委,有党员830人。1949年3月,渭华地委成立,东路地区划归其管辖,其主要领导成员在渭华地委担任了职务。由于这一地区还未解放,东路工委坚持活动到5月下旬才结束工作。

7. 中共陕西边界工作委员会

1947年3月,关中地委在白河县建立了陕西边界工委。工委成立后,活动于白河和湖北省的竹溪、竹山二县交界地带。1948年4月,白河县解放后,陕西边界工委撤销,工委书记黄正甫参加了县政府的领导工作。

8. 中共西安市工作委员会

1948年12月,中共关中地委决定成立中共西安市工作委员会。当月下旬,经中共中央西北局批准,由韩夏存、崔一民、朱子彤组成中共西安市工作委员会,韩夏存任书记。工委隶属中共关中地委领导,机关驻西安市郭签士巷崔一民家中。1949年5月西安解放时,市工委下辖3个党支部,3个党小组,党员由工委成立时的20余人发展到108人。

9. 中共汉中工作委员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中央西北局统战部从西北党校学员中挑选原国民党三十八军地下党员伍力、高秦生二人派赴汉中,负责领导三十八军系统党员的工作。伍力、高秦生到达汉中后,与隐蔽在当地的赵冠群、薛绍裕等人接上组织关系,于1945年11月在洋县五间桥杜家村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共汉中工委,书记伍力。汉中工委隶属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领导,机关设在洋县江坝啾唔峰小学。

汉中工委成立后,伍力、高秦生分别继续与其他党员建立单线联系,并由

高秦生负责,在三十八军返乡官兵贫雇农中发展党员。到1946年9月,共发展新党员14名。工委依靠党员骨干,以民间组织“孝义会”为掩护,把一批进步青年组织起来,准备在条件成熟时发动暴动。正当组织发展工作和建立武装的工作按计划进行之时,工委成员薛绍裕被国民党逮捕,高秦生遭到追捕。为了防止更大的破坏,保存党的力量,工委于10月决定高秦生返回陕甘宁边区。汉中工委在伍力领导下,在与上级失掉联系的情况下,继续联络地下党员,建立秘密武装,独立自主地在洋县、城固和南郑的北部山区开展秘密活动,曾派人打入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权内部,等待时机成熟时策动武装起义。到汉中解放时,由西北局城工部领导的汉中地下组织共有党员20余人。

第三节 陕南解放区的中共组织

一、中共豫鄂陕边区委员会

1946年6月底,由中共中央中原局代书记郑位三、副书记兼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率领的中原北路突围主力,突破国民党30万大军的包围,于7月23日到达陕西商洛地区。29日,李先念、任质斌率部在今丹凤县花园岭油房村,与前来接应的中共商洛工委书记兼陕南游击指挥部政委王力汇合。此时,中共中央西北局派刘庚也来陕南迎接中原突围部队。8月2日,李先念率部与陕南游击队指挥巩德芳会师后,与巩德芳、刘庚等研究决定,将中原部队与陕南游击队合编,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并向中共中央提出组建豫鄂陕边区党委和军区的建议。8月6日,中央复电“同意以王震为司令员兼政委并兼区党委书记,汪锋为副书记兼副政委,任质斌为第二副书记兼副政委并兼政治部主任,周志坚为副司令员。区党委待汪锋到达后正式成立。在此之前,一切工作均由中原局负责”。9月24日,原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汪锋在今丹凤县大峪乡封地沟主持召开扩大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共豫鄂陕边区委员会。当时,由于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及中原军区直属队一部分已经进入陕甘宁边区,经报中央同意由汪锋任豫鄂陕边区党委书记。随后成立了中共豫鄂陕边区一、二、三、四、五等五个地委。豫鄂陕边区党委机关先后驻今丹凤县封地沟、蔡川、上庄坪、留仙坪、峦庄、石门和河南省的卢氏县兰草、官坡、双槐树、五里川等地。

豫鄂陕边区党委成立以后,在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领导下,创造了豫鄂陕根据地,建立了革命政权,进行了反对敌人“围剿”的斗争。

1947年2月6日豫鄂陕边区党委经请示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同意,中央军委于1947年2月10日复电,边区党委与军区主力于2月20日至3月20日分两批北渡黄河开往山西晋城休整,与此同时,新成立中共陕南工委,继续坚持斗争。1947年7月,部队休整结束,进行整编,豫鄂陕边区党委奉命撤销。

二、中共豫鄂陕边区委员会下辖组织

1. 中共豫鄂陕边区第一地方委员会

中共豫鄂陕边区一地委是中原局于1946年8月8日在镇安县七里峡街建立的。9月下旬,改属豫鄂陕边区党委领导。机关驻镇安县七里峡。地委下辖中共镇(安)柞(水)、商(县)山(阳)蓝(田)边、南宽坪、镇(安)郧(西)旬(阳)、茅坪五个工委和红岩寺县委以及商(县)山(阳)蓝(田)镇(安)柞(水)中心县委。主要活动在镇安、柞水、山阳、蓝田、商县等五个县的边界地区。1947年2月奉命撤销。

书记先后为张树才、萧元礼。

2. 中共豫鄂陕边区第二地方委员会

中共豫鄂陕边区二地委于1946年8月4日在今丹凤县留仙坪成立,书记刘庚,归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9月下旬改归豫鄂陕边区党委领导。机关驻地丹凤县留仙坪,后移驻峦庄。地委下辖中共商(南)洛(南)、卢(氏)洛(南)、商县、商南、山(阳)商(县)、蓝(田)洛(南)六个县委。主要活动在丹江以北的商县、洛南、丹凤、商南、蓝田等五县边界地区。1947年2月奉命撤销。

3. 中共豫鄂陕边区第三地方委员会

中共豫鄂陕边区三地委于1946年8月3日在山阳县中村成立,归中共中央中原局直接领导,9月下旬改归中共豫鄂陕边区党委领导。机关驻地山阳县中村。地委下辖中共商(南)山(阳)、郧(西)山(阳)、郧(西)商(南)、山阳四个县委。主要活动在商南、山阳和湖北郧西三县部分地区的边界地带。1947年2月奉命撤销。书记先后为方正平、王力。

4. 中共豫鄂陕边区第四地方委员会

中共豫鄂陕边区四地委是中共中央中原局于1946年8月上旬在今丹凤县庾家河组建成立的,机关设在庾家河,后移驻河南卢氏木桐沟。同年9月以

后,隶属中共豫鄂陕边区委员会领导。地委下辖六个县委,其中跨商洛地区的有卢(氏)灵(宝)洛(南)、卢嵩两个县委和卢(氏)灵(宝)洛(南)中心县委。主要活动在豫鄂陕边界的秦岭和伏牛山区。1947年2月奉命撤销。书记先后为黄林、韩东山。

5. 中共豫鄂陕边区第五地方委员会

中共豫鄂陕边区五地委是豫鄂陕边区党委于1946年9月下旬在镇安县米粮川成立的,书记汤成功。机关先后设在镇安县七里峡、宁陕县东江口。地委下辖中共长柞工委、东江口中心县委。主要活动在柞水、宁陕、长安三县边界地区。1947年2月奉命撤销。

6. 中共陕南工作委员会

豫鄂陕边区党委在主力部队准备北渡休整之前,于1947年2月5日在河南省鲁山县瓦屋街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陕南工委。工委的主要任务是在边区党委领导机关北渡黄河休整期间,统一领导豫鄂陕边区的斗争。陕南工委成立后,先后在卢氏、洛南、灵宝等县建立了卢灵洛和豫陕工委。1947年10月,陈赓兵团抵达陕南商洛,将陕南工委组建为豫陕鄂边区第二地委。书记刘庚(未到职),副书记王力。

三、中共豫陕鄂区前(后)方委员会

1947年7月,由陈赓司令员、谢富治政委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渡过黄河,挺进豫西、陕南、鄂北地区,开辟了豫陕鄂解放区。7月27日,在太岳解放区首府山西阳城成立了中共豫陕鄂前方委员会,受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中共豫陕鄂前委随陈谢兵团主力强渡黄河后,在豫西、陕南、鄂北地区的30余县建立了八个地委和中共洛阳市工委。其中包括陕西境内的豫陕鄂第二地委和豫陕鄂第四地委。

1947年11月8日,中共豫陕鄂前线委员会在河南南召县召开会议,鉴于中共豫陕鄂前线委员会的主要精力在前方指挥主力部队作战,各地委、专署、军分区建立后,急需对其加强领导,统一开展工作,决定成立中共豫陕鄂后方工作委员会、豫陕鄂行政主任公署、豫陕鄂后方司令部,统一领导豫陕鄂解放区和各地委的工作。11月8日,中共豫陕鄂后委在河南南召县李家店正式成立,后移驻河南省鲁山县耿集。中共豫陕鄂后委受中共豫陕鄂前委领导,先后辖八个地委和中共洛阳市工委。其中包括陕西境内的第二、第四两个地委。

1948年6月,中共豫陕鄂后委与前委同时撤销,所辖党组织分别划归中共陕南区党委和中共豫西区党委领导。

四、中共豫陕鄂区前(后)方委员会所辖陕西境内组织

1. 中共豫陕鄂第二地方委员会

1947年8月下旬,陈谢大军渡过黄河,解放了豫西广大地区。9月下旬,兵团前委遵照毛泽东关于“以一部出陕南、开辟陕南根据地”的电报指示,抽调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刘庚、五十五师副师长孙光和教导团政委杨克,组成中共陕南工作委员会,由刘庚任书记;抽调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教导团陕南籍指战员组成陕南独立团。9月下旬,前委命令刘金轩率四纵十二旅,陈先瑞率三十八军十七师,刘庚、孙光等率陕南独立团三路向商洛进军。9月29日,三路大军会师今丹凤县龙驹寨。10月9日,刘庚等率部在今丹凤县峦庄乡同坚持根据地斗争的陕南工委负责人王力会合,并召开工委扩大会议,研究分析了商洛的政治军事形势,作出了解放商洛的战略决策。11月15日,陕南工委又在陕西丹凤县蔡川干沟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共豫陕鄂前委的决定,陕南工委正式组建为中共豫陕鄂第二地委,王力任书记,刘庚调回三十八军。机关跟随部队,主要活动在长(安)坪(西坪)公路和丹江以北、秦岭以南地区,创建了以今丹凤县留仙坪为中心,包括洛南、龙驹寨、商南和豫西卢氏的淇河、毛河等部分地区的游击根据地。先后下辖三个党支部,三个团党委,商洛武工队和商南、上关两个县委。1948年6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成立中共陕南区委,中共豫陕鄂第二地委改称中共陕南区第二地委,隶属陕南区党委领导。

2. 中共豫陕鄂第四地方委员会

1947年11月,陈谢兵团先后解放了湖北省郧西、郧县等县。中共豫陕鄂前委决定,在湖北郧西县土门镇成立中共豫陕鄂第四地委,机关驻郧西县土门镇。下辖九个县委,其中包括陕西境内山商、山阳、白河和镇安、旬阳以及陕鄂边界的上关六个县委。1948年6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成立中共陕南区党委,中共豫陕鄂第四地委改称中共陕南区第四地委,隶属陕南区党委领导。书记李耀。

五、中共陕南区委员会

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陈(赓)、谢(富治)大军创建了豫陕鄂革命根据

地以后,又向陕南腹地商洛以及豫西、鄂西北进军,在当地党组织以及武装力量的配合下相继建立了八个地委组织,使陕南根据地和豫西根据地连成一片。1948年6月,为了在陈谢大军东进后便于对根据地的领导,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将豫陕鄂边区党委划分为豫西、陕南两个区党委,同属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陕南区党委于1948年6月7日正式成立,书记汪锋。工作部门只组建了一个办公室,下设秘书、组织、宣传、总务、地方工作等五个科。机关驻地湖北郧县。辖中共陕南区第二地委(原豫陕鄂边区二地委)、第四地委(原豫陕鄂边区四地委)。1948年12月,张邦英任第一书记,汪锋任第二书记,区党委机关增设了宣传部,创办了《陕南日报》和陕南公学。培训干部,组织农村工作队,建立农村基层政权。

这期间,原中共豫陕鄂边区第一地委及专署、军分区,曾短时期内划归陕南区党委及行署、军区领导。不久,又划归豫西区党委及行署、军区领导。1949年1月5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今后地委一律以地名命名。”故陕南区党委将中共陕南区第二地委改称中共商洛地委,中共陕南区第四地委改称中共两郧地委。1949年5月20日,中共安康地委成立,隶属陕南区党委领导。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1949年6月,中共中央电令:原属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的陕南区党委改由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1949年7月,中共汉中地委成立。截至1949年9月底,陕南区党委共辖商洛、两郧、安康、汉中四个地委。

六、中共陕南区委员会下辖组织

1. 中共商洛地方委员会

中共陕南区党委于1948年6月7日成立后,中共豫陕鄂边区第二地委改称中共陕南区第二地委,其任务是监视西安门户,牵制敌人,坚持敌后斗争,创建革命根据地,配合中原野战军作战。1949年1月5日,又奉命改称中共商洛地委。机关驻商南县赵川镇,1949年7月移驻商县城关镇原丹江中学。下辖商县、洛南、山阳、丹凤、商南、镇安等六个县委和四个团(队)党委,42个区委,有党员1470多名。书记王力。

2. 中共两郧地方委员会

中共陕南区委成立后,中共豫陕鄂边区第四地委奉命改称中共陕南区第四地委。1948年8月商山县撤销。1949年1月5日,第四地委又改称中共两

郧地委。1949年5月上关县委撤销。同年6月原辖镇安、山阳两个县委划归商洛地委领导,高山、上关两个县委撤销,地委下辖郧西、郧县、房县、竹山、竹溪、均县和陕西白河等七个县委。机关驻郧西县土门镇。书记先后为江震、杨锐。

3. 中共安康地方委员会

1949年5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九军,从湖北省郧阳地区西进,担负解放安康地区的任务。中共陕南区党委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经中共中央中原局批准,于5月12日组建中共安康地委,书记唐方雷,机关驻湖北郧县城关镇。中共安康地委成立后,陕南区党委将原隶属两郧地委领导的白河县委划归安康地委领导。安康地区尚未解放的各县,均由地委组成各县工作队,到各地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开展建党工作。5月底,地委机关移至白河县的裴家河。在建立中共安康地委的同时,陕南区党委决定,报经中共中央华中局批准,安康地区设立安康、汉阴、石泉、紫阳、岚皋、旬阳、平利、宁陕、镇坪九个县委和安康市委,连同先期成立的白河县委,安康地委下辖十个县委,一个市委。到1949年9月底,全区共有党支部16个,党员296名;团支部三个,小组11个,团员150名。

4. 中共汉中地方委员会

1949年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抽调大批干部西渡黄河,支援大西北。同年4月,西北局决定,以到达陕西韩城的晋绥干部和陕甘宁边区准备南下的部分干部为主,建立西北党校韩城分校进行培训。陕南区党委鉴于自己管辖的干部力量不足等情况,请求西北局为汉中配备干部。7月,西北局又决定,将韩城分校部分干部留西安、咸阳和宝鸡工作,大部分随军继续南下,接管汉中,同时决定建立中共汉中地委,隶属陕南区党委领导。地委机关设在宝鸡黄家崖。中共汉中地委成立后即着手筹建南郑、城固、洋县、西乡、褒城、勉县、宁强、略阳、镇巴、留坝、佛坪11个县委。书记白成铭。

第四节 进步团体

抗日战争胜利后,陕甘宁边区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中共中央的亲切关怀和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先后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总工会、西北总工会筹备委

员会、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陕甘宁边区各界青年联合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北区工作委员会、陕甘宁边区民主妇女联合会等群众团体。各群众团体根据自己的特点,积极开展工作,组织领导边区工人、青年、妇女在保卫边区、建设边区、土地改革、政权建设、接管城市、恢复生产诸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成为党与政府强有力的助手,发挥了桥梁与纽带作用。在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中创造了许多典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边区的工会、青年、妇女组织也不断发展、壮大,在新解放区内建立了各系统的下属组织,各群众组织自身也进一步健全与完善。

一、工会组织

1. 陕甘宁边区总工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陕甘宁边区大批干部和工人中的骨干力量,被派往各个新的解放区工作,各级工会组织面临着重新调整的任务。边区总工会要求在各工厂和产业工人较集中的地方,按需要与自愿原则组织工会,并依照不同行业和地区,分别建立工会小组或分会。随着斗争形势发展变化,边区总工会的组织机构更加精干,任务更加具体,党、政、工的关系更加密切。1946年8月16日至18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在延安召开第六届执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执委、工厂厂长、工会主任和劳动英雄等。会议选举七人为常委,崔田夫为主任(后为萧彩峰),高凤山为副主任。边区总工会属中央西北局和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领导。先后下辖晋西北总工会、晋南总工会以及陕西境内的陕北总工会和绥德等分区工会或办事处。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进犯陕甘宁边区,边区总工会暂时停止了活动。1948年4月,延安光复,8月,中央西北局决定恢复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指定马汉山、杜延庆推举干部,重组班子,其主要任务是准备接收城市,筹建西北总工会。1949年5月,正式成立了西北总工会筹备委员会。至此,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结束其历史使命。

2. 西北总工会筹备委员会

1949年5月1日至5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邀请晋南总工会、晋西北总工会、兵工部总工会在延安召开西北工会代表会议,宣布成立西北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并通过《西北总工会章程草案》。筹委会由29人组成。5日,筹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11人为常委,贾拓夫为主任。西北总工会筹委会属

中央西北局和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领导。机关驻地,1949年5月至1949年6月在延安市南关新市场;1949年6月至1949年9月在西安市。筹委会成立后,积极筹备组建各级工会组织,先后下辖晋西北总工会、晋南总工会、陕北总工会及陇东、绥德、宝鸡、三原、大荔、渭南等分区工会或办事处。

3. 各分区工会组织

(1) 绥德分区工会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绥德分区工会继续存在,绥德分区工会先后属绥德地委和陕甘宁边区总工会、西北总工会筹备委员会领导,下辖所属各县的工会组织。机关驻地与绥德分区党政机关相同。主任高凤山。

(2) 西北总工会(筹)三原分区办事处

1949年7月11日,西北总工会三原分区办事处成立。办事处属中共三原地委和西北总工会领导,下辖所属各县工会组织。主任赵应奎。

(3) 西北总工会(筹)宝鸡分区办事处

1949年5月,西北总工会(筹)宝鸡分区筹委会成立,负责工会组织筹建工作。7月29日,经中央西北局正式批准,设立西北总工会(筹)宝鸡分区办事处,主任吴生秀。办事处属中共宝鸡地委和西北总工会领导,下辖所属各县工会组织。

(4) 西北总工会(筹)大荔分区办事处

1949年7月,西北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大荔分区办事处成立。机关驻地大荔县城。办事处属中共大荔地委和西北总工会筹委会领导,下辖蒲城县工会(筹委会)。主任张惠民。

(5) 西北总工会(筹)渭南分区办事处

1949年7月,西北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渭南分区办事处成立。机关驻地渭南县城。办事处属中共渭南地委和西北总工会筹委会领导,下辖华县工会(筹委会)。主任王定邦。

4. 西安市职工总工会筹备委员会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为了尽快建立健全全市工会的统一领导机构,更好地组织领导全市工人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支援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6月21日,中共西安市委职工工作委员会在群众堂召开了西安职工代表会议。到会代表60名,会议讨论并成立了西安市职工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着手筹备召开西安市第一届工人代表大会和建立西安市职工总会。筹备委员

会设委员 29 人,常委 13 人,主任委员 1 人,副主任委员 1 人,朱子彤任主任委员。1949 年 7 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命赵伯平兼任主任委员,原主任委员改任副主任委员。机关驻西安市北大街。

二、青年组织

1. 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陕甘宁边区各界青年联合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陕甘宁边区青年组织仍为青年救国联合会,机关驻延安。为了适应抗战胜利后新形势发展的需要,1946 年 1 月 9 日,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改名为边区各界青年联合会,并制定新时期边区青年运动工作方案。3 月 20 日,中央西北局批准并转发了这一方案,要求各地、县党委配备青年干部,建立各级青联组织。4 月 20 日,边区各界青年联合会在延安召开执委(扩大)会议,对抗战八年中边区的青年工作作了总结,提出青运工作新的任务。会议选出由 11 人组成的临时委员会,王治周为主任。边区青联成立后,先后建立了延属、绥德、三边、陇东、关中、黄龙、西府等分区青联会和所属各县的青联组织,领导和动员边区广大青年参加战前军事训练,维护治安,发展生产,学习文化,开展社会教育,声援和支持国统区青年的爱国民主运动等活动,为 1946 年 10 月以后开展的建团试点工作,从思想上、组织上作了准备。

1946 年 9 月,中共中央发出建团指示,陕甘宁边区青联根据指示精神,在中共中央青委的指导下,于 1946 年 12 月先搞试点,建立了第一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基层组织。

1947 年 3 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侵犯延安,边区青联由延安迁往绥德。边区青联在战争中,进行了扩大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试建工作。在建团工作中,动员广大团员和青年积极参军参战,巩固后方,支持前线,踊跃投入后方的土改和生产运动,在各种运动中发现和培养青年积极分子,壮大团的组织。1948 年 4 月,延安光复,边区青联迁回延安。5 月,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目前青年工作的指示》,要求建团工作和青年运动相结合,在老区团员、青年中开展以学习、生产为主要内容的活动;在新区发动农村青年参加剿匪、反霸、土改、生产和对城镇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工作,为解放西北培养、输送大批青年干部,逐步实现团组织建设的正规化、系统化。

1948 年 7 月,边区青联在延安召开会议,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陕甘宁边区筹备委员会,边区青联工作重点转入团结全体青年参加新民主主义建

设。1950年8月,西北青联成立后,边区青联停止活动。

2.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陕甘宁边区筹备委员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北区工作委员会

1948年7月2日至16日,边区青联会在延安召开各分区青联会主任及延属分区各县青联主任会议,总结近两年的建团工作,确定新的任务。为了加强对边区建团工作和青年运动的领导,会议决定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陕甘宁边区筹备委员会,推举13人为筹委会委员,王治周为代理主任,机关驻延安。先后建立了延属、绥德、三边、关中、黄龙分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委会。

1949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正式决定在全国普遍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简称青年团)。2月,成立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领导的全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委会。这时,青年团在陕甘宁边区60%的区、33%的乡普遍建立,团员总数发展到10063人,共有支部412个,从事建团工作的干部344人。正式建立陕甘宁边区青年团机构的条件已经成熟。1949年3月11日至19日,青年团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到会代表108人。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组织部长马文瑞、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刘景范、西北军区参谋长张经武等先后到会讲话。大会总结了建团经验,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首届代表大会关于当前青年运动的基本任务和继续推进建团工作的决议》,选举由15人组成的新青团陕北行政区委员会,选举七人为常委,王治周为书记。陕北区团委按照边区团代会精神,继续建立和巩固团的组织,领导广大团员、青年医治战争创伤,掀起学习、生产热潮。

随着解放战争迅速发展,新区不断扩大,为充分发挥广大青年的积极性,在青年团省级机构未建立的情况下,中央西北局青年工作委员会及时领导新区建立了各级团组织。

为了迎接大西北的解放,1949年6月,青年团中央和中央西北局决定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北区工作委员会,任命17人为委员,其中7人为常委,罗毅为书记,陈煦为副书记,机关驻西安。团西北区工作委员会领导西北各省(市)的建团工作,广大团员、青年在新区的土改、剿匪、支前、恢复战后经济的各项活动中,充分发挥突击队作用。团西北区工委辖有陕西地区的陕北区团委(包括绥德、榆林、黄龙、三边团地委和直属县团委)、西安市团委和三原、大荔、渭南、宝鸡、彬县分区团地委。

3.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陕北区委员会

1949年3月成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陕北区委员会,直属陕北区党委领导。书记先后为王治周、刘书亭。下辖绥德(书记慕生桂、申效曾)、黄龙(主任张维锦)、三边(主任白纪年)、榆林(书记陈智亮)四个分区和延安等七个县的青年团组织,机关驻延安市。

4. 各分区青年组织

(1) 延属分区青年联合会、青年团延属分区委员会

1946年6月,延属分区青年联合会在延安筹备成立。延属分区青联和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边区青联联合试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先在冯庄建立了第一个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部。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延属分区青联随地委、专署转移。1948年11月,筹备成立青年团延属分区委员会。1949年1月,正式建立青年团延属分区委员会。机关驻延安市东关。先后属中共延属地委和陕甘宁边区青年联合会、青年团陕甘宁边区筹委会、青年团陕北行政区委员会领导,下辖所属各县青年组织。新青团延属分区委员会1949年5月撤销,所辖各县团委划归陕北区团委直接领导。书记先后为袁世富、李经纶。

(2) 绥德青年联合会办事处、绥德分区青年联合会、青年团绥德分区筹委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绥德青年联合办事处继续存在。1946年10月,中央青委和边区青联在绥德辛店二乡试建青年团,1947年底,绥德分区开始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六个县的各个乡村都先后建立了团的小组或支部,团员发展到3400多人。为了加强对全分区团组织的领导,1948年5月,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青年团筹委会宣告成立,隶属中共绥德地委和陕甘宁边区新青团筹委会领导,下辖所属各县青年团组织。主任先后为郝振邦、白炳书、慕生桂。

(3) 三边分区青年联合会、青年团三边分区筹委会

1946年秋,陕甘宁边区青年联合会和中共三边地委决定建立三边分区青年联合会,隶属中共三边地委和边区青联领导。1948年7月,青年团三边分区筹委会成立,隶属中共三边地委、青年团陕甘宁边区筹委会、陕北区团委领导。三边分区青联和青年团筹委会下辖所属各县的青年组织。机关与分区党政机关同驻一地。主任白纪年。

(4) 关中分区青年联合会、青年团关中分区筹委会

关中分区青年联合会1946年6月成立,属中共关中地委和陕甘宁边区青

联领导。1948年7月成立青年团关中分区筹委会,属中共关中地委和陕甘宁边区青年团筹委会、西北局青委领导。下辖所属各县青年组织。1949年4月,青年团关中分区筹委会改称新青团三原分区筹委会。主任杨德厚。

(5) 青年团三原分区工作委员会

1949年4月,青年团关中分区筹委会改称为青年团三原分区筹委会。1949年5月,正式成立青年团三原分区工作委员会。机关与三原分区专员公署同驻一地。青年团三原分区筹委会、工委先后属中共三原地委和中央西北局青年工作委员会、青年团西北工委领导,下辖所属各县青年组织。书记先后为杨德厚、牛其益。

(6) 黄龙分区青年联合会、青年团黄龙分区筹委会

1948年4月,陕甘宁边区青联派出新区青年工作组随边区赴黄龙分区工作队进驻黄龙。6月,成立了黄龙分区青联,主任先后为郭羽才、张维锦。1948年7月,新青团黄龙分区筹委会成立。黄龙分区青联会、新青团筹委会属中共黄龙地委和陕甘宁边区青联会、陕甘宁边区新青团筹委会领导,下辖所属各县青年组织。

(7) 西府分区青年联合会

1948年4月,西府分区青年联合会成立,王维祺代理主任。西府分区青联属中共西府地委和青年团陕甘宁边区筹委会领导,下辖所属各县青联,负责建团和青年运动工作。

(8) 青年团彬县分区工作委员会

1949年8月21日,中共彬县地委决定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彬县分区工作委员会,先后属中共彬县地委和中央西北局青年工作委员会、青年团西北工委领导。机关和地委同驻一地。下辖所属各县新青团组织。负责人先后为王自强、王乃奇。

(9) 青年团大荔分区工作委员会

1949年6月下旬,青年团大荔分区筹委会成立,主任董念黎。8月,根据中央西北局青年工作委员会指示,正式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大荔分区工作委员会。机关驻大荔县城。青年团大荔分区筹委会、工委属中共大荔地委和中央西北局青委、青年团西北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辖韩城、合阳、澄城、白水、大荔、蒲城六个团县(工)委。

(10) 青年团渭南分区工作委员会

1949年6月,青年团渭南分区工作委员会成立。据1949年9月统计,全

区有团支部 20 个,团员 529 人。机关驻渭南县城。团地工委先后属中共渭南地委和中央西北局青年工作委员会、青年团西北工委领导,下辖渭南、临潼、华县三个团县(工)委。书记李经纶(兼)。

5. 共青团西安市工作委员会

1949 年 6 月,中共西安市委、中共中央西北局青委决定,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安市工作委员会,任命韩夏存为负责人。机关驻西安市青年路。

6. 西北民主青年社

西北民主青年社(简称民青),成立于 1945 年 4 月,是中共陕西省工委领导的一个进步青年组织。该组织以西安为中心,在西安周围的十多个县和陕南城固等县,都建有自己的组织,共有社员七八百人。1948 年春,由于国民党的镇压破坏,民青被迫停止活动。民青的领导机构是五人小组。成员有李敷仁、武伯伦、王维祺、张光远、郑竹逸。

三、妇女组织

1. 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陕甘宁边区民主妇女联合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陕甘宁边区妇联合会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1949 年 1 月 26 日至 2 月 10 日,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到会正式代表 82 人,候补代表 1 人。这次会议决定: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民主妇女联合会。她是各界、各民族民主妇女的联合组织,以农村妇女、女工、城市贫民等劳动妇女和知识分子为基本对象。选出执行委员 25 人,候补执行委员 3 人,张子芳为主任,路志亮为副主任;选举出席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 14 人,候补代表 1 人;选举出席西北妇女代表大会正式代表 25 人,候补代表 3 人。

大会结束后,边区民主妇联合会即着手筹建西北民主妇女联合会。1949 年 4 月以后,关中地区陆续解放,边区妇联在关中新解放区大荔、渭南、彬县、宝鸡、三原、咸阳等六个分区设立边区民主妇联合会办事处,一些县市成立了妇联筹委会组织。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关中新区妇女工作蓬勃发展,妇联合会就地培养和提拔 169 名妇女专职干部,充实到分区、县组织中。边区妇联合会先后设有秘书、组织、宣传、生产、福利等部和妇女生产工作委员会、妇女教育文化工作委员会、机关学校妇女工作委员会、保育工作委员会等工作机构。其下属组织在陕西境内先后有:陕北区妇联及延属、绥德、三边、三原、黄龙、西

府、宝鸡、彬县、咸阳、大荔、渭南等分区妇联或办事处。主任先后为白茜、张子芳。

2. 陕北区民主妇女联合会

1949年6月成立了陕北区民主妇女联合委员会,直属陕北区党委领导,下辖绥德、黄龙、三边三个分区和延安等七个县妇联组织,机关驻延安市。主任王锦秀。

3. 各分区妇女组织

(1) 延属分区妇女联合会、延属分区民主妇女联合会

1946年6月,陕甘宁边区妇联会派郝明珠到延属分区工作,随即成立了延属分区妇联会。1947年10月,妇联会和地委机关的家属一同转移到蟠龙镇。12月,妇联会离开蟠龙镇转移到子长县,跟随中央西北局家属队向北转移。这时妇联会机构自行消失。1948年4月,收复延安后,妇联会即于5月重新恢复工作。1949年1月,延属分区妇女联合会改称延属分区民主妇女联合会。1949年5月,延属分区民主妇联会撤销,所辖各县妇联归陕北区民主妇联直接领导。机关驻延安市东关。延属分区妇联会属中共延属地委和陕甘宁边区妇联会(后为民主妇联)领导,下辖所属各县妇联。主任先后为郝明珠、高波、冯世光。

(2) 绥德分区妇女联合会、绥德分区民主妇女联合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绥德分区妇联继续存在,1949年1月,改称绥德分区民主妇女联合会,属中共绥德地委和陕甘宁边区妇联(后为民主妇联)领导,下辖所属各县的妇女组织。机关驻地与绥德分区党政机关驻地相同。主任先后为晓汀、郝明珠、白青山、林薇。

(3) 三边分区妇女联合会、三边分区民主妇女联合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三边分区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改称三边分区妇女联合会。1949年1月,又改称为三边分区民主妇女联合会。三边分区妇联先后隶属中共三边地委和陕甘宁边区妇联(后改称民主妇联)领导,下辖所属各县妇女组织。机关驻地与分区党政机关相同。主任先后为史次峰、白烈飞。

(4) 陕甘宁边区民主妇女联合会三原分区办事处

1949年4月,陕甘宁边区民主妇联会三原分区办事处成立。机关与三原分区专署机关同驻一地,办事处属中共三原地委和陕甘宁边区民主妇联领导,下辖所属各县的妇女组织。主任刘静。

(5)黄龙分区妇女联合会、黄龙分区民主妇女联合会

黄龙分区妇女联合会于1948年4月成立,1949年1月改称为黄龙分区民主妇女联合会,隶属中共黄龙地委和陕甘宁边区妇联会领导,下辖所属各县妇女联合会。主任先后为林枫、王锦秀。

(6)陕甘宁边区民主妇女联合会宝鸡分区办事处

1949年7月,陕甘宁边区民主妇联会宝鸡办事处成立,隶属于中共宝鸡地委和陕甘宁边区民主妇女联合会领导,下辖所属各县妇女联合会。

(7)陕甘宁边区民主妇女联合会彬县分区办事处

1949年9月,陕甘宁边区民主妇联会派李晋昭到彬县分区开展妇女工作,负责筹建陕甘宁边区民主妇联会彬县分区办事处。1949年12月,陕甘宁边区民主妇女联合会彬县分区办事处正式成立。负责人李晋昭。

(8)陕甘宁边区民主妇女联合会大荔分区办事处

1949年6月初,陕甘宁边区民主妇女联合会大荔分区办事处成立。机关驻大荔县城。办事处属中共大荔地委和陕甘宁边区民主妇联会领导,下辖韩城、澄城二个县妇联会(筹委会)。主任先后为梁山、李康。

(9)陕甘宁边区民主妇女联合会渭南分区办事处

1949年6月,陕甘宁边区民主妇联会渭南分区办事处成立,机关驻渭南县城。属中共渭南地委和陕甘宁边区民主妇联会领导,下辖渭南、蓝田、华县、潼关四个县妇女联合会。负责人雷田颖。

4. 西安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

1949年6月4日,中共西安市委妇女委员会召开了西安市各界妇女代表座谈会,应邀参加会议的代表200多人。代表们建议成立西安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6月26日,各界妇女代表76人集会,成立了西安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着手筹备召开西安市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建立西安市民主妇女联合会。会上曹冠群就成立市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的意义和主要任务讲了话,陕甘宁边区妇联主任张子芳到会讲话,号召西安妇女组织起来,加强团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会议选举产生了筹备委员会委员25名,常委11名,主任1名,副主任2名,曹冠群当选为主任。机关驻西安市后宰门。

第二章 革命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除了陕甘宁边区以外,党又在鄂豫陕边境地区先后创建了豫鄂陕根据地和豫陕鄂根据地,最终迎来陕南地区的最后解放。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及边区政府领导人仍为高岗、林伯渠。参议会及边区政府机关驻延安。边区政府下辖延属、绥德、三边、关中四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1945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选举工作指示。乡、县、边区三级政权从是年10月到1946年春进行改选。在边区三级“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自由无拘束的、秘密投票的选举”基础上,1946年4月2日至27日召开了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到会正式议员121人,候补议员21人。参议会通过了经济、文化等建设方案和“三年经济建设计划”等提案。参议会选出常驻议员12人,高岗为议长,谢觉哉、安文钦为副议长;第三届边区政府委员35人,林伯渠为主席,刘景范、杨明轩任副主席。边区政府除管辖原有的延属、绥德、三边、关中四个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外,又于1946年11月新设了榆横政务委员会。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胡宗南军队进犯延安时,陕甘宁边区政府撤离延安。为适应战争要求,边区后方党政机关两度进行战时整编,至1948年初,边区政府工作机构最后确定为秘书处、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粮食局、保安处、高等法院八个部门和战时临时成立的后方委员会等六个委员会。在自卫战争中,边区政府曾多次转移,1948年2月,边区政府移驻绥德。延安光复后,边区政府于5月13日迁回延安。1947年8月,成立榆林地委的同时也成立榆林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8年1月,黄龙地区大多数县城解放,黄龙地委与黄龙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也同时成立。至此,陕甘宁边区政府共辖陕甘宁解放区陕西境内延属、关中、绥德、三边、榆林、黄龙六个分区

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1948年2月中旬至3月初,宜川、瓦子街战役以后,陕甘宁边区政府设立了西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1949年2月8日至17日,举行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政府委员及晋绥代表联席会议,会议根据抗战胜利后高岗去东北工作的情况,决议由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习仲勋代理议长,在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因事暂离边区期间,由副主席刘景范代理主席职务,增选边区政府委员15人。会议接受晋绥行署及晋绥临时参议会的提议,将晋绥边区划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统一领导,原晋绥行署撤销,分别成立晋西北、晋南两个行署。5月8日,边府决定下设13个厅、行、处等工作部门,并任命了领导人。边区政府除秘书处及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保持原建制外,建设厅改为农业厅,保安处改为公安厅,西北农业银行改为中国人民银行西北区行;新增工商、交通、公营企业等三个厅和西北财经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解放前夕,边区政府在延安又设立留守委员会和整编委员会两个临时机构。

1949年5月,西安及关中各县相继解放,陕甘宁解放区相继增设了宝鸡、彬县、大荔、渭南、咸阳等5个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关中专署改为三原专署。同时,为了完成接管新区的中心任务,支援第一野战军解放大西北,边区政府南迁西安。为加强老区工作,在延安成立了陕北区行署,管辖榆林、三边、绥德、黄龙四个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及原由延属分区管辖的七个直属县。

第二节 豫鄂陕革命根据地

豫鄂陕革命根据地是解放战争时期由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率领的北路突围部队与中共陕南工委、陕南游击队共同创建的。

豫鄂陕根据地,以商洛地区为中心,包括现河南省的淅川、西峡、卢氏、洛宁、栾川、灵宝、嵩县,湖北省的郧西、郑县,陕西省的山阳、商南、丹凤、商县、洛南、镇安、柞水、宁陕、旬阳、汉阴、石泉、安康、蓝田、长安等县的中心地带或边境地区,所辖面积约7600余平方公里,辖区人口约200多万。根据地内先后建立了5个分区、24个县、55个区、100多个乡人民政权。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分四路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挑起了全面内战。26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率中原解放军分南北两路向西突围。其中北路突围部队由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中原局代书记兼军区政委郑位三和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率领,由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和第二纵队十三旅、十五旅之四十五团、三五九旅、干部旅等部队组成。7月11日,北路突围部队到达内乡以南师岗地区时,决定分兵两路,左路由李先念、郑位三领导经南化塘、漫川关一线,向宁陕方向前进;右路由王震领导,取道荆紫关、山阳,向镇安、柞水前进,并分别进入陕南地区。

在中原部队突围过程中,党中央于7月15日电示中原局:“胡宗南有强兵节节堵击,北上很难通过。且牵制大批敌军,在敌后创立根据地,是我中原军的光荣战略任务。”同日,中央军委根据中共陕西省工委的报告,也向李先念、郑位三、王震通报了陕南游击队的情况。指出陕西工委在商县、洛南、山阳、柞水、卢氏之间,“今年搞起数部武装,现统一归巩德芳(党员)指挥”,“已有边区派出50余名干部帮助发展,积极活动准备建立根据地”。同时,中央也具体指示“考虑是否可能在陕南建立临时根据地”。7月22日,中央再次通报陕南游击队三个大队的活动地区,指出:“上述地区在联系陕北与中原区,在配合华北斗争上,以及对于我们在鄂豫陕川甘边创造新根据地,陕南地位是很重要的”。并指示,以一部分队伍编入游击武装作为骨干,“使陕南地方斗争较快地发展起来,创造较大地区的游击根据地”。根据中央指示,中原局于7月16日、23日相继在淅川县王窑一个树林里和商南县白鲁础召开会议,讨论在陕南建立根据地问题。1945年冬,中共陕西省工委派巩德芳到商洛,统一了分散的地下党组织,争取了十多股与地方政府对立的地方武装。1946年5月,中共商洛工委成立,6月,成立陕南游击队指挥部,开辟了以龙驹寨(今丹江凤县城)南北二山为中心,北至河南卢氏县境,南至湖北郧西县关防、大小石门一带,东西约200华里的“隐蔽根据地”。29日,李先念部在丹凤县花园岭油房村与中共商洛工委书记、陕南游击队指挥部政委王力接上关系,8月2日在丹凤县留仙坪与陕南游击队指挥部指挥巩德芳部会师,正式开始创建豫鄂陕根据地,并决定将豫鄂陕根据地划分为三个分区。其中,一分区以王震所率之三五九旅分散活动于安康、柞水、蓝田、临潼以西地区,郭鹏任司令员,王恩茂任政委;二分区以黄林所率河南军区部队和陕南游击队两个大队活动于西荆公路以北,陇海路以南,巩德芳任司令员,黄林任政委;以汉水以北、丹江以南为三分区,方正平任司令员,张树才任政

委,统一指挥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五团及三十七团一个营和陕南游击队一部。将三十七团两个营和陕南游击队两个大队组成两个支队,向蓝田与洛南间进军。接通与陕北来往的交通线。

一分区王震所部于8月2日袭占镇安县城后,即将部队分散于镇安、柞水、宁陕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此时,国民党胡宗南急调重兵从南、北、东三面压来,企图围歼三五九旅于洵阳坝、关口、太山庙地区。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三五九旅继续北进,经镇原、宁县、正宁,寻路打回陕甘宁边区。在陕甘宁边区部队的接应下,9月17日,王震部胜利到达延安。

鉴于王震部北上,中原局对一、三分区的干部作了调整,并决定将原三个分区划为四个分区。8月3日,三地委和军分区在山阳县中村吴家坟园召开有3000人的军民大会,宣布成立山阳、郧山、商山县委和人民政府。18日,三分区领导人方正平、张树才向中央报告了银花、中村建立政权的情况。21日,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将银花、中村建立政权、组织地方武装经验通知各部照办,愈快愈好。一地委和军分区先后在山阳县、商县、镇安县宣布成立了中共南宽坪工委、中共商山蓝工委和中共镇郧旬工委和政权机关。二分区以商县北宽坪为中心,成立商洛县,并相继成立了中共商县、商南县、卢洛县委和县政府。四分区成立了中共卢灵洛县委和县政府。至8月27日,已成立11个县(工)委。9月1日,中原局就豫鄂陕边区各分区所辖地境和干部配备,发出通令:任命吴世安、张树才、萧元礼、曾广泰分别为一分区司令员、政委、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巩德芳、丁先国、薛兴军、刘庚、邹顺华分别为二分区司令员、副司令员、第二副司令员、政委和参谋长;周光策、齐勇为、方正平、许道琦为三分区司令员、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政委和政治部主任;黄林、张忠为、闵学胜、许子威、张水泉、吴钊同为四分区司令员、副司令员、政委、副政委、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各分区所辖区内之游击队,属该分区领导指挥。

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汪锋奉中央命令,到陕南主持豫鄂陕边区工作,9月18日到达中原局,22日,中原军区奉中央军委电令,任命文建武为豫鄂陕军区司令员,汪锋为政治委员,陈先瑞、方正平、张树才、夏农苔、魏国运分别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副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副政治部主任、参谋处长,豫鄂陕军区正式成立。9月24日,豫鄂陕区党委在封地沟西沟老院(今丹凤县大峪乡)召开扩大会议,宣布区党委成立。根据8月26日李先念的提议,中央批准汪锋任书记,文建武、陈先瑞、方正平、张树才、夏农苔、魏国运为委员。至9

月底,全边区已建立了四个地委和四个军分区,郟山、山阳、商山、商洛、镇郟旬、山商、卢灵洛、卢嵩、长柞、南宽坪、卢洛灵、商山蓝、郟商等 17 个县委(工委)、县政府(或办事处),数十个区乡党委和政府,包括 20 个县的中心地带或边境,其中陕西境内有山阳、商南、丹凤、商县、洛南、镇安、柞水、宁陕、旬阳、蓝田、长安等 11 个县。地方武装已扩大到 2000 多人,县区都建立有武装组织,有的乡还有游击队。豫鄂陕边区党委和军区的建立,标志着根据地的正式创立。

豫鄂陕根据地的创立,自然引起了国民党严重的不安。1946 年 8 月下旬,国民党从洋县、鄂西等地调来正规军九个团,配合 11 个保安团队,共 5 万多人,于 9 月上旬开始对边区进行第一次“清剿”。9 月 1 日,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电中央,提出反“清剿”的原则是:基本采取分散游击方针;基本采取内线作战方针,以保卫地方政权;作战对象主要是地方武装及保安团。9 月 2 日,中央军委复电:“完全同意你们的计划。”指出:“作战时,着重打保安团,只要你们用各个击破方法歼灭大部分保安团,顽正规军即被孤立,那时再打正规军不迟”,“你们一般应避免这些正规军,专门打保安团,如能够将 11 个保安团歼灭大部,根据地即可建立。”

根据中央批准的反“清剿”战略战术,各分区广泛出击。据不完全统计,在 9、10、11 三个月反“清剿”的斗争中,全区进行较大战斗 20 多次,毙俘国民党团长以下 1500 余人。仅 11 月份,就缴获重机枪 23 挺、长短枪 677 枝。

豫鄂陕边区党委和军区成立后,中原局和中原军区负责人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任质斌、戴季英先后调回延安。10 月上旬,边区党委在蔡川上庄坪(今属丹凤县)召开会议,认真讨论了贯彻李先念等离开根据地时指示的具体措施,调整了各地委的领导班子:一地委书记萧元礼,副书记胡达明;二地委书记刘庚;三地委书记王力;四分区由黄林任地委书记兼政委,闵学胜任司令员。突围到鄂西北的二纵十五旅四十三、四十四团奉命入陕归建。于 9 月下旬在柞水、宁陕以西建立了第五分区,汤成功任地委书记兼政委,王海山任司令员。经区党委提议,中央于 10 月 19 日批准成立豫鄂陕行政公署。中央任命:汪锋兼行政公署主任,陈守一任公署秘书长,同时建立了 4 个专员公署和 1 个办事处,领导着 21 个县级政权和 56 个区、100 多个乡级人民政权。周季方、薛兴军、余益庵、张旺午分任一、二、三、四分区专员。第一专员公署下辖郟镇、镇郟旬、镇柞、商山蓝等四个办事处和红岩县政府。机关无固定地

点;豫鄂陕边区第二专员公署于1946年10月成立,下辖商县、卢洛、蓝洛、商南、山商五个县民主政府及商洛一个县政府。管辖区域在丹江以北的商县、洛南、丹凤、商南、蓝田等县边界地带;豫鄂陕边区第三专员公署于1946年10月成立,下辖商山、郟商、郟山、山阳等县民主政府。管辖范围在镇安、柞水、山阳、蓝田、商县等五县边界地区;豫鄂陕边区第四专员公署于1946年10月下旬在河南卢氏县木桐沟成立,下辖六个县政府,其中跨商洛地区的有卢灵洛县政府、卢灵洛中心县政府和卢嵩县民主政府。管辖范围东起豫西洛宁县上戈,西至陕西洛南县巡检、石坡,南至皖西西峡县桑坪、黄沙,北到豫西灵宝县朱阳关;豫鄂陕边区第五分区办事处于1946年10月在宁陕县东江口成立,主任陈任远。机关无固定驻地。上述四个专员公署和办事处于1947年二三月间奉命撤销。在区党委的领导下,还曾建立了蓝洛、栾川、东江口县(工)委和县政府及中共茅坪工委,使所辖县扩大到21个,游击武装发展到5000余人。在不断扩大根据地的同时,党组织深入发动群众,领导秋收,减租减息,帮助部队解决给养。边区还先后制订了关于征收公粮的方案,对敌封锁经济之政策,解决群众食宿的办法及1947年度预算等政策、方针,使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有了新的发展。

国民党第一次“清剿”失败后,于11月下旬又发动了第二次“清剿”,为其重点进攻陕北扫清道路。国民党先后调集9个正规旅和17个保安团由边区的西、东、南三面压缩,国民党所到之处,烧毁民房,大肆抢劫粮食,封锁交通集镇。在军事上,采用分区“清剿”,反复“扫荡”的战术,要把根据地一块一块吃掉。边区党委领导全区军民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动员党政军各级干部,帮助群众解决食宿困难。组织大小商人到敌区办货,组建新的货物交换场,发动群众代我购货。根据中原局“化整为零,又善于化零为整”的原则,针对国民党“清剿”的态势,作出《关于建设野战支队的决定》,集中歼灭来犯之敌。1947年1月上旬,军区调集二、三、四分区主力5000余人,组成野战纵队,黄林、方正平、夏世厚、翁可业分别任司令员、政委、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为将国民党军引出内线,野战纵队即向豫西之南台、鲁山地区转移,在外线打击国民党军,扩大根据地。此期,又建立了中共卢灵洛中心县、卢灵县和卢灵洛工委。从1月16日到27日的10天之内,消灭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营,全歼内乡保安八团两个营、一团一个营和二团全部,连克栾川、庙子、两镇、栾川县的唐营寨和嵩县的大章街。为配合野战纵队东进,各分区在内线的部队向西行动。经40多天的奋战,完成

了牵制敌人,掩护野战纵队东进河南的艰巨任务。

野战纵队东进后,国民党三个旅亦紧跟进入豫西。1947年2月4日,区党委在河南鲁山县瓦屋街开会决定,将主力撤至黄河以北休整,待机南返。2月6日,报告中央:“为使这支主力不致打坍,便于长期坚持豫鄂陕边区游击战争,为此提议主力北渡休整,留当地游击队坚持此间斗争,主力待机南返。”2月10日,中央军委复电:“你们决心北渡甚好,但须作充分准备,战胜敌人堵击、截击。”“要有战胜困难,战胜危险的充分准备,才能胜利到达太岳。”野战纵队从鲁山县的土门、瓦屋街和嵩县的东村等地出发,经临汝、汝阳、伊川等县,于2月20日在新安县刘皇岭地区北渡黄河,开往山西晋城休整。其他分区2000多人,于2月下旬组成第二野战纵队。于3月19日在新安县曲沃镇北渡黄河,与先期到达山西晋城的野战纵队会合。

在野战纵队渡河休整之前,边区党委于2月5日,成立了中共陕南工委及陕南指挥部,以刘庚、巩德芳、王力、薛兴军、赖春风为工委委员,刘庚任工委书记兼指挥部政委,巩德芳任指挥部司令员。统一领导和指挥豫鄂陕边区的斗争。

1947年2月初,国民党调集27个团的兵力,对我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围剿”、“合击”。国民党进入边区后,移民并村,组织保甲,恢复旧政权,烧杀抢掠。根据地军民在陕南工委的领导下,坚持与之进行了极其英勇而顽强的斗争。

7月下旬,豫鄂陕军区主力7000余人奉命改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二纵队,赵基梅任司令员,文建武任政委(因病未到职,后由刘建勋担任)。由500多名陕南干部、战士于4月在晋城组建的豫鄂陕军区教导团与西北民主联军三十八军教导大队合编为三十八军教导团。

中原北路突围部队与陕南游击队共同创立的豫鄂陕革命根据地,从1946年7月15日起,到1947年7月25日止,正式存在了一年零一个月之久。

第三节 豫陕鄂革命根据地

1947年春,豫鄂陕军区主力部队北渡黄河休整,根据地处于短暂的革命低潮。7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第九纵队、第八纵队一部和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组成作战集团,执行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建立豫陕鄂根据地的任务。

1947年7月27日,在山西阳城成立了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下的中共豫陕鄂前方委员会。前委成立后即决定:四纵十二旅和三十八军十七师即刻进击陕南。

8月23日,四纵十二旅从河南济源县小教口强渡黄河,三十八军十七师由山西平陆县茅津渡、马沙涧渡过黄河,进入豫陕鄂地区。9月4日,中央军委电示陈赓、谢富治:“全军都要有在豫西、陕南、鄂北建立根据地的决心。”9月10日,十二旅攻克河南卢氏县城。15日,陈赓、谢富治报告中央军委:十二旅主力出商南或荆紫关及龙驹寨,我们决将教导团(汪锋所带)配合十二旅先入洛南、商县一带游击,并与当地游击队联系。16日,三十八军政委汪锋、军长孔从周宣布,中共豫陕鄂前方委员会决定由刘庚、孙光、杨克三人组成新的中共陕南工委,书记刘庚;将三十八军教导团原陕南籍干部战士组成陕南独立团,由陕南工委领导配合主力挺进陕南。十七师渡河后西进抵潼关县南原善车峪,歼国民党一个团部又两个营,24日向商洛进发。29日,十二旅、十七师、陕南独立团与原陕南指挥部领导的游击队,四路军胜利会师于龙驹寨。同日,各路的领导人在商洛镇召开联席会议,商定:十二旅进入丹江以南开辟根据地,十七师留丹江以北牵制敌人,策应四纵其他部队在豫西展开。

这时的陕北战场,王震部两个旅向蒲城、白水以北推进,彭德怀率六个旅攻击延长、延川、清涧国民党守军,与陕南形成南北两翼呼应。国民党见已出现南北夹击西安之势,急调六十五师增援商洛。国民党六十五师于10月1日向龙驹寨一带进犯。我十二旅、十七师阻击后东撤卢氏五里川、朱阳关休整,牵制国民党六十五师于商洛山区,使其既不能进攻陕北,又不能回援中原。此时,陕南独立团在中共陕南工委领导下,于丹江南北山区积极发动群众,建立游击根据地。

10月9日,中共陕南工委在今丹凤县峦庄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丹江北豫陕边的卢氏、洛南、商县、商南结合部,恢复和建立根据地。首先从陕南独立团第三连抽出一个排组成第一武工队,在青棉沟、留仙坪、蔡川区域活动,建立了青棉沟区民主政府。后又以陕南独立团第四连一个排组成第二武工队,在灰池子、桃坪、峦庄等地活动,成立了桃峦区民主政府。接着成立了第三武工队,在涌峪、双槽、申家沟等地活动,建立了楸树坪区民主政府。11月,豫陕鄂边区第二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在卢氏县兰草东川成立,王力任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孙光任军分区司令员,石金河任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副专员(后由王杰任专员)。中共陕南工委撤销。二分区党政军组织的活动范围

为商南、商县、洛南、蓝田、华阴、华县、潼关、临潼、渭南九县全部或边境地区。下辖商南县民主政府。

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向陕南各县展开,建立根据地”的指示,11月11日,十二旅三十五团、三十六团在张奎、叶茂荣游击队配合下解放山阳县城。中共山阳县委、山阳县民主政府成立,何文俊为县委书记,邓浩然为县长。12日,十二旅三十四团解放山阳县漫川关镇与湖北省郧西县上津镇。次日,中共上关县委、上关县民主政府成立,王直夫任县委书记,宋景先任县长。17日,三十六团解放镇安县城。次日,中共镇安县委、镇安县民主政府成立,希庄任县委书记,李忠正任县长。12月25日,三十六团东进至山阳县照川地区。中共山商县委、山商县民主政府在石佛寺成立,王友常任县委书记,任友恩任县长。此时,经豫陕鄂前委批准,成立了豫陕鄂根据地第四分区的党政军组织。书记李耀,专员张明(后杨锐),司令员孙光。豫陕鄂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下辖鄂陕边界的上关县和陕西境内山商、山阳、白河、旬阳、镇安等县政府。

随着各分区组织的建立,急需对其加强领导,统一开展工作,前委决定成立中共豫陕鄂后方工作委员会、豫陕鄂行政主任公署、豫陕鄂后方司令部。先后下辖八个分区和洛阳市,陕西境内有第二、第四分区。豫陕鄂根据地的建成使国民党极为恐慌。10月18日,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发出指令,成立以商县、山阳、洛南、商南、镇安、柞水、蓝田等七县为区域的“西荆地区清剿总指挥部”,谢辅三为总指挥,“区内专员、县长、地方团队以及担任清剿之部队均归其统一指挥”。国民党先后调集六十五师、八十四师、一三五师、十七师,以及白青云等地方团队万余人,不断地进行残酷的“清剿”。根据地的军民与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清剿”斗争,不断发展和巩固根据地。12月中旬,六十五师一部向栾庄区进犯,二分区部队即采用“能打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术,分股歼敌。共牵制国民党正规军及地方保安团队5000余人,直接与之作战17次,毙伤俘敌近百名;在地方工作方面,摧毁了国民党部分行政机构,建立了一批区、乡、村民政权,并重点进行土改,打击了农村封建势力,将没收的财物和征集的粮食,救济贫苦农民。四分区的山阳、镇安、上关、山商等县经过一年的艰苦斗争,共建立19个区民主政府和100多个农村基层政权。

1948年5月,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将豫陕鄂根据地划分为豫西和陕南两个行政区域。6月,中共陕南区委、陕南区行署和陕

南军区同时成立,区委书记汪锋(1948年12月,张邦英任第一书记,汪锋任第二书记)、行政公署主任汪锋、司令员刘金轩。行署下辖陕南区第二专署、第四专署(由豫陕鄂第二、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改称)及1949年建立的安康分区专员公署(专员王廷佐)、汉中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毛凤翔)。

第三章 军事组织

在解放战争中,陕西除少数地方外,绝大部分地方是通过战争的形式解放的。在陕北和关中战场,主要参战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陕南战场主要是中原解放军和晋冀鲁豫解放军。华北野战军十八、十九兵团由晋入陕作战,在保卫关中地区和解放陕南战斗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武装迅速发展壮大,在解放全陕西的斗争中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一节 正规部队

在陕西战场,国民党胡宗南部、青海马步芳部、宁夏马鸿逵部是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在军队的数量和装备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相反,初期陕甘宁解放区只有两万余人的野战部队。国共两党的军队在陕西战场上进行了激烈的较量,有的地方几经易手,但人民军队最终赢得了胜利。

一、陕甘宁解放区陕西地区的军事组织

1.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西北军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形成两个前线,分为两个战略区。晋绥前线称晋绥军区,下辖晋绥军区和晋绥野战军所属部队,归中央军委、中共中央西北局直接指挥和领导;陕甘宁前线仍沿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番号。联防军司令部驻延安市。在贺龙司令员赴晋绥前线指挥作战后,由王世泰代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高岗代理政委(关向应因病不能坚持工作)。高岗、谭政、徐向前先后调东北和晋冀鲁豫军区工作后,中共中央军

委即任命王世泰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下辖教导第一旅、教导第二旅、新编第四旅、警备第一旅兼关中军分区、警备第三旅兼三边军分区、第三八五旅兼陇东军分区、延属军分区、绥德军分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总兵力3.2万余人,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1946年3月至4月间,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精神,进行精简和整编,先后裁减了10个团、12个营、67个连,复员2700人。调整部队序列,合并领导机构,将教导第一旅旅部与教导第二旅旅部合并,改称教导旅;将第三八五旅并入警备第三旅。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整编后为五个旅: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新编第四旅、新编第十一旅、教导旅。这次调整缩编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共有2.8万余人。当时,国民党军不断对边区进行侵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部队在陕甘宁边区人民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从1945年9月至1946年6月,共粉碎国民党军队向陕甘宁边区200余次的袭扰和进攻。1947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晋绥军区再度划归陕甘宁晋绥联防军(1948年3月,改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建制,仍由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兼任政委。下辖晋绥军区及直属关中军分区(警备第一旅兼)、绥德军分区、延属军分区、三边军分区(新编第十一旅兼)、陇东军分区、警备第三旅和骑兵第六师。1949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改称为西北军区,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先后下辖晋绥军区、晋南军区和西北军区军事政治大学以及延属、绥德、三边、榆林、陇东、关中、黄龙、西府、彬县、宝鸡、三原、咸阳、大荔、渭南等14个直属军分区。1949年4月,晋绥军区所属的绥蒙军区划归华北军区建制。5月,晋南军区并入晋绥军区,另成立晋西北军区、陕北军区。陕北军区下辖榆林、黄龙、三边三个军分区和延安等七个县武装部或大队,司令员先后为张达志(未到职)、吴岱峰、牛书申(代理),政委李合邦。西安解放后,西北军区司令部由延安迁到西安。7月,将警备第二旅改编为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8月,西北军区司令部迁至甘肃省兰州市。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将起义的国民党二十二军第八十六师改编为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师。晋绥军区所辖军区及军分区划归华北军区建制。

2. 陕甘宁野战集团军、西北野战兵团、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

1947年2月,为了统一指挥和提高作战能力,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进驻陕甘宁边区的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辖新编第四旅、教导

旅、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等部，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集团军司令部机关驻延安市。全军共6个旅，2.8万余人。集团军建立时，中共中央军委确定的基本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与敌在延安东北的山区周旋，使敌陷入疲惫、缺粮之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时机，集中兵力在运动中逐批加以歼灭，以粉碎敌人的进攻。同时决定调晋绥军区第二纵队西渡黄河加入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序列。1947年3月13日，集中在西北的国民党军队34个旅2.3万余人，分由南、西、北三面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进攻。3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所有陕甘宁解放区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统归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习仲勋指挥，成立西北野战兵团，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番号。在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彭德怀直接指挥下，西北野战兵团从3月25日至5月4日，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歼敌1.4万余人，给胡宗南集团以沉重打击，稳定了陕北的战局。1947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简称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任副司令员（翌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任命赵寿山为西北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委。在此之前，即7月23日，经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同意，成立了中共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书记彭德怀。西北野战军下辖：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原晋绥军区第三纵队，8月调归西北野战军建制）及教导旅、新编第四旅和骑兵第六师，全军约5万人。西北野战军于8月6日至9月16日进行了榆林战役、沙家店战役、关庄、岔道口战役，共歼敌3.1万余人，由防御转入进攻。趁此时机，西北野战军在所属各部队中进行了以“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和群众练兵运动，为转入战略反攻进行充分的思想准备与战术技术准备。1948年2月，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先后取得宜川、瓦子街战役和西府、陇东等战役的重大胜利，创造以相等兵力进行歼灭战并一次歼敌五个旅的范例。

1949年2月，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命令，西北野战军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简称一野），机关驻延安市，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第四纵队、第六纵队、第七纵队、第八纵队，依次改编为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四军、第六军、第七军、第八军，各纵队所辖旅改编为师，每个军辖三个师，每个师辖三个团。一野司令部还直辖骑兵第一师、

第二师。4月,华北野战军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奉命由晋入陕,调归第一野战军建制。在山西作战的第一野战军第七军也随同归建。5月,第一野战军司令部迁往西安。为适应战争发展形势和向大西北进军的需要,在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及第七军全部到达西安、三原地区时,第一野战军请示中共中央军委同意,6月中旬成立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第一兵团辖:第一军、第二军、第七军;第二兵团辖:第三军、第四军、第六军。5月至9月,第一野战军先后进行陕中、扶(风)眉(县)、兰州、宁夏、河西等战役,相继解放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国民党军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政府主席包尔汉,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率所属军政人员7.6万余人,于1949年9月25日和26日,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分别通电起义。至此,西北五省全部解放。8月,第一野战军司令部迁至甘肃省兰州市。

3. 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

1946年4月28日,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再次成立,隶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和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司令员由王世泰兼任。机关驻延安市。

4. 延安卫戍委员会

为了加强延安卫戍工作,1945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以杨尚昆、李克农、马文瑞、阎揆要、周兴、刘海滨、谢怀德组成卫戍委员会,司令员阎揆要。卫戍委员会主要任务是领导延安卫戍司令部工作。1946年7月撤销。

5. 陕甘宁边区各分区军事组织

(1) 延属军分区

1945年11月,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命令,以延安卫戍司令部为基础,成立延属军分区兼卫戍司令部,建立健全了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以及其他科室。因人员增加,机关驻地由延安市东关迁到王家坪至清凉山之间的俄文学校。军分区除辖各县自卫军外,又征集3000兵员,于1946年2月组成三个独立营,由军分区直接指挥。卫戍司令部主要任务是负责市区周围百里以内警戒工作,保卫中共中央和边区领导机关的安全。1946年7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决定撤销延属军分区,所辖部队改编为教导旅独立团。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大举进犯延安,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立即派白寿康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陕甘宁第一军分区,组编所属各县游击队。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中支援西北野

战军主力作战。12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决定以第一军分区主力组成警备第四旅,下辖三个团,即十团、十一团和十二团。此时,第一军分区与警备第四旅没有分设。在此期间,第一军分区部队除配合西北野战军主力西进外,还在富县、甘泉、黄陵、延安等地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第一军分区机关主要活动于延安、安塞、子长地区。1948年4月21日收复延安,第一军分区又兼任了延安警备区司令部。1948年5月,警备第四旅随主力部队行动。6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命令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副处长李启明兼任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组成新的第一军分区。7月,骑兵第六师撤销,师部带100多编余干部回延安与第一军分区合并,充实第一军分区各组织机构。11月,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命令,骑兵第六师余部南下,充实加强黄龙军分区和准备组建大荔军分区。此时,第一军分区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延安军分区,下辖各县武装部。1949年5月,延安军分区撤销,所辖警卫营、补充营和各县武装部划归陕北军区直接领导。延属军分区兼卫戍司令部、第一军分区、延安军分区,先后属中共延属地委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西北军区领导。司令员先后为王宝珊、郭宝珊、李启明,政委先后由李景膺、白清江兼任。

(2) 绥德军分区

1945年8月,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独一旅奉命调离绥德警备区,绥德警备司令部改为绥德军分区,王季龙任司令员。军分区下辖第十、十一团,1946年3月,缩编为第一、二、三营。机关驻绥德城内,先后归中共绥德地委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西北军区领导。1946年6月,吴岱峰接任司令员。1946年10月,将各独立营扩编为警备第四团和第六团。1947年3月,国民党调集23万军队对陕甘宁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当月即侵占了延安、绥德等地,并继续北犯。绥德军分区机关撤离绥德县城,8月下旬迁回绥德县城。1947年4月,根据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命令,将四团、六团整编为独一旅并兼绥德军分区,归西北野战军指挥。1947年10月,第二次攻打榆林时,归第三纵队指挥。同年11月,绥德军分区司令员由张达志接任,吴岱峰任副司令员。独一旅于1948年3月至4月间在内蒙古连打两个胜仗后,因粮食供给困难,又回师神木。不久,独一旅改为陕甘宁边区警二旅。这时军分区下辖第四、第六、第十团、侦察大队,不久新编了第五团。1948年春以后,由于当时特殊的战争环境,绥德军分区虚设,实际已不复存在。绥德军分区政委先后由白治民、张邦英兼任。

(3) 三边军分区

1945年10月,国民党十一旅起义后,改编为八路军新编第十一旅。1946

年1月,警备第三旅调防陇东(留八团、骑兵团)后,撤销三边警备区,为统一指挥三边地方部队,成立三边军分区,由新编第十一旅兼。1947年春,三边自卫战争爆发后,新编第十一旅一团团长赵级三率部叛变,警备八团在定边下暗门战斗中失利。4月,撤至吴旗县凤凰寺与新编第十一旅二团合编为二八团(撤销新编第十一旅番号),在定边南部山区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到1948年春,二八团又分编为二团和八团,不久,二团改称定边县游击一大队,八团调防陇东。至此,三边军分区只领导骑兵团和各县游击大队。警三旅兼三边警备区司令部、新编第十一旅兼三边军分区,先后属中共三边地委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西北军区领导。1949年5月陕北军区成立后,三边军分区归其领导,辖盐池、定边、靖边、安边、吴旗五个县大队。1949年9月27日撤销。机关驻地:1945年8月至1947年4月在定边县城;1947年4月至1949年5月在吴旗镇。司令员先后为贺晋年、曹又参,政委先后由王世泰、高峰、郭炳坤、朱敏兼任。

(4) 关中军分区

1945年8月,警备第一旅旅长兼关中军分区司令员王世泰调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工作,高锦纯接任司令员。1947年初,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侵占延安以后,企图打通咸榆公路,封锁黄河,消灭中共主力于陕北,因而对关中分区进行反复“清剿”。为配合西北野战军主力军队对敌作战,关中地委将关中地区划分成西府、渭北、直属三个游击区,领导各县开展游击战争。1947年1月,以关中军分区三团部分人员为基础,成立南线指挥部。指挥张占云,政委吕剑人,南线指挥部所辖主力董策丞起义部队与边区南几县武装力量配合,牵制、打击、摧毁胡宗南在关中的军事力量。1947年3月,中共陕西省工委并入关中地委,原由陕西省工委领导的渭北游击总队改属关中地委和关中军分区领导。1947年9月,关中军分区决定成立路东工委同级军事组织——路东临时指挥所。1948年2月,路东临时指挥所改为路东游击总队。1948年初,高锦纯带警备第一旅大部离开关中,关中部队仅剩一个警卫连和西府、渭北、路东游击总队。1948年4月,中共西府地委成立后,西府游击总队划归西府地委和军分区领导。1948年6月,中共路东工委划归中共黄龙地委领导,路东游击总队亦改属黄龙军分区领导。关中军分区属中共关中地委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西北军区领导。1949年4月,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区将关中军分区改称三原军分区。关中军分区司令员先后为高锦纯、陈国

栋,政委先后为张德生、高锦纯、赵伯平、杨伯伦兼任。

(5)三原军分区

1949年4月,关中各县相继解放,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区指示,关中军分区改称三原军分区。渭北游击总队下属游击队,分别划归为各县武装力量,由三原军分区领导。同年8月,成立三原军分区党委。三原军分区属中共三原地委和西北军区领导。司令员黄子祥,政委白治民。

(6)榆横军分区

为了配合西北野战军对榆林国民党二十二军的进攻,建立革命政权与地方武装部队,榆横军分区与中共榆横特委于1946年10月同时成立。榆横军分区属中共榆横特委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领导。1947年12月,榆横军分区与榆横特委同时撤销。司令员吴岱峰,政委先后为高朗亭、朱侠夫。

(7)榆林军分区

1947年8月初,西北野战军发起对榆林外围的攻击,为配合西北野战军的军事行动,中央西北局决定立即成立榆林军分区。榆林军分区成立后,下辖佳县、镇川独立营和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子洲、横山七县游击队,武工队部分整编为步兵三十九团归其管辖。8月12日,国民党援军迫近,当晚西北野战军撤离榆林。1947年11月2日,再次围攻榆林,组建榆林军分区,张达志任司令员,但随着战局的突变,西北野战军随即撤出榆林外围,榆林军分区停止工作。1948年秋,榆林国民党守军已处在四面包围之中,为加强解放榆林的工作,年底,中央西北局确定再次组建榆林军分区,榆林军分区于1949年2月正式重建。原晋绥第一军分区部分干部调榆林军分区工作,军分区机构逐步健全,辖步兵三十九团、神府支队和直属侦察连、骑兵连共计2345人。榆林军分区先后属中共榆林地委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西北军区领导。机关驻地随军事活动不固定。1949年5月,陕北军区成立后,榆林军分区归陕北军区直辖。下辖侦察连、骑兵连、步兵三十九团、神府支队及分区领导的榆林市大队和榆林、神木、神府、府谷、横山、镇川(以后撤销)等六个县军事组织。机关设在镇川堡,后迁至榆林城内解放中巷。

司令员先后为张达志(未到职)、吴岱峰、王心瑀,政委先后为刘长亮、朱侠夫。

(8)黄龙军分区

1948年2月,为了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中央西北局决定成立黄龙军分

区,司令员牛书申。军分区成立后,从教导队中抽出一批武装骨干力量,以原黄南游击总指挥部指挥的韩城、澄城、合阳、黄龙四个县的游击武装为基础,整编为五支游击队。到1949年,游击武装发展到九个支队,队员近万人。全区解放后,除留一部分人员帮助地方建设人民政权,维护社会治安,清剿土匪外,大部分改编为第一野战军两个正规团。黄龙军分区先后属中共黄龙地委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西北军区领导。1949年5月,黄龙军分区改属陕北军区领导。下辖黄龙、富县、宜川、宜君、黄陵、洛川等六个县大队。司令员先后为牛书申、王宝珊,政委先后为强自修、黑志德。

(9)西府军分区

1948年4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决定在西府游击总队的基础上,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府军分区。主要任务是统一、协调和领导西府地区的武装力量。西府军分区隶属中共西府地委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西北军区双重领导。下辖第一、二、三、四、五支队和长武、宁太游击大队和教导队。西府军分区与西府总队,是两个牌子,一套机构,建制相同。设有司令部、政治部、供给处及卫生队、警卫排等。总计700余人。司令员赵伯经,政委李景膺(兼)。

(10)宝鸡军分区

1949年5月,西府分区分为彬县、宝鸡两个分区,宝鸡军分区随之建立。宝鸡军分区由原西府军分区(西府总队)第一、四支队、教导队一部和扶风、岐山、凤翔县大队以及原关中军分区第二十一团两个连组建而成,共1000余人。军分区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直属有教导队和特务连。军分区属中共宝鸡地委和西北军区双重领导,下辖宝鸡、凤翔、岐山、扶风、千阳、眉县、陇县、凤县八个县大队。司令员陈国栋,政委吕剑人(兼)。

(11)彬县军分区

1949年5月,西府分区分为彬县、宝鸡两个分区,彬县军分区随之建立。此时,彬县分区尚未全部解放,军分区和地委、专署机关一起转战在永寿、乾县、礼泉、三原一带。1949年7月下旬,彬县分区全部解放,军分区移防彬县县城。彬县军分区属中共彬县地委和西北军区双重领导,下辖所属各县大队、中队、支队。司令员赵伯经,政委杨伯伦。

(12)大荔军分区

1949年2月下旬,东府军分区在合阳县成立,3月,更名为大荔军分区,杨拯民任司令员,军分区机关设有司令部、政治部等,机关移驻大荔县城。大荔

军分区隶属中共大荔地委和西北军区领导。下辖路东总队、二十二团(1949年5月下旬划归渭南军分区领导)、朝邑支队(1949年7月中旬划归西北军区领导)和韩城、合阳、澄城、白水、蒲城、大荔、朝邑、平民八个县大队,共有兵员3200多人,1949年7月军分区设立了党委。1950年5月,大荔军分区与渭南军分区合并。司令员杨拯民,政委刘文蔚(兼)。

(13)渭南军分区

1949年3月,渭华军分区在延安王家坪组建,5月20日更名为渭南军分区,于占彪任司令员。5月下旬,军分区率领二十二团向渭南、临潼、蓝田等县城逼进,在地下党组织的配合和策动下,守卫渭南城的国民党渭潼警备司令武纬率部起义,渭南、临潼等地和平解放。5月24日,军分区机关进驻渭南县城。军分区的主要任务是收编和改造旧军队,协助地方党、政建立政权,巩固政权,肃清境内反动武装,建立和扩大人民武装。军分区机关设有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1949年5月,军分区设立了党委。军分区属中共渭南地委和西北军区领导。下辖二十二团和渭南、临潼、华县、华阴、潼关、蓝田六个县大队。1950年5月,渭南军分区与大荔军分区合并,组成新的渭南军分区。司令员于占彪,政委白清江(兼)。

(14)咸阳军分区

1949年5月18日,西北军区决定成立咸长军分区,5月20日,改称咸阳军分区。6月6日,中央西北局决定,成立咸阳军分区党委,王权任书记。军分区、军分区党委属中共咸阳地委和西北军区领导,下辖咸阳、长安、兴平、武功、周至、户县六个县大队。司令员王宝珊,政委先杨和亭(兼)后张中(兼)。

6.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市警备司令部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5月21日,中央军委任命张经武为西安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徐立清为政委(后为赵伯平)。5月25日,西安市警备司令部正式宣布对外办公。警备司令部工作机构设有政治部等九个处。机关驻西大街。

二、陕南解放区的军事组织

1. 豫鄂陕军区

1946年8月2日,李先念率部与陕南游击队巩德芳、西北局派来的刘庚,在丹凤县花园岭油房村会合后,决定将中原部队与陕南游击队合编,在豫鄂

陕军区未正式成立之前,分别在陕西镇安、丹凤和山阳县成立了一、二、三、四军分区,以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9月22日,中原军区奉中央军委电令,任命文建武为豫鄂陕军区司令员,汪锋为政治委员,豫鄂陕军区正式成立。9月底,在陕西柞水县建立了第五军分区。军区机关驻陕西丹凤大峪乡封地沟,后移驻丹凤县蔡川乡上庄坪。隶属中原军区领导。

1947年2月4日,豫鄂陕边区党委与军区主力部队,经中共中央军委同意,于2月20日北渡黄河,开往山西晋城休整。在主力部队准备北渡休整之前,为了继续坚持根据地的游击战争,豫鄂陕边区党委于2月5日在河南省鲁山县瓦屋街召开会议,决定成立豫鄂陕军区陕南指挥部,任命巩德芳为司令员,刘庚兼政委。主要任务是在军区领导机关随主力部队北渡黄河休整期间,统一指挥豫鄂陕边区内的军事斗争。陕南指挥部成立以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决定将游击队化整为零,坚持对国民党军队的斗争。1947年9月,与陈赓兵团会合,陕南指挥部奉令并入豫陕鄂第二军分区。

1947年7月25日,豫鄂陕军区主力7000余人,经过休整补充后,奉命改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二纵队,赵基梅任司令员,文建武任政委(因病未到职,后由刘建勋担任)。

2. 豫鄂陕军区下辖组织

(1) 豫鄂陕军区第一军分区

中原突围北路主力部队进入商洛地区后,第二纵队十三旅三十八团奉命到达山阳、镇安两县边界一带分散开展游击战争。1946年8月4日,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决定,以三十八团为基础,建立豫鄂陕军区第一军分区。8月8日,第一军分区在镇安县七里峡成立,隶属豫鄂陕军区领导。机关无固定驻地。下辖手枪队和五个支队、镇郃旬支队、镇旬游击大队、十五支队。主要活动于镇安、旬阳、山阳、商县、蓝田等县的中心地带和边界地区,1947年2月奉命撤销。司令员吴世安,政委由张树才、萧元礼兼任。

(2) 豫鄂陕军区第二军分区

为了适应创建豫鄂陕边革命根据地的需要,1946年8月3日,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决定,将中原军区三十七团两个营与陕南游击队一部合编,成立豫鄂陕军区第二军分区,并任命巩德芳为司令员。当日,豫鄂陕军区第二军分区在今丹凤县留仙坪成立。机关无固定驻地。随着武装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经过整编,先后下辖商县支队、蓝洛支队、商洛支队、商南支队和古城支队

等五个支队。主要活动于蓝田、商县、龙驹寨、荆紫关之线以东、以北，陇海路以南，豫陕省界以西地区。1947年2月奉命撤销。司令员巩德芳，政委刘庚兼。

(3) 豫鄂陕军区第三军分区

1946年8月3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决定，以分散活动于鄂陕边中原突围北路主力部队为基础，建立豫鄂陕军区第三军分区。主要任务是统一、协调和领导鄂陕边地区的武装力量。当日，豫鄂陕军区第三军分区在山阳县中村吴家坟成立，隶属豫鄂陕军区领导。下辖四十五团、商山支队、郟商支队、郟山支队、山阳支队等。主要活动于西荆公路沿线以南之山阳、漫川关、上津，沿小汉水之线以东、汉水以北地区。1947年2月奉命撤销。司令员周光策，政委由方正平、王力兼任。

(4) 豫鄂陕军区第四军分区

豫鄂陕第四军分区于1946年8月在今丹凤县庾家河成立，下辖第六团、第七团、第八团和洛北支队，主要活动在河南省的卢氏、灵宝、嵩县、栾川和陕西省的洛南、丹凤边界地区。1947年2月奉命撤销。司令员先后为闵学圣、黄林，政委黄林兼任。

(5) 豫鄂陕军区第五军分区

豫鄂陕军区第五军分区于1946年9月在镇安县七里峡成立。下辖十五旅、三支队、六支队、九支队、长柞游击队、东江口中心游击大队和机关支队，主要活动在西安、柞水、镇安、旬阳之线以西、汉水以北、川陕公路以东地区。1947年2月奉命撤销。司令员王海山，政委汤成功兼任。

(6) 豫鄂陕军区第一野战纵队

1946年12月8日，豫鄂陕军区调集二、三、四军分区主力5000余人，成立豫鄂陕军区第一野战纵队。黄林任司令员，方正平兼政委，集中部队向豫西之南召、鲁山地区挺进，争取打开一个新局面。纵队由豫鄂陕军区直接指挥，下辖第五、六、七、八、九、十等六个支队。1947年3月，第一野战纵队在军区司令员文建武、政委汪锋的率领下，北渡黄河休整，到达山西省晋城后撤销。

(7) 豫鄂陕军区第二野战纵队

1947年2月，豫鄂陕军区第一野战纵队北渡黄河后，陈先瑞、韩东山奉命收拢内线部队，于1947年3月6日在河南洛宁县熊耳山西侧，宣布成立第二

野战纵队,陈先瑞任司令员,韩东山任政委。下辖一、四、七支队。20日,二纵队北渡黄河,到达山西省晋城后撤销。

(8) 豫鄂陕军区陕南指挥部

豫鄂陕军区陕南指挥部,是豫鄂陕边区党委率部实行战略转移行至豫西时,于1947年2月5日决定成立的,其任务是在豫鄂陕军区率部北渡休整期间,统一指挥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游击战争。指挥部无固定驻地。下辖11个游击队,主要活动在今丹凤和山阳、商县边境地带隐蔽指挥,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斗争。1947年9月下旬奉命划归新的建制后即行撤销。司令员巩德芳,政委由刘庚兼任。

3. 豫陕鄂后方司令部

1947年11月,陈谢兵团主力挺进豫西后,先后创建了七个军分区。为了加强对各军分区的统一领导,中共豫陕鄂前委在南召县李家店召开会议,决定成立豫陕鄂后方司令部,代行军区职权,并负责筹建豫陕鄂军区。11月下旬,豫陕鄂后方司令部在鲁山县正式成立,机关驻地在鲁山县城。豫陕鄂后方司令部隶属中共豫陕鄂前委领导,下辖八个军分区,其中包括在陕西境内的第二、四军分区。1948年6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成立豫西、陕南两军区,豫陕鄂后方司令部同时撤销,所属各军分区分别划归陕南军区和豫西军区领导。

4. 豫陕鄂后方司令部下辖陕西境内组织

(1) 豫陕鄂第二军分区

豫陕鄂第二军分区,是奉陈谢兵团前委之命,于1947年11月中旬在陕西丹凤县蔡川干沟成立,隶属豫陕鄂后方司令部领导,机关随部队在陕南一带活动,下辖陕南独立团和第一、第二、第三武工队及商洛武工队,随着斗争形势变化和军队的成长壮大,陕南独立团改编为独立第五团,第一、第三武工队合并为商洛武工队,并又新建了独立第四团。这些军事组织主要活动在今丹凤、洛南、商南、山阳及河南的卢氏、西峡等县边境地区。1948年6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将豫陕鄂第二军分区改称陕南第二军分区,隶属陕南军区领导。司令员孙光,政委王力(兼)。

(2) 豫陕鄂第四军分区

1947年11月,豫陕鄂第四军分区在湖北郧西县土门镇成立,下辖各县大队,独立团、营。1948年6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将豫陕鄂第四军分区改称陕南第四军分区,隶属陕南军区领导。司令员刘金轩,政委李耀(兼)。

5. 陕南军区

1948年6月,以原十二旅机关为基础,加上三十八军一部分干部组成陕南军区,军区机关驻郧县城关镇。下辖十二旅、十七师和第二、第四两个军分区。1949年1月,第二、第四两个军分区改称商洛、两郧军分区。陕南军区成立时未成立军区党委,在一个时期内陕南区党委代行了陕南军区党委的工作,直到1950年春才正式建立了军区党委。

1949年5月1日,奉第二野战军前委命令,以陕南军区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九军(兼陕南军区)。第十九军下辖五十五师(原十二旅)、五十七师(原十七师)及商洛、两郧、安康三个军分区。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1949年5月11日,中共中央电令,原属中原军区领导的陕南军区改由西北军区领导。同时,中央军委和第二野战军也发出指示,十九军(兼陕南军区)归第一野战军指挥。为了解放全陕南,并策应关中战场的攻势,十九军开始向西南进军。5月24日,汉中军分区成立。经过六个多月的连续作战,于同年12月解放了陕南各县(除镇坪县外)。此时,共解放县城43座,组建了商洛、两郧、安康、汉中四个军分区。

司令员刘金轩,政委先后为汪锋、张邦英。

6. 陕南军区直辖部队

1948年6月,陕南军区成立以后,开始直辖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二旅(旅长薛克忠,政委谭友夫)、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师长张复振,政委梁励生)。1949年5月,在陕南军区奉命改编为第十九军(兼陕南军区)的同时,下辖的十二旅改编为五十五师(师长符先辉,政委张明)、十七师改编为五十七师(师长张复振,政委张文彬)。

7. 陕南军区下辖组织

(1) 商洛军分区

1948年6月,陕南区党委成立后,豫陕鄂军区第二军分区奉命改称陕南军区第二军分区,1949年1月,改称为商洛军分区。分区机关驻商南县赵川镇,1949年7月,移驻商县县城西街城隍庙。地委仍兼有商洛军分区党委的职能,随军实施领导。下辖陕南军区第四团、第五团和商洛武工队、流岭武工队和六个县的独立营、支队,分区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达5557人。司令员孙光,政委王力兼任。

(2) 两郧军分区

1948年6月,陕南区党委成立后,豫陕鄂第四军分区改称陕南军区第四

军分区,隶属陕南军区领导。1949年1月,陕南区第四分区更名为两郟军分区。两郟军分区1949年5月以前,下辖四个独立团和各县武委会、独立营及大队、支队。5月1日,上关独立团划归安康军分区,郟白独立团改编为第十九军五十五师一七一团;其它所有地方武装先后统一改编为独立一、二、三团,直属军分区指挥。司令员先后为刘金轩、符先辉、梁励生,政委先后为张明、江震、杨锐。

(3)安康军分区

1949年5月23日,建立了安康军分区,隶属陕南军区领导,机关驻湖北省郟县城关,军分区下辖一个独立团,五个独立营。8月初,军分区机关进驻白河县裴家河。司令员谭友夫,政委唐方雷兼任。

(4)汉中军分区

1949年5月24日,经中共中央西北局批准,汉中军分区在西安北郊建立,隶属陕南军区领导。同年8月,军分区机关和汉中地委、汉中专署机关移防宝鸡黄家崖后,又成立了中共陕南军区汉中军分区党委。司令员张涛,政委白成铭兼任。

第二节 地方武装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国统区的各级组织采取各种形式发动群众,建立了陕南游击队、西府总队、渭北总队、路东总队、长柞游击队等武装组织,并在陕北南部、关中的36个县建立了游击武装。人民武装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配合解放军作战,消灭反动地方武装,摧毁国民党基层政权,有力地牵制和打击了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动摇了国民党在陕西的反动统治,为解放陕西国统区做出了很大贡献。

1. 陕南游击队指挥部

1945年10月,中共关中地委派巩德芳返回商洛地区,恢复和建立武装组织。巩德芳回商洛后,集中分散的武装力量,并吸收张奎、谭道鹏等与国民党政府相对抗的民间武装,使游击队得到很大发展。1946年5月,中共商洛工委成立后,加强了对游击武装的领导。6月上旬,陕南游击队指挥部在商县留仙坪(今属丹凤)成立,巩德芳任指挥,王力任政委,薛兴军任副指挥,下辖三个大队和一个独立大队,1000余人枪。陕南游击队活动于北至河南卢氏境,

南至湖北郧西关防、大小石门一带,东接豫鄂边境,西到商县黑龙口牧护关的区域内,建立起以龙驹寨南北二山为中心的“隐蔽根据地”,准备对付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内战。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向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原解放军北路突围部队按中央指示向陕南突围。陕南游击队为迎接中原部队做了各种准备,并派出部队四处接应。8月2日,商洛工委、陕南游击队与中原北路突围部队在留仙坪会师,决定两支队伍合编,创建豫鄂陕根据地。陕南游击队指挥部撤销,所辖武装编入豫鄂陕边区新的建制。

2. 西府游击支队(总队)

1946年8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工委决定,在成立中共西府工委的同时,成立了西府游击支队。西府支队司令员兼政委赵伯经,副司令员刘懋功,由西北局调的干部和关中警一旅的两个加强连组成,共300余人。西府支队成立后,即奉命随西府工委越过国民党封锁线,奔赴麟游山区开展游击活动,牵制国民党胡宗南部对从中原突围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的压力,接应三五九旅安全返回陕北。西府支队顺利完成任务后于9月下旬撤回马栏,原警一旅人员仍回原部;干部队除部分人员在马栏学习整训外,其余骨干派赴西府各县开展地下斗争,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1947年6月,为了配合陕甘宁边区自卫战争,扩大党在西府地区的武装力量,西北局决定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府游击总队,司令员赵伯经,政委吕剑人兼,副司令员董策成。总队辖五个支队和一个教导队,700余人。1948年4月,西府总队随西北野战军参加西府出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决定,在西府总队的基础上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府军分区,统一协调和领导西府地区的武装力量。西府军分区司令员赵伯经,副司令员张占云、董策成,政委李景膺兼,副政委吕剑人兼,下辖五个支队、一个教导大队和长武、宁太游击大队。1949年5月,西府军分区结束工作,分别建立了宝鸡军分区和彬县军分区。

3. 长柞游击队

1946年9月10日,中共长柞工委在长安县小峪寨沟发动起义,建立长柞游击队。长柞工委委员李志中任队长,下辖3个小队,有队员40多人。长柞游击队成立后,活动于长安、柞水交界地区,发动群众,搜集情报,筹集粮食,配合中原解放军北路突围部队创建豫鄂陕根据地。1947年2月,主力部队北渡黄河休整,长柞工委和游击队停止活动。

4. 渭北游击总队

1946年12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工委决定,在成立中共渭北工委的同时,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渭北游击总队,谈国帆任司令员兼政委,受渭北工委领导。渭总成立后,即调集临潼、三原、耀县的几支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关中地委与陕西省工委合并后,关中地委为了统一指挥各地武装力量,于1947年5月决定成立渭北游击总队司令部,并对所属武装组织进行改编。司令员谈国帆,政委先后为谈国帆、张凤岐、郭进亭,副司令员黄子祥、张占云,受关中军分区和渭北工委双重领导,下辖五个支队和三原、耀县两个独立中队。同年6月,路东工委合并于渭北工委,同官、富平、蒲城、白水四县的武装力量划归渭北游击总队领导。10月,渭北游击总队下辖十个支队和耀县独立中队,1100多名指战员。1948年2月,路东工委与渭北工委分开,所属武装力量亦相应分开,渭北游击总队下辖五个支队和一个独立中队。1948年12月渭北工委撤销后,渭总直属关中军分区领导。在渭北工委存在的两年间,渭总及所属组织从100多人发展到千人左右,在渭河以北和淳、耀西北部的广阔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949年5月以后,渭北各县已经解放,渭北游击总队所属各支队分别被编入西北军区所属部队或县的地方武装。

5. 路东总队

1947年9月,为了配合西北野战军第二、第四纵队开辟黄龙山区,根据关中军分区指示,路东临时指挥所成立,周有才任军事指挥,中共路东临时工委书记张凤岐兼政委。隶属关中军分区,下辖富平、同官、蒲城、白水、挺进等五个支队和关中军分区独立营。11月,临时指挥所在同官、白水交界的瓦渣岭遭国民党军主力“围剿”,成员失散,后辗转回到边区,临时指挥所停止活动。1948年2月,为配合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反攻,在重新成立中共路东工委的同时,关中军分区成立了路东总队,未设总队长,郭廷藩任政委。路东总队隶属关中军分区,下辖七个游击支队,至5月发展到1280多人。6月,路东总队改属黄龙军分区领导。同年11月,路东工委撤销,路东总队仍在黄龙军分区领导下活动。

6. 洛川县地方武装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洛川县工委将工作重点转到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上来,先后组建了洛川县游击三大队(1946年6月成立,大队长雷治国)、洛川县城北游击大队(1946年12月成立,大队长师志春,政

委杜军)、洛川游击支队(1947年5月成立,支队长王根发,政委杨西林)等地方革命武装,在黄龙山区和洛川东南原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7. 宜川县地方武装

1946年4月,为了在宜川开展游击战争,中共洛川工委从教导队中抽调一批骨干力量,成立了宜川支队,队长谭守荣,政委薛天敏。宜川支队在中共宜川县工委的领导下,打击国民党地方政权及武装,牵制国民党正规部队的兵力,支持和配合陕甘宁边区的自卫战争。1947年10月21日宜川县城第一次解放后,宜川支队随县工委进驻县城。后由于国民党反扑,宜川支队随西野四纵转移。11月,支队遭损失后组织解体。

8. 黄龙县地方武装

解放战争时期,黄龙党组织遵照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在黄龙山区全面发动游击战争的指示,先后组建了朱志英支队(1946年5月成立,支队长朱志英,指导员张景春)、黄龙游击支队(1946年8月成立,支队长周庆财,政委孟树林)、徐善有游击队(1946年8月成立,队长徐善有)、姚金山支队(1946年8月成立,队长姚金山,政委先后为刘善斌、许增珍)、李玉山支队(1947年9月成立,支队长李玉山,教导员杨峰)、黄龙支队(1947年9月成立,支队长贺生高,政委薛禹庵)、黄龙县大队(1947年10月黄龙第一次解放后成立,景志仁代理大队长兼政委)等地方武装,在黄龙山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摧毁国民党基层政权,打击前来“清剿”的国民党正规军。

9. 中部县地方武装

1946年8月,为了牵制国民党胡宗南部的兵力,迎接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返回陕甘宁边区,中共中部县(今黄陵县)工委组建了中部第一游击支队,队长郭景荣,指导员傅秦川。一支队成立后,县工委决定抽调部分骨干组成武工队,由韦明海任队长,到田庄、北谷地区发展武装力量,开展对敌斗争。后因武装暴动失利,武工队受到较大损失。10月,县工委组织失散的人员,成立了中部第二游击支队,队长雷治启,指导员李建斌。1947年2月,县工委将一、二支队合编,成立了中部游击支队,支队长先后为雷治启、米生发,政委冯力生兼。支队下辖3个中队,队员初为100多人后发展到300余人。同年4月,中部支队配合警一旅、警三旅首次解放隆坊镇,歼敌300余人,切断了进犯延安之敌的交通运输线。1948年3月上旬,中部支队配合西北野战军二次解放隆坊镇。3月10日中部县解放后,中部支队进驻县城,稳定社会秩序,保卫

新生的人民政权,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系列。在解放战争中,中部县几支地方革命武装参加战斗 50 多次,先后有 200 多名指战员和群众英勇牺牲。

10. 同官县地方武装

1946 年 7 月,中共陕西省工委派雷振东、雷炜、王方民等带领武工队到同官、富平交界的沿山一带活动,争取改造了惠璋杰的民间武装。同年 9 月,关中军分区派许天洁回同官领导武装斗争。10 月,富同游击队一、二支队相继成立,隶属关中军分区和富同工委双重领导,活动于富、同交界沿山一带,有队员 300 余人。一支队队长惠璋杰,政委雷振东(后为王方民),二支队队长许天洁,政委雷振东兼。1947 年 3 月,一、二支队分为富平支队和同官支队,统属路东总队领导。同官游击支队在东至蒲城县杨家河,西至同官县石柱、文明,北至陕甘宁边区同国统区交界的广大地区,打击和牵制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消灭反动地方武装,深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1948 年 11 月,同官游击支队改称同官县大队,屈计君兼任大队长,雷炜兼任政委。

11. 耀县地方武装

1946 年春,张仲平在负责恢复耀县地下党组织的同时,在固县村建立起耀县武工队,张仲平任队长。同年 8 月,武工队改为耀县独立中队,杨凯、李福荣先后任队长,杨增贤、杨凯先后任指导员。11 月中共耀县工委成立后,独立中队受耀县工委和渭北游击总队的双重领导。耀县独立中队和淳耀县游击大队密切配合,在耀县国统区和淳耀县边界地区打击敌特活动,袭击敌人碉堡,摧毁国民党乡保政权,保卫陕甘宁边区。1947 年 3 月,国民党反动派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耀县独立中队寻机歼敌,牵制敌兵力,配合渭北总队夜炸耀县南岔口铁路,破坏敌后方供应,支持和配合边区军民的自卫战争。1949 年 1 月,根据关中地委决定,耀县游击大队成立,封正宝兼大队长,白天民兼政委。2 月,耀县独立中队改编为渭北总队警卫连。

12. 宜君县地方武装

1946 年秋,中共雁门工委在原教导队的基础上建立了雁门支队,支队长兼政委薛志仁。支队下辖 4 个大队,人员最多时达 1000 多人。雁门支队在东至洛河畔,西到子午岭,南至同官、富平、耀县边界的区域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历经八丈塬战斗、许家塬战斗、白家沟伏击战、攻打焦坪镇等十多次较大的战斗,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队和反动地方武装。1947 年春,国民党胡宗南部进犯陕甘宁边区,雁门支队在中部、宜君和同官金锁关 100 余华里长的咸

榆公路两侧与敌周旋,打击和牵制国民党军,破坏交通、通讯设施,进行反“清剿”斗争,支持和配合了陕甘宁边区的自卫战争。1948年3月,西北野战军在取得宜川、瓦子街战役的胜利后,又组织了黄龙山麓战役。雁门支队积极配合解放军作战,为主力部队当向导,侦察敌情,与中部支队一起解放了店头、隆坊两镇。1948年3月宜君解放后,雁门支队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黄龙军分区二十二团。

13. 宝鸡县地方武装

1948年4月西府战役后,宝鸡县地下党组织以主要力量筹建地方革命武装。在地下党组织具体指导下,于1948年12月17日和1949年1月22日,分别成立了焦振祥游击队和符友亮游击队。两支游击队200多人枪,主要活动于县东部渭河南的山区和渭河北的周原一带,先后袭击了国民党蜀仓、钓渭、鸡峰等乡公所,在任家山、牛家沟门、长益公路、颡头等战斗中截击国民党军运输车辆,打击反动地方武装。1949年2月,焦振祥、符友亮奉命率部撤至凤翔北山,合编为宝鸡县游击队,焦振祥任队长,龙云任指导员。宝鸡县游击队在北山整训期间,由凤翔县游击大队代管,和凤翔县游击大队一起参加了亢家河阻击战。6月,游击队回到宝鸡,7月中旬,宝鸡解放后改编为县大队。

14. 凤翔县地方武装

1946年10月,中共西府工委和西府支队从边区派出一支武工队,在凤翔、岐山交界沿北山一带开展游击活动,队长先后为欧阳德(后牺牲)、亢少平,指导员先后为邵云亭、蒲光。武工队同中共凤翔县工委接上关系后,密切配合开展地下斗争,控制了后周公、涝川、毛家山一带山区,并在平原地区建立多处活动据点。1948年4月23日凤翔第一次解放后,中共西府地委决定将武工队改编为凤翔县游击队,亢少平任队长,蒲光任政委,隶属中共凤翔县委领导。西府战役结束后,主力部队撤回边区,游击队随县委转移到北山开展游击战争,连续粉碎了国民党三次“围剿”,牵制了国民党正规军一个师的兵力。6月,凤翔县游击队更名为县游击大队,李福祥任大队长,邵光瑞兼政委,下辖四个中队,有队员280多人。凤翔游击武装积极配合解放军作战,消灭国民党地方武装,摧毁国民党乡保政权,发动群众抗粮、抗款、抗丁,为凤翔解放做出了贡献。1949年5月,凤翔游击大队配合第一野战军,在凤翔亢家河歼灭国民党第五十七军残部和第三十师,游击队毙伤俘敌200多名,受到野战军表扬。1949年7月凤翔解放后,游击大队改编为凤翔县大队。

15. 岐山县地方武装

解放战争时期,岐山县地下党组织先后组建了冯兴汉、刘岐周、郑士奎、王孝先、刘耀玉、王均贵、徐俊杰等七支游击队和南原秘密武装,有队员450多名,创建了以麟游山区为依托,东接扶风,西连凤翔,沿北山一带的公开、半公开游击区,和南原、渭河南、秦岭北麓一带的秘密武装活动区。岐山游击武装在西府总队和中共岐山县工委(县委)的领导下,打击国民党地方政权和武装,配合解放军作战,为解放岐山做出了贡献。各游击队的组建情况如下:

冯兴汉游击大队,1946年6月成立,冯兴汉任队长,孙宪武、陈世业先后任中共支部书记。后改编为西府游击总队第四支队第一大队,冯兴汉任大队长,赵杰、杨清秀先后任指导员。1949年7月岐山解放后,被编为县大队。

刘岐周游击大队,1947年3月成立游击队,刘岐周任队长兼中共支部书记。1948年4月改为游击大队,刘岐周任大队长。1949年7月被编为陇县县大队。

南原秘密武装,1947年3月组建,负责人陈鉴元、赵建文、蔡清贤、朱延寿。

郑士奎游击队,1948年4月成立,郑士奎任队长,王自强、吴志纯、李鹏飞先后任指导员。

王孝先游击队,1948年4月成立,王孝先任队长,任金厚任指导员。

刘耀玉游击队,1948年6月成立,刘耀玉任队长,刘沛、张锡先后任指导员。

王均贵游击队,1949年2月成立,王均贵任队长。

徐俊杰游击队,1949年2月成立,徐俊杰任队长。

16. 扶风县地方武装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和上级指示精神,中共扶风县工委积极组建地方革命武装。经过争取改造魏文德民间武装,于8月建立了扶风县第一支游击队,在北部山区开展游击活动。1947年夏,游击队进边区整训,1948年2月,改编为西府游击队总队第四支队第二大队,魏文德任大队长,史厚斋任教导员。后重返扶风,继续开展游击战争。1948年4月扶风第一次解放后,青年学生和贫苦农民纷纷报名参加游击队,西府总队司令部决定将四支队二大队分编为两个大队,大队长分别由魏文德、冯俊安担任。同时县工委又组建了扶风县游击大队,史俊儒任大队长,李特生任政

委。在西府战役期间,扶风游击武装积极配合解放军作战,消灭国民党地方武装,打击反动势力,并开仓放粮帮助群众度春荒。西北野战军撤回边区后,国民党疯狂反扑,以正规军四个团和关中十县保安团队几千人的兵力,先后对扶风游击区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清剿”。魏文德大队、冯俊安大队和县游击大队在西府总队和扶风县工委(县委)的领导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了国民党的“清剿”。1949年5月,扶风游击武装配合第一野战军攻克扶风县城,收缴了国民党扶风县地方武装的枪械。

17. 眉县地方武装

中共眉县工委成立后,先后建立了眉县游击队和鸚鹄嘴游击队,积极开展武装斗争。1948年春,共产党员汶湃在渭河北汶家滩组织起一支十多人的武装。同年7月,汶湃等策动国民党宝鸡县蜀仓乡保安队起义,拉出二十多人枪。两部分队伍会合后,于8月在岐山高码头成立眉县游击队,汶湃任队长,有队员40多人,在眉县、岐山南部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后加入岐山冯兴汉游击大队被编为第三中队。1948年秋,党员李金泉受眉县工委指示在鸚鹄嘴(今属太白县)筹建游击队。他在当地建立了党支部,并做好了拉出队伍的准备。1949年5月21日,第一野战军解放眉县县城。次日,一股国民党残余部队经鸚鹄嘴向西逃窜,李金泉带领乡公所警备班和临时抽调的50多名武装人员,阻击敌军,并于当晚成立鸚鹄嘴游击队,唐国贤任队长,李金泉任指导员。此外,县工委控制的钟仁亮任队长的眉县保警队第三中队,于5月21日眉县解放时起义,阻击沿斜峪关南逃的国民党胡宗南部一个营。一野二军六师将钟仁亮中队临时编为眉县游击大队,大队长钟仁亮,教导员李金泉。6月中旬被编为宝鸡军分区游击大队之一。

18. 麟游县地方武装

1946年6月,中共陕西省工委派刘章天、赵杰等回到麟游、扶风、岐山交界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组建起麟扶岐武工队,赵杰、刘章天先后任队长,段福祥、柏少英先后任指导员。8月,为迎接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北返陕甘宁边区,西府游击队出击麟游,麟扶岐武工队与之会合,在火石山一带迂回作战二十多天,胜利完成“迎王”任务。西府支队撤回边区后,陈世业、刘章天等建立麟游武工队,在中共麟游县工委领导下坚持游击活动。1948年4月,在西府战役中,麟游武工队跟随西府游击总队,在县城、两亭、招贤等大的村镇摧毁国民党乡保政权,收缴反动地方武装。5月,西北野战军撤回边区,国民党军向

麟游反扑,武工队随县委、县民主政府进入边区。7月,中共西府地委派赵杰、柏少英、袁惠民等重返麟游继续开展游击战争,任命赵杰为县游击大队大队长,柏少英为政委,要求到年底完成百人百枪组队的任务。赵杰等回到麟游后,与留在当地的李青等武工队员会合,很快建立起游击队,至1948年冬发展到3个中队、160余人枪,于1949年3月正式成立麟游县游击大队。

19. 咸阳县地方武装

1946年9月中共咸阳县工委成立后,工委书记陈吾愚在边区组建了一支武装力量。1947年5月,这支武装力量被编为渭北游击总队第五支队(亦称咸阳支队),陈吾愚兼政委。当时只编一个中队,中队长龚生满,指导员宁志学。同年10月五支队扩编为两个中队,有队员150多人,谢东兴任支队长。五支队在渭北游击总队和咸阳县工委的领导下,主要在陕甘宁边区淳耀县沿边地区开展游击活动,配合主力部队参加了数十次战斗,打击和牵制进攻边区的国民党军队,并在咸阳、礼泉等地打击反动地方武装。

20. 武功县地方武装

1946年10月,中共陕西省工委派党员李岳峰到武功开展地下工作。李到武功后,积极筹建革命武装,于1947年4月成立了武功游击队,吴彦科任队长,李宏春任副队长,有二十多人枪。游击队初在乾县牛石山一带活动,后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后解体。

21. 三原县地方武装

解放战争时期,三原县党组织先后组建了金刀游击大队,三原独立中队,渭总一、四支队,三原县大队等地方武装,在三原及渭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破坏其交通运输和通讯设施,打击反动地方武装。各游击队的组建情况如下:

解放战争初期,刘光远(刘金刀)领导的三原武工队在心字、武字区及嵯峨山一带开展游击活动。1946年12月,武工队改编为金刀游击大队,刘光远任大队长,中共三原县工委书记张中涛兼政委,有队员100余人。1947年5月,改编为渭北游击总队第四支队,支队长刘光远,政委张中涛兼,下辖三个中队。7月,四支队在嵯峨山打败国民党暂编二旅及三原等县保警队1000余人的包围,毙伤敌200多人,受到渭北游击总队嘉奖。

1947年2月,三原县工委组建了三原独立中队,吴曰聪任队长,有队员30多人。7月,改编为三原县警卫队。

1947年5月,黄子祥、黄子文等率三原陵前乡自卫队100余人起义,进入边区后被编为渭北游击总队第一支队,支队长先后为黄子祥、慕天祥,政委先后为张孝德、董实丰。一支队在富平盘龙湾袭击国民党四十八旅运输队,摧毁三原新兴一带封锁线敌碉堡15座,并打击了三原保警队、彬县自卫营等反动地方武装。

22. 泾阳县地方武装

解放战争时期,泾阳党组织先后组建了泾阳武工队和泾阳县游击队等地方革命武装,在泾河沿岸和陕甘宁边区周围开展游击战争,为保卫边区和解放泾阳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几支游击队的情况分别是:

1945年2月,关中军分区派寇邦颀、王丁秀到泾阳白王一带建立革命武装,于年底正式成立了泾阳武工队,王丁秀任队长,寇邦颀任指导员,在泾阳县西北的徐家山、侯家山、党家山、宋家山几条山沟和淳化县南部山区开展游击活动。1947年5月,武工队配合渭北游击总队第四支队在嵯峨山与国民党暂二旅作战失利后,被编入渭北游击总队。

1947年3月,中共泾阳县工委策动国民党淳化县保警队三分队起义,起义人员被编入渭北总队第五支队三分队,王天才任分队长。三分队受泾阳县工委和渭北总队双重领导,1949年5月经阳解放后被编入泾阳县游击大队。

1949年3月,泾阳县工委接收淳化县百谷乡保警队起义的二十多名人员,以及口镇一带报名参加游击队的二十多名群众,成立了泾阳县游击队,队长高登科,指导员郭述全。泾阳解放后,改编为县游击大队。

23. 乾县地方武装

1945年冬,中共乾县工委组建了乾县武工队,陈玉林任队长,有队员50多人。武工队以白草坡为据点,活动于乾县北部的峰阳、注泔、铁佛寺等地。1947年2月,陈玉林与打入国民党铁佛寺保警队任队长的共产党员赵乾修里应外合,从保警队拉出40多人枪,将武工队扩编为乾县独立大队,陈玉林任大队长。同年6月,中共乾永工委书记上官克勤、委员段福祥等在乾县临平、城关、阳峪等地经过秘密串连,成立了乾县游击队,随即开进边区与乾县独立大队合编为西府游击总队第三支队(亦称乾县支队),下辖两个大队,300多人。上官克勤任支队长,苏智任政委。1947年秋冬,三支队遭到一些损失。1948年7月,三支队改编为西府总队乾县独立中队,段守真任中队长兼指导员。1949年5月乾县解放后,独立中队改编为乾县县大队。

24. 礼泉县地方武装

1945年夏,礼泉县地下党员李林忠等在马栏中共关中地委干训班受训后,建立了礼泉武工队。武工队多次深入礼泉国统区,打击小股反动武装,人员发展到60多人。1946年7月中共礼泉县工委成立后,礼泉武工队改称礼泉游击队,罗恒采任队长,县工委书记张思明兼政委。1947年6月,礼泉游击队改编为西府游击总队第二支队,郭升云任支队长,张思明兼政委,下辖7个中队和1个武工队,200多人。西府总队二支队在西府总队和礼泉县工委的领导下,在边区、泾河沿岸、礼泉境内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毙伤俘敌总数2000多名,拔除敌据点十多处,比较大的战斗有石门关突围战、黄花山阻击战、烧圪塔激战、东庄坡之战和张洪原遭遇战等。1949年5月,西府总队二支队一部分组建为礼泉县县大队,一部分被编为彬县军分区独立八团第一营。

25. 永寿县地方武装

1946年7月中共乾永工委成立后,在永寿进行组建武装的工作。1948年1月1日,宁太游击队在彬县龙高镇土陵村成立,队长赵彦芳,指导员杨光耀。乾永工委副书记苏智兼政委。游击队下辖三个分队,有队员100多人。宁太游击队成立后,在永寿党组织和西府总队的领导下,在东至礼泉县北牌,西至永寿县底角沟,南到永寿监军镇,北到彬县龙高的区域内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大小战斗近百次,给国民党地方武装和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1948年4月在常宁战斗中,宁太游击队配合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歼灭国民党二〇三师一个团。游击队还多次摧毁泾河沿岸国民党封锁边区的碉堡,破坏西兰公路国民党交通运输,捣毁保甲组织。由于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宁太游击队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嘉奖。1949年7月永寿县解放后,宁太游击队大部编入彬县军分区独立团,部分人员被编入永寿县大队。

26. 彬县地方武装

1947年2月,中共彬旬工委在开辟彬县龙高新区的斗争中组建了一支十多人的游击队,后扩编为龙高区游击队,队长武兴勤,指导员寇春荣。同年10月中共彬县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成立后,建立了彬县警卫队,队长武兴勤。1948年4月,县委、县政府成立了彬县游击支队,县长张效良兼支队长,县委书记任君瑞兼政委。同时组建了香庙、新民、北极等区游击队。7月,彬县游击支队改称彬县游击大队,张效良兼大队长,任君瑞兼政委。将原各区游击队编为县大队的4个中队,有队员300余人,至1949年5月发展到1100余

人。在彬县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各级武装组织在解放彬县的斗争中,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地方武装,先后作战 30 余次,比较大的战斗有永乐军村战斗、北极沟战斗、攻打义门城战斗等,歼灭了国民党彬县自卫大队、保警队和一些乡自卫队,同时开展反霸锄奸活动,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

27. 长武县地方武装

1946 年 9 月,中共西府工委先后派刘刚、崔鹏程回长武开辟地下工作。刘刚、崔鹏程在发展党员的同时,积极筹建革命武装,于 1947 年 3 月在长武亭口镇建立了长武游击队,队长先后为刘刚、王有智。1948 年 7 月,改为长武支队,队长王有智,指导员崔树英,有队员 50 多人。长武支队在西府游击总队和中共长灵工委的领导下,转战三原、耀县、淳化、正宁、宁县、彬县、长武、灵台、麟游等地,参加了张洪原、枣林子等战斗,多次受到西府总队的表彰和奖励。1949 年 7 月长武解放后,长武支队改编为长武县大队。

28. 旬邑县地方武装

1947 年 5 月中共旬邑县委成立后,组建了旬邑县游击支队,队长马志超,政委杨宗耀兼,彬旬工委建立的张洪、城太区游击队归其领导。同时组建了中原游击队、张彦成游击队。同年 8 月,旬邑游击支队一部分改编为旬邑县独立营,营长马志超;一部分改编为旬邑县武装大队,队长先后由马志超、李德禄兼任,下设 3 个支队,共 300 余人枪。1948 年 2 月,县独立营撤销,一部编入县武装大队,一部编入关中分区警一旅三团。

29. 淳化县地方武装

1947 年 5 月,国民党淳化县方里自卫队队长宋彦芳在渭北游击总队的争取教育下,率 70 余人起义,成立了方里支队,随后改编为渭北总队三支队,政委孙一心,副队长宋彦芳(队长缺)。1948 年 11 月,国民党方里保警队队长俱兴义率部起义后被编为第三支队第二中队。三支队活跃在方里、小丘、三原以北地区,摧毁国民党保甲组织,袭击敌据点,护送进出边区人员。

30. 长安县地方武装

中共长柞工委成立后,于 1946 年 9 月在长安县小峪寨沟发动起义,建立起长柞游击队,李志中任队长,配合中原突围部队在长柞山区开展游击战争,1947 年 2 月停止活动。长安县分散活动的地下党员坚持斗争,通过争取民间武装和控制改造国民党乡保武装,于 1949 年春建立了长安南乡游击队(队长

刘崇英,有队员 400 多人)、王曲游击队(队长王振国,有队员 100 多人)、黄良游击队(队长孟金山)等地方革命武装,打击国民党地方武装和保甲组织。1949 年 5 月长安县解放后,这几支游击队编入长安县大队。

31. 户县地方武装

为了迎接户县解放,中共户县工委于 1949 年 5 月 17 日建立户县游击队,队长赵伟儒,政委王振林,有队员近百人。游击队成立后,收缴了大王乡公所枪支,控制了附近的交通要道,配合解放军截击溃逃的国民党残余部队。5 月 21 日户县解放后,户县游击队改编为户县人民支队,清剿匪特,维护社会治安,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

32. 蓝田县地方武装

1948 年春,中共蓝田县工委在鹿原、汤峪等地建立了四支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领导人分别为李文、王彦仓、杨怀德、陈志正。1949 年春,穆春发等人根据汪锋指示,组建了蓝田游击队,穆俊杰任队长。蓝田游击队成立后,袭击了许家庙、厚子镇乡公所,寻机打击国民党地方武装,为迎接蓝田解放发挥了作用。

33. 渭南县地方武装

1949 年 2 月,渭南县渭河以北地区第一次解放后,中共渭南县委、县人民政府成立了渭南游击队,惠均发任队长。3 月,党组织策动国民党渭南县国民兵团副团长薛少龙、中队长王志忠等人率部起义。4 月,县委、县政府将起义人员与游击队合编,成立了渭南支队,司令张恒英,政委权秉华兼任。5 月,渭南支队改编为渭南县大队。大队长由县长魏光波兼任,政委由县委书记张俊贤兼任。渭南县地方武装在渭南解放的过程中,积极配合解放军作战,摧毁国民党乡保政权,打击反动地方武装。全县解放后执行肃特剿匪任务,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

34. 韩城县地方武装

1946 年冬到 1947 年上半年,中共韩城县委和韩城县工委(同时并存)分别在韩城发动群众,组建了多股游击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策应陕甘宁边区自卫战争。1947 年 10 月 11 日韩城第一次解放后,西北野战军四纵司令员王世泰正式命名成立了韩城游击支队和韩宜游击支队。韩城游击支队由九支游击队合编而成,田德霖任支队长,韩城县委(1947 年 10 月成立)书记段洁兼政委,下辖 4 个大队、4 个分队,有队员 500 多人。韩宜游击支队的前身为

韩宜游击大队,孙石亦任支队长,韩宜中心区委书记吴沙浪兼政委,下辖4个大队、4个直属分队,有队员800余人。10月19日,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反扑县城,游击队撤到山区坚持斗争,在白杨树岭、马蔺滩、中峙山、河儿川、相公殿、王家岭等地与国民党作战30多次。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为保存力量,韩城支队和韩宜支队奉命于12月下旬撤到山西万荣、河津解放区整训。1948年2月下旬,韩城、韩宜支队西渡黄河参加宜川、瓦子街战役。3月下旬,配合解放军收复韩城。1948年7月,两支游击队合编为新的韩城游击支队,后编入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二十二团。

35. 大荔县地方武装

1949年1月,在中共东府工委领导下,荔北游击队成立,张志茂任队长,薛永清任指导员,有队员70余人。同月,商颜乡的地下党员组建了商颜游击队,翟德玲任队长,有队员近百人。这两支游击队在东府工委领导下,在荔北地区开展游击活动,摧毁国民党乡保政权,狙击国民党军运输车辆,收缴反动地方武装枪支。3月初,荔北、商颜和永丰游击队奉命改编为大荔县大队,隶属大荔军分区领导,姚一征、白云峰分别兼任大队长和政委。3月4日,县大队配合解放军解放了大荔县城。

36. 蒲城县地方武装

1946年2月中共蒲澄工委成立后,与蒲城县荆姚乡民间武装首领、原国民党三十八军退伍团长韩子芳建立了统战关系。9月,国民党当局以“通共”罪名枪杀了韩子芳。中共陕西省工委获悉后即派蒲城党组织负责人张军、刘拓等,争取韩的部下王振邦等二十余人进入边区,经过整训于10月成立了西北民主联军第六总队,王振邦任司令员,张军兼任政委,隶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和蒲白工委双重领导。同月,党组织争取的蒲城县西北乡另一支民间武装王玉成部也进入边区,被编为第六总队第一支队。总队组建后在蒲城、白水、同官、富平交界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又建立了第二支队,于年底发展到200余人。1947年2月,总队在宜君云梦山与国民党军作战受挫,余部撤进边区。9月,第六总队改编为蒲城支队,王玉成任支队长,林光任政委,受蒲城县工委和路东总队双重领导,后改编为路东总队第七支队。1948年9月,中共路东工委决定将路东总队第六支队改建为蒲城县大队,王振邦任大队长,刘拓兼任政委。蒲城县北部游击区的六个区也都建立了游击队,为配合主力部队解放蒲城发挥了积极作用。

37. 白水县地方武装

1947年9月24日,中共白水县工委控制的国民党白水县保警队、预备队,在共产党员杨培才、田焕贵领导下起义,配合西北野战军解放了白水县城。25日,中共路东临时工委决定将起义队伍改编为白水游击支队,杨培才任支队长兼政委,下辖3个大队,有队员300余人。26日主力部队东进韩城,白水支队随路东临时工委撤出县城,在尧禾、林皋、西固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摧毁国民党保甲机构,开仓放粮,建立村政权,支队很快发展到700余人。11月9日,支队在瓦渣岭遭遇国民党第六十一旅,因力量悬殊被敌打散,转入隐蔽活动。1948年3月白水县二次解放后,白水游击支队改编为路东总队第八支队,杨培才兼任支队长,屈计君兼任政委。同一时期在白水活动的还有北塬支队。1947年9月白水第一次解放后,白洛宜第三游击大队改编为北塬支队,支队长魏浪东,政委高平,活动于洛河以北沿山一带。1948年6月24日白水县城被国民党军占领后,为了坚持游击战争,中共白水县委、县政府决定将各区游击队合编为白水游击大队,大队长杨培才,政委王春华兼,辖3个中队,有队员200多人。游击大队随县党政机关在白水北部活动,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为保卫新生政权浴血奋战。

38. 合阳县地方武装

1946年9月,共产党员史建堂根据中共洛川工委指示,带领合阳县五福乡保警队在皇甫庄起义,捣毁五福乡乡公所,建立了合阳游击队,史建堂任队长。同年10月中共合阳县工委成立后,在合阳、韩城交界地区建立了韩合游击队。12月,中共陕西省工委又派王敏(何养民)、张超、邢丕奇等人到合阳开展游击战争,在县东北和西北地区组建了多股游击武装。1947年10月,合阳县境内几支大的游击队在黄龙山郭家塔成立了合阳游击支队,王敏任支队长(后雷岳、左文辉相继任支队长),合阳县工委书记白云峰兼政委,下辖3个大队,有队员300多人。在解放合阳的斗争中,合阳游击支队配合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多次战斗,主要的有:百良战斗,解放合阳县城,参加澄合战役,牛庄突围,临皋、东马村战斗等。

39. 富平县地方武装

解放战争期间,富平党组织先后建立了富平游击支队、富西支队、挺进支队、大水峪游击队、富平县游击大队等地方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国民党基层政权和地方武装。各游击队的组建情况如下:

富平游击支队,1946年10月中共富同工委成立后,组建了富同游击队一支队(富平支队),队长惠璋杰,政委先后为雷振东(兼)、王方民。1946年11月,陕西省工委派惠方辰、钟树岩到富平,组建了富平游击支队,队长钟树岩,政委惠方辰,12月进边区整训后编入一支队。1947年3月富同工委停止活动后,省工委和关中军分区决定将一支队重新改建为富平游击支队,支队长先后为王方民、王维、周友才,政委邵武轩兼任。支队下辖3个中队,有队员200多人。

富同游击支队,1946年冬成立,支队长张春发,活动于富平县城以西及三原武字区一带。

挺进支队,1947年5月成立,支队长许秀岐,政委邵武轩兼任。

大水峪游击队,1948年2月成立,队长先后为党建民、党生有,指导员先后为陈彦青、习仲杰。

富平游击队,1948年3月成立,队长王杰,政工负责人张少林,指导员蔡满德,活动于县北部的薛镇、美原、老庙一带。

富平县游击大队,1949年3月成立,大队长梁琦,政委张少林兼任,下辖三个中队,队员400多人。

40. 澄城县地方武装

1946年7月,中共陕西省工委派李蛋儿、韦东堂回澄城组建澄城县游击支队,确定李蛋儿任支队长,杨力生兼政委,不久被迫返回马栏休整。同年8月,澄城与黄龙部分地下党员在黄龙将军庙率地方武装起义后,组成黄南游击队第三支队,在澄城、黄龙山区开展游击活动,周庆才任支队长,蒋立祥任教导员。11月中旬,省工委派李蛋儿、刘振中等组成武工队返澄县开展武装斗争,1947年春发展到二三百人,成立澄城游击队,队长李蛋儿,政委刘振中(李蛋儿牺牲后刘振中任队长,杨力生兼政委)。7月,两支武装合并,成立澄城县游击支队,刘振中任支队长,孟树林兼政委。游击支队在澄城县委领导下,打击国民党乡保政权,消灭反动地方武装,为配合解放军解放澄城发挥了积极作用,澄城解放后,编入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十二团。

41. 朝邑县地方武装

1948年10月朝邑起义后,因国民党军反扑,中共朝邑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撤出县城。为了与国民党进行斗争,县委、县政府建立起一支十多人的武工队,在县北一带开展游击活动,1949年春发展到100多人,改称朝邑县游击

队,负责人韩增友。游击队在县北各乡镇宣传群众,打击国民党基层政权,给反动当局以震慑。1949年3月,朝邑游击队和兄弟部队再次解放朝邑,后改编为朝邑县大队。

第四章 战役 战斗

陕西全境解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陕西人民的配合下经过一系列重大战役战斗而获得的。在陕北战场,主要是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边区的部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作战;在关中战场主要是西北人民解放军(包括调归一野的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十九兵团)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作战;在陕南战场主要是中原解放军在地方武装及西北人民解放军配合下作战。

一、榆横战役

1946年10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和绥德、三边分区的地方部队主动发起榆横战役,其目的在于策应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驻横山部队起义,解放无定河以南地区。战役部署:除以绥德分区之地方武装一部,消灭石湾、麒麟地区反动武装外,以新编第四旅、教导旅一个团、警备第三旅第八团一部、新编第十一旅二团一部和绥德分区、西乌审、三边分区地方部队,分三路向吴庄、镇川、武家坡、横山、响水堡等国民党据点进攻。

10月13日发起攻击,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及保安第九团两个大队、二十二军3个连及新编第十一旅一部共2100余人,于波罗、哈兔湾、海兔庙等地宣布起义。同日,向国民党发起攻击,各部相继攻占薛家寨及镇川城西北角、吴家园子、麒麟沟、石湾等地,并扫除武家坡、横山国民党军外围据点。14日全部占领镇川、武家坡、鱼河堡、吴庄、兴隆寺、旧寨、安崖地等地。15日攻克万佛洞、乌龙山。16日驻横山国民党新编第十一旅一团团部及一个营300余人被迫投降。20日联防军集中兵力,攻击无定河以南国民党军惟一残留据点——响水堡。此时,榆林邓宝珊急令二十二军副军长胡奎僧(胡景通)率两个营增援,20日进至白家岭地区。联防军除留一小部兵力继续围困响水堡外,迅速集中主要兵力包围该部,经过四小时激烈战斗,除胡奎僧率数人脱逃外,其余全部就歼。21日攻

克响水堡。至此,无定河南岸地区全部解放,战役胜利结束。

榆横战役,国民党榆林邓宝珊部起义 2100 余人,被俘与被迫投降 1000 余人。连同战役前起义投诚及地方武装在边沿地区积极战斗的结果,使陕甘宁解放区北线国民党军损失 45 个连 7000 余人,粉碎了蒋介石以邓宝珊袭扰陕甘宁解放区,企图吸引解放军主力于北线的阴谋。为人民解放军集中主力于南线对付胡宗南集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役解放了 12 万人口,5000 平方公里的地区。

二、关中囊形地带争夺战

1946 年 11 月 15 日国民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后,虽然占领了解放区 12 个县城,却丧失了 4 个旅,75000 余人。全国战局使国民党军由进攻变为相持争夺的形势。这就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停止全面进攻,采取重点进攻,挽救其局面。胡宗南遂积极完成向陕甘宁解放区进攻的准备。胡在陕甘宁解放区南线的兵力有六个旅,首先集中四个旅夺取关中分区,以消除其夺取延安时侧背之威胁。

1946 年 12 月 31 日,胡宗南集团以四十八旅、一二三旅、一三五旅及两个保安团,先后占领关中分区西坡店、湫头塬、巩家斜、长舌头、武王山等地后,其四十八旅一四二团驻山河、西坡店、湫头塬一带;一二三旅三六九团驻职田镇、长舌头、神岩沟一带;保安警备队、自卫队 200 余人守旬邑;以陕西保安第十团分驻张洪镇、土桥、大槐树、白子头、金池、黄甫村等据点;陕西保安第四团驻淳化、通润、梁庄、方里镇一线;一三五旅驻铜川、宜君、焦坪一线。

西北人民解放军以教导旅及警备第三旅第七团驻守茶坊、牛武、南泥湾、临真、固临一线;警备第三旅旅部率其第五团驻守陇东分区沿线,并决心集中新编第四旅及警备第一旅第三团、警备第三旅第七团向进入关中分区之敌展开反击,诱敌于运动中歼灭之。

1947 年 1 月 17 日,警备第一旅第三团攻占旬邑城歼敌一部,国民党四十八旅第一四三团急驰援旬邑。此时,新编第四旅及警备第一旅第三团分三路向宁家至金池之敌碉堡线攻击,26 日占黄甫、梁庄、白子头、金池、龙高等据点,突破国民党 70 余华里封锁线。国民党又急以淳化第一二三旅第三六八团及进入旬邑的第四十八旅第一四三团从南、北进攻,企图夺取梁庄,恢复其封锁线。29 日国民党一二三旅第三六八团抵通润,四十八旅第一四三团进至金

池、龙高一线。31日国民党一四三团被阻于黄甫、腰里。警备第七团将国民党三六八团诱至梁庄附近展开了坚决抵抗。此时,新编第四旅第七七一团分三路对国民党军形成合围之势,包围于宁家、梁庄之间,经过半小时激烈战斗,国民党三六八团团直及两个营939人被全歼。

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第一次进攻关中分区破产后,从晋西南、陕南及陇海路抽调兵力,集中了四十八旅、一四四旅、十二旅、二十四旅、四十七旅、一二三旅、一三五旅、一六五旅等8个旅,以其中7个旅5万余人,于2月18日由关中分区东、南、西三面形成280平方公里的合击圈,分五路进攻,企图将西北人民解放军一举歼灭,夺取关中地区。

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解放区插入国民党统治区之囊形地带,西北人民解放军可三面出击,击敌侧背,威胁国民党军后方,对胡宗南集团进攻延安时侧北威胁甚大。但其地形狭窄,回旋余地小,易遭敌合围。为争取主动,西北人民解放军决心暂时撤出。2月17日,除以少数地方武装坚持游击战外,主力掩护党、政机关撤离关中分区首府马栏,19日夜胜利撤出。

关中地区之战,西北人民解放军先后进行了旬邑、金池、龙高、黄甫、白子头、方里镇等攻坚战斗,并取得了诱歼国民党军于梁庄的全胜。1月17日至2月10日,以323人伤亡的代价先后歼国民党军1613人,敌我双方伤亡对比为5:1,其中生俘敌官兵1225人,起义73人。

三、保卫延安战役

国民党军向陕北解放区的进攻,首要目标是夺取延安。从1947年2月下旬起,他们从晋南、豫西、陕南等地陆续抽调了12个旅,连同原驻陕甘宁的部队,共计达20个旅,除其中5个旅担任守备外,其余15个旅,14万余人,集结于宜君、宜川、洛川地区;马步芳、马鸿逵集团除以两个旅守备外,以10个旅,5.4万余人集结于宁夏之银川、甘肃之同心城、镇原地区;邓宝珊集团两个旅,1.2万余人集结于榆林。具体战役计划是:以整编第一军率第一师、第二十七师、第九十师共七个旅组成右兵团,沿金(盆湾)延(安)大道及其两侧地区向延安突击;以整编第二十九军率第十七师、第三十六师、第七十六师及第十五师之一三五旅、第三十八军之五十五旅共八个旅组成左兵团,沿咸(阳)榆(林)公路及其两侧地区向延安突袭。青、宁二马集团以整编第十八师三个旅组成宁夏兵团向三边分区突袭;以整编第八十一师两个旅组成海(源)固(原)

兵团向陇东分区环县地区突袭；以整编第八十二师等五个旅组成陇东兵团向陇东分区庆阳、合水地区突袭。

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是坚决在延安以南国民党军主要战役方向上，进行机动防御，节节抗击，迟滞进攻之国民党军，争取时间，掩护党中央及延安各机关、学校的安全转移与延安群众的疏散。尔后主动撤出延安，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歼灭国民党军。

自1946年7月开始，陕甘宁解放区军民即先后在延安以南约70公里的地区加修了第一和第二防御地带的工事，增添了长达21.9公里的战壕。以教导旅及警备第七团5000余人组成防御兵团，第一纵队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及新编第四旅为战役预备队。教导旅占领临真、金盆湾一线阵地，警七团占领牛武、茶坊一线阵地，并以延属分区独立团及民兵游击队进行游击战配合，严阵以待。

3月13日，胡宗南集团发起了全线进攻，并以十余架飞机轮番疯狂轰炸延安及陕北城镇，企图三天内占领延安。

战役开始，胡宗南即全部使用了其15个旅14万人。其第一线攻击部队12个旅8万余人，首先以强烈炮火轰击，然后以步兵轻装从荒山中开路，以密集队形多路蜂拥攻击。防御兵团教导旅、警备第七团，依托第一、第二防御地带野战工事，根据预定计划，交换掩护变更部署，节节抗击。虽众寡悬殊，然而西北人民解放军却士气高昂，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口号鼓舞下，发挥了全体指战员高度的战斗积极性和顽强性，与国民党军寸土必争，国民党军每占一地都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延属分区民兵、游击队埋设地雷、破坏道路，展开游击战密切配合。经三天激战，给国民党军以重大杀伤，并阻敌于麻子街、马坊、金盆湾以南地区，胡宗南三天妄图占领延安的计划遭到失败。胡宗南不得不改变战术，慎重前进，天明后攻击，黄昏前停止攻击；露宿山头，避免夜战；抢掠人民群众耕牛，在进攻中用以踏雷开路。相应地，人民解放军则白昼以少量兵力固守要点，适时实施反冲击，利用夜战特长不断袭击国民党军。又经过四天激战，18日中共中央及延安各机关、学校已安全转移，群众疏散完毕，人民解放军已杀伤国民党军有生力量5000余人，达到了预期目的，19日午前主动撤出了延安。19日午，国民党先头部队始进入延安空城。

保卫延安战役，标志着陕甘宁解放区由长期相对和平环境转为全面战争的开始。整个战役是在敌我双方人力物力十分悬殊的情况进行的。战役进

行七天,国民党军平均一昼夜进攻速度仅达 8.5 至 10 公里,创造了敌我伤亡对比 7:1 的战绩。

四、青化砭伏击战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动撤出延安后,以一小部力量与国民党军保持接触,并作掩护主力撤退之势,诱敌主力向延安西北的安塞方向追进,大部队则秘密向延安东北的甘谷驿、青化砭、蟠龙地区转移,待机歼敌。

第一纵队独立第一旅一部兵力的积极佯攻迷惑,国民党整编第一军之五个旅向安塞扑去;第三十一旅(欠九十一团)由拐峁出青化砭,保障其主力翼侧安全。

西北解放军在侦悉国民党第三十一旅将出青化砭的情报后,决心集中五个旅,以伏击手段,在青化砭以南地区歼灭该敌。具体部署是:第一纵队(欠独一旅)由梁村地区进入阎家沟至林坪公路以西地区,主力配置在小寺沟以西高地,待第二纵队切断国民党军退路后,由西南向东猛烈攻击;第二纵队及教导旅,由阎罗寺、胡家河进至青化砭至房家桥公路以东地区,主力配置在寨子沟、窑子沟高地,待国民党军后卫一过房家桥,首先断敌退路,阻敌增援,然后以三个旅由东向西猛烈攻击;新编第四旅由常家塔进至青化砭东北之赵家沟以南高地隐蔽,待第二纵队及教导旅打响后,即向青化砭猛烈攻击;独一旅为野战军预备队,位于守庄头、郭家庄地区,监视安塞方向国民党军行动,保障主力翼侧的安全。各部于 3 月 24 日拂晓前进入指定设伏区。

25 日,国民党第三十一旅(欠九十一团)由拐峁出动北犯。10 时,先头部队进至青化砭附近,后卫已过房家桥,完全进入伏击圈内。西北解放军按预定部署,拦头、断尾,东西夹击,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敌阵,经 1 小时 40 分钟激战,将该部 2900 余人全部消灭,国民党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也被活捉。

五、羊马河伏击战

青化砭战后,西北解放军料定国民党军主力必掉头东进。为达到使国民党军十分疲劳、十分缺粮,然后寻机歼灭的目的,遂以部分兵力吸引疲惫敌人,敌向东,我向西,主力于 3 月底转移到蟠龙西北地区休整,隐蔽待机。

国民党第三十一旅被歼,始知西北解放军主力在延安东北地区,胡宗南立令整编第一军五个旅与整编第二十九军,分别经甘谷驿、青化砭向延川及其以北地区

进犯,26日占延长,29日占延川,31日占清涧后,主力于4月3日进占瓦窑堡。

4月11日,西北解放军在准备迎击国民党军进犯中,获悉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六师第七十二团接替瓦窑堡防务,判断原守备瓦窑堡的第一三五旅可能南下,并决心牵制国民党军主力于瓦窑堡、蟠龙大道以西地区,相机歼国民党第一三五旅。作战部署是:以第一纵队(欠独一旅第三十五团)坚决阻击国民党整编第一军、第二十九军,迟滞其前进,吸引国民党军主力向西;主力则配置在黑山寺、阎家沟、新庄沟地区,待国民党第一三五旅南下时,在运动中将其歼灭。

4月12日,国民党军主力八个旅开始向榆树峁子、新庄沟方向进犯。13日,第一纵队将国民党军阻滞于李家岔、上白家坪、宋家沟、新庄沟以南地区。阻击部队的积极行动,使国民党军误认西北解放军主力在瓦窑堡、蟠龙大道以西地区。国民党整编第一军五个旅向三皇峁、南家湾方向进攻;整编第二十九军也由新庄沟转而向西进攻,并急令第一三五旅迅速南下,向其右翼靠拢。

4月14日8时,国民党第一三五旅分两路沿瓦窑堡、蟠龙大道两侧高地南下,第四〇四团居右,第四〇五团居左,逐山跃进,以防被歼。9时许,先头部队进至三郎岔、李家哨,遭新四旅顽强堵击,前进道路被封闭。第二纵队及教导旅、新四旅迅速将该敌包围于羊马河以北的三郎岔附近地区,阻援部队也阻止了国民党军主力的东援。经过七个小时激战,将该旅4700余人全部歼灭。国民党第一三五旅代旅长麦宗禹及其团长成耀煌、陈简均被活捉。

六、蟠龙攻坚战

羊马河战后,国民党军发现西北解放军主力在瓦窑堡以南地区,西进之整编第一军、第二十九军,急忙掉头东进。此时,西北解放军主力已秘密转移到瓦窑堡西北和瓦窑堡至清涧大道以南地区,休整待机。因国民党军消息不灵,盲目追寻,一连数日,兵疲粮尽,不得不于4月7日南返蟠龙补给。在补给中,蒋介石得到了“中共中央及共军主力已开始东渡黄河”的情报,当即令胡宗南主力九个旅迅速北进,并令榆林邓宝珊部南下配合,企图南北夹击,一举围歼西北解放军于葭县(今佳县)、吴堡地区,或逼其东渡黄河。4月26日,国民党军留第一六七旅及地方保安团队约7000人守备蟠龙,主力向绥德方向疾速开进。

西北解放军在察明国民党军企图及动向后,决定乘国民党军主力北上绥德,回援不及,攻歼蟠龙守敌。蟠龙是胡宗南集团的前进补给基地,守军以蟠龙镇为中心,利用周围高地构筑了较坚固的防御工事,但国民党主力北上绥

德后,蟠龙即成为孤立的据点。西北解放军攻克蟠龙的部署是:以三五九旅一部并抽调各旅一个排,配合绥德分区及由晋绥渡河的独五旅,伪装成主力,节节抗击,积极诱敌主力北上绥德并将其拖住;以三五九旅主力位于永坪东北地区,准备阻敌主力回援,并阻击由清涧出援之敌,另以一部兵力组成南进支队,破袭延安以南公路,牵制敌军;教导旅进至青化砭以北地区,准备阻击青化砭方向来援之敌;第一纵队从蟠龙西北面进行攻击,第二纵队从蟠龙东南面进行攻击,新编第四旅从蟠龙东北及北面进行攻击,4月30日,西北解放军完成了对蟠龙守军四面合围的攻击部署。

5月2日,国民党军主力九个旅已进至绥德,西北解放军当晚即对蟠龙守军发起攻击,至4日6时,国民党军在蟠龙东山之集玉岭主阵地被攻占,致使国民党军整个防御趋于瓦解,至24时,国民党蟠龙守军第一六七旅等部6700余人全部就歼。

七、三边战役

三边分区位于陕甘宁解放区西北部,南部多山与陇东相连,北部多滩地与伊盟沙漠接壤,东连延属、绥德两分区,西与宁夏之金积、灵武相接。

1947年3月胡宗南集团向延安进犯,宁夏马鸿逵集团也倾巢向陕甘宁解放区三边分区出击配合。宁马整编第十八师占领三边后,即以骑兵第十旅旅部及骑兵第二十团驻安边、砖井堡,暂编第九旅及宁夏保安第六团驻定边,一六八旅(欠五〇三团)及宁夏保安第五团驻盐池地区,并组织了安边、西乌审鄂托旗等地方反动武装,编制保甲等,企图长期统治该地区。

西北野战军针对三边之敌,除以陇东地方兵团坚持陇东斗争外,以陇东骑兵营向山城堡国民党第八十一师残部警戒。6月25日,野战军以隐蔽行动,迅速由环县北进,6月29日进入定边南山。当时获三边分区报告,有撤退模样。野战军为不失战机,以第一纵队及新编第四旅迅速向定边进攻,教导旅前出至定边西南,准备截击定边可能西窜之敌;以第二纵队向砖井堡及安边进攻,阻止砖井堡以东之敌西撤归路,并消灭砖井堡、安边之敌。30日午,当主力接近定边城郊,国民党骑兵第十旅之第二十团绕长城外不战而逃,西北野战军虽以一部追击,但因步兵追骑兵未果。第二纵队亦同时占领砖井堡。7月2日独立第四旅攻占安边城,守军反动地方武装除十余人跳城逃脱外,全部被歼。7月7日,除以第二纵队控制安边、定边为预备队外,西北野战军主力继续西进,攻占盐池城,歼灭国民党骑兵第二十团之一连,国民党军

大部向西狼狈逃窜,三边分区全境随之收复,战役遂告结束。

八、榆林战役

陈(赓)谢(富治)兵团在晋南休整后,为执行全国战略进攻计划,南渡黄河出击豫西,策应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南进。此时,西北野战军为保障陈谢兵团顺利南渡,吸引国民党军于陕北战场,因此决定进攻榆林,调敌北上。

榆林为晋绥边境之反革命重要据点,历来是陕北及晋西北逃亡地主的集中地,西与宁夏马鸿逵集团、南与延安胡宗南集团形成犄角之势,北与绥远傅作义集团相依,为绥、陕之重要门户。榆林城地处长城线上,西隔榆溪河为广阔之沙漠,北、东、南三面环山,为沙漠与高原之连接点,城墙坚厚,外有凌霄塔、无量殿、观井滩等坚固据点,三面高地皆为沙丘,不易构筑工事,利于坚守。

榆林地区守军为国民党邓宝珊部第二十二军及胡宗南集团第三十六师之二十八旅,以及地方团队等共计 1.5 万人。除第八十六师之二五八团分驻神木、府谷,三五六团分驻高家堡、响水堡,陕西保安第五团驻守横山外,余均驻城内及其附近。

西北野战军三边战役后,召开了旅以上干部会议,明确了榆林战役之目的,统一了作战认识,各兵团进行了攻坚战术训练。中央军委决定调晋绥之第三纵队西渡黄河,拨归西北野战军建制,加强西北野战军的力量。

西北野战军以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新编第四旅、教导旅共八个旅进攻榆林,加上绥德分区之第四团、第六团总计兵力 4.5 万人,3 倍于榆林守军。进攻榆林部署如下:

第二纵队、新编第四旅、教导旅经镇川堡首先向鱼河堡、归德堡、三岔湾、赵庄等外围据点攻击,力求歼敌于城外,第二纵队绕城东包围城北及城西北部,新编第四旅包围城东南,教导旅作为机动兵力;以绥德分区之第四、第六团归第一纵队指挥,包围城南及城西南部;第三纵队之独立第五旅由沙家店经杏树塔、银匠岭攻击流泉河、青云山之敌,独立第二旅攻击高家堡、乔岔滩之敌,该两旅歼灭上述各地之敌后包围城东部。各兵团统于 8 月 6 日开始向国民党军进攻。7 月 30 日至 8 月 4 日先后向榆林攻击前进,8 月 6 日开始向榆林外围据点攻击。至 8 日晨,榆林国民党军外围据点除凌霄塔外,全部被肃清。

西北野战军围攻榆林,令国民党集团十分恐慌。蒋介石一面严命邓宝珊

部固守待援，一面急调在安塞、保安地区的胡宗南部十个半旅6.3万人迅速北进，星夜驰援。当时西北野战军决心争取攻克榆林，而后继续打援。

8月10日，攻城部队向榆林城发起第一次攻击。第二、第三纵队及新编第四旅攻城北门及东门，但强攻和爆破均未奏效。攻击西门的第一纵队三五八旅七十五团先锋连曾一度登城，但因后续梯队未能及时加入战斗乘胜扩大战果，又被迫退至城外。至此，第一次攻城受挫。8月11日，第二次攻城，由于准备仓促，加之各部队之间协同不周，攻城再次受挫。

此时国民党援军第一军、第二十九军于10日进至青阳岔、安定地区，并继续北进，其第三十六师率五个团未出我意料，沿长城外沙漠地疾速驰援，避开我阻援部队，11日抵横山北之刘家嘴，并星夜前进。西北野战军因时间紧迫，不及调整部署，又因粮食困难，为争取主动，遂决心撤出战斗。12日黄昏，第一纵队向长乐堡转移，以诱敌北进，主力向榆林东南地区集结待机歼敌。

榆林战役，城虽未攻克，但完成了调动胡宗南集团主力北上的战役目的，配合了陈谢兵团南渡黄河之行动，并削弱了陕甘宁解放区北线以邓宝珊为首的反动武装力量。计消灭了国民党第二十二军两个整团及第二十八旅之一个营，打垮了其另一个营，俘国民党陕北少将警备副司令张子英、第二五六团团团长李含芳、新编第十一旅二团团团长周效武以下3200人，毙伤2000余人，共计5200余人。收复和解放了横山、响水堡、鱼河堡、归德堡、高家堡等城镇和广大地区。

九、沙家店战役

沙家店战役，是西北野战军在榆林战役后，于1947年8月中旬进行的一次歼灭战。这次战役共歼灭国民党整编第三十六师6000余人。由于此役的胜利，结束了国民党对陕北的重点进攻，改变了西北战局，从而使西北野战军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反攻。

榆林战役后，西北野战军主力隐蔽地撤至榆林东南、沙家店西北地区待机歼敌，并以后方机关一部伪装主力从葭县以北东渡黄河。国民党军误以为解放军仓皇而逃，遂令其援榆部队加紧追堵。8月15日国民党军进占绥德后，除以整编第一师留驻绥德外，余由援榆集团总指挥、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领分路向葭县方向推进。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长钟松，自认援榆有功，趾高气扬，于14日率两个旅（四个团）远离主力经归德堡南下，孤军冒进，16日进到镇川堡。

8月17日，刘戡率主力由义合镇进至吉征店以南地区，并继续向葭县方

向前进。整编第三十六师以第一二三旅配属第一六五旅之第四九三团为前梯队,于17日由镇川堡向乌龙铺以南与西野第三纵队接触,三纵且战且退,诱敌于黄昏时进到乌龙铺。野战军首长判断该师师部及第一六五旅(欠第四九三团)为后梯队,可能经沙家店地区东进。因此,决心集中野战军主力在运动中歼灭国民党整编第三十六师,粉碎国民党军的合围计划。

8月18日,国民党整编第三十六师前梯队(第一二三旅附第四九三团),经万佛洞、高家园子向乌龙铺前进,上午10时许在乌龙铺以南与西野第三纵队接触,三纵且战且退,诱敌于黄昏时进到乌龙铺北山。国民党整编第三十六师后梯队(师部及一六五旅欠四九三团),于当日午后在常家高山附近与西野第一、第二纵队先头部队接触,因时值大雨,山洪暴发,国民党军与西野稍事战斗,即向西退缩。西野各部队也为大雨所阻,未组织追击,返回原集结地,寻机再战。

8月18日战斗后,国民党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率第一六五旅(欠四九三团)撤至沙家店及其西南地域,构筑工事。已经进到乌龙铺的整编第三十六师前梯队于19日推进到刘家沟。刘戡所率的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部、整编第九十师以及第五十五旅、第十二旅也于当日进占神泉堡、葭县、李家庄等地。

8月19日晚,国民党整编第三十六师发现沙家店附近有西野主力,乃急令第一二三旅星夜向沙家店靠拢。但第一二三旅害怕夜战,当夜仅令配属的第四九三团先行驰援。

8月20日拂晓,西野各部到达指定位置并向国民党军发起攻击。第一纵队首先以第三五八旅向沙家店东南高地攻击,独立第一旅主力向沙家店以南敌阵地攻击,激战至上午10时,占领沙家店、均家沟以东一线高地。第二纵队以独立第四旅向张家坪南、西南高地之敌展开攻击,第三五九旅从独立第四旅左翼向常辛庄以南高地之敌攻击,经数小时战斗后,西野连续攻占国民党军前沿阵地多处。

20日10时左右,回援之国民党第四九三团沿吴家沟川道与其师主力会合。在当日4时才出动西援之国民党第一二三旅此时也进到常家高山附近,企图占领常家高山北侧高地,掩护其师主力东窜,当即遭到新编第四旅迎头痛击。国民党军为抢占这一要点,竭尽全力实施进攻,战斗十分激烈。此时,原定从第二纵队左翼加入战斗向国民党整编第三十六师主力攻击的教导旅赶到,并根据敌情的变化,当机立断改变了原来的突击方向,主动向常家高山方向投入战斗,迅速与新四旅沟通联系,密切协同,完成了对国民党第一二三旅的包围。至此,国

国民党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及两个整编旅分在两地被包围。

20日午后,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密切配合,向国民党整编第三十六师主力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战斗到17时,国民党军主要阵地均被占领。国民党军伤亡惨重,待援无望,遂企图逃窜。第一纵队即令各部向国民党军纵深猛插,进一步割裂敌人部署,断其退路。1小时后,国民党军全线崩溃,西野各部迅速发起追击,国民党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及第一六五旅除师长钟松及旅长李日基带少数残部逃跑外,大部被歼灭。

20日14时,教导旅与新编第四旅向国民党第一二三旅发起攻击,黄昏前,该旅被全歼,旅长刘子奇被俘。

第三纵队及绥德军分区第四团、第六团,在国民党第一二三旅回援其师主力时,除以一部兵力尾击该敌牵制其行动外,主力在乌龙铺西北地区展开,阻击西援之国民党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部和第五十五旅、第十二旅。战至当日黄昏,未使该部通过青阳川,保障了野战军主力全歼国民党整编第三十六师的战斗。此时,由于葭县之国民党整编第九十师已尾随其主力西进,西野即迅速撤出战斗。至此,全战役即告结束。

十、延清战役

1947年9月,西北野战军第二、第四纵队南下开辟黄龙山区,进入外线作战,以分散国民党军兵力,配合主力在内线歼灭国民党军。

9月23日,第二纵队攻克大、小劳山之后,立即出击黄龙。第四纵队于9月25日在白水地区党组织的配合下,争取了国民党保警队百余人起义后,解放了白水城,然后东进与第二纵队协同,开始了开辟黄龙山区的作战。与此同时,西北野战军主力在集结地域积极进行战役准备,拟乘国民党军分散孤立之机,发起延清战役,收复延川、延长、清涧各县。

10月1日,第三纵队及教导旅首先攻克延川、延长两城,守军国民党第三十五团第二营、第七十团第二营全部被歼。之后,第一纵队在北进途中攻占了清涧城南的三十里铺,歼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六师辎重营一部。至此,绥德、子长、清涧与延安之国民党军联系全被割断,创造了围攻清涧的有利条件。10月4日,教导旅进至九里山,立即占领了附近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准备阻击来援之国民党军。第一、第三纵队分别进到武家祠及其以南老庄坪、韩家堆地区,进行攻击的各项准备。10月6日,第一、第三纵队开始扫清城外据点。由于组织准

备充分,战术运用灵活,各部作战勇敢,只用两天时间,基本拔除了城外各据点,歼敌一部,余敌龟缩城内及退守城西的笔架山阵地,负隅顽抗。10月8日,正当第一纵队独立第一旅攻击笔架山失利时,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整编第一、第九十、第二十七、第七十六师各一部五个半旅的兵力,由延安增援清涧。绥德军分区第四、第六团放弃对子长之敌的围困,迅速进到永坪地区,与先期到达该地区的新编第四旅协同,阻击援敌。

为迅速攻占国民党军笔架山阵地,9日下午,彭德怀司令员率领第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政委余秋里等到前线观察地形,帮助部队总结经验教训,共同研究新的作战方案。10日凌晨,担任主突任务的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根据新的战斗方案,选择山坡陡峻、但守备薄弱的笔架山山南阵地为突破口,采取先偷袭后强攻的方法,于当日上午9时许全歼守敌,占领了这个能瞰制全城的制高点。

10月10日,国民党援军进攻更加猛烈,企图迅速打通永坪到清涧的通路。为更有效地阻止国民党军进攻,新四旅及绥德军分区第四、第六团转入下石窑、曲思教一线阵地继续抗击,增调教导旅主力到马家圪塔地区,加强了阻援力量,制止了国民党援军的推进。

在阻援部队的有力保障下,攻城部队第一、第三纵队,于22时发起了总攻。第三纵队独立第二旅第五团,首先攻破东门,突进城内一个营又两个连的兵力。11日拂晓,第一纵队独立第一旅与第三纵队独立第五旅第十五团配合,爆破北门成功,迅速从北门攻入城内,与国民党军展开激烈巷战。随后第三五八旅主力亦由城东入城,向城南发动进攻。国民党军遭三面夹击,阵势大乱。战斗至11日5时30分结束。

延清战役,是西北野战军主力于1947年10月上旬进行的一次攻坚作战。此次战役,歼灭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部、第二十四旅旅部又6个营8000余人,活捉国民党七十六师师长廖昂及旅长张新,扫除了陕甘宁边区腹地的国民党军,收复了延川、延长、清涧、绥德、子长等5县广大地区。

十一、宜川、瓦子街战役

1947年冬初,西北野战军第二次进攻榆林,给予国民党军马鸿逵、邓宝珊部以严重打击后,主力集结于绥德、米脂、安塞地区休整,进行转入战略进攻的各项准备工作。第二纵队亦于1947年12月28日结束安邑、运城战役,集结于晋南曲沃地区整训,待命西渡。

西北野战军整训期间,胡宗南集团也加紧进行了部署调整。为确保陇海路、平汉路的畅通,胡宗南被迫抽调四个师,由西安“绥署”副主任裴昌会率领,东出潼关及陕南,配合刘峙集团作战。留在陕甘宁解放区的国民党军此时有9个师25个旅。由于国民党兵力下降,遂被迫在战略态势上采取守势,置重兵于延安之南的洛川、黄陵、宜川地区,以机动防御姿态,企图继续占领延安,阻止西北野战军南进。

针对国民党军分兵延安、洛川、宜川三地,企图依城固守,阻止西北野战军南进的防御布势,西北野战军决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解放黄龙山区,威胁西安,调回胡宗南集团增援中原的兵力,直接配合中原战场上人民解放军作战。西野司令员彭德怀认为,宜川守敌只有两个团,兵力薄弱,而解放军则背靠陕甘宁解放区,便于掩护行动和后方供应,第二纵队可以随时西渡黄河,迅速参加作战,且能获得晋南解放区的直接支援。而且围攻宜川,国民党军必驰援,时值冬春之交,尚未解冻之际,国民党援军不易在运动中构筑工事,利于在运动中歼灭。

1948年1月29日,西北野战军在米脂县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宜川战役的作战部署。宜川东依黄河,西连洛川、富县,是陕东战略要地,被胡宗南视为关中屏障。宜川又好比是黄龙区同晋绥、太岳解放区之间联系的一个大钉子。拔掉这个钉子,解放黄龙山诸城,可进一步打通与晋西北的联系,巩固后方,造成解放大西北的有利态势。会议最后确定:先以一部兵力(第三、第六纵队各一部)围攻宜川,调动黄陵、洛川等处国民党军来援;野战军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先歼援敌,然后再夺取宜川城。估计解放军围攻宜川后,国民党军增援的道路可能有三条:一是由洛川经瓦子街到宜川。此条公路,便于大部队机动,距离又近,增援快。但国民党军顾虑瓦子街以东一段咽喉狭道易遭伏击;二是由洛川、黄陵经黄龙至宜川,路程较前远两倍;三是由洛川、黄陵沿第一条路以北的进士庙梁至宜川。此路虽不易遭到伏击,但山高坡陡,重装备行动困难,路程也远。会议判断国民党军走第一条路的可能性最大。因此,制成三套作战方案,并以第一方案为主。即增援宜川之国民党军若取道瓦子街时,我第三纵队、第六纵队各以一部兵力由正面抗击,不使国民党援军与宜川守军会合;第一纵队待其全部通过瓦子街进入我伏击圈后,立即断其归路,攻击其左侧后;第二纵队由东南向西北攻击其右翼;第四纵队由北向南攻击其左翼,四面合围,歼灭增援之国民党军。

2月22日,第三纵队、第六纵队开始向宜川攻击前进,24日包围宜川城,立即展开攻击,至27日,突破了国民党军外围防御,先后占领敌防御要点老虎山、虎头山、万灵山、外七郎山等阵地,将国民党军压缩于城内。与此同时,第一纵队、第四纵队亦于24日进到指定的待机地域,第二纵队于23日由禹门口强渡黄河后,向宜川以南之圪台街地区前进。

胡宗南屡接宜川被围,遂告急电,一面严令守军坚守待援,一面急令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部火速救援。刘戡军26日出发,取道瓦子街轻装驰援,按整编第二十七师、整编第九十师、军部、第一五八团序列前进,援军兵力计四个旅八个团。

西北野战军在获悉刘戡军26日出动并取得瓦子街前来时,立即按预定作战方案行动,并适当调整了部署,以第三纵队、第六纵队各一个旅共五个团继续围攻宜川,诱使国民党援军就范,并集中主力九个旅,迅速按预定方案向瓦子街以东之南北高地机动,隐蔽进入设伏阵地,待机歼敌。

27日,刘戡军进到瓦子街以西地区。28日,继续攻击前进。

29日凌晨,第一纵队在查明国民党后卫全部通过瓦子街后,立即向瓦子街攻击前进,于6时攻占瓦子街并歼国民党军搜索连,切断了国民党军的退路。这时,刘戡一面急令整编第九十师速派一个团争夺瓦子街,同时又迅速以两个团向瓦子街东南山机动,企图抢占要地作为进退依托,控制住南逃道路。经一天激战,第一纵队第三五八旅坚守阵地,击退了国民党的多次进攻,粉碎了国民党军夺路突围的企图。29日黄昏前,已完成对国民党军援军的四面包围,将敌压缩于乔儿沟、任家湾、丁家湾狭小地区。29日夜大雪不止。

3月1日上午,第一纵队沿公路及其两侧由西向东,第二纵队由南向北,第六纵队(欠第七七一团及教导旅第一团)由东南向西北,第三纵队(欠独立第二旅)由东北向西南,第四纵队由北向南,向国民党军发起总攻。在猛烈攻击下,至16时,公路两侧之国民党军阵地均被占领,将国民党军压缩于沟内,国民党军混乱不堪,至17时被全部歼灭,无一漏网。

宜川攻城部队继2月27日夺取宜川外围据点后,29日,独立第二旅一部攻入城内俘敌500余人。由于内七郎山、凤翅山未能占领,受国民党军火力压制,又于拂晓撤出城外。3月2日,攻城部队根据敌情调整了部署,在全歼援敌的胜利鼓舞下,由小北门再次突入城内,迅速夺取了内七郎山、凤翅山,守军动摇。至3日8时,宜川守军全部被歼,战役胜利结束。

宜川战役,是西北野战军于1948年春季转入外线作战时,运用围城打援的战法进行的一次歼灭战,这次战役共歼国民党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部、整编第二十七师师部、整编第九十师师部、第二十四旅、第四十七旅、第五十三旅、第六十一旅、第三十一旅旅部及一个团,共2.9万余人。击毙国民党中将军长刘戡、中将师长严明、少将旅长周由之、李达及少将副师长李奇亭、少将师参谋长曾文思等。

十二、黄龙山麓战役

宜川、瓦子街战役国民党军主力被歼,渭河南北、洛河两岸,延安以南20余县的广大地区,仅有一三五旅、整编第二旅、新编第九旅、骑兵第二旅共四个旅分散驻守铜川、耀县、三原、咸阳、临潼等地。新拼凑的第六十一旅守备洛川;其整编第十七师守备延安孤城;黄龙山麓之黄陵、宜君、白水、蒲城、澄县、合阳、韩城、石堡地区,仅有三个保安团及各县保警队守备。国民党军后方空虚,胡宗南不得不“剜肉补疮”调回豫西之整编第一师、第三十师、第三十六师、第六十五师、第三十八师及汉中的第二〇三师至西安附近守备,以确保西安。但四个师尚在潼关以东,一个师在空运西安途中。

宜川解放后,黄龙山广大地区随之迅速解放。西北野战军决定乘胜向南发起进攻,实施黄龙山麓战役。

1948年3月5、6两日晨,西北野战军按预定计划开进。第一、第四纵队于3月10日向宜君攻击。宜君守军乘西门未封锁之际,向西突围逃窜,西野占领宜君第三、第六纵队,于9日完成对洛川之包围,当晚即发起冲击,外围之国民党军逃入城内。10日晚,再次发起攻击,国民党守军拼死顽抗。两次攻击未克,第三、第六纵队遂构筑工事,准备再攻。第二纵队于8日西渡洛河,歼灭了国民党地方武装400余人。9日进至蒲城附近,准备攻击蒲城。

西北野战军围攻洛川,解放宜君,进迫蒲城,使胡宗南急令由豫西回撤之整编第一师、整编第三十四师、整编第三十六师、整编第三十八师、整编第六十五师等八个旅统由裴昌会指挥,组成第五兵团,由灵宝、陕州迅速回陕,以保守西安并相机增援洛川。其先头第三十六师第二十八旅及一二三旅于11日增防蒲城,保障其主力之机动。

根据上述情况,西北野战军除以第三、第六纵队继续积极围攻洛川,诱敌北援外,第一、第四纵队就地集结,第二纵队撤至白水县附近集结,准备歼灭

可能北援之敌。

由于洛川国民党军凭借险要地形和坚固设防,顽强抵抗,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第六纵队经 22 天的连续围攻,仍久攻不克。而南线之国民党军蠢蠢欲动,西北野战军决心围困洛川,主力西移,诱裴昌会兵团增援洛川,在运动中寻机歼灭之。但裴兵团行动极为谨慎,无歼敌良机。战役遂告结束,共歼其 3000 余人。

十三、西府陇东战役

西北野战军第三、第六纵队围攻洛川,国民党裴昌会以十个旅的兵力驰援,到后来却因惧怕被解放军歼灭而集结于渭河以北洛河东西地区按兵不动。除泾阳、耀县、淳化之三角地带有国民党暂编第二旅、新编第九旅及骑兵第二旅守备,西安附近有国民党青年军第二〇三师集结外,西府、陇东之彬县、陇县、宝鸡、兴平等 14 县地区,十分空虚;川陕公路与陇海铁路之连接点,胡宗南集团重要供应基地宝鸡仅有第七十六师师部、第一一四旅新编第四十团及陕西保安第二十一团约 2000 余人守备,其余地区皆为反动地方团、队守备。鉴于以上情况,西北野战军除以第三纵队附黄龙分区独立第二十二团,继续围攻洛川,迷惑国民党军,并寻机歼灭可能由延安、洛川南逃之国民党军外,主力第一、第二、第四、第六纵队于 4 月 7 日由黄陵、澄县地区向西移动,实施西府、陇东战役。

西府、陇东战役于 4 月 17 日开始。西北野战军分三路出击,自 4 月 17 日至 25 日,连克长武、麟游、凤翔、扶风等 12 座城镇,切断了宝(鸡)西(安)公路、铁路,逼近了宝鸡。

26 日,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二纵队联合攻占宝鸡。此时,蒋介石认为,西北野战军远离解放区,处境不利,乃命令胡宗南一面以整编第十七师等部放弃延安及洛川等地集中力量拱卫西安,一面以裴昌会兵团西进,配合西北行辕副主任马步芳部之整编第八十二师,共 11 个旅的兵力,自三原、镇原地区分路驰援宝鸡,对宝鸡形成夹击态势。

西北野战军为从不利中摆脱出来,另寻战机,乃于 4 月 28 日撤出宝鸡,向陇东地区转移。5 月 12 日,转至关中老解放区马栏等地,最后摆脱了国民党军的追堵。

当西北野战军向西府进军,威胁西安,直取宝鸡之时,延安国民党守军整编第十七师于 4 月 20 日弃城南逃,22 日退抵洛川,25 日偕同洛川守军第六十

一旅等部连同地方反动武装共约3万人,沿洛(川)白(水)公路南逃。被国民党占领一年多的延安遂于4月21日上午宣告光复,洛川也于25日解放。此时陕北各地的除以地方武装、游击队、民兵跟踪追击南逃之国民党军,西野第三纵队于4月26日、27日在洛川以南展开猛烈追击,歼国民党第六十一旅、整编第十七师、第四十八旅各一部共3000余人;缴获国民党全部坦克、汽车、榴弹炮、野炮、山炮等重武器。至此,国民党军黄龙分区与关中分区已连成一片,胜利地完成了进军西府、陇东,调退延安、洛川国民党军,巩固后方和黄龙新解放区的预期目的。

在这次战役中,西北野战军连续作战一个月,收复了延安,解放了洛川、旬邑,并一度解放长武、彬县、永寿、灵台、崇信、麟游、扶风、岐山、凤翔、咸阳、宝鸡等14座县城,毙、俘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六师中将师长徐保(毙)以下官兵及国民党之专员、县长和地方武装共2.19万多人,国民党第二〇三师、第六十五师、第三十八师、第八十二师等部均遭沉重打击,缴获了大量装备、弹药及军用物资,摧毁了国民党军在西北之供应基地宝鸡、蔡家坡等军需工业和大量军火仓库,动摇了西北国民党军的根基。

十四、澄合战役

西府陇东战役结束后,西北野战军主力集结于石堡、韩城地区整训。但是,国民党胡宗南集团却不断向黄龙山麓新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关中分区进犯,占领了澄城、合阳、白水等县城。为打破国民党军的进攻,西北野战军决心以小部兵力引诱、钳制、分割国民党军之大部(两个师另一个团),集中主力(11个旅)首先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十六师及一四二团(三个旅),得手后歼击整编第十七师、整编第三十八师,粉碎国民党军之封锁。

1948年7月30日,国民党整编第三十六师进占澄城以北之冯原镇、刘家凹,整编第三十八师、整编第十七师(欠一四二团,一四三团守备澄城、合阳)进占合阳以北之甘井镇、鹅毛村。此后,国民党军利用边山要点及村落,积极构筑工事,不再前进。西北野战军诱敌深入未果,乃于8月5日改变决心向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十六师进攻。

8月8日拂晓,西北野战军发起冲击。是日黄昏,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长钟松率其师部及第一二三旅、第一六五旅主力即沿冯原镇通澄城之公路南撤,西北野战军第一、第二、第四纵队乘胜追击,第三、第六纵队各一部由刘家凹

附近向南截击,至9日午前,歼国民党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及第一二三旅之三六八团于王庄镇、杨家凹地区,并将国民党第一六五旅旅部及四九四团、四九五团,包围于王庄镇;9日黄昏,该部向东南突围,大部被歼,一部乘黑夜溃逃,西北野战军即分头追捕,除第一六五旅旅部及四九五团一部漏网外,余均被消灭。困守梁周村之国民党四九三团也于9日午夜向东南突围中被全部歼灭。

当国民党整编第三十六师第二次被歼的同时,相隔25公里之敌右路军整编第三十八师、第十七师不敢增援,于8月8日撤离韩城,向合阳、澄城集中。10日由合阳、澄城混乱南逃,西北野战军乘胜收复韩城、澄城、合阳后,仍继续追击南逃之国民党军。13日攻占大峪河以东之马村镇。此时,敌在大峪河以南之寺前镇、韦庄镇、永丰镇地区占领阵地转入防御,西北野战军始停止追击,战役遂告结束。

澄合战役,西北野战军收复韩城、合阳、澄县三城,消灭国民党军近万,扩大了黄龙分区,巩固了澄、合、韩三县广大地区,扩大了新解放区人民支援革命战争的人力、物力来源,减轻了老解放区人民的负担,并使西北解放区与晋南解放区的连接面大大延长。

十五、荔北战役

国民党整编第三十六师于澄(城)合(阳)战役再次遭到歼灭性打击之后,胡宗南集团于8月11日急调部队增强蒲城、大荔地区防御,并将主要兵力集中配置于交通线上,企图堵西北野战军南下和再出西府。此时,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战场上开展了大规模的秋季攻势。西北野战军为配合全军的作战,拟于10月初向胡宗南集团发动新的进攻。因此,决定集中全部五个纵队的兵力,以求歼国民党整编第十七师、整编第三十八师为目的,发起荔北战役。

1948年10月5日拂晓,西北野战军各纵队在澄合以南的交道镇、岱堡、黑池镇地区集结完毕。6日拂晓对据守永丰镇、醍醐镇、酥酪、寺前镇、韦庄、两宜镇及双泉镇之整编第十七师和骑兵第四团展开全线攻击。当第一纵队第三五八旅之七一四团以轻装急进直插国民党防御阵地侧后之张家城,切断了韦庄至酥酪国民党整编第十七师师部与第四十八旅之联系后,国民党军阵势大乱,第四十八旅旅长率旅部企图南逃,被七一四团堵击,歼其一部,生俘国民党旅长万又麇等。战至11时许,除双泉镇骑四团大部逃向大荔,永丰镇、韦庄之国民党军正在围歼之中外,北党村、西观、寺前镇、醍醐镇、酥酪、临高

各设防据点均被攻占,国民党第四十八旅大部被歼,少数残兵逃向朝邑县。14时,第二纵队独立第四旅、第三五九旅攻克东家村、新村,将国民党第十二旅第三十四团大部歼灭,残部逃向韦庄。此时困守韦庄之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七师师部、第十二旅旅部及第三十五团,既不能解第三十六团之围,又无信心坚守,乃于黄昏拼命向西南方向突围,被歼一个多营,余部向唐家堡方向逃窜,并在整编第三十八师火力掩护下,西渡洛河逃去。

7日,西北野战军调整部署,决心由追歼整编第十七师转向对整编第三十八师进攻。凌晨各纵队开始准备,午后在炮火准备之后发起猛烈冲击。至15时,占领唐家堡、乌泥村、汉村、八岔口等阵地,歼国民党第一七七旅第五二九团全部及第五十五旅一部,其残部沿铁岭山向西南溃逃,第二纵队追击至老君寨之洛河岸边,俘虏千余,缴获该师全部重武器及其他大量军用物资。第三纵队追击至船舍渡附近,歼灭增援之国民党军整编第一师第一六七旅第四九九团一部。南逃之敌,溃不成军,一部被俘,一部淹没于洛河之中。

在主力攻歼整编第三十八师的同时,第六纵队则乘胜直逼大荔城郊,国民党裴昌会之第五兵团司令部在整编第三十六师残部掩护下,仓皇向洛河南岸逃窜。被围于永丰镇之敌第三十六团,抵抗不支,15时突围又未得逞,是夜即被第四纵队全歼。第四纵队乘胜挺进到蒲城以东之孙家庄。

另以第三纵队独立第五旅十五团三营与黄龙分区、韩城、合阳地方兵团组成的南进支队6日进到朝邑县,争取了该县国民党军地方部队两个大队1100余人起义,解放了朝邑城,截俘了由寺前镇逃出之国民党军。7日又解放了平民县。第四纵队骑六师于5日攻占了铜川县之周家岭,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多连,击溃由铜川来援国民党军一个团。黄龙军分区警备第四旅于6日攻占了蒲城西北之高阳镇,消灭国民党军蒲城保安团第三营,收复了白水县城。

至此,战役第一阶段结束。此时,胡宗南集团为挽救其荔北败局,迅速集中了整编第一师、整编第六十五师、整编第九十师、整编第七十六师、整编第三十六师及整编第三十八师第五十五旅、整编第十三师第一三五旅共13个旅约9万人,实施反击。

10月10日、11日,国民党反击各部与西野第二、第三、第六纵队在胭脂山、汉村、李家坡、大壕营一线多次交战,形成对峙局面。12日,西北野战军向国民党发起总攻。胡宗南紧急派西安绥署所属榴炮连、战车连及飞机十余架支援作战。战斗中,西北野战军虽大量杀伤消耗了国民党军,但自己伤亡也

相继增加。在此情况下,西北野战军立即改变方案,除以一部兵力与国民党保持接触外,主力稍向后撤,占领有利地形,以求在新的防御作战中寻机消灭国民党军。

13日,国民党又调来整编第一师一个旅、整编第七十六师、整编第十三师第一三五旅和整编第三十八师第五十五旅等七个旅的兵力,再次实施反击。但其见西北野战军后撤占领有利地形,疑有诈,进攻行动十分谨慎。西北野战军见不易割裂国民党军,乃决定将主力迅速北移。国民党军发现西北野战军有组织地撤退,亦不敢追击,只随后尾逐步向前推进,直至16、17日占领合阳、澄城后停止前进。

当国民党主力北进,其后方空虚之际,第四纵队并指挥黄龙军分区之警备第四旅于14日至17日扫除了蒲城、富平两县内之龙阳镇、党睦镇、兴市镇、美原镇、流曲镇各点的地方反动武装及敌后留守部队,截断了大荔经蒲城至富平的公路,歼国民党整编第一师第一旅山炮营及保安团等700余人。至此,战役结束。

荔北战役,是西北野战军于1948年10月在陕西大荔以北地区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平原地区攻坚战役。此役共歼国民党军2.5万余人。

十六、冬季战役

1948年11月上旬,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联合发起了淮海战役。为了牵制胡宗南这一战略集团不使其增援淮海战场,同时也为了保证西北野战军能顺利进行冬训,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决定发起冬季战役。

西北冬季战役,是西北野战军为粉碎胡宗南集团在西北战场上的“机动防御”所进行的一次运动战战役。此役共消灭国民党军2.5万人,收复与巩固了澄城、合阳、白水地区,保障了西北野战军冬季整训的顺利进行。

11月20日,西北野战军将第一、第四两个纵队及警备第四旅、骑兵第二旅组成右翼兵团,向铜川、耀县之国民党攻击,引其西援;将第二纵队、第三纵队、第六纵队组成左翼兵团隐蔽集结于洛河两侧地区,准备侧击西援之国民党军。

11月21至23日,右翼兵团先后在韩村、康庄、草滩歼国民党第十七师大部,在军台岭、店子坡消灭国民党第二五四师一部。此时左翼兵团占领了新村、史家山、金粟山一线地区,准备伏击西援之国民党军一部。

国民党军在右翼兵团的积极行动下,误认为西北野战军主力在铜川、耀

县地区,即令第一军、第六十五军等部迅速回援。同时以驻守澄合地区之第七十六军、第九十军及第一六五师南撤西调。

根据以上情况,西野立即由待伏转为攻坚,决心乘国民党主力分散之机,将第七十六军歼灭于永丰镇地区。25日,西北野战军向石羊、坡头、曹村之国民党第二十四师发起攻击,当即歼国民党军一部,余部向东逃跑,与第二十师及其军部会合一处,死守永丰镇。当晚,为加强对第七十六军的攻击力量,第三纵队,协同第二纵队渡过洛河,迅速包围国民党军并肃清永丰镇外围据点之国民党军。28日拂晓,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对国民党军发起总攻,6时攻破寨墙,10时战斗即告结束,国民党第七十六军全部就歼,俘其军长李日基、参谋长高宪岗以下官兵1.7万余人。距永丰镇以南五公里之国民党第九十军及第一六五师,在第三纵队独五旅、第二纵队第三五九旅第九团及独六旅第十六团的顽强阻击下,未能前进一步,眼望着第七十六军被歼而无能为力。国民党第一军、第六十五军、第三十八军、第五十五师以及守备蒲城的第十七军第十二师,因惧怕中途侧击,绕道蒲城南之党睦镇、船舍渡之线前往救援,28日才到达八岔口,待其29日赶到永丰镇、韦庄、临高地区时,西野已打扫完战场,安全撤离。

十七、春季攻势

1949年2月,遵照中央军委命令,西北野战军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原各纵队改称军,旅改称为师。第一野战军完成整编后,决定发起春季攻势作战,以第四军向铜川、耀县之国民党军进攻,吸引国民党军主力西顾,集中第一、第二、第三、第六军围歼蒲城之国民党军。

2月20日,各军按计划向国民党军发起攻击。至21日分别攻占铜川、耀县、蒲城等地,消灭国民党军千余人。当一野各部向铜川、耀县、蒲城开进之际,国民党第三十八军、第十八兵团及第六十五军、第九十军、第七十六军之第二十师残部,第六十九军、第十七军之第十二师等四个军另两个旅,于2月19日相继退守乾县、泾阳、三原、富平及其以西地区。野战军总部决定以东府分区地方兵团进至大荔、朝邑地区展开游击战争,以第三、第六军于2月24日向富平追击前进,第一军、第二军进至玉都村、阎良镇地区准备打援,骑兵第二旅进至田市镇地区游击。25日晚第三军之第九师向富平攻击,26日晨全歼守城国民党地方武装400余人,国民党第三十师逃往泾阳。

第四军于24日向淳化发动进攻,国民党军弃城逃窜。第四军猛追,消灭

国民党军 400 余人,占领淳化。26 日国民党军急调第七十六军之第二十师及第十四师之四十团残部,在朱家庄、口头镇地区转入防御阻止第四军继续南进。第四军于 28 日夜向该部进攻,3 月 1 日全歼该部,俘国民党第二十师师长诸静亚以下 1500 余人。

铜川、蒲城、淳化、耀县、富平解放后,国民党以 11 个师的兵力,集结于三原、高陵、泾阳及咸阳以北地区,第三十六军(欠一个团)仍守备渭南、华阴地区,第八十四师仍驻守潼关。

青海马步芳集团惧怕胡宗南集团撤走后形成孤立,同时企图乘机向陕西扩张其势力,所以积极出兵配合行动。胡宗南集团得青马集团增援后,于 3 月 5 日集中其主力第一军、第三十八军、第六十五军、第六十九军、第九十军等共 11 个师的兵力实施反突击。以第十七军、第五十七军、第三十六军等十个师为第二线,守备三原、乾县、西安、渭南地区,以青马第八十二军四个骑兵团向淳化地区反突击。

第一野战军因暂时难获各个歼敌之机会,乃决心诱敌深入,争取整训,待机歼敌。3 月 5 日至 19 日,除以第四军之第十师于 11 日在淳化以北之墓坳地区给国民党八十二军以严重打击,毙伤二四八师师长马德胜以下 1000 余人外,主力先后主动撤出淳化、耀县、富平、铜川、蒲城等县城,转移至黄陵、宜君、白水、澄县及大荔以北地区。国民党军进至铜川、美原镇、蒲城、龙阳镇地区后未敢继续前进。战役遂告结束。

此次战役,第一野战军消灭国民党军第二十师、陕西保安第四旅等 7000 余人,再次解放并巩固了大荔、朝邑、平民地区,并一度解放淳化、耀县、富平、铜川、蒲城及其广大地区,打击了反动地方武装及保甲组织。

十八、陕中战役

陕中战役是第一野战军进行的一次较大的追击战役,此役共歼国民党军第五十七军及第九十军第五十三师、第三十六军第一六五师等部 3.5 万余人,解放了胡宗南盘踞多年的老巢西安与关中广大地区,进一步打击了胡宗南及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集团,为西北战场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进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两大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的部分兵力发起的渡江战役,以及华北人民解放军解放太原,震撼了整个国民党反动阵营。在西北

地区的胡宗南集团慑于被歼,乃于4月25日起,从铜川、蒲城、龙阳镇、羌白等地后撤,至4月底,在三原、泾阳、高陵、临潼等地,跨泾、渭两河形成保守西安的弧形防御地带。准备在情况不利时退守汉中和四川。

1949年4月14日,第一野战军司令部获悉:胡宗南集团有全部撤至汉中的企图,并可能经川入滇。其部署是:除第九十军位于泾阳、第三十六军位于咸阳、第十七军位于西安外,第五十七军已撤至永寿,第三十八军已撤至礼泉,第六十九军已撤至蓝田,第一军则已车运到宝鸡。胡宗南集团军心动摇,退却避战,给第一野战军提供了有利的战机。为防国民党军南逃西窜,第一野战军决定实施迅猛进击,将逃窜之国民党军歼灭于运动之中。

5月17日晨,国民党军全部西撤,第一野战军决定全线展开追击。在泾河北岸,第二军在泾阳塔地区歼灭了担任掩护任务的国民党第五十三师大部。渡过渭河后,全军拼力猛追。第二军18日在行进间歼灭国民党第五十三师之残部及骑兵第二旅第四团一部,俘虏1200余人,乘胜解放了咸阳,当夜沿铁路线西进,19日解放了兴平、武功,20日进占扶风、岐山益店镇。第四军于18日攻克礼泉,19日解放乾县,24日进占关头、永寿。第一军18日进至咸阳西北,后经武功、崇正寺于20早日进至岐山、横水镇等地,一路未遇国民党军大的抵抗。第三军20日进至临平地区。第六军经咸阳直下西安,20日拂晓在咸阳以东抢渡渭河,突破国民党暂编第二旅的防御,前出到西安城郊,此时西安守军第十七军主力已向西安以南之秦岭山区逃窜,第六军以一部兵力进行追击,在行进间歼国民党第四十八师、第十二师一部和暂编第二旅大部,解放了户县,主力于20日1时进入西安城。

5月22日,国民党第五十七军及第三十师在逃跑中,被第四军、第一军追歼于凤翔东北之姚家沟,俘虏8000人。第二军同时攻占凤翔、虢镇、眉县。至5月31日止,宝鸡以东、渭河南北广大地区均被解放。

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在国民党以陕甘两省军政大权钓饵的诱惑下,相继举兵南下,企图与胡宗南集团联合,实施反扑,扭转败局。胡宗南见青宁二马倾兵增援,也令各军暂停撤退,并摆开与二马联合,向人民解放军反扑的架势。

6月9日,调归第一野战军序列的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一军赶到西安,接替第六军防务,第六军随即西进到阻敌地区。第六十军由潼关快速开进西安。归建的第七军已到合阳。

6月11日,青宁二马兵力在马继援率领下发起全面进攻。人民解放军节

节抗击,给国民党第一二八军、第十一军、第一零零师、骑八师和第二四八师以千余人杀伤后转移。

6月12日,国民党马继援集团发现人民解放军东移,即尾随向东继续进攻。当马继援集团进至咸阳以北后,即向人民解放军防御阵地猛攻。第十八兵团先头部队给其迎头痛击,国民党军发起多次猛攻,第十八兵团依托有利地形,组织步炮火力,给其以重大杀伤,国民党军死伤2000余人,锐气顿挫。孤军冒进的胡宗南集团第三十六军第一六五师于13日被第二军包围歼灭于金渠镇地区。与此同时,进攻西安外围之国民党第三军、第十七军、第六十九军也被第十八兵团部队所击退。国民党多处进攻,多处受挫,士气低沉,无心再战;又发现第十八兵团已经全部到达西安、咸阳地区,第十九兵团正向西安方向急进,遂于16日至19日分路向乾县、永寿、扶风、眉县地区撤退。人民解放军也考虑到第十八、第十九兵团等部队刚刚入陕,尚需短期休整,因此未组织对国民党逃军的追击,故此战役结束。

十九、和平解放榆林

第一野战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即以绥德分区地方兵团与游击队、民兵长期围困榆林之国民党第二十二军。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土崩瓦解,榆林人民及国民党二十二军广大官兵逐渐觉悟,要求榆林当局迅速下决心和平解放榆林。在此形势下,国民党第二十二军乃派出代表至延安,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宣布的八项和平条件,和平解放榆林问题,并愿意依据西北军区命令,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依据毛泽东、朱德总司令的命令,表示赞同二十二军这个意愿,接受二十二军代表的要求,依据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为基础,作具体的协商。于是,双方代表在延安开始正式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国民党反动派虽从中阻挠,二十二军内部也有少数人犹豫不决,但西北军区始终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方针,力促榆林和平解放。5月下旬,参加围攻太原之独立第一师返回榆林地区,增加了榆林地区人民解放军的力量,终促使第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等定下决心。5月29日双方代表在协议书上签字,6月16日左协中发出通电,表示“与国民党反动派完全断绝关系,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主张,服从中共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及人

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的领导,依照民主原则,在指定地点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脱离黑暗,走向光明,永远为人民服务”。西北军区即依据协议,将二十二军4000余人,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建制,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师,并接管了国民党在榆林的一切机关、企业,并改编与处理了反动地方团队,数十年来陕北反革命重要据点乃宣告解放。

二十、扶眉战役

扶眉战役,是第一野战军在转入全面进攻时,以相对优势的兵力,采取“牵马打胡、先胡后马”,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在陕西的扶风、眉县地区,对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和青宁“二马”(马步芳、马冯逵)部队进行的进攻战役。此次战役一举消灭国民党主力4个军9个师约4.3万余人,给胡宗南集团以致命打击,使西北国民党军完全丧失了战役进攻能力。

西北野战军整编为第一野战军后,下辖第一、第三两个兵团,华北第十八、第十九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并于6月先后西渡入陕,使第一野战军兵力由22万人增至42万人,为迅速解放大西北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1949年6月,第一野战军在击败胡、马联合反击后,乘胜追击,第十九兵团已进到三原集结,第二兵团到达礼泉,第十八兵团进抵兴平,第一兵团已集结户县地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为贯彻中央军委关于解放大西北的战略部署,决心抓住战机,集中优势兵力予敌以各个击破,遂制定了先牵“马”打胡,后牵“胡”打马的作战方针,以一个兵团钳制“二马”,集中三个兵团首先在扶眉地区将胡宗南集团就地全歼,不使南逃,尔后再解决“二马”。

战役从7月10日开始,担任钳制部队之第十九兵团首先行动,按时进入指定地区,构筑工事,扬言进攻,迷惑国民党军,掩护主力行动。担任主攻的第一野战军各兵团于11日拂晓开始进攻,第二兵团渡漆水河绕道西进,向国民党军侧后迂回。于12日占领罗渠镇、眉县车站,截断了国民党军退路。第十八兵团分三路由东向西攻击前进,12日克武功,消灭国民党一部。第一兵团主力沿长、益公路及秦岭北麓两路并进,12日消灭国民党第九十军军部,并占领哑柏镇、横渠镇诸要点。第一野战军主力在一天之内,即切断国民党军西逃退路,北、东两面已插入国民党军纵深,南面已在向眉县急进中,在国民党军四周只剩眉县一个缺口尚未封闭。

胡宗南集团判定人民解放军要向其进攻,但未料到人民解放军能一举包围其在扶眉地区的全部兵力,更未料及迂回其侧背。眉县当时虽是一个缺口,国民党军亦未敢利用而由此逃走。因没有大量渡河器材,国民党军不敢轻易南渡渭河,怕人民解放军迅速逼近河岸,使其处于背水而战的险境。所以除驻眉县之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和第九十军残部越秦岭逃走外,余部被包围。

至12日中午,国民党三个军之大部及第十八兵团部全部被压缩在午井镇以西、高王寺以南、罗镇以东之渭河河滩。下午3时,人民解放军对该部发起全线总攻,国民党军始妄图南渡,但为时已晚,经5个小时激战,除一部泅水南渡外,均被歼灭。泅水南渡之军已成溃兵,正逢第一兵团于黄昏时占领眉县,当即控制河滩,泅渡之8000余溃兵全部为第一兵团俘获。第十八兵团于12日午夜与第二兵团会师。至此,主要国民党军已歼。第二兵团乘胜西进,14日攻克宝鸡,占领凤翔;第一兵团按原计划西追国民党逃军,13日围歼国民党第五十三师一部于马营镇地区,14日占益门镇。扶眉战役至此胜利结束。

二十一、十九军西进战役

到1949年初,人民解放战争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西北战场,第一野战军发动陕中战役,解放渭北各县后,直逼西安。5月1日,奉中原军区命令,在陕南军区部队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九军(兼陕南军区),下辖五十五、五十七师,开始了解放全陕南的步伐。

此时,陕南前线的国民党军为掩护其主力部队在关中地区作战的侧后安全,保住入川退路,将安康地区列为战略重点之一,投入两个军的兵力,建立了以白河天池岭为重点的南北长75公里的第一道防线;以平利、竹溪之间关垭子为重点的南北长90公里的第二道防线;以平利女娲山为重点的南北长50公里的第三道防线。6月初,胡宗南又急调两个军和四川的第一一零军增援安康。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第十九军从湖北省郧阳地区出发进行第一次西进作战。

5月24日,第十九军进至白河向国民党守军实施包围,于当日下午发起攻击,首战告捷,全歼国民党守军二十七军一四零团和地方保安团2700余人,收复白河县城,打破了敌之第一道防线。5月30日,五十七师解放竹溪县后,从正面佯攻关垭子至老阳山之国民党军。五十五师采取迂回战术,取道深山

密林,冒雨前进,侦察分队化装突袭,智取高桥,攻下险要十八盘。先后歼国民党九十八军一个团和另一个团大部 2200 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之第二道防线。31 日解放平利县城。

白河、竹溪、平利的解放,使胡宗南极为震惊,急调第三军和六十九军增援,加强对安康外围的防守。6 月 6 日,第十九军奉命撤离平利县,驻湖北省竹溪县西部地区休整,以五十七师一部牵制国民党军,阻国民党军于鄂陕交界的关垭子以西地区。在此期间,十九军和平竹边界进行了两次阻击战。6 月 7 日,国民党六十九军、二十七军、九十八军的四个团,向十九军一七〇团阵地双龙寨、蒙西垭、马盘山发起多次冲锋,均被击退。此战毙伤国民党军 500 余人,俘虏 400 余人。6 月 20 日,国民党军一五三师、一四四师、一一七师、一五八师、三十一师等 5 个师向十九军守卫的老阳山、鹰嘴崖阵地发起猛攻。十九军一七一团激战一天,击退国民党军五次集团冲锋,毙副师长以下 573 人。

7 月 10 日,十九军为配合第一野战军发起的扶眉战役,向陕鄂边界关垭子三个师的守军进攻。十九军一部从正面佯攻,钳制国民党军,集中主力从左右两翼实行迂回包围。经猛烈攻击,断其退路。这次关垭子战斗,歼国民党一四四师师长符树蓬以下 1360 余人,击毙国民党四〇三团团长李定邦,打死打伤 800 余人,收复平利。

7 月 17 日,十九军继续西进,向女娲山进逼。五十七师沿汉白公路正面进攻,五十五师从洛河、大贵绕道 100 余公里,迂回于女娲山后侧的老县。20 日,国民党守军受到前后夹击,全线溃退,胡宗南精心经营的第三道防线随之瓦解。22 日,十九军乘胜攻下狗脊关、药王寨,直抵牛蹄岭。

牛蹄岭,位于安康城东南,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是安康城的天然屏障。胡宗南以三个军的兵力,构筑坚固工事固守。7 月 23 日,十九军和安康军分区独立七团,发起牛蹄岭战斗。经过 19 次反复争夺,终于占领牛蹄岭。24 日晚,解放军攻进安康新城和老城的西关。此战毙国民党军 200 余人,生俘 550 余人。

牛蹄岭战斗结束后,因第二野战军主力部队正向大西南后方迂回包抄,十八兵团暂停向南进军,十九军也奉命撤离安康,移驻平利县和旬阳县蜀河区休整待命。第一次西进战役结束。

此役经过两个多月,接连摧毁国民党军 4 个军设立的 3 道防线,解放 3 座县城,其间进行了 30 多次战斗,毙俘 1.2 万余人。

二十二、秦岭战役

扶眉战役之后,第一野战军实行“钳胡打马”的作战方针,对胡宗南残部没有进行追歼,以防其过早撤退入川。胡宗南利用这个机会,将其残部部署于陕西安康地区至甘肃天水老山村一线,组成所谓“不可攻破的秦岭防线”,以确保汉中,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四川。

在第一野战军主力进军甘肃时,除命令第十八兵团之六十二军为野战军总预备队,随野战军主力西进外,以第六十军及六十一军之一八三师位于宝鸡及外围地区,控制要点,构筑工事,担负钳制胡宗南部于秦岭之任务,并相机消灭国民党军一部;第六十一军(欠一八三师)仍位于西安及其以南地区担任警备。1949年8月中旬,第一野战军决定在攻击兰州的同时,由第十八兵团发起秦岭战役,以策应野战军主力作战。

为打好秦岭战役,确保各个歼灭国民党军,第十八兵团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调整作战部署,以第六十一军两个师附兵团炮兵团位于宝鸡、益门镇,暂取守势,准备从正面出击,配合第六十军行动;第六十军首先歼灭孤立深入七里沟的国民党第一七七师,尔后向川陕公路进攻,并提前于29日13时突然发起战役行动。

国民党第一七七师与第六十军接触后,发现解放军兵力强大,于28日夜间向后收缩。第六十军随即向南进攻,在能见度极差的秦岭原始森林里披荆斩棘,翻沟爬坡,秘密接近国民党军。29日14时,第一七八师向七里沟攻击,国民党军不支后撤,该师跟踪追击,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防线;至18时,第一七九师突然出现于五林子之敌侧后,国民党军猝不及防,一部被歼,一部仓皇逃窜;第一八〇师于16时占领汉王丞、狗头寨。30日,第六十一军两个师附兵团炮兵团从川陕公路正面及其两侧发起攻击,国民党第三十八军五十五师以一部据险抵抗,掩护主力向东河桥及东南山地撤退,国民党第三十六军亦向南撤退,六十一军乘势相继占领观音堂、天台山、秦岭垭口、东河桥、黄中铺等地,并消灭国民党军一部,占领秦岭主峰。接着第六十一军两个师和第六十军一八〇师向核桃坝、进口关、咀头地区进击,以求歼灭向南退却之国民党第三十六军。30日24时,第一八〇师由黄牛铺出发,经河口洞、安河寺向核桃坝前进;第一八一师(欠插入进口关之第五四一团)、一八三师由东河桥出发,分别经南岸沟、杨家河向核桃坝、平木地区追击。各部队均于9月1日进至上述地区。之后,第一七九师沿川陕公路向凤县追击,第一七八师向唐

藏方向发展,第一八〇师向东南推进,与第六十一军合歼核桃坝之国民党军。此时,国民党第三十六军退至黄李园、丁家坪、黄牛湾一线顽抗。因国民党军已猥集在双石铺、两当地区,加之秋雨连绵,山区严寒,供给困难,第十八兵团于9月6日下达停止进攻命令,秦岭战役即告结束。

秦岭战役共消灭国民党军3741人,将其第三十六军、三十八军及骑兵第二旅等5个师重点防线全部摧毁,打开了通向汉中的门户,为随时入川,配合第二野战军解放西南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十三、陕南战役

1949年10月底,在全国范围内,华北全境和华东、中南、西北大部地区获得解放。国民党先是妄图依靠残存的两大主要军事集团胡宗南部、白崇禧部和四川地方军阀,以陇南、陕南为决战地带,以川陕边为守备重点,沿秦岭、大巴山、巫山、武陵山构成所谓西南防线,阻止人民解放军从北线进入四川。继而发现人民解放军有从鄂、湘西进川、黔迂回重庆和成都的意图,随即令胡宗南部由秦岭、大巴山南撤入川。

12月3日,就在胡宗南部加速南撤之时,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发出了加速进军的命令,决定全兵团及配属部队立即全线出动,首先解放陕南、陇南,主力集结川陕边境。5日,人民解放军分左中右三路追击前进。

右路第六十二军由岷县向西固、武都方向进攻;第七军由天水出发,以一部向武都进攻,以另一部向徽县、略阳进攻。至30日解放了全部陇南地区。

左路陕南军区三个独立团翻越秦岭后,分向东江口、宁陕、两河口等地进攻;第十九军由安康沿汉江两岸向汉中进攻。第五十七师经安康、汉阴、石泉向汉中方向挺进;第五十五师经平利,攻打岚皋、紫阳,向西乡、镇巴方向进攻;两郧、商洛、安康等军分区独立团和各县大队,分别负责清剿当地的残敌,以巩固后方。从11月26日至12月7日,陕南十九军各部边战边进,消灭国民党军一部,并顺利占领各县城,第五十七师在汉中与南进的第十八兵团一部会师。

中路第六十军由宝鸡以南沿川陕公路南下,向勉县、宁强进攻。进占留坝县城后,因新店子桥、天心桥遭国民党破坏,两端设有雷区,便改走鸡头关古栈道,顺利进占褒城、汉中、勉县。

在第十八兵团入川的过程中,第七、第十九军和陕南地方部队积极配合,进行了陕南陇南作战,共消灭国民党军1.3万余人。

第五章 重大事件与会议

第一节 重大事件

1. 陕甘宁边区的民主选举运动

为维护 and 推动全国的和平民主与团结,进一步发展陕甘宁边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建设,也为给全国作出榜样,边区政府于1945年9月6日,发出关于选举工作的训令,决定于1945年10月15日至12月底举行乡、县、边区三级政权改选。

这次选举的原则是:坚持不分阶级、党派、民族、性别、信仰,不受财产与文化程度的限制,普通、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

选举的基本方针是:在三三制政策的精神下,发扬民主,团结人民;放手发动群众,检查政府工作和人员,教育干部,整顿作风,改进工作;自由选举,选举好人;健全民主制度,加强地方自治。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的普选工作作了周密的部署,并精心地进行指导。西北局发出党内指示,要求全党切实执行政府有关选举工作的训令、法令和指示,把普选工作“当作当前最中心工作之一”,加强领导,真正做好。经过一个月左右的边区和分区试点试选,三级选举的基础乡选工作于10月中旬全面铺开。在乡选工作将要全面展开之前,边区政府选举委员会就“如何贯彻选举工作方针”,“如何放手发动群众检查政府工作和工作人员”,“如何选举代表”,“如何开好代表会”,“如何改乡议会为乡人民代表制”等问题作了具体指示。

这次普选分选民登记、检查政府工作、酝酿候选人、正式选举四个阶段进行。原定于1945年12月底完成,但由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准备发动内战的影响和干扰,致使边区新的一届参议会迟迟不得召开,整整推迟了三个月,直到1946年4月2日,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召开,27日闭幕。以此为标志,陕甘宁边区的乡、县、边区三级选举工作正式结束。

在历时半年的陕甘宁边区三级普选中,全边区 38 个选举单位参选人数平均占全部选民的 82.5%,有的达到 90%。各党派、各阶层、各民族、各方面公正人士、优秀人物、劳动模范被群众推举为人民代表,组成权力机关,为人民议事办事。经过选举,仅乡一级即选出代表 30519 人,其中共产党员 1066 人,无党派民主人士 7274 人,提出了 47366 条批评和建议。推选出出席边区参议会的正式参议员 135 人,候补参议员 35 人。按本人出身统计,工人 6 人,贫农 69 人,富农 26 人,地主 34 人,商人 9 人,其他 8 人。从党派关系统计,共产党员 61 人,旧国民党员 19 人,救国会派一人,无党派 89 人。从民族成份看,其中汉族 164 人,蒙古族 3 人,回族 3 人。从性别看,其中妇女 7 人。

2. 减租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出于“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主张,继续在解放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 1945 年 12 月 25 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1946 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对此作了阐述。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根据陕甘宁边区执行减租减息政策的实际情况,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对开展减租运动作了具体安排。西北局在 1945 年 12 月 28 日《关于 1946 年边区工作任务的指示》中,要求各地“研究历年减租情况,继续进行查减,并整理租佃关系”。1946 年 4 月召开的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进行查租保佃、贯彻减租方针”的提案。7 月 16 日,边区政府发出《关于减租和查租的指示》,具体规定:“在减租已较彻底的绥德和关中一带,应以复查和保佃为主;在减租尚不彻底不普遍的陇东庆、合、镇一带,应以减租、退租、勾欠、换约、保佃为主;在安边除切实依照租佃条例进行退租、勾欠、换约、保佃,达到彻底减租外,同时应根据其具体情况适当照顾各阶层利益。”并且重申:地主非法倒算的土地应退还农民耕种,地主假典假卖、抬高租额、骗取陈租、明减暗不减等不法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并补偿农民的损失。

1946 年 5 月 4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将抗日战争以来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但是,鉴于当时全面内战尚未爆发,国共关系尚未最后破裂,为了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社会力量,减少变革农村土地关系中的阻力,中央这个指示又规定,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不是无条件地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而是除了没收和分配极少数大汉奸的土地之外,主要通过清算、减租、减息、献地等方法,使农民

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7月,中共中央又考虑根据孙中山赎买地主土地的主张,对一般地主的土地采用发行土地公债的办法进行征购,然后分配给农民。根据中共中央的新政策,陕西解放区农村的减租运动向前推进了一步,不少地方的农民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起来清算地主,有的地方地主主动向人民政府献地,有的地方人民政府准备发行土地公债征购地主的土地。不久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军进犯陕甘宁边区,致使这场改变农村土地关系的群众斗争,暂时停了下来。

3. 瓦解国民党两次“反苏反共”游行

1946年春,国民党政府以收回“中东铁路”路权为幌子,密令全国各地组织“反苏”游行。阴谋借以打击中国共产党,并为进行全面内战做准备。陕西的国民党当局更企图借组织“反苏”游行,打击国统区的中共地下组织,打击同中共合作的民盟组织,整垮《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等进步报刊,为他们的内战政策清扫障碍。

西安的第一次“反苏反共”游行发生于1946年3月1日。早于2月25日,陕西省教育厅厅长王友直召集西安各中等以上学校校长开会,强制各校组织全体师生参加3月1日的游行。由于各校民青组织采取紧急措施,不仅使参加游行的人数大为减少,而且使游行的人大都在途中离散,瓦解了游行。

由于第一次反苏反共游行未达到其原来预计的目的,国民党陕西当局又责令三青团陕西支部动员陇海铁路沿线学生参加,于3月16日在西安举行第二次游行。鉴于第一次反对反动游行的经验,“联合版”和各校民青组织做了充分的瓦解工作。(1)“联合版”于3月8日发表《学习“五四”青年优良传统》专文,指出“五四青年的优良传统为‘完全自发’的,极端纯洁的,绝对民主的,了然清楚的,反面的陪衬着这次西安学生游行是当局的强迫,特务学生的受人金钱,国民党的操纵包办,一般学生的糊糊涂涂,启发学生,以自发的、纯洁民主的、了然清楚的精神,开展真正的民主运动”。教育学生提高政治警惕性,不再上国民党的当。(2)陕西师专的民青社组织,集中揭露特务学生、第一次游行的大会主席曹积德的种种丑行,使其威信扫地,迫使这所第一次游行的“领头羊”学校,再组织不起参加游行的“全校力量”。(3)各校的民青社组织采取合法的斗争手段,取得“由学生会代表表决是否参加游行”的胜利,结果大部分学校难以做到由学生会表决通过以“学校”名义参加游行,“出师无名”,三青团的分团部把学生组织不起来了。(4)杜斌丞、杨明轩、张锋伯、

张凤岐、刘文伯等知名人士直接或间接地向重点学校的校长作解释,规劝他们不要再强迫学生参加“游行”。这样以来,国民党中央社原来吹嘘报道将有4万学生参加的西安第二次“反苏”游行,仅以寥寥千余人参加而草草收场,完全失败。

4. 印刷工人罢工

1946年4月,西安印刷业工会的全体会员,由于生活无法继续,向报馆老板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并表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19日,印刷工人宣布罢工,并发表《告西安人士书》写到:“抗战业已胜利,物价飞涨,而每个工人的工资每月平均不到1.5万元。谁无父母,谁无妻子,以此庞大的物价指数,如何支持?”西安各报的停刊,更加引起社会各界对反动政府的不满,纷纷支援工人斗争。最后政府不得不答应各报工人待遇自4月1日起,每人按4月1日以前工资增加1倍。

5. 李敷仁事件

1946年5月1日,中共秘密党员、民盟西北总支部青年部主任、西北民主青年社负责人李敷仁在西安去民众教育馆的路上,突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绑架,被解往咸阳北原陈老寨附近的战壕里。特务们随即连开数枪,李敷仁倒在血泊里。所幸子弹未伤要害,被当地群众发现,将李抬往村里治疗,并将其多处转移。不久,中共地下组织派人将其护送到马栏,后转往延安,任延安大学校长。

6. 东江口惨案

1946年6月,中原解放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进入陕南。8月9日,为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真内战假和谈的阴谋,中原解放军干部旅旅长张文津、政治部主任吴祖贻、中原军区干部毛楚雄三人奉命从镇安县杨泗乡出发,前往西安同国民党胡宗南部谈判,行至宁陕县东江口时,被胡宗南部第六十一旅一八一团扣押。10日,张文津等三人及向导肖善义被秘密杀害于东江口。

7. 胡宗南部进犯延安

1947年2月,国民党军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受挫后,又加紧对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蒋介石尤为重视,不仅亲临西安策划部署,而且亲自核准《攻略延安作战方案》。3月13日,在25架空军飞机的配合下,胡宗南对延安发动了猖狂进攻,出动兵力34个旅约25

万人,组成南、西、北三个集团,主力是胡宗南集团的15个旅约14万人,自洛川、宜川之线分两路直扑延安。青海马步芳和宁夏马鸿逵部12个师,榆林邓宝珊第二十二军两个师,分别由西面、北面予以策应配合。其后,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指挥七个旅,自宜川至龙泉镇一线发动进攻,企图攻占临真镇和金盆湾,尔后进攻延安;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八个旅,自洛川至旧县一线发动进攻,企图攻占富县和甘泉,尔后进攻延安。西北解放军与民兵对胡宗南军的进攻,予以顽强痛击。经三日激战,予其以重大杀伤,并阻敌于麻子街、马坊、金盆湾以南之线,至18日,沿金(盆湾)延(安)公路进攻的董钊部右路军仍未靠近延安市区,只推进到宝塔山以南。沿咸(阳)榆(林)公路进攻的刘戡部左路军也只越过大、小崂山,使胡宗南“三天内占领延安”的狂妄计划宣告破产。18日,中共中央机关及毛泽东、周恩来等撤离延安。19日,胡宗南部经过7天艰难作战,以死伤5200人的代价,占领了延安。

8.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

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受挫后,发动了对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为了粉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于1947年3月18日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转战陕北期间,中共中央在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同时,直接指挥了西北野战军的作战,先后进行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宜瓦等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队10万余人,西北野战军也由2万余人发展到近10万人。1948年3月,为更好地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中共中央东渡黄河,进入华北解放区。

9. 药王山惨案

1947年5月初,由于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柳林情报站主要领导成员张蓬(张智仁)叛变投敌,致使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情报科柳林情报站和“西北人民自救军”(1944年12月由关中地区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组织的革命武装)许多党员先后被捕。1948年4月19日,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命令将赛坚、武梦名、胡文选等32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由西安押往耀县,21日在药王山活埋。

10. 土地改革

1947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正式颁布实行。11月,中央西北局在绥德县义合镇召开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传达了全国土地会议的精神,并结合边区情况,揭露批判了干部

中存在的阶级观点模糊,怯敌和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右倾思想,及领导作风上的官僚主义、脱离党的路线、违犯政策、违反纪律等不良作风,作出彻底完成边区土改和认真进行整党的决议。

义合会议后,边区各分区和各县的党组织都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和贯彻义合会议的决议。随之,土改运动即迅速在边区开展起来。但运动进展不久,凡动起来的地区多片面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对地富乱斗、乱打、乱没收财产,有的甚至搞扫地出门。在佳县,有几个村庄连中农的东西都一律没收。在机关学校中,也出现组织贫农团等“左”的问题。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举行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做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1948年1月2日,西北局在绥德召开分区党政军和土改工作团党员干部会,参加者有200多人。习仲勋传达了12月会议精神,并着重指出在土改中如何划分阶级成份的问题。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依据毛泽东报告中所提的“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的土改方针,及必须“满足贫农雇农的要求”与“坚决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利益”的原则,对边区土地问题的情况作了具体分析,即大部分地区是经过土地革命的老区,人口有75万,包括延属、三边、陇东、绥德及关中一部分半老区,农民土地问题早已解决,仅有一些漏划地主、富农和个别地富非法收回土地的现象,少数地方也有分地不彻底的情况。有些地区是经过长期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的半老区,人口约45万,包括绥德分区以及延属分区富县的一部分。这些地区经过清算,征购地主土地以后,土地已大体分配,只是1947年春分地中,有些地主富农留地较多,土地质量也较好,一些富农的土地未动。就是解放不久的榆林地区,人口约10万,也进行了减租,清算和征购地主土地,大体与半老区相同。据此,会议决定,边区土地改革不能按人口再作平均分配,而必须是一般地采取“抽补调剂”的方针,即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按此方针,边区各地把地富所占较多较好的土地抽出来,补给地少地差的农民。同时,调查没收了漏划地主的土地和以多报少的“黑地”、公地和庙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纠正了前段土改中发生的偏差。从1947年12月到1948年4月,边区492个乡将近60万人口的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调剂土地90多万亩,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

11. 整党整风运动

1947年11月义合会议后,边区各级党组织召开干部会议,除讨论研究开展土地改革工作外,通过批评,整顿各级领导的思想作风,纠正工作中的各种偏差。同时,对农村基层组织开始进行试点整顿。1948年7月以前,有十多个农村支部进行了整党,取得了一些经验。

1948年7月19日至8月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地委书记联席会议,学习研究了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整党工作的指示》,全面总结了边区半年来的各项工作,具体安排了农村整党工作。西北局规定整党的方针是:“经过调查研究,发动和依靠党内外群众力量进行整党,即党内外民主结合。并确定以教育改造为主,把整党和发展党员结合起来。在处理党员问题上必须贯彻严肃慎重的态度,对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及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必须坚决清除出党。”具体步骤是:事前在党内外说明整党的意义、政策和方法,公开党的组织。先由党内开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讨支部和个人的工作,彻底揭发各种脱离群众的现象,使大家认识错误何在和如何改正错误。然后请群众选代表参加党的会议,尽量提出批评意见,再依据群众意见,在党内作进一步检讨,决定对犯错误人的处理办法。最后和群众共同开会,由支部和党员作自我批评,宣布处理办法,征求群众意见。同时表扬好的同志,吸收新同志加入党组织。在此基础上,进行支部改选,并建立必要的工作制度。

边区地委书记联席会议后,广大农村普遍开展了整顿党组织的工作。向党员进行了党的基本知识和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揭发了党内存在的成份不纯和作风不纯问题,批评了错误倾向,对阶级异己分子和严重违反纪律分子进行了处理,吸收了新党员,改选了党的支部,从而纯洁了党组织,提高了党员的思想觉悟和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加强了党在农村的核心领导作用。同时,结合整党,还整顿了农会,改选和加强了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密切了干群关系,提高了党在群众心中的威信。

12. 新式整军运动

从青化砭战役到沙家店一战的八个多月时间里,西北野战军完全打破了胡宗南部对陕北的重点进攻,由战略内线防御转向战略内线反攻,并且先后歼灭国民党军6.1万余人。边区解放军随着战局的变化在数量上也有了较大发展,其中西北野战军从两个纵队和两个旅的2.6万人,扩大到5个纵队7.5

万人;地方武装由1.6万人发展到3.4万余人。在野战军扩大部分中,解放兵成份增多了,有的连队甚至达到80%以上。这种情况就带来了一些需要解决的新问题,即部队中出现了阶级观点模糊,有的解放战士不知为谁当兵,为谁打仗,以及惧怕艰苦,违犯群众纪律,有的甚至在战斗中贪生怕死等各种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经中央军委批准,在西北野战军前委和彭德怀的直接领导下,从1947年12月上旬至1948年2月中旬,利用严冬季节部队休整之机,结合土改运动,野战军各部分别集中在米脂、绥德、清涧和志丹地区(第二纵队在山西曲沃地区),开展了以诉苦和“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

整军运动分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是普遍进行诉苦,即诉旧社会和受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之苦,弄清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提高指战员的阶级觉悟;第二步是开展“三查”,即在诉苦的基础上,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划清阶级界线和敌我界线,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坚定革命斗志;第三步是在诉苦、“三查”的基础上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高潮,为迎接战略外线反攻作战作充分准备。在两个多月的整军运动中,西北野战军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发扬了解放军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增强了部队的团结,加强了纪律观念,更加密切了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调动了干部、战士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使整个部队意气风发,士气旺盛,打败国民党军进攻的信心更坚定,部队战斗力更强大。

13. 延安光复

1947年3月中旬,西北野战军在成功地掩护了中共中央机关安全撤离延安,并给进攻的国民党军队以重创后,于3月19日主动撤出延安,转战陕北。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西北野战军先后发动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榆林、沙家店、宜川、瓦子街等战役,歼灭国民党军10万多人,收复与解放县城近30座。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为了牵动延安、洛川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南下,发动了西府陇东战役。胡宗南为保西安,急电延安守军何文鼎部回救关中。4月21日,何文鼎部弃延安城南逃。22日,被国民党军队占据一年一个月零三天的延安宣告光复。24日,中共中央电贺收复延安的伟大胜利。5月1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重新迁回延安城。

14. 反迁校运动

西安、咸阳解放前夕,大专院校学生反对和抵制国民党当局把学校迁往

四川和汉中的运动。1948年冬至1949年春,西北人民解放军逼近西安,国民党当局企图把西安的大、中学校迁移到四川和陕南。在中共西安地下组织的领导下,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的师生通过学生自治会发动学生在“民主墙”上张贴了许多反迁校的标语和意见,粉碎了国民党当局的企图。不久,胡宗南集团溃逃时又以集训为名,妄图把西安、咸阳等地大专院校的学生强迫带走。中共组织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发动学生实行“空校运动”,让学生分散在校外住宿,使国民党当局的企图未能得逞。

第二节 重要会议

1. 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

1946年4月2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参加会议的正式议员121名,候补议员21名。谢觉哉致开幕词。会议听取并讨论通过了林伯渠的政府工作报告,李鼎铭关于选举工作的报告,以及一些厅长关于各厅工作的报告。会议审查了边区政府以及部分议员向大会提交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等159件议案。其中绝大部分被通过。会议选举高岗为参议会议长,谢觉哉、安文钦为副议长,习仲勋等12人为常驻议员,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刘景范为副主席,贺连城等19人为政府委员。

2. 白鲁础会议

1946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在商南县白鲁础召开会议,讨论贯彻中央指示,在陕南建立根据地问题。中原局委员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戴季英和第二纵队司令员文建武等出席。会议决定将中原突围部队分散为七支,在镇安、郧西、商南、山阳等地开展工作,发动并依靠群众,创造豫鄂陕革命根据地。

3. 封地沟会议

1946年9月24日,中共豫鄂陕边区党委在丹凤县封地沟西沟老院召开扩大会议。中原局、边区及各分区主要领导人参加。汪锋主持会议,李先念宣布中共豫鄂陕边区党委正式成立,汪锋任书记兼豫鄂陕军区政委。并宣布了豫鄂陕边区各分区的区域划分与干部配备。

4. 枣林沟会议

1947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会议。决定成

立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由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前敌委员会,代表中共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率领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5. 小河村会议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前委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举行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总结了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第一年(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歼敌112万的伟大战绩。毛泽东根据解放战争第一年的战果,首次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从1946年6月算起)来解决的设想。

6. 义合会议

1947年11月,中共西北中央局在陕北绥德县义合镇召开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精神,批判了过去工作中的一些“左”倾偏向,做出彻底完成边区土地改革和认真进行整党的决议。

7. 杨家沟会议

即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报告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土地改革、整党、经济、统一战线方面的基本政策,提出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任务。

8. 西北野战军第一次前委扩大会议

中国共产党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于1948年1月7日至20日在米脂县杨家沟举行了第一次扩大会议,总结西北野战军在陕北九个月的作战,研究决定西北野战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的基本任务和进入国统区后的各项政策。11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周恩来,为会议作了《关于全国战争的形势》的报告。同日,彭德怀代表西北野战军前委作了《关于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的报告。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作了《关于土地改革中的12个问题》的报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就后方动员与后勤供应问题作了专题报告;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介绍了华东解放军一年来的作战情况经验。17日,毛泽东作重要讲话;20日,彭德怀作《关于我军转入外线作战的基本任务和进入蒋管区的各项政策》的报告。会议通过了《西北人民解放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明确规定了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的基本任务:一是大量消灭敌人,一是建立根据地。会议从方针政策上为开展新区和城市工作,作了具体规定和必要的准备。

9. 西北野战军第二次前委扩大会议

中国共产党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于1948年5月26日至6月1日在洛川县土基镇举行了第二次扩大会议。总结春季攻势,重点是西府战役的经验教训,确定部队整训计划和以后对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军的作战方针。全军旅以上干部参加会议。彭德怀在会上作了《春季攻势总结》报告。林伯渠、贺龙、习仲勋、王维舟等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春季攻势总结与目前工作指示》的决定。

10. 中共陕南区委党员干部会议

1948年7月10日,中共陕南区委党员干部会议在湖北省郧县召开。区委书记汪锋在会上作《关于陕南工作方针》的报告,将陕南根据地划分为三类:(1)正规根据地;(2)游击根据地;(3)游击区。并就不同地区的工作提出不同的方针。

11. 边区地委书记联席会议

1948年7月19日至8月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地委书记联席会议,学习研究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整党工作的指示》,全面总结边区半年来各项工作,具体安排农村整党工作。

12. 中共关中地委扩大会议

1948年9月12日,中共关中地委扩大会议在马栏召开。地委书记赵伯平作了《关于新区工作、整党领导等问题的总结报告》,对新区工作,强调解散一切特务组织;对地方武装,应以政治争取为主,武力清剿为辅;对学校及一切文化教育机关,必须坚决保护;对城市工商业亦应严格保护;新区政权不应过早民选;新区的社会改革,必须按实际情况进行;没有巩固的新区,应集中力量领导战争。对整党建党问题,亦提出明确的要求和规定。

13. 西北野战军第三次前委扩大会议

中国共产党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于1949年9月13日至22日在合阳县雷家庄举行了第三次扩大会议。讨论和贯彻中央关于加强请示报告制度的指令,总结半年来的新区工作,具体研究规定新区政策,研究决定秋季作战方针等。出席会议的有前委委员,以及团长、团政委以上干部157人。前委书记彭德怀主持会议并作讲话。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张德生作了《关于新区地方工作报告》。关于在新区的财经政策及实行供给制度的问题,张宗逊副司令员和刘景范后勤司令员分别作了报告。

14. 西北野战军第四次前委扩大会议

中国共产党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于1948年12月4日至6日在澄城县钱儿村举行了第四次扩大会议。研究部署冬季整训和开展地方工作问题。前委委员、各纵队和警备四旅、骑兵第二旅的领导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彭德怀主持,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和部队中攻坚经验还不普及、不熟练等问题,提出分两至三期整训部队的计划。彭德怀还作了《关于农会组织问题的讲话》,阐述了农会的性质和基本任务,提出了发动和组织群众所遵循的原则及要求。

15. 中国共产党西北野战军第一次代表会议

中国共产党西北野战军第一次代表会议于1949年1月11日至23日在澄城县武庄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113人,其中地方党的代表16人。会议期间,贺龙传达了中央政治局1948年九月会议关于在解放战争第三年争取打前所未有的歼灭战,加速夺取全国胜利的精神,和毛泽东关于“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指示;彭德怀传达了1949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所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党内指示和毛泽东1949年1月14日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并作了关于1948年几项工作的基本总结和1949年任务的报告;习仲勋、甘泗淇、张宗逊、张德生分别就城市政策和工作、提高部队纪律、加强党委制、地方工作等问题讲了话。23日,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一次党代表会议总决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关于提高自觉纪律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关于地方群众工作的决议》等重要文件。

16. 第一野战军第五次前委扩大会议

中国共产党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于1949年2月28日在富平县常家村举行了第五次扩大会议。会议由张宗逊主持,就部队作战、休整问题和开展蒲城、大荔、富平、耀县地方工作,建设区乡政权、地方武装、筹粮等工作进行了研究和讨论。

17. 青年团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

1949年3月11日至19日,青年团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到会代表108人,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组织部长马文瑞、边区政府代主席刘景范、西北军区参谋长张经武先后到会讲话。大会总结了建团经验,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首届代表大会关于当前青年运动

的基本任务和继续推进建团工作的决议》，选举由 15 人组成的新青团陕北行政区委员会。

18. 第一野战军第六次前委扩大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一野战军前线委员会于 1949 年 4 月 19 日至 23 日在澄城县平城举行了第六次扩大会议，由王震传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19. 中共陕南区委常委会议

1949 年 5 月 12 日，中共陕南区委在湖北省郧县召开常委会议，研究部署解放全陕南的工作，成立了由汪锋（书记）、刘金轩等六人组成的前方委员会，统一领导前线的党政军财工作。

20. 第一野战军第七次前委扩大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一野战军前线委员会于 1949 年 7 月 6 日在咸阳举行了第七次扩大会议。会议由彭德怀主持，贺龙出席会议，各军军长、政委参加。会议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制定了“钳马打胡”的作战方针，决定发起扶眉战役。

21. 中共陕北区委员会党代表会议

1949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8 日，中共陕北区委在延安召开了党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绥德、榆林、黄龙、三边四个地委和七个直属县委以及陕北军区党委的代表，共计正式代表 85 名，列席代表 42 名。会上，区党委书记李合邦作了《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报告，区行署第一副主任李景林作了《关于生产建设问题》的报告。

22. 西安市第一次各界代表会议

1949 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1 日，在西安市群众堂召开了西安市各界代表会第一次会议，出席代表 326 人，旁听 9 人。会议主席团由 29 人组成。西安市军管会主任贺龙，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出席会议，并分别作了《关于西安市人民当前的首要任务》和《真诚团结革命阶级》的讲话；西安市市长贾拓夫作了《关于两个月来接管工作及市政府目前中心工作任务的报告》。会议制定了西安市各界代表会组织规程，讨论了各项提案，选举产生了西安市各界代表会主席、副主席。

23. 西安市第二次各界代表会议

1949 年 9 月 18 日至 20 日，西安市第二次各界代表会议在西安市群众堂召开。341 名代表出席会议。会议主题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军管会文教处长张稼夫作时事报告，副市长方仲如报告第一次各代会后 40 天的政府工作。会

议还通过了中苏友协西安分会筹备委员会名单。

第六章 起义 投诚

在解放战争时期,陕西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军队(主要是地方团队)和政府(主要是县以下)里的一部分人员,反对蒋介石胡宗南的反动内战政策,不断举行武装起义和投诚,为陕西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彻底胜利,贡献了力量。

陕西国统区里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起义和投诚,有三个特点。一、大都是由共产党员领导,或经党组织通过统一战线工作促其起义和投诚的。二、起义投诚人员大都参加了地方游击队、地方兵团和野战军,增强了人民武装力量。三、由于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起义、投诚,一部分县城和地方得以和平解放,避免了战争造成的损失。

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队伍。中国共产党在其中建立有秘密组织,始终帮助改造它,终于使其于解放战争前线举义,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回到人民的怀抱。

1. 新编第十一旅安边起义

1945年10月25日,在共产党员牛化东、王子庄、冯世光、赵武臣等领导下,驻定边县安边的国民党新编第十一旅旅部和第一团举行起义。11月3日,起义部队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三警备旅密切配合,攻克负隅顽抗的第二团驻地宁条梁,击毙团长史舫城以下百余名,俘800余名。5日,起义官兵通电全国反对蒋介石打内战。起义部队整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十一旅,前代旅长曹又参任旅长,牛化东任副旅长,王子庄任参谋长。安边起义后,三边的国统区全境解放,陕甘宁边区政府新设了安边县治。

2. 第一六五旅一排起义

1946年8月14日,国民党整编第一六五旅四九四团一营一连第一排,在班长谷秀峰率领下,于宜川县雪白据点起义。在向解放区行进中与追兵激战,其中八人携带轻机枪二挺、步枪八枝进入解放区。

3. 陕西保安第六团第三大队起义

1946年8月15日,国民党陕西保安第六团第三大队,在大队长董策成率

领下,于旬邑县张洪镇起义,进入解放区。全大队计 207 人,携带长短枪 168 枝、机枪 4 挺。起义后部队编为新的“陕保六团”,董策成任团长。

4. 第一二三旅一个班起义

1946 年 8 月 27 日,国民党整编第一二三旅三六九团五连一个班 10 人,在班长陈宗元率领下,于耀县嵎邱镇起义,携带步枪 7 支、子弹 600 发、手榴弹 8 枚进入解放区。

5. 合阳县五福乡警备队起义

1946 年 9 月 8 日,国民党合阳县五福乡警备队长史建堂(共产党员)率部 120 余人起义,击毙乡长和自卫队指导员,俘自卫队大队长。后改称合阳游击队。

6. 二十二军二五七团一营三连起义

1946 年 9 月 25 日,驻佳县打火店国统区的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八十六师二五七团一营三连,在连长梅廷栋率领下起义。起义后部队编入新组建的陕甘宁边区绥德军分区独立团,梅廷栋任团长。打火店起义后,佳县的国统区全境解放。

7. 陕北保安指挥部驻横山部队起义

1946 年 10 月 12 日至 14 日,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胡景铎,在陕甘宁边区绥德军分区部队的配合下,率国民党驻横山县的第二十二军八十六师、新编十一旅各一部和陕西保安第九团 5000 名官兵起义成功。其间,胡景铎领衔通电全国,反对蒋介石卖国、内战、消灭异己。11 月 4 日,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正式成立,胡景铎任师长。7 日,胡景铎再次领衔通电全国,表示誓为粉碎蒋介石胡宗南进攻而战。横山起义使横山县和榆林县国统区解放,11 月以胡景铎为主任的榆横政务委员会成立,下辖镇川和横山两个县治。

8. 三原县陵前乡自卫队起义

1947 年 5 月 5 日,国民党三原县陵前乡自卫队队长黄子祥(共产党员)和副乡长孙志正(均为地下共产党员),率自卫队 30 余人起义,并收缴了马额乡自卫队的武器。包括自愿参加的人员,共百余人,携带机枪 1 挺、长短枪 140 余枝,进入解放区。9 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关中军分区领导的渭北游击总队第一支队。

9. 淳化县方里镇自卫队起义

1947 年 5 月 8 日,国民党淳化县方里镇自卫队队长宋彦芳率领 70 余人起义,成立方里支队,宋任副支队长。29 日改编为渭北游击总队第三支队。

10. 旬邑县自卫大队起义

1947年5月22日,国民党旬邑县自卫大队大队长马志超(共产党员)率领200余人起义,配合西北野战兵团南线部队解放旬邑县城。起义后,整编为陕甘宁边区关中军分区关中总队旬邑支队。支队长马志超。

11. 白水县保警队和预备队起义

1947年9月24日,国民党白水县保警队队长杨培才(地下中共白水县工委书记)、白水县预备队队长田焕贵(地下中共白水县工委副书记),组织起义成功,配合西北野战兵团南线部队解放白水县城。后改编为白水支队,杨培才任支队长,石生芳任支队政委。

12. 淳化县保安大队驻东柳分队起义

1947年秋,国民党淳化县保安大队驻东柳分队长张子信率领30余人起义。起义前配合渭北总队第五支队俘国民党保安中队长以下20余人。

13. 咸阳县保安团一部起义

1947年秋,国民党咸阳县保安团里的杨生茂一部起义,编入渭北总队第五支队,杨任二中队队长。

14. 白水东北区保安队起义

1947年10月1日,国民党白水县东北区保安队队长魏朗,率百余人携械起义。当地保甲被摧毁。

15. 黄陵县地方团队起义

1948年3月9日,国民党黄陵县保安团第五连连长张俊杰(共产党员)、三连连长李建邦、保警大队中队长张怀德率领200余人起义,县长许评芝弃城逃跑。10日,人民解放军一部进入县城,黄陵县和平解放。

16. 澄城县国民兵团二营投诚

1948年3月下旬,国民党澄城县国民兵团第二营营长杨荣轩,率部40人到冯原镇前线向人民解放军黄龙军分区澄城支队投诚,后杨任支队参谋。

17. 二十二军八十六师警备营一连三排起义

1948年8月1日,在府谷县第六区边沿起义的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八十六师警备营一连三排,在排长杨文德率领下携带步枪25枝、子弹400余发抵达府谷县城。后编为府谷县第二游击队,杨文德任队长。

18. 朝邑县保警队和常备队等起义

1948年10月6日,国民党朝邑县保警大队大队长杨海潮(共产党员)、朝

邑县常备大队大队长王宴亭(共产党员),率部 1100 余人,携长短枪 1300 余枝起义,并逮捕国民党县长、县党部书记长以下 200 余人,俘国民党军情报人员 50 余名。配合西北野战军解放朝邑县城。后改编为朝邑支队,杨海潮任司令员,王宴亭任副司令员,罗曼中任政委。

19. 陕东南突击大队起义

1948 年 11 月 12 日,国民党陕东南突击大队大队长李世华(共产党员),率部 370 余人在商县麻街起义。后抵达人民解放军陕南军区机关所在地湖北郧阳,编为陕南军区第二军分区商县支队,李世华任支队长,谢华任支队政委。

20. 淳化县方里镇保警大队一部起义

1948 年 11 月 16 日,国民党淳化县驻方里镇的保警大队第二中队的分队长俱兴义带领 30 多人起义,并在起义中里应渭北总队第三支队全歼保警大队,击毙队长赵应德。

21. 麟游县自卫团 14 人起义

1948 年 12 月 21 日,国民党麟游县自卫团分队长魏生林在共产党员刘耀庭的教育下,率领 14 人携枪 14 枝起义,加入麟游游击队。

22. 合阳县地方团队起义

1949 年 1 月 20 日,国民党合阳县长兼陕西省第八区保安副司令潘禹九,率地方团队 300 余人起义。在向人民解放军防区行进中,与胡宗南部第一二三旅游击小组遭遇,部分人员溃散,只有 90 余人携机枪 11 挺、步枪 70 余枝进入解放军防区。

23. 第三十八军搜索营第三连起义

1949 年 1 月 25 日,国民党第三十八军搜索营第三连在连长魏清智、特务长张光宇率领下,于三原陵前乡起义,隐蔽在共产党员萧德印、郭立三和进步群众家中。30 日进入解放区。

24. 白水县政府和县自卫团投诚

1949 年 2 月 1 日,国民党白水县自卫团团团长李新民、副团长冯博山,副县长李康子等 150 余人投诚,并将县长李宝衡拘捕送交人民解放军。计携来轻机枪 2 挺、长枪 60 支、短枪 5 支。

25. 旬邑县保安团起义

1949 年 2 月 11 日,国民党旬邑县县长兼县保安团团团长郝登阁,率保安团及所属 4 个乡公所人员 430 余名,在太峪文家村宣布起义,携带机枪 12 挺、步

枪 300 余枝、短枪 20 余枝、电台 1 部,进入关中分区马栏镇。后编入人民解放军关中军分区第二十一团,郝登阁任副团长。

26. 彬县阎堡乡警备班起义

1949 年 2 月 20 日,国民党彬县阎堡乡乡公所警备班班长杨青山,率领 20 多人,携带机枪 2 挺、长短枪 32 支、子弹 2000 多发起义,加入麟游游击大队。

27. 铜川县民众自卫团投诚

1949 年 2 月 21 日,国民党铜川县民众自卫团副团长郭清廉、团附张志英,率部 184 人、80 多支枪,在雷家沟投诚。

28. 三原县柏社乡自卫队投诚

1949 年 2 月 22 日,国民党三原县柏社乡乡长曹金城、乡队附惠德山,率自卫队 30 多人,携长短枪 40 多枝、子弹 1000 发投诚。编入柏嵯游击队。

29. 渭南县自卫团常备二中队和渭文乡乡保武装起义

1949 年 2 月 29 日,国民党渭南县自卫团副团长薛少农和该团常备二中队中队长王志忠率部 500 余人,渭文乡乡长李思白率乡保武装二三百人,在渭河北的薛村起义。起义人员一部分编入渭南县武装大队,薛少农任人民解放军渭南军分区副科长,王志忠任渭南县武装大队参谋。

30. 晋陕绥边区总部一个连起义

1949 年 2 月,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部驻榆林城南金刚寺的 1 个连 80 多人,在副排长旦云章(共产党员)带领下起义,进入解放区。

31. 三原县西阳乡自卫队起义

1949 年 3 月 1 日,国民党三原县西阳乡乡长李永业(共产党员),率西阳乡自卫队 114 人,携带长短枪 87 枝、子弹 3000 发、电话机两部起义。编入三原县游击大队。

32. 平民县政府和保警大队起义

1949 年 3 月 4 日,国民党平民县县长王子敬(共产党员),率领县政府和县保警大队 400 余人,携六〇炮 3 门、机枪 6 挺、长短枪 300 余支起义。平民县再次和平解放。

33. 榆林保安十四团三营某分队投诚

1949 年 3 月 23 日,国民党榆林保安第十四团三营某分队长曹文华,率领 41 人,携带轻机枪 5 挺、长短枪 26 支、战马 43 匹和弹药一批,向人民解放军榆林前线部队投诚。

34. 秦岭守备区三团起义

1949年5月11日,国民党秦岭守备区三团副团长李映午,受团长张明珊委派,率部900余人,携长短枪900余枝起义。后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咸阳军分区第三支队,张明珊任支队长。

35. 晋陕绥边区总部50余人投诚

1949年5月14日,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部留榆机关50余名官兵,由甄载明(曾任总部秘书)带领,出榆林城,到解放区三岔湾投诚。

36. 泾阳县自卫团起义

1949年5月14日,西逃到周至县楼观台地区的国民党泾阳县自卫团,由渭北游击第二总队司令牛志诚(原泾阳县自卫团团长)率领,在兴平南佐村宣布起义。后,一部改编为兴平游击第二支队三大队,牛志诚任副支队长兼三大队大队长。

37. 礼泉县自卫团起义

1949年5月18日,国民党礼泉县自卫团副团长王敬安率领173人起义。20日,第一中队苟俊山率队从南花寨返县城起义。25日,杨生荣率第三中队在亭口起义。共300余人起义,大都编入县游击大队。王敬安任县支前委员会副主任。

38. 武功县保警大队起义

1949年5月19日,国民党武功县长王镛带领县保警大队和县乡保人员近800人南逃到大庄乡桥寨、尖强、立节一带时,县参议会秘书刘作汉(地下共产党员)和佐士敏(保警队中队长)、李保民(保警队分队长),举行起义,王镛带其部分亲信仓皇过渭河逃窜。后,起义人员改编为武功县大队。

39. 兴平县自卫团起义

1949年5月19日,国民党兴平县长兼县自卫团团团长范重仔率部弃城南逃,抵达岳阜南桥时,一大队四中队中队长张彦博率队起义。其残部南渡渭河后,张辅汉(共产党员)联络程玉玺、程振国等又率100余人起义。起义官兵共300多名。后编为兴平游击支队第一大队,程剑青(共产党员,原兴平自卫团第一大队大队长)为大队长,张彦博、张辅汉等任中队长。

40. 西安市民众自卫总队起义

1949年5月20日,国民党西安市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闵继骞率领2000余人起义,迎接进攻西城门的第一野战军第六军四十九团入城。配合人

民解放军维持社会秩序,保护公私财产。后改编为第六军补充团,闵继騫任西北军政大学军事教员。

41. 西安团管区起义

1949年5月20日,国民党西安团管区400余人携枪300余枝,在司令王子伟、副司令张正坤率领下起义,配合已攻进城的第一野战军第六军部队维持社会秩序,保护公私财产。后,王子伟任西北军政委员会、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

42. 秦岭守备区第三团一营起义

1949年5月21日,国民党秦岭守备区第三团一营营长吴彦昌和三连连长李世芳(均系共产党员),率部150余人在眉县城关起义,配合人民解放军维持县城社会秩序。该部起义前夕从周至西撤眉县时,沿途伏击胡宗南军,击毁汽车4辆,缴获枪100余支、驮骡16匹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

43. 华阴县地方团队起义

1949年5月21日,国民党华阴县参议会副议长程俊佐公开了共产党员身份,即与县自卫团中队长杨蔚坤、县军事科长兼独立大队大队长杜福洪,率华阴县地方团队589人起义,并成立了华阴县临时治安委员会,程俊佐任主任。22日,人民解放军大荔军分区部队和平入城。起义人员一部改编为华阴县武装大队,程俊佐任大队长。

44. 陕西保安第六旅三支队华阴起义

1949年5月22日,国民党陕西保安第六旅三支队250余人在孟原附近起义。后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大荔军分区路东总队二营五连,由原中队长孟俊甫任副连长。

45. 蓝田县自卫团起义

1949年5月23日,国民党蓝田县自卫团团团长魏玉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军第十六师的配合下,率全团900余人起义,蓝田宣告解放。后改编为第六军独立团,魏玉山任团长,胡天舜(胡田勋,十六师联络科长,奉命到蓝田组织起义)任政委。

46. 渭潼警备司令部起义

1949年5月23日,国民党渭潼警备司令部司令武纬率部4400余人在渭南城起义,渭南和平解放。起义前武于19日令驻渭南南原之警备团痛击南逃的胡宗南部两个团。起义人员中的一部改编为渭南县武装大队。

47. 三原县政府和三原县自卫团投诚

1949年5月23日,逃往户县大王镇的国民党三原县政府和县自卫团400余人,在县长兼自卫团团团长石仲伟、副团长董凤文率领下向人民解放军第十七师投诚。后改编为“龙江部”第七支队,石仲伟任支队长。

48. 华县地方武装投诚

1949年5月23日,国民党华县参议长王仲谋在县自卫团团部主持召开县政府各科长、各乡长、自卫团各大队长会议,决定接受中共华县工委提出的八条和平协议,中共华县工委书记王平凡讲话表示欢迎,华县宣告和平解放。投诚人员2200余名,其中一部编入华县武装大队,一部编入人民解放军大荔军分区,一部遣散回乡。

49. 眉县保警大队第三中队起义

1949年5月25日,国民党眉县保警大队第三中队中队长钟仁亮,率部在斜峪关东侧截击南逃的胡宗南部第三十六军机炮营,毙伤百余名,俘二十多名,缴获轻重机枪六挺、八二炮和六〇炮七门、长短枪十多支,战斗结束后宣布起义。后钟仁亮调任人民解放军宝鸡军分区独立第十团三营副营长。

50. 第二十二军军部及八十六师榆林起义

1949年5月29日,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在《榆林局部和谈协议》书上签字,接受和平改编,榆林县北部和中部和平解放。6月1日,榆林数万群众夹道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后,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师,原二十二军八十六师二五七团团团长高凌云任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军区成立后,左协中任军区副司令员。

51. 潼关县自卫团和潼关县政府投诚

1949年5月29日,国民党潼关县自卫团副团长兼保警大队大队长马登瀛率部向人民解放军投诚,之后县长王西铭、副县长徐文华率县政府人员及保警大队一部向潼关县人民政府投诚。投诚人员共300余名,整训后编入华潼支队,马登瀛任第三大队大队长。

52. 洛南县地方团队投诚

1949年5月29日,国民党洛南县地方当局代表同人民解放军商洛军分区商洛武工队代表举行和平谈判,议定洛南县保警大队于次日下午二时在景村盈耳沟投诚。虽县保警大队长王离仙毁约窜逃,但其部第一大队和一些乡镇武装共1000余人相继投诚。

53. 周至县自卫团起义

1949年5月31日,国民党周至县自卫团团长武良翰召开中队长以上军官会议,决定部队起义,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咸阳军分区第四支队。全支队800人枪。

54. 秦岭守备区第二团三营起义

1949年5月,国民党秦岭守备区第二团三营营长东立武率部在眉县泥峪口地区起义后,多次伏击西逃的胡宗南溃军,并截击军用汽车40余辆,缴获新式卡宾枪400余枝及其他电讯器材等7卡车。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咸阳军分区第四支队。

55. 商洛警备第三团起义

1949年6月27日,国民党商洛保安司令部警备第三团团团长房景堂,率上秦自卫营和民仁、治安等乡地方武装400余人起义。

56. 镇安县自卫团第二中队起义

1949年8月1日,国民党镇安县自卫团第二中队队长郝杰,率部456人在七里峡起义,配合商洛军分区部队袭击国民党白青云残部。

57. 宝鸡县自卫团投诚

1949年8月5日,国民党宝鸡县自卫团团长秦伯瀛、副团长李伯恭率部600余人,在宝鸡西拓石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诚。计携来八二炮和六〇炮各1门,重机枪两挺,轻机枪25挺,步枪600余枝,短枪62枝,枪弹5万余发,六〇炮弹54枚,手榴弹400多枚,报话机1部,骡马7匹。

58. 阳平关宁西独立自卫第三大队起义

1949年11月中旬,国民党略阳县阳平关宁西独立自卫第三大队大队长成连音率部300余人,截击向四川溃逃的略阳县反共救国军残部,俘虏10余人,缴获长短枪50余枝、电台1部、电话机两部以及药品等。后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投诚。

59. 旬阳县自卫团起义

1949年11月25日,国民党旬阳县自卫团团团长段西屏率部在白腊河起义,旬阳和平解放。该部计1500余人,枪800余枝,其中一部编入人民解放军安康军分区独立第九团。

60. 安康自卫团起义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安康自卫团团团长鲁秦侠率部起义,欢迎人民

解放军入城,安康县城和平解放。起义人员 2100 余名,携来轻重机枪 14 挺、长短枪 1116 枝,后编入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五十五师。

61. 镇安县柴坪乡自卫队投诚

1949 年 11 月 27 日,国民党镇安县柴坪乡自卫队队长祝迪卿率部攻打逃窜的镇安县自卫团。29 日,人民解放军商洛军分区一部进军宁陕途经柴坪,祝部未作抵抗,表示愿意投诚,自编为“区干队”,接收乡警备班二十多人枪,维持地方治安,并为解放军筹粮 5 万斤,受到商洛军分区的表扬。

62. 汉阴县自卫团投诚

1949 年 11 月 29 日,国民党汉阴县自卫团 200 余人,在中队长沈让亭、县党部书记长沈继芳、开明人士胡书竹等带领下,步行五里欢迎解放军进城。汉阴县城和平解放。

63. 宁陕县自卫团投诚

1949 年 12 月 6 日,国民党宁陕县临时县长、县自卫团团团长桂超亚,率部 200 余人,携轻机枪 6 挺、长短枪 167 枝及弹药向人民解放军投诚。

64. 神木县自卫队第二营一部投诚

1949 年 12 月 7 日,国民党神木县自卫队第二营之五、六连百余人,在连长刘定明、何宗德等率领下,向神木县人民政府投诚。计携来步枪 75 枝、马 7 匹。

65. 略阳县反共救国军投诚

1949 年 12 月 9 日,国民党略阳县参议会议长兼县反共救国军副司令崔希珍,率部 80 余人投诚,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略阳县和平解放。后,崔希珍任人民解放军组织的略阳县临时政治处副处长、略阳县临时支前委员会副主任。

66. 镇巴县游击第五支队起义

1949 年 12 月 16 日,国民党镇巴县党部书记、县参议会议长、县游击第五支队司令庞文彦率部千余人向人民解放军投诚。当日,人民解放军步行 70 里由西乡杨家河进入镇巴县境,19 日,和平进入镇巴县城。

67. 陕西保安第四旅投诚

1949 年 12 月 19 日,国民党陕西保安第四旅旅长谭华初,率领一、七两个团在南郑县黄官镇向人民解放军投诚。该部投诚前将国民党褒城县政府和县保安大队包围缴械,所获人械连同本部枪械送交人民解放军陕南军区。

68. 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三十八军)中的起义

西安事变之后,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部被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撤销,部队改编为陆军第三十八军。至解放战争时期,只剩三十八师一个师的建制,其原属的五十五师、十七师、一七七师均降格为旅,并且派遣一大批国民党嫡系军官和特务替换原连以上官佐,十七路军(三十八军)面临着极端危险的局面。在中共中央的关怀指导下,在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地下党组织的具体组织下,1945年7月18日,由共产党员梁励生、朱曼青、徐又彬领导组织原十七路军第十七师五十团、五十一团在河南洛宁县故县镇宣布起义。1946年5月15日,孔从周率五十五旅在河南巩县宣布起义。1946年8月,一七七旅五三〇团两个连,五二九团一个机枪排在共产党员吕元璧、薛生荣、邓子玉带领下,于辉县战役中起义。1946年9月13日,奉中共中央命令,十七路军(三十八军)起义部队在邯郸宣布成立西北民主联军三十八军,投入人民解放战争。1948年12月,国民党重新组编的十七师四十九团一个营在共产党乌迁乔率领下起义。1949年8月4日,随孙蔚如前往六战区,以原十七路军五三一团一个营、四集团军总部警卫营为主编成的二三二师,在孙蔚如、卢松轩、王汝昭、李锦锋等人策动下,随程潜、陈明仁在长沙起义。至此,原十七路军主力部队基本全部脱离国民党,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

第七章 陕西全境解放

解放战争前,在陕西境内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有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在陕西的区域,共25个县(市、区),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10万,最高行政机关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国民党领导的独裁专制政权,辖81个县(局),面积1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916万,最高行政机关名义上为陕西省政府,实际上最高行政权在西安绥靖公署。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军队于1946年6月以重兵围攻中原解放区,掀起了全面内战。

陕北的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国民党集结25万兵力向陕甘宁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并扬言“三天占领延安”。此时,陕西解放区内只有正规部队

2.6万余人和部分民兵,且装备、给养、兵员都极为困难。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放弃延安,转战陕北。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经过西北野战军和地方人民武装的英勇战斗,在撤出延安后40多天,西北野战军便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重创国民党军,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

1947年8月,沙家店一役,基本上改变了战争形势。西北野战军的总兵力迅速发展到了7万余人,地方部队3万余人,逐渐由被动转变为主动。西北野战军不仅在内线取得一连串战斗的胜利,而且大胆进入国民党统治区作战,两次攻打榆林、发动宜瓦战役、出击西府解放关中数十座县城等,迫使国民党收缩战线。1948年4月21日,孤守延安之国民党军仓皇逃跑,延安光复。整个陕西解放区全部收回,并扩大黄龙地区成为巩固的解放区。

经过一年一月又三天,延安失而复得。期间,陕西解放区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动员人民参军参战和支援前线。数万名青年从军,十多万民兵配合作战,抬担架、运输军需物资等各项任务出色完成,保证了战争的胜利。随后,陕西解放区军民的工作重心又转移到生产建设、支援解放国统区的战争中。

解放战争时期,陕西国统区内国共两党的斗争十分激烈。国民党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实施残酷统治,妄图维护其反动政权。中国共产党则在国统区内恢复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武装,进行游击战争,并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人民大众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国统区的战争。

陕西国统区绝大部分地方是人民解放军通过战争形式分块解放的。其中一些地方经过反复争夺,几经较量才获得最后解放,少数地方是和平解放的。

第一节 解放榆林国统区

榆林地区包括榆林市和神木、府谷、定边、靖边、横山、佳县、米脂、吴堡、绥德、子洲、清涧等11个县。全国解放战争开始时,子洲、绥德、米脂、吴堡、清涧、佳县、定边、靖边的大部和神木的南部属陕甘宁边区,榆林、府谷、横山和佳县、定边、靖边、神木的一部分为国统区。

1945年10月,国民党新编第十一旅起义,定边和靖边国统区解放。陕甘宁边区政府恢复安边县县治。11月上旬,中共安边县委、安边县地方自治委员会

成立。1947年3月,宁夏马鸿逵部为配合胡宗南进攻边区,侵占了安边县城和宁条梁等地。6月,西北野战军收复了上述地区。8月,西北野战军东进榆林,马鸿逵部卷土重来,安边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同国民党军展开了艰苦的游击战。1949年6月14日,三边军区所属部队和定边、靖边、安边三县游击队收复安边县城,后又撤出。7月,西北军区榆林独立一、二两师奉命西进。8月1日,马鸿逵部仓皇撤出安边县城。2日,安边游击队收复县城。9月28日,撤消安边县治,除梁镇区划归靖边县外,其余的划归定边县。

1946年9月25日,驻佳县国统区打火店的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八十六师二五七团一营第三连,在连长梅廷栋率领下起义,进入解放区,佳县国统区解放。10月14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具体协助和绥德军分区部队的密切配合下,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胡景铎率部5000余人在横山起义,横山县和榆林县南部随即获得解放。1947年3月到6月,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期间,横山县城和21个乡被侵占。8月,绥德分区所部攻克响水堡,夺取了波罗堡,横山县城守国民党守军逃窜,横山光复。1948年夏,逃窜于内蒙、榆林的横山地方反动武装经常袭扰横山北部边沿地区,经反复清剿将其消灭。1949年4月,横山县委、县政府成立了河北区委和区公署。横山全境解放。

1947年秋,晋绥人民解放军一部西渡黄河,府谷和神木国统区解放。8月6日,晋绥地方兵团第五支队解放府谷县城。为消灭国民党有生力量,第五支队后又撤到农村。次年1月17日,晋绥军区第三十一团第二次解放府谷县城。同时蒙绥军区骑兵第三旅和晋绥二分区两个团也进入府谷国统区,消灭国民党军一个团,毙伤150余名,俘430余名。1947年8月7日,晋绥军区第三纵队独二旅在神府支队配合下首克神木重镇高家堡,俘国民党陕北警备司令张子英以下1400余名,毙伤200余名。10月下旬,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在神府支队配合下解放神木县城。次年3月,神府国统区全部解放。

1947年8月初,西北野战军主力发动第一次围攻榆林城战役,收复被国民党侵占的榆横新解放区,并推进到榆林城近郊,完成对榆林城的包围。11日晚国民党援榆部队逼近榆林,对围城解放军造成严重威胁。此时,策应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富治)兵团从晋南强渡黄河,挺进陕豫鄂边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西野主力遂从榆林撤围南返。10月下旬,西野主力发动第二次围攻榆林战役,在肃清榆林外围战斗中击溃国民党军两个团,俘600余名。又于11月15日在袁大滩击溃援榆的宁夏马鸿逵部3.5万人,缴获甚多。同时

西野亦有很大伤亡,遂再次从榆林撤围,到横山一带休整,进行新式整军运动。

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时局的声明,提出以彻底消灭反动势力为基础的八项和谈条件。西北局和西北野战军决定对榆林采取力争和平解放的方针。2月21日,参与北平和平起义的邓宝珊将军电告二十二军:“起义为顺乎人心势在必行之举”。3月间,解放军解放了内蒙古的东、西乌审旗,断绝了榆林守军退入宁夏、包头的后路。与此同时,在城内党组织的鼓动下,榆林各界成立了榆林和平促进会。5月2日,二十二军派出以参谋长张之因为首的四人代表团赴延安谈判,29日达成协议。6月1日,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2日,中共榆林市委和人民政府成立。

从此,彻底结束了国民党在榆林的统治。

第二节 解放延安国统区

现延安市所属的黄龙、宜川、黄陵、洛川四县,在解放战争开始时是国民党统治区。

1947年9、10月,西北野战军第二、第四纵队发动黄龙山战役。10月2日,第二纵队解放石堡镇(今黄龙县城),消灭国民党一个保安团。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了中共黄龙县委和县人民政府。21日,第二、四纵队联合解放宜川,俘国民党军中将指挥官许用修、少将县长徐沛,消灭国民党军4000余名。后,四纵返回陕北解放区,二纵东渡黄河在晋南解放区休整。国民党军复占黄龙、宜川。

1948年2月末3月初,西北野战军发动宜川战役。3月1日,西野在瓦子街附近歼胡宗南第二十九军军部、第二十七师和第九十师师部及所属四个整编旅,共歼国民党军2.3万多名。3月3日,第二次解放宜川县城,俘中将旅长张汉初,全歼守军5000余名。

宜川战后,西北野战军乘胜追歼南逃之国民党军,3月6日,第二次解放黄龙,7日,解放了黄陵县隆坊镇,8日,解放了太贤,并将部队移至县城以东和南部地区各村,形成对黄陵县城包围态势。9日,国民党中部县保安团机枪连第三连167人在连长张俊杰(共产党员)、李建邦带领下起义,与中部工委领导的游击队会合。10日晨,张怀德率领保警一中队50余人投诚。国民党中

部县长弃城而逃。中部工委和游击队当日进入中部县城。2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将中部县改为黄陵县。

洛川是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补给站。从1948年3月23日起,西北野战军三次向洛川发起攻击,均未奏效。4月10日,又发起猛攻,洛川守军杨荫寰急向胡宗南求援。胡令其加强工事,死守待援。同时令裴昌会由耀县出发,令延安的国民党十七师南下,会师洛川。这时,西北野战军主力已经淳化、永寿、麟游一线,直奔凤翔、宝鸡。胡又令裴昌会返回关中。在延安的国民党十七师何文鼎部于23日到达洛川,25日和杨荫寰等仓皇南逃,洛川获得解放。

第三节 解放铜川国统区

1966年8月,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决定设立省辖铜川市,先后下辖铜川市城、郊区(今印台区、王益区)和宜君、耀县。解放战争时期,铜川市为国民党统治区。

1945年8月,中共延属地委在所辖地区内设立了几个工作点,指派薛志仁为宜君点的负责人,负责恢复党的组织。10月,西北局指示将洛川工委分设为洛川工委和雁门工委。雁门工委负责宜君,中部(今黄陵)、同官(今铜川市区)、富平、白水、蒲城部分地区党的工作。工委先后派郭希汾、王清廉、李树芳到宜君县焦坪、哭泉、五里镇、偏桥,刘涛到铜川县(国民党于1946年6月将同官改为铜川县)红土开展工作。同时,中共陕西省工委派雷炜到铜川陈炉、黄堡和县城,张仲平到耀县恢复发展党的组织。1946年初,张仲平奉命筹备中共耀县工委。3月,洛川工委决定成立中共同富工委,郭希汾为工委书记,刘涛负责同官党的工作。9月,雁门工委在教导队的基础上成立了雁门支队。10月,省工委书记赵伯平、关中地委书记高锦纯在旬邑县马栏镇宣布成立了中共富同工委,雷振东任书记,属省工委领导。富同工委成立后,领导富同游击队创建了陈炉、黄堡镇公所等“两面政权”,基本控制了富同山区一带,使其成为暗边区。11月,张少林在耀县阿子乡固县村组建了中共耀县工委,属省工委领导,负责耀县国统区和富平洪水一带党的工作。

1947年春,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严密封锁了咸铜铁路和咸榆公路,侵占了解放区淳耀县,同官、耀县、宜君国统区工作亦受到严重影响。3月,为适应新的形势,中共陕西省工委决定成立中共路东工作委员会,雷振东任工委书记,领导富

平、同官、蒲城、白水四县党的工作,富同工委停止活动。5月5日,边区警一旅三团、警三旅五团袭击耀县城成功。同年冬,中共同官县工委成立,雷炜任工委副书记(1948年3月任书记),同时撤销同富工委。1948年2月,关中地委决定路东地委与渭北工委分设,同富工委归属路东工委领导。1948年3月,瓦子街战役胜利后,西北野战军继续南下,于3月10日,在雁门支队的配合下,解放了宜君县城。中共宜君县委和县政府随之成立,杨西林、冯德厚分别任县委书记和县长,雁门支队整编为黄龙军分区二十二团。国民党宜君县长韦孟若带领县府工作人员和保安团300余人窜铜川县,被同官游击队伏击打散。5月,路东工委决定,同官工委改为同官县执行委员会,雷炜任书记,同时成立了同官县政府,屈计君为代理县长。11月路东工委撤销,同官县执委划归关中地委领导,路东纵队二支队划归同官执委领导,改为同官县大队。

1949年1月,关中地委决定撤销耀县工委,成立中共耀县执行委员会和耀县县政府,白天民、封正宝分别任书记和代县长。2月,西北野战军向关中进军,胡宗南主力撤到三原,临潼一带。2月20日,铜川、耀县遂告解放,两县县执委、政府分别迁入县城内。3月,国民党军再度北犯,重新占领了耀县、铜川两县城。4月,西北野战军挥师南下,在同官、耀县地方武装配合下,于4月29日收复了铜川、耀县。5月,关中地委改为三原地委,同官、耀县两县执委属三原地委领导。7月,耀县执委改为中共耀县委员会,耀县政府改为耀县人民政府;同官县执委改为中共铜川县委,同官县政府改为铜川县人民政府。

第四节 解放咸阳国统区

1947年5月,西北野战兵团南线部队出击国统区,22日晚,向旬邑县城发起攻击,共产党员马志超率国民党旬邑县自卫大队200余人起义,配合人民军队顺利破城,旬邑遂告解放。西野部队转移后,旬邑支队退出县城活动于靠近解放区的乡村。

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集中第一、二、四、六纵队,分左、中、右三路,挺进国民党兵力空虚的西府,并夺取宝鸡。16日,三路大军分别由旬邑的马栏、转角和耀县的照金庙湾分路开进,拉开了西府陇东战役的序幕。

4月17日,西北野战军中路军第一纵队第二次解放旬邑县城及职田、张洪、太峪等重镇,俘国民党陕保第十九团团以下1000余人,毙伤250余人。

在解放旬邑的同时,西北野战军左路军第四纵队警备第一旅于4月17日从马家河、騫家河、向永寿县常宁镇前进,在常宁镇附近经一昼夜激战,逼迫国民党军全部退回县城。从17日晨到18日晨,左路军第二纵队之第三五九旅,独立四、六两旅也赶到常宁镇北面和西面一线结集。18日拂晓,完成对国民党军的四面合围。午后发起总攻,黄昏国民党军指挥部被摧毁。常宁战斗以消灭国民党军二〇三师2000余人的胜利宣告结束。国民党永寿县县长尾随监军镇守军弃城南逃,解放军进驻监军镇,首次解放永寿县城。旬邑战斗结束后,解放军第一纵队独立第一旅、第三五八旅马不停蹄,于4月18日逼近彬县县城。19日零时,攻打彬县战斗开始,8时许,在解放军猛烈攻击下,国民党军指挥官不得不下令缴械投降。彬县战斗以消灭国民党军少将保安司令乔维森、少将指挥官赵璋以下2143人的战绩胜利结束。彬县县城首次解放。4月19日,右路军第六纵队迅速从彬县向长武进军。20日到达长武亭口、二厂村,当日21时许新四旅七七二团二营将长武县城包围,并向城内守军发起攻击。经过激战,全歼国民党守军,长武第一次宣告解放。

解放军在三天之中连克旬邑、永寿、彬县、长武四县,震惊了国民党。于是国民党当局从四面调兵遣将,企图消灭解放军主力。4月23日,马步芳部八十二军步骑两个团向长武发起进攻,25日黄昏,在教导旅二团掩护下,解放军主力向彬县、麟游撤退。

解放军西府出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咸阳地区北部四县,给国民党胡宗南集团以重大打击。后来,以上四县又被国民党占据。

1948年8月10日,人民解放军关中军分区地方兵团第三次解放旬邑。

1949年春节刚过,平津战役胜利结束。西北战场上的国民党胡宗南集团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2月20日,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西北野战军改称)向渭北地区之国民党军发起春季攻势。24日,淳化获得解放。3月1日,在泾阳口镇一战,消灭国民党军1823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5月中旬,第一野战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陕中战役。

5月12日,第一野战军第一军先遣部队和渭北游击总队先头部队抵达三原东里堡一带。国民党三原驻军闻讯南逃。13日,一军侦察连攻克三原北大门——泾阳鲁桥镇。同日晚21时,国民党三原县县长石仲伟与县府官员和县地方武装撤离县城,后在户县投诚。5月14日,三原县宣告解放。

5月17日,第一野战军第二军向泾阳之国民党军发起攻击,国民党县自

卫团逃到兴平起义。泾阳县城解放。

在解放军大军压境的形势下,胡宗南六个军全线西逃至咸阳、礼泉、乾县、永寿一带。5月17日20时,第一野战军第二军两个师由花池渡、泾阳塔上下渡口强渡泾河,乘胜追歼前进。18日拂晓,在咸阳东北之岩村、阎家寨地区,一举消灭国民党五十三师一五九团全部及骑兵二旅四团一部,俘虏1200余人。国民党第五兵团驻咸阳司令部闻讯,于先日晚逃窜宝鸡。古城咸阳解放。同日,第一野战军第二军从咸阳向兴平、武功方向追击国民党军。这时,兴平县自卫团和武功保警大队各一部起义。19日,兴平、武功两县解放。

泾阳解放当天,即5月17日,第一野战军第四军第十师进抵泾阳县王桥镇以北地区。18日强渡泾河。当时礼泉城内仅留与中共有统战关系的自卫团副团长王敬安带领的部分武装。下午,第一野战军顺利进驻礼泉县城,自卫团173人投诚,礼泉宣告解放。5月19日,第一野战军抵达乾县城郊,解放乾县后继续西进。20日,第二次解放永寿县城。6月初,青海马步芳部和宁夏马鸿逵部入陕援胡,与退守汉中、宝鸡的胡宗南部,分别沿西兰公路和西宝公路两线向东反扑,妄图夺回西安。第一野战军为诱敌东犯加以聚歼,主动从永寿、乾县、礼泉、凤翔、岐山、眉县、扶风、武功、兴平等地东撤,在周至、户县、咸阳、西安等地待击。至6月25日,第一野战军在眉县东南、乾县永寿之间的杨峪镇、咸阳以西、泾阳以北、淳化以西、周户以南等地作战获胜。“二马”受重创后西退陇东,孤悬胡宗南四个军于扶眉地区。第一野战军即于7月12日发动扶眉战役,至14日消灭国民党军1个兵团部、3个军部、6个整师、6个整团,共4.5万余名,其中俘3.1万余名、毙伤近万名、渭水淹毙3000余名。在战役之前,6月28日第二次解放乾县、礼泉、兴平。在战役中,12日第二次解放武功,20日第三次解放永寿,24日第二次解放彬县,25日第二次解放长武。

第五节 解放宝鸡

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出击西府,向胡宗南后方供应基地宝鸡进攻。

21日,解放麟游县城,俘国民党第九行政督察区保安团第一大队150余人,麟游县解放委员会成立;22日,解放扶风县城及绛帐镇,扶风县解放委员会成立;23日,解放凤翔县城,消灭国民党军保安团一部,凤翔县民主政府成立;24日,解放岐山县城及蔡家坡镇,消灭国民党军保安团一部,岐山县解放委员会成

立;26日,解放宝鸡县城,俘虏国民党军第七十六师师长徐保(因伤重毙命)以下2248名,缴获极丰。同时建立宝鸡县民主政府;29日,解放千阳县城,开仓放粮两天。5月12日西北野战军回师关中分区,宝鸡等六城复被国民党军占领。

1949年5月,第一野战军发动陕中战役,解放西安,对国民党胡宗南集团以沉重的打击,迫使胡宗南军向西撤退。第一野战军不失时机尾追歼敌。20日第二次解放扶风县城。21日解放眉县,第二次解放麟游、岐山。22日第二次解放凤翔。

1949年6月初,马步芳、马鸿逵部窜入陕西,妄图配合胡宗南夺回西安及整个关中地区。第一野战军为诱敌东犯加以聚歼,主动从西府地区东撤。此时,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十九兵团入陕加入解放大西北的行列,使西北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达到了40万。7月,第一野战军发动扶眉战役。12日,第二次解放眉县,第三次解放岐山。13日,第三次解放扶风。14日,第二次解放宝鸡,第三次解放凤翔。

1949年11月27日,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从西府地区出发,越秦岭向汉中进发,途中解放凤县及双石铺,俘虏国民党军200余名。宝鸡地区全部解放。

第六节 解放渭南

1947年9、10月,西北野战军第二、第四纵队发动黄龙山战役。9月24日,西野第四纵队向白水县城攻击前进。是日晚,国民党白水警备队队长杨培才(共产党员)、白水预备队队长田焕贵(共产党员)率部起义并逮捕国民党县长,配合西野解放白水县城。25日白水政务委员会成立。10月11日,两纵队联合作战,解放韩城,俘虏国民党军300余人。西野部队撤离后,白水、韩城被国民党军占领。

1948年春宜川战役后,西北野战军勇猛追歼南逃之国民党军。3月10日,第二次解放白水;3月24日,第二次解放韩城,俘虏国民党军枪200余;3月25日,解放合阳,俘虏国民党军130余名;27日,解放澄城,俘国民党县长。后,合阳、澄城复被国民党军占领。

1948年8月,西北野战军发动黄龙南线战役。8日至10日,西北野战军一部在澄城县西北之冯原镇、王庄镇地区,歼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部及直属连队,第一六五旅旅部及其三个整团,第二十八旅和第一二三旅各一部,击毙中

将副师长朱侠,击伤少将旅长李规以下3000余名,俘少将高级军官张先觉、李秀、陈定等以下6089名。10日,第二次解放合阳、澄城。

1948年10月,西北野战军发动秋季攻势。10月6日至18日,西北野战军在荔北地区歼国民党第十七师、第三十八师大部,第六十五师半数以上,第三十六师、第一师、第一三五旅等各一部,俘第四十八旅旅长万又尘以下1.1万余名,伤第一六〇旅旅长黄植虞。在此期间,共产党员杨海潮(国民党朝邑县保警队队长)、王晏亭(国民党朝邑县常备队队长)率部1100余人,于6日晚起义,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黄龙军分区朝邑支队。7日,朝邑和平民县城解放。同时第三次解放合阳、澄城县城。

1948年11月,西北野战军发动冬季攻势。11月15日至28日,西野在合阳、蒲城、富平、耀县间和蒲城永丰,三战三捷。歼国民党第七十六军全部,第六十九军一四四师、第三军十七师大部,俘第七十六军军长李日基、第十七师师长王作栋、第二十师师长吴永烈、第二十四师师长于厚之以下1.77万余人,毙伤7600余人。15日,第四次解放合阳县城。合阳、澄城、蒲城的大部乡村解放。

1949年2月至3月,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发动春季攻势。2月初至3月底,第一野战军在东府渭北地区消灭国民党第二十师全部,第十四师、第八十四师、第九十师、陕保第四旅等各一部,毙第一九〇师师长马德胜,俘第二十师师长褚静亚、陕保第四旅旅长兼第十一行政督察区专员赵国祯以下4921名。其间2月1日第三次解放白水(国民党县自卫团起义);2月21日解放蒲城县城;25日解放富平县城;3月4日解放大荔县城,并第二次解放朝邑、平民县(国民党县政府和保警队起义)。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向关中地区进击,彻底推翻了国民党胡宗南在关中的统治。23日解放华阴(国民党县乡地方团队起义)、华县(国民党县乡地方团队起义)、渭南(国民党渭潼警备司令部起义)、蓝田(国民党县自卫团起义);29日解放潼关(国民党县政府和自卫团大部投诚)。

第七节 解放西安

1949年初,胡宗南在西北战场连遭惨败后,并不甘心,竭力拼凑地方武装,在三原、蒲城、大荔布置“机动防御”,妄图死守陕西省会——西安。

为解放和接管西安,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安地下党组织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1949年2月9日,贾拓夫根据中共西北局决定精神,拟定了《准备接收西安初步计划》。3月1日正式成立了以贾拓夫为主任,由16人组成的接收西安准备委员会。5月10日,中共西北局召开进军西安干部动员大会。

与此同时,西安地下党组织也为解放西安加紧了准备工作。1948年12月,经中共西北局批准成立了中共西安市工作委员会,韩夏存任书记,崔一民、朱子彤任委员,吴伯畅参加领导。在中共西安工委的领导下,为迎接西安解放开展的主要活动是:积极发展党、团员,壮大组织力量;采取多种形式,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和情报工作;发动群众护厂、护校。在西安解放前夕,中央决定了西安市军管会、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人选,对进城工作提出了要求。

1949年5月,第一野战军发动陕中战役。5月13日,高陵县解放。5月18日,胡宗南与陕西省主席董钊、西京市(西安市,下同)市长王友直飞抵汉中,由西京市警备司令杨德亮留守西安。陕西省会警察总局局长萧焱文将1000名警察和清洁大队合编为“火焰别动队”,在西安毁坏公共设施,炸毁桥梁,全城实行戒严,突击捕人、杀人。5月18日,第一野战军第六军先头部队配合二军部队在咸阳东面的新庄、阎家寨消灭国民党军1个步兵团和1个骑兵团一部,俘虏1200余人。20日黎明,十六、十七师全部强渡渭河。国民党西安团管区司令王子伟、西安民众自卫队副总队长闵继騫分别率部起义。上午11时,西安全城解放。20日长安县解放。21日解放临潼、户县,23日解放蓝田,30日解放周至。

5月21日,解放军举行了入城仪式。22、23两日,解除了市内国民党残部武装,收缴了部分暗藏武器。为了确立革命秩序,尽快恢复生产,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市警备司令部于23日成立。24日,宣布成立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25日,西安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26日,中共西安市委员会成立,贾拓夫为书记,赵伯平为副书记。

第八节 解放商洛

1946年8月初,中共中央中原局代书记郑位三、副书记兼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率领的中原北路突围部队抵达豫陕鄂边,创建了豫鄂陕根据地。北路突围部队一度解放镇安县城。豫鄂陕边区建立的5个分区、24个县、55个区,大都在商县、山阳、镇安、商南、洛南县的境内。随着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

发展,豫鄂陕边区主力部队于1947年2月和3月,分批北渡黄河在晋南解放区休整,待机南返,由新成立的中共陕南工委和陕南指挥部率领部分地方人民武装坚持豫陕边斗争。陕东南已解放的地区又沦为国民党的统治区。

1947年秋,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南渡黄河挺进陕豫鄂边,陕东南部分国统区再次解放。8月下旬,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富治)作战集团所属之第四纵队十二旅、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等部,南渡黄河挺进豫陕边建立根据地。9月底解放龙驹寨、商洛镇等地,10月2日解放商南县城,后转移豫陕交界处休整。11月初部队向鄂西北方向挺进,11日解放山阳县城,17日第二次解放镇安县城,到年底今商洛地区丹江以南的国统区全部解放,设立了山阳、镇安、上关(以郧西的上津和山阳的漫川关地区为辖区)、山商(以山阳和商南的各一部为辖区)等四县民主政府。1948年3月第十二旅发动旬白战役,4月1日解放白河县城,13日解放旬阳县城;同时,第三十八军十七师从豫西南西进,19日第二次解放商南县城,21日第二次占领龙驹寨。

1949年5月,在陕南军区的统一部署下,商洛军分区亦发动西进战役,商洛国统区大部解放。在发动西进战役之前的2月7日,商洛军分区主力部队第三次解放了商南县城。5月中旬,商洛军分区部队从商南分三路向西进击,配合第一野战军发动秦川追击战役。5月30日,商洛武工队解放洛南县城(国民党县乡地方团队一部起义)。6月1日,分区主力第三次解放龙驹寨;中共陕南区委、陕南区行政主任公署主要以商县东南部为辖区新设丹凤县治,治所龙驹寨。6月27日,分区独立第五团在山阳独立营配合下第二次解放山阳。7月12日,分区主力解放商县县城。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咸阳军分区部队11月21日解放柞水,24日第三次解放镇安。

第九节 解放安康

1946年8月,中原解放军北路突围部队转战到陕南地区,南路突围部队转战到鄂西北地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两突围部队分别开辟豫鄂陕和鄂西北根据地。8月3日,中共中央中原局批准将安康、柞水、蓝田、临潼以西划为豫鄂陕边区第一分区。8日,中共第一分区地委在镇安县七里峡组建了中共镇(安)郧(西)旬(阳)工委。同时,组建了镇郧旬办事处、镇郧旬支队和游击

大队。这些地方武装在旬阳、安康、镇安、山阳等地，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坚持斗争达七个月之久。

1946年7月底，南路突围部队解放镇坪县城。8月底，中共鄂西北区委将镇坪、平利、白河、房县、竹山、竹溪等县划为第一分区。中共鄂西北第一分区地委在安康地区内建立了中共白(河)竹(溪)平(利)中心县委和白竹平指挥部。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小块根据地，坚持斗争七个月之久。

1946年9月下旬，突围到鄂西北的一部分部队到达宁陕、柞水地区。中共豫鄂陕区委决定，以宁陕县东江口为中心建立第五分区。10月15日，十五旅、四十三团解放东江口地区，奉命建立了中共东江口中心县委和政权。因国民党军队围攻，东江口中心县委仅存在七天时间。

1947年2月，豫鄂陕军区主力奉命北渡黄河休整，鄂西北军区部队也转移到了鄂西南地区。豫鄂陕一、五分区和鄂西北一分区所属党政军组织也随之撤销。

1947年夏，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第九纵队和西北民主联军三十八军组成太岳兵团，在陈赓、谢富治率领下，由晋南强渡黄河，建立豫陕鄂革命根据地。10月下旬，成立了中共豫陕鄂边区第二地委、第二专员公署及第二军分区。11月初，四纵十二旅渡过丹江，解放了山阳、郧西、镇安等县。随即在旬阳、郧西、山阳三县结合部设立了上关县，建立了上关县委和县人民政府。1948年1月1日，在郧西县土门成立了中共豫陕鄂第四地委、第四专员公署，第四专员公署和第四军分区建立后，积极巩固和扩大解放区。1948年3月下旬，十二旅发动旬白战役。4月1日，解放白河县城。建立中共白河县委和县人民政府。4月13日，解放旬阳县城。5月2日，十二旅东返，参加宛西(南阳西部)战役，撤离旬阳县城。8月21日，国民党六十九军占领白河县城，白河县委转移到湖北郧西县南北峰地区坚持斗争。

1949年5月1日，奉中原军区令，在陕南军区部队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下辖五十五、五十七两个师，6月归第一野战军指挥，西进作战。

1949年5月12日，中共安康地委、安康分区专员公署正式成立，唐方雷任书记，王廷佐任专员。机关驻湖北郧西县城关。5月23日，人民解放军安康军分区成立。同日，十九军发动白(河)竹(溪)平(利)战役。25日，收复白河县，31日解放平利县城。中共安康地委随军到达平利，开展支前工作。6月6日，十九军撤离平利县。7月10日，十九军再次解放平利。23日，发起牛蹄岭战斗，25日攻占安康新城，地委机关随军进到安康县黄洋河畔，后因十九

军奉命撤离安康,8月4日,地委机关又移驻白河县裴家河,在此,地委机关领导地、县党政机关干部发动群众,组织民工,筹集粮款,组建基层政权,作了大量的工作。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进军川、黔作战,胡宗南开始南逃。十九军配合主力分南北两路向汉中挺进。南路五十五师11月26日从平利出发,沿巴山北麓疾进,28日解放岚皋,30日解放紫阳。北路五十七师11月25日从河口出发,沿汉白公路向西挺进,25日解放旬阳,27日解放安康,29日解放汉阴,30日解放石泉。12月5日,商洛、咸阳、渭南军分区部队解放宁陕。1950年1月11日,安康军分区独立七团和平利独立营解放镇坪县。至此,安康全区获得彻底解放。

第十节 解放汉中

1949年初冬,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南下,解放南郑等六县。早已突破敌秦岭防线的第十八兵团,为配合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于11月下旬从凤县北部南下。12月2日解放留坝,6日解放褒城和南郑,8日解放勉县,9日解放略阳(国民党县乡地方团队一部起义),11日解放宁强后入川。5月成立的汉中军分区和7月成立的中共汉中地委、汉中行政专员公署迁入南郑县城。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再次西进,11月下旬,分兵两路,从平利和旬阳蜀河镇出发,沿汉江左右两岸西进,配合第十八兵团解放全陕南。12月4日解放洋县;5日解放西乡;7日解放城固;19日解放镇巴(国民党镇巴第五游击支队投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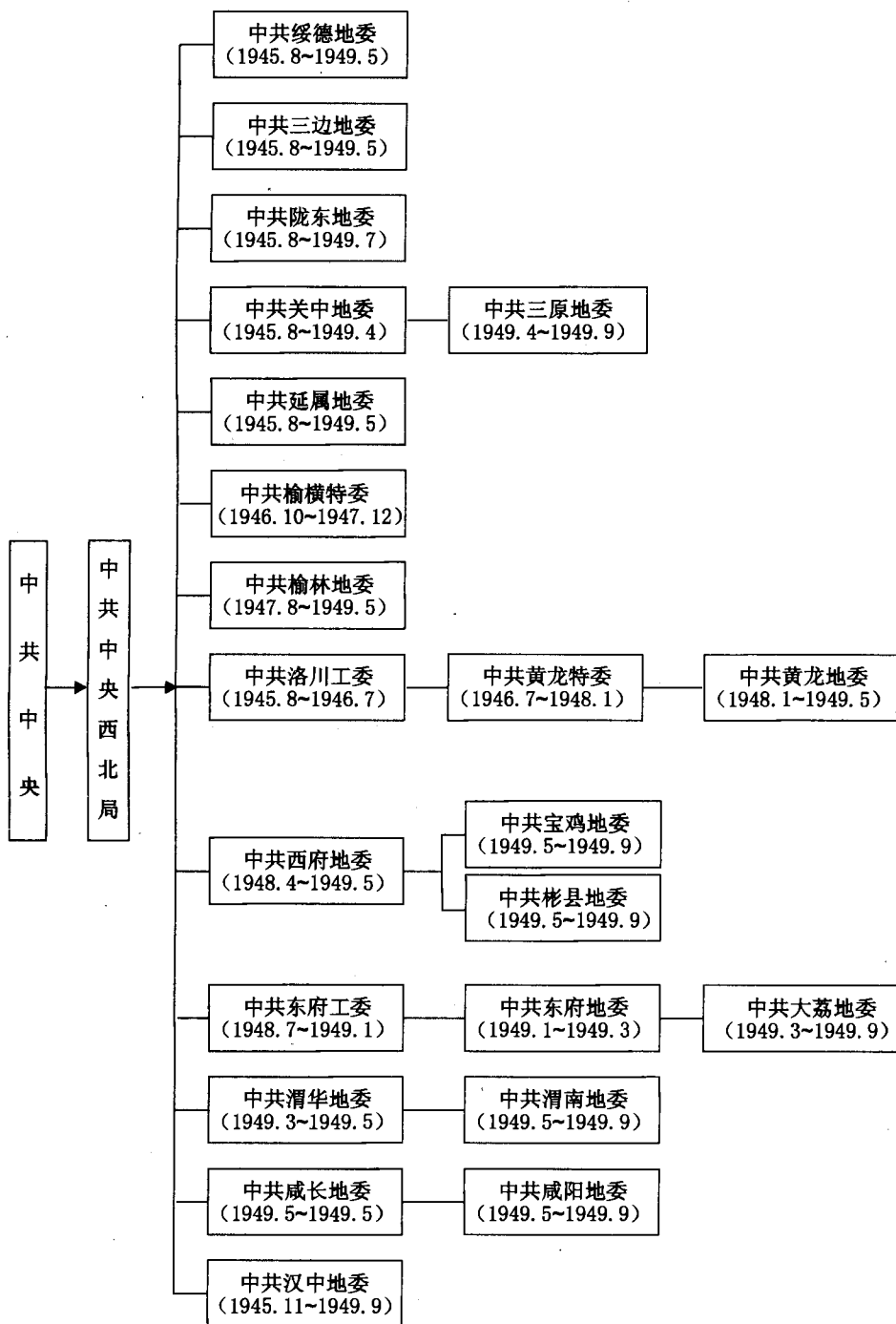
12月8日,咸阳军分区一部解放佛坪。

1949年6月之后,陕西省境内的西安市、陕南区、陕北区和关中各分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均分别受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的领导。

以1950年1月11日攻克国民党在陕的最后一个堡垒镇坪县为标志,陕西全境获得解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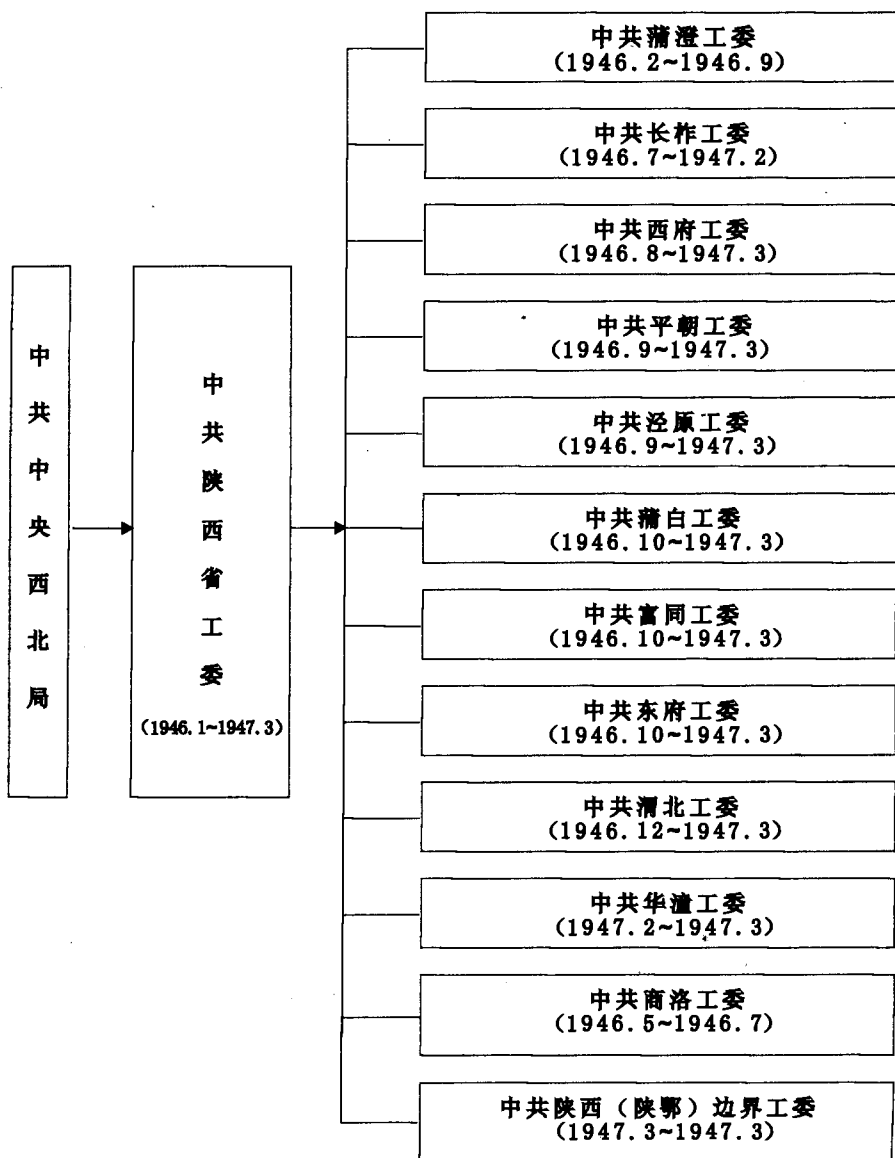
从1925年陕西建立中共组织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经过近25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国民党在陕西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从此,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领导人民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新的历史时期。

中共中央西北局直属地（工、特）委组织序列表
（1945. 8~1949.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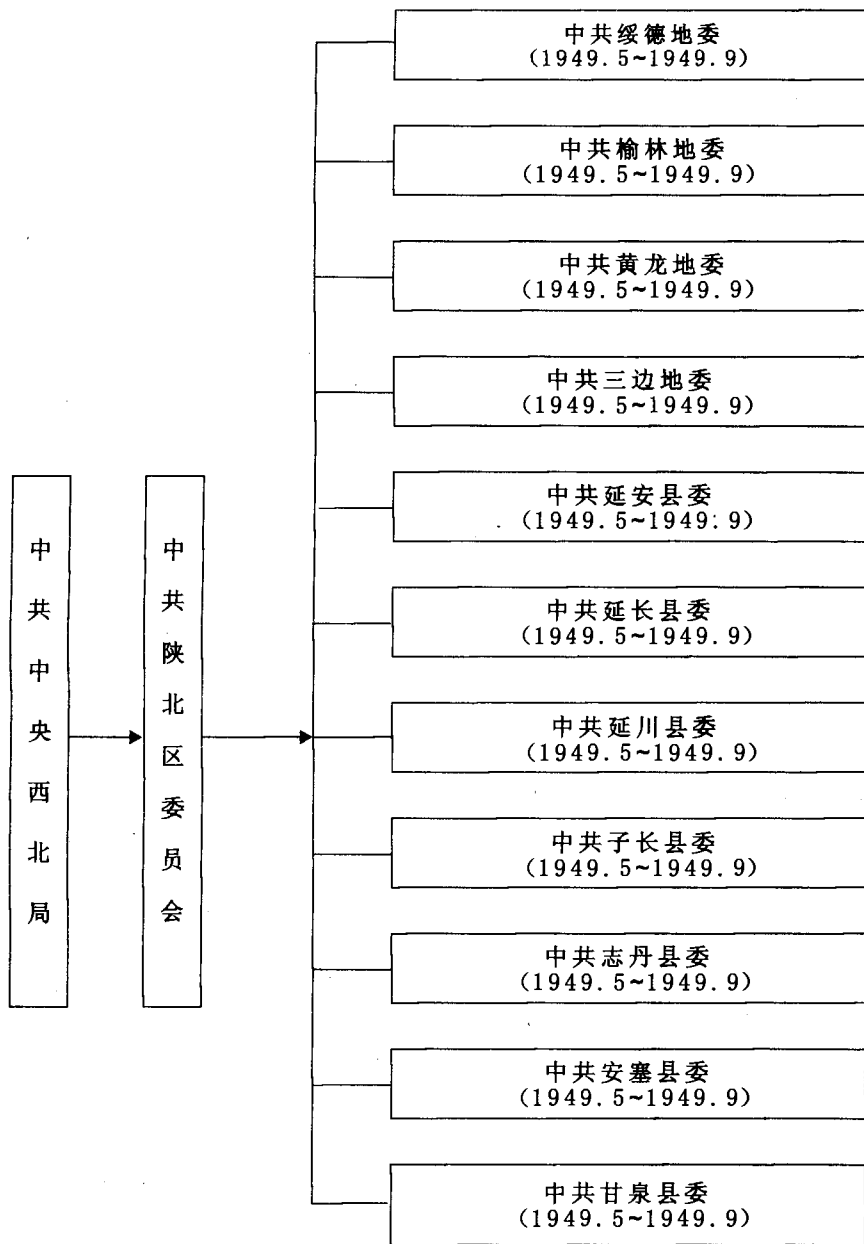
中共陕西省工作委员会组织序列表

(1946.1~194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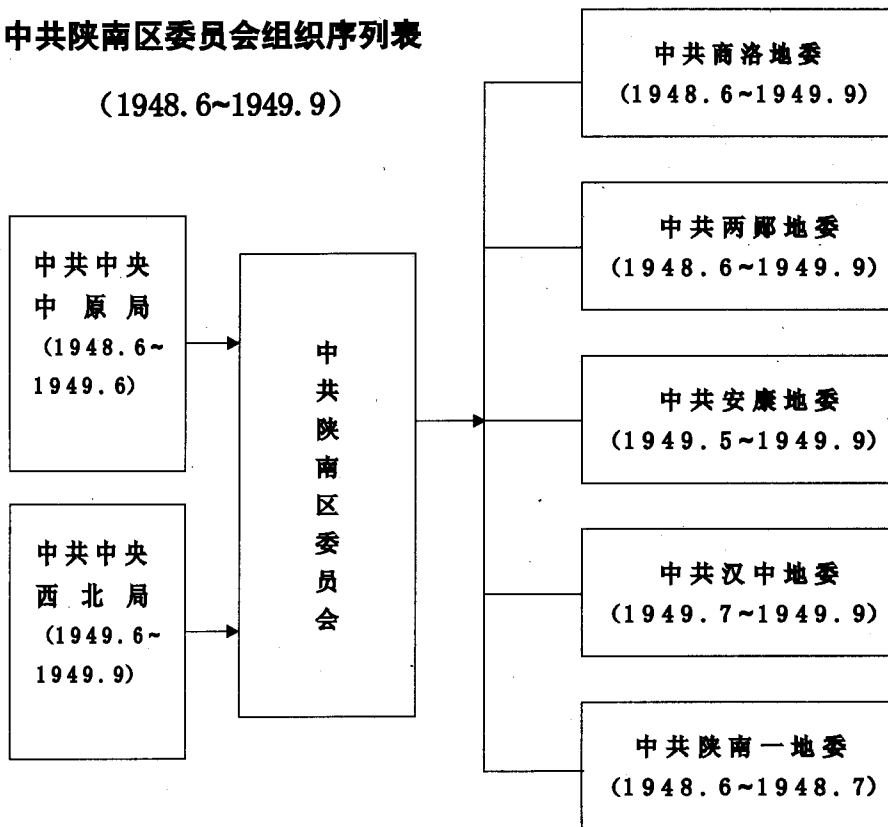
中共陕北区委员会组织序列表

(1949.5~194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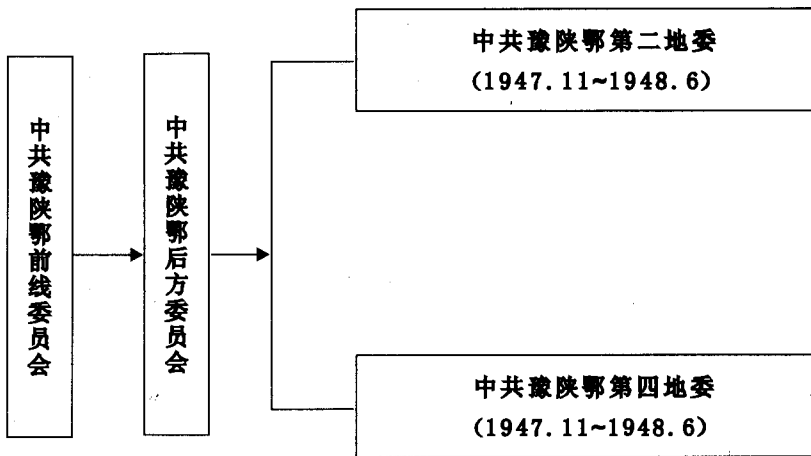


中共陕南区委员会组织序列表

(1948.6~1949.9)



中共豫陕鄂区前（后）方委员会下辖陕西党组织序列表



责任编辑 刘景巍



ISBN 7-224-06349-5



9 787224 063493 >

ISBN 7-224-06349-5/K·1085

定价:260.00元 (上、下)